
打倒刘少奇
西安美術文革


打倒刘少奇
西安美术文革

目录

出版说明

刘少奇言论集（1958.6-1967.7）

02 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1958年6月14日)

03 同北京日报社编辑的谈话(1958年6月80日)

04 在石景山发电厂的讲话(1958年7月5日)

05 在天津地委的讲话(1968年7月19日)

06 在南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83日)

07 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24日)

08 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27日)

09 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1958年10月8日)

10 在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纪要（1959年8月24日）
11 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9月9日）
12 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发言（1959年11月）
13 给黄炎培的复信（1959年11月28日）
14 与王光英一家谈话纪要（1960年1月31日）
15 同民建会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的谈话纪要（1960年2月12日）
16 关于报纸宣传工作的讲话（1961年4月28日）
17 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讲话（1961年5月1日）
18 在湖南宁乡炭子冲干部和社员会上的讲话（1961年5月7日）
19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5月31日）
20 在内蒙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8月6日）
21 关于禁止商品“走后门”问题的谈

话(1961年10月22日)
22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
23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上的两次讲话(1962年1、2月)
24 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3月21日)
25 对中央办公厅石家庄和无锡调查组的指示(1962年4月24日)
26 在总结四年政法工作时的谈话(1962年4、5月)
27 对下放干部谈人民公社问题(1962年7月18日)
28 在晋南地委负责人汇报关于加强生产责任制提高农活质量问题时的讲话(1962年8月27日)
29 对组织部负责人的讲话(1962年11月12日)
30 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58年11月18日)

31 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1964年1月8日)
32 同王光美谈四清(1964年春节期间)
33 给王光美的一封信(1964年8月27日)
34 同某国文化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4月19日)
35 在河北地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2日)
36 在济南部队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9日)
37 在安徽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13日)
38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1日)
39 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8月10日)
40 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1964年9月1日)

41 附件：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7月5日）

42 关于“四清”、“五反”蹲点问题的报告（1964年9月16日）

43 在经委党组汇报工作时的讲话（1964年9月23、26日）

44 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45 在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期间的谈话（1966年8月31日）

46 在工交系统四清试点座谈会上的讲话（1965年7月5日）

47 关于城市半工半读问题的讲话（1966年11月6日）

48 转发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的批示（1966年1月23日）

49 附件：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50 关于大庆矿区建设的宣传报道问题的讲话（1966年2月96日）

51 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批示(1966年6月20日)

52 附件：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1966年6月18日)

53 同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部分组员的谈话(1966年6月20日)

54 在听取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的讲话(1966年7月11日)

55 在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时的指示(1966年7月13日)

56 附件：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1966年7月14日送审稿)

57 在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9日)

58 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几次讲话(1966年8月2、3、4日)

59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1966年10月23日)

60 向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检查(1967年4月14日)

61 向北京建筑工业学院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1967年7月9日)

附录

附录 突破网络封锁
附录 左派网站
附录 后记

中国文革研究网：http://www.wengewang.org

01）出版说明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震荡着全中国，震撼着全世界。亿万革命群众，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指引下，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他们的总代表刘少奇揭露出来了，把隐藏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的这一伟大胜利，对于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具有极其重大的、深远的意义。

当前，一场埋葬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伟大战役，正在祖国大地上威武雄壮地进行着。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运动。大批判运动不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动力。形势一片大好。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正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一旦时机成熟，他就要篡党篡政，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

长期以来，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厚颜无耻地自我标榜是什么“老革命”。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必须剥去。”在全国胜利之前，他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结成一伙，疯狂地反对武装夺取政权，推行“议会道路”。在全国胜利之后，他竭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借口中国生产力落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而要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他大肆宣扬“阶级熄灭论”，鼓吹阶级调和，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企图复辟资本主义。在激烈的国际阶级斗争中，他竭力推行“三降一灭”的投降主义路线。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妄图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他一贯疯狂地反对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刘少奇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假革命、反革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老牌机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混入我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总代理人。

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掀起以后，中国的赫鲁晓夫为了保住自己和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炮制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白色恐怖，疯狂地围剿无产阶级革命派，妄图扼杀我们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是，刘少奇辈象古今中外一切反动派一样，“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彻底揭露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革命面目，彻底揭露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活动。中国的赫鲁晓夫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破灭了。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妄图在中国通过他们的代理人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破产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果，极大地鼓舞了和鼓舞着全中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四九年全国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候，曾告诫我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派对于他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们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无产阶级革命派必须牢牢地记住毛主席这个伟大教导，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赫鲁晓夫，虽然被广大革命群众揭露了出来，成了“落水狗”，但是，他们的反革命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每时每刻都在伺机反扑，妄图东山再起，如果我们忘记历史上许多血的教训，让他们的反革命阴谋得逞，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就将人头落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就将付之东流。

当前，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布署，牢牢掌握革命斗争的

大方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集中火力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猛烈开火，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批得中国的赫鲁晓夫比当年的托洛茨基还臭，比眼前的赫鲁晓夫还臭，让他遗臭万年，永世不得翻身。

为适应广大革命群众对刘少奇开展革命大批判的需要，我们搜集了他的一部分文章、讲话、报告、信件、“指示”，按年代顺序汇编成册，陆续出版。刘少奇的言论是一种很好的反面教材，希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认真地读一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一最锐利的战斗武器给以彻底的批判。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编者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

02）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1958年6月14日）

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个问题，大家看能办不能办。要组织生产，也要组织生活，是不是组织生产运动是基本的主要的，把生活也可以组织一下。我也是还没有想好的，还不成熟，不要拿到外边去吹。一切经过试验，取得成熟经验，然后再推广，推广时再吹，再刮风，如果没有经过试验，就刮风，就会出毛病。这里讲一个宣传问题，对新事物作宣传，特别是号召大家办新事物，要选择个时候，有什么建议，提出个计划纲领、意见，还未实行过，但是想要实行，那么，就要经过试验，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切经过试验，有放手发动群众，还有一切经过试验。宣传工作有几种，一种宣传是讲讲道理，并不要行动、组织；还有一种宣传是宣传办什么事，例如办托儿所，一宣传，大家都行动起来了，把托儿所办起来了。还有办合作社，一股大风一刮，就刮起来了。最近关于半工半读学校，在报纸上大登起来，宣传得嫌早了一些，还没有成熟经验，一登报，大家都办，大批地办起来，势必大批的垮台，因为还没有成熟经验。

今天我提出个问题，你们如认为可以办，就去试验试验，不可以办，就拉倒。

×××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我看过，她提出进一步解放妇女劳力问题，这个题目很好。河南代表××等三人的发言是讲公共食堂问题；青年团的代表也有讲公共食堂问题的。××××反映江苏常熟县普遍办了农忙食堂，可见大家趋向共产主义。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中写的。康有为二十七岁(一说二十五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阶级界限，男女界限，家族、私有财产……除九界。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时是一些空想，可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受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写书时把空想社会主义者叫伟大的思想家。毛主席讲话时也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要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不知道你们对于消灭家庭怎样了解？你们要座谈一下。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样一来六十年后人人没有家族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想的，他认为家族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族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他说如果把妻子儿子作为私有就不能天下为公，因此，他主张消灭家庭。

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世界上没有不消灭的东西，一切事物都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家庭是怎样产生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书中已经讲过了。人类开始是没有家庭的，有几十万年没有家庭，到后来，才有家庭。人类有家庭的时期很短，以后家庭还会消灭的。毛主席讲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的单位(物质生产和劳动后备的生产)，教育的单位，消费的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的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个消费的单位。

进一步解放妇女劳动力，这确是个问题。现在劳动力感到不够，特别是在农忙的时候，不是农忙季节也是感到劳力不够。城市的劳力是不是够了？城市要发展工业，工业普遍发展，也需要劳力。宁波市街道办了二十几个工厂，北京市也提出了每条街办工业，因此，把劳力节省出来还是有用的。不要怕人多，现在是劳力不够。怎样节省劳力？社会上是不是还可以大大节省劳力，腾出很多劳动力来多快好省地从事生产建设？现在社会很多劳力还有浪费，我们国家机关就有浪费，机关多用了几百万人，浪费很大，这几百万人的消耗等于全部国防经费。社会上的劳力也有很大浪费，这里牵涉到妇女劳力解放问题。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作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孩子，家家补衣服，作鞋子，有那么几项是家庭要作几项劳动。农村还有磨面等。这些都是家务劳动。的确，我们也曾鼓吹了下家务劳动，

三次妇代大会提出勤俭持家，那个决议案是对的。在没有想出新的办法之前，只有那么作。在工厂、机关没有事情作，有人作不了工作，还请个保姆，自己回家搞家务正是节省了社会劳动力。但这样作不能作为长期的方针，不能讲将来的目标就是这样，还是要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不是对妇女特别有好感，而是为了整个生产，为了社会的进步，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应该是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件设想：要建立很多的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的事业。在农村、工厂、机关、街道无非这四个地方，其他地方还有，但那是比较很少数的地方。主要是农村，工厂、机关、街道。组织生产是基础，是否可以把职工家属、农村妇女为生活服务的基础上组织起来。为生活服务的基础上组织起来，可以节省劳力，腾出很多劳力去参加生产。同时，可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他们参加社会劳动，成为社会劳动力。河南有一个农业社，有五百多户人家，其中二百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作饭了。组织起来之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二百多人作饭，现在只要四十多人作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二百多人作饭变成四十个人作饭，同时把煮饭的事业变为集体的事业，变为大生产、大经济。这样，在集体的事业中，就有很多新的工作，如政治、思想、业务、政治挂帅、经济核算等，和工厂一样。对这个问题要进一步系统地想一想，现在的问题是不限于农忙的时候，不只搞农忙食堂，农忙托儿所，而是把家务劳动有计划地有系统地逐步组织起来，组织成为大规模的集体的服务事业。就是原来这些煮饭、洗衣、带孩子的人，合起来搞。合起来搞，要比原来分散的搞得更好些，更有条理，一定要比原来搞得更好些，显示了优越性，人家才愿意来。向这样一个目标奋斗，不一定在一二年内全搞起来，时间长一些也可以。

不只是在农村，城市里也要组织生活。我到上海职工宿舍区去看，小孩子多得很，象蚂蚁子一样，哇哇叫，工属抱着孩子没有事情作，每天是带孩子、煮饭、洗衣服，情绪不高，问她想什么，她想找点事作，可是没人带孩子、煮饭。没有事情，又不甘心，只好带着孩子去串门子，东说西说，说闲话，引起吵架、纠纷。有人宁愿出去替别人煮饭、带孩子，自己家里又请人来煮饭、带孩子。为什么呢？因为她们认为带自己的孩子是家务劳动，带别人的孩子是社会劳动。作了工人，心里愉快些。现在是不是可以设想，把职工家属的家务劳动可以组织起来，不要家家烧饭、洗衣服、补衣服、带孩子、作鞋子，而是合起来作。不齐心，落后思想可能有，比如：怕小孩子吃亏，……等；这是落后意识，不要光看这一面，还要看另一面，家庭妇女操作家务很苦，一有出路，有了光明前途，心情愉快，积极性会很高，他们进步可能会比别人更快，愈苦闷，积极性愈高，干劲会更大。眼光要看远一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从现在开始，逐步前进，一直作下去。家务组织起来，劳动力多出来了怎么办？劳动力节省出来，这是好事，首先是扩大服务事业，不只是食堂、托儿所这些服务事业，而且家属可以把商店搞下来，代购代销。原来的商店店员，只留下几个人作师傅，节省下来的人可以调走，调到需要的地方去。特别是新的工业基地，如包头等地，就是没有服务事业。要组织家属开商店、理发店、裁缝店、电影院……一直扩大，有多少人力都利用起来。象鞍山那么大的地方，净男工，我们动员过家属还乡，但并不是永远不叫家属来，我们要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没有老婆怎么行？男女不搭配，不平衡是不行的。郑州七个纱厂在一起，成了女儿城。鞍山每家都有家属，可以把家属组织起来作事，商店、洗澡塘、电影院、戏院，还有市内交通，如公共汽车等，一切服务事业，统统由家属作。以后可以不给鞍山送布去，只供给棉花，在那里开办纱厂、布厂，工属可在厂内作工，还有食品店、肥皂厂……等。凡是需要的都搞，这样势必所有劳力都有事情作，把劳力从家庭中解放出来，搞面粉厂、轻工业、公共交通、服务事业，劳力多多搞，劳力少少搞。总而言之，用完那些劳力，现在是这么设想。家属搞服务事业会不会挤了已有的服务行业？不要怕挤，现在商店这一环已经突破了，已经有几十万商店的人下乡，天桥的经验，就大大节约了人力，使劳动力更合理的分配，节省下来的商业人员可以支援工农业，一挤他就叫，一叫起来就解决问题。你说这里无事作，那么还有许多地方没有服务事业，没有商店、没有理发店，就可以把这里多余的人调到别处去。这是整个社会劳动力合理调配合理分工的问题。现在不是理发师、裁缝多了，而是少了，就是有些时候多了，也是暂时现象。如果组织公共食堂，势必要请大师傅，组织商店，势必要请熟练的店员，组织理发店，势必要请理发师来教，成立裁缝店势必要请裁缝来教。人只有那么多，到

处都请，就会感到不够。一搞起公共服务事业来，就不是家务劳动的水平，要提高技术，促进劳动更加专业化，要吸收熟练的人当师傅，当教员。

家务劳动社会化之后，要作到又节省又好。要比在家里节省，从理论上讲是一定会节省的。一定要搞得好些，要满足各种复杂的要求，男人、女人、老太婆、小孩子、病人，各种人需要的都能供应，病人病了吃什么，食堂要能解决，不能搞了这样，没有那样，一定要把这个事业办好，表现它的优越性，人家才愿意来。还有小学教师，也可以从家属当中选人来担任，没有上过师范的可以去学一下，家务劳动成了集体的社会化的事业，就要求提高技术，慢慢地改良工具运动，技术革命也要在服务事业中实行。列宁讲：妇女解放，必须把家务劳动变成大经济，这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始。乡村、工厂、机关、街道都这样搞。不只是在生产上把人们都组织起来，而且要组织生活，使服务事业配合生产运动，为生产服务，又促进生产的发展，这样，家属就成了促进派，服务事业并不只是消费，也有生产，作饭也可以说是生产，这是食品工厂，是食品工业。补衣服是大修理，理发也是修理，总之，都是社会上必需的，不可少的。

组织起来搞，怎么搞法？政府办呢？还是群众办？政府办了，群众觉得那是政府办的事，不那么密切关心。今后是要群众组织起来自己办，这同妇联工作很有关系，进一步解放妇女劳力的问题，也就是妇联工作方向，不要政府拿钱去办。组织形式是什么？是不是也叫合作社？或者叫服务合作社，或者叫消费合作社。规模少许搞大一些，互助组已经搞了这么久了，是不是可以提升一下，高级化一下，有那么几百家，没有几百家不好办，要有个几百家、千把家。大的食堂，大的洗衣房，有这样大经济生活的单位，生活就不是家庭生活了，就是几百家成为一个生活单位了，不是一家一家生活的，这是比较有点规模的生活单位。将来很多事情都可以机械化了。当然这不完全是女的，也要有几个男的，体力较强的。至于以什么为单位，乡村以社为生产单位，同时也就是消费的单位，城市可以工厂、街道为单位，有了一定规模，就有许多工作做，要推广洗衣、作饭等先进经验。可以搞很多的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所说的，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完全可以设想，到将来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十五年等于三、四个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目可以进入共产主义。大工厂、大机器厂的布局不要只想到现在，还要想到将来。新建的工业基地完全可以实行新的规划，宿舍所在地建立一套商店、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医院、浴室、电影院……等等。可以先在新建的大工厂区试验一下，如石景山这个地方，这么大的单位，有这么多人，可以去试验一下。搞几个典型，搞个千把人家的食堂、商店、托儿所……作用很大。那时候生活就不限于家庭，不再是家庭：生活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曾经组织新村，日本也有个人组织新村，我在入党以前看过组织新村的材料，很形象化，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看了心里激动了。要搞得好，势必依靠群众的积极性，主要依靠工属和农村妇女。不是说工属不能加入党吗？作了这些事情，共产主义觉悟提高了，就可以加入党。不要轻易组织，要经过思想发动，组织大鸣、大放、大辩论，花个几十天。详细讨论。如不交伙食怎么办？托儿所打孩子怎么办？要大家讨论。发扬共产主义精神；替大家办事，比办自己家里的事还要办得好些，更认真、谨慎。妇女们很苦闷，这个光明前途一来，大家情绪就更高，马克思讲过，受压迫愈厉害的，觉悟可能更高。我到四川去到一个合作社员家里去，男社员下工后去抽烟，他妻子带了四个孩子，喂两口猪，家务重压得很，我去时她正忙着给猪煮食，光顾烧火，问她生活好不好，她头也不抬，简单地说："好！入了社，还有啥不好！"看来心情不很舒畅。如对这种人讲清楚，说孩子有人带，猪有人喂，她就抬起头来了。

这些牵涉到一个工作原则性的问题，妇联工作的方针问题，解放的道路问题。社会的组织，生活的组织形式，用什么方式组织起来，是家家烧饭，个体的，还是集体的组织起来，势必有些生产合作社是个生产单位，也是个消费单位，分作三、四个村子，就是三、四个单位。工厂宿舍区，一个街道，都是生活的单位。是不是将来就这样过下去，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组织形式。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共产主义，但在社会主义阶段就要准备好条件，将来到共产主义就不要重新改组了，利用现在的这些，再加上一些东西

就行了。如果组织生活，势必需要工厂、机关、商店、农业合作社配合。比如商店把人抽走，职工家属包下来办，留下几个师傅，他的工资可以保持原来的。这些事情可以试办一下，你们研究。现在先不登报、刮风，搞群众运动。只要是好的比较典型的经验，推广很容易，好货色是容易推广的。货色不好不要推广。要比较有成熟的经验，多几个地方搞，不要登报。杂志上当理论问题探讨登一点是可以的。

家庭已经不是生产单位了，家务劳动社会化之后，消费单位也剩一半了，分配还是把家庭当作一个单位分配的。群众组织起来，工资不能按照国家工资标准，就按合作社的工资标准，家属售货员不能与店员工资一样高。这里边也就没有政府了，完全是经济组织，由群众自己制订公约，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恐怕全由群众集体搞好，不能由国家搞，国家实际上予以帮助，不要讲民办公助，就是群众办，实际上助就是了。如果一讲公助，就会依赖国家。

要先去试办，特别是在新工业基地，去搞新工业基地可以按我们的需要去布局，搞好了可以组织参观，刺激其他地方。将来势必要有养老院、幼儿园、残废院……等等。

要经过宣传，讲清道理，经过讨论，典型试验，初步带点系统性、规模性，要全面规划全面安排，有系统地去搞。

这工作是社会的责任，也必须有党的领导，势必要有党的支部，有青年团，过去家属不能加入党有苦闷，过去家属是附属组织，今后是不是可以这样提？所有工业基地和所有城市服务事业统统由妇女办，这样妇女积极性就大了。而且男女平衡，阴阳调合。今后男人搞生产，搞政府是以女人为主。组织起来，大有可为。

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这个口号是不错的，今后还需要勤俭持家。

03) 同北京日报社编辑的谈话(1958年6月80日)

编辑：有人说党让作什么就作什么没出息，对于作党的驯服的工具想不通。

刘少奇：**不做工具，做什么？作党的工具好不好？作驯服的工具好不好？很好。**有些人把党当成汽车，他是开汽车的，想爬到党的身上驾驭党，否则他就是汽车，党来开他。党是不是工具，是工具，我们也是工具，工具论。党是人民的工具，是无产阶级的工具。国家也是工具，阶级统治的工具。范瑾是不是工具，你们是不是工具，编辑、教授、专家、主席是不是工具，都是工具。

作个什么样的工具？驯服的工具，还是调皮的工具？是容易驾驭的，还是不容易驾驭的？

说工具，工具有死工具活工具。死工具，不推不动，推一下，动一下，象汽车，不开它不动；不关它不停。这是死工具。还有活工具，牛、马是活工具。毛主席不是在“整顿三风”里举过例子么，捉猪猪要跑，杀它它会叫，它不愿杀。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叫奴隶是活工具。人更是活工具，不仅身体活动，脑子也活动。脑子多活动些好，还是少活动些好？当然是多活动些好么。敢想、敢说、敢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精通业务，动脑筋的人与工具似乎是矛盾的。动脑的人就不能作驯服的工具，作驯服的工具就不能动脑筋了？作一个驯服的工具，又有理想，是绝对不能统一，还是能统一？这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有一致性的。

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这篇文章里驳斥反对派。谈到螺丝钉问题。是不是做工具，人怎么能做工具呢？有些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说服从党的分配的人是盲从，驯服的工具，还说了许多不好听的话，什么“没出息”，“碌碌无为”，“没头脑”，“平生无大志”，却没接触到什么是工具，作不作工具的问题。报纸、党、国务院、主席、总理，是不是工具，国家是不是工具，都是。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区别于资产阶级的观点，是唯心论和唯物论的区别。

“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总结，要有战斗性。张家仁是战斗的，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鄙视服从组织分配的党员，他战斗，不答复不行。无产阶级要插红旗，他插了白旗，我看是插白旗。这种思想是应当批判的。好象只有他是高尚的，别人都下一等，他鄙视碌碌无为的人，这是西风压倒东风，他压倒人家么！

“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提法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提得更好一些，更妥当一些。这么提，答案就是应该有或没有，即是或否。人家说是，不对，说否，你们又说不对，是不是问题的提法有问题。正确的答案应是：是，或者不是。也是也不是，这样提法就不明确。两种意见，都包含有正确和错误的方面，不全对。两边有所否定，又有所肯定，那你们这么提。你们的答复是应该有，但有条件。问题这么提，难免各执一词。这问题实际是三种意见。比较正确的意见是第三种，即又要有，但是又要服从党的要求和需要。

现在人们的想法，提起个人志愿，干什么，就想干好一点的。有远大的理想，这是我们提倡的。每个人应该有所作为，力争上游，应有伟大的个人理想，但是个人是不可能独立的，个人是社会中间的人，是集体中间的人，而且是社会的时代的历史的人。不是封建时代的人，几百年前的人，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他有社会性，历史性。

因此，个人志愿是不是伟大，能不能实现，要看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还是促退作用。退进是好的、进步的，促退是反动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多促进一点还是少促进一点，即促进大小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对社会的发展促进就很大。有些自然科学家也能在自然科学发展上起关键作用，卫星上天，就为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开辟了新纪元。

促进大也好，小也好，总算促进，这是一派。马克思促进，我也促进，你们也促进，我们是一派，和反动派不一样。反动派都是促退的。促退的不一定都是政治上反动的。

如何促进，要看历史情况，看历史向什么方向发展，和人民一道，就是人民的方向。方向错了，就是促退。人民要向那方向前进，是历史车轮，不能阻挡的。促进就应当根据这一点。

要是促退，还叫什么个人志愿，往坏处说，那是遗臭万年的问题。个人志愿是否实现，看你是促进，还是促退。这是一个问题，方向正确就能促进，个人志愿就能实现。

党也只能这样，党的作用即在于坚持人民的方向，历史的进步方向，革命方向。而且在关键的时候，紧急关头，能看得出来，采取正确的措施，渡过紧急关头。坚持正确的人民的方向,要靠掌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要有预见，不是正确的党、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办不到。历史上没有任何党派阶级能做到这一点。只有掌握了马列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才能做到。

假如党掌握的方向是正确的，凡是符合党的政策的人,真心诚意，好好地去干，创造性地去干，都是能成功的。党和人民成功了，胜利了，为党和人民的方向努力奋斗的人也成功了，这是一致的。

党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很多，党号召干什么就于什么，党号召土地改革，上山打游击，他就干，不是成功了么。当时当农民的人，现在当了将军。如果不根据党的指示，顺这一方向去作，不能当将军。那时候，有不少人比现在当将军的人聪明的多，他们以为上山打游击划不来，不去，就当不了将军。

“一二．九”以后，抗战开始，党号召大家上山，很多民先队员上山。有些人起先不去，后来还是去了。有些人硬是不去，有个人志愿，要写诗，写小说，搞自然科学等等。比较起来，还是上山的个人成就比较大。那时上了山的北京大学生，现在有的都是地委书记，部长助理，有的是副部长，不上山的现在也在工作，但当不了地委书记。地质部的副部长来应，当时学地质，后来上了山，现在当副部长。但老学地质的，不能当部长，当不了。这是历史事实。

党有时掌握方向不正确，也要犯错误。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大错误犯过四次。影响相当大。陈独秀是一次，“左”倾三次，李立三、王明、瞿秋白都犯过错误。小错误就更多了。不听中央的指示，个别地区犯错误就更多了，中央分配工作错了也是有的。中央不错，地方错了，是局部的暂时的，还不要紧。中央一号召，他们就改了，不改，就撤他们的职。

分配党员工作时，我们主张倾听个人意见，允许人家说出自己的意见，愿意作什么，希望作什么，长处是什么？愿到什么地方去，尽可能照顾。但只是尽可能，不可能完全满足。还是根据需要，革命的需要，历史发展的需要，不愿干也得干。党说要打仗，不会打也得打，现在不打仗了就干别的。你能说我就愿意打仗，别的不干？王震同志是搞军事的，现在开荒去了。李先念同志也是搞军事的，现在当财政部长，我想他做梦也没想到会作财政部长。

那时大家都上山。在大家都上山的情况下是否允许有个人兴趣？在一定限度之内，也还允许。上山打游击，也写小说，写诗，还不是写他的。

现在是大家搞经济工作，经济建设是中心任务，要搞技术工作，文教工作，这需要大量干部。最近不是调了很多人到学校搞教育工作么？他们从前根本不是搞这一行的。

如果不这样，个人也不会有什么成功。因为历史发展方向如此，个人作用再大，莫不过于促进历史的发展。个人顺着历史发展，才能促进历史前进。将来写历史的时候，写上你一个名字，个人名利莫过于这个吧。

掌握大局的是党，当然党也会犯错误，你个人正确了，但是这种时期是很少的。党外正确，党内不正确，这种情况也极少。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康有为、孙中山，工业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试过了，不能成功，失败了。康有为搞戊戌政变还有进步作用，后来就不行了。孙中山搞了三大政策，还有进步作用。教育救国、工业救国成功了没有？梁漱溟搞乡村建设搞了一辈子，写了那么多书，历史上要不要写上他一笔？

我们成功了，也不过是因为跟着党走，党走对了，我们也走对了。所以你们能当社长、总编辑，否则谁要你们来当？

历史上一切政党、伟大人物要毁灭的。从前有不少人人物，希特勒、蒋介石，有一阵不是很出名么？凡与人民方向不一致的，都要毁灭。只有共产党不会毁灭，因为它掌握历史发展方向，特别是大方向，有马列主义。只有跟着共产党，个人才能成功，即使改了行。姚依林原来学化学，后来上山了，现在搞商业。鲁迅原来学医生，他觉得搞文学能代表人民说话。他们才成功了。假如姚依林还搞化学，顶多么，象傅鹰这个人吧。搞化学，搞专家，还是人民需要的。但不是人民需要的关键。当时“七.七”抗战解决历史的关键问题，还是上山打游击。

搞实业救国的李烛尘，搞了一辈子工业，办起几个工厂，作了点有益的事，但不是解决人民需要的关键问题，解决历史的关键问题。写历史，就不必写他一笔。历史上就没他的名字。有名的还是井冈山、太行山……等，这些都是要上历史的。

没有山头，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是问：中华人民共和国那里来的？回答是：从山里来。什么山？井冈山，五台山，太行山……等等。山头是谁，历史就有谁，能说是李烛尘办了几个工厂么！那不能写。这是过去的历史。

现在讲将来，要看得远。历史走向何处？党还要号召人们去作许多事情，需要很多人。作得好，会有成功，党会成功，人民会成功，个人也会成功。反其道而行之，除非是党错了，他对了，象铁托、纳吉的党，这也很难讲。但是，过去党犯错误，也只有很短的时期，那是最困难的时期，没有经验的时期，就是犯错误的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只是在如何反法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在达到目的的路线上犯了错误。我们的党过去从建党时候起，就是反帝反封建的。陈独秀依靠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所以错了，反不掉，结果失败了。抗战时，王明依靠国民党蒋介石打日本，不依靠八路军、新四军、山头，结果抗不了战，抗战胜利了也是旧中国。我们不依靠蒋介石，依靠人民，山头、自己就能打败日本，建设新中国。打败日本之后，建立新的中国，不是旧中国。

现在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目标。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几种方法，这是新问题。也有人不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是资产阶级右派。还有些人口里不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对这种情况要善于观察，毛主席要我们辨明方向就是这个意思。有些人就是不愿搞社会主义，这是资产阶级分子。有些人愿我们最好不搞，要搞也慢一点，不搞就好了。还有速度问题，是慢还是快，这是两条道路，两种方法问题。有争论，要善于辨别。

不想搞社会主义的人，党号召他搞，他不搞，说不合自己的志愿，那会有什么大作为？不搞社会主义要成什么家，不可能成家。即使成名成家，无非是傅鹰这种人，甚至身败名裂，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定的。

将来，我还是根据过去想将来。将来的社会什么样？参加“共产党员应不应该有个人志愿”的讨论的人，多半是青年，现在不过二十几岁，要过三、四十年，他们算是有所作为的人了吧。三、四十年之后我看可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要现在你们这样的记录员、记者、编辑、社长、部长、工人、农民、勤务员么？恐怕都变了。报纸还有，但不是现在这样，部长也有，但不是现在这样，工人农民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的学生。那时候，人人作工，人人种地，人人扫地，人人当编辑、部长，人人当厂长。不止一门，门门都行，既会种地，又会作工，也会开汽车。那时候恐怕找不到汽车司机了，苏联现在就少了，现在是汽车会开才卖给你。人人当编辑，也会写小说，当然也有些人不愿写。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界限要消灭。可以采取半工半读方式。四小时作工，四小时学习，高中三年，他上四年，大学四年，他上五年，还可能不要那么久，工人不就是大学生了吗？大学与工厂合一。这样普及教育会更快一些。

农村中，搞农业中学，农业中学现在只是初中，要搞高中，高中毕业要搞大学，半天种地，半天读书。年青的工人农民都读了书，现在翘尾巴的人，就翘不了。你说你不干，别人来干。干什么？还是种地作工。那时候，不论什么人，专家、部长，都要种地作工。现在已经开始了，部长们去十三陵劳动，每年下去四个月，将来不是下去四个月，而是种地。又是部长，又是专家，又是工人农民，一定这样，不分什么界限。专几门，普通的工作都会做。一定要学，每人还要精通几门。教员教书，不一定一辈子，也可以种几年地，有理论，又有实际。一种职业干一辈子，没有那种事，特别是我们这些领导人，一辈子当县长、部长，不会有的。

工人农民的界限要消灭，农民会作工，工人也会种地。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试验。恐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净种地，作工净作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农村现在合作社是生产分配教育单位，城市里是工厂、机关、学校、街道。现在是单打一。北大只读书，石钢只炼钢。现在农业合作社已开始办工厂、商业、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

将来发枪，统统把枪背起来，每年操练几个礼拜。现在义务兵，一年练不了几个月。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兵学商都有了。

合作社多种经营，将来各单位都多种经营，在基层单位什么都可以看到，什么都有了。小孩子从小到大，工业、农业、商业，什么都可以看到，什么都不是外行(小麦韭菜不分，就有很大的片面性)。在这种单位长大的小孩子，又会种地，又会作工，又会读书，当兵，当售货员。普通工作都可做，又有高度文化。专业不止学一门，将来专业分得那么细，分工多样性是有的，但有些普通的工作，人人都可以做。一个人，样样会不可能。原子能、机械、化学等等……，将来不只是七十二行，而是万行，都精通不可能，但精通几行，会十八般武艺，是可以的。李先念过去打仗，现在搞财政，姚依林搞化学，现在搞商业，就是一个例子。许多人想当专家、教授，也难怪。他们只是看到现在，看到专家、教授、部长最好，没有看到将来，将来就不是这样了，他们的理想要落空了。

现在的青年多数在变，不变也得变，存在变了么，“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不是有人死也不变？少数人一定会有。问题是我们要不要促进他变化，要进行批评、斗争，促进其变化。

现在青年同志的志愿，是根据过去、现在的情况设想的。现在社会上冒尖的是专家、工程师、负责人，他们就向往这十方向，但社会在变，他们刚刚设想好，社会变了，就没有这些东西了。不是从发展看问题，以为过去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过去许多东西是资产阶级的，包括我们现在许多规章制度，另外因袭了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所谓五气，这是资产阶级性质，还是无产阶级性质？只能挂在资产阶级帐上吧！在我们一些机关里，规章制度，还有这种东西，青年人也在学这些东西，羡慕这些东西。他们没接受劳动人民苦干三年的前进的东西。我们机关也有五气，他不信服。他们不是鄙视资产阶级这些东西，而是看资产阶级这些东西，羡慕得很。

社会上有无产阶级的进步力量，还有旧社会的力量，而后种东西很快就会过去的。将来工人阶级的专家、教授、干部、工程师，没有五气，没有资产阶级专家的派头。将来一年当几个月专家，还种几个月的地，也可以当编辑，写诗，写小说。现在这些青年脑子里就没想到这样的情况，没想到将来一个有专业知识精通业务的劳动者，是体力劳动者同时也是脑力劳动者。现在没有人有这种志愿，应该有这样的志愿。现在强调个人志愿的，多数带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当然不是全部。特别是张家仁，是插白旗的。他鄙视那种服从党的分配的人，企图把他们压倒。这是极端的个人主义，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不能允许的，和人民需要格格不入。

另方面，有的老干部，确实有些衰退，朝气不足，干劲不够，安于中游。但他服从分配，党要干什么就于什么，他们有缺点，但还是无产阶级的，他是跟着党走的。他们的干劲可以鼓起来。

讨论里有阶级斗争问题，对×××应采取同志态度；对张家仁，应采取彻底的批判态度。

在党的方针之下，允许党员有个人志愿，但要根据需要。现在在搞普及教育，没人当教员行不行？你不愿作，是否教育就不发展了？现在当教员恰恰是人民需要的。很多人愿意写诗，写小说，当作家。我的小孩子愿意当演员，喜欢跳舞、唱歌，但国家不能要很多人搞这个，因为搞这个的人多了，就不能吃饭。演员、写诗的不能多。写诗是可以的，业余写写诗么。毛主席也写诗。整个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要考虑。

现在愿搞工业的，多数可以满足，但是工业也是各行各业，机械工业最多，但越是多，大家都干，越不容易出头。比来比去，恰恰是人少了易出名，因为只你一个。

应该根据党和人民的需要去发展，党的事业成功了，个人也跟着成功了。个人的胜利，不要放在第一位。

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历史的需要，需要很多，大家不来，需要不多，大家都来，怎么办？国家还要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许多青年人立志愿，不从实际出发，幻想成分很多。有人要搞原子能，这个志愿很好。但是，许多人不切实际，没有多少根据。当然有学得较好的，可以适当照顾他们的兴趣和特长分配他们。现在学校招生有第一、二志愿，也是这个意思，但志愿不能完全满足。

到共产主义社会，计划更严格，不会比现在纪律性差，而是严格得多。不要以为共产主义社会个人自由那么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是少得多的。中国要到六十亿人口，一个人睡一个床怕不行了，说不定要轮班睡。马路上走路也不能乱走。人只是在山里当野人的时候，比较自由，没有那么多规章制度。这是个必然性问题。个人志愿也是合不合乎必然性问题，个人志愿在必然性之内。是个人认识必然性，还是党认识必然性。跳舞唱歌的人不要那么多，是必然性。个人志愿与必然性要统一。有计划比例发展是客观规律，也是必然性。

分配问题。服从分配就没创造性了？不能这么说。没作过的，去钻，不要神密化，钻两年就行了。真要搞原子能，我也行。干什么，钻什么，会什么，搞革命就是如此。我们不会打仗还不是学会了，我们以革命办法搞建设，比资产阶级搞得并不坏么！学校我们过去管的比较少，他们管的多，管的不好。我们调了一批干部去，就可以比他们搞得好。教育家，那么了不起？作什么都要力争上游。除了精通本行，是否还可搞别的？可以。有正业，还可以搞副业，兴趣在哪里即可搞哪里。毛主席就写诗么。你还可以准备改行。不要以为当工程师就永远当，还可以种地作工。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后，什么人都是专家。

将来共产主义社会，不要八小时工作，可以作五小时四小时工作。其余时间都玩了？可以读书，学习，研究。有些人业余研究，比现在专家高明。普通工人农民都可以提高到专业水平。用半工半读办法，有个十年二十年，很多人可以达到大学水平。什么工程师、专家、教授，没什么了，很普通。当然里面有特殊的，有发明创造的人，冒尖的，不冒尖的也是专家。有人说自己一定发明创造，强调个人志愿，但并没有具体研究题目。没有具体题目，没有真钻、真搞，就搞不出名堂来。许多工人、农民，他们倒有具体题目，有具体题目的，党和国家是帮助的。

将来发明的人多了，是否要搞很长时间，花很多钱。现在资产阶级专家搞发明，都讲盖多少实验室，五年十年不能见效。将来发明创造要联系实际。

是强调个人志愿，还是讲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好？个人志愿、兴趣是允许的，党分配工作时尽量照顾，但不能完全照顾。有时违背个人志愿，就应该放弃。志愿也不一定是一门，可以几门。今天在青年中间，造成一种强调个人志愿的风气，不那么好。说有个人志愿就是个人主义，也过于绝对。你说个人志愿应该有，提出这个口号，但你又满足不了，容易被动，说不许有，也不好。

政治挂帅还是应该强调的，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世界，处理自己的问题，这叫真正会作政治工作。我们这种作政治工作的干部，有人叫“万金油”，没有也不行，多了也不好。让我到清华当校长，当厂长，带军队，我都可以去。但我只是靠政治。政治上不强的，不能挂帅。要告诉所有青年人，外行领导内行是原则，内行不能领导内行，钻到里面去就不能领导了。领导是搞相互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这要靠政治，看形势，提办法，到什么时候提什么任务。所以挂帅的人，往往是政治上强的人。是专家、内行，在政治上又能挂帅，当然更好。不懂么，学一下也就行了。王鹤寿当冶金部长，他也不是专家，但搞一两年他会了。要一个炼钢专家当冶金部长就不行。经济学家马寅初当财政部长，一定当不了，他当，大家都没饭吃。李先念原来是木匠，当部长大家就能吃饭，他下面才是专家。当部长的历来都是政治家。法国当部长的是政治家，专家是司局长、副部长，部长经常换，但下面专家不换。英国也是，工党当财政部长的是专家，他也是政治挂帅。也有专家当部长的，那也是政治挂帅，但是少数。

个人的成名，不能长久的，不要看这些，只有根据党的方向、历史的需要去发展，搞几年就能成专家，搞得好就能成为什么领导同志。什么都没搞，就想当专家，随他的便，这不是自封的，不能强求的。领袖不能自封，那得人家承认，自己承认是不算数的。强求势必要发生错误，另搞一套不行。

一定这么搞，就会和人民的方向对立起来了。

提倡敢想敢说敢做，势必有错误意见，让他说出来好么。这是人民内部问题，可以交换意见讨论么，有点资产阶级思想也不要紧，不说还是有的，检讨了，改不改，看看么。谁是最好的人？是不是不服从分配的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人好呢？张家仁答复不了，但是他实际是这样想的，他很硬，所谓“硬骨头”，“有志气”，但他的意见在某些地方和右派观点相同。

撞钟派的人是暮气，我们正在反。我们鼓励党员敢想敢说敢干，力争上游，不这样就是甘居下游，要挨批评。这种人是有的，老干部中有一部分这种人，革命意志有些衰退。

要宣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坚持真理。这是可以鼓足干劲的口号。但是是否要提出一个口号“应该有个人志愿”？强调了，个人问题就来了。个人志愿至少不应该强调，强调了就会出毛病。将来个人志愿，个人要求不能满足的势必很多，需要你放弃志愿，就要发生困难。你有志愿，但照顾一下问问也就够了。

应该强调的是哪一面？强调的应该是另一面。批评的重点应该是张家仁。×××也应批评，一有个人

志愿就是个人主义，这是机械论，不能让人生动活泼了。

共产主义、集体主义，可以更好地发展个性。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个人主义有没有进步性？现在没有，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范畴的，在社会主义时代是反动的。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04）在石景山发电厂的讲话（1958年7月5日）

一．与干部座谈时的讲话：

社会上浪费最大的是人的浪费。人每天吃这么多饭，吸收这么多营养，发生这么多热量，能保持身体健康，有力量劳动，可是有些人吃了饭却不劳动。要对劳动加以组织，组织得好，可以节省劳动力。工具改良，机械化、自动化等等也可以节省劳动力。所有吃饱了饭能劳动的都劳动，给他事情做，组织好，再加上工具改良，能发挥很大力量，得到很大效果。资产阶级经济学不是也说以最少的劳动得到最大的效果吗？不管你劳动得好劳动得不好，都要吃饭，不劳动的吃的也不见得少，吃了还骂娘，不起好作用，还起坏作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让没事的有事做，有事的组织好，五个人的工作三个人做，再加上工具改良，机械化、自动化，我们的国家就不得了！我们的社会将成为怎样的社会！

石景山钢铁厂可以做×千瓦容量的发电机，你们能不能做？能不能做大的？（张厂长答复可以做，如增加设备拨给材料，可以做×千瓦的发电机。）检修工人大修时有事做，不大修就没事做嘛！可以搞制造。不给你们增加人，能不能做大点的发电机？吃了饭有事做嘛！大修一年一次既然改成二年一次，就剩下人了，剩下的人没事做，搞制造就有事做了。检修人员大部分是老工人，比新建厂的技术力量要强。增加点设备，给你们送点材料就可以做。所有修理厂都可以做。要发挥你们最大的能力。你们算一算，每年保证能做多少发电机？汽轮机？水轮机？还能不能做锅炉？可以做多少锅炉？最大的生产能力多少？需要多少投资？请你们算算这笔账好不好？现在全国发电机不够，到处要建设电站，但是没有设备，你们这里潜力很大，修理工人普遍要求制造。钢铁厂可以做×的，你们可以做×的，这很好。搞起制造，检修就变成次要任务，但是还要修理，人力要充分利用，不闲着。运行人员可以学检修，机器停下来时，他没事，为什么不可以修呢？运行搞检修，检修搞制造，搞多种经营。不要单打一，多搞几样才好。钢铁厂现在就用这个办法。工人做多面手的问题提出来了没有？工人高兴不高兴？前几年是前途问题，成了多面手就好了。

石景山将有×万人，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后可能有×万——×万人，是个大城市了。要设法把煤烟、瓦斯、灰尘都利用起来。

石油工业部搞的人造石油，可以去看看，很简单。从油页岩和煤里提出原油，但还跑掉一些煤气。他们用的就是大同煤，提出×％——×％的煤油，还有多少硫酸铵。你们烧这么多大同煤，可以搞得大一点，取出原油和硫酸铵，煤气还可以当作燃料烧锅炉。门头沟的煤也可以充分利用。煤炭来了就卸在窑里，放四十个钟头，就出原油，这很简便。石油工业部几天安几根管子，搞个水塔喷水、喷硫酸水就是了，抽风机是十马力的锅驼机，抽风就是了。×千吨大同煤出×吨原油，还有硫酸铵。你们的综合利用搞的比较复杂、稳定，但是用土办法也可以，简单，又出原油。

工厂过去太单打一，不知道搞付业，只知发电、出铁。搞点付业好不好？正业还是要的，不务正业不行，但是不搞别的，不好，单打一不好。应该搞多种经营。发电厂又搞洋灰，也可以搞石油、硫酸铵，还可以制造发电设备。这样赚钱就多了，利润就多了。正业其实不赚什么钱，付业赚钱。你们还可以搞什么付业？围绕正业、不妨碍正业、又帮助正业，搞多种经营、综合利用。乡村可以搞多种经营，你们用不着花什么钱，为什么不可以搞？这用不着什么研究。你们要清华研究，他们就给你画图、设计……，不如搞上办法，把原油通通收回来。搞洋灰是次要的，你把炉灰卖给别人，别人也是搞洋灰。重要的是把煤里的东西收回来，收回原油可以炼出各种油；石油、柴油、汽油、灯油……最后是沥青。可以自己加工，也可以送给别人加工。铵水也可以送给农民。

托儿所、食堂、洗衣房……可以由家属合作起来去办。向工人和家属讲清楚，一定要和工人讲清，把

家属从家务中解放出来，一部分参加生产，一部分参加学习，这样，家长制就搞不起来了。没事做的可以参加学习，劳动时间长的少学习，劳动时间少的多学习。可以参加八小时劳动，也可以六小时、四小时，这样家里方便。家属也愿意学习，学习为了可以参加劳动，一天可以上四小时课，将来可以大学毕业。大学生有什么了不起？六年搞个博士，家属学十六年可以超过博士。家属可以一直学下去。商店、理发店、澡堂、托儿所、幼儿园、洗衣房、学校……都可以由家属代理起来，国家可以少用人员。家属可以搞菜园子，还可以搞小工厂，废物利用，做鞋子……等等。不会，学就是了。派人出去学一年就会了，或者请人来教。没有什么事是学不会的。农村组织起来了，工厂街道落后了，最落后的是机关，家家有保姆，实际上是保姆当家。我去过一个机关宿舍，有二十多个保姆，你上班了，保姆自己组织起来，研究谁先去要求涨工资，不答应就不干，一家答应了大家就都去要求涨工资。

什么事情工厂办，什么群众办？不要弄混了。发电厂、洋灰、石油……是国家的。国家办的托儿所、理发室、食堂、银行可以交给群众办，国家保留一些高级的。群众愿意组织什么生产群众自己组织。农民组织得比工人好，农村妇女比城市妇女解放的早，组织的早。

社会劳动力有很大的浪费，主要是妇女劳动力。家务劳动浪费几千万劳动力。可以集体化，搞大规模的社会服务事业、社会经济事业和教育事业，节省劳动力。

还有一个半工半读问题。你们厂百分之八十是青年，还要再增加些青年，大多数是初中毕业生，是否可以搞半工半读？又是工厂又是学校。你们打算招收三百到五百徒工，都是初中毕业生，在学徒期间可以上高中，搞四小时或六小时工作，生产学完，高中课程也学完了。学徒时给几块零花钱就可以，等到三年出师，工钱拿一半。高中学完，然后上大学，也是四小时工作，四小时学习。普通大学五一六年毕业，你们可以学七年，比大学延长一年。工程师可以当教员，搞几间教室。搞起半工半读就要增加一部分人，你们可以招八百人、九百人，盖点楼，搞集体宿舍。多用一倍的人，是否没出路了？到大学毕了业，怎么没出路？十几年之后大学生就多了。自己搞，就不要向教育部要大学生了。这一批毕业了，再招下一批徒工，同样又是学徒又是高中课程。锅炉工人说没前途，搞半工半读就有前途了。你们和清华合作搞学校，这很好。运行人员可以隔日学习，也可以把三班改成四班或六班。青年人的学习要求是正当的，要设法尽量满足青年人的学习要求。他半工半读不多要钱，国家不吃亏，只要你创造条件。多招人要多盖宿舍，房子总在那里，没有什么浪费的。青年入如果要求半日工作拿二分之一工资，做六小时工作拿四分之三工资，是否应该满足这种要求？青年人，要趁机学习。很多青年人提出前途问题，钢铁厂有的青年说，我怎么努力也只能达到五级工。这里一个是对青年人的学习该不该满足问题。一个是多面手问题。要创造条件给他们学习，给他们安排时间。八小时工作没有时间学习，学不好。要增加学习时间就要减少工作时间。有些老工人看见青年向前奔，觉得自己没前途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全国要搞许多电站，老工人要领导电站。也要使老工人学习，他们有家，少发工资不行。国家可以调训。准备让他做干部的，国家需要时调训他，国家不需要他时，他不能要求。国家不能搞很多调训，花钱太多，搞几十万不行，搞几万可以，有几万就不少。过去脱离生产进大学的办法不好，一去七、八年什么都忘了，模范也模不成了。不要搞长期脱离生产的学习。半工半读这样一做，如果以后再有人说前途问题，就可以答复他：那是你自己不努力，又不学习，又不劳动。

学习多面手。钢铁厂工人几个月可以学会几种操作。多面手不要停止，要永久搞下去。一个人可以做几十种工作。

我到各处走走，找青年、学生谈心，感到他们有两个问题；一是轻视体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者，有的青年发誓不当体力劳动者，不当农民，讲的可坚决啦！这是第一个思想，应该批判，还有一个思想是要求升学，这是普遍要求，不是个别的。全国几千万青年人要求，是群众问题，是阻止不住的。要替他们想办法。群众办学，自己办学，半工半读，半耕半读……半耕半读一下子几万所农业中学办起来了。农民可以搞半耕半读，你们工人不搞不行。前途问题阻止不住。这样一搞真正解决了升学问题、生活问题、

早婚问题，非要大学毕业才能结婚。什么人都可以上大学，愿意学习的可以完全满足。农村没有先生也要干，工厂里的先生不大困难。订计划要把群众的升学计划到里边。现在办农业中学，过几年势必办农业大学，只要派一个大学生去就可以办，不一定比教授办的差。世界上第一个大学是不是大学生办的？英国的皇家学院、牛津、剑桥，搞了几百年，难道比我们的农业大学高明？不见得。从前京师大学有没有煤炭可以回收？没有我们高明嘛！过几十年，大学生太多了，大家都是大学生，全是八小时工作，消灭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区别。这办法是促进共产主义实现的很重要的一条。再以后，四小时工作就够了。剩下时间干什么？是不是全看电影、玩？不能老玩，恐怕还是要学习。到共产主义社会，全社会的人都是半工半读，你看是不是？要看得远一些。我们国家人多，劳动力多，安排得好，组织得好，可以腾出许多人来，一大部分人一半学习一半工作，而生产不降低，还发展。有的国家人少，劳动力少，困难一些。我们人多，人多可以更早地进入共产主义。

二、与工人座谈时的讲话：

你们谈的很好，我听了很高兴。这样做下去，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是苦干几年的时候，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就不那么穷、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钢铁、煤炭明年就可以超；过，电要慢点，多几年，大概五年，五年不行，七年，其他、大都是二年三年。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的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算数，有这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过英美就变成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人口等干三个苏联，四个美国。美国就是多几吨钢和其他工业产品。十五年我们要赶过整个欧洲(包括苏联)。欧洲共六亿人口，和我们一样，面积也差不多。欧洲几十个国家，不互相帮助，我们几十个省可以互相支援。发挥地方积极性，十五年许多省要超过一个国家，河北要超过英国，河南要超过法国，再一个超意大利，再一个超西德……我们大有希望，前途好的很。

为什么会这样？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的努力。好好于，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报上不讲二、三年赶英国，七、八年赶美国，是因为帝国主义一听十五年赶英国就害怕，等我们搞起来了再讲有什么不好？他们议论说我们超不过他们，等超过去了，那时他们就更吃惊了。

×××说自己不围锅台转了，但是现在还有很多妇女围着锅台转，怎么办？要让所有人解放出来。要有人做饭、带小孩、洗衣服、理发、做鞋……可以一家家干，也可以合起来干。家家做饭、带小孩，浪费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就可以节省很多人出来。出来干什么？参加生产、参加学习。有事劳动，没事读书，学点文化不好吗？没组织好的，要认真组织起来。搞一批人围锅台转，也可以弄先进经验，做饭切菜用机器，洗衣服做鞋也可以用机器，大家做大家学习。只有合作起来组织起来才办得到。

分给你们几个山，栽果子树，放牛放羊放猪养蜂，都是你们的，你们自己搞好不好？在工厂里每年做十个月工，二个月到山上去放羊放牛放猪，对锅炉房的工人身体很有好处。

组织起来也可能吃的不合适，衣服洗的不干净，小孩带的不好，但是你们工人搞共产主义，难道家属就不能搞？组织起来以后，也可以把孩子带的更好，饭做的更好，衣服洗的更净。

厂里是否也可以办学校，还可以搞半工半读。做四小时工作六小时工作，上几小时课，少要钱，行不行？

以前思想不好，要少干活多挣钱。大家都这样搞，国家就没有希望了。国家没有希望害谁？害了自

己。国家好了是大家的。百万电站，不是毛主席的，也不是我的，是大家的，大家都有分，这样才搞的好。搞共产主义，大家好。英美不算什么，要超过美国。我们人口等于四个美国，工农业发展起来也要等于几个美国。等十五年看看，那时大家生活都比较好了，将来每人少做一点工作，多学习点。共产主义搞好了，做四小时五小时工作就够了。大家都来工作，来耕地，连家里的人也来，大家全来，什么都用机器。东西出的很多，就用不了做八小时工，做六小时、五小时、四小时就够了。其他时间还读书，再看点电影，还是八小时睡觉。每个人学习，一辈子学习。那时的人什么都会，会检修，会制造，会炼钢，会开拖拉机，会养猪、养羊……什么都会。

发点枪要不要？给大家练操。你超英美，他要打，怎么办？不怕，全会。不打更好，正好我们是不愿打仗的。不是让你们去当兵，在工厂里练练操，可以上山打野味。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

我们努力，不要花好久时间，经过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国家过了关，那时欧洲就没有我们进步了。不是说西方进步东方落后吗？那时就是东方进步西方落后了。

05） 在天津地委的讲话（1968年7月19日）

（当××报告了水利规划、电气规划，以及如何着手消灭城乡差别、改变居住条件后），刘少奇说：在明冬后春搞初步的，也要先搞个典型村。

刘少奇问：托儿所、食堂搞的怎么样？（答：已有17个县基本上托儿化了，搞了三百多个食堂点，并准备全区推广。）

刘少奇问：五保户集中起来有多少？（答：集中起来的还不多，还处于试点阶段。）

（当××汇报到高速度的粮食增产与生产基础条件不相适应，这是当前一个重要矛盾时），刘少奇说；乡社合一怎么样啊，你们不是并社吗？一乡一社不好吗？

（当××汇报到机关不要这么庞大，只要指挥的好，是不用这么多人的，主要看领导核心强不强，现在的编制再砍掉三分之一也可以时），刘少奇说：这样办是好事。

（当××汇报到这涉及到组织原则时），刘少奇说：这里没有什么组织原则，多快好省是原则，合乎多快好省原则就是好的。

乡、村根据生产发展需要，水利、道路、村庄等都应该有规划。地上水和地下水要配合起来，天是下雨的，地下水不够加以补充。

搞大渠道很重要，防涝防洪结合起来。有些问题小心谨慎，劳力安排好，机器会有的，有很大可能，汽车不会很久，没油可以炼油，汽车能自己制造。有了汽车，手推车还要，因为有短途，几百米远的地方不需要用汽车，可是没有手推车，还要背和挑，手推车也有用，可以普遍搞。要搞桥，否则汽车过不去。

农业合作社，不管什么特点，合在一块，采取“打乱平分”的办法，把道路一修，那个吃亏，那个占便宜，好在你们这里土地多，大家搞的吗？什么你的。团泊洼生产搞的好，钱多没处使，有潜力。首先把生产搞好，把基建搞好，还是钱多可以盖房子。我有个想法：搞标准的，共产主义标准的。楼房不楼房由群众考虑决定。问题是怎么搞法，一百个人就一百个灶，一百个食堂，是否需要这样？有三个大灶也就够了，可以吃食堂，这是大节省。搞托儿所，洗衣服不要家家洗，搞个洗衣房。洗澡堂也可以公用，一个礼拜洗一次澡。搞理发室。很多事业不能分开。作衣服的作的好，可以选为模范。这样办可以节省劳动力，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你们不是感到劳动力不够吗？

文化教育事业也要搞，每个乡都有医院，生不下孩子来要开刀，传染病的防治，割盲肠这些手术，乡下也可搞，建立家庭病床。

集体办托儿所、办学校、办食堂、办医院、办澡堂、办洗衣房，养鸡也可以集体养吆！要想这么一个问题：谁家都有老人，你家有，他家有，都要有人照顾。留下一个人照顾就够了，一个人可以照顾几十个人，要水有水，要饭送饭。很多事情要集体搞。由小到大，象办互助组那样，起初几户亲戚朋友办在一起，以后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托儿所办到后来也可以全托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生下来就有人管，直到死时烧成灰。

集体生产，有一部分是个体的、分散的，如衣服不是生产吗？盖房不是生产吗？磨面不是生产吗？作鞋不是生产吗？可是这些都是分散的，这与集体生产不适应，要进一步改进。要搞新村庄，不是一般的，现在的房子是临时的，将来拆掉当作肥料。

你们这里并社搞多大？(答：一般乡二到三个社，以乡为单位组成联社委员会。)

社大了，远的也不怕了，可以骑上自行车。社要合并，你们计划一乡搞二一一三社，组成联社委员会，将来过渡到一乡一社，那是可以的，那没啥。

(当××汇报到经济发展悬殊，落后的小社越来越跟不上了，从今年麦秋开始，从富裕地区抽共产主义基金，从公共积累中抽百分之一，全区抽出×元时)，刘少奇说：这好。有了这么一条，事情就好办了。有的社一个劳动日分五元钱，如果明年分红降下来，可能有抵触。你们是把这些钱抽到县或专区来。

乡一级财政要办工业，也可由社借一些钱，由乡去办，如由社办，利润大，揩别人的油，这种不由社办；有的可以乡、社合办，是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合办。

制定计划、算账除外，主要是出主意，坐在屋子里出主意，是出不好主意的。社里多少人，共收入多少粮，都是打的什么，这些数字都有，有几个人办就行了。每个社都要有这么一些人，不可能天天出工。会计是脱离生产的，洗衣服的算不算脱离生产呢？要算。教员也可以种一点地。食堂里要用什么东西，学校里要用什么东西，有人负责供给。大多数人可以参加生产。徐水县不是有后勤主任吗？算不算领导人呢？算领导人，后勤主任也可参加烧饭的工作吆！

乡、社是否合一，从前途上看是这样。

县领导人每人一片是可以的，一个县分几片，一个书记分一片，书记要轮流去住，到那里即参加那里的生产，应该经常流动，完全分散又不能开会，要有领导工业的，领导农业的，领导商业的。又能分散工作，又能集中讨论问题。

(当××汇报到因为本地区没有山，到保、唐等专去办开矿事业，把矿石拉回来炼铁时)，刘少奇说：为什么要拉回矿石呢？不把钢拉回来呢？把铁水倒在转炉里就成钢了。为什么要拉回铁来，再经过把铁烧成水才炼钢呢？这样把铁烧成水，既费事，又费钱。鞍钢为什么便宜，就是因为把炼出的铁水立即倒入炼钢炉。上海的钢成本高，就是因为需要化铁，化铁后才炼钢。应该是在那里炼铁，就在那里炼钢，然后把钢运回来，这样就便宜了。你们省委没有研究这个问题吗？要把炼铁、炼钢、轧钢结合起来。

工资问题怎么解决呢？

专、县、乡、社办工业，工人的工作时间、生活待过各方面的情况和经验，农民到工厂里来了，与农业社是什么关系，这些经验要总结报省。省委有个规定，你们有什么改进。

生活好的不愿意吃食堂，可以自愿。

社是生产单位，要办工业，办学校，又搞农业，又搞商业，搞民兵，工、农、兵、学、商吆！把乡里研究一下，如何领导合作社，大概在三年内拖拉机、汽车都有了，因为有了钢铁，情况是会变的。乡是生产单位，也是生活单位，又要搞工业、农业、商业、学校和民兵，当然又是政府，政府的事情越来越少了，还有坏人，但是那种事情很少，大部分事情是管理生产，办文教事业。乡是一级政权，它的(专政)任务是越来越小了，敌人反扑是有的，反扑时打击一下。马克思讲过国家慢慢地消亡。要管好生产，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有这些事情的。先进与落后也是有的，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有的。

乡政府如何搞法？乡和社结合起来，规模大一些，生产就可搞的更好了。富裕中农服气了，因为他是劳动者，他不相信别人干的好，他是赞成社会主义的。地富是不服气的，他是没办法，只好听你们的，因为你们不听他的，这些人暂时不反抗可以，心里不是服气的。这些人越死越少了，想反抗的人是少数的，但是有，有一部分。有的人七十多岁了，没有几年了，他如反抗，加强压迫工具。这种事情是少数

人，有这么一部分，表面上服从，心里打主意，不服气。富裕中农服气了，他们就没有社会基础了，完全孤立了。

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商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当××汇报到沧镇的工业发展，将建十万锭子的纺纱厂时)，刘少奇说：十万锭的纱厂是否分十个，这样，那些地方的姑娘就可以会种地、又会纺纱，当地的面貌就可改变了。要分散搞。鞍山那么大工厂，×万工人，又要运粮、运油、运布。应该又搞工业，又搞农业，一些东西当地就解决了，这是社会主义节省，要这么打算。

把一些厂给县，不要投资，只给装备就可。这样，可以一个县包干一个大工厂。省设备、省人力、省投资。河北省可以先创办，他们高兴(指县)，你们省事(指省)。

“三化”写个报告，慢慢地搞大的。托儿所为什么不给小孩洗洗澡，要学学消毒，试体温，一个小孩一条小毛巾，以免传染沙眼，要把托儿所办的更好一点。老太婆带孩子是老经验，青年看孩子没经验，可以学些新经验。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06） 在南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83日）

农村中办公社，是一次不小的革命。要准备实行粮食供给制，干部和公社社员一样，这也是革命。乡干部拿国家的钱，一个月几十块，下放干部拿八、九十；而农民吃饭以外，只拿七、八块；这样，你不革命，农民就要革你的命。乡干部要改，县干部也要改，地方的干部改了，部队干部也要改。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要革命就要革的彻底，革命不彻底，可能还要革第二次的，我们不要等群众来革我们的命，有问题就自己先自觉的革。

三类社的问题不只是南通专区有，别的专区也可能存在，不过比重不一样，程度不一样。这问题省委是不是注意了？全省都要查一查，摸一摸底才好。现在干部中还有人主张最好不革命了，可以停下来，他们以为蒋介石打倒了，革命就胜利了，没有什么可以革了。还有一种人，是赞成不断革命的。

搞土高炉能出铁就好。这是出的师傅钱，不要算成本，这半年主要是熟悉技术我们学会了本领，一年就能出几万个炼铁的人。一万人开矿，一万人运输，一万人炼铁，有三万人真了不起，这办法好，每个县都要出人支援炼钢炼铁。

你们搞不搞盐、海水养鱼？我在连云港看海水养鱼很好。我们把海里的鱼弄到塘里养，恐怕长的还要快。盐搞出来很好，搞化学用。

养猪问题有些地方一个人两头，而新沂县红旗社一人养三十头到五十头。以后一人有一万斤粮食，无论如何吃不光。明年每人收三万斤，吃不完就给猪吃，要多养猪。

干部恢复到打游击时的供给制要事先做好准备，从前和现在的供给制不完全一样。以前是一部分人，现在老百姓也搞供给制。我们照他们做，五亿农民的制度一改，我们非改不可。逼上来了。机关干部跟农民走，军队跟农民走，工人阶级跟农民走，城里人也要跟农民走。迟早都要跟他们走，不改不行。我们过去实行的供给制，吃饭穿衣不要钱，粮食两斤半，发两套衣服，津贴也很少。现在农民一部分供给制，吃饭不要钱，再发一点钱，或者叫半工资制，虽然还没有定，但方向是这样的，过去我们物资少，搞供给制，现在物资多了搞供给制，所以有不同。这是一次大的革命。也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但这还是社会主义的事，不过是更进了一步，将来到共产主义可能也是这样一种形式。这是一种生活的形式，也是交换分配的形式。

乡干部改了供给制，乡村中店员、教师、手工业者不改不行。牵动面很大，将来势必牵动城市，牵动工人。这样一改就创造了新的劳动工资制度、新的办法。你们调三万人炼铁就是炼铁工人，去晒盐的就是晒盐工人，去采矿不就是采矿工人？这样做，是不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劳动工资制度吗？现在的一套是老工厂的办法，一个月固定拿多少工资，再加上劳保，这种办法是资本家那里来的，还有一部分是从苏联学来的，我们自己又加了一点。这种制度不大合理。所以农民有意见，说你们城里人生活太好了。农民对工人有意见，这是件大事，不是小事情。再过两年，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就可以和工人接近起来。

如果炼铁是一种方法，开纺织厂又是一种方法，这就不合理，一家人，哥哥炼铁，妹妹纺纱，妹妹拿的钱比哥哥多，自然会有意见。你们调三万人炼铁，以后再开什么厂，也该用这个办法。从公社调它几万人去做工，实行新的办法。是社会劳动制度的改革，是个大问题。

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不要顾虑，过去那样的困难我们也克服了，现在比过去好得多，你的工作做得好，群众拥护你，群众生活好了，群众不会亏待你的，我们的干部要把眼光放远些，要算大账，不要算小账，不要为几块钱、几十块钱失掉了群众的信任，群众不拥护你，这是最大的损失。

07）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24日）

将来人民公社建立后，每个公社都办起工业来了，县里也办了工业，那时人民需要我们大、中城市干些什么？这个问题你们考虑过没有？现在公社的工业没有基础，你们搞钢铁，搞抽水机，搞布匹、毛巾等东西，送到农村里去很有销路，反正样样都要。将来再过几年，公社和县里的工业办好了，他们自己能生产东西，就不要你的了。譬如缫丝，许多公社自己栽桑树、养蚕，自己搞缫丝机缫丝，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把茧子老远的送到无锡来？以后，象上海、南京、杭州、无锡、苏州、常州等大、中城市都应该考虑人民需要你干些什么？各县、各公社能办的，你们就不要办了，人民需要你们办些他们办不起来的事情。假使人民不需要你办的你硬要办，要你办的你又不办，人民就会对你有意见，就会革你的命。

你们调农民来炼钢铁，一个省都有几百万，一个基地也有好几万，他们来了就集中在一起，没有工资，也不带家属，搭个棚子睡在炉子旁边，干得很带劲。我看，倒是这种工人进步些，他们头脑里的共产主义思想还多些，我想，能不能反过来，把他们当作正式工人呢？是不是由此就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劳动制度来呢？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以后新建的工厂，就和现在炼铁一样，由公社里调人出来。现在搭个棚？一声号召，就可以动员几万人、几十万人上山开矿炼铁，条件那末坏，生活那末艰苦，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干起来了。我们开个纺织厂，把房子宿舍都盖好了，要公社调几千、几万个小姑娘来作工，吃饭不要钱，基本菜不要钱，和在农村的公社里一样，生活不降低，还能学技术，你说他们肯不肯来？我就不相信她们不肯来。

炼钢铁不是短期的事，看样子势必长期的搞下去，在现在的基地上建立钢铁工厂。当然还是要把这些工人长期留下来，老搭棚子不行，要盖宿舍，要接家属住在一起，实行粮食供给制，再加一点津贴。如果这些新盖的工厂实行新制度，老厂还是保持老制度，到后来到底是谁影响谁？谁向谁看齐？是老厂照新厂办呢？还是新厂照老厂办？我看，势必是老厂要跟着改，老厂要学新厂的样。我们要搞出一个新的样子来，老厂的工人假使不愿意来，我们也不一定要他们，我们就从公社里调新的人来干，将来看看，到底谁干得有成绩，到底那一种制度好？大家可以比赛嘛，我就不相信，新厂比不过老厂，拿供给制的工人比不过拿工资的工人。

将来工厂的工人和农民不应该有什么区别，全国就是一个大公社，工人、农民的生活待遇就应该差不多。当然，工人和农民稍微有些差别还是合理的，但差得太远就不合理了，目前当然不是说全部不合理，但有若干部分是不合理的。公社里动员出来炼铁的，晒盐的，采矿的，修水利的都应该看作是工人，这不是降低工人现有的水平，而是为了要力求更合理些。一个家里哥哥上山去炼铁，工作很艰苦，拿的钱少，妹妹去工厂纺纱，作的活很轻巧，拿的钱反而多。这就是不合理，不合理就一定会有矛盾，有意见。

新办的厂采取新的劳动制度，这是一个方向，但各地的具体办法可以不一样，到底怎样实现这种制度，还有待研究和试验，这问题暂时不要拿到工人中去讨论。

小商小贩是否多了一点，社会上不需要这么多的小商小贩小店铺子。以前是照顾性质的，已经照顾了这么多年，还嫌不够，还要反对我们，这就不对了。应该和他们讲清楚道理，分析形势，说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转到生产单位去。以后一个地方有一两个商店就够了，要那么多铺子干什么？现在要趁这个劳动力紧张的机会，组织这些小商小贩快快转业。

劳动力紧张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劳动力紧张我们工作困难些，但是基本上要把它看作是一件很好的事。劳动力多余倒是不好的。一九五一年我来苏州时，就是有很多人没有事作，那种情况不好，我们要利用劳动力紧张作好五件事：(1)人人参加体力劳动，(2)从家务劳动中把妇女解放出来；(3)技术革命，

工具改革；(4)改变社会和工厂的劳动组织，(5)发展多面手，提高技术水平。

劳动力紧张是暂时的现象，过几年就不那么紧张了，可以实行六小时工作制，农业生产不要那末多劳动力，就可以作别的事情。当然，我们对外宣传不要说紧张是暂时的现象，免得让那些懒汉坐享其成。

苏州地委的××刚才说，农民对吃饭不要钱这个制度非常拥护，农民说“一个心思放下来，一个心思又来了”，这两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前一个心思是农民几千年来都担心吃不饱，现在宣布吃饭不要钱，等于把几千年的重担子放下来了。后一个心思是想怎样把生产搞好，不然怎样对得起共产党。

有人担吃饭不要钱，是不是会出懒人？苏州的事实说明，吃饭不要钱，不是工作马虎了，而是工作得更好了，劳动效率提高百分之三十，出勤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当然少数的懒人还是有的，对这种人我们有办法治他，最好的办法是不给他饭吃。列宁说过，不劳动者不得食，这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对于懒人就要这样，他没得吃只好劳动。对多数人来说，吃饭不要钱，干活更有劲，不是做得少了，而是作得更多了；不是作得更坏，而是作得更好了。这是人民的共产主义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标志。列宁说：“共产主义的劳动就是不要报酬的劳动，是没有定额的劳动”。不管你钱多钱少，不管你规定什么定额，总是作得那么多那么好。这就是共产主义的道德面貌。只有当劳动成了社会全体人民的普遍的生活习惯，这时候才能产生共产主义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

实现共产主义需要的基本条件。是：社会物质生产极大的丰富，人民觉悟提高和文化教育的普及。并且要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以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三个差别；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制度的残余，到那时，就实现了共产主义了。但是不是要等群众的觉悟提高到那种程度，等各方面的条件全部成熟后再宣布实现共产主义呢？当然不是，我们可以在有条件的方面先实现共产主义，一边实现，一边来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这也是互相促进。譬如我们先宣布吃饭不要钱，群众就得到很大鼓舞，共产主义的觉悟就提高了一步，工作不是更坏了，而是更好了，少数的懒人在群众中很孤立，很没有道德，很臭，人人都瞧不起他，在这种压力下，懒人也势必会得到改造，势必去参加劳动。

对那些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家属，他们现在拿定息，手里有钱，当然不愿意参加体力劳动，但我们要引导他们，鼓励他们劳动，我们干部和劳动人民都干起来了，他们也就孤立起来了，慢慢也会跟着来劳动了。

你们想过没有？农民吃饭不要钱，乡干部怎么办？常熟白茆乡的乡党委书记一月拿五十三块钱，在干部食堂吃饭，他的老婆是社员，在社员食堂吃饭，这就不太合情理，我说夫妻俩个还是要在一块吃饭嘛。农民吃饭不要钱，拿供给制，乡干部势必要跟农民走，乡干部一改，县干部，地委干部，省一级的干部一直到中央也都要跟着改；地方上改了，军队也得改。我看我们不改就站不稳，五亿多农民就会起来革我们的命。我们与其让大家革我们，不如我们先自觉地来革。

现在我们就要向农民看齐。标兵在什么地方？是干部？是工人？还是农民？恐怕标兵还在农民那个地方。农民作标兵，各县各地都要按当地农民的标准，有些地方搞得好的就多拿些，搞得差的少拿些。不但在省与省之间，各县之间，各公社之间都可能有些差别，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差的太多了也不好，富裕的地方要拉平，差的地方要提高，能保持合理的差别就好。

08）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27日）

同志们。

省委一定要我向同志们讲讲话，推辞了几次推不掉。现在简单讲一点，也没有什么好多问题讲。中央北戴河会议有了很多的决议，省委已经传达了，并且讨论过了，正在贯彻执行。

这回我出来到处跑了一下，经过河北、河南，到江苏。在江苏乡下跑了一下，城市里看了一下，沿途也看了一些东西。总起来说，大约这样，农业生产的信心是十足的，各个地方对于明年的农业生产、今年的农业生产，信心是十足的。对于今年的农业生产，有些地方还不大满意，对于明年的农业生产，我问了大家，都是有信心，而且信心十足。可以大体讲这么一句。今年的农业生产中间，我们也看了有个别的地方生产不那么好，那个地方可能还有点问题，那方面的问题，现在还不能清楚啰！但是，对于明年的农业生产，是很有信心。关于工业生产，现在看来，不论在江苏以及在全国，恐怕还是这种情况：还需要苦战几年才能过关。农业大约今年一年，明年一年，大概这个问题算是已经过关了；农业生产摸了一条路，明年农业生产信心十足。整个工业生产，特别是钢铁，还没有过关，还要苦战几年，才能过关。

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一种时候，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紧要的关头，也可以说是一种带决定性的关头，或者可以说是决战的关头。正如解放战争也有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三个战役就决定胜负了，以后过长江以及到西南、云南那些地方都不费多大力了，是经过决战的。现在我看社会主义建设也处在决战的时候，大概经过几个决定性的战役，才能够过关，才能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大家应该鼓足干劲，打起精神，跟过战斗关一样，采取战斗态度，来过这个关。这个关并不比解放战争那个关容易过，不容易过。队伍比解放战争那个时期更大，整整六亿人民，全体人民，全体工人、农民都编成的队伍，编成团，营，连、排，班，农村里面就是这样，城市里面也开始这样做，工厂里面也早有这种带军事性的劳动组织，恐怕将来也还会更进一步。所以，在这样一种决战关头，大概我们还需要苦战几年，工业上过关了，农业上也过关了，那么，我们以后的事情就比较好办。现在各个方面正在为着生产钢铁来战斗。我沿途也看了很多炼铁炉。在炉子旁边集中了几千人、几万人，各方面集中起来的：有工厂里面来的、有学校里面来的、有机关里面来的、有街道里面来的、有农村里面来的，各方面来的人。从前各方面来的人凑在一起，总是搞不好，别扭很多。包括我们的解放军，这个军队和那个军队合在一起，是要闹点别扭的，是不是？我们这次在炼铁炉旁边看到别扭很少，他们能够合作，情绪甚高，团结。我看那个地方相当苦，没有房子住，住在棚子里面，吃、睡各方面条件都不是那么很好的。也有点我们从前打游击、过草地那么个味道来。是不是？我们过草地的时候，不大闹别扭，你看奇怪吗？大家没有心思闹别扭了，去搞别的事去了。我看这样的精神很好。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的钢铁就会搞出来的。现在困难很多，化了很多力量炼那么一点铁，按照成本算起来，成本也是很高的，化不来。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把人锻炼了，将来可以炼钢炼铁，将来我们就有成百万，成千万的钢铁技术人材。这个时候化点钱学习，很有必要，不算浪费。现在建成一个小炉子，炼几个月扳掉了，这不是白炼的。再扳掉，再盖大的，再扳掉，再盖很大的。这算什么浪费呢？不算浪费。从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国家精神很好。

现在我想讲以下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还没有确定，只是讲一讲，请同志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可以议论一下，最后省委、中央恐怕还有所决定。在省委、中央没有决定以前，我提出一点问题，或者提出一点意见，请大家同志们考虑。

想讲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农村现在已经实现公社化，农村已经组织了公社，公社化了。而且，我经过这三个省，河南，河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见来，大家都赞成。分配制度实行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这么一种分配制度。(江渭清：基本工资加奖励工资)基本工资加奖励工资。这么一种农村公社里面的分配制度。这个制度大概是有早实行的，有比较慢一点实行的，看来会要这么实行。我们这么实行以后，就会产生以下的一些问题。我在下面跟同志们也谈过，也问过他们，问过一些公社的同志，我说，农民实行粮食供给制、基本工资加奖励工资的办法，你们怎么办？你们乡干部、社干部怎么办？你们实行什么制度？过去的乡长或者乡党委书记现在是社党委书记了，过去的区干部，也是社干部，现在是公社的社员了，当了社长、社党委书记，不加入公社，那个也不行，加入了公社就做社员。做社员，就有了两种工资制度。我问过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你多少钱一个月，他说，他拿九十块钱，另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我问他拿多少钱一个月，说，五十二块。我问，你这个公社里面有多少拿国家工资的干部，说是有二、三十个左右。一个公社里面二、三十个干部拿国家的钱，比社员高，各个公社不一样。这种情况恐怕要有所改变，不能长期继续下去，否则社员会有意见。下面已经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有意见怎么办？他们的答复是：就改罢！和社员一样，公社的干部这样答复。我说，那你们能行哪？能行！我说，没有反对的？没有反对的。或者个别的人有点意见。但是，不要紧，是讲得通的。有同志这样答复我。我也问过县里的人，县委书记，他也说可以。那么这个问题就很显然了。乡干部也照农民一样，实行吃饭不要钱，拿基本工资加奖励工资，县干部怎么办？是不是要跟乡干部来，县干部一改，省里，中央怎么办？(江渭清。省里也改。)是不是也要改？省的、中央的、地方干部改了，那么，你们军队干部改不改？(江渭清；又是老一套供给制来了。)是啊！逼得来了。我们干部，军队都改了，农民也改了，那么工人阶级改不改？只剩下一个资本家拿定息的，我看，就让他拿一下也好，越拿就越脱离群众。有些同志对资本家还拿定息不劳动不服气，就是不服这个气，他又不做事，吃得这么好，穿得这么好。不是服气不服气的问题。你说，我就那么服气？我也不那么服气。问题就是要使资产阶级彻底孤立起来，把他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这个话是不向外面讲的，在干部里面也讲得少。就是故意让他吃得好一点，他越吃得好、越穿得好，就越孤立，政治资本就越没有。因为中国的资产阶级，毛主席多次讲过，是有很大的政治影响的，人数虽少，可是政治影响很大，殖民地、半殖民地资产阶级加上它的知识分子，要把他的政治影响剥夺干净，有什么办法？就是用这个办法。给他选举权，给他政治地位，给他高工资，给他定息，让你这样做的时候，于是它的影响，在全国人民中间就逐步缩小，以至搞得没有，搞得没有什么影响。因此，现在这个问题除开资产阶级以外，那是另一问题，拿定息是另一个问题。因此，其他的人：农民、农村的干部、城市的干部、军队以至工人，因为农村的公社化、农村里实行粮食供给制、加上基本工资加奖励工资这样的制度，恐怕就影响我们这样一些一系列的制度要有所变革。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什么一件事情？实际上是五亿多农民组织公社革我们的命。那么，我们呢，与其农民要来革我们的命，不如我们自己早一点革。早一点革，农民就没有意见。你如果总不革，势必农民起来革我们的命。五亿多农民，它的制度改了，头一个公社分配制度一确定，乡村干部就站不住。乡村干部一改，县干部就站不住。县干部一改，省干部站得住？中央干部站得住？就站不住。干部一改，你军队不改？农民改了，军队改了，干部也改了，工人阶级是不是也得要改？他站得住？这是迫得要改的。我们不要等农民打扁担再来改，我们就自己改。不断革命吗！我们自觉自愿地自己革自己的命。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再前进一步。因此，恐怕有这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提出来了，实际上提出来了，因此，恐怕省委、县委、地委要加以研究，订出方案。中央想等各省委提出方案之后，再来考虑几条原则。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拖一下，但是拖不了很久，所以现在就要着手研究。不只乡村干部的问题，乡村里面还有其他的人，比如乡村做企业的人，供销社、银行、小学教员都是拿国家的钱，向国家领工资。我问了几个公社，大概一个公社，有二百多人，是拿国家工资的。做生意的、教书的、银行的，各种企业事业机关。一个乡有一，二百人，二百多人，向国家领工资，这是一种。×××同志在郑州，我见到了他，他正在研究这问题。乡村的财经贸企业，他就研究这问题，他提的意见是：两放、三统、一包。什么叫两放，就是两件事情下放：就是乡村的财经贸的资金下放，财经贸企业他不是有些资金、有些资产哪，有些仓库，有些房子，有些货物，下放给公社，下放给各县。资

金、资产下放，流通资金也下放，人也下放。刚刚讲不是有两百多人吗？这两百多人也交给公社，交给各县，他们就不管了。三统，三统是什么呢？他说是价格要统一，各种商品的零售价格不准公社、各县随时涨价，随时跌价，要上面统一规定。这是一统。第二统是各种主要物资要统一调拨，不准你不调，不准你收起来，不准你做别的用。第三统是流动资金不许拿去做别的用，不许拿去搞基本建设、盖工厂、修水利。流动资金搞掉了，做生意就没有钱了，可以放给你，可是必须要做流动资金，你不能拿了做别的用，流动资金要统一。他讲有这么三统。包，是包上交利润，人交给你，钱交给你，东西交给你，你交给我们利润。他说他想了一想，想实行这种制度。这样一来，是不是乡村里面的企业机关的干部工资制度也改了，交给公社嘛，还不是吃饭不要钱，基本工资加奖励，就是那一套啰。你乡下这样了，你县的企业机关改不改？省的改不改？所以，这牵涉事业企业机关一系列的问题。一个干部，一个企业事业机关，我看，小学教员也可以改。小学校不是国家出钱的吗？小学教员国家出工资吗？以后也可以交公社里面办。房子也可以交给他，人也交给他，教员也交给他，你发工资，他的家属，他的小孩子你包啰。国家的教育经费可以发，发给公社。如果这样一做，乡村干部一改，一个公社二十多干部，企业事业机关加上小学教员那就有二、三百人，原来这些人都是国家拿工资的，现在都要公社来负担。恐怕一下子还负担不起，有困难，再等几年看又怎么样。公社也要上交利润，在利润里面也可以扣出等等这些办法。原来乡村干部是由国家发钱，现在国家不发，要公社负担，有些公社他们暂时负担不起，恐怕这些钱还是要给，小学教育经费恐怕也还是要给一部分，或者是给一年两年，如何给法，是不是可以给公社，不给他个人。乡干的工资发给公社，公社发给他个人。国家呢，这些钱横直给了的，不加也不减，照给，特别富足的可以少给一点，有些公社是特别富足的，我了解的那几个公社，可以少给，或者看怎么样。所以如果要改变这种制度有相当一些复杂的问题。此外，我还问了几个公社，比如新沂县有个红旗公社，我问，你们这个乡、这个公社到外面去做事情的有多少？在外面当干部的、当工人的、在军队里面的有多少人。他一下答复不出，他算不出来，他只晓得这么一个数目字；他说他那里每一个月从外面寄铁回家到他这个乡的有一千到一千五百元。这是新沂县陇海铁路边上有那么一个社，每一个月寄回到家的钱有一千到一千五百，至于讲南京附近、上海附近、苏州附近恐怕就不止这么一千、一千五，恐怕一万元也是有可能的。就是一个公社，还有很多人到外面去做事情去了，外面当干部的、当工人的，当军官的寄钱回家。在无锡、在苏州还有人到外国的，华侨寄钱回家的。这也是一个问题。一方面他住在乡下，是公社的社员，吃饭不要钱；另一方面，外面又寄钱回来，他不是得两份吗？那个公社那个农民看到他是不答应的！这问题怎么办？怎么处理？也是要去研究一下的。恐怕江苏这个问题特别多，每个省都有的，每个地方都有的，每个乡都有的，有人在外面，寄钱回家的。有人讲，他寄钱回家，不给他家，不给他个人，给他公社、公社扣。那么，你一扣，他就不寄了。那你不受损失吗？又有人提出，不能扣，你扣他不寄了怎么办呢？只能提出问题就是了，问题没有解决如何办？我也不晓得，大家来研究吧，总会有办法的，那里没有办法呢？一个外出的干部、工人、军人家属，实行粮食供给制，这个制度的改变，他们这些问题如何处理？过去我们这个事也有经验的啰。过去是外面不寄钱，军队没有人寄钱回家，只好优待军人家属，后来优待军人家属不行，又优待干部家属，干部家属也没有钱寄回家，工作人员家属，都优待的吧，过去包过，在农村里面，有这个经验。是不是将来还再实行这个制度了连我们这些人寄回家的钱都不给了，就拿乡下去包，都实行供给制就没有寄了，就好了。(江渭清：那就都是供给制，不寄了都是，公社就可以除他劳动以外不足的由公社补贴他。)如果，出来的人太多了，他包的太多了，国家可以补他一点。所以，这还是有办法的。不过我是提出这个问题，总有办法的。还有一个外来干部家属。一个乡里他有外来干部的，外面的干部在这个公社当干部，他的家属不在这个公社，在另外的公社，总之是别的县，原来是靠他生活的，如果他实行供给制，他就不能寄钱回家，恐怕这些事情国家要替他解决。这是一个问题。下面我听到有这么句话，有个别的干部这样讲：好象是乡村里的合作社的组织就是公社的组织规模是越来越大，而我的官呢？他做官啊就越来越小。组织的规模越来越大，而我的官就越来越小。他原来是社长，现在变成了队长是不是小了，社长变队长。有这么一句话。这合不合乎事实呢？我看是合乎事实的。这好不好？他说这个话的人，他觉得是不好啰，他是抱怨情绪啰。官越做越小啰，官嘛，只有升，还有越来越小的？是不是？他觉得这事情不好。就是

社会越来越进步、社会的经济组织规模越来越大，我的官呢越来越小。我看这事情是好事情，不只是官越来越小，将来要搞的没有官，都是老百姓。不要有官，要官干什么东西啊？官越来越小，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没有了，我看，那样才好。那么至少说这种怪话的人思想是不健康的，是个资产阶级思想，是一种资产阶级式的思想。他脑子里面所想的问题是官只能大不能小，而不知道社会主义社会越发展，发展到共产主义，就没有官了。他思想上没有这个准备。这一方面我看是应该解释的。那种抱怨情绪是应该批判的。在扬州听到这样的话，扬州地委书记告诉我，他说，在群众里面提出，跟群众商量实行吃饭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么个问题提到群众讨论以后，有的农民就这样讲，他说，一个心思放下来了，另一心思又提起来了。一个心思放下来，是什么呢？就是说几千年以来，他们的心思总是愁吃、愁穿，怕吃不饱、穿不暖，总是有这个心思放不下，几千年以来一个心思放不下，怕没有吃的，怕吃不饱，都是愁吃愁穿，这一回你吃饭不要钱，包你吃饱，这个心思放下来了。但是，另一心思提起来了，是什么呢，他说；既然共产党实行这样一个制度，使所有的人都吃饱饭，那么，要怎样努力工作才能够可以对得起大家，对得起共产党，对得起这个制度，这个社会啊！他提起了这个心思，怕自己做的不好，对不起人。这是农民中间有这么一句话，经过一个地委书记跟我讲的，我很赏识这句话。这个问题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从马克思以来，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制度，这个理想以来，就有人反对。反对的一条理由就是认为实行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很多人都不愿意工作了，要懒下来。你既然有饭吃，吃饭又不要钱，人家既有饭吃，那么，他要什么劳动呢，就不劳动了。懒人就多了。历来有这个话，我们过去一部分人实行供给制的时候也有人说这种话：叫做干不干，两斤半。那是反对供给制的人说的话，是不满意的人说的话。干也好，不干也好，都有两斤半吃，都有饭吃。干多了、干少了都有两斤半。因此，我多于不如少干，我少干不如不干，横直有饭吃。这是那种不好的人讲怪话的。现在这样办，群众、劳动人民不是这样想的，他想的是另外的事情。一个心思放下来了，另一个心思提起来了，提起来的心思不是懒的心思，而是提起来如何努力工作，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才对得起人，才合乎新社会的道德标准。所以，这个问题对于从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制度的理想以来，许多人怀疑共产主义制度是不是能够实现，有许多人反对，有许多人作为理论根据，有许多人就怀疑。那么现在有这么一句话就可以证明：实行粮食供给制，就是在粮食这一点上实行各取所需，尽肚子吃，不是各取所需吗？又不要钱。在这么一点上仅仅在这么一点上，在这么一点上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各取所需的。那么经过实行这一种制度，不是使人家更懒了而是使人家更勤劳，更努力工作，道德标准更提高，这是农民讲的。所以因此，有人说提高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品质之后再实行共产主义，还是先实行共产主义制度，同时就提高人们的道德品质与共产主义觉悟？恐怕这两件事情是相互促进的。物质上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实行，在精神上也提高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不是一个先一个后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也讲过，实行供给制的问题。毛主席在我们中央的会议上也谈过这个问题；如何在我们的于部中间以及在军队中间再实行供给制的问题。那么如果要实行供给制，标兵在那里？军队不是有标兵吗？标兵是那一个？有人讲标兵么从毛主席起，毛主席有多少工资，然后一路下来，总不能超过他啦，总不好超过啊。这是标兵。现在这个标兵恐怕不能这样，现在恐怕农民就是标兵，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他站稳了，他实行了供给制，现在嘛，首先要从农村里面实行粮食供给制、基本工资加奖励工资，把它这个制度确定，他站定了，五亿多农民一站定了，其他所有的人都按照他看齐。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排队，可以高一点，乡干部也可以比社员稍许高一点，县干部可以比乡干部稍许高一点，省干部可以比县干部稍许高一点，但是高的太多就不行了。高的太多了怎么行？应该五亿农民是我们的标兵，看是不是这样子？恐怕不能不以他为标兵。他五亿多嘛！你有什么办法呢？他定了，不好与他差得太多，差得太多了，他就不答应，他就要讲话，他不满意嘛，他的情绪不高嘛，就要发生很多问题，象农民进城等等都来了嘛。所以，如果实行供给制，标兵在那里，是不是农民？五亿农民也不是一样的，这个公社与另一个公社也不会一样，这个县与那个县不一样，这个省跟那个省不一样。这个富足的公社，可能供给标准、工资水平高一点，那个不大富足的就低一点，因此干部也低一点，富足的，干部也高一点。这个省富足，干部高一点，另外一个省又低一点。因为是以农民为标兵嘛，农民各个地方不一样嘛。是不是我们的干部工资也是会有点差别，各个地方不一样。不能那么排队，你是那年当红军

的，资格有多老啊，职位有多高啊，因此，评你工资多少。恐怕要以农民为标兵。看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差别也不大。以后如果以农民为标兵，恐怕也会有差别，有一些是不能采取绝对平均主义的。工人的工资是不是也可以有点差别，特别是无锡纱厂的工人与西安纱厂的工人工资为什么一定要一样，是不是也可以有点差别，是不是差别不能太多，我看这是肯定的。多少有一些差别，恐怕这也是合理的，不能避免的。恐怕也是好的，有一点差别。

第二个问题，讲一讲劳动力紧张问题。许多地方谈话中都谈到过这个问题。乡村里面也谈这个问题，工厂里面也谈这个问题。劳动力紧张，就是有困难。我承认是有这个情况，劳动力是有一点紧张，也是有一些困难，但是，我已经向同志们谈过，这件事情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有人认为是困难哪，就不是好事。我说呢，这是一件好事。这证明我们国家的生产事业有了大的发展，因此劳动力才紧张，不然劳动力不会紧张，人就闲起来嘛。我觉得各方面劳动力紧张这一种现象可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很可能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不是一种长期的现象。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利用现在这种劳动力紧张的情况来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社会上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不应该再有闲人，不应该再有闲着的没有工作的人，我是讲社会，整个社会。现在我觉得我们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是闲着没有事做的，还有闲人，他不参加劳动的，特别是在城市里面。要使社会上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这也是社会主义社会要求的，要求社会上所有的人这样做的。社会主义要求这一条。共产主义也要求这一条。一切人要参加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不应该有闲人。这是各尽所能。什么叫“各尽所能”？各人都有一定劳动力，你就尽嘛，就尽你所能嘛。现在还有人不尽所能，有些人不做事，闲人，他有一定能力不做，至少没有搞尽嘛。你看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各尽所能，社会主义也是各尽所能，都要“尽”，你到底有多大能力，是不是搞尽，是不是搞干净啰。南京市是不是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搞尽了？是不是各尽了所能？上海、城市、乡村是不是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尽了所能呢？没有嘛，还有一些闲人嘛。现在劳动力紧张，没有人做事，趁着这个机会都做事，不要有闲人嘛。要做好这件事，这件事情做好了是件大好事，是社会进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要求的。

第二条是要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妇女。既然劳动力紧张，没有人做事，妇女是很大一批劳动力，现在很多妇女被小孩子、被烧饭洗衣服这些事情拖累了，被繁琐的家务劳动束缚了。妇女在家庭里面抽不出来。趁劳动力紧张，要使妇女，全社会的妇女，都从家务劳动中间解放出来，能够参加社会劳动，要做好这件事情。趁着劳动力紧张，没有人做事吗，女人可以出来做事嘛。

第三件事情是进行技术改革，改进劳动工具。正好劳动力不够，就改良工具，改进劳动工具，进行技术革命，就节省劳动力，正好做这事情。

第四件事情是改进社会劳动组织。社会的劳动组织要加以改进，这里有很大的文章可以做的。基本上来说，小社变为大社，组织公社，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改善社会劳动组织。使劳动力好调配，劳动效果更大的发挥，社会的劳动组织组织得不好，就浪费劳动力。组织得好，劳动效果就提高，人力就节省下来，可以做很多事情。一个工厂有这个问题，一个学校有这个问题，整个社会有这个问题。农村里面有这个问题，特别城市里面有这个问题，社会劳动组织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军队也有这个问题。人多了，组织不合理，经常搞这个事嘛！要整编嘛，整编搞那个事的嘛。整个社会不要整编整编啊？社会上这么复杂。新沂那个地方——靠近徐州，听到这样一句话：他们解释叫女换男，老换少。以女的换男的，把男的腾出来去做别的事。有些工作妇女可以做的，不要男子做，女的来换了，这个男的去做别的事，女的代替男的工作，这个老换少，就是老年的代替青少年，有的工作不要青少年可以做的。老年人就可以做，老年人可以担负。他那里有这么一句话，这不是我的嗅。女换男、老换少。这也是改善社会劳动组织，发挥劳动效果。不要浪费劳动力。很多事情半劳动力可以负担的，但是，是青壮年在那里负担。所以，改善社会劳动组织，这里面是有文章好做的。

第五是树立多面手，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文化水平。因为劳动力紧张，大家树立多面手，劳动者可以做这样也可以做那样。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

是不是可以利用劳动力紧张这么一种情况来做好这么五件事情。使社会上一切有劳动力的人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不要有闲人，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妇女；进行技术革命，改进劳动工具；改进社会劳动组织；学多面手，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文化水平。那么，做好以上这么五件事情，我想，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很大一个促进，一个很大的好处，就要使我们国家提早或者说促进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劳动组织这个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讲了很多，是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根本问题之一。社会的劳动问题、劳动组织问题、分配问题，根本的是生产问题、组织问题。我在河南已讲了这个问题，人民日报登了一篇消息，标题讲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我看这样的一个标题不一定很妥当的。什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条件呢？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上已经写了，有三个条件。人民公社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是，很有一些全民所有制的成分，有些地方快的，可以三、五年，三、四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有些地方慢的，可以五，六年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以后，人民公社还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还不是共产主义。那么，再过多少年(多少年就没有讲)，又要提出这样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社会的物质产品极大的丰富了，东西很多啰，吃不完、用不完。第二个是全体人民的(不是讲一部分)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极大的提高啰。第三个条件是教育普及了并且提高了。有了这么三个条件，因此，就可以消灭三个差别，第一个差别是工农差别，第二个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第三个是城乡差别。消灭这三个差别，因而也就消灭反映这三个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就可以过渡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时代。有这样一段话嘛，这么一段话是比较全面概括的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刚才我所讲的话是另一个问题。我是有感于社会劳动力紧张，大家对于劳动力紧张有点抱怨情绪，有点愁眉苦脸，不大好办啊。有那么一种情绪，我就觉得这是好事，你们脸色不那么高兴啊，我就很高兴。人多事干不完，这个事情就好办了，有事等着人干，这就好办啰，我们的社会就发展得更快。

第三个问题我要想讲的，讲一下我们这个国家的劳动制度问题。

我们国家解放以后，从解放以来我们工厂里面实行的劳动制度、劳动工资制度基本上是适合的，但是有一些是不合理的。这是讲从解放以来有一些不合理，基本上是适合的。但是这个问题等到现在情况又有所不同了。农村公社化以后，我们工厂中工人阶级中的劳动工资制度就更有改进的必要。原来就有改进的必要，因为有一些不合理嘛，有一些不合理就要改进嘛。那么，现在农村公社化以后，就更有加以改进的必要，所以我们现在工厂的劳动工资制度是要加以改进的。

我在沿路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刚才讲的炼铁，看到成千成万的人去炼铁。江苏省有三百多万人炼铁。成几百万人去炼铁，有的开炉，有的炼铁，有的搞运输，有的砸石头，这些事情。我看到这种情形，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说，这些人都是从农村调去的，大多数是从农村调去的，城市也去了一些，工厂、学校的也去了一些，劳动是不要钱的，并且还带饭去。在农业社记工分，或者叫包饭吃，基本工资加奖励这么一种工资制度。一个地方集中几万人，一个省几百万人，一个专区十几万人。江苏省有多少工人？(江渭清：产业工人有×万。)产业工人有×万，但是炼铁的有三百万，那个大呢？是三百万大，还是那×万产业工人大。人那个多？因此，是不是可以这样讲：我们炼铁炼钢以来就开始创造了一种新的工厂中的劳动制度，看到这么一种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抓住这种新的现象，来研究一下，讨论一下，是一种新的劳动制度的萌芽，开始创造，这是群众创造的，公社里面，农村里面创造的。那么，现在几百万去从事炼铁炼钢，还是有临时性，他也不准备在那里搞多少年，不换不回家，他没有那个准备的。但是，那个炼钢炼铁，住在山上恐怕也不会是一年两年。我也曾经问过，你们炼铁准备炼几年，是不是炼一个月就不炼？还是炼一年就不炼？怎么样啊？他说，那是要长期炼下去，将来开大钢铁厂，那么赖是个大工厂嘛！就是要长期搞的嘛，不是临时搞的嘛。现在有临时性，将来会要变成长期性。如果

变成长期性，他们的吃饭、工资这些东西要加以改进的，稍许加以改进就行了。也是跟着农民走，根据农民那种吃饭不要钱，基本工资加奖励工资，就可以了。炼钢炼铁的工人，就可以把他变为长期的工人。因此，是不是可以就这种制度稍许加以改进，做为一种正式的工厂制度，正式的工厂制度的一种新的形式。那么，也是根据吃饭不要钱，按技术和劳动态度，发一部分工资和奖励。劳动保险也可以根据农村里面什么几包几包，那么包下来就是啰。劳动保险制度也不一定按照现在工厂的劳动保险制度。既然三百万炼铁工人可以这样做，别的工人就不可以这样做？你还要办别的工厂。比如江苏，你还要开纺纱厂，还要开什么机械厂，开什么发电厂，开什么其他的厂，三百万人他可以上山去炼铁，搭起棚子他可以做，情绪很高，我在那里看到的也不扯皮，不打架，也不合待遇，也不合什么劳动保险，什么工资太少，伙食太差，这一切都不合。那么，是不是开纺纱厂也可以这样。也可以从农村里⑨，比如我这里要两千工人，请你们那两个县调两千工人到我们这个纺纱厂来工作，有没有人来呢？来了就扯皮打架？就闹事？我看不会的。那么机械厂是不是也可以来呢？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开始萌芽了一种新的劳动工资制度，需要我们加以研究，而且以后加以贯彻执行。那么对于老厂我们现在暂时不变更，照老办法。老厂、老人暂时维持现状，暂时维持原来制度的现状，而新厂、新人就实行新的劳动工资制度。这种劳动工资制度根据何来？根据是从三百万炼钢炼铁工人那里来，加以改进。因为事实上已经有了，大批有了。产业工人只有×万，炼钢炼铁的有三百万，不是大批？除非我们看不见，看不见新的东西。当然，那个三百万现在还刚刚开始这么做，还有临时性，但是，我们可以把它变长期一点：把它加以改进就是啰。那么，以后新办工厂，新办机械厂也好，纺纱厂也好，……劳动局、工会、工厂的厂长，在座的是不是有？如果有，就请你们考虑这个问题。大体上我们劳动局的人，工会的人，工厂的厂长，脑筋有相当一点顽固的，对于这个想不通不敢想，不敢破除迷信，不敢破除教条主义，受教条主义束缚，稍许改变一点就是要闹事，就没有人来，那里去了三百多万人，有人去，那里并不闹事，我在那里看的。有的是当护士的，有的是中学生，有的是机关干部，有的是农民。挑的挑，敲的敲石子，面孔搞得一抹黑，晚上不睡觉，他在那里不闲事，你们是不是可以去看看，研究一下，工会的人，劳动局的，你们这些工厂的厂长，都去看看。这是一种新的制度，他们既然可以那样搞，那么，我们的工厂是不是可以这样搞？当然，是要加以改进。

势必实行两种工资制度劳动制度，老厂一个样子，新厂另外一个样子，实行两个制度，树立对立面，红旗应该插在那里，那个比较进步、那个比较落后，就提出这个问题嘛。就可以比较，那一个比较更好嘛。这我也是没有想好的，是有感于此，提出这么个问题，请同志们考虑。是不是也可以在这个问题上研究一下。当然，我们劳动制度问题，上面讲了嘛，所有的人参加劳动，中央已经有个决定，我们的干部也要参加劳动。从中央到省市各级干部，每年至少有一个月参加体力劳动。军队军官要下连队去当一个月兵。听说你们军区司令×××同志也报名当兵去啰。在徐州碰到山东×××同志已到徐州军队报名当兵，我看这个现象好。这一回又是军队做模范，军队已经开始做了，我们还没有做，你还没有报名嘛。（江渭清：我们落后嘛。）我们落后了嘛。解放军总是要带头的。（江渭清：解放军将地方的军。）将地方的军哪！解放军，×××同志军区司令可以去当兵，那么我们的省长、县长、市长是不是可以当工人，当农民，这一些人可以去当兵、当农民、当工人，那么，其他的什么人，什么厂长、局长、乡长不在话下嘛，自然要做嘛，这也是使我们所有的人全社会的都参加劳动，这也是一种制度。而并不是一样的，说是要好多工钱，要好多报酬，并不计较这个。我看你们那些炼钢炼铁的人也是不需要报酬的，努力在那里工作。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江渭清：这几天我们的厅长、部长、付部长都背背包参加工地去炼铁去。）这个很好，普遍的工人、农民都是这样子，是很好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列宁讲过这样的话，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是什么呢？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就是没有报酬的劳动，无定额的劳动。共产主义的劳动，劳动是没有报酬的，因为你横竖有饭吃、有衣穿，各取所需嘛，不需要另一个报酬，而且是没有定额的，不是一个劳动日要你做多少事情，没有那个定额，但是，劳动者都是自觉地达到定额，都是努力劳动，没有那一个说是劳动得差一点、劳动得不好，没有这样。这些人们已经是高度的共产主义的觉悟。劳动，达到一定定额的劳动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普遍地成为一种习惯。因此，农村

也好、干部也好、军队也好、工厂也好，是不是我们有一些新的制度要定下来，要来研究，这里比较复杂一点、难解决的还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工资制度。因为他历史上遗留下来很久，过去还是我们组织工人罢工要求达到的，现在又要他改变一下。是相当复杂的问题。比如年终双薪就是我们要求的，“二七”罢工以前就是要求那一个，几十年了，都有年终双薪，现在又说是年终双薪不要，又有人说，还是有一点好。所以要比较一下工人的劳动制度。工人阶级的劳动制度，现在已经创造了一种新的，抓住了新的，实行新办法让老办法放在那里摆一下。新厂、找新工人可以试行新办法。横竖是从农村里来的。从公社里来的，有人来嘛。这是第三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我还想讲一讲教育方针中间的一些问题。

关于我们的教育方针，中央已经有一个决定发表了。这是北戴河会议通过了的，陆定一同志有一篇文章《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那么一篇文章，那一篇文章也是经过中央讨论过的。那篇文章写得很好。现在我们要贯彻执行这个方针。

关于教育这个问题，从解放以来一直到现在，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党的教育方针是没有在学校里面彻底贯彻、完全贯彻的，贯彻得不彻底，中间经过几次动摇。这个情形，我们应当看到这个情形。为什么，一个是党没有抓紧领导，另外是一个，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教育队伍，教职员×万小学教员，还加上×万中学、大学教员，这个队伍主要的成分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进行过一些改造，但是没有彻底，没有把它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数教育队伍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没有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因为这个问题，这个工作还没有完，还要继续改造，所以因此很多问题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一些办法跟我们不一致，与我们的方针抵触。因此，在过去几年中间我们在学校里面这个资产阶级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包括我们自己的子女进学校，都一样的受了很多资产阶级影响的。现在要彻底加以改进，对于教育事业，要彻底加以改进。党要加强领导，贯彻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方针，教育为政治服务这个方针。

现在这个方面已经有很大的进步。勤工俭学开展了，在全国范围里面开展了，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农场也办学校，农业合作社、公社也办学校，实行勤工俭学。在学校里面实行勤工俭学。我看在工厂里面、在农村公社里面也是勤工俭学。是不是工厂办学校也是勤工俭学，一方面勤工，另一方面俭学。

勤工俭学不只在学校里面可以实行，在工厂里面，在农村公社里面也可以实行。学校办工厂，现在比较相当普遍，也比较容易办。我还想讲一讲工厂办学校的问题。工厂办学校，业余学校是办的不少，或者还有技工学校、技术学校等等办了一些，也有成绩。这些工厂业余学校也有成绩，成绩也不小、相当大。我曾经在天津、北京找一些工厂的同志也谈过，找工人也谈过，我曾经提出过是不是这些工厂里面可以组织半工半读的学校。在工厂里面组织。谈话的时候、这些工厂的厂长、党委书记也赞成，但是，有这么一个问题，他们工厂中办学校要培养人材，大体上他只愿意培养他本厂要用的人材，他愿意培养的。至于为别的工厂或者为整个社会培养人材，他是不大注意的，就是怕工厂实行半工半读，打乱工厂生产秩序，恐怕生产秩序打乱了。这也是一个问题。搞得不好也可能打乱的。大体上我发现他们的思想上有这样一个问题。工厂厂长、党委书记领导机关思想上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要完成生产任务。工厂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要完成生产计划，要制造物质产品，这个思想是很浓厚的，他们注意了。至于工厂要办学校，他觉得这个不是他的责任，也不是他的任务，也没有计划。办得好当然好，办得不好他也不算什么，这种想法是不是好？因此，是不是可以这么提：工厂的领导机关、工厂的领导人，除开制造物质产品这么一个任务以外，是不是还应当培养新的人材？这也是工厂领导机关的任务，也是工厂的任务，为建设新社会，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工厂要负责。因为工厂是无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培养新的人材，培养新的人，共产主义新的人，农村里面可以培养，工厂里面要培养。学校里面要培养，工

厂里面更要培养。

因此，我在有些地方提过是不是可以这样试办一下。以后一些新的工厂，第二个五年计划不是要办很多新的工厂吗？有一些大的工厂嘛，是不是可以试办。老工厂比较难办，因为他那一套制度已经定下来了，那么新工厂就不同，新工厂我们可以定他的制度，他的工作时间，他的工作制度，他的其他各种制度，是不是可以这样试办，在新建工厂里面建立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与工厂结合的合而为一的制度？新工厂要招工人，是不是可以劳动局与教育局合起来招。教育局替工厂招学生，劳动局替工厂招工人，就是一个(江渭清：名义两个既是工人又是学生。)既是工人又是学生。可以招一批高小毕业生进工厂，上初中课，也可以另招一批，比如一个工厂招两千人，可以招一千高小毕业生进工厂开始实习三个月四个月也就可以上机床了，进工厂半工半读，或者六小时工作，或者四小时工作，四小时学习，上初中课。再有五百人、六百人初中毕业生，进工厂上高中课，再招三百人到四百人、高中毕业生进工厂上大学嗓。那么一个工厂，初中、高中和大学都有了，办一个两千人的工厂就等于办一个两千人的大学一样，又是大学又是高中，又是初中，都有，国家不要化钱，除少数加一点盖几间教室给他上课，只盖点集体宿舍，加几个教员，而学生多数都是没有结婚的，只要集体宿舍，家属宿舍都不要，这种新工厂，可不可以这样，如果试办成功的话。可不可以这样，所有新工厂，或者一半工厂这样办，一百个这样的工厂我就是一百个这样的中学、大学。办学校、办大学不要办两套，就是一套，办大学中学就是工厂。就是一套。这么一种办法是不是可以试办？今天在座的不知道是不是有工业学院的。是不是你们可以这样，由劳动局、教育局、工学院、师范学院或者还加上什么工业厅，这五个机关合作起来组织一个小组，去包一两个新盖的工厂，厂长由他们派，党委书记由他们派，学生由他们招。那么你办两个工厂就是办两个大学、中学，就是两个学校、两个大学校。你们敢不敢这么试办？如果真要试办起来，那个问题很多啰，问题多得很。我在这里提一提，麻烦问题甚多，但是，那些麻烦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这样就可以大大地促进我们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可以大大节省了，免得又办大学，又办工厂，又盖高中又盖工厂。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工厂跟学校就合起来办？至于农场、农业合作社，他办学校半工半读，他容易办，工厂里面比较难办。老工厂我现在暂时也难要他们这么办。至于新工厂是完全可以试办的。(江渭清：老工厂现在就只办自己的。)是办自己的，他办了自己用的。他为社会训练人材啊，他不管那个事。他只制造物质产品，制造新的人呢，人的产品他不大负责的。是不是工厂里面除钢铁、除机械以外，除这些物质产品之外，还可以出工程师，出技师，出干部，也出厂长、出党委书记，出大学毕业生，这么一些人嘛。要出点人的产品嘛，是不是这个也要负责。工厂领导机关、工厂的党委书记是不是加上这么个责任，更光荣一些嘛。单纯只搞物质产品，见物不见人嘛。他只看到物质产品，对于那个人，怎么搞法，搞好一点，他就不重视的。你看他这个观点是不是也是见物不见人的具体表现之一。如果又见物、又见人的话，我们除开完成生产计划以外，物质生产计划以外，我们还完成多少教育的任务，培养新的干部、新的人材的任务。是不是可以这样？

这是关于教育问题，我想再还提这两点。

就是我们对儿童的教育，小孩子的教育，有一个时期甚至一直到现在我们在宣传上面也就是强调家庭教育，家庭对于小孩子应该负责，应该教育好啰。小孩不好就要父母负责。甚而至于要……，还有什么条例，小孩子犯了什么罪还要惩罚父母的。是小孩子俄东西吧？什么东西吧？我想，对于儿童应该有家庭教育，我想这个没有疑问，是必要的需要的，不是不需要。那么一个家庭教育，一个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也就是学校教育，工厂教育等等。两种教育都需要，社会教育也需要，家庭教育也需要，问题是现在应该强调那一种，应该着重那种。还是着重家庭教育，还是应该着重社会教育？我们在宣传上面应该是强调社会教育还是应该强调家庭教育？这么个问题，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据我看在今后宣传上恐怕是应该强调社会教育，不应该过分强调家庭教育。这是一个问题。

此外，还有托儿所、幼稚园、小学校。农村里面托儿化，城市里面我看不久也可能托儿化的。我们机

关里面托儿；化比较更早就搞起来了，以后可能更普遍啰。因此，农村、城市都是托儿化。普及小学教育。所有小孩子进小学，而且要普及中学教育，小孩都进初中。因此，对于我们新的一代的教育，托儿所、幼稚园、小学中学要负很大的责任，所以我们党委要抓这个。要加强领导。对于托儿所一直到小学、中学，对于儿童这方面的问题，是个大问题。是否以后，这是个方向，当做方向来讲，托儿所、幼稚园是不是应该向全托这方面发展。小学、中学是不是让他住校，不要天天回家。托儿所全托，小学、中学住校这样子对于家长负担更加减轻，父母更可以抽出来去担负社会劳动，恐怕小孩也好一点，也好得多。特别是我们干部子女，我想了，是有些担心的。如果在托儿所，在小学里一道吃饭、一道睡觉、一道穿那样的衣服，横竖那里是供给制，没有劳动的在那里劳动，将来加入公社就在那里加入公社，进工厂就进工厂。这样是不是比较更好一些。这是方向，不能马上办的。所有托儿所全托，小学住校，现在办不到。但是，是不是当做方向讲，是不是应该向这个方向发展。小孩子不大听父母的话，比较的还听老师的话，比较的还是怕群众。这也是个问题。所以，儿童教育是着重社会教育还是着重家庭教育，托儿所、小学以及中学的住校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在一部分问题上面带方向性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是不是重要？托儿所、公共食堂、小学、中学这些东西，现在我在乡下一走，有很多人看不大起，不愿意到托儿所工作，不愿意当保姆，不愿意做饭，女同志也不愿意做饭，小学教员不愿意当小学教员。做这些事情，那是社会地位很低，因此人家不大愿意做。这个情况恐怕是不好的，对我们的事业不利，对我们的社会不利。托儿所、幼稚园、公共食堂、小学是全体人民关心的事情。全体人民都关心啦。托儿所搞不好，他的父母就关心，劳动就不放心，公共食堂搞得不好，大家吃饭吃得不好，劳动也就不会好，小学生搞不好也是关系到父母。所以这几件事是人事。托儿所、幼稚园、食堂、小学校等等这是几乎关系全体人民的生活的问题，也几乎是全体人民所关心的。所以，这些事情必须办好，要提高。要把托儿所办好，把托儿所的水平提高，公共食堂的水平提高，要办好。曾经我讲过保育员应该经过师范学校毕业。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带孩子的人应该是比较高级的技术工人。是不是可以这样讲？看小孩总要比看拖拉机、抽水机差不多，或者总要高一点才好。现在是看抽水机的是要最好的人去看，而看小孩子可以马马虎虎的。看这样摆得合理不合理？这样看法。带养小孩应该是新式的办法，农村中还是旧式的办法，也不消毒，有病来了也不容易预防。所以办托儿所、幼儿园、小学校这些几乎关系全体人民的事情要加以提高办好。报纸上恐怕也要加以宣传，那些食堂是办得好的，要加以鼓吹，也要开现场会议，插红旗，插白旗？那些托儿所搞得不好的，应该批评；那些搞得好的，报纸登一下鼓励嘛，也要开现场会议，这些事情就可以办好的。办好了对全体几乎全社会人民是给予一种鼓舞，很大的鼓舞。因为他小孩送去就放心。现在我们还有好多干部不愿意把小孩送到托儿所，无非是说托儿所还办得不好。如果办好了，他也愿意送的。

这些问题当做问题提出，也有一点意见，提出请省委、今天这么多的同志，请你们大家考虑一下。但是，现在还不要在工人里面、群众里面展开讨论，群众里面展开讨论就要轰起来了。在领导干部中间议论议论，思想有个准备，想一想考虑一下，是好的。无非是要这样办，与不这样办，两个都可以啰。问题提出来嘛，现在还没有决定嘛，省委没有决定，中央没有决定嘛。我也是这一路来跟同志们谈话，看了一些事情感觉有这些问题，我自己也没有决定，到底怎么样，好不好，因为没有试验，没有试验过嘛，试验过以后才能最后相信嘛。没有试验的东西总还是不能晓得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呢？是能够行呢？或者是能够普遍行呢。这个还没有把握。

09）同某国议会代表团的谈话（1958年10月8日）

团长：地主、富农入社没有？

刘少奇：入社了。好的做正式社员，不好的做候补社员，一部分更坏的监督劳动，由民兵监督他们。

全部妇女都积极拥护公社，她们过去一直是做饭、带孩子。有时参加了田间劳动，回来也得做饭，做得不好还挨丈夫骂。搞了食堂、托儿所、缝纫组，解放了她们的劳动力，丈夫也不骂她们了。

团长：是否每个农村都成立了食堂？

刘少奇：都有，每个生产队设一个。

团长。全家都在食堂吃饭吗？

刘少奇：是的。有的小孩在托儿所吃，有的带来食堂吃，有的在学校里吃。

大家都赞成，运动发展得很快，如河南省在不到两个月中全省就公社化了。当然，一些具体问题还有待解决。

团长：听说本月底全国就可以完成，现在已经有百分之三十几了。

彭真：不只这个数字，还要多些。

团长：我们是从新闻简报上看到的。

刘少奇：运动中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只要向群众说清楚就可以了。个别地方，有的杀了猪、鸡，怕归公社，经过解释也就纠正了。一些具体问题，譬如自留地等如何处理，现在各地都在讨论，一致决定取消。牲畜、山林的处理问题，也在讨论，各地的具体办法不同。鸡、猪有的地方还让社员养，但只是少量的，主要的是由公社来养。目的是进一步增加公有部分，缩小以致最后消灭私有部分。

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我们准备把国家的仓库、商店、银行、加工工厂、学校都交给公社，加强公社中的全民所有制。

我们想，这样做两三年以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我走了三个省(河北、河南、江苏)，看了公社。他们正在讨论分配制度问题。有的地方提出吃饭不要钱，有的一般的菜也不要钱，如要吃好菜，自己花钱。有的地方提出一年发两套单衣，两年发一套棉衣，一年四双鞋，老年人住幸福院，儿童入托儿所和学校不要钱，结婚、生孩子发补助费。这些办法正在讨论。大部分只能在粮食上不要钱。

除此以外，还有一种分配办法：粮食供给，外加基本工资。

团长：粮食供给，工资的钱数是否要少了？

刘少奇：我讲的是农村，城市是另一种办法。钱的那部分是少了。

团长：这就是说，一部分实物，一部分钱。

刘少奇：是，农民开始领工资了，部分地实行了供给制。

团长：银行是全国统一管理的，交给公社，是否会有什么变化？

刘少奇；不会有变化的，还是统一领导。银行的工作人员交给公社管理，由公社发工资，公社可以叫他们去种地，可以调派他们。

商业也如此。把资金交给公社，但不准他们动用。

公社里有共产主义成分。农林牧副渔，工农兵学商，乡社合一，是社会的基层单位，生活单位，分配单位，教育单位。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目前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好形式，将来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团长：据我们了解，乡是基层单位，在乡的上面是县，那么在县的范围内是否成立联社？

刘少奇：有的一县是一社。一乡一社的，乡人民代表大会就是社员代表大会，县里是联社。

团长：省怎么办？

刘少奇：改组会有，但基本上不变。中央和省的人员可以大大减少。从这个观点来看，国家基层政权在开始消亡，但没有完全消亡。对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还要镇压，然而事情不多了。公社要分出一部分人监视坏分子。公社和县的主要任务是搞经济工作，阶级斗争只是一部分工作。国外的阶级斗争由国家来搞。民兵主要是对付外国帝国主义的，对付地主是次要的。

实行粮食供给制，是因为粮食多了，可以随便吃。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

团长：我们在××××建立合作社的时候很重视物质刺激的原则，使农民们乐于多作工作。在中国，这个原则是怎样体现的？

刘少奇：这个原则现在还是要的，工作好的多得些，坏的少得些。马克思把这种制度叫做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是不平等的制度。在城乡还保留这个原则，而粮食供给制是实行了“各取所需”的原则。

至于猪、鸡等，公社的收入多了，私人部分的收入也就无足轻重了，而且私人养猪养鸡也不合算。个别的老人不能出田劳动，养点猪、鸡是可以的。

团员：搞个人经济，会不会影响他们去公社劳动？

刘少奇：一方面是自己搞不合算，另一方面是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现在是共产主义精神大发扬。

譬如，目前有××万人在为钢铁而奋战：开矿、运输、建炉子、炼铁。他们不要钱，自带粮食。大部分是农民，一部分是市民，没有八小时工作制，没有星期天，没有地方睡，搭个棚子。这是什么？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工厂是八小时工作制，但工人们自己工作不是八小时，甚至是工作十小时、十二小时，礼拜天不休息，也不要工钱。

北京大部分工厂的工人都要求取消计件工资。这正象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所说的，是伟大的

共产主义精神。自觉的、无定额的、无报酬的劳动，是共产主义的劳动，这是列宁在一九一九年说的。俄国在内战时期有过这种劳动，列宁就大写文章。

我们的这种劳动的规模比一九一九年俄国那时大得多。××万人同时炼钢，如果要钱，怎么得了？这样的例子在其他方面也很多，如兴修水利。在这样一种精神下，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好。马克思说过，如果劳动者不肯多做一小时工，不肯少要一点钱，就谈不上共产主义。

我们的工人、农民、干部们不仅可以多做一小时、几小时，甚至可以多做几个月。如果多做一小时就多要钱，那就谈不上共产主义。

团长：中国党认为中国农民的觉悟，是否已经很高了？

刘少奇：是的。可以这样说，农民的干劲是共产主义精神的表现之一，不是法律和命令可以做到的，也不是共产党简单号召所能做到的。

彭真：讲一个例子吧！有一个合作社完成了自己的水利建设。社长于是号召社员去支援邻近一个社，并且说可以给报酬。社员们听了以后回答说，要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就去，如果是为了挣工分，我们就回家睡大觉去。

刘少奇：中国农民大部分觉悟很高。这是党几十年在他们当中工作的结果，党依靠了他们，他们相信党。他们一穷二白，看到了前途。“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为了长远利益，为了将来的幸福。

很奇怪，在中国，农民常是带动工人，农业带动工业，乡村带动城市。这也是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现在城市也在试办人民公社。我看了郑州，那里初步组织了城市公社。不错。

有这么几种公社：以农业为主的公社，以工业为主的公社，以学习为主的公社。

团长：学校也要搞公社？

刘少奇：都搞，机关和街道也要搞。

过渡到共产主义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而是逐渐实现的。“共产主义”这个字不能随便用。共产主义对社会主义来说是高级阶段。

我们想，开始从粮食起各取所需，其次是衣服，然后再及其他。过几年，糖每年生产七百万吨或一千万吨，那时糖也可以各取所需了。明年预计养七亿头猪，每人平均一头多，那就可以各取所需了。

粮食明年计划达到每人平均1,500—2,000斤。如果达到8,000斤，就超过了美国。美国每人平均1,900斤。这样就吃不完了，猪也吃不完了。在这个基础上，粮食和猪都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的原则了。

棉花和油料也可以实行各取所需。现在正在讨论明年城市是否可以实行供给制的问题。粮食供给制今年年底在乡村实行，明年年底可以在城市实行。

粮食和肉都够吃了，并且实行了机械化和电气化以后，就可以大大缩短八小时工作制，实行六小时工作制，甚至四小时工作制。

我们想，实行六小时工作时，所有的工人都要去学习。除了六小时工作以外，剩下的时间不能都用去

跳舞和进电影院吆，要学习。

我们中央决定在十五年内普及大学教育。没有大学教育，建设共产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在工人中正在推行多面手运动，一个人不限于一种技术。农民去工厂，掌握工业技术，工人去农村，学种地。加快消灭社会劳动分工的区别。使劳动者学习，使知识分子劳动，逐步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我们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在农村盖几千个大工厂，每个县办两三个，使农民入工厂，消灭城乡间的差别。

这些差别消灭下去，文化水平大大提高，产品很丰富，那时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了。

10） 在第十七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纪要(1959年8月24日)

各位讨论了，大家的意见，都是赞同×××的报告。指标，也赞成。指标是两个：一个是去年的指标，核实了的；一个是今年的指标，人大通过的一九五九年计划指标，把它降下来，降低一点。本来每一年的指标，都是到了八月要调整一次。一九五六年人大也通过一个计划，后来一调就调的很高，人大通过的计划根本不管多少用了，不知道各位记得不记得。各部部长他们是很清楚的。一九五七年的指标也是人大通过的，也是比较低，后来也是调高了一些。特别是人大通过的一九五八年的指标，后来一调就调得那么高。今年不是调高，是调低，所以就出问题了：去年调高，今年为什么调低？很多人有这个思想。我们作工作，搞计划，也是有这么一个反复，就是有时候搞低了，调高，有时候搞高了，调低。是否将来还要调低？将来还是有的。作事情总是有反复嘛！“高”“低”两个字也可以用“左”“右”两个字来代表。有人说，你们一高一低，一左一右。当然，我们主观上总是希望正确。政府的领导是正确的，计划是正确的。事实上，要作得不左不右，世界上没有那个事。主观上想搞的正确，作的结果，不是左一点，就是右一点，经常有这个事情。理想只是理想，理想跟实际是有一定矛盾的。正确的领导它跟实际都是有出入的。不过那个出入总是离这个线上下不远。方针错了，那就偏，偏，偏，偏……一直偏下去。那就叫做路线错误，叫做方针、路线的错误。那个是不容易纠正的。有时搞的高了一点，有时搞的低了一点，这个应该是常事。有人讲，你们去年的统计不确实，统计产量高了。结果核实是少了：有人就怀疑去年的大跃进，说，我老早就怀疑，你看，还不是自己承认了吗！？就是不可靠嘛！会不会有这个话呢？我看，有一些人会有这个话的。还有人讲，今年的指标降低了，我原来就怀疑那么高达不到。你看！还不是达不到，是不是？好象他有先见之明。这种人，我看也有是好意讲的；我看，讲这个话的人好意的不多。去年说粮食那么多，东西那么多，我们那个时候也是相信的。后来说没有那么多，就没有那么多嘛！还有一些人怀疑没有那么多，是好意的，听了就不讲这个话了，就不会来讽刺我们。刚才讲的话是一种讽刺我们的话，是一种反对我们的借口。去年的怀疑派，我们的指标核实、落实以后，是否会增加这个怀疑派呢？我看不是会增加怀疑派，而是会减少怀疑派。当然也会有这种人：你们去年报告统计的、公报统计的那么多，现在核实没有那么多，你们核实的是否可靠呢？恐怕也值得怀疑。也会有这种人，恐怕这种人是少数。相信我们的话的人会更多的，怀疑的人会减少的。今年的指标很快就会看到作得到或是作不到。一到年底，作到了他就不怀疑了。能够超过一点就更好。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一个反“左”反右的问题。现在提出鼓干劲、反右倾，是否还应该反“左”呢？现在不提反“左”，恰当不恰当？是否反“左”反右都提，又反“左”，又反右？或者只反“左”，不反右？或者只反右，不反“左”？这个也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有人讲这个话：为什么只反右，不反“左”？原来去年指标核实的过程就是一个反“左”的过程。反了“左”才核实了的；不反“左”就核实不了。去年不是有一些虚报浮夸吗？由于反对了虚报浮夸，才核实了；不反虚报浮夸，就核不了实。经过反复多次，有这么一个过程。核实过程就是反“左”过程。落实过程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曾经提出过，一九五九年要生产×万吨钢，……去年郑州第一次会议就开始反“左”了。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要充分可靠，要有实际根据，头脑不要太热，要实事求是。对一九五九年的计划，实际上是从郑州会议开始就进行反“左”工作的。一个是经济计划的指标，一个是人民公社中间的一些东西。那个时候三级所有制还没有确定，有一部分“左”的现象，就是集中过多。有一部分平均主义，过早地否定了等价交换、按劳分配这些原则。对这些原则不大那么重视了，重视不够。从武昌会议、郑州第二次会议以后，就作了纠正，确定了三级所有制，基本所有制还是原来的高级社，公社只搞部分所有制。因此，也就有人讲了：你们只搞部分所有制，我们还搞公社干什么？是否不搞公社好一点？公社是否搞得早了？但是不要轻视公社的部分所有制，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公社的部分所有制，一个公社有几千户上万户，每一个生产队一年可以积累百分之几，总产量的百分之几交给公社。如果一个公社有五十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交百分之几，五十个就相当多了。公社自己还办一些企业，企业完全是公社所有的。这样一个部分所有制，再经过三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或者十年，那个公

社就了不起了。到了这么一个时候，再经过三年、五年、七年、八年，至多十年以后，恐怕生产队所有制就不是基本的了，基本所有制是公社所有制了，因为它大了嘛！公社富起来了嘛！公社有工厂，有机器，有拖拉机，有电站，有很多东西，还可以办很多学校。那个时候生产队还是有所有制，恐怕那个时候就变过来了，基本所有制是公社所有制了，生产队变成了部分所有制了。有这么一个发展过程，大概是经过三年、五年、七年、八年这么一个时期，就逐步地由生产队所有制(即原来的高级社所有制)变为公社所有制，即由小集体所有制变成大集体所有制。而这个大集体所有制、公社所有制是接近全民所有制的，跟全民所有制差不多了。只要我们农村的公社所有制变成了基本所有制，我们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就基本上过去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经过人民公社的形式，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成为基本所有制了，过渡问题就基本过关了。所以这是一个有伟大意义的事情。我们经过人民公社这么一个方式，我们的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的过渡，会大大促进这个速度。所以不要轻视公社部分所有制。公社问题也好，指标问题也好，过去八、九个月以来，部分工作中所发生的“左”的现象已经纠正了，而且是纠正够了。今年六月，我们党中央就跟各地商量指标落实问题，向他们发出了一个意见，跟他们商量，指标落实，看怎样好，怎样决定好。他们就跟工厂商量。一跟工厂商量，有些工厂负责人就泄气了。从今年六月到七月这个时期，我们在庐山发出反右倾社论指示以前，已经有两个月，气就有点泄了，所以这个右倾现象已经冒出来了。就在落实的过程中、算账的过程中有些人就泄气了。这一阵风下来不得了，不是几个人的问题，而是几千万人、几万万人的问题。因为这样，有一两个月的生产情况不大好。有些地方的指标越定越低，认为越少越好。我们看到了有这个现象，一方面那些主观主义的过“左”的现象已经纠正，一方面右倾现象已经冒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反右倾、鼓干劲，而不同时提出反“左”。因为反“左”已经反过几个月了。是否将来还会有“左”倾现象出现呢？还可能有的。也许不会出现了，有了这次经验，他们就不那么干了。但有一些事情有人还会干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反“左”，再来纠正。这个现象并不可怕。我们应该是左派，不过这个左派县实事求是的左派，不能是主观主义的左派。主观主义的左，是带引号的“左”。真正的左派是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一定要使自己成为左派。只要能实事求是，只要是经过努力可以作到的，是实事求是的，就不要怕错。经过努力能够作到嘛！你怕错干什么！这是一个问题。

此外，庐山会议上，我们党的八中全会还讨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路线问题。……原来是不想开全会的，但是在开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出现了路线问题。就是在我们党的干部中间以及我们中央内部，对我们党的总路线出现了怀疑。去年大跃进是否搞糟了？成绩是否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否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人民公社办得对不对？大办钢铁是否得不偿失？这些问题，在庐山会议前一个阶段就提出来了。说去年大办钢铁、搞人民公社是不对的，大跃进也是搞糟了！因此，我们的总路线就成问题了。总路线对不对呢？于是我们就召开八中全会讨论路线问题。我们中央内部也有这个问题，党内干部中也有这个问题。党外一定有这个问题，不会是没有的。国外也有这个问题。一个是帝国主义，还有我们的朋友，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也有这个问题。中国是否搞对了？去年搞钢铁、办人民公社是否办得对？这个问题是我们的敌人和朋友以及全世界的人民都关心的问题，是国内国外党内党外都关心的问题。第二个阶段开中央全会，我们就讨论了路线问题。肯定了去年的大跃进是大跃进，不是假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人民公社是办得对的。人民公社中出现的部分缺点、错误已经纠正了。大炼钢铁不是得不偿失，而是得的很多，失的少。×××已经把这个问题讲过了。市场问题也是这样。这里又牵涉到形势问题，牵涉到去年和今年整个经济形势，由经济形势又引起了政治形势。罗隆基讲我们是人心丧尽，龙云也讲我们是人心丧尽。好象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政府有这样的引起人家反对的，好象历史上就没有看见过。我们国内的形势是否是这样呢？不是这样。我们大办钢铁、大办公社以后，曾经有一个时期集中过多了一点，搞了一点平均主义，农民那个时候暂时也有一些不大满意。后来把三级所有制确定了。集中过多的一一什么叫做集中过多呢？就是公社不管生产队怎样就把东西调去了。没有代价的把你的东西调走，你的白菜，你的粮食，你生产的什么东西等等。现在把这些东西都退了回去，凡是调走的东西要照样给价钱，少价的要

补给。这样给了以后，农民没有意见了。所以现在农民的情绪还是拥护我们的，拥护党，拥护政府，拥护公社的。市场上发生了一些问题，是一部分商品供应不够的问题。在职工中间有一些意见，经过解释也没有多大意见了。所以基本上讲来，经济形势是良好的，国内政治形势也还是良好的，并不因此我们不得下台。春荒有一部分，也过去了。现在是抗旱、救灾(水灾、虫灾)。在抗灾过程里面，人民公社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广东受了水灾，广东有一篇通讯上讲，因为发生了那么大的水灾，农民对公社的信仰更加提高了。有一个记者访问了一个农民，这个农民说，过去骂干部骂错了，因为有这么一场水灾，我们才知道这些人是好人，我们骂错了。他认错了。因为发生了大水灾，干部舍身跟他们一道，不顾自己的东西，而去帮助别人搬东西，跟他们一道吃苦，一道住。他们看到了这些东西。经过这场水灾，干部跟群众的关系也好了。湖南也有这个事。洞庭湖也是经过一场水灾，平常农民不大满意那些干部，经过那么一次水灾，干群关系也改善了。

关于我们的路线问题，今天恐怕不能多讲，等几天再讲。先把指标问题搞清楚。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复杂问题，这个问题可以引导到路线问题，庐山会议上就是这样引起来的：大跃进是否大跃进？是成绩大还是缺点、错误大？人民公社办得对不对？市场为什么这样紧张？因此，你们是否错了？就发生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党内发生，我们相信在党外也会有的。我看几天之后，再有一次会议(或者以座谈会的方式)，把我们党内的庐山会议的问题再给各位谈一次。

要看到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我们国内形势是好的，党内形势也是好的。经过去年大跃进，我们最大的成绩(也是我们的经验)是取得了大跃进的经验。这个经验不是少数人取得的，是我们全党全民全体干部取得的经验。这个经验，不在实际中是学不到的。从大学里面，经济学里面是学不到的。这么几千万人上山，几亿人搞大跃进，大家动手搞，这样才会得到经验。我相信，这样我们进步快。这个是出钱买不到的。而我们是在很短的时期内取得这个经验的。我们取得这个经验，那怕是犯很多错误。这个错误我们必须犯，现在不犯将来还得犯。我们犯了，将来就可以不犯或者少犯。即使犯了错误，发生了问题，也要从积极方面看。犯错误也有好处哩！“失败为成功之母”，只看失败，不看成功之母是不行的。我们的事情不是一下子就搞得完的，我们还要办很多事。我们是新国家，初搞社会主义，不经过失败，那有这个事！？凡是我们的失败，应该说是很宝贵的，这样才能取得经验教训。没有这些失败，要想成功，那是不可能的。我们有一条：我们经过总路线提出来以后，经过大跃进以后，我们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快一些了，而且可能比苏联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快一些。我们可以高速度发展，取得了这么一个成功的经验。有那么多的问题，什么不平衡啦，市场物资紧张啦，等等问题。包括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都有它的积极的一面。我们最大的收获应该是这一条。我们在这很短时期里面，几乎可以说党内党外、全体干部、全体人民都有这个经验。以后就可以避免错误，少犯错误。这个也是形势。有很多错误我们犯了，这一次不犯，将来还是要犯一点。经过这么一些曲折，我们才得到了这个经验。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11）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9月9日）

我想讲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

无产阶级，我们的党，是要进行革命的。要革命胜利，就要依靠广大群众，要放手发动群众，并且在运动中正确地领导群众前进。在历史上，社会上，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的阶级，各位同志要做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要记住这一条。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而且是最彻底的革命的阶级，不彻底就要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无产阶级要进行革命，在民主革命时期，要领导民主革命，就要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民主革命彻底胜利以后，要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这个任务，过去是这样做了的。现在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就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到现在已经十年了，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取得了胜利，但还要把它进行到底。是否要进行到底？这里有两种思想，有的说够了，尽是这样下去，革命到那一天为止啊？他们要不彻底，要停止，抱怨革下去。而我们就是要把它进行到底，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了又怎么办呢？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要进行不断革命。所谓不断革命，无非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革命，这就叫社会革命。

另一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外国人叫产业革命，我们叫技术革命。我们是革命的阶段论者，又是不断革命论者，我们革命是要分阶段的，这个阶段和那个阶段不要混淆起来。同时我们又是不断革命论者，不断进行革命，革命阶段论就是讲质变，因为量变的革命，部分的革命是经常有的，无产阶级就是要这样进行革命的。

在一切革命中，都要放手发动群众。在民主革命中也好，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也好，都要放手发动群众。要放手发动群众，要发动尽可能广大的群众，主要是发动工人、农民劳动群众，以及其它有革命性的群众。发动群众越大越好，还是越小越好？越大越好。有人讲，发动这么大群众这还得了，要越小越好。放手发动群众这是大家知道的原则，是马克思、列宁、毛主席老早讲过的。在我们一部分干部中间，不赞成这样的方针和路线，一方面，他们要革命，但是又怕出乱子，怕犯错误，怕出缺点。因而他们就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胆子不大，不敢放手。放手发动群众这是毛主席提出的口号。但是有些人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就产生无穷的忧虑，他们用许多办法搞清规戒律，限制群众运动。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既要革命，就不能怕出乱子，怕出某些缺点、错误。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根本区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有很多的区别，但是最重要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采取反对、指手划脚批评，还是鼓励？这是分界线。一切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都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限制革命的群众运动，当限制不住时，就反对，甚至要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资产阶级的革命家是这样的，当着他要反对他的敌人时，就要一点群众来参加他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当群众动手干起来，他们就害怕了，就要限制，就要颁布命令、法律来限制，如果限制不住，就要反对、镇压。这方面中国有许多这样的例子。我们和国民党合作，在广东时他们是要群众运动的，那时毛主席做农民运动工作，我做工人运动工作，还有其他同志也做群众运动工作。但革命一发展，打到武汉，他们就想法子反对，反对不了，他们就叛变革命。后来在抗日战争中间，蒋介石一直不让群众运动发展，他要一点，但不让群众运动发展，国民党大后方就没有群众运动。我们搞群众运动，他就反对。这一点无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中等资产阶级的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切资产阶级革命家、包括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家在内，都是害怕群众运动的。外国的例子也很多，如现在印度的尼赫鲁，阿联的纳赛尔，伊拉克的卡塞姆，缅甸的吴努，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很早以前，法国的大革命，当广大的群众起来时，资产阶级就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国和外国的例子很

多，东南亚的尼赫鲁等这些人，他们是会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这是一定的，不反对就不是资产阶级，就变成无产阶级了。我们现在还是要进行革命。一九五七年的整风、反右，党内的整风，主要是肃清干部以及党员中间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使无产阶级思想增加起来，继续进行思想革命。思想革命也就是在脑子里进行革命。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直接反对资产阶级和他的知识分子，这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去年的国民经济大跃进，组织人民公社，以及体制下放，改革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事情都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解放生产力，为什么要整风反右，提出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组织人民公社，体制下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高共产主义风格，改革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搞这么一套干什么？目的是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解放生产力。我们中国人几千年以来受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的束缚，包括我们自己的脑子在里面。这种思想在人民中间是束缚生产力的。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那么大的生产力从地平线上冒出来，好象是很奇怪，生产力是那里来的呢？……我问你：人还是那么多，东西还是那么多东西，工具变更不多，那么，生产力那里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蕴藏在我们社会中间，我们人民中间。潜伏的生产力，在以前由于种种束缚，有封建制度的束缚，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特别是几千年思想习惯的束缚，一下子解放好不容易呵！解放思想破除迷信、鼓足干劲来干的时候，生产力就发挥出来了，潜伏着的生产力，沉睡着的生产力，就发挥出来了。机器没有增加多少，生产资料还是那些，人还是那么多，但是生产力可以很大的发挥。从这里可以看到，人民公社、体制下放，也是解放生产力。刚才讲包到石景山也是体制下放，体制下放一下，生产力可以提高一倍，这不是一个生产关系问题吗？同是全民所有制，由王鹤寿来包干，是全民所有制，包给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也是全民所有制。可是归你王鹤寿管，生产力就降低一倍，归石景山钢铁厂党委会管，就提高了一倍，可见全民所有制内部，还有很多生产关系问题，集体所有制内部有生产关系问题，全民所有制内部有生产关系问题，这种生产关系需要不断地调整，不断地使它完备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经常要做的，在共产主义时期也是要做的。经常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础要不断调整，不断地使它完备。去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体制下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改善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是属于革命范畴里面，也属于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发动几亿人口彻底解放生产力这么一件事情。

但对去年这些事，有些人是害怕的，他们害怕去年大办钢铁、人民公社、体制下放等这些事情，发动这样广大的群众，不知道要出多少乱子。关于出乱子这个问题，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乱子，毛主席说过，革命就叫造反，造反还不叫乱子？革命的本身就是乱子。有些人讲的所谓乱子，实际上并不是乱子，不是缺点错误，而是革命正常现象，革命的正常秩序。但是，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间，总会有一些缺点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以前有，今天有，以后还会有的，恐怕一万年以后还得有。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不可能没有一点缺点错误的。一万年以后就不要群众运动吗？就不要很多群众起来搞事情了吗？盖这么大礼堂，也要搞点群众运动，要是搞一百个几百个呢？不要搞群众运动吗？这是人与自然界的斗争。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改变，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改变，那非搞斗争不可。一万年以后还要搞群众运动，那就还是要有缺点错误，我就不相信没有。我们要不断地总结经验，正确地去引导群众运动，要避免和尽量减少群众运动中的一些缺点，在发生缺点的时候，随时随刻加以纠正。我们要采取谨慎小心的态度，领导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要有这个态度，而不要随随便便，粗枝大叶，马马虎虎。毛主席告诉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是要谨慎小心的。即使你这样做，随时注意，但所有的群众运动，总会有九个指头的成绩和一个指头的缺点。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问题，不是现在暂时性的问题，恐怕以后总是会有的。一个指头、半个指头，两个指头、三个指头，大小不一，总是会有的。有七分成绩，八分成绩，九分成绩，有一分缺点错误，我看那就很好了。只有一个指头的缺点，我看是好的；两个指头的缺点，我看是可以的；三个指头的缺点、错误，我看也是可以的，因为有百分之七十的成绩嘛！七分成绩、三分出了毛病，还不可以吗？你还要求怎么样呢？当然可以要求缺点少一个指头，但是努力干了，还是出了三个指头的缺点，我看即使出了三个指头的缺点，也不要害怕，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要害怕。现在的问题是，出了一个指头的缺点，就怕了，就不得

了，就骂起来了，就岂有此理，你们不该搞，搞糟了。毛主席经常讲，军队干部带兵打仗，三仗中间打两次胜仗，一次败仗，威信还可以维持，如果是两败一胜，就站不住脚了。三次中有两次胜仗，只一次败仗，三分之一的缺点，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维持威信的。如果有人，怕在革命运动中发生一些缺点、错误，或者认为你搞可以，但不准犯错误，或者把一个指头的错误夸大起来，指手划脚，加以咒骂，那就不能有革命，不能放手发动群众，就等于反对革命。这样的人，具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根本缺点。

这里我讲一个我在一九五七年看到的一个材料，那是北京高级党校鸣放出来的一些材料。高级党校都是地委以上的高级干部，因此我们很注意。在那些材料中，对过去的土改、肃反、三反、五反、审干和合作化等运动很有意见，认为这些运动搞得不好。这些运动都是发动广大群众参加的，他们认为搞是可以的，但不要发动群众；特别是审干，反贪污和肃清反革命，他们认为发动群众来参加是错误的。这些运动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是成功的，必须的，不可少的。这些运动中间也发生过一些缺点、错误，这些缺点、错误不过是一个指头。但他们却认为根本搞错了。这些人以后都成为右派了。这些人的态度特别恶劣，他们是借此反党的。除了右派以外，其中还有右倾思想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少的，他们也说这些运动搞糟了，搞得不好。那时的左派挺不起腰来，也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件什么坏事，不大好讲，见不得人似的，有右倾思想的人，说这些运动付作用太大，伤人太多，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人民，有损失或者有很大的损失，和彭德怀同志讲的差不多。他们说中央领导不正确，或不完全正确，表现一左一右，不左即右，或者说太偏了。因此他们要求中央不左不右的好，绝对正确的好。不左不右，绝对正确的领导是没有的。总会有一个指头的缺点。这些人有一股很大的怨气，有些人的怨气恐怕到现在还有，你们空军也经过三反、审干，打过大老虎，怨气也还是有的。党校，不只是党校，其他机关、部队里面是否也有一些，我看也有的。他们抓住三反、五反中的缺点，说打了那么多人，结果只有百分之五，那百分之九十五不是都错了吗？而不知道有的是降低了标准，后来审查时有意降低了，少整一些人，一万元以上的才算大老虎，几千元的都不算，而且都是讲贪污的，浪费的、公私不分的不算，这样就少了么，所以只剩下百分之五了。在三反、五反中，也有一个指头的错误，将好人搞成了大、小老虎，那是错了的，不到百分之五，只有半个指头。其它的一些人，不是完全错了，也贪污了一些，几十、几百，或者浪费、公私不分很严重，因此把他打上，以后又把他的帽子摘下来了。除完全错的以外，是否那么冤枉呢？老实说，我看不冤枉，应该打一下子，他总是贪污了一些，戴几个月老虎帽子，还有什么怨气呀？当然，有的人被打了，但他是没有怨气的，他真正改正了，小贪污也不搞了，这样的人是大多数，有怨气的人是少数。有怨气的人就那么正确吗？我看不见得，有机会还要打一下，他还有怨气么，他不承认错误么！这个问题值得考虑一下，我没有肯定意见。

……

有人讲，现在民主革命胜利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以后不要再搞运动了。黄克诚在西楼开会就对我讲过，说台风再刮不得呀！恐吓我们不要再搞群众运动了。当时我们没有理他。还有人讲，这几年，左一个运动，右一个运动，一个接一个，象打摆子一样，一冷一热，实在不好受。这是我们干部讲的，共产党员讲的。毛主席在庐山批了一个文件，说洛甫同志打摆子，冶一阵热一阵。他们却说我们是打摆子，他们认为群众运动是打摆子，因此，他们反对搞群众运动。在最近的大的群众运动中间，他们也借口运动中间出了一些缺点错误而反对。他们要求不左不右，要求领导革命没有任何偏向，要求四平八稳。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领导呢？是没有的。不发生一点偏差的群众运动，也是没有的。他们就是不要群众运动，不要前进，实质上是不要革命。现在我们中国，在社会上，同时也反映到我们党内来，我看有这么三种人：一种人要求回到资本主义去，说我们现在已经前进得过分了。这是反动的，是资本主义要复辟，它可以采取各种方式，但实质上是要求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上有，资产阶级是这样的，一部分富裕中农是这样的，他们有社会基础，而我们党内代表他们的人，如彭德怀同志、黄克诚同志、张闻天同志是不是属于这一类，实质上他们是采取各种方式还是要求回到那个地方去，回到资本主义那个秩序里面去，他们认为这个秩序不好受，冶一阵热一阵嘛，打摆子嘛，这是一种。还有一种人，是要

停留在现在位置上，不继续前进，或者要前进也是要四平八稳。事实上是没有四平八稳的，既要四平八稳就是要停止，就是再不要革命了，再不要搞群众运动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些人实质上是要停留在现在的位置上。还有一种人，就是要求继续前进，在还要前进的人们中间也可能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慢速度地前进，一种是要前进的快一些，要大踏步地前进。我们应该是那一种人？我想你们应该考虑。属于第一类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家，属于第二类，不干了，不进则退嘛！我看也不好。第三类人还是要继续前进的，前进中可以有这种方法，也可以有那种方法，有快有慢。党中央、毛主席历来是主张继续前进的，而且是大踏步前进的。我们是属于这一派的。因此，和其他人有些冲突了，有些分歧了，意见不同了。真的意见不同挖出棍子来就是这个问题。

这里可以讲这么一个问题，过去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了这些运动，也可以检查检查领导，到底我们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是不是最正确的最好的领导。我想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是最正确最好的领导。这句话是有一部分人不赞成的，他们觉到不是这样的，特别是觉得外国人的领导好一些。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问：马克思、列宁的领导是不是比我们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更好一些？如果要马克思、列宁领导这样大的群众运动，领导这样大的革命，是不是也会有一个指头的缺点？或者是一个指头的缺点也没有？是不是叫马克思、列宁打大老虎的时候一个都不错？要马克思、列宁领导我们的审查干部是不是一个都不搞错？是不是在审干小组会上斗了一下，斗的结果也还不是特务，可是斗了一下，伤了点感情，是否这件事情不会发生？我在一九二一年到过苏联，那时列宁领导的革命，我在莫斯科是看了一年的。一九三〇年我也到过苏联，又住了一年，这一年是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间，是斯大林领导的，我也看过。那时他们的情形也、不比我们好，和我们的情形比起来严重得多。我跟×××一道去的，那时我是组长，领导着这个小组，由海参威上岸，后到伯力，一路走到莫斯科，坐火车走了三个月，有时领不到面包，只好饿两天肚子。我们一到火车站，围起来的尽是要饭的。这是实际情形，困难比我们大得多。他们那时搞五年计划，那个紧张情形怎么样？比我们紧张得多嘛！市场没有东西卖。我是抽烟的，买一包烟好困难呀！买烟要开条子，我是外国人，开条子到秘密商店去，才能买一包烟。那时，他们是通货膨胀，钢的戈比一下子就不值钱了。就是列宁、斯大林的领导，他们的困难，他们发生的问题，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所发生的后果，比我们大得多。当然，他们那时有他们的困难情形，我们的条件比他们好些，客观条件好些，所以我们也应该好一点。我想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绝不次于马克思、列宁的领导，假如马克思、列宁生在中国，我想他们领导中国革命也不过如此。因为没有看到过他们，所以就神化了。毛主席形容这些人的心理是：菩萨是远处的灵，近处的不灵。毛主席在我们的身边，天天可以见到，可是没有见过马克思、列宁。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讲，从毛泽东同志领导以来，我们党中央的领导是不是最正确的领导，最好的领导呢？我想是的。对于这样的领导，应该是满足了，不要再有要求了，不要既不左又不右了，一左一右，有一时期左一下，有一时期右一下，是必要的。毛主席说过：矫枉必须过正，有一个时期就要偏一点，不偏就纠不过来。但不是一直偏下去，一直偏下去，就不得了。一个时期对于某个问题，要有重点，强调一个方面，强调得比较厉害一点，这是正常的领导，正确的领导。列宁也常常强调得那么厉害，在《左派幼稚病》中，他讲过：战胜农民、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比战胜资产阶级要困难一千倍。到底有没有一千倍啊！是不是强调得过分了一点？他为了说明这个任务的艰巨，就是那么强调的。我想最正确的领导，在大的群众运动中间也会有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的缺点，没有，是不可能的。最正确的领导尚且如此，那么次正确的领导发生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缺点+也是可以原谅的，应该支持的，他只有三个指头的缺点嘛！百分之七十的成绩，你还不支持吗？但是有些人不原谅，要反对，甚至一个指头的缺点，也要反对。

一个时期有一股风。专讲工作中发生的这些缺点和错误，缺点和错误收集起来确实也不少，所以形成一股风。这一股风我们应该顶住。某些运动，即使是成功的，过后也总是有、一股风，批评这个运动，说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这个要顶住。犯错误的人也要顶住啰！王明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这不是一个指头的缺点，而是九个指头的缺点啰！但是他一直到现在不承认。博古开始也是顶住的，在遵义会议之后，他也是顶的，不承认的。洛甫在遵义会议之后，也跟着王

明犯过路线错误，他也是顶住的，顶了七、八年，到整风的时候，就顶不住了。毛主席讲的两条路线一印，把他那些文章也印出来，他们就解除了武装，不顶了，顶不住了。这里可以看出，他们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他有他的顽强性。犯路线错误的人还是顶的哩，我们如果在运动中百分之七十、八十、九十做对了，只有那么一股风还顶不住？！我想是应该顶的。

我们经过这个事件，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事件，对我们党是有很大好处的，使我们能够提高水平。我们应该学到一点经验，就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就是借着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一点缺点和错误，刮起一股风，想把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刮倒。这股风还不小，因为发现得早，还没有刮到八级、九级、十二级台风，就把它压下去了。如果一直让它刮下去，是可以刮到十二级的。八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材料，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个材料是经过毛主席批示的，我希望同志很好地学习它，在这方面提高点水平。今天我在这里讲讲这个问题，是因为有一部分同志，在这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觉得自己挺不起腰来。所以这个问题值得讲一下的。

过去历次大的革命群众运动，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而毛主席领导的运动，尚且有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如果是其他人领导的，是不是可能会有更多的缺点和错误呢？我看更加可能。现在毛主席健在，也还发生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的缺点和错误，如果毛主席不在了，不是更有可能吗？运动还是要搞，领导还是要领导，一个指头，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缺点还是要发生，那么，到那个时候再刮起这么一股风，谁来顶啊？毛主席不顶了，那时在座的同志们大家顶一下才好，是不是？大家顶住，事情就好办了；大家不顶，事情就不好办。因此，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对于一个党员，一个革命者是否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自己阶级的试金石。当然，那时不赞成群众运动的人，是不搞群众运动的，因此，也就不会有缺点，不会有错误；但是也就不会有革命了。所以这就是取消革命的倾向，是反对革命的一种观点，这是资产阶级的方向。今后，我们还要搞更多更大的群众运动，如对社会的改革，对于自然界的斗争。也还会有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的缺点和错误。所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应当是最彻底的革命家，是不怕群众运动的，也不怕运动中发生的一点缺点和错误。当然在运动中要小心谨慎，努力避免缺点和错误，有了缺点、错误应立即纠正，这都是必要的。如果怕群众运动，怕群众运动中间发生缺点、错误，他就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资产阶级革命家，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候是革命家，他还革命；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了，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不能成为革命家了，资产阶级革命家如果不改变，现在就不能成为革命家，而成为反动家，起反动作用了。

以上这些问题，我是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他们还没有完全肃清资产阶级的影响)讲的，是对好人讲的，对同志们讲的。也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要我们坚定起来。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一方面要临事而惧，兢兢业业，力求避免在运动中发生错误，发生了错误，立即纠正。我们要采取这种态度。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大胆革命，放手发动群众，不怕出一个指头、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缺点。不要怕，不要不敢革命，要敢革命。那末，对于那些诽谤革命群众运动的歪风邪气要顶住，对于这种歪风，对于那些指责、咒骂和各种各样的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议论，要加以驳斥。要热情地对待群众，要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不要随便附合那些有损群众运动的歪风邪气。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就是左派，马克思、列宁自己称自己为左派，历来如此，说我们是左派。我们要力争上游，所以我们是左派。但不是那种主观主义的左派。主观主义的左派，是括弧里的“左”派；我们是左派，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左派，不是中间派，更不是右派。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犯一点过左的错误，但只要一发现，就随时纠正。发生了过“左”的错误，随时纠正了，这同主观主义的、系统的“左”倾路线错误是完全不同的。“左”倾路线错误是一直“左”下去的，他自己纠正不了的。毛主席讲过，凡是犯路线错误的，他自己是不能纠正的，只有别人来纠正，就是要把那个领导推翻。那末，就是正确的领导，有一个时期犯过左一点的错误，有一个时期犯过右一点的错误，但

是一发现就纠正了，这是正常的，难免的。这与“左”倾路线错误和右倾路线错误完全不同。所以真正的实事求是的左派，同那个括弧里面的“左”派、主观主义的左派是两种不同的派别。前一种是好的，我们要学习的；后一种是不好的，我们要反对。所以一个时期的过左随时纠正了，同那系统的路线错误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毛主席讲矫枉必须过正，过正就是说要过左一点啰。这是必然的。彭德怀同志历来反对这句话，说矫枉必须过正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个人讲话、做事情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等于没有政策，有重点，就是过正一点，过正就是偏了嘛！要有重点。所以一时的过左同系统的路线过左是两回事情，前一种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有益处的，这就是“矫枉必须过正”那个左。但一直左下去，不纠正，成为路线过左，那就是数量变质量了，就变到王明那里去了。如果不是路线过左，而是一个时期，为了强调某些问题而过左一点，同时也迅速纠正了，如果是这样情形，那我就说左比右好。这个话是很多人反对的。如果不是路线的过左，不是系统的犯“左”倾错误，而是一个时候左了一点，并且随即纠正了，那确实是左比右好。当然一个时候的过右一点，也是允许的，这不会受很大的损失，而且是容易纠正的。譬如说，人民公社里面搞一平二调，这并不难纠正嘛，几个月就纠正了嘛，不比那王明路线几年还纠正不了，遵义会议后还等了十年，在整风中才纠正，花那么多力量。一平二调，不要整十年风就纠正了。所以一个时候的、范围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不知你们看过没有，航海里线是笔直的，但轮船驾驶员，这样一搬，那样一搬，他是一左一右的。飞机驾驶员我也看过，本来天上的航线也是笔直的，似乎是从上海一直就到北京了，对准它就可以一直走，但是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一个时候左一下，一个时候右一下，他就是一左一右的。他不一左一右就到不了北京。自然界的事情，社会上的事情，都是合乎规律的。所以一时的范围不大的一左一右的领导，就是正确的领导。飞机驾驶员、轮船驾驶员，他那么一左一右，就是最好的飞机驾驶员，最好的轮船驾驶员。但是，不论一个时候过左或一个时候过右，都是应该纠正的，因为过一点嘛！而且还应该实事求是的加以说明。

我的话不是对个人野心家、阴谋家说的，他们不是希望我们有正确领导，而是希望我们犯错误的，希望毛主席犯错误，中央犯错误的。我们犯错误，他就高兴，中央不犯错误，我们不犯错误，他就情绪低落。张闻天就是这样：只要我们一犯错误，他的劲头就来了，我们不犯错误，他就情绪低落。他们不是要把事情搞好，而是要把事情搞坏、搞糟，然后，他们可能推翻中央的领导，他们上台。高饶集团是如此，彭德怀、黄克诚同志也是如此。他们是别有野心的。如果他们这些观点不改正，要学马克思主义也是学不进去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讲讲关于所谓个人崇拜的问题。所谓个人崇拜，在苏共一九五六年二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后，那时候，在中国也有人要反个人崇拜。那时有一股风，各地方、各机关也有人说，在中国也应反对个人崇拜，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反对个人崇拜？党中央内部也有人反对个人崇拜，中央内部的代表就是彭德怀同志，也有其他的人。那时彭德怀同志，跃跃欲试，他也想搞个大跃进。他在西楼政治局会议上，两次提出来反对唱《东方红》这个歌，反对喊毛主席万岁。就是要中央来禁止群众唱《东方红》这个歌，禁止喊毛主席万岁，而这是几亿人民的事，中央怎么能禁止呢？我们没有理他，不管他那一套，他就讲不下去了。搞一次，我们不听他的，不理他，他就不讲了，再提一次又没有理他，他又不讲了。但是他到外面讲。西楼讲不通，中央会议上没有市场，就到别的地方找市场了。而这股风，被中央的两篇文章，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压下去了。那两篇文章一出来，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就反不起来了。但是彭德怀同志还是不死心哩。“七大”党章有这么一条：我们的党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指导思想，那时彭德怀同志参加我们那个党章起草小组，他就提议不要写这一条，他又没有什么道理，就是试探吧！他这个人就是这样的，他是试探试探哩！只要提一句没有人理他，他接着就不讲了。可是我们就很注意。到“八大”开会时，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开会讨论邓小平同志起草的党章修改草案，小平同志没有把那一段写上去，彭德怀同志就说，那一条为什么没有了？“七大”党章有的啊，现在是不是要写上去啊，你们为什么划掉了？划掉了是不是外国人看见不好，中国人看见也不好？他主张写上。他讲了那么一篇，他以为我们忘了他在“七大”时讲的话，时间过去了十多年，可是我们记得清清楚楚。所以两篇文章出来之后，他还是不死心。

他的意思是这样的："既然我在'七大'反对你们写上去，'八大'你们又划掉了，你们为什么不承认'七大'写上去是错误的？而我是对的，那时我是反对的，苏共开了二十次代表大会，你们现在不敢写上这一条，你们于心有愧。我赞成写，你们还是不敢写。"有这么个神气，有这么一股劲。那时我答复他，"七大"时，有必要写这一条，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领袖问题已解决了，"八大"的决议里可以不写。因此，他很难讲下去。所以他在政治局是很不得志的，有什么话总是讲不下去，露那么一点，下面的话就说不下去了。他很不高兴政治局会议，因此，就不愿到会了，经常不来了，来了发言又不听他的。所以他跟绝大多数的政治局委员不是一道的，不是一条心的，话不投机，听又听不进去。

我这个人，历来是积极的提倡"个人崇拜"的，也可以说"个人崇拜"这个名词不大妥当，我是说提高毛主席的领导威信。我在很长时期就搞这个事情。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主席；"七大"的修改党章报告我也宣传，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的。我以后是不是还要搞别的同志的"个人崇拜"？也可能的。这完全不是为了那一个人，更不是为了我个人，或为了争选票，不是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替彭德怀同志搞"个人崇拜"呢？我也想过，后来我想不能搞。他是想要我替他搞"个人崇拜"的，我可以感觉出来，不能搞。因为他自己极力搞他的"个人崇拜"，装得很认真，在各方面极力表现自己，他有个人野心。但我看他这个人的政治水平是很低的，比在座各位同志的政治水平都要低一些。不象他个人的想法，他自以为水平很高，我就不相信。他估计形势总是估计错的，这次在庐山会议又估计错误了嘛！他如果政治水平很高，为什么要搞这个事啊？政治水平高的人是不会搞阴谋的。马克思主义很少，或者没有，只有个人野心，所以他的"个人崇拜"不能搞。我们搞"个人崇拜"这件事情，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不是为了任何人。

在革命队伍中间，个人的威信，若干个人的成信，跟党的、阶级的威信是不可分离的。集体的威信，党的威信、无产阶级的威信，是通过多少个个人的威信表现出来的。在威信这一点上来讲，无产阶级的威信长时期不如资产阶级的威信高。在中国如此，外国也是如此。在中国无产阶级的威信，比如陈独秀的威信不如孙中山高，就是我们毛主席的威信，过去也不比蒋介石高嘛，在长时期里面，无产阶级的威信不如资产阶级高的。两个阶级的领袖是悬殊的，而且在各方面还有这个问题，比如现在我们在学术界、文艺界中，共产党的威信还不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演员的威信，我们培养的还比不上梅兰芳高，那个演戏的比得上梅兰芳呢？现在还有这个问题嘛。无产阶级的威信和它的领袖的威信不如资产阶级高，长期造成无产阶级的困难。比如英国共产党的威信，就不如保守党，不如工党，不如丘吉尔、劳埃德的威信高，他们不是困难吗？印度共产党的威信，就不如国大党高，共产党的领袖总书记高士的威信就不如尼赫鲁高。印尼共产党的领袖艾地就不如苏加诺高。伊拉克卡塞姆的威信很高，共产党现在还去拥护卡塞姆，虽然他现在很想反对群众运动，你还是不能不跟他合作。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不把资产阶级的威信和它的领袖的威信打下去，把无产阶级的成信和它的领袖的威信提高，压倒他们，无产阶级就不能得到胜利。没有一个有威信的党，没有一个有威信的党的领袖，有威信的党中央委员会，想把党团结起来，把人民团结在党的周围，是不可能的。恩格斯专门有一篇文章叫做《论权威》，因为那时有那么一些党员反对权威，恩格斯把他们称为"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恩格斯在那篇文章中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有权威的东西，那些反对权威者，散布反权威的论调，要么他们是不懂，散布糊涂的观念，要么他就是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他批判那些反权威的人的结论就是这样：他说，这两种观念，无论那一种，都是为反动派效劳。这句话讲得很重。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那本书上讲阶级、政党、群众、领袖互相之间的关系，专门有一章。他说：阶级通常都是由政党领导的，而政党通常是由那些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负责职务而成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多少固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是起码的常识。……我们党是由中央委员会领导的，中央委员会有政治局、书记处，政治局常委，有主席、副主席这么一些同志来办事。因此，没有个人的威信，没有若干个人的威信，党的、无产阶级的威信就不能建立起来。你说党要有威信，无产阶级要有威信，如果没有什么个人的威信，怎样建立得起来？在我们六亿五千万人的大国中间，建立党的阶级的若干个人的威信，被人民承

认，被几亿人民所承认，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经过几十年来斗争的考验才建立起来的一个有威信的党，有若干有威信的人来主持，才有可能团结人民，战胜强大的敌人，才有可能搞建设，搞大跃进。没有这个威信，那末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破坏这个威信，就等于破坏革命，破坏建设，为反动派效劳。彭德怀同志是借着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的。我们应该讲，斯大林的个人威信是很高的，他的个人威信中间，有一少部分不是那么健康的。这一部分不健康的东西，应该注意把它纠正，而毛主席和党中央则早就把这些不健康的东西否定了。在我们党七二中全会上决定，党内不许作寿送礼，不许用人名来命名等等，这在苏联是很普遍的，苏联的领导人到五十岁就做寿，中央就有贺电，外国各国都有贺电。作寿、送礼、以人名命名地名，什么斯大林工厂，莫洛托夫工厂等，这些事情，我们党、毛主席早已否定了。所以我们党很早就注意这个问题上的某些不好的影响，我们以后还要注意。苏联党的二十次代表大会，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我看在方法上、分量上也有不妥当的地方，我们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上，讲过这些问题了。有人借着苏联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要在中国反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是完全错误的，是一种破坏活动，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破坏活动。我们党中央要有领导核心，这是常识。资产阶级也是这样搞的。在我党中央要有领导核心，所有各机关、企业、部队、各地方，都有领导核心嘛？每个支部要有领导核心，支部书记嘛，小组要有小组长，一个班要有班长，一个连要有连长，一个团要有团长，一个师、一个军都是这样。没有这样行不行？没有这样是不行的吧？但是要真正形成一个地方、一个公社、一个支部、一个县、一个省、一个连、一个团、一个师的领导核心有威信，他所领导的群众是心服的，这是很不容易的。任命你当团长、师长这是一回事，在法律上是合法的，真正建立起威信来，成为实际领导核心，这又是一回事。这是经过长期工作考验才能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不只是党中央、各级、各地方、各机关、各部队，都要有意识地去建立那个地方的领导核心，那么彭德怀同志为什么要反对这一件常识呢？毛主席在庐山也讲过彭德怀同志为什么要反对这个常识呢？他不是不懂，目的是破坏你们这些人的威信，要破坏你这个领导核心，才好建立他自己的领导。不破不立，他要破一个，才能立一个。他是建立以他自己为领导的核心，所以你这个他要破。这回我们明确表示：我们还是要我们这个，不要你那个。彭德怀同志几十年以来，背地里，背着中央，背着主席鬼鬼祟祟说了主席和许多中央同志的坏话，阴谋搞他个人崇拜。他的这个人不是反对“个人崇拜”，而是积极赞成“个人崇拜”的，只搞他自己的，搞了几十年，所以有他的影响。他讲了毛主席及讲了我们其他一些同志的坏话，而我们没有讲过他的坏话。今天在座的同志，几十年来，你们听到过毛主席和我们其他同志，讲到过彭德怀同志的坏话没有？你们听到过没有？没有听过嘛！我们总是不讲他的坏话嘛！虽然他有那么多缺点和错误，我们不是不知道。有些同志讲，彭德怀犯这么大的错误，还做中央政治局委员，还做国防部长，什么道理？为什么不早讲？我们早讲，那是讲他的坏话。我们是不讲的，我们遵守纪律。要讲，当他的面讲，在会议上讲，此外我们不讲。而他则是不遵守纪律的。当面不讲，会上不讲，背后乱讲。讲了几十年了。他有这个优越条件。人家要遵守纪律，是受束缚的；他不遵守纪律，就无拘无束，自由得很，他是这样自由的讲，所以造成他们的一些影响。那么好吧，他们讲了几十年，我们讲彭德怀同志几个月的话，总可以讲吧！从庐山讲起，现在还讲，我看还要讲几个月。我们不是鬼鬼祟祟的讲，我们是在大会上讲，公开讲，当他的面讲，不鬼鬼祟祟的搞。

还有这个问题，难道说毛泽东、刘少奇这些人是不能反对的呢？高岗那个时期就有这个活动。有错误不能反对吗？不能批评吗？党的中央委员犯了错误不能批评吗？不能反对瞩？只能拥护吗？只能赞成吗？不是这样。不论谁，毛主席也好，我也好，林彪同志也好，以及任何同志也好，有了错误都是可以批评，可以反对的。党章上载了，以党章为准，保证了的，党中央委员犯了错误，也是可以批评，可以反对的。没有犯错误，你有不同意见，也是可以批评，可以反对的。但是要在一定的组织原则，一定的会议上，一定的纪律条件之下来进行，是为了把事情搞好，从好心出发，不是为了把事情搞坏，不是进行破坏活动。为什么彭德怀同志当面不讲，会议上不讲，要背地里鬼鬼祟祟去讲呢？不明火执杖起来反对中央呢？我想彭德怀同志他的方法主要是进行阴谋活动，他的反党反中央，跟高岗他们一样。他的纲

领不是明火执杖地统统拿出来，而是背地里鬼鬼祟祟地进行阴谋活动，他的严重性也在这一点上，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几次党内斗争，陈独秀是完全提出自己的纲领的，是明火执杖的，瞿秋白也是有纲领的，王明也是提出纲领的，李立三也是提出纲领的，第二次王明路线也是提出纲领的，明火执杖起来反对的，这也好，不论你对也好，错也好，你明火执杖起来反对是可以的。但是高岗、彭德怀不是这样的，不是统统把自己的纲领拿出来，他们扭扭捏捏，拿那么一点，试一试，做一个幌子，幌那么一下，就收起来，为什么这样？因为在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党中央的威信高了，毛主席的威信高了，党进步了，提高了，干部的水平提高了，他的市场很小，那是提不出的，提出来没有好多人赞成，所以他们不能明火执杖把自己的纲领统统拿出来，他要搞阴谋，鬼鬼祟祟的搞。他自己懂得，如果统统把自己的纲领拿出来，他自己立即会垮台。他要隐藏起来，把资产阶级的路线，资产阶级的纲领隐藏起来，进行阴谋活动，所以这是个阴谋集团。

彭德怀同志要求民主，要自由。他们要求民主，是要求讲怪话的民主，要求反总路线的民主，要求宣传资产阶级路钱的民主自由。他们感到有压力，为什么？因为好人多了，正确的人多了，他的那一套拿不出来，一讲就遇到人家的抵杭，于是感到有压力。他们实际上是要求讲了资产阶级纲领之后，别人不能批评，只准他讲话，不准别人讲话，这就是他们的民主。只准我讲，你不能讲。你讲了就是有压力，就是不民主。我讲了，你不能驳。他们所要求的民主，实际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要无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就叫有压力。我们开这么一千多人的大会，还不是民主吗？他说这个不叫民主，这个叫压力，你开这样的大会来压我，要操我的娘，这叫什么鬼民主啊？！他是这样想的。因此，所谓民主，所谓自由，是有阶级性的。同志们要看到这一点：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相反有了无产阶级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了。这是毛主席讲的。我们是讲民主的，是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毛主席讲过，毒草要放也可以自由放出来，你有自由放毒草，自由讲怪话，但是我们也有锄毒草的自由，反驳坏话的自由。要有两方面的自由，而这个他是不赞成的，所以他们感到有压力。毛主席讲，彭德怀反对人家的独裁，实际上他自己要独裁，与其你来个资产阶级的独裁，还不如我的独裁好，在这个地方是不能谦让的，不能轻视的。

高岗、彭德怀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都造这个谣言，说我有一个摊摊，很有私心，而且要篡党，并且在毛主席到重庆的时候，我就布置了。口里造谣说人家要篡党，实际是他自己要篡党，他自己搞这个事的，他有目的的。我有什么布置啊？我向你们那一个布置啦？一你们可以揭露，篡党布置有无证据？当毛主席有别的事情或有病的时候，中央决定要我代理他的职务，我自己也认为可以代理，而且我代理比别人代理也不见得怎样不好，在这种时候，我是不推辞的。如果我觉得别人代理比我代理好，那我就为别人搞“个人崇拜”了，那我就投别人的票了，因为别人代理比我好嘛！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要绝对遵守党的纪律，要有自知之明，要懂得自己，也要了解别人。所以我要遵守纪律，在这个时候，自己绝对不去追求，不去自封，急着去搞这个事。即使自己是正确的路线，中央领导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也不能搞，也不能不遵守纪律。

12） 在讨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的发言(1959年11月)

11月11日的发言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整个看来，还是一本好书。但有缺点。苏联的同志从自己的经验去看别的国家的经验。这一点，我们应该警惕。在将来，我们的同志也可能会从自己的经验去看别人的经验的。谁把自己的经验看成是普遍真理，而把别人的经验看成是特殊情况的经验，这样的看法都是有片面性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苏联，经验很丰富；第二个应是中国。苏联经验既有普遍真理，也有一部分是特殊性；我们的经验也是有普遍真理，又有特殊性的。苏联革命是在几十年前取得的，我们则较晚三十年才取得革命胜利，我们既有苏联的经验，又有自己的经验，应该说是比较完整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发展的，如果把经验看成已到了顶峰，那就不是发展的了。政治经济学也是发展的，不断丰富内容的。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再过几年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我们的同志不应背包袱。现在我们的经验是比较完整的，但再过几十年后，也许别人的经验更加完整。

在过渡时期要做几件事：夺取政权，工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包括三大改造、工业化)、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建成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规律各国是一样的，但有些国家的具体情况不同。譬如英、美等资本主义工业发达的国；家，在革命胜利以后，不必要再搞工业化，不一定再搞合作：化一一或者大部分过渡到国营农场，少部分搞合作化。过渡时期的工作，是扫清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扫除障碍(进行三大改造)。苏联扫清道路后即宣布社会主义建成，实际上大搞建设是在一九三七年以后。我们是边改边建，边扫清、边建设。在一九五八年以前，主要是扫清道路的工作，到一九五八年提出总路线以后，才大搞社会主义建设。

扫清道路的工作，作得怎么样？可以说，进行各种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造、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等问题，在我们已经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一一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也解决了。但是，解决了这个多种经济为单一经济以后，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还有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主义革命还未完全解决。就是说，在经济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经济体系，谁战胜谁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在政治上、思想上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政治上、思想上不解决谁战胜谁是危险的，波匈事件的发生，把军队和党都搞垮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没有提及也没有解决。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在反右斗争前，所有制问题解决了，经济体系建立起来了，但是资产阶级世界观问题还没有解决，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呢，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到整风、反右斗争才解决了，这一次保卫总路线的斗争，也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是采取整风、全民整风的方法来解决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斯大林曾提过这个问题：“解决人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但是他们没有搞群众运动去解决。我们则；不同，不但过去搞，现在还在搞两条道路的教育、大辩论，这是我们的经验，我们必须这样做。

关于过渡时期的几项事必须做好：

第一、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强调大工业，没有提几个并举，缺少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农业的腿更加短一些。这不但苏联如此，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有，我们自己也有。别人的经验可以作为我们的经验，但是我们没有碰到的还是免不了要犯错误的。过去几年，搞工业，优先发展重工业，这并不错。但是工业搞得多了一些，重工业比重上也多了一些，失了合理的比例（不多又为什么要下马？)因此，现在就要提：以农业为基础，发展重工业，同时发展轻工业的方针，免得比例失调。比例恰当或者是失调，是工业和农业的比重问题、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重问题、生产资料生产和生活资料生产的比重问题。看来发展农业是很重要的。美国只有六百二十万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其中三百万搞农业，三百万搞畜牧业)，粮食、肉类、棉花不但能满足国内需要而且能出口。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的速度是不可能很快的。列宁说：农业发展不平衡，农业落后于工业，是引起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

一。因此，我们要大力发展农业、轻工业，同时发展重工业(轻的、小的容易发展，收入大，所以并举是加速工业化，而不是拖迟)；既要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又要发展生活资料生产，这样我们的速度就能加快。

我们也曾犯过工业发展过多、设备过多的缺点，因此许多下了马。不犯错误是不懂得的。去年的缺点不出现也总有一天会出现的。人不碰钉子是不成的。

第二、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我们在解放后马上搞土地改革，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思想发动，搞了三年。到一九五二年以后，继续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建立人民公社。没有前三年发动群众搞通思想，作了各种工作，以后要搞合作化是不容易的。因为有了前者的准备，所以合作化能够加快。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主要是对富农进行斗争；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主要是对上中农，因为地主、富农早在土改时打垮了。我们对上中农的生产资料还是采取折价归社的办法，这样做的结果可以减少阻力(对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也是减少阻力)。

第三、在完成三大改造，解决所有制问题以后，还是要继续革命，我们是不断革命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者，各个时期提出革命的任务，坚持到底，这样可以避免停滞不前和超越阶段。

我们在完成三大改造以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还有技术改造问题。我们的办法是先完成所有制的改造，然后再进行技术改造。

第四、是和平过渡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有人说我们是采取“暴力”，我们回答这些资产阶级说：可以用和平过渡，但决定于你们(你们如果不反抗)，决定于反抗的强烈程度和反抗的方式。如果愿意接受和平解决，不采取武装反抗，可以用和平解决，否则就只有采取暴力。因此，从战略上来说，和平过渡是不对的；但从策略上来讲则是可以的。有没有可能和平过渡呢？有两个可能。有和平可能也有暴力可能，看问题怎样来我们就怎样做，这样就不片面了。如果只讲一面，是修正主义，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准备以和平来夺取政权，那是不对的。

关于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可能，过去也没有事实作先例。可能的话，是在美帝垮了，社会主义包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已经占压倒优势的时候。并且，在那个时候，还是有两种可能的。例如西藏是我们占绝对优势，要它和平过渡，但达赖就不愿干。台湾也是如此。还是两个可能。

第五、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问题。社会主义可以是全民所有制。但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不能等同不分。斯大林是把全民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等同不分的，说过“集体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以是全民所有制，不是到共产主义才能有。应该在社会主义阶段做好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准备，否则到那时过渡不了一一这些准备是：物产极丰富，生产力高度发展，道德水平大大提高，人们不计较报酬，积极生产，三个差别消灭，按需分配，否则过渡不了。城乡差别，主要是工业的布局问题。应该下放的下放，县社工业都要搞起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苏联只强调一面，提高工农文化，却对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体力劳动不强调，我们两方面都要提。工农差别，主要是机械化的问题。按需分配，是逐步实现的。有些能够满足。先从衣、食的需要开始，让人们先满足吃、穿的需要，然后有什么东西，可以满足什么东西(例如手表就不是一下子就能满足了的)。也可以是半供给、半发工资。总之，不是所有的东西在一个早上都做到，而是逐步的。

政权问题，到共产主义社会，政党当作领导阶级斗争的集团不必要了，但那时候还有先进与落后之别，因此政党也可以是作为先进分子纠合的集团。孙中山曾说过：“政治乃是治理众人之事”，那时，管理众人之事也是很必要的。

第六、苏联集体农庄的积累很少，而国家要集体农庄的要得多(占一半)，因为积累少，所以农业的发

展就慢。到最近才有体制下放。拖拉机站下放是一个革命的措施。苏联是“廉价收购”，而我们则是合理价格，而且收购不多。这样农业的积累快，发展就快。

第七、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物资的刺激是必要的，但不能靠物质刺激来解决问题，必须是政治加技术不谈政治，问题是不好解决的。正确的提法是：政治驾驭技术。应该使人人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而不是为两座别墅、一个美貌爱人而工作。因此应该强调树立共产主义道德。为了社会主义而做好工作，而做好工作，物质自然就跟着来了。而不是没有物质就不工作（按酬付劳）。做好工作，物质才从后面来。目的是“我为人人”，后面才是“人人为我”。物质和政治思想工作是两方面的，缺一不可。

总的说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归纳有如下缺点：（大意）

1.只谈经济，缺了政治；

2.多谈成绩，少谈缺点；

3.强调团结一致，少谈或不谈内部矛盾；

4. 把自己的经验作为普遍真理，而把别人的经验多认为是特殊性的。

11月13日的发言

美国是第一个生产发达的国家，一亿七千万人口，约七千万劳动力，用不到十分之一的劳动力，即六百二十万搞农业、畜牧业。人是那么多，从农业腾出劳动力就能多搞工业，多搞文教等别的事业了。我们粮食生产得多了，用粮食喂牛喂猪，人多吃肉。猪、牛实际上是一个“加工厂”，这对于人的健康有很大好处。可以设想：当我们的粮食多了，百分之八十是生产资料，百分之二十是消费资料的时候，日子就好了。

到共产主义实行按需分配，也有个“基本生活资料”问题，吃，可以放手吃三顿干饭，放手地吃肉、吃鱼，穿，棉布衣可以充分满足，绸缎恐怕还不能充分满足。新产品总会有的，是一个相当时期内满足不了需要的，当某一新产品普遍大量生产了，又有新的新产品出现。

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一个。但是，社会主义也有它的特殊性。在社会主义，最充分满足还一时做不到。有些消费品，还要限制，要拿出一部分进行积累，积累与消费有了矛盾，最充分满足消费，就不能最充分满足积累。积累是为了什么？还是为了满足需要。当前需要与长远需要一方面是统一的，另一方面也是矛盾的。为了满足长远需要，现在就少消费一点。毛主席说过：人民生活不可不提高，一定要提高，也不可提得太高(大意)。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现在还做不到最充分“最大限度”地满足需要。

要研究经济中的最主要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生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所有制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中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的矛盾要研究。不要认为全民所有制内部没有问题了，也有矛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之间有没有问题。有的。苏联工业与建筑业下放是“革命措施”。为什么要采取革命措施？就是因为矛盾发展。中央的与省的，省与县、县与公社的都有矛盾，譬如海南国营农场和人民公社也有矛盾。经济学要研究这一个问题。

举几个例子。石景山钢铁厂，投资×万元，五年的时间，扩建为年产×万吨钢，×万吨铁的企业，实行了投资包干，于是钢铁生产规模扩大一倍，建厂的时间缩短一半。投资还是那么多，还是那个全民所

有制，生产力猛增许多，生产力从那里来？无非是投资归谁掌握的问题，交归冶金工业部所掌握，所使用，还是归石景山钢铁厂所掌握，所使用。生产力不是天上掉下来，本来就有，过去没有得以发挥。再如办水利工程，办纱厂。可不可以设想：纺织工业部要在寿一个县办纱厂，对县里同志说，我给你机器，你们自己去办，人和厂房统统由你们解决。那些县里同志们会积极愿意办，而且会搞得快些，好些。这是什么原因？这里面大有文章可作。石景山钢铁厂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我看使用权就是所有权，这里，厂长、党委书记就代表国家，他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全民所有制是否就不需要发展了，不需要不断调整了呢？要不断调整，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调整。冶金工业部是全民所有制，下放给石景山钢铁厂也是全民所有制，生产力的提高却大不相同。都是全民所有制，谁来管理，用什么办法去管理，结果就大不相同。

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也有问题，也有矛盾。二是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

在机关、企业中有一个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体力劳动名与工程师、知识分子之间，辅助工人和熟练工人之间，他们工资不一样，文化程度也不一样。我们提出领导者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两参一改三结合”这一问题关系大得很，贯串整个社会主义。这些问题，应作为重点问题之一来谈。正确处理劳动者相互间的关系是个大问题。集中的问题，又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厂长可以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劳动者，也可以用国民党的态度来对待劳动者。怎样使大家干劲十足，心情愉快呢？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和工人一起干(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劳动者就干劲十足，心情愉快。

三是关于分配问题。

首先是积累与消费的分配的关系：1．要补充生产过程中已消耗的物质，2．要积累，为社会的需要，个人的需要，扩大再生产的需要，3．分配给个人消费的部分。要考虑怎样安排上述三项的比例。分配给个人消费的这一部分应如何分配呢？是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重要的问题是讲劳动者相互关系中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领导的各个环节的关系，苏联工业、建筑业的下放，全民所有制未改变，但环节变了。政治领导是个相互关系问题。“政治挂帅”着重的是改变相互关系，而不是改变所有制。庐山会议前，钢的日产量是×万吨，十月份日产则达到×万多吨。生产力从那里来？原来是先前的生产关系(主要是指劳动者相互间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搞试验田，干部和群众一道干，劳动者情绪高了，生产力也就出来了。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教科书中没有讲，这是一个缺陷。

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也是按比例发展，但它是通过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资本家不能认识这个规律，比如生产一吨钢，与之相适应的就要有多少铁、多少煤、多少电力等。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是知道按比例发展规律的，但因为所有制问题没有解决，不能依据客观经济规律来发展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人们才有可能自觉地掌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发展经济。总之，不管你是什么所有制，经济运动总是按比例发展。资本主义是经过比例破坏，经济危机(而从不平衡到平衡)而后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可以通过人们的计划，实现按比例发展。其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创造了一个条件：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如果计划不周，也还有破坏比例的事情，但可以随时调整。“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有计划”发展是在社会主义才出现的。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通过“有计划”来实现。有计划不是客观的，是经过人们的主观努力来实现的。如计划搞得不好，国民经济也可能出现大的失调。

物质利益放在第二，政治放在第一。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也是一个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有这样几条原则：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一个民族的利益要服从世界的利益。当然，这还要看群众的觉悟程度。

社会主义的生产不断扩大，问题在于扩大的速度如何？速度快，长远利益就不怎么长，几年就可以看到了。我国农民说得好："几年辛苦，万年幸福"。如果群众觉悟提高，群众会说：宁愿少吃一点，多积累、多生产一些。那么速度就快了。积累多少？只要群众谅解，可以多积累。干劲从何而来？教科书中认为是物质刺激。干劲不仅可以从物质刺激来，也可以从政治觉悟来。这要靠先进部队的作用。一是教育群众，一是先进分子带头干。

提高劳动生产率是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去提高劳动生产率？教科书讲了四条：（1）采用先进技术；（2）物资的最合理利用和节约，(3)改进劳动组织和生产管理；（4）提高劳动者技术文化水平、熟练程度。在四条上面还应该再加上一条，提高工人的政治觉悟。这四条都需要政治挂帅。工人觉悟提高了，干劲大，节约物资就多了，技术熟练程度就快了。鼓足干劲，人的干劲是有个限度的。一个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最多十小时，算全国劳力有三亿，也不过二十四亿小时到三十亿小时，再多了，就不能。单纯增加劳动强度，这是有限度的。但提高技术是无限度的。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是无限度的。

鼓足干劲与提高技术密切联系，鼓足干劲之后，技术革新是重要的问题了。

关于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问题，这一讲法是不对的。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的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如刮"共产风"的例子就是，会破坏生产力的)。今天我国的生产关系是跑到生产力的前头了呢？还是相适应的呢？是相应的，不能说生产关系跑到前头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合现在的生产力，它大大促进生产的发展，但物质基础还有些不够。不是有了机器就没有矛盾了。相反，有了机器后，矛盾就产生了。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保留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痕迹，如商品、货币、按劳分配、国家、银行，等等。社会主义要把这些痕迹都逐步搞掉。不要把一些范畴(如八级工资制)长期巩固起来。而是现在不能不搞，有条件可以不搞时，就不搞了。商品，货币等的旧形式保留，但内容变了。新内容总是在旧形式中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把旧形式冲破。现在商品货币的发展，还未完全冲破旧形式和扬弃它的外壳。社会主义保留着许多资本主义的旧形式，但还没有到扬弃旧形式的程度。我们是为了利用它，不是长期巩固它，而是到一定程度抛弃它。任何质的规定性，总是要进行两方面的斗争，既区别于过去，又区别于将来，既反对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它，又反对从右的方面来否定它。社会主义是诞生于资本主义，它区别于资本主义，它向着共产主义发展，它也区别于共产主义。

11月16日的发言

提出两个问题：(1)什么是社会主义生产力性质？为什么要加"性质"两个字？是不是因为单讲"生产力"，苏联不如美国？社会主义生产力迅速提高，从那里来？那是性质所决定的。（2）教科书仅仅提到"生产方式"，没有提到生活方式。人的思想意识决定生活方式，到延安去的女学生穿旗袍就穿不出去，那是生活方式不一样。"生活方式"这一个名词是可以引用的，美国为他的生活方式大吹大擂，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鼓吹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讲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性质，有些是和共产主义相同，某些又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同时）这是一切过渡时期的特点，有新事物的特征，也有旧社会的痕迹。（讲到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存在矛盾的，教科书中没有指出生产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时）企业由谁来管？这里面是复杂的。下放包干后可以多搞一些。应该把那一个环节都调动起来。（讲到矛盾的转化时）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不会是没有冲突的，那有处理得那么好？当然不一定是武装冲突，处理不当是可以转化的。矛盾的根本性质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可以转变为对抗性；对抗性矛盾处理得当，也可以转化为非对抗性。例如我们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讲到关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时）比例是客观的，人认识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讲到关于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时）这里面是有生产潜力，人还是那么多，生产资料也没有增加，但是有了政治挂帅，就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就能大大提高。

（在×××谈到消灭差别问题时）消灭城乡差别主要是农村搞工业，这是工业布局和配置问题。教科书中说，本质差别不消灭，非本质差别是消灭不了。这个结论下得太早。共产主义那么长久，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非本质差别是可以消灭的。当然，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非本质的差别一万年也不能完全消灭，只是大体消灭，将来专家大概没有的，但那个人对某一门特别好点，让他多做一点，这种情况还会存在的。那是社会分工问题，总不能叫人人都能唱好戏。非本质的差别是可以消灭的，现在就可以讲。

(在×××讲到教科书中把人的社会地位由劳动和个人能力来确定时)能力高，地位高，能力低，地位低，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人是平等的嘛！(讲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主要矛盾时)共产主义对抗性矛盾消灭，但矛盾将仍然存在的；在社会主义内部对抗性矛盾则仍未完全消灭。

在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党的总方向可能不会发生错误，但个别错误不可避免。具体怎样走法，不可能不犯错误。譬如王明要打日本、打国民党的方向并没有错，但怎样打法？路线就错了。毛主席讲过，处理问题可以用这种方法，也可以用那种方法，但结果不同。用这种方法代价太大，成绩很少，时间很长；另一种方法成绩很大，代价很少，鼓鼓劲就可以赶上去。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可能要犯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错误。譬如南斯拉夫的错误。现在是存在着三条路线和三种方法：一是仍有可能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二是慢慢地走到共产主义；三是快些、好些走到共产主义。“按劳分配”万岁，是难以走到共产主义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不要看成为独立的社会经济形态。它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既区别于资本主义，也区别于共产主义，但其最基本的性质是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范畴，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半成品。其情况是复杂的。因为刚从资本主义社会来，有许多斑痕脱不了，消灭几个差别也不是很快做到的。人们常常搞不清楚：现象上许多是资本主义的，但本质是却是共产主义的。多种经济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单一经济，但许多资本主义的东西，如按劳分配、银行、信贷等形式仍要采用。政治经济学比较难写，是因为现在许多东西还没有定型和成熟。马克思写《资本论》是在资本主义成熟时期写的。

教科书426页，第一段讲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方式。但是，生产资料是谁的，这里面有生产关系问题，解释得不完整，没有回答属于谁的问题。“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意味着高度技术为基础的大机器生产在工业、农业和整个经济中占统治地位”，这一点我们没有做到。但我们的生产方式也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我们在工业中，大机器生产是占统治地位，而在农业则没有。苏联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才搞社会主义改造，搞集体化的，但是在工业化之前搞社会主义改造是否可以？生产关系是否可以走到前面？教科书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发展生产力，搞机械化、自动化、化学化、电气化等，我们也是要搞的，不搞不成，但是否没有高度技术为基础就不能称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里是有些呆板的。(陶铸插话：好象是有技术决定生产方式，而不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方式的味道。)不完全决定于技术的高低，而决定于是什么阶级掌握了领导。工人阶级掌握政权，有广大农民拥护，生产力就能很快发展。

教科书433页第三段。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旧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障碍生产力的发展。教科书中的这一段，使人觉得似乎是自发的，自流的。遇到这种情况，要主动改才不致发生革命，人们要把生产关系调整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什么？是矛盾的统一。生产力的发展势必要经过斗争的，社会的保守势力是主要的斗争对象，斗争是尖锐的，反复的。

教科书435页第二段讲两种公有制形式的存在是客观必然性。在社会主义阶段是否一定要存在两种所有制？不一定。两种所有制存在是一定历史时期的特征，但并不是一定要两种所有制非同时存在不可。集体所有制万岁，这是机械的看法。

教科书437页，讲两种所有制的共同点和差别。共同点有四个是讲得对的，但讲到存在的差别时，只提差别，不提矛盾。其实既有差别，必有矛盾。苏联对集体农庄的产品实质上是调拨，收购价格很低，和零售价相差好几倍，侵犯集体农庄的所有制，不让集体农庄搞积累，又不让农庄有拖拉机，实际上把农庄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都搞到国家的手里来了。这里是有矛盾的，书上没有讲。我们的政策不同。我们坚持等价交换，农业税很少，国家规定价格。

教科书439页，讲两种所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动不得的，把差别长期保存下来，这是不妥当的。两种所有制的差别是暂时现象，是能够改变的。国家所有制这一社会主义所有制既是高级形式，那末，集体所有制该是低级形式，低级形式是否可以向高级形式看齐呢？既说是神圣不可侵犯，那就发生矛盾了。439页第五段“大力巩固”集体所有制的提法也是有问题的。

教科书441页第二、三段，讲资本主义残余，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说法是片面的。搞得不好，是可以转化为对抗性的。

教科书441页第六段：“生产资料公有制则把人们联合起来……”；这只能是一种可能性。并不是保证，还要作许多工作，不是矛盾斗争没有了。公有制还不能保证同志式的合作和真正一致。工人、农民的友好联盟，当中问题还很多，有矛盾。第七段、第八段也是不讲矛盾，讲相互关系好得很，没有矛盾，似乎觉悟高得很，知识分子觉悟也高得很。恰恰相反，这里面是很复杂的，中央管的与地方管的集体所有的与全民所有制的，都有很多文章。相互关系多得很，在农村、工厂、干部不参加劳动，不上车间，就有问题，大集体与小集体，个人与集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关系也是个大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要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不去主动解决，是会发生冲突的。这一段里面写得不够。列宁也曾谈过这个问题，特别是严厉地批判了官僚主义。我们现在是采取“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等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教科书444页第二段，讲矛盾不会弄到冲突的地步，大体上是对的，但闪闪躲躲，不够明朗，虽不至冲突到发展成国内战争，但发生失调却是可能的。至于讲到充分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这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而且充分认识也是一种可能性，有可能充分认识，也可能不充分认识，不能讲得太肯定。接着下面讲：“没有力图保存腐朽的经济关系的阶级”，“阶级”是没有了。但残余有没有呢？象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有没有？它是会出来的。进步与落后也是存在的。

444页第三、四段(小字)讲采取了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的领导，改组机器拖拉机站，是一项重要的革命措施，但为什么不早采取？这里面，也没有谈经过了怎样的斗争过程，实际上是经过很多斗争的，不是很自然地得以实现的。经常注意调整生产关系，经过斗争一一虽不是阶级斗争形式，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教科书445页第三段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保留着商品生产，即所谓旧形式、新内容问题，这些旧形式已有不同的新内容，它是作为无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工具。这些旧形式不是一下子便消灭的，什么时候消灭？要看条件。武汉、郑州会议时，有些同志认为商品将要很快地消灭，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即使到共产主义，还不能一切都按需分配，可能是大部分按需分配，一部分按劳分配(如高级消费品)，即采取供给和工资相结合的制度。既有按劳分配，就必须保留商品的形式。

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和利用这些规律是有程度上的不同，一般来讲，能基本上认识和掌握，就不致犯大的错误，但小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还是会犯的。因为在过渡时期有旧社会的斑痕和残余，加上主观认识和客观不完全一致，小错误是完全可能会犯的。这方面教科书没有讲。

旧社会的许多残余不会很快退出历史舞台的，如货币、政党、国家、军队、价值规律等等。但是，国家、政党等，在社会主义制度发生了变化。为了要消灭国家，我们应该强化国家；为了要消灭政党，而

巩固政党；为了要消灭货币，而利用货币；为了要消灭商品，而运用商品。这里应该加上这么一段。

教科书448页，谈国家的职能。作为阶级斗争的国家职能是逐渐减弱、衰退；作为领导经济建设的职能则会逐渐扩大。在第一段讲，“国家必须存在，以保护和巩固公有财产，……维护社会主义劳动纪律”，讲得不清楚，把维护社会主义劳动纪律也作为国家的职能，混淆矛盾。

教科书450页，讲经济管理应贯彻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同时又强调一长制，是否有矛盾？这是不彻底的民主集中制。党委、党组织的作用和一长制如何结合，教科书中没有讲。

教科书452页最后一段也讲了矛盾，讲了一点点，但没有发挥。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具有非对抗性质，是否所有的都是非对抗性的？列宁讲，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对抗消灭了，而矛盾仍然存在。是讲共产主义制度下，难道在社会主义就没有“对抗”的吗？

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是丰富的，教科书是好的，不好的地方我们指出来。要求写出一本生动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需要作很多努力的。编写政治经济学讲义或教材，应从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从实际出发，从具体生活中的事例出发，生动活泼，避免枯燥、教条。

11月17日的发言

资本主义是被“必然王国”所支配，为必然性所控制，它自己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劳动力、生产资料给价值规律自发地分配。当某种商品需要，利润大，大家都去投资，劳动力也投进去，因为大家都去，结果过剩，资本和劳动力又得转移到别的商品生产中去。所以，其劳动力生产资料的分配是没有人去搞，而是靠价值规律去决定。资本家也想搞计划经济，叫计划的资本主义，但是他们不可能有真正的计划。我们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当然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比例也有摆不准的时候，但我们不是盲目的，而是有计划的，比例不恰当，很快就会得到调整。(陶铸插话。一搞多了，马上可以看出来，停下来，下马，最多是不太舒服罢了，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它不是有计划地去调整，而是自发地调整，直到最后发生经济危机。)

这其中是有许多矛盾的。工业要高速度发展，人民消费就要减少，这是一个矛盾。要提高速度，就必须多积累，这又影响消费，引起各方面的紧张。(陶铸插话；工业搞得过多，工人增长很快，消费资料生产相对减少，会全面紧张起来。)

毛主席说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但斯大林说“一定要适合”(现在教科书没有提“一定要适合”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是经过斗争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适合一下，又不适合，然后又适合，又不适合，其中经过不断的斗争。主要是旧社会的残余，规章制度等上层建筑，妨碍基础的发展。要改，需要有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宣传，事实的教训，觉悟的提高，多数人的行动，而且每次改，都要经过斗争的。

现在我们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是不是可能？这是矛盾的统一。苦战三年，不增加工资，多积累。这是基本的问题。积累多可以多搞基建。当然多积累，要靠群众思想觉悟，不能损害群众的积极性。现在是过关问题，多积累一点，实行工、农业，轻、重工业同时并举，把建设基础打好。譬如海南，三年基本完成种植热带作物的任务，待三五年后有收成时，就过得好了。可以和群众讲清楚，群众劲头就来了。农业发展需要有重工业，没有重工业，农业是发展不了的。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就是工业和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发展的比例关系。看来苦战三年过不了关，要苦战五年到七年才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提“最充分满足”人民需要，恐有困难，我们只能是有限度的满足。今天限制一点，明天就可以多满足一点。

农业高速度增产，轻工业、重工业的发展就可以多搞，这就可以高速度，又有比例。比例可以是逐年递增的，但必须搞得好，否则也会递减的。苏联是递减的，我看搞得好是会递增的。速度递增递减问题。一个是积累，一个是技术进步，一个是社会关系不断调整，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发展，发现问题立即改，这样就会不断递增。至于自然资源条件一定要的，同时，还有国际条件。国际上有战争威胁，要建设国防，要发展原子能，不得不拿许多资金，去搞国防工业，这也是有关系的。还有，要把社会的劳动力好好的组织，充分利用起来，也是一个因素。总之，递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陶铸插话：总的讲来，递增是可能的，但这里面是有个作法问题。薛暮桥说：苏联农业搞好，发展会更快些。陶铸接着说：苏联过分强调搞重工业，就有些片面了，但原则上是正确的。)

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对的，在某一个时期内可以优先，这一条不能动摇，但必须注意按比例，应该用两条腿走路，除优先发展重工业外，还必须注意其他工业的发展，不然会发生比例失调。

化肥不很多，机器不很多，是否可以高速发展？我看潜力还很大。六亿人民的组织，社会劳动力的充分利用，潜力就很大。我们讲节约，不是说只省吃省穿，这是消极的讲法。节约首先是节约物化劳动‘原材料’和劳动力，例如妇女劳动力等。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是可以充分利用劳动力。许多经济学者不注意这一件。我国二亿五千万个劳动力，搞不好，浪费几千万个劳动力是很容易的。搞一些初步的技术改革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很大的作用。如水利工地搞车子化，广东提一个劳动力搞四土方，这里面有很大潜力可挖。我们讲节约，应从广义来讲，不是少吃少穿，节约以后，而是可以多吃多穿。做到建设速度快，积累增多，生活又改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本事就在这里。这里有一个发展农业的问题，以发展农业为基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五、七年机械化，发展更快，生活更好，干劲更足。(陶铸插话：加上有好的良种，又搞技术改革，粮食增产可以很快的。去年南宁会议时广东亩产五百一十斤，今年接近八百斤，看来一千斤是不难搞到的。农业一发展，工业便会搞起来。)

苏联递减是有其原因的。农业的腿短，生产关系没有及时调整好，上层建筑对发展生产是不相适应的。我们不应以个人物质利益来教育群众，应教育群众对前途多关心一些。我们对群众进行教育、提高；“几年辛苦，万年幸福”、“苦战三年，改变贫困面貌”等等，而不是以个人物质来教育群众。列宁讲过：共产主义劳动是不计报酬的自觉劳动。我们教育群众应该用共产主义的精神，使群众看得远一点，当然在实(际)工作上，仍然应按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

既然社会主义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短暂的阶段，只有几十年，而共产主义可能几万年，几十万年。在过渡时期里，旧社会的痕迹没有去掉，还运用许多旧社会的形式，如商品、价值、货币、银行等，但这性质已经变了。斯大林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不承认有剩余价值，称资本为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生产资金)。劳动力不足商品，但是不是可以采取商品形式？讲有剩余产品，而不敢讲有剩余价值，不讲有盈利。我们采取了许多旧名词，但是内容变了。譬如我们习惯讲得痛“心”，而不讲痛“脑”，用衷“心”，而不讲衷“脑”，旧名词是改不掉的，这有什么妨碍呢？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旧社会的痕迹，但我们的理想是在前面。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实质上不是商品，固定资产也不是剥削，剩余价值也不是个人占有，为什么不敢讲？教科书在解释旧名词时，忸忸怩怩，故意回避。

二十五至二十七章的三个规律是重要的，不但在社会主义用得着，共产主义社会也用得着。

455页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加了一句：“使他们得到全面的发展”，是加得好的，斯大林没有讲这一句。“先进技术基础上”是用“先进”两字，不用“高度”，是比较来讲的，双铧犁也是比较先进的。455页最后一段讲的是生产的目的，为达到这目的，就必须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扩大。

456页最后一段，讲社会主义可以不断地扩大生产，但还没有解决高速度问题。既要高速度，又要不

断，怎样的速度又是不断？还要靠实践来证明。不断是解决了，高速度还没有解决。

461第三段讲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能够毫无阻碍地推广科学最新成就，技术发明和先进经验。这是一种可能性。我们国家采取现场会议，抓得快，先进帮助落后，没有“秘密”。但是如果单讲物质刺激，就会影响技术的发展。在苏联，窍门是不给别人知道的。往往是封锁先进技术，否则不能获得物质奖励。强调物质刺激，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不可没有物质，但过分强调则不成。是靠物质刺激第一，还是思想政治教育第一呢？外国是有争论的。我们说：政治驾驭技术、物质，政治是统帅。机械唯物论是没有灵魂的唯物论，单纯强调吃饭穿衣，不是政治挂帅，而是钞票挂帅，过分强调物质刺激可能出现“按酬付劳”，实际会引起许多付作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教科书第二十六章是很重要的一章，一般讲得好，提出许多问题，但缺乏分析。我们讲比例要从具体问题讲起，一步一步深入。如从粮、油、棉……等生产讲起，两大部类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等等比例来讲，不要从抽象定义出发讲起。469页讲生产配置，也讲了四条。应该明确的讲农村要搞工业，把工农业结合起来。运输业很重要，在计划工作中要正视这个问题，节省运输很重要，譬如石碌运矿石出去是空船来，东北运木材，山西运煤都是空车回。这是一个生产配置问题。分配劳动力很重要，把工区生产配置在有劳动力的地方，有重轻工业配置，否则工人连爱人也找不到。475页，强调按劳分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物质刺激越多越好，处处表现出把这条原理过分强调了。480页，平衡表要算得好，算不好也是个问题。年年算，算不准，也有个经验，总比不算好。总之，这一章很重要为作计划，提出许多问题。许多规律要讲得通俗，使人容易掌握这些规律。

11月18日的发言

只要有按劳分配存在，那怕是两种所有制消灭了，商品仍会存在，不过商品的性质变了。劳动力当然不是商品了，但仍要采取商品的形式。既是商品，就需要一种计算方式。货币是等价物，就是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所以我以为只要不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就不能取消。

到共产主义社会，当然不会有交换了。不过社会的计算形式总是有的，社会上各项产品需要生产多少，每个人需要多少，需要计算。到那时候，大概是有一部分先实行供给制，况且供给部分越来越扩大。但是也可能保留一小部分以货币形式付给，购买某些高级的特殊商品。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最根本的一点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为使用价值而生产，资本主义社会是为交换价值而生产。还有，社会主义的商品价格不受价值的支配，其价格由国家规定，也即是商品价格由国家干涉起作用，而不是价值规律起作用。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性质，到社会主义社会就完全变了。这个问题很值得全面研究。

提高劳动生产率应同节约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联系起来。我们过去讲节约，多是强调节衣缩食，这是消极的；从积极方面来讲，应是节约劳动力、节约原材料、节约劳动时间。这样的节约，意义更大。今后应当多从这方面来宣传。

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问题是如何去掉这种残余。是靠物质刺激呢，还是靠思想教育？人民公社实行伙食供给制，懒人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先给他，然后教育他，这样更有效。物质刺激是资产阶级的办法？资本家很强调这个，并且不惜培养工人贵族。物质刺激的办法我们不提倡。

13） 给黄炎培的复信（1959年11月28日）

任之老同志：

您十一月二日的来信和寄来的文章都读过了。因我最近在海南岛旅行和休息，交通不十分方便，接获来件较晚，所以迟至今日才能给您回信，很对不起。

您的文章，我建议在报上发表，已转交吴冶西同志酌办。您如有意见，请电话通知吴洽西同志商酌。（此信写好后，经查您的文章已于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上发表，此议取消。）

您的来信说，中国工商界和知识界中的许多人，从解放以来，是逐步认识和接近共产党与社会主义的，他们经过了几个认识阶段，最后达到信服、悦服的阶段。这是真理。事实的经过就是这样。但是他们的认识还会进一步提高，也需要进一步提高，以至能够在遇到风浪时，深信不疑地坚定起来。这一点我认为是重要的。因为他们至今还是我国社会上比较更容易动摇的一部分人。

随着我国面貌在今后进一步改变，他们的认识也会进一步提高。新中国在过去的十年，主要是进行了革命的社会改造，即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它的目的，是为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扫清道路。在过去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虽然也同时进行建设，但人们的注意力，特别是领导机关的精力，主要是放在社会改造的问题上，而不是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建设的问题上。另一方面，也由于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还没有积累足够必要的经验。因此，过去十年的建设虽幽灵很大的成就，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没有充分显示出来。至于说到今后十年，情形就会不同了。现在我们已积累了一些必要的经验，为建设扫清道路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在今后的建设道路上，虽然还要清除一些旧的和新的障碍，但是我们已经造成一种条件，使我们和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以主要的精力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就会加快建设的速度，使今后十年的建设成就大大超过以往十年，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比较充分地在人们面前显示出来，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将逐步地在基本上改变过来。现在还多少保存旧观念的工商界和知识界的人士，将要为今后不断出现的新事物所改变，他们的认识会继续提高，他们的旧观念会进一步为新观念所代替，只要他们是采取老实的承认事实的态度，就会如此。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如果他们主观上能够加以努力，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那他们的旧思想就可能更早地改变，就可能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以至在大风浪中坚定地站住自己的脚跟。我们希望大多数工商界人士在新中国的第二个十年中能够做到这一点。

目前国内国际的形势都很好。只要世界上不发生突然事变，中国在第二个十年的建设大跃进，是无疑问的。到那时，中国的一切，以至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都将会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大大小小的困难总是有的，国际上的大风浪也有发生的可能。重要的就是要能够在大大小小的困难和风浪中，坚定不移、信心百倍地奋勇前进。而这就需要在主观上努力学习和修养。

我见如此。您意以为如何？

顺致敬礼！

刘少奇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14）与王光英一家谈话纪要（1960年1月31日）

后一辈应当比我们更进步些。历史发展应该是这样，总是越来越进步，不能越来越落后。

总路线是什么？说全句是：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全中国人民鼓足，不是乱鼓，要在党的领导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这段历史时期的总方针和战略口号。老年、青年都需要鼓足干劲，青年人应当鼓得更足一些。你们（指在座的学生）在学习时期，也要力争上游，你们现在还在消费，但是为将来的生产力做准备，劳动者要受训练，要受各方面的训练，否则劳动不好。学习时期，即是准备时期，要准备好。

你们中间上游是谁呢？总会有先进、中间、落后，应该向先进看齐。先进、中间、落后，是永远会有的。

你们中间有三个念大学的，还有念中学的，有个又红又专的问题。红就是世界观的改造问题，很多人犯错误就是与世界观有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世界观。有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世界观问题将来还固有。阶级消灭后还有世界观的问题，还是有正确的，不正确的，还有唯心论，唯物论。现在解决世界观是很要紧的。在阶级社会中，人们搞起事情来，总是要按自己的世界观和精神面貌来改造世界，总有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在目前中国的改造事业迅速进行的时期，如果世界观不对头，就会感到很难受，如果世界观的问题搞通了，对头了，积极性就大得很，干劲就来了。

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乡下人也看不起城里人，城里人有城里人的世界观。你们看过《阿Q正传》，阿Q是乡下人，贫农，他进了城，看不惯，批评意见很多，城里人对板凳畔板凳，乡下人吗条凳，乡下人做鱼把蒜切碎放进去，而城里做鱼却放整段的蒜，阿Q就想要按他的意见办。这是一些小事情，也有不同看法。年龄比较大些的人，习惯形成了，对社会的观察即有很多看法，不管自觉不自觉，有他的世界观。这与哲学体系的世界观不同，那是更有体系的。

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如何着手？不能性急，要多看，多谈，多锻炼，自然就会有的。头一个问题，世界上物质是第一位，精神是第二位，是矛盾的两个方面。物质是基本的，是主要的。辩证观点，是矛盾斗争的统一。不要怕矛盾，这个矛盾解决了，那个矛盾又会发生，不要逃避矛盾，要面对矛盾，揭露矛盾，才能处理矛盾。这就是辩证观点。事物是变化的，不是静止的。事物都有它发生、发展、消灭的过程。为什么有发生、发展、消灭过程？即因为有矛盾。年青人是不容易理解的。

碰到问题，学习、工作、接触，会发生很多问题，如何看法？如何处理更好？有一个方针：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人生观也是社会观。人类有社会发展史，你们都学过了。人生观就是怎样做人，活着干什么，怎样做最好的人，要多贡献，作用更大。对几十亿人做多少贡献，青年都有这个理想。一点也不贡献？人生下来，长这么大，不管是谁养的，总是靠社会养大的，是工农养大的，农民种出棉花，工人织布，一切东西最后总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从生产那里来的。

一个人在世界上要消费。不只消费，还要生产。消费一百，生产八十就欠账了。一个劳动力要养活三到四个人，大体上不少于此。劳动时间在一生中只有一段，大体从二十岁以后到六十以前。总算起来，生产三百，才能抵上消费一百，那还只是简单抵上，社会还不会进步。要生产四百、五百、六百，才能有剩余，才能修长江大桥、人民大会堂，才能搞建设。一个人的生产如能养活十至二十人那就好了，如只能养活三至四人，就不能建设。问题是社会总生产，总消费一加一减很简单，有多少积累，搞多少建设。

对整个人类及个人也是这样。

人活一辈子总要对社会有所贡献，要贡献多一些才好。可能贡献很多，也可能贡献很少，也可能没有，也可能破坏，有几种选择，你们选那一种？

如果消费多贡献少，社会生产总不满足社会需要，那就使社会退步，对社会发展即起阻碍作用。这就有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集体利益问题、部分利益问题，暂时利益与长远利益问题。

马克思说过：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部分利益服从全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民族利益服从全世界的利益，即国际利益。这是永远正确的，这是对处理人民内部问题讲的，对处理自己问题与大家的问题讲的。

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是不矛盾的，但也不是没有一点矛盾。阶级消灭后，有时也会发生矛盾。照顾自己就照顾不了大家，照顾了大家，个人利益就要牺牲一点，这样才可使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统一。要有远大理想与目标，就要看清长远利益。长远利益是不容易看清的。看清楚，看正确了，有矛盾时就要使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这就叫有远见，有理想。

不能没有个人利益。个人利益集合起来即是整体。个人利益、暂时利益是要照顾的，但在有矛盾时，就要把暂时的、个人的利益牺牲一些。有时民族利益也要服从世界利益，有时就要吃点亏，只要对世界有好处，那好处更多嘛！

这就是教矛盾的统一，而不是矛盾的破裂。人民内部讲团结，即是统一起来。也可能闹事，因矛盾有统一性和斗争性。有时故意闹乱它，如英美之间的矛盾，我们就叫它冲突起来好；对敌人就要采取斗争方针，划清敌我界限，把矛盾扩大，而不是缩小，使之离得远远的。对地主、对资本家是团结好呢？是分开好呢？对右派要斗的，他们彼此间都不敢讲话，他们就不能团结起来了。对人民内部，工农学生等等是团结起来好。

个人、集体，部分、整体，暂时、长远，是能统一起来的。总不能坚持个人的，总要有一个服从一个，那一个服从这一个。在某种时候，个人要吃点亏。办大家的事情，是占人点便宜好？还是吃点亏好？我看要宁愿吃点亏。人家不干的，你干，这不是吃了亏吗？要宁愿吃这个亏，这叫吃小亏，占大便宜。一心一意工作，可能人家一时不了解，也许会说是沽名钓誉，一天看不清楚，一年看不清楚，但是十年二十年会看清楚。占小便宜，人们会看清楚的，那是遮盖不了的，也许可能遮盖一时，长时期遮盖是不可能的。与人接触时，情愿吃点亏，遇到困难，人家不愿做的事我做，任劳任怨，最后大家说你是好人，大家愿意与你交朋友，将来还有大发展。人都会有一天不能做工作了，人也有发生、发展、消灭的时候。国家总是要青年人管的，后一辈总要接手，是人民叫你们管，建立起信任来，就可能有更多工作要你去做。

吃点小亏，占大便宜，是向相反方向发展的规律。整天想到个人，最后是没有个人利益，个人利益还要丧失一部分。为人民做事，大家就会照顾。规律性即是这样。现在是人民做主的国家，有公道，真理能得到发扬。在我们社会里只要有贡献，大家都会看到。整天考虑个人即不会有个人，不考虑个人，则最后有个人利益。占小便宜，吃大亏，吃点小亏，占大便宜，这是合乎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

有人说，个人问题解决不了，怎能为全国人民想办法，首先要解决个人问题，才有余力解决国家问题。按此说法，如果个人问题一辈子解决不了，那就没有机会解决社会问题了，把个人利益，家庭利益放在第一位，是把次序放倒了。

我们加入党，是看到个人的问题横竖解决不了，先解决国家利益。国家社会问题解决了，个人问题也

解决了，随着大家利益的提高，个人利益也会提高。只要有贡献，社会一定有适当的报酬。不会大家都好了，你饿饭，那是阶级社会的事。人民做主人的社会里不会有这样的事。着手即从这个地方着手，这个问题看来很简单，有些人一辈子也解决不了。年青人要下个决心，从身边的问题着手，个人问题可以抛开。

比先进，首先从这个问题比。第一比红，第二比专。红只能摆在第一位，如不红也可以变右派。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但不能一手，要有两手，即还要专。只专不红，那只有一手。不红，既使搞得好，这或可以工作，但不能领导。领导即是处理各种相互间的关系，不按一定方针原则处理不行，也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可以贡献很多，马克思就有伟大的贡献，但马克思在世时没有稿费，我们是继承他的，不是你们的功劳，可是你们收稿费。

听说你们要求入党，到我们这里来了解情况，这种愿望是好的，要怎么入？是秘密入？公开入？

搞政治工作在阶级社会里是有冒险性的。象东周列国志那样就是这个杀那个，那个杀这个，溥仪写了三卷书，揭露这些，他的态度是有所改造，杜聿明就不写，不揭露内幕。

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方向的转化，要具备一些条件。这是一般的法则。如战犯关了那么久，长期劳动教育，在一定条件下，还有主观条件，可以向好的方向转化，相反，好人也有向坏的方向转化的可能。

(对王光英说)工商界有几个参加共产党好不好？有点榜样。搞几个。可是那就对国外没有影响了，我看帽子还可以戴一个时期，有利于工作。你资本家也当了，也没有整你，又入了党，则更好了。

(对光琦说)二哥挨了一次斗，现在少犯错误了，这是因祸得福，也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对光英说)未整当然好了，未整的也不一定就好。如何吸收过去经验教训，过去日本人逮捕了你，你想躲开，那是躲不开的，你躲，他也要找你。二千年前，老子说过：“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社会斗争是逃不了的。

做共产党，也是把个人的事情放浅薄一些；一切为人民工作。别人暂时不了解，最后还是会了解的，个人不要有所保留。凡能做得到的，不要去计较。要求入党，是别人评定，不是自己说的。

（对光琦说）只要去做都有前途，即使过去挨过整，也有前途。×××的家庭是大地主，那就是叛变家庭嘛？不觉得没有希望，那是自暴自弃，要有力争上游的精神。只努力去作，最后总是会好一点，入不了党，但观感总是会一些。你的孩子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为你被整了一下，孩子脸上不光彩，只好靠自己了，因此两个孩子不错。

我八个孩子就让他们去锻炼，不要怕这些那些，让他们马路上去跑，让他们去锻炼。高级干部子女不好的比较多，苏联也有这样情况，值得注意。

整个历史到了变动很快的时期，再过十年二十年，就反过来了，那时的人与现在的不一样了，人也变了。

（对胡敏说）你们工作能力都有，二嫂也是大学毕业，英文很好，要在政治上努力，为远大目标、长远利益着眼。

（对光琦说）你们看会不会变天，又回到旧社会？变天很难讲，那也不是你个人的问题。

马克思是一个贵族出身，活了八十岁。恩格斯没有老婆儿子，死后按遗嘱火葬，把骨灰抛到大海里，所以没有他的墓，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了，但结果呢，他的著作、思想都遗留下来了。这是讲那个时期，真理的发现者常常是得不到个人，而为真理牺牲。发现太阳是哥白尼，达尔文反宗教神道，都是得不到个人，现在总比那个时候好了。

光英，你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我看是时势造英雄。这个时候需要这样的资本家，才提出你来。

成绩不是个人的，是党的领导，群众做的，不警惕要出岔子。

全世界在骂我们，正说明我们好。他们说最危险的是中国，证明中国在某些意义上比苏联还好。

但中国总不会没有人要，就那么孤立，美国在骂，英国就拉，蒙哥马利五月要访问中国，麦克米伦放出风声要到中国来，还说要邀请毛主席访问英国，印尼、印度在骂，缅甸即要求来，非洲、拉丁美洲要我们。苏加诺、尼赫鲁、纳赛尔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他们是反帝，当帝国主义松一点就反对人民，首先是反对共产党。反共、反帝，就是这条路，完全是这一条规律。亚洲一些国家独立了，一个时候人民力量发展起来，他们国内困难很多，大量人没有吃的。印尼物价飞涨，现在还要杀人，他们没有物质条件，物价是没有法子用行政办法解决的。

资产阶级到一定时期就要反动。蒋介石过去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共产党把他弄上去的，是陈独秀弄上去的，反过来杀共产党。这个问题不要奇怪，某种意义说，反对我们并不是坏事。

帝国主义说苏联好，那就要警惕了，很多人去过苏联，写文章说苏联正在自由化，欣赏苏联的物质刺激，说中国才是马列主义。说我们是革命的马列主义，苏联是保守的马列主义，这就需要注意，他们在挑拨我们同苏联的团结。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15）同民建会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的谈话纪要（1960年2月12日）

民建会、工商联两千人在北京开会，已经开了两个月，在这里过了年，并且有不少工商业者家属代表参加，思想工作搞得比较细致深入，开得很好。时间长与会议收获成正比例。

现在工商界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如一九六二年以后取消定息问题、高薪问题、退职退休问题、病假期间工资问题、子女上学问题、另外就是刚才有人提到的世界观的改造问题等等。

取消定息，到一九六二年还有三年。定息取消以后怎么办？我们还没有想，工商业者现在就想了，这也难怪，因为对他们是切身问题。这个问题，毛主席有过指示，七年定息，到一九六二年取消，必要时可以留个尾巴。现在还是这句话。至于尾巴多大多长，我们还未研究，你们可以想想，我们也可想想，时间还来得及。现在恐怕你们也没有想过，只是提出问题。所谓必要，是指不留尾巴就有困难。真有困难，总要解决。

有人担心政府对工商业是否会照顾到底。政治上要继续照顾下去。一部分人的高薪在定息取消以后怎么办？这问题过去讲过，也是继续下去，原来的高薪不减，也不好再增加。由于调动工作或下放而减薪的，恐怕是少数人。不论调职或下放，应当薪水照旧，已经降了的要补发。总之，我们的政策是：高薪不降，调职不减薪，减者补发，各位看到有此情形，可通知统战部转告有关部门补发，问题是很容易解决的。

工商业者接受改造，为国家做事，同党合作，到一个时候年纪大了，年老了不能做事，需要退职退休，现在尚无办法，将来总要拟个办法。一句话，国家照顾到底，负责到底。目前临时怎么处理？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就不一定去上班，请个假，薪水照发。暂时按此办法搞二、三年以后再讲。

病假期间工资，国务院曾有个规定，就照那样办好了。若干地方贯彻执行上有不一致的话，我们可以再发一个通知下去。

总而言之，工商业者只要跟着人民政府一心一意搞社会主义、同共产党合作，不论老、病或有其他困难，国家都负责到底，包到底，这点请各位放心。具体办法还要议。总之是照顾到底，不要担心，我们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收入几百亿元，六亿人民的国家不会小气。首先你们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跟党走，这是第一个条件，人民对你们会负责到底，不会亏待你们。

子女上学，没有好多问题，如有，也可提出解决。

现在的问题是向前看的问题，继续进步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分工：你们管一头，要所有工商业者思想进步，走社会主义道路，跟着党走改造世界观、思想进步为国家做事，这一头你们包了，对工商业者的照顾等等，由我们包。那一头做得不好，互相提意见，订一个口头协定。

工商业者中有些人解放以前就同共产党合作，解放后合作的人更多。绝大多数工商业者是同共产党合作的，中间某些时候发生某些问题，是过去了。总的说是合作了十年，回想起来，同十年前比较，工商界的确是大有进步。相互信任也建立了一些。黄任老讲，十年来工商业对共产党经历了畏服、信服、悦服三个阶段。我们一开始就相信工商界的多数人是可以接受改造、可以合作的，否则，就无法规定一系列和平改造的方针和政策，但在党内和群众中也有些人是不那么相信的。在工商界方面，一开始就相信共产党的是少数，慢慢才多起来。建立相互信任，是不容易的，一要时间，二要事实。经过十年，有许多事实，相互信任就进了一步。现在，我们党内对你们信任的人也多起来了。工商业者对党的信任也增多了。但是不是许多人对党都悦服了呢？悦服的人肯定有，但不是那么多。悦服也者，包括感情和世界

观的问题，世界观一改变，感情就变了，对国家的进步就会感到高兴。十年来，国家面貌已经有很大改变，今后十年，中国面貌还要更大改变。一般讲，人们的主观世界的改变，落后于客观世界的改变。但有些人，如孙中山所说的，先知先觉，有远见的人，主观世界就走在客观世界的前面。客观世界还未变，他们的主观世界就看出了，就先提出了理论、纲领和方针，虽不详细具体，但指出了方向。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如果有些人的主观世界走在客观世界的前面，而且他所想的又符合于客观世界的规律，将来客观世界改变了，就不会感到意外，就会兴高采烈，而不觉得震惊。如果落后于客观世界，就会感到意外，觉得震惊。分明是好事，也感到不可理解，要鼓掌也鼓得慢一些，感情也跟不上来。工商界的文化水平比其他阶级高，主观世界的改变是可能的，想得远一些有好处。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但个人利益同国家利益、整体利益、长远利益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讲过三句话：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民族利益服从全世界的利益。个人利益同整体利益，是矛盾的统一，在这个矛盾中，到底是个人利益第一？还是整体利益第一了正确的原则，应当把个人利益放在服从的地位。如果个人利益第一，不计后果，不顾整体，要整体利益服从个人，就变成个人主义。个人利益一定要照顾，没有个人利益即无整体利益，个人利益集中起来即是集体利益。国家的利益，还不是由六亿五千万个个体利益集成的？因此，不是大公无私，而是大公有私，公私兼顾，先公后私。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主动去做。但做起来相当难做，党内也有种人强调个人利益，坚持不改，结果还不是开除党籍？个人主义是工商界的本性，恐怕不会比其他的人少。"工业救国"只是一句话，要工业服从他的个人利益就救国，否则就不救国。

工商界朋友们应当下定决心，不顾一切，一心一意为国家、人民和整体利益着想，努力工作，不要顾虑个人利益，不要顾虑国家对这些个人利益是否照顾到底，这方面我们包下来。个人有困难，可以解决，六亿五千万人的国家为什么不能解决一小部分人的困难？总而言之，你们不要顾虑，这是靠得住的。你们要一心一意、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竭心尽力。也可能群众一时不了解你，以为你有什么企图，恐怕"糖衣炮弹"又来了，你也不要顾虑，坚持地做下去，最后总会相信的。这问题同每人都有关，要好好地搞一搞，这就是世界观改变的开始。对家属和子女，也要如此，也要他们不顾一切，一心一意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就会取得人民的信任。工商界的子女进步的多，有的是党员，有的是团员，不进步的是少数。工商业者家属要多参加街道工作，不管什么工作，先参加一点再讲，不要选择工作的大小贵贱，做了再说。我们党提倡所有党员和负责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在群众面前出现，参加一些生产劳动。目的不在于创造多少价值，而在于改变群众观感。有些厂长扫扫地，铲铲土，搬搬废铁，群众观感就改变了，相互关系就改善了，生产就提高了，灵得很。工商业者和家属凡有可能也要这样做，工作不在多少、大小，只要力所能及，就全付拿出来。不要选择工作，这样不做，那样不做，这一部分工作不做，就会引起做这一部分工作的群众的反感。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对你们会有好处。

只要一心一意地为国家工作，即使开头有人不相信你，总有一天会相信你。不要顾两头，要奔改造、服务的一头。要一边倒。有了这一头，就有那一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就会来。反之，不顾国家、人民的利益，个人利益也顾不到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心一意搞个人利益的人是搞不到个人利益的。相反，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会给他报酬的。因此，应当一心一意、一边倒、顾一头，不要三心二意、顾两头，这样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要信任共产党，往这方面奔，朝这方面努力。那一头（指个人利益）我们照顾，照顾不到，你们提出来。这样坚持为国家、为人民工作，做个多少年总会有好处，世界观慢慢就改变了。

我们国家还要从社会主义进到共产主义。当然不会很快，但要看得更远、想一想也好。有些人越想越怕，其实没什么可怕。解放以后，过社会主义生活已有十年，也没那么可怕，将来到共产主义只有更好。但不要搞得过急，要自觉，搞体力劳动过多也不好，不一定搞得很多。世界观的改变只能慢慢来，

不能强迫，要经过细致的工作，别人可以帮助，但决心要自己下。方向就是这样。我们要提倡这个方向，生活方面你们不用担心，舍掉你们这个包袱，以便你们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你们这样做，共产党会高兴，劳动人民会高兴，结果不是一头没有，而是两头都有。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真理是被人承认的，做了好事，大家会看到的。

大集体小自由，也是世界观的一个问题。尽是纪律，人就受不了，总要有些自由。问题是那个服从那个？为什么要大集体小自由？因为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个人自由要有，但集体与自由不能平摆，更不是小集体大自由。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暂时利益是有的。有了今年才有明年，今年过不去，还有什么明年？我们国家今天还没有根本摆脱一穷二白的面貌，但有光明的前途。再过十年、二十年，不是世界第一大国，也是第二大国。我们今天比美国的经济、生活水平还差得多。但今后一定要搞四个、五个美国才行。战略上藐视敌人，要从长远看。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个人、国家都是这样。

对资产阶级子女，要他们努力，人们是会信任他们的，几十年后人们是会改变对他们的观感的。一个人在青年时代要吃点苦，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马克思、列宁都是贵族出身，但他们长期为人民利益奋斗，几十年后再没有人讲他是剥削阶级，相反地取得人民极大的信任。现在有一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人家到处捧他，自己不努力，反而变坏了，这是好事变成坏事。对资本家的子女现在社会有些看法，有些子女可能暂时受些气，你们不要过于重视，要把这当作好事，坏事会变好事，好处在后头。这也是世界观问题。

总而言之，一切服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谁违背这一条，最后总是没有好处的。谁能忠实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对人民有贡献，并且一贯地做下去，最后就会有好处。对共产党员我们也是这样要求。对工商界现在可以提倡，提倡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奋斗。

为什么有些群众文化水平不高而能够有许多发明创造、对国家比你们做出更多贡献呢？这没有什么秘密。就是他们只顾一头，一心一意为国家利益奋斗，不顾个人利益，因此得到群众的信任。你们有文化、有技术、有管理经验，是否也可以做到？秘密就在于顾一头、顾两头的问题，能否同群众打成一片的问题。努力自我改造，可能这是最要紧的问题。

16） 关于报纸宣传工作的讲话(1961年4月28日)

天华大队这个红旗，群众不承认，过去报上登的不对。你们搞的那一本天华大队的调查报告，也不合乎事实。你们一吹彭梅秀(天华大队的支部书记，兼广福公社的副社长)，群众就不敢讲实在话。你们吹虚假的东西，就剥夺了群众的发言权。报上那种宣传，说谁是模范，不合事实，群众是不相信的。你们那样一说，那敢说你们登得不对？口里不说，但影响不好，也助长了不说真话的风气。

经过这次整风，将来天华大队是可以转好的，天华还可以成红旗，成真红旗。但是成了真红旗，也不要天天吹，也不要象报纸那样说得太好。特别不要吹那一个人。劳动模范，是有，比较先进的人物也有，每项工作都比较先进的人物就没有，你这样先进，人家可能那样比你更先进。所以在报上，即使是红旗，也不要宣传得那样好，对个人更不要吹得什么都很先进。

要作好调查研究不容易。你们在天华大队调查了那么久，还是那么不清楚。调查情况，要对每一个问题每个方面都调查清楚。如果你对一个问题的每个方面都了解清楚了，才算真正了解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才算真正解决了。

要了解真象，了解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真象，是不容易。就是人的主观世界要反映客观世界很不容易。要了解客观世界，要经过一个过程，很曲折的过程，有时需要很长的时间，短了不行。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你对客观实际就没有调查研究清楚，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没有地方出发。

为什么要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而调查研究，不是为调查而调查。调查的目的不明确，问题都没有，调查就没有边。

每次调查要有目的，调查的目的有三个：一个是了解中央已经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比如现在公社实行的粮食政策，供给制，公共食堂，等等。调查的目的就是首先看这些政策是否正确，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二是已实行的政策已经不够，要根据新情况来修改政策。调查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出现了一些什么新情况，过去的政策那些不正确，那些不完善。三是脑子里原来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在调查中新提出来的问题。调查的目的就是要发现问题，要根据新问题提出应订些什么新政策。比如“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对农民的教育主要靠口头教育，不是文字教育。天华大队的农民究竟什么人在教育？天天在这里教育农民的是彭腾奎‘大队文书，地主子弟’，他能教育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好的典型。

你们在天华大队调查的那一大本，看了，没有多少印象对决定政策没有多大作用，如对公共食堂、幼儿园、社办工业等究竟应该如何办，就没有这方面的材料。

调查是认识世界，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在改造的过程中更深刻地认识世界。

提倡调查研究，是好。但可能调查研究了很久还是不能认识世界，不一定都好。比如你要调查公共食堂怎样坚持办，总可以找一些根据，但是没有用，因为公共食堂根本不应该坚持办下去。比如你要调查一些材料来证明高指标是可能的，可以找到一些材料，但这是没有多少实际作用的。

现在调查研究不那么容易。现在的情况，和毛主席当年在湖南作调查时情况不同，比那个时候调查恐怕更困难一些。现在常常遇到这样的公社、这样的大队，他们护短，生怕你发现他们的缺点，你去调

查，他们有一套办法封锁消息，不让你了解到真实情况，搞一套假的给你。有多少大队，家丑不怕外扬，不怕告状，给你讲好的、也讲坏的，这样的单位恐怕不多。多数的单位是你一来调查，警惕性就高了，封锁其实情况，有的还给你准备一套假的。天华大队是真是假？至少是半真半假。这次胡乔木带的调查组，在天华大队遇到这种情况，在湘潭望仙桥也遇到这种情况，在安化县也遇到这种情况，难道别的地方就遇不着？

毛主席说，调查研究要诚心诚意，甘当小学生，就可以了解情况。仅仅只有当小学生的精神，仅仅只有诚心诚意的态度就行了吗？不行。要经过曲折的斗争。要采取另外的办法，不然就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天华大队对你们不客气，对我也不客气。我到这里一接触，就感到他们不敢讲心里话。

湖南有一股不敢说真话之风，很严重。人家话都不敢讲，你还能调查出什么真情况？不一定是不相信你，这中间有很多原因。我们搞了一个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拿下去征求群众的意见，群众说：这是拿六十条来试我们的心，可不能说真话。

如何使人家说真话，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这也要调查研究。回老家可能是一个办法，家里除父母兄弟以外，总有一些亲戚、熟人，容易给你说真话。但也要注意，对他们有

利的也可能夸大，不利的也可能缩小，所以对亲人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都信。找人个别谈也是一个办法，但是要把人找到长沙去谈可能好一些，你到天华大队来找他，他就不一定对你谈真的。在谈话的时候，最好是提出问题，启发群众说话，摸群众的真实意见。还要提出一些反面意见，从反面问他，让他说，要耐心真正听下去。

这次我提出四个问题和群众谈，谈了两次，就摸到一点风向。我提了公共食堂八个缺点，一提大家就活跃了。你提出问题，要看群众是笑脸还是低头不高兴，你就可以了解他们的心理。我和群众谈的，结论是不办公共食堂。如果要办下去，就只能学张公百忍。

17) 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讲话(1961年5月1日)

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想用这些典型事例来指导实际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样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你们报喜不报忧，只登好的，不登缺点、错误。我就不看你们那些头条新闻，我不看，报纸来了只看七、八版。

现在农村干部有一套办法，不让你们记者了解真实情况，给你弄虚作假。我也没有办法。

你们一两个记者下去，人少，力量小，农村干部人多，力量大，是优势。他们知道上面有人去了解情况，可以把那些有意见、敢说真话的人事先调走，可以先开积极分子会作布置，不准讲真话。那些坏人和搞独立王国的人不全是坏人。

新华社《××××》上登的东西，大都是表面现象，并不是真正的真实情况。总之，我看你们秀才下乡，毫无办法；你要了解真实情况，不只是县委干部抵抗，公社、大队干部也抵抗。

《人民日报》应该好好总结一下三年来办报的经验。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些，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在这个问题上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报纸宣传大办万猪场，结果是祸国殃民。

报纸威信很高，大家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人民日报搞了这样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以后宣传新事情要请示中央，要加以限制。

在报纸和党委的关系方面，过去你们要求新闻自由，认为服从党委领导就妨害批评和自我批评；现在你们口里不讲要向党委争新闻自由，但思想上不一定完全通了，不听党的话的地方还是有。今天不讲这个问题。”今天要讲两种偏向；一种偏向，脱离地方党委的领导，认为受党委领导就不能批评，因而就闹独立性；一种偏向是完全听党委的话，因而就出现浮夸这类事，什么公共食堂好，放卫星。听话，也不是；不听话，也不是，是难办。作一个共产主义的新闻记者是难办。你们就要从这中间想出办法。要把坚持原则性和坚持纪律性结合起来。一方面要服从党委领导，要坚持纪律性，一方面也要敢于向党委反映问题，提出意见，要坚持原则性。不要怕对党委有争论，有争论不是不服从党委。不服从，是错误的，要犯错误；服从，也要犯错误，是不容易。又要作马列主义的记者，又要想那么容易，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你们报上登那么多高指标的浮夸新闻，开初，地方党委相信，我们也相信。首先是你们报社的人相信，大字标题，登头条。

你们要作马列主义的记者，要鼓励群众前进，报纸要有指导性，要帮助党委指导工作。不是要脱离党委。指导性不只是社论有，新闻报道上的指导性更具体。

你们登那么多高指标，一宣传，使整个党都陷于被动。很多数字是从那里来的？是逼供信来的。你们登那么多数字，有多少是真的？

要好好总结三年的经验教训，但是当前报纸就要有所改进。你们每天一个头条，大标题，到底真不

真？这样做，到底是作了好事，还是作了坏事？你们记者写了那么多放卫星的新闻，要那些记者亲自到他写新闻的地方去，看当时那个卫星究竟是怎样放的。要亲自去发现真象，才知道以前怎样不切实际，不经过亲身的核对，考查，就不懂当时是怎样搞浮夸的。

这几年，你们喜欢搞表面现象，搞形式主义的东西，搞耸人听闻的报道，还没有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影响。报纸是斗争最尖锐的工具，几年来报纸在敌我界限方面分得比较清楚，有敌我观念，但在是非界限方面就分不很清楚，是非不明，什么是不正确的，不应该宣传，你们还搞不清楚。比如登大办万猪场，是好，是坏，你们登的时候没有搞清楚，登了以后也不去亲自调查，结果弄得祸国殃民。

你们不作调查研究，秀才味道太重，太脱离实际。你们要脱离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残余，不要满足于那些东西。

报纸工作人员是什么人？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人员。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当是调查研究的结果。调查研究是一门学问。在这方面，我看你们学问不深，对调查研究还很不行。要了解真实情况很不容易，你们记者和编辑，是调查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对调查研究都那么不行，怎么行呢？我看你们对调查研究，还是初小学生，高小学生也说不上。记者和编辑要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要从初小到高小，从初中到大学，要决心作一个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的新闻工作者，要努力搞一辈子。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18） 在湖南宁乡炭子冲干部和社员会上的讲话(1961年5月7日)

田里工夫忙不忙？想耽误你们半天工夫，同你们谈谈。我来几天了，找几个熟人谈了一下，还没有找你们谈。今天谈谈。

将近四十年没有回过家了，我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的生活很苦，我们工作作的不好。对你们不起。

乡亲们说说看，社员的生活比一九五七年是好了还是差了呢？不是好，是更差了吧？更苦了？生活更困难？生产比以前是降低了！是这样，就承认这个现实。什么原因呢？为什么生产降低了，生活更苦了？

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工作中犯了错误，工作搞得不好。我问过几个人，门前塘里的水是不是车干了？安湖塘的水是不是车干了？他们说都还有半塘水，看来旱影响不是那么重，我记得过去有两年遭受旱灾，安湖塘和门前塘里的水都车干了。主要是这里的工作犯了错误。这是不是完全怪王升平(原大队总支书记)？不能完全由他们负责，上边要负主要责任，县有一部分责任，省有一部分责任，中央有一部分责任。当然王升平不是没有责任，要负一小部分责任，他有他的账。

有的是中央提倡过的，如办食堂，搞水利，大办水利，大办万头猪场，一直到现在全世界没有一个万头猪场，因此，根子还在中央，不过到了下边就加油添醋了。安湖塘废掉好田挖鱼池、拆房子。彩脸化、赤膊化，听说是总支书记带头先划一个花脸。还有打人。

这里搞纪念馆，写信问过我，我几次写信说不要搞，不要搞，结果还是搞了。

最近中央发了关于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文件，里边提到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有说话和气。当然更不能打人骂人，我不知道你们这些队长说话和气不和气？

说话要和气点嘛？不要对社员板面孔，对调皮的人，多讲几次，再不行，这里有派出所嘛？可以管教人。过去几年取消了派出所，你们说有好还是没有好？有了，群众有个地方打官司，告状。法官可以搞巡回法庭，这里坐几天，那里坐几天，群众到县里去告状，好不方便，有派出所就会方便些。

工作出错误，有的是坏人办坏事，胡仁钦（宁乡县委书记兼花明楼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是坏人办坏事；有的是好人犯错误，王升平是好人犯错误吧？

什么是坏人干坏事？这种人看到你把事情搞烂了他高兴，我们看到工作搞的不好就很难过，你们要警惕，现在看到群众生活这样不好，还有高兴的没有。

坏人办坏事，同坏人搞在一起，也要领导上负责。

以后是不是保证不出坏人呢？饿了一年饭，苦了一年，这个教训很深。有了坏人，大家要起来反对他，同他斗争。事不过三，吃了一次苦头，再吃第二次还可以，第三次就不要了。主要靠大家同坏人作斗争，上边要注意，你们也要注意，上边负责，你们也要负责，合作起来就不怕坏人。你怕他，他不是打死人，不怕他也许少死几个人。

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错误，要向你们承认错误，省委恐怕也有错误。人没有不犯错误的，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犯了错误不要紧，要紧的是认识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人

对错误的态度有三种；改正的快。改正的慢，死而不改。改的慢不好，死而不改更不好。

有些事情是当好事办的办坏了要接受教训，下次改正。如要你们种棉花，不一定是当坏事办的，只是不要一下种那么多，还是应当种一些，棉花和双季稻，都还是种一些好。

食堂问题

你们食堂散没有散？

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整米；一个食堂占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甚至占二分之一，半数的人都去作，饭了，烧硬柴砍树，茅草不次，小树砍得只是上边剩一点大的头，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好处也可以讲个把两条，说是出工齐，出工齐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嘛！

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

要办食堂办小的，三五户，像在家里作饭一样，家里作饭那有专人煮饭，专人挑水，专人砍柴！不都是早晨起来挑几担水，晚上回来捎带砍点柴，一早一晚的开开菜上，下雨天不能出工就整米，老人、小孩砍点柴，吃过饭随手就喂猪，主要劳动力是不喂猪的。

办小的食堂要互助自愿，我家十口人吃饭，你家二口人吃饭，我就种十口人的荣，担十个人的水……你就种二口人的菜，担两个人的水。各户劳动力情况不一样，还可以互助换工，你的劳动力强，可以多担几担水，我可以多作几顿饭。办得好的话，可以节省劳动力，节省烧柴，又能解放妇女，那就有优越性。没有优越性就散。最重要的是不能浪费劳动力，一定自愿，彼此信的过。食堂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食堂一散，有些社员有困难，没有锅子，铲子，坛坛罐罐，社员回家作饭怎么办？赶快去搞这些东西。大队、公社、县、省、中央，赶快动手，组织生产这些东西，组织铁匠，打铲子嘛？菜刀，还可以两户合用一把，锅铲就不好合用，组织木匠，篾匠生产炊具。工作队在这里，社县省一起努力，赶快把这些东西制起来，可能今年一年制不齐，怕两年也制不齐，三年制齐就是好事，三年也得制嘛？

来一批解决一批，来了发给大队，大队分给生产队。生产队分给谁了分给生产队的干部了别人还没有，你当干部先分？好不好！我看第一批，第二批先分给那些最需要的人，社、队干部不要先要。如果你是最需要的户，那就让大家评。大家都有了，还怕你们没有，即经当了干部，在这些地方就要当心些。

分散食堂，是不是就分田到户？食堂是食堂，田是田，食堂可以分散，分田到户不行，还是集体生产。分食堂不是分田，田不能分，仍归大队所有，也不是包产到户，这条要肯定。有些零星生产也可以包产到户，如田塍，可以包产到户。我小的时候，我们家的田塍就归我母亲种，那时收的东西也不是归全家所有。田塍包产到户，收稻草时常常把田塍上的豆子拖死，谁种豆子，那一段的草可以归他收。

荒土是不是可以包产到户？收入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是你自己的，社员有了就好办。

田塍的产量也要交一点给生产队，少交一点，一百斤交十斤，多了，交五斤也可以，要交生产队一点，因为田塍是集体所有的。把它包死，包死好。

房屋问题

一散食堂就遇到房屋问题。一个屋场住那么多户，没有地方打灶。分散食堂以后，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房子。社员的房子不确定，很多事情不能定，白留地，自留山不能定，养猪喂鸡也难办，厕所也不好定。生产就不放心。

要一下全解决也困难，要一年二年有的要三年，不能搬，在一个地方定二、三年也好嘛！有二、三年也可以搞一些生产。有的要长期定下来。大部分可以长期定下来，小部分短期定下来。

空房子可以利用，还有一些是公家占用的房子，银行、供销部、学校、公社、大队办公室、工厂、猪场等，都要挤一下。猪场可以办工厂，可以作办公室，作商店，有人说猪场不好住人，我看至少王家湾(东湖公社，一个生产队)的猪场可以佳人，把多占用的房子都退出来给社员住。此外还有这个房子，应退出来，纪念馆不办了，省委、县委都同意了。这个房子谁来住，欧风球、黄瑞生还有那些人来住？由工作队主持同大队商量好，分几户到这里来住。我家的其他人不要来住。桌子、凳子，仓库、锅子、灶，一切东西都作为退赔，退给社员，只留下少数几件我母亲用过的几件，如纺车，都是旧的不能用了的。这些楼板，拿去替没有门的人作门。被、帐怎么处理？你们研究一下。在这里至少可以住上十年，二十年，等你们有了房子，房子比这个房子好了，你们愿意搬再搬。

有人说住在这个地方，有人来参观怎么办？我看外国人来参观不让他来，中国人让不让他来？恐怕阻止不住，那就让他来看嘛。不卫生怎么办？房子里有尿桶，还是按你们的老习惯办，他们愿意看就看，不愿意看就拉倒。房子里摆尿桶这个习惯不好，你们愿意改就改，不愿意改就拉倒。以前这些房子里，也摆尿桶，臭的要命，闻惯了也不臭了。

来人参观，招待怎么办？招待两碗开水，过去去长沙，走路上还要喝茶呢？找个老婆婆烧开水，喝开水要给钱，放片菜叶更好，有点收入，老太太会愿意搞。有人来就先问他们喝不喝开水，喝就烧，不喝就不烧，一分钱两碗，不喝就拉倒。

这里还有些罐罐坛坛，要分掉，这次不要再打烂了。

此外，要保护山林。要拟几条办法，保护山林，这样砍下去不得了。以后砍了树要赔，所有权归大队，包给小队，划出自留山。小树不要劈了，长大了再劈，不要劈的太厉害，现在山上的小树只剩几个枝子，要有几年不劈树才行，缺了要补，栽几棵。

以后不准生产队、社员随便砍树，要砍得经过大队统一规划，公社批准。有些树成材了再砍，不要砍小树。

退赔问题

要退赔，十二条讲了，到底退赔得怎样？

我看是一般差得很远。听说你们有一条规定，丢失的东西要有证明才准登记。搞乱了，那里去找证明呢？当然也有的人虚报，恐怕这是少数。给社员讲清楚，看你丢了什么东西就登记什么。公社、大队拿走了的，自己搬家打烂了的，搬房子以后住的很挤，床铺没有地方放，把床劈烂烧了的，猪、鸡杀吃了的，都登记起来，除退赔了还要算损失账，因为你不要他搬，他就不会把床铺作柴烧，把猪、鸡杀吃了。

自己杀吃了鸡，要不要赔，可以考虑。

有意的整一下干部。要彻底算账，要退赔清楚。退清了还要写个单子，某年某月，由于乱搞，损失什么东西多少，刻一块碑立在这里。

退赔不是赔钱问题，没有东西，赔了钱也不能解决群众的问题。用退赔款去制办东西，赔东西。你拿了他四个锅子，赔两个锅子，另外，两个赔钱，这样可以不可以？这个账要一户一户的结，这个账要记住，赔清以后，立块碑，或者写一个大单子，用镜框子镶起挂在公社里。不这样搞，老百姓下不得底。不要搞得半途而废。不要赔几个钱马马虎虎了事，拢胡子，要扎扎实实算一回账。算得疼一下，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算疼了，社员也要疼一下，疼几年。这次教训很深刻，子子孙孙要传下去，以后再不犯这个错误。

随便拿东西问题

现在社员也随便拿东西，米，小菜随便就拿走了。有人不愿种红薯，种上就被人拿走了，搞不成器。这事情怎么办？这样就不能安心生产，大家想个办法好不好？

你的东西，我随便拿走，公家的东西社员也随便拿走，这就动摇了所有制。所有制不确定没有办法安心生产，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还有部分个人所有制，不能随便侵犯。自留土的产品要归社员所有。所有制一动摇社员就不安心生产。

为什么有些社员不尊重所有制呢？

一个原因是肚子有点饿，主要是拿吃的东西。还有一个原因是一平二调成了风气，公社、大队拿社员的东西，社员也就拿公家的东西，也拿别的社员的东西，首先是公社、大队不遵守社员所有制。社员这样想：你拿得，我就拿不得，你大拿我就小拿不得？这种风气是上边造成的，不是社员造成的。

现在讲清楚，上边拿的坚决搞好退赔。我拿了你们的退赔，你拿了别人的，拿了公家的就不退赔？要统统退赔，上边退赔，社员退赔，大家退赔，以后拿了就退赔。现在一下拿不出，算个账秋后退赔，使拿别人的东西的人感到没有便宜占，这样，人们就不乱拿了。

退赔是什么呢？退赔就是巩固当前以大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和部分个人所有制。因此，上边拿的要退赔，个人拿了东西也要退赔，一路退得去。一年退不起，两年退。要定一个规矩，这个不要放松。

耕牛、农具问题

耕牛、农具到底归大队所有好，还是为生产队所有好？犁耙、耕牛归生产队，会管理的好些，农具和小牛会爱护的好些，这些事情先由社员讨论，在“六十条”里要写上这样一条，耕牛、农具归那级所有。

粮食问题

今年粮食少了，大家吃不饱，现在的粮食只有这样多，有什么办法，再熬两三个月早稻收下来就会好些，麦子快收了。问题是早稻来，晚稻收了怎样分配？

农民要吃饭，工人要吃饭，老师，工作干部也要吃饭，收下粮食末怎样分配？国家要征购一部分，给工人吃，给干部吃，听说征购的不多了。留下来的又如何分？大家都要吃饭，劳动力要吃饭，小孩子要吃饭，老人也要吃饭，怎么分？一种办法是按人分配，一种办法是劳动好的，劳动力多的多吃，按劳分配。

这几年没有芋头，没有猪养，没有鸡养，吃了大亏。

要按劳分配，劳怎么算？什么活算十分？什么活五分？要有个劳动定额。劳动定额要适当，没有劳动

定额或者劳动定额不准确，按劳分配就不会合理。小队与小队之间也会扯皮，一定要搞好劳动定额。

是不是可以按劳动日计算，产多少粮食和付食品，比如一百个劳动日搞多少斤，产的多的生产队，就多分些，产的少的就少分些。这样就要把小队与小队之间的工分搞好。

供给制问题

要不要供给制？这几年搞的这样苦，供给制不搞或少搞，只包困难户、五保户，从总收入中拿5—10%解决困难户的问题，困难户有长期的，如人口多劳动力少的，孩子长大起来要几年时间。也有临时的困难户。

手工业工人问题

刚才说到要锅子、菜刀、铲子、修房子，这就要铁匠，木匠，泥水匠，篾匠。正是你们需要他们，还需要的很紧。听说他们的待遇太低了，二十到二十六元一个月，同你们收入差不多，现在分了自留地，他们也想回去，这样好不好？

他们不积极，有了铁，他们不努力打也不行。恐怕要把手工业工人的待遇提高一些，不然谁还学手艺，我学出来，收入还不是和你们一样。过去手工业工人的收入大体比农民收入，铁匠高一倍，泥水匠高60－70%，木匠高50—60%，篾匠高40—50%，裁缝高80一40%。

过去学手艺的人大多是没有地种的，现在你们的小孩子都是有地种的，谁还去学手艺。手工业工人的待遇提高多少？你们都是有孩子的人，提高到多少，你们才愿意让你们的孩子去学手艺呢？那就应该提多少。

我和一个泥水匠谈话，他说收入很低，他有个办法抵制，过去搭一个灶用一个工，现在搭一个灶用三个工。这样还是你们吃亏。要很快解决他们的问题，叫他们努力搞，那才好。

盖房子问题

需要盖一些房子，一下子盖不起，秋后再盖，两三年才能盖起，盖房子要木头，铁筋。铁筋还好办，木头就不好办，可不可以用窑砖砌窑洞式的房子，不用木料。

房子问题很复杂，有的人房子被别人拆掉了，住着别人的房子，别人要搬回来，住别人房子的人，就不那么说得起话。社员不能这样子，这是我的房子，我就硬搬回来，把别人赶走。不准社员赶社员，不然一赶又会造成损失，必须有秩序的搬，要规定几条，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乱搬。

还有些人没有房子，要借，要租，都要公社、大队帮助去借、去租，不要社员向社员去租，要经过大队的手，这样社员住起来就有说的了，我住的是大队租借给我的房子。

买卖房子也要这样，一个愿意卖，一个愿意买，价格要公平合理，也要经过大队，大队先买下来，再卖给社员。要肯定所有权。买房子不仅是几间房子，还要同时买一块空地皮，这样才能发展屋前屋后的生产。

这样办可能还有一部分人的房子不能解决，以后逐步解决，一年解决不了，两年三年也要解决。

这回的教训可是深刻，遗留下来的问题要三，四年才能解决。

民主问题

大队有没有管理委员会，主要是支部管事还是管委会管事？开过管委会吗？两个都要办事，但支部只讨论大事情，具体的问题要管理委员会去处理。决定大事情要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

讲点民主好不好？

我同几个人谈过话，看来他们不敢讲话，不知是什么原因？是“不怕官，就怕管”吧！管起来就不得了，整人，这个风气很不好，人都不敢讲话，那怎么能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呢？听说他们不是不讲，就是当面不敢讲，背后讲闲话。他们背后讲几句，你又去追问，说人家为什么当面不讲，背后讲，这样就闭塞了自己的耳目，不要反对讲闲话好不好了当面不敢讲吗？背后讲几句，不敢直接同你讲，同你的亲戚讲一讲，你不是也可以听到人家对你的意见。他们讲的对，好嘛，即使讲错了也不要紧。背着你讲了几句，你不要再去追究。如果你追究人家，“你为什么不当我面讲，背后讲”，这样一来，人们都不讲了，你就什么意见也听不到了。

要规定几条，什么问题必须由社员大会决定。像密植，插双季稻，种棉花，修公路等，这些大事情，不能由少数人决定，公社，大队干部只能提出方案，没有权作决定。这样工作就可以少犯好多错误，特别是经过年纪大的人讨论，他们有经验。过去要是真正经过社员讨论了，食堂也不会办，双季稻也不会搞那么多，房子也不会拆。经过社员讨论，即使办错了，也不会要干部负责，大家会负责，大家会担担子。

当然要社员开会讨论也可能是形式主义的。干部一讲就是要种多少多少的棉花，这是政策，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的举手，一看有人不举手，就去问人家，你为什么不举手？你有意见？你是什么成分？这一来谁敢不举手？

真正经过社员讨论了，对上边不合适的规定也才可以顶住，上边的瞎指挥要大家认识了才能顶住，公社、大队的少数干部，怎么能顶住呢？

要记住，多数社员不能办的事，就不要办。

要社员讲话，好不容易，我向几个社员了解情况，讲王升平可以，讲蒋文彬(现任炭子冲大队支书)就不敢。因为你是当权的嘛！以后你们可以吸收王升平参加一些会，帮助作些工作，提点意见，王升平能承认错误，又愿意改正，但现在还是不要担任正式工作好，过一段时间再说。

要真正实行民主，就是社员当家作主，不是干部当家作主，干部是社员的勤务员，不是社员的老子。应该好好为社员办事，社员会感激你们的。当然干部也有一肚子气，有的收入少，回家挨老婆的骂，我们当干部的吃亏不要紧，最后群众是不会让你吃亏的。

告状问题*

以前我和王升平、成敬常通信，听说公社有个姓冯的干部找王升平和成敬常谈过话，姓冯的对他们说，有两个人给北京写信告状。他们两个人承认写过信，说不是告状。以后成敬常就没有再给我写信，王升平最近才写了一封信。不要反对人家告状好不好？！我还想和他们常通信，要求你们给我一点通信自由，好不好？请公社，大队不要扣我的信，好不好？恐怕主要公社和县两级，省不会扣我的信吧？不只是扣我的信，听说给毛主席的信也有人扣，这很不好。

有人向我告你们的状，不要怕，我又不是那样糊涂的人，你们总还要相信我一点吗？我不会听片面之词，如果告的是真实情况，那好嘛，横直假的也说不成真的。

给我通信并不是要捣你公社、大队的蛋，我是想帮你们的忙。我这个人也可能犯错误，帮个倒忙，那

我再向你们承认错误，作检讨。

上北京问题

为了大家的事情，可以到北京来，我出路费。成敬常、黄瑞生就来过。一个是请你们来，一个是为了大家的事，你们认为需要来，可以来。住房、吃饭我出钱，不要为办个人的私事来。

其他

这里是我的故乡，省、县、社对这里都有照顾，照顾多了不好。不照顾也可以搞好的嘛。要靠自己努力，大家努力事情就可以搞的好。千万不能用我家乡的名义去要求别人照顾。

这里还有我的亲属，不要因为我的关系特别照顾他们。

现在的食堂占人太多要散了，除食堂以外，幼儿园、敬老院，是不是办？要研究一下，要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团结出发，研究一下。

这些话作为你们参考，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你们可以这样办，也可以不这样办，总之一定要搞好。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19）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5月31日)

现在各方面的矛盾，工业、农业的矛盾，文教和其他方面的矛盾，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总而言之，人人都要吃饭，城里人要吃饭，乡下人也要吃饭，读书人也要吃饭，我们“做官”的人也要吃饭。而且，城里的人比乡下的人还要吃得多一点，人不只是吃饭，还要吃肉、吃油、吃鱼，要有副食品。没有那些东西吃，即使粮食不减少，身体也要坏。……

现在的问题，就是马克思讲的一句话：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投于工商业上面而无须从事农业的劳动者人数……是取决于农业劳动者在他们自身的消费额以外，能够生产多少的农产物。”也就是说，要看农民生产的东西，在他们自己吃用以后，还能够提供多少粮食、肉类以及其他的工业原料，才能决定这个社会可以拿多少人去从事其他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所谓其他的物质生产，主要是工业，交通，精神生产就是文教。农民提供的粮食少，就只能拿出那么一点人；提供的粮食多，可以拿出的人也就多一些。农民吃了以后剩下来的粮食，就是我们所说的商品粮。有多少商品粮，就可以办多少工业、交通运输业和文教事业。比如这个时候横竖是没有饭吃，办工业也好，办学校也好，都没有办法多办。在中国历史上，地主阶级挤农民的口粮，贫农是糠菜半年粮。本来农民是拿不出那么多的商品粮，卖到城市里面来的。地主阶级把它挤出了一部分，那还不是挤的农民的口粮。现在地主阶级被我们打倒了，是我们在挤农民的口粮了。现在是城里人，也就是我们，跟农民争饭吃，争肉吃，争油吃，争鸡蛋吃，争棉花，争麻，等等。很多东西统统被我们收购起来，农民很不高兴。这样一来，就使工农联盟发生了很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是很危险的。它对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国家，甚至于我们的社会，能不能继续维持和发展下去，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总起来讲，就是工业、交通、文教都办多了，其他方面用的人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非减少不可；不然就要同他们争饭吃，争肉吃，争油吃。这个问题到底还有什么考虑的余地没有呢？我看是没有考虑的余地了。就是说，工业战线要缩短，农业战线要延长。这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就讲了的。现在不是工业战线踏步和前进多少的问题（某些部门可能还要前进一些，比如石油），而是要后退一步。……后退好了，就可以把比例搞适当。工业战线、文教战线延伸得太长了，缩短一点，同农业的比例就适合了，就可以和农业并举，一同前进。不然，农业不能前进，工业和其他各方面也不能前进。

为什么搞成这个样子呢？我看，在农村里面，我们的工作有缺点、错误，也有天灾；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上面，我们的工作也有缺点、错误。两个方面都是高指标。农业上面的高指标、高收购等等，这是从中央起要负责的。工业上面也是高指标，横直要那么多钢，那么多煤，那么多交通运输。文教也是这样。结果，把原材料和各种东西都搞到这些方面来，其他方面就没有了，势必挤了农业和轻工业。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千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右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我也间了几个省委书记。我问过陶鲁笳同志：在你们山西，到底天灾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他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其他一些省我没有问。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那么，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错误，不就好了吗？有的同志讲，这还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现在看来恐怕不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总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这个比例关系不变，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搞好了就是搞好了，有成绩就是有成绩，有一分成绩就是一分成绩，有十分成绩就是十分成绩，成绩只有七分就说七

分，不要多说。我们这几年确实做了一些事，也做了一些事情是不见效的，问题就是搞多了。因此，回过头来讲，这样一些缺点错误，并不牵涉到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这三面红旗的本身，而是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有严重的缺点错误。最近发生这样的问题：不仅农业减产，工业生产也落下来了。如果不是严重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减产？为什么要后退？难道都是天老爷的关系？说到责任，中央负主要责任，我们大家负责，不把责任放在那一个部门或者那一个人身上。我们现在是来总结经验。好在我们现在能够回头，能够总结经验，能够改过来，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现在要下决心。

由于我们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够，这些缺点错误，至少有一部分是不能避免的。农业方面过去我们没有碰过这样的钉子，没有这样减产过，这同苏联是不同的：苏联土改后减产了，我们土改后没有减产；它合作化减产了，我们合作化没有减产。我们极力想使中国的农业不要减产，也想吹一下子，说可以避免减产，看来，我们现在要减一次产。人家有了经验的，我们自己没有搞过，还得碰一次钉子。工业方面，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也搞多了，搞快了，也发生过比例失调。大概在东欧这些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也是比例失调，重工业搞多了，结果引起波匈事件。我们中国也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当中出了些问题。所以，也不要笑人家，人家有经验，不等于我们有经验。我们的这些缺点错误，从一方面来讲，有些是不能避免的，从另一方面来讲，可以避免一些，可以早一点发现，早一点转，这是可能的。我们转慢了一点，问题发现得迟了一点，所以，损失比较大。但是，现在转过来还不迟。现在，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全国的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现在要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

现在就是要下一个很大的决心，减少城市里面的人口。当然，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有些工人会搞不清楚。但是，只要很好地向工人进行说服动员工作，我想是可以说得清楚的。而且现在有些中、小城市，已经有这样的人，看到农村分了自留地，农民又养起猪来了，养起鸡来了，呆在城市里面吃不到肉，吃不到油，吃不到鸡蛋，他就愿意回去了。到了今年下半年农民的自留地有了收成，副食品也比较多了，某些乡村里面的生活可能比城市里面要好一点。现在有的地方就已经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农村形势更加好转，动员工人回去就更容易。当然，还会有些人是不愿意回去的，一定要很好地做动员说服工作。对回去的人，要安顿得很好。有些人回去如果没有粮食吃，要带一部分粮食去。各级党委、各部门的负责人要亲自去组织一下，切实把这项工作做好；动员一下，不要把它推给劳动调配科科长作为一般的劳动力调配来搞，以为那么一调问题就解决了。从城市里压人口下乡，也可能发生一些事情，如果做得好，可以少发生一些。

乡村里的农民家庭手工业，大多是半农中工的，发展这种家庭手工业，并不会妨碍农业。乡下还有一些手工业工厂，农闲开工农忙停工，它又供应产品，又不妨碍农业，也是可以办下去的。比如湖南宁乡县的耐火材料厂，原来有1000多人，最近还有800多人，它附近有煤炭，每年在农闲的时候搞三四个月就行了。这种季节性的东西，今后还可以搞，主要是搞轻工业，搞一些农民生产同生活所必需的产品。一定要搞轻工业产品，才能有东西去换农民的粮食、猪肉、鸡蛋等等，没有东西换是不行的。现在农民急需锅子，急需木桶，好多东西急需，你如果有这些东西，他们是愿意把粮食、鸡蛋卖出来的。现在连洋火、咸盐都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你怎么能收购到农民的东西？农民现在是没有，有了也收不到。所以，现在要加强农业战线，还要加强轻工业这条战线，真正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农轻重的方针，重工业战线不能不缩短。缩短多少？还要具体研究，但是，一定要下这个决心。文教战线也要缩短。××同志说，要发一部分粮食养架子猪，我看要先发一部分粮食养母猪、母鸡，生点小猪、小鸡卖给农民。现在农民急需小猪、小鸡、小鸭，有了小猪、小鸡、小鸭，才能有架子猪。要首先搞这个，从这里下手。

不然，架子猪也没有了。

城市里头这样大大缩减，有些工厂要关，特别是一些小土群以及还有一些小洋群要关。以后再要开，也要尽可能地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把机械化的程度搞得比较高。这样，就可以少招工人，吃饭的人少，而产品还会多一些。××同志讲，粮食问题解决了，小土群这些东西可以搞。恐怕现在相当难，以后就是要有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水平，才向农村里面招工人，不然，招来了，又是这样。

在这里，我要讲到美国的情况。美国现在有1.8亿人，农业人口不过1600万，约占10%；而农业劳动力只有600万，其中300万搞粮食，300万搞畜牧业。它的这一点农业人口，除了能够提供1.8亿人的粮食、肉类、原料、棉花以外，还有剩余的农产品和原料出口。美国的强大，我看它的基础就是这个。美国人吃饭，粮食吃得很少，平均一个人一年只吃一百六七十斤粮食，而肉也吃到100多斤。它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样高，因此它可以用90%以上的人来搞工业和其他事情。假如我们能够达到美国这样的比例，我们这个国家的强大就可观了。世界上解决了农业问题的国家不多，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国家中，解决了的也只有那么几个国家。所以，农业是基础。

这里有个农业技术改造的问题。有同志讲，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为什么高呢？第一是机械化程度高，第二是化学肥料多。此外，它有那么多肉吃；牲口多，粪肥也就多。它的水利也比较好。我们的工业到底能够搞多少，文教到底能够搞多少，要看我们的农业在以后能够提供多少粮食、肉类和其他的东西。

如果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这方面来看，恐怕农业情况的改变就不会是很快的。我看不是三年五年，而是要有十年八年才能见效。在十年八年内，只能从农村里面招很少的人，而且要等机械化程度比较高了，才能招，决不能一下子从农村里面搞出很多人进城，来了又退回去。以后再不能那么想了。在这个问题上，本来我们是有过一些经验的，这回又有了一次经验，以后就不要再重复这个教训了。如果不是这样，来了以后还得回去。这是没有面子可讲的，不管你的威信也好，面子也好，感情也好，都不行。因此，恐怕这一回只能下这样的决心。

至于工业方面的技术改造，以及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造，都要注意把各种比例关系安排得适当。所以，速度不能太快了。我看过去是有点性急，用不着那么急嘛！比如钢铁，按照客观规律在一定的条件下，它只能搞那么快，搞那么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能够搞那么多就是那么多，不能太多了。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关厂、并厂、缩小规模和从城市压人员下去的问题。人下去，还要有具体的安排，各部门都要搞，现在就要下大的决心。会不会一下退回去退得太多了？看来恐怕不会退得太多的。即使下去多了，再招起来，我看并不很困难。对于这一方面，有些人还有点认识不足，还舍不得，还下不了这个决心，这恐怕是当前主要的问题。

这几年，我们的成绩还是大的。问题也的确不少，有些地方是问题成堆。如果这次下了这个决心，问题可以解决，我想前途还是光明的。所以，还是那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中间有个中心的问题，总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城市人口下乡。各位同志还可以想些其他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再加上贯彻执行十二条、六十条，农业方面就可以好转。农业方面好转了，工业就可以好转，市场就可以好转。整个国家的情况好转了，才会出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局面。现在我们的心情怎么能舒畅呢？农民不舒畅，工人不舒畅，我们的干部也不会舒畅。

20）在内蒙自治区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8月6日)

这次我到小兴安岭，张广才领去看了一下，看后提了一些问题。到这里我又看了大兴安岭，今天也想提几个问题，请你们答复。我是走马观花，是外行，对这里的情况，你们比我了解的清楚，你们是内行，怎么解决好？你们应当答复。另外，还想提出一些意见，有些是别人的意见，有的是自己的感觉，都不是肯定性意见。我是旁观者，你们是当事人，但有的时候，当事者迷，旁观者清。当然，怎么办，还是靠你们当事人决定。我今天讲话的性质，只是提问题，提意见，供参考，决不是指示，不是硬性的，你们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反对，也可以全部推翻。只有这样，我才敢讲话。

第一个问题：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

这里特别提出要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既要满足国家的需要，又要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而且是多方面的需要，不是单方面的需要。在国家盖工厂修铁路、开矿山等生产建设方面，需要大量的枕木、坑木、包装材，建筑用材；在农村生产方面，也需要大量的木材制造犁杖、车辆、锄柄、刀把等农具；在城乡人民生活方面，家家户户用的水桶、锅盖、擀面杖、床铺、桌、椅、板凳等家俱，都需要木头；修盖房屋和城市烧火用的引火柴，需要量也很大；牧民支帐棚、渔民造船，也少不了木头。人一生下来，就需要个摇篮，以至到死，还需要一口棺材。总之，从生到死，无时无刻都离不开木头。这些多方面的需要，都应该安排，老百姓家死了人，没有木头，拆房子也要做一口棺材，没有引火柴，他们甚至会劈桌椅板凳烧。你们想想，假设你们的父母死了，做儿子的怎么办？一定也是要千方百计地搞一口棺材。以己之心，度人之难嘛！你不给解决他就会把盖房子，造农具的用材改做棺材。当然，现在还不能完全满足需要，所以提了个尽可能的满足，你们是否尽了可能？讲起来你们也尽了你们的能力，还是卖了力，但还是没有尽了一切可能。如山上还有很多小规格用材没有拉下来。问题就是：一方面山上有大量资源，另一方面全国人民又迫切需要，如何把山上的资源和人民的需要结合起来，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地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这就是你们的工作。过去你们作的主要是搞大木头，只满足几种需要，如原木、坑木、枕木，而对人民群众复杂的需要注意不够，能不能既把大木头拿出来，也把小木头和枝桠拿下来，充分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这是一个问题，请你们研究。我在伊春看，主要是铁路运输问题，因为那里的铁路既要运木又要运煤，运不过来。你们这里铁路运煤任务少些，情况可能好一些。当然要把小木头和枝桠都拿下来，有一系列的问题，麻烦得很，是有困难的。但是，困难能不能克服呢？请你们考虑。

第二个问题：调整工资制度与木材价格。

这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有关。现在是既要搞大木头，又要搞小木头，但问题是，搞小木头工资低，搞大木头工资高，小木头价格高，大木头价格低，我想在木材价格方面，可分两种价格：一种是收购价(出场价)，另一种是销售价。收购价按成本和利润规定，销售价则按使用价值规定。收购价应当是小木头贵(因为费工成本高)，大木头便宜(因为省工成本低)，可以把大木头的价钱降下来，小木头的价钱加上去。销售价则反过来，小木头便宜，大木头贵一些。这样势必使小木头不赚钱或者少赚钱，搞大木头多赚钱。大木头应当多赚钱，因为几百年才收获一次，不赚钱怎么得了！就是现在投资造林也得要几百年、至少几十年才能收回。在工资方面，大小木头的采集、运、装的工资应当分别计算，搞小木头的定额低一些，搞大木头的定额高一些。以刺激大家既愿意生产大木头，也愿意生产小木头，有利于生产，符合按劳付酬的原则。现在山上小木头很多，就是不愿砍，即便是砍了的也不愿意拉下来，主要原因是工资制度和价格政策问题。因此是不是把工资和价格调整一下，使工人对小木头，采的愿意采，集的愿意集，装的愿意装，运的愿意运，使工资和价格政策适合生产发展的需要，否则就破坏了生产力。什么叫破坏生产力？就是木头扔在山上。生产关系不适合，就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调整一下，使它适合了，

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森林资源的充分利用，从而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

关于林区木材、木器购销问题，应该是统购统销，只准一个单位去收购，不能由许多单位去收购。是否统一由林业局来收购？商业部门要买，可以通过林业局，由商业部门统销，林业部门也可以销一点。我不反对你们赚钱，就是怕商业等单位都来收购搞乱了，引起林区老百姓破坏森林。

采伐定额有的不合理，如工人反映：大家都不愿意砍“大屁股”木头，因为它费工又出料少，是否可考虑在工资定额上砍“大屁股”树多给钱，使大家愿意砍。同时，采伐定额不应当只按采伐立方米多少来计算，还应当按锯口横断面积计算，林业部可以研究一下。

林区津贴你们一律是33％，上山的和在办公室的，冬季和夏季、晴天和雨天都没有区别，是否应该区别一下？林业局林场所在地房子好，生活好应该低一点，到山上工作的应该高一点。这样，鼓励人们到山上去，要不然都愿意坐在办公室。林业部给你们33％的津贴，你们应当再细分一下，分配得合理。什么吗合理？就是供在山里生产的人多得一些。现在出勤率不高，只有70％左右，出勤时间也不多，一般每天工作六、七小时，甚至工作四、五小时就不干了。计时工资应该按小时计算，不应按日计算。工人有这样的议论：“出工不如不出工，多出工不如少出工。”我问他们什么道理？他们说：不出工发70％的工资，而出工的还达不到定额，也只能完成定额的70％。所以，你们要研究一下，是他们没有努力？还是定额过高了？如果过高了就应当修改。工人有病不出勤应当有医生证明。无故旷工不但不应当发工资，还应该受处分。国家规定是因待料停工才发给70％的工资，而不是发给无故旷工的人。劳动纪律要整顿一下，要鼓励人员出勤。

有的工人讲，住帐棚；冬冷夏热，棉帐棚八千元一个，两年就用坏了。你们考虑是帐棚便宜，还是修房子便宜？这有个成本核算问题。当前国家缺布，成本又高，不如盖房子好。伊春有的工段利用铁路客车住宿，我看很好。现在工段半年一搬家，这涉及到采伐点的安排规划问题，是否可安排长久一点了我感到你们搬家太多，浪费很大，工人也不愿意搬，“搬家三年穷”，而你们一年搬了几次，没采完又搬了。根河就是这样，这里木头没有采完，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我想工段能够定居的尽量定居一下好，如果路远可利用汽车和小火车上班。

你们林区工人平均工资×元，小兴安岭是×元，已经够高了，主要问题是如何调整合理，而不是提高工资问题，特别是实物不够，有钱拿不到东西，现在设法要增加些实物，并实行实物按劳分配，无故不出勤，不仅不发工资，而且吃粮也要少给。

商业部门走后门，你们这里有没有？你们党委要抓这件事。有的地方上山工人买不到雨衣胶鞋，而家属和干部反而买到了。我提议，商店到多少货，要由上一级商业部门贴布告公布，使他们无法走后门。要由职工大会讨论如何合理分配，不能偷偷摸摸。要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多劳多得。特别是现在东西缺的时候多得的不光是人民币，而且要多得实物。要体贴群众，群众才信服你们。工人对走后门写那么一副对联(指会上有人讲，工人写一副对联；走前门样样没有，走后门样样俱全。少管闲事。)你们的威信能高？我不相信。

第三个问题：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

最近几年林业上有些合理的规章制度被废除了，相反的有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却没有废除。两参一改是要改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而不是要改合理的规章制度。因此，过去废除的，合理的规章制度要恢复。例如伐区工艺设计，伐区拨交与验收，检验员由上级委派干部担任，检验打号锤制度等，是不是恢复？我看要恢复。还有过去森工局和营林局是分设的，说有矛盾，合在一起了。结果现在没有人管营林，是否还要恢复？当然不一定设两个局，但是在林业局下面分设两个单位是需要的，一个管采伐的，一个管

营林的。是这样好，还是恢复过去两个局好？请你们考虑。

另外，也有的制度不合理而没有废除，如根河林业局山上据说丢了不少牛马套子拉不动的大木材，若是切断集材要受罚，而丢在山上就不受罚。我看截断拉下来不但不应受罚，而且应当受奖。

现在每立米木材收4—6元的育林费，这一大笔款，你们是怎么用的？应该专款专用，不能拿给林业局修礼堂、招待所。现在用不完的应该积累起来作为基金，放在那里不要动，将来再用，应由林业部、省区党委、管理局掌握起来，不能交给下边分散使用。

机械化问题。新工具是有作用的，但不要机械化，不要马套子，只用人力是不划算的，新工具实际上是手工劳动。机械化水平一定要逐步提高。没有机械化，用牛马也好，可以不用牛马的，也可用冰雪滑道，什么都没有，当然只好用手工劳动。机修力量一定要加强，林业局应当有大修设备，现在技术工人和设备不够要增加，可以由大机械厂抽调一些。学徒工人多，要减少一些。每个林业局都应当有机械工程师和林业工程师，要建立工程师负责制，林业局副局长至少应当有一个林业大学毕业生，林场应当有个中等林业学校毕业的任副场长。工段很重要，实际权力操在工段长手里，他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因此，工段长也应当分批训练一下，使他们懂得林业技术，或者调林业大学或中等林业学校毕业生做副段长。他们负责技术，建立技术责任制。

第四个问题：采伐与更新方式问题

有人说，择伐好，有人说皆伐好，到底那个好？我还得不出结论。恐怕问题不能这样提，这样提，就会有片面性，答复只能是这个好那个不好。我看应该根据地区不同条件，因地制宜的采用，有的可以采取皆伐，有的可以采取择伐，以有利于提供木材，有利于更新为目的。

另外，我出个题目，大兴安岭阳坡为什么不长树？有什么办法使阳坡长起树来？要多研究、多试验，一下子得不出结论来，你们如果五年或十年得出结论来，我就满意了。我在西尼气林区看到，阳坡都没长起树来，而他们又偏偏在阳坡上大面积栽树，好地方多得很，却不去栽。应当在土壤好，坡度适宜，交通方便，容易成活的地方大面积去造林。阳坡可以少栽一点作试验。阳坡长起来就好，杨桦林甚至灌木都好，先长灌木再长乔木，第一步是让它长树，第二步是长好树。

更新是以天然更新为主，还是以人工更新为主？看来大兴安岭天然更新是可能的，小兴安岭的红松，大树一砍，小树就死了，大兴安岭的落叶松，天然更新的幼树长得很好，可见这里天然更新应做为更新方法之一。而且这样大面积人工更新也没有那么多劳力和投资。那么，是以天然更新为主呢？还是提以人工更新为主呢？恐怕还是提以人工更新为主。不然，都不搞人工更新了。人工更新长的快，产量高，采伐方便，一般天然更新的每公顷出材几十立方米至一百立方米，人工更新的每公顷一般可产三百立方米，搞得好可产四百一一五百立米，在带岭，他们讲每公顷可产七百立方米，他们是算了账的，我看了，的确长的不坏。这样，人工更新，一公顷的产量可等于天然更新五公顷的产量，而且其将来的成本也是最便宜的。可能到我们下一代，采伐主要是采人工更新的林子，而不是天然更新的林子，我们不否定天然更新和人工促进更新的说法，但是人往往走容易的路，所以仍要提以人工更新为主，实行两条腿走路。

杨桦树长起来了，也算是天然更新的成功，不要讨厌它，不要不算数，不要在扶育的时候把杨桦砍了，只留针叶树，当然应当主要留针叶树，但杨桦树也应当留一些，这样对针叶树幼树生长有利。

你们应当总结一下人工更新的经验，看来小兴安岭人工更新比你们好，经验比较多，他们那里有成片长起来的林子，你们这里就很少，栽活的不多。你们要总结栽树经验，栽不活要想办法栽活，要有专业队伍，采取包栽包活包成林的办法，工资也可按栽活多少树来计算，如栽活一百棵树，当年给一部分工

资，第二年检查再按活多少给一部分，第三年检查后付清工资。现在是没有专人负责，林场、工段、小组、个人都应当有责任制。天然更新空白点，还要人工来补栽，过密的要间苗，但是要逐渐疏伐，不宜一次伐得过稀。

你们这里封山育林是有成绩的，老爷岭就长得很好，只是阔叶树多一点，长起阔叶树也好，我看了就高兴，你们的荒山没树我看了就不高兴。杨桦树以天然更新为主，栽树要栽松树。次生林也长的很好，应当管起来，进行必要的扶育。

我跟小兴安岭一位打过八十几次山火的同志谈过话，我说火灾是坏处，但火也有积极作用，能否把采伐迹地烧一下。以有利于更新？他说可以，但是以秋天烧为好，秋天下第一次霜的时候，有的草死了，底层水分多，起火也好打，烧时必须有人看着。因此能否组织放火队，变火灾为火利，有组织有准备的去烧？你们可以试试看，但一定要小心，不要出乱子。

第五个问题：林业局体制问题。

现在林业局为基本核算单位，一个局管几十个单位，几万人口，将来还要增加。一个林业局管这么多复杂的事。又管采伐又管更新，人民公社、政府、企业合在一起，管生活，又管政法、商业、学校，管得了吗？你们真有这么大的本事吗？是否可以这样：以林场为基本核算单位，林业局作为一个总公司或公司，进行综合核算。森铁，贮木场，制材场也分别是一个核算单位。林业局对林场实行几包几固定。这是一个意见，是否可行？当然不能一下就变，可先做个别典型试验。

此外，政府和公社是否分出去？政府的事由政府来管，林业局不搞政府那套，光管采伐、更新和木材加工方面的事。人民公社还是搞集体所有制，不一定搞全民所有制了，你们研究一下，没有高度机械化，搞全民所有制有困难，企业用月工资七十元的工人去搞农业怎么能行，成本太高。亦工亦农是不行的，工人搞农业划不来，亦农亦工还可以划得来。

人民公社、政府和企业分开，核算单位下放，事情就好办了。

此外，有的地方把党委也合起来了，党委不管党，而管些具体业务问题。还是分开来好，党委是党委，林业局是林业局。党要管党，也管林业局的方针政策，管群众工作，思想工作。要正确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个制度是好的，过去实行的不正确，现在是要正确实行，在你们林业局就是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局长负责制，实行总支领导下的场长负责制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提支部领导下的段长负责制。军队的政委制到团一级，营连则不同了。

你们农业如何搞要研究。根河有一个工人提机，划一块三千公顷左右的林地，安置十到十二户人家，国家给他们盖房子，给每人开二亩地(其中每人五分做白留地)，给一些小农具，牲口，组成一个小合作社，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搞林业不是搞商品粮，十几个人家有十几个全劳动力，每个劳动力负责约800公顷林地的造林，育林和森林保护，每月发给10一20元工资，他们还可以再开一亩自留地和经营林副业生产，冬天可以帮助林场集材。其所得产品除征税统购的以外，由自己处理。这个办法是否可以试一下，看有没有人干？但是要给他规定几条责任，要他们听我们的话，经常派人去检查，如果违反规定，就要受处分。土地、房屋、耕畜，农具都是国家的，搞不好可以收回。

对林区的农民，是否也可以采取这个办法，给他们开地，贷给他们小农具和耕畜，房屋也可以贷款，或者他们自己建，国家还应帮助，安置一部分农民进林区组成合作社，主要是搞农业，出商品粮，商品菜。逐步解决林区职工粮食，付食品的需要。几年后贷款还清，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即归合作社所有。

在安置农民的地方，也可以考虑安置一些牧民，虽然放牧对农业有点矛盾，但安排得好是可以互相结

合互相促进的。还可以教会汉人搞牧畜业，自己养马、牛、羊，有肉有奶吃，生活会更好些。也可以采取同样办法安排一些手工业者进林区。

这样算一下账，可以需要一笔不小的投资，但也不会太多，至少比林业局用月工资七、八十元的林业工人去造林育林和办农牧场，便宜得多。公家给一点投资，让他们自己去搞来自己吃，本人愿意，国家也有利。

第六个问题：储木场问题。

据说根河储木场有许多木材堆在那里运不出来，有的已经腐烂变质，而山上还在继续砍。所以我建议，储木场保持一定的合理周转量，不再增加，另搞一些预备林场，预备采伐储量，既可避免积压腐烂，又可在山上继续生长。平常采伐先采那些条件困难的产量少的林子，把采、集、运条件便利的好林子，留下来做为第二储木埸(或称预备林场)，一切都准备好，保证随要，随砍，随运。

最后，关于党委领导问题

党委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要管大事，不要管小事，业务工作由林业局长去管。现在有些事，你们还不大清楚、不摸底，我看了两块林子，都说是择伐，实际都是皆伐，不是你们不懂什么叫择伐，就是你们不了解情况，没调查清楚。工会工作要加强，现在工人反映有许多意见没地方提，党委是否开个职工代表大会，解决职工提出的问题，发扬民主，进行选举，真正造成毛主席所说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现在你们这里是否有这种局面，你们自己检查，恐怕差得远吧？

今天就提这些意见，谈了这些想法，请你们考虑研究，怎么办由你们决定，希望把事情办好，不要把事情办坏。

看了这里的情况，比较乐观，原来担心大兴安岭拖拉机集材会引起水土流失，看来问题虽有而不大，集材道有水土流失只要集材后组织工人堵一堵，用工量不大，只要工段长负责即可。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21）关于禁止商品“走后门”问题的谈话(1961年10月22日)

一、关于商品“走后门”问题

刘少奇说：商品“走后门”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现在我们队伍里有一部分人，受到了自由市场的影响。自由市场是资本主义的，现在问题不在有无自由市场，而是你们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阵地。

（当汇报到商业部门“走后门”的情况很普遍，大概占职工的百分之×，其中特别严重的有百分之×时），刘少奇说：这些人是新的资产阶级。你们不反掉这些人，百分之×的人抬不起头来，百分之×不“走后门”的人，也不高兴。对特别严重的，一定要惩办一批。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说，惩办多少人，你们可以分个指标，比如说，象北京五百万人口，惩办十个，天津三百万人口，惩办六个，石家庄市惩办一、二个，小县城惩办一个，全国惩办几百个。惩办时要开公审大会，群众大会，彻底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搞那一行的人，对那一行的东西，可以允许多买一点。比如说，卖热水瓶的人可以允许他们多买一个，卖粮食的人，每月可以多买斤把粮食，卖水果、卖糖的，也可以多买一点，但只限于这个行业的人自己用。你们应该有这样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以外，拿国家的商品作武器，去谋求个人的方便，是不允许的，更不能拿个人“走后门”来的东西，去随便换东西。现在，是国家有困难的时期，也是考验每个工作人员的时候。要向所有的工作人员讲清楚，不“走后门”的人，好的将来可以入党，党员“走后门”严重的要开除党籍。“走后门”的人是和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拿热水瓶换糖，拿糖换戏票，等等，是发国难财，是把困难推给别人，把方便留给自己，还有些人自己并不困难，倒卖国家商品，这种人叫资产阶级分子。如湖南省商业厅有个处长，倒卖自行车，赚了几千元，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坚持搞社会主义的人是不“走后门”的，“走后门”的人是乘国家困难，投机倒把，墙倒众人推，从国营商业内部推，这样就使国营商业变了质。你们有些国营商店恐怕已经不是国营商店了，是资产阶级分子在那里挂帅了。

（当汇报到“走后门”和“开前门”的关系问题时），刘少奇说：有些东西可以适当开些前门。如纸烟要公开规定那些人可买几包，不多买就不算“走后门”。如唐山市汽车司机给商业部门送煤，经常要点东西，是否考虑给司机开点前门，但“走后门”必须严格禁止。国家有困难，可以考验人。商业部门掌握着东西，不“走后门”的是好人，这样的人靠的住，“走后门”的人，是向资产阶级靠拢。河北省张承先的秘书因为粮食困难，河南开封砖瓦厂的一个供销科长，送他二百斤全国粮票，据说该厂里几百人都“走后门”，只有一个副厂长不“走后门”，大家都叫他傻瓜。我看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人。

（当汇报到反对“走后门”，一定要联系在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现在全国对资产阶级搞缓和，我们反“走后门”，势必把关系搞紧张，这个问题怎么处理时），刘少奇说：对资产阶级别的方面松，你们紧，你们对资产阶级也是杀一儆百，对那些严重投机倒把，发国难财的惩办几个，资产阶级也无话可说。

（在汇报到商业系统的队伍问题时），刘少奇说：商业队伍要加强，骨干更加强些。书记处讨论一下，是否调一些人加强商业。商业部门要搞起监察机构来。大企业要专门设几个人，专门查账，查库存，搞企业检查。一个城市要有商业监察机构，小企业可以不设监察机构，几个企业划为一片，按片设监察人员，吃了饭不干别的，专门搞监察。商业部门的监察机关要与群众监督结合起来。我考虑政府还要恢复监察部，和党委监察机关分开。你们粮食、商业、财政各部可考虑恢复监察室，可以和组织部商量一下。中央没搞起来以前，地方可先搞，工厂、商业都可以先搞。

（当汇报到财贸部门加强组织性、纪律性问题也要搞一下时），刘少奇说；三大纪律头一条就是如实反映情况，你们这些人就不遵守。国家商品交给你们厂你们这样搞法，有关国计民生，也是一个考验，是坚持社会主义，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还是按资本主义原则办事？总之，这种人不是搞社会主义，至于他搞什么主义，以后再说也可以。

二、关于农村自由市场问题

刘少奇说；农村自由市场还是要搞下去的，但不是不要管理。自由市场会产生一些资本主义，也会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还会产生一些暴发户。你们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有些人可能发展为暴发户，这无非是多了几个资产阶级分子，即是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也不要怕，无非是再搞他一次。如国营企业变成资本主义，那就决不允许。至于社会上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可怕。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但是我们国营商业内部搞资本主义，绝不允许。如果我们队伍中有人要搞资本主义，那就请他出去搞。社会上有点资产阶级分子也好，这些人积极的很，他们很会钻空子，可以补我们的缺陷。甚至有些人开地下工厂，也不要怕，除了他们骗人以外，他们生产的东西总是人民需要的，是我们的缺陷。他们发现了我们的空子，便积极去搞，那就补了我们的空子。这些人有商业技术，你们要向他们学习，要向老店员学习，甚至于向老批发商学习。

看来资产阶级不是一下子可以消灭的，苏联搞了两次，十月革命一次，新经济政策一次。我们也搞了两次，解放后没收帝国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财产一次，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一次，要最后地消灭资产阶级，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搞多少次。只要我们不搞高薪阶层，社会上产生点资产阶级分子并不可怕。苏联现在是否最后消灭了资产阶级？我看还没有。他们现在有高薪阶层，还有私有制。我们现在也不能说最后消灭了资产阶级。我们对自由市场是网开了一面，只要过几年我们转入主动就好办了。在困难时期，可能产生一些资产阶级分子，这不可怕，但是我们队伍内部绝不允许产生资本主义。

商业部门设监察机构，要双重领导，要加强商业部门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监察工作要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要和职工代表会，消费者代表会结合起来。总之，监察机关要走群众路线，怎么样走法，你们去研究一下。

三、关于提高商业人员的政治水平问题

刘少奇说：要提高商业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水平，恰恰要在困难时期去提高。什么叫提高政治水平？就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你们过去不是讲三大观点吗？我看光讲三大观点还不行。还要有分配观点。你们的机关不是搞分配吗？现在“走后门”不是在分配上出的问题吗？分配工作搞得好，就能促进生产，便利群众。生产是基本的，生产决定分配，分配也反过来影响生产，对生产起反作用，有时还会起决定作用。比如说，在生产关系中，所有制是决定性的，所有制决定分配，但分配正确与否，也反过来影响所有制。纳赛尔那些人搞的是官僚资本，我们的全民所有制搞不好也会变成官僚资本。你们商业部门是否一点缺点也没有？我看商品“走后门”是少数人独占，多数人吃苦，这也是资本主义。你们要把分配业务搞好，使分配适合所有制，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分配业务上的政治观点。

你们讲的三大观点，都要通过分配去实现，但是你们在分配上不研究，不学习，你们本来可以比私商搞的好，但是你们搞的不如私商。

“走后门”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阶级斗争在经济工作上的反映。如果不这样去提，就不会当成一件事去办，就会当耳旁风，你反你的，他走他的。对“走后门”的人，除少数恶劣的以外，一股人不按敌我矛盾处理。但问题的性质要提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上去。你们在全国商业、粮食厅局长会议纪要上没有提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我想改，但没有改，我看不这样提不行。整个社会商品交给你们，结果你们不按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分配，对国计民生有很大影响。要搞出

几个条条来，对特别严重的，要严肃处理。这是对商业工作人员的一个考验。

四、关于工、农业产品交换问题

刘少奇说：明年要力求站稳脚步，以便前进。明年国家手里只有那么多的工业品，你们要考虑怎么运用。

在工、农业产品交换上，农民卡住我们的脖子，如粮食，我们也要卡住农民的脖子，如煤油、火柴、布匹、食盐，化肥、农药、电力，等等。你们要卡住这些东西和农民交换农产品。要考虑取消农村按人口配售商品的办法，农民不卖你农产品，你就不给盐吃，不给布穿，不给农药，不给化肥。现在你们把主要商品按人口配售了，只用次要商品和农民交换，就卡不住农民。明年要改过来，这是明年的大变动，它牵涉到明年和农民签合同问题。斯大林说；“工农联盟，是各为本阶级利益打算盘的联盟”。考虑一下，你们抓住农民什么辫子没有，你们打算用什么武器去打？我主张到农村去卖高价商品，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卖给我们的东西很贵，我们卖给农民的东西很贱，实际上农民占了工人的便宜。今后除和农民交换的工业品以外，卖给农民的工业品也可以高价出售。这是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对农村自由市场进行领导的重要方法之一，既可以回笼货币，又可以稳定农村市场价格。

五、商品分配要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

刘少奇说：城市还保持定量供应，按人分配的制度。有些东西可以试验按劳分配。口粮可以提一部分奖励粮，奖给劳动好的人。手表、自行车可以首先供应劳动好的职工。商品分配抓阄不是政策，几块手表拿到几百人几千人中去讨论那是假群众路线。城市定量供应的商品，以后多了的时候也不再增加定量，多出来的部分，按劳分配，首先满足劳动好的和最需要的人。

现在工业品不足，你们要把所有的工业品都拿到手里，和农民进行交换，对工人按劳分配。国营企业的产品要全部家过来，手工业，国家供应他们粮食，他们要吃饭，就有义务把产品交给国家。

22）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

…………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那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那一个是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例如山东的××、××地区。但是山东其他地区的情形就不一样。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问他们：一九六〇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委、某一个地委、县委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这几年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有那一些？书面报告上写了四条。请大家看看够不够。成绩写了十二条，缺点和错误只写了四条，你们如果认为缺点和错误写得还不够，再加一两条也可以。我们应该实事求是，不够就加，多了就减。

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还有成绩。那么，成绩和缺点那样是主要的呢？恐怕各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每一个省委、每一个地委、每一个县委，都可以自己进行讨论，都应该根据那里的情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加以说明。即使一次判断得不正确，也不要紧，下次再改就是了。但是要加以判断，要总结一下。

总的来说，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我们在工业交通建设上有很大的成绩，在农田水利建设上也有很大的成绩。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在商业、文教，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不能否认这些成绩，不能抹煞这些成绩。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比如河南的××地区，甘肃的××地区。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

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

总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要忘记了。这几年在我们的工作中是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的。一方面有成绩，这是好事，另一方面有缺点、错误，这是坏事。但是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不再犯了，已经改正了，或者正在改正。也就是说，缺点和错误的大部分已经过去了，好象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现在这场病基本上已经好了。比如供给制、公共食堂现在已经不办了，高指标已经不搞了，许多“大办”也停止了，基本建设战线也缩短了，水利建设也不搞那么多了。我们的许多缺点和错误已经改正了。这些缺点和错误改正之后，坏事就能够变为好事。问题是我们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事物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要使坏事变为好事，就缺点错误来说，它的条件就是我们能够总结经验，能够很好地从经验教训中学习。这样做了，缺点和错误就变为好事了。因此，犯了这些错误，也用不着悲观、丧气。这几年，我们在某些方面跌了跤子，而且跌痛了，现在要自己爬起来，把道路看清楚，再向前进。那一个人走路不跌过跤子呢？重要的问题是要实事求是地承认缺点和错误，要总结经验，要善于学习。如果根本不承认有缺点和错误，或者只是枝枝节节、吞吞吐吐地承认一些，又掩盖一些，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倾箱倒箧地承认曾经有过的和还存在的缺点和错误，经验就无从总结，也无从学习，坏事就不能变为好事。这样的人跌倒了，他自己就爬不起来，当然也不能继续前进了。这种人势必陷入被动，势必要在别人的帮助之下才能站起来，才能继续前进。所以，要使缺点错误这类坏事变成好事，必需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十分重要的，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善于学习。

我们这几年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在书面报告上已经说过了。我们犯的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部照着做，没有做好。全面做好多快好省，是不容易的，需要经过若干次的反复，才能做好。

关于我们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的责任，我们在书面报告中讲过，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其次要负责任的是省、市、自治区一级党委，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包括中央本身发出的一些不恰当的指示、文件和口号。

这几年，我们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改正？这在书面报告中也有了说明。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不够。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也没有经验，为什么没有犯严重的错误，而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倒犯了一些严重错误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应该说，在我们取得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利用了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经验和对我们有用的苏联经验，很好地组织和恢复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继续保持着恢复时期的经济秩序。这时，我们党的工作重点放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即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虽然我们也进行了不少的工作，但还不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当时，我们在现代化工业建设工作中，自己还不会走路，只能照抄苏联经验，并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进行建设；其次，就是我们的干部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般地保持了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作风。由于这两条，所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胜利地基本完成，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方面来了，我们对于建设工作，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因此，我们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但是，这时，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是很不够，另一方面，

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都是缺少根据或者是没有根据的，都没有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没有同工人和农民群众，同基层干部和技术专家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在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就草率地加以决定，全面推广，而且过急地要求限期完成，这就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违反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这是我们这几年在某些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由于上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使下级组织发生很大的困难，没有时间去同群众进行充分的协商，没有时间去召开职工大会和职工代表大会、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基层的人民代表大会等，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酝酿和讨论，来发现和纠正我们的错误。到后来，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用电话会议及其他方法进行“瞎指挥”，有时也开些群众性大会，但大都是形式主义地讨论和决定问题，并不能反映群众真实的意见和要求；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这样，就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比外，党内不纯，地富反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利用我们的错误，添油加醋，兴风作浪，又进一步加重了错误的恶果。这些就是我们这几年在工作中发生错误的全部原因。

我们认真地分析了发生错误的原因，我们就会找到改正错误的办法。这就是要经常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经常保持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工作中严格地按照党的、国家的、群众团体的民主集中制办事，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在书面报告中都已经讲了。

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全党的干部，全体党员，以至绝大多数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经验，都有了切肤之痛。饿了两年饭，全体干部、全党、全民都有了切身的感受，这样，以后的事情就比较好办了，许多问题就可以说通了，在思想上，认识上就比较容易取得一致了。虽然我们现在还有困难，而且困难相当严重，但是这些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取得的经验则是长期要起作用的。因此，应该说，犯过这些缺点、错误以后，我们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

在书面报告上，我们总结了十六条经验。这是初步的总结，现在也只能作初步的总结。因为有些事情现在还看不很清楚，等到将来，我们的经济再回升，全部恢复，并且继续前进以后，再来看看，就能够看得更清楚。再过五年，或者再过十年，我们还要作进一步的总结。那个时候，总结出来的经验，就可能不是现在的十六条，也许还多几条，也许少几条，但是一定会比现在总结得更好。

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个问题。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是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该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

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背后活动。他在党内背着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消除，从长远来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彭德怀同志在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自己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大举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同志讲过的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彭德怀同志带领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一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

其次，讲一讲关于三面红旗的问题。

总路线问题。我们过去说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还是说它是正确的，还要继续实行这条总路线。但是，这几年在总路线的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了多快，不注意好省，或者注意得不够。以后要更多地注意好省，要在产品的品种、质量上面跃进。我们要增加产品的数量，但不要单纯地追求数量。今后数量不一定要增加很多，要更多地注意品种、质量，注意配套，使我们能够独立地进行建设，能够自力更生。这件事的重要性，英国人懂得，日本人也懂得。我和我们驻英国的代办宦乡同志谈过话，他说：“英国人怕我们怕得厉害，对中国很恐慌，说我们发展得惊人的快。”我说：“现在我们停下来了，他们该不怕了吧？”他说：“我们停下来，他们更怕。”为什么英国人更怕了呢？因为他们懂得，单靠数量不行，品种、质量比数量更重要，他们怕我们把品种、质量搞上去。一个日本人跑到鞍钢看了一次，也提出了要重视品种、质量的问题。

我们在一九五八年确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完整地说，就是：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总路线，难道是不正确的吗？难道全国人民不要团结起来，不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不要鼓足干劲，不要力争上游，不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吗？绝不能这样。所以，我们说，总路线本身是正确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问题是在我们许多同志执行总路线的时候，没有注意使全国人民真正自觉地团结起来，不是由人民群众实事求是地去鼓足干劲，不是由人民群众切切实实地去力争上游；而只是由少数干部，站在群众之上，命令群众形式主义地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又只注意多快、而不是同时注意好省地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我们说，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是在执行总路线的工作中发生了偏差。我们只要纠正这些偏差，正确地、全面地执行总路线，就会是很好的。

大跃进问题。过去我们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产量每年翻一番，或者每年增加百分之几十，才叫大跃进。对大跃进的正确解释，还是应该按照毛主席几年以前讲过的，就是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毛主席说过：苏联从一九二〇年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到一九四一年德国进攻苏联以前，这二十一年的时间中，他们的钢产量，从沙皇时代原有的四百二十万吨的底子，增长到一千八百二十万吨。也就是说，在布尔塞维克执政的二十一年中，钢的产量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我们是不是可以经过二十年到二十一年的时间，使我国的钢产量的增加，比一千四百万吨更多一些呢？比如，增加一千五百万吨、一千六百万吨、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一千九百万吨，或者二千万吨。如果可以，我们

的发展就不但比资本主义国家快一些，而且也比苏联快一些。另外一种可能性是我们不能增加这么多，不能增加一千八百万吨，或者两千万吨。也许我们只能增加一千四百万吨，或者还少于一千四百万吨，那我们就没有大跃进。毛主席在几年以前提出过：建设社会主义，可以用这种方法，也可以用那种方法。用这种方法，比较快一点，好一点。用那种方法，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比较慢一点、差一点。我们是不是可能实行一种比苏联更快一点、更好一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呢？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是不是可以争取呢？我们说，是可以争取的，可以试一试的。到那个时候，如果争取到了，就是大跃进。当然，如果争取不到，那就证明，没有大跃进。因此，大跃进不能就一个短时期的成绩来解释，比如说，不能就某年增加多少、或者减少多少来解释，而应该就一个历史时期内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来解释。我认为，大跃进还应该继续作为我们全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目标，我们应该坚持下去。

人民公社问题。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这个“一大二公”的特点，从现在的人民公社来看，就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因此，有人就问：这个“一大二公”还要不要？我们说，这个口号用不着取消，还是留一下，过若干年再看。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积累，一方面，它可以自办一些企业来增加积累，另一方面，它还可以抽取一些公积金。将来要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目前，人民公社有一点“一大二公”，兴修了许多已经发挥效益的水利工程，有一些社办企业，也作了一些事情，但是作用不很大，“一大二公”还不大明显，还看不大清楚。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所以，人民公社要继续办。“一大二公”的口号也要保存，将来再看。

书面报告上说，人民公社吸收了初级社和高级社的优点，这句话怎样解释？吸收了初级社的什么优点呢？现在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小队，即生产队，大体上就是以前的初级社的规模。我和农民谈过话，农民对于初级社很高兴，谈起来眉飞色舞。可是谈到高级社，就不那么高兴。我们现在的人民公社是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又实行评工记分，土地没有报酬，对五保户，困难户有补助等等，从这些方面说，初级社的优点我们有了，高级社的优点我们也有了。现在，人民公社只能搞这么多优点。能搞多少优点就搞多少优点，再多的优点现在也搞不成。

我们吸收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本身的优点，来建立和发展现在的人民公社。这样做，人民公社是有前途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人民公社的供给制，现在一般不搞了。原来我们也说，供给制起一种社会保险的作用。现在对五保户、困难户的照顾，也就是一点社会保险。这个还保留。我们曾经普遍办过公共食堂，这是不正确的，现在不办了。但是，自愿结合的农忙食堂，是可以办、应该办的。

有的同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迟几年办是可以的。问题是已经办起来了，群众已经起来了，我们怎么办？是反对它呢，还是赞成它，加以领导，逐步把它办好呢？我们说，还是应该赞成它，逐步把它办好。

还有的同志说：如果人民公社一开始就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那不是更好吗？是的，那会更好，但是做不到。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虽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那时就没有这样的聪明，那时就不懂得这个道理。

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有准备地、有步骤地，有秩序地、有区别地、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并且不断地总结经验。这样，就会比较好些。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也就在这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其次讲一讲清理最近几年的口号问题。

几年来，各个地方和中央都在群众中提过不少的口号。除了正确的口号以外，其中有些是不正确的，有些是部分不正确的，有些是解释得不清楚的。我认为，应该认真地清理一次，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对这几年来在观念上搞不清楚的许多问题，弄得更清楚些。

我现在举几个例子。

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有一个时期，人民日报曾经反对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把这种观点叫做“条件论”，或者叫做“唯条件论”，这也是不正确的。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反对重视条件，不能反对重视客观条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要有客观的条件，还要有主观的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必要的主观条件，都成熟了，都具备了，问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时间、地点，条件。就是说，要具备一定的时间条件、空间条件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条件，事情才能办好。条件是可以经过人们的努力去创造和改变的，但是不具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事情是不能办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就是重视条件的。我们不能反对，也不应该反对重视条件。但我们不是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者。我们认为，主观能动性在符合客观规律性的条件下是能够发挥伟大的作用的。

还有一种“左”比右好的说法。有的同志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好。这里所说的“左”，是括弧里面的“左”。“左”有方法问题，也有立场问题；右有立场问题，也有方法问题。我们是左派，是革命派，但不是括弧里面的“左”派。我劝告同志们，不要作那个括弧里面的“左”派，要作实事求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密切联系群众的、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真正的左派。只有这样的左派，才会经常是朝气勃勃的、其有干劲的左派。不要作那种脱离实际的、脱离群众的、冒里冒失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去蛮干的那种加括弧的“左”派。那种“左”派不会有真正的经常的干劲，他会由一时的狂热突然转入消沉。那种“左”派不但不值得敬仰，而且应该受到批判。这种人就其所犯错误的后果来说，和右派差不多，不见得比右派好一点。有些人在犯了极“左”的错误以后，转过来又犯极右的错误。所以，那种“左”派和右派常常是相通的。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这几年，还有一种用具体的指标、数字来确定是左或者是右的作法。比如说，亩产八百斤就是左派，亩产七百斤就是右倾。这也是不正确的，在这种具体指标、具体数字的问题上，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对于生产技术的问题，也不应该联系到右倾或者“左”倾上去。

比外，这几年搞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很多是一轰而起。有些并没有正式的文件，只是从那里听了点风，听到了一点不确切的消息，就轰起来了。这种方式，是不好的。我们要朝气勃勃，但是在进行工作、开展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逐步推广，要有准备、有步骤、有区别、分期分批地进行。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更应该是这样。这是过去我们在土地改革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这是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上的讲话中早已指出过的。这是那个时期实行土地改革的正确方法。以后，我们开展各种运动，进行各种工作，都要采取这种方式。我们党是有这种经验的。毛主席多次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这是讲战争。在建设时期，是向地球开仗，也要这样。典型试验，小范围里的试验，那是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也要去搞的，目的是取得经验，做好准备，“敢想、敢说、敢做”的那

个“做”，不是说一下子在全国去做，而是指在小范围内去做，先做典型试验。一切经过试验这一条，一定要实行。凡是没有把握的、没有成熟经验的事情，都必须先经过试验，然后才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因此，凡是要通过各省的报纸和中央的报纸，以及广播电台、电话会议、现场会议等等，来推广和造成声势的事情，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要加以控制，不能让报纸和电台自由发表消息和评论。

还有，在水利建设中，曾经提过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由于执行这个方针，最近在一些地方发生了问题。至少，在一些地方是不能实行这个方针的，是不可以这样办的。其它地方也许可以实行这个方针。要继续进行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地加以确定。

我建议，诸如此类的口号，中央还可以再清理一下。各省委也可以清理一下。我建议，关于这个问题，由各地委、各县委提出意见，交给省委，由各省委加以清理，加以解释，写出文件来，送给中央。经过中央批准，再发下去。这些口号的清理，一律要经过中央，各地方不要自行决定。

其次，讲一讲任务问题。

书面报告上提出了一九六二年的生产任务，也提出了一九六三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十年奋斗目标。我们对于十年的指标，只是一个初步设想，将来经过综合平衡后作出的计划，可能不是这样的数字。对于十年的指标，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高了？是不是还要低一点？有的同志说，这些指标不是高了，而是太低了，还应当高一点。我们说，达到这样的指标，现在也没有多大把握。还是先提出这些指标。如果说低一些，那就算是留有余地，以便将来超过。这些指标，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或者还可能差得相当远。这些可能性都存在。还要继续研究，综合平衡。

在这里，我想说一说指标的高低和人民群众干劲大小的关系问题。有一些同志觉得，指标低了，就不能鼓足人民群众的干劲。指标高一点，才能鼓足干劲。指标越高，人民群众的干劲就越大，指标低了，干劲就没有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我看，指标和干劲有一点关系，但是不能这样说：指标的高低，同人民群众干劲的大小成正比例。据我看，指标对于人民群众的干劲不起决定作用。在最近几年中，有过这样的情形：在指标比较低的情况下，人民的干劲起来了。有几次，指标很高，人民的干劲反而落下来了，因为达不到这样高的指标。所以指标应该适当，应该符合实际可能。适当的指标，经过努力。可以完成，还可以超过一点，这样，群众的干劲就会起来，而且能够长期保持。

干劲有两种，干部的干劲和人民群众的干劲。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干部的干劲，而在于人民群众的干劲。单有干部的干劲，没有人民群众的干劲，是不行的。当然，单有群众的干劲，干部没有干劲，也不行。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人民群众的干劲。我们掌握了政权，我们能够开这样的×人的大会，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要有适当的口号，有符合实际的办法，把人民群众的干劲鼓起来，并不是很困难的。问题是在群众的干劲鼓起来以后，要使用得当，不要浪费，要把群众的干劲长期保持下来。这是不容易的。这就必须严格地实行劳逸结合。如果老是“黑夜当白天，月亮当太阳”，搞那么三五天，于劲就没有了。苦战几昼夜之后，干劲就保持不住了。应该使群众长年累月都保持住干劲，都有饱满的情绪。对于群众的干劲，一定要使用得当。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决不要二百人去干，而应当要一百人干活，其余的一百人睡觉，休养生息，睡好了再干。本来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为什么要二百人去干呢？这几年不节省群众的干劲，浪费了群众的许多干劲，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同志们耽心群众的干劲发动不起来，这是目前应该很好地进行研究的一个问题。因为这几年，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受了挫折，在某些地方受了严重的挫折。要把群众的干劲再度鼓起来，我们就必须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并且同群众一起制订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最近几年我们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在人民群众的干劲发动起来后，如何节省地使用群众的干劲，如何经常保持群众的充足干劲，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好好学习。

…………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是在党章和宪法中明白规定了的，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但是，最近几年，由于我们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而且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各种组织手段，去坚持执行这些任务，因而，我们也就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这些组织上的错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首先是有不少的负责人，没有充分地发扬民主，没有把任务提交给群众和干部，让他们认真地而不是形式地进行讨论，并且由他们根据实际的可能作出决定。然后，这些负责人又在群众中和干部中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批评和斗争，混淆了是非，压制了民主，使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心话。这样，党的组织，国家组织和群众组织中的民主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受到了窒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所谓“集中领导”，只能是没有群众基础、违反群众意志的领导。这样的领导，是没有不犯严重错误的。最近几年工作中发生的错误，有许多是同我们没有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有关的。

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这是就人民和人民的敌人而言的。即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只在人民内部实行的制度，不包括人民的敌人。有些同志混淆了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这两个概念，没有把这两个概念明确地区别开来，因此，他们常常用专政的手段，用强制和压服的办法，去对待人民群众，去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而不是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用民主和说服的办法，用服从多数的办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他们不只是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他们对人民群众有时也实行专政。这样，他们就常常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反人民的地位。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是最广泛的民主制，它是包括全部人口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民主，它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又是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在党内，在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中，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也是一种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一种调查研究的方法。当然，实行这种方法，我们仍然可能犯某些错误，因为群众的多数，党员的多数有时也会犯错误，但是，只要我们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就有可能少犯错误，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群众的多数，党员的多数总是比较更少地犯错误，而在更多的时候，总是比较正确的。即使我们同多数群众，多数党员一起犯了错误，也易于发现，易于较早地得到纠正。

现在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在确定任务以前，先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充分地发扬民主，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认真地进行讨论，用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那么，我们就可能不会提出过高的超出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如果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那么，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会通不过，会顶回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使我们能够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例如，亩产几千斤的指标、办公共食堂等，如果让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认真的讨论和选择，那么，他们中间的多数是决不会赞成、决不会通过的。因此，只有在我们既是错误地提出了过高的任务，又是错误地违反了、甚至严重地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情况下，就是说，既犯了某些政治错误，又犯了某些组织错误，在严重的强迫命令的情况下，我们才在一些具体工作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并且使这些错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拖延下来，直到最近才得到纠正。这应该作为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一条重要的教训。

同志们！如果在我们党内和我国人民中不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而是依靠强迫命令行事，那么，我们的党会变成什么党呢？我们国家的政权会变成什么政权呢？我们党同国民党的区别又在那里呢？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又在那里呢？这不会使我们党和国家政权有发生变质的危险吗？因此，我们党和我们国家决不能容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必须迅速地、彻底地加以改正。我们在一切地方、一切部门、一切单位的人民中，都必须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而不能依靠强迫命令行事。

…………

关于党的问题，书面报告中写了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邓小平同志还要专门同大家讲这个问题。在这里，我只说两点意见。

先说实事求是的问题。

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很重要的。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丰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

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有一种人，虽然了解情况，但不敢说老实话，怕说了就要受打击。分明是黑的，他不敢说是黑的。分明是白的，他不敢说是白的。这种人勇气不够，被迫说了些假话。还有一种人，因为如果要实事求是，那就得承认错误，就要作检讨，就要受批评，他怕面子不好看，因而不敢实事求是。至于在经济工作中藏一手，多要一点，少报一点，这种现象就相当多了。另外一种人，为了个人利益，有意造假，有意夸大成绩，有意封锁消息、扣留信件，有意对说老实话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问题，而是一种违法乱纪性质的错误。

过去，有些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吃了亏，而不老实的人却占了便宜。党内的这种情况，使一些干部产生了一种印象，似乎老实人总是吃亏；似乎手长一点，隐瞒一点，说点假话，总是占便宜。这种印象是不正确的，不正常的。在共产党内，在人民群众中，不允许滋长这种风气。要抵抗这种风气，要对这种风气进行斗争。说老实话真的吃亏，说假话真的不吃亏吗？老实人真的吃亏，不老实的人真的不吃亏吗？我看，不怕吃亏的老实人，最后是不会吃亏的，如果说是占便宜的话，他最后要占大便宜。因为老实人吃点亏，党内同志是看到的，人民是看到的。党和人民终究是会要信任这些好同志的。怕吃小亏的“聪明”人，不老实的人，最后是要吃大亏的。因为你总是说假话，长期这样搞，党和人民就不会信任你了。

在这里，对于那些被迫说假话的人，对于这种软弱的人，应该说几句话。毛主席以前说过：为了坚持真理，为了实事求是，为了说老实话，应该有“五不怕”，这就是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准备了这“五不怕”，什么话也敢讲，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刚才不是讲实事求是要有勇气吗？要有什么勇气呢？就是要有这“五不怕”。有了这“五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呢了因此，应该说老实话，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真理。

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应该注意，不要使那些说老实话、作老实事的人吃亏，要信任他们，表扬他们。对于那种说假话、作假报告的人，不要信任他们，要批评他们，必要的时候，要处分他们。只有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采取这样的政策，在党内，在同志中间，那种不正常的印象才会改变过来，才会证明老实人并不吃亏，还占了便宜，说假话的 “聪明”人是一定要吃亏的。我们希望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这样做。如果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不这样做，怎么办？也有办法，我们有这么多的党员，这么多的干部，总会是有办法的。就是说，应该在党的会议上批评这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并且可以作出决议，要领导机关改正错误，执行正确的政策。至于有些人，由于不了解真象，估计错误，说了一些同实际情况不符合的话，这不算说假话。这是调查研究不够的问题。但是，这种人既然调查研究不够，就应该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在了解情况之后，再来讲话。

各级领导机关对于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人，都不允许进行打击。这是党章上规定的。应该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人说完他的意见，即使说得不正确，也不能阻止他讲话。如果他最后仍然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还可以让他保留自己的意见。最近几年，有些党的组织，重犯了过去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的那种过火斗争的错误。凡是犯了这种错误的党组织必须迅速地改正过来，以后再不允许进行这种过火的斗争，而要按照我们党内早已形成的一套正常的党内斗争的方法办事。

…………

23)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安徽大组会上的两次讲话(1962年1、2月)

临时通知我出席你们的会议，明天我还想来，后天我还想来，大会也好，小会也好，听听你们意见。主席讲话你们听了，你们听懂没有？主席讲要建立民主集中制，不充分发扬民主，就不可能集中，不充分发扬民主，人民民主专政也专不好，社会主义也建设不好，要变成资本主义，要变成南斯拉夫。这个问题相当严重。这次会议上反映出两方面情况，一种是不让人家讲话，一种是不敢讲话。用眼色、语气、态度不让人家讲话是很恶劣的，要充分发扬民主，有气出气，不要有话不讲，气出完了就好，在北京把气出完，回去就舒畅。个别人气没出完问题还不大，多数同志这样，问题就大了。曾希圣同志那天在彭真同志那里讲，希望我报告时鼓鼓干劲，假如说参加这次会议的干部，相当多的人气还没有出完，那末，怎么鼓干劲呢？不可能鼓干劲，气没有出完要人家鼓干劲，气就更多。要鼓干劲，首先要出气，要充分发扬民主。在座的有一个同志给中央写了一封信，我没有带来，他说他抱着一肚子希望要把肚子里的意见讲出来，但是现在看来不行了。安徽有些同志肚子里的气没有出完。安徽这几年的工作，有成绩有缺点，成绩好讲，缺点就不让讲，不敢讲，这种情况就不好了。既然有缺点有错误，就应该揭盖子，就应该把盖子揭开，批评缺点错误。成绩当然要讲，以取得正面经验，发生的缺点错误也要讲，不揭盖子，对缺点错误不揭露，不知道是错是对，是什么性质，是什么原因，就不可能总结经验。不充分发扬民主，就不可能总结经验，不充分总结经验，就不可能改正错误。安徽盖子到底揭了没有，揭得彻底不彻底，如果还揭得不彻底，再揭，揭彻底。上午曾希圣同志开会要大家提意见，对省委的意见，对中央的意见，对中央那个部门意见，对中央那个同志的意见，对省委那个同志的意见，都要倾箱倒箧而出，实事求是，有多少说多少，是白就白，是黑就黑。马列主义者有个基本要求就是实事求是，如果不实事求是，还有什么马列主义？如果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还有什么马列主义。因此，我出几个题目大家讨论。

安徽盖子揭开没有？彻底不彻底？如果没有揭开，就再揭，如果揭得不彻底，现在把它揭彻底，如果“透底”，就再补一下。

我在讲话中、在报告中说到这几年我们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和目前存在的困难。……

这些问题到底什么原因，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每个地委要作出判断，每个县委也要作出判断，首先是省委要作出判断，作出估计，与其回去搞，不如在这里搞。今年不搞，明年还要搞，后年还要搞，五十年以后还要讲，这个盖子必须揭。与其迟揭不如早揭。主席说，省委、地委自己不揭，让人家揭也好。到底这几年工业、农业损失有多大，是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是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每个地委、县委都要作出判断。

对于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我在报告中讲了四条，安徽有多少条，那四条能不能够包括你们安徽？在安徽来讲，是多一条二条还是减一条二条，实事求是，是怎样就怎样。

错误的性质，我在报告中说，不是路线性的错误，是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安徽是不是这样，安徽的错误，是路线性的错误，还是不是路线性的错误。××地委到底犯的是什么性质的错误，××的错误不能说路线没有问题吧，××地委是犯了路线性的错误，还是不是路线性的错误。错误的原因和性质，我在报告中讲了，各个地方还有各个地方的原因。

错误的责任，中央有中央的责任，省委有省委的责任，地委有地委的责任，县委有县委的责任。大家讨论这么几个题目。

讨论毛主席的讲话，现在不是讨论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原则，而是讨论如何执行的问题。列宁说过，在

党组织未作决定以前，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不管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都可以讲，在党组织作出决定以后，就服从组织决定，但是有不同意见还可保留，以后开会时再讨论，又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时候，有不同意见在一定的组织里面都可以讲。

是不是根据这么几个问题，在小组中进行讨论。这几个问题，每个同志在脑子里都是有数的。盖子揭了没有，错误的原因，错误的性质，错误的责任，这几个问题，如果说脑子里没有数我是不相信的。是不是就讨论这么几个问题，这样就把问题集中了。这几个问题讨论清楚了，然后再讨论如何办？大家思想一致，然后才能团结一致。你们看，还有什么问题要讨论。

回不回去过春节，现在不管它，总而言之，气没出完，会没有开好，就继续开，中央并不一定要留你们在这里过春节。

在这四年中，我们经过了一个大波折，开始糊里糊涂，现在情况一天天清楚了，对于这些问题，你们就没有想过你们和省委意见就那末一致？省委同志的意见就那末一致？我也不相信。我们中央同志的看法就不一致，我那个报告初稿，大家讨论意见就不一致，以后组织×个人改写了，大家意见才比较一致了，但不是意见完全一致了。我不相信你们意见那么一致，我不相信你们没有考虑，就是没有讲，憋在肚子里面不好，百无禁忌，样样都可以讲。

三改问题到底改得对不对，也可以讨论一下，还能一点没有错。张××的问题可以讨论，到底搞错了还是搞对了，要重新讨论一下。那些界限都要打破。中央总路线都可以讨论，你们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讨论。

刚才两位同志讲了一些具体事情，具体事情也要讲，心里有气嘛！对这几年工作要有一个总的估计。今年不讲，明年要讲，十年以后还要讲。你们心里是有数的。今天大家没有准备不好讲。今天曾希圣同志要你们提意见。缺点错误到底有多大，错误性质，错误责任，这么一些问题。总的来说是中央负责。这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内矛盾。内部矛盾要解决，就是要采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办法对高岗、彭德怀例外，因为他们有小组织、有反党集团。什么叫反党集团？不能笼统的说，凡是对工作提点意见，对第一书记提点意见，不执行某项政策指示就叫反党吗？不能这样说。公开的反对派是可以的，秘密的反对派不许可。对三面红旗不同意，甚至提出自己的路线、纲领都是允许的，但只能在大会上讲，不开会不讲，这不叫反党，公开不赞成中央、省委路线，但不破坏纪律，这不叫做反党。如果自己搞非组织活动，党不赞成你的主张，你就另搞一套，组织一批人，背着中央去搞，这就叫反党集团。王明到现在还不赞成中央路线，他还搞一些非组织活动，但现在了解，他还没有搞小集团，我们还选他当中央委员嘛！总之，不要有什么界线，三改问题不能讲，张××问题不能讲，都是不对的，应该有什么讲什么。

***

同志们：

我到你们这里来有几天了，参加了你们的小组会，找了一些同志谈了话，我的目的是搞清安徽的问题，到底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问题的严重性。搞了这么几天，我算了解了一点情况，了解不多，了解很少，不如同志们对情况了解清楚，但我是局外人，因此可以说，可以客观一点看问题，但不一定看得很准。每天上午下午晚上和你们一道，我总知道一点情况，我自己有我的看法。

我感到安徽的中心问题是省委问题，省委的中心问题是曾希圣问题，这是我的看法。安徽的好事是以曾希圣同志为中心做的，安徽的不好的事也是以曾希圣同志为中心做出来的。曾希圣同志我是清楚的，不仅我清楚，中央很多同志都是了解的。曾希圣这个人，是党内一个很老的同志，在党内做了很多工

作，他的长处我们了解，他的缺点、他的脾气我们也了解。这个人还是要革命的，过去要革命，现在还是要革命，以后还是要革命的；他是拥护共产党的，拥护毛主席的，也是愿意按照马列主义办事的，愿意把事情做好，愿意把安徽工作搞好，他主观愿望是这样，他主观愿望上是革命的，是拥护党、拥护毛主席的，这是我们不怀疑的。

一九五八年以后，想力争上游，曾希圣同志想把安徽工作搞好，结果不是上游，而变成了一个下游，事与愿违，安徽现在这种局面是出乎他自己预料之外的。

…………

今天检讨是有进步，他这样检讨我听到的也是第一次，讲到了家庭出身，旧社会尾巴，背功臣包袱，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独立王国，过火斗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等等。这些东西他都讲了。

曾希圣同志脾气很坏，作风不好，可以说他不懂群众路线，不懂得民主集中制，马列主义懂得不多，毛泽东思想我看也懂得不多。他自己的思想作风有那么一套，他观察问题，有时有些独到，有时看错了，有很多偏见，有很多陈见，我看是这么一个人。工作是努力的，工作上能钻出一点东西。作为一个党员来说，这些毛病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是可以容忍的，但是作为安徽这样一个大的省，这样一个大的党，第一书记是个主要的负责人，有这些缺点错误是不能允许的。问题就在这里。安徽有多少党员呵？三千万人口，×万党员，这样一个大省大党。

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一切要听他的，一切要依他的，不依我的，就反你，打击你，不依则反，或者是不依则打，这是他的方针，一切要照他的办，不管正确的或是错误的。……你也要依照他的讲，不依照他的就要打击你，就要反对你。过去他在一个小范围里也是这样，一定要依照他的办，不然就搞不好。

我看，可不可以这样讲，曾希圣同志在安徽做第一书记，用曾希圣的面貌来改造安徽的党，改造安徽的社会。全省×万党员，都要象他，三千万人民都要象他，就是要按照他的面貌来改造安徽的世界。我看问题的性质是不是这样一个性质。

…………

曾希圣同志个人的毛病、个人的错误是可以原谅的，现在问题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他把安徽这么一个大党、这么一个大省的问题，要掩盖住，这就不是他个人问题，这就变为政治问题了。他已经把安徽党，安徽社会搞得有点象曾希圣的样子，许多作风象曾希圣的作风，只能说好的，不能说坏的。曾希圣的毛病我老早晓得，安徽党有什么毛病，安徽工作有什么毛病，我就不知道，你直接封锁，直接对抗，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这是三千万人民、×万党员的问题，怎么能允许？

不让别人过问。安徽也是共产党的天下，别的地方的共产党员，江苏的、河南的、江西的共产党员，跑到你们安徽来对工作有所评论，他就不让你评论；这次中央来评论他也抗拒，我来他也抗拒，华东局来不会更客气的。从这一点来讲，封锁中央是长期的。对下一切都要照他的办，曾希圣同志说，下面对他也封锁，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封锁曾希圣，你们敢不敢，你们也象搞×××一样赶他走，我看是不敢的；对下一切都要照他的办，对上有他的一套，不许中央干涉他的内部事务，从这一点讲，有独立王国性的。是不是个野心家，是不是反党？我相信曾希圣同志不会搞这个事情，你说他不是有意识的么，是有意识的；你说他反对党，反对毛主席，走资本主义道路么，也不是，从这一点讲，有某些不自觉。曾希圣同志马列主义觉悟不很高，他不懂得团结大多数，不懂得跟各种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很多干部受到他的抛评和打击，有几个案子，×××、×××、××、××，×××，这只是几个人，这儿个人下面还有一大批这些案件，曾希圣同志自己也讲了要重新审查，根据现在的观点，大家的认识，重新审查。

中央准备派人到安徽，华东局也要派人去和省委一起审查、研究这些案件。受过处分、批判、打击的人，需要重新作出结论的话，可以重新作出结论。

安徽这几年工作是不是有成绩呢？一点成绩也没有，尽是缺点、错误，恐怕不能这样讲，成绩还是有的。有人说工业方面成绩多一点，农业方面成绩少一些，恐怕农业方面一点成绩没有，也不能讲，某些地方还是有的，这些成绩包括水利、河网化，还是可以利用的；三改大家意见好象损失大，收获少，这个结论可以这样，恐怕也不能说一点成绩也没有，某些地方还是有点成绩的。三改损失是大，将来怎么搞，是不是还要搞，搞多大，要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按照各个地方的情况作出判断。

安徽整个来讲，是成绩多，还是缺点多？这些损失是怎样引起的？是天灾为主，还是工作中的错误为主？这是过去的事情，你们回到安徽以后，还可以讨论，作出判断。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今年可以讨论，明年可以讨论，再过几年还可以讨论。我们党的历史上犯过几次“左”右倾路线错误，直到一九四三年，中共中央才作出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历史总是可以修改的，联共党史，斯大林写过，现在不是修改了。中国过去有二十四史，现在不是又在写历史嘛。

不要纠缠在过去历史问题上，而耽误当前工作，要向前着，不要向后看。要总结经验，可以经过讨论作出结论，但今年作了结论明年可以再修改，后年再修改都是可以的。

…………

安徽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本来其他地方也发生的，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高指标、瞎指挥，各地都有，问题是严重程度不一样，有最严重的，有次严重的，就是有些比较好的省，比较好的县，也还是有问题的，比较起来说，安徽是最严重的省分之一，安徽问题的严重不比××、××、××、××更好一些。特点是什么？别的地方揭盖子早，安徽省委不肯揭盖子、到中央来开会还不肯揭盖子。别的省早揭盖子也不是省委自己揭的，是中央去人的，要有外力才行。安徽的问题我们老早知道很严重，我们等待安徽同志自己揭，有这个希望，并和曾希圣同志谈过，要他把盖子揭开，实事求是，总结经验，直到这次和曾希圣同志谈话还是这样讲，不要以为自己什么都揭了，可是谈了还是不行，这个盖子揭不开。问题这么严重，时间这么久，脑子想到一边去了，这个任务没法完成，只有施加外力，由别人揭，就不爽快了，就被动了，自己揭就不被动了。犯了错误是不是能改正，就看自己能不能揭开，不敢揭开就改正不了。

安徽的问题，我向党中央作了报告，有的时候××也参加了。中央决定将曾希圣同志调动工作，曾希圣同志检讨时也讲了，要求中央把他调离安徽，中央接受他这个要求。曾希圣同志离开安徽，我们相信曾希圣同志是革命的，革命什么地方都可以，为什么一定要在安徽革命呢？有的同志在这个地方出了毛病，换一个地方去发挥你的革命性。中央决定派李葆华同志到安徽当第一书记，代替曾希圣同志。安徽其他同志不动，中央还准备调几个同志到安徽去工作。我相信你们会和李葆华同志合作，李葆华同志能力没有那么强。这么大，那么利害。这个人比较和气，好和他讲话，不打击报复人，不会作假报告，你有不同的意见可以和他讲，这个人有民主作风，好处就在这里，至于出主意，作决断，要你们大家帮他忙。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和尚三个帮，人家不帮那就不成。荷花虽好，要绿叶扶持，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曾希圣同志就是这个缺点，和三个臭皮匠不能合在一起，合在一起，也是别人做老鼠他做猫，这是非正常的党内关系，也是非组织关系。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就是民主集中制，所有共产党员都是平等的，大家都可以发表意见，有不同意见可以自由讨论。曾希圣同志不懂得这一条，特别是和他意见不相同的，他不允许。这一条很重要，李葆华同志有，今天是不是夸早了。葆华同志，你到那里不要打击人，不要做假报告呵，如果你象曾希圣那样，那我今天讲话就夸早了，葆华同志缺点是在决断的时候需要人帮助。

会议开到这里，安徽发生这些严重问题中央有责任，不能全部推到省委身上、曾希圣同志身上，中央要替省委和曾希圣同志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很多事情是中央提的，人民公社、大跃进、高指标、食堂、供给制都是中央提的。那时候别的省都搞，安徽不搞也不行。就是三改，曾希圣同志也报告过中央，中央同意的，责任田报告过中央，同意他试验的，不过没有讲在安徽普遍推广，只讲在一个地委范围内试验。就是×××、×××、×××这许多案件，也是中央批准的。凡是安徽省做错了的事情，安徽省委要负责任，曾希圣同志要负责任，中央也要负责任。你们要向下面讲，不要怕说中央有错误，那有中央不犯错误的？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王明犯过“左”倾错误，不要怕讲了损害中央威信。这样讲不会丧失威信的，实事求是，中央靠这一条吃饭，曾希圣同志不靠这一条吃饭。实事求是受打击也心甘，说了假话受打击那就不值得了。是中央的责任就是中央的责任，是省委的责任就是省委的责任，是曾希圣同志的责任就是曾希圣同志的责任。你们地县委就没有一点责任吗？你们没有出一点主意，你们没有“左”一点、右一点？你们有你们的缺点，要实事求是。我们说地县委以下责任小。在省委责任主要是曾希圣。今天告一段落，不作最后结论。

你们回去是不是再开会？你们回去要把当前工作做好，抓当前工作，过去四年工作总结，等你们把春耕工作抓得差不多了再召开常委会，作点准备，然后召开地县委书记会议，开个十天半月，搞出一个文件来。

×××那些案子，中央派人帮助审查。

是不是暂时放下，因为这是过去四年总结。同时，这次会议上主席讲话和报告你们没有很好学习，主席说没有充分民主，就不可能集中，没有充分民主，就不可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在讲话中也说，要恢复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老章程，这几年把党的老章程破坏了，要恢复起来。这些讲话都要学习一下。

四年总结，明年后年还可以讨论，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等了十年才做了总结，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遵义会议后，我们暂不讨论三次左倾路线问题，做好工作，到抗战后期才进行二年半整风。作出总结。总之不要纠缠在历史问题上，但省委同志要把档案历史材料保存好，包括曾希圣同志在内，不能销毁档案，将来拿出来作总结。那时自己看一看，别人看一看，都有好处，不要把那些东西烧掉了，那些东西本来不是好东西，可是过后能总结经验，能吸取教训，不好的东西，能变成好的东西。

首先要抓当前工作，而后再总结经验，如果现在不抓当前工作，也要犯错误。省委工作由李葆华去，另外还派几个同志，根据这次中央扩大工作会议精神好好团结起来，改正错误，克服当前困难，争取今年农业丰收，工业也有更多的增产。在党内党外，能造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一个县要有这样局面，一个地委要有这样局面，党内要有这样局面，群众中要有这样局面。有了这个局面，经济文化建设工作才能搞好。这种局面形成不好，就不会有干劲，只有纪律没有自由，只有集中没有民主，那你怎么争上游？这是一个关键。在人民群众中、在党内都要充分发扬民主，这样才能团结最大多数干部和群众，做好工作。小平同志说还是有上游可争的，有实事求是的上游，有发扬民主的上游，有很多上游。

希望你们一心一意和李葆华合作。

我刚才有几个问题没有讲清楚，要按照自己面貌改造世界，首先要改造自己。毛主席说，首先要做群众的学生，然后才能当群众的先生，先生教训你学好，教训你把毛病去掉，学好作风。改造世界就是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提出任务、办法，取到群众同意。然后去干。不断改造自己、不断改造社会。一方面是我的面貌，另一方面又是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面貌。要把劳动人民的觉悟水平提高到党的水平，以共产党的面貌改造世界。曾希圣同志有个坏习惯，主席、总理和我都找他谈过，但是改不了，是顽固

的，如果他自己面貌不能改，他改造人家就要走样子，不象马列主义样子，不象毛主席样子，而成了自己哪个样子。如果没有很好的马列主义修养，不很好的学习，是改造不好的，改造出来就不象无产阶级的长相乙解放初期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一进城，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搞平均分配，要按照农民样子来改造社会。

曾希圣同志刚才检讨了你那个脾气不好，这个脾气改不好，还要犯错误，可以改，黄岩同志那天说他保证你能够改，我不大相信，但是我承认你是能够改的，可以改的。

24) 在第十八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3月21日)

我们现在开会。文件有些人还没有看完，可以带回去再看，一下看不那么清楚，要慢慢研究。

今天开一个最高国务会议。邀请参加的人比较多。就是讨论第二届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应当怎么开，应该讨论的主要问题；同时要讨论一下我们国家当前应该采取怎样的一些方针、政策。我想首先讲一下这个问题。

毛主席出去了，等几天才能回来。他交代，不要等他，最高国务会议也不要等他，人民代表大会也不要等他，我们先开，开的中间，他再回来。

这次人民代表大会，隔得时间相当久了，去年没有开，过两年了，现在才开。为什么人民代表大会等这么久没有开呢？说老实话，就是包括我们在内，情况还不那么明了，不那么清楚，不好开，开会不好讲话，提不出什么确切的东西。现在情况有些已经明了了，但是，现在还有些不十分明了，还没有切实的把握。有把握就是有把握，没有把握就是没有把握，明了就是明了，不明了就是不明了。因此，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今年的预算，还不能照往年一样，提出那么一个东西。大概我们的总理、付总理还要讲一讲计划问题和预算问题，但是还提不出象往年那样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报告。这是我们这次会议等这么久没有开的原因。

现在很快就要开会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议程，讨论的中心问题就是要估计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总结十二年来，特别是最近四年(从一九五八年到现在)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当前的任务。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中央讨论过，不只是中央讨论过，而且开了一个×人的中央工作会议，在那个×人的大会上也讨论过了。×人是些什么人呢？有各中央局的人，有各省、市、自治区的人，有各地委的人，有各县委的人，还有各部门、各企业的人，还有人民解放军的人参加。×人的大会，其目的，也就是讨论这个议程，估计当前国际国内的形势，总结十二年来，特别是最近四年来的经验教训，确定当前的任务。

在这次×人的共产党中央工作会议上，发扬了民主，展开了批评自我批评，让人家讲话，有什么话都讲。不是曾经有一个时期不让人家讲话吗？这个会就大讲一番，首先批评中共中央，其次才批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面地委、县委暂时不批评。……我今天首先讲一讲我们中共中央这样一个大会，中共中央内部所讨论的一些问题，一些意见。

首先是我们国内的形势。

我们国内的目前形势，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国内的目前形势是一种什么形势呢？我们应该承认，应该说，我们目前在经济方面，是存在着相当大的困难的。这是大家都感觉到的。

…………

这种形势的出现，是出乎我们许多人的意料之外的，以前没有预先想到。是不是各位都想到了？难说。我们是没有想到的。我们原来以为，这几年还会有跃进，现在不但没有跃进，不但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这种形势，我们是不是应该承认呢？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应该承认这种情况，这是事实。

从经济上来说，目前我们不是大好形势。不是讲大好形势吗？现在是不是还是大好形势呢？从经济上讲，不是大好形势，而是存在着严重困难的形势。经济是基础，基础有严重的困难，那么，在其他方面，势必也是困难的形势了。但是，我们应该认真地说，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党内，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各民族的人民群众，还是团结的，并没有因为这种严重困难，我们就散伙。大家今天还来

开会，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对付这种困难，从这一点上讲，我们还是大好形势。但是，从经济上讲，不能这样说。我们是有困难的，而且困难相当严重。最困难的时候，大概是一九六。年、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现在比以前好一点，但是现在的困难还相当严重。

为什么出现这种困难的形势？原因是什么？这就是问题了。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连续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我们中国历史上常常写着有连续三年的大旱，这件事情我们没有碰到过，现在我们碰到了。因为这一条原因，因此农业减产，工业减产，发生很大的困难。但是，不只是这一条原因，另外一条原因，就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这四年中间，我们在工作中间有不少的缺点、错误，由于这些缺点、错误，引起损失，造成我们现在的困难。这两条原因合在一起，困难就更大了。

又有天灾，又有缺点、错误，这两条原因，那一条是主要的？天灾是主要的，还是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各地的情况不一样。有些地方，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比如，我到湖南的宁乡和长沙的乡下去过，我问农民困难的原因是什么？农民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农民跟我讲，天灾不是没有，是有的，但是，仅仅是天灾，还不会这样，再加上人祸(他所谓“人祸”，就是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所以，就发生这么大的困难。后来我又查了一查，农民讲的话大体合乎事实，是真的。我只到过湖南的两个地方，是不是湖南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我就没有去查，听说湖南其他地方这种情况还不少。各地方的情况不一。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的，例如山东的××、××专区，河北的××专区，那天灾是主要的，是一种毁灭性的天灾；有些地方天灾就不是主要的。现在总起来讲，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所引起的。现在总起来讲，不要确定那一方面是主要的。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各地方的同志讲，我说，你们各地方可以自己去作出判断，每一个省，每一个地委，每一个县委，根据你们那里的情况，你们自己去作出判断，是天灾是主要的，就是天灾是主要的，是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就是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的，实事求是。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所引起的困难程度不小，应该说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各地方的情况不一样。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也有各地方的同志参加，也可以由各地方根据各地方的情况讨论一下。

这几年，我们工作中间有一些什么缺点，犯了一些什么错误呢？最近我们共产党的会议上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总结起来，大体上有这么四条：

第一条，从1958年以来，这几年，工农业的生产计划指标定得过高了。农业指标过高，工业指标也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基本建设搞得太多了。盖工厂，搞水利，起房子，看来也是好事，但是搞得太多了。因此，就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的现象。我们在农业上犯了一种高估产、高征购的错误。这几年，我们对农业产量估计过高，说农业生产上去了，粮食也很多，于是征购就多了，这就发生问题了，买了过头粮，其他东西也有些过头的地方，如买猪、买鸡蛋等等。进行了一些不适当的“大办”，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大办交通，还有什么大办，很多大办，有很多大办不适当，有些事情就是要办的，但是方法也不适当。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交通等各方面，都犯了一些瞎指挥的错误，科学上也有，乱指挥一气，农业上乱改耕作制度。水利建设，有些是建设得好的，有用的，有一些建设不但没有益处，而且有害，建设了一些无益而且有害的水利工程。工业上任意废除规章制度，推广了一些不切合实际、违反科学的技术措施。因此，工业上有些设备受到了损坏，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下降，不少的工业有这种现象。

第二条，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间，许多地方，在一个时候，混淆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应该是有界限的，应该分清楚的，他把这个界限混淆起来了。在集体所有制内部，也进行了一些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过渡。有许多地方急于由生产队的所有制过渡为公社所有制，有些地方就是急急忙忙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这就违反了按劳分配、等

价交换的原则。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这是社会主义整个阶段必须遵守的原则，但是这几年，我们违反了这两个原则，犯了一平二调的错误，就是犯了刮“共产”风的错误以及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无代价地把农民的东西拿来，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农民。在城市里，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的错误。商业方面的供销合作社本来是集体所有制的，手工业合作社本来是集体所有制的，一个时期就把它改为全民所有制了。这是在所有制方面，我们犯了这些错误。

第三条，我们曾经在一个时候讲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因此，就把权力往下放，中央就放到各省、市，自治区，省、市、自治区再往下放，放得过多、过散了。因此，分散主义倾向有了滋长，各搞各的，不听调动，你那里要搞，他那里也要搞。因此，就发生了许多违反中央政策和国家计划的现象，经济生活中的集中统一领导受到破坏，全民所有制也受到损害。本来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财产属于全民，属于整个社会，产品也归国家支配。全民所有制不是地方所有制，不是县所有制，不是专区所有制，不是部门所有制，不是省所有制，而是全民所有制，委托给你那个省管，委托给你那个县管，委托给你那个部门去管，你要管好。有些地方把全民所有制分隔了，你归我管就是我的，我就不给你，产品就调不动，他先用了。这对全民所有制就是一种损害，发生了这种分散主义的现象。

第四条，有一个时期，我们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了，对建设的发展要求过急了。因而，城市人口就增加过多。……因此，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业发展速度，跟我们目前的农业生产水平不相适应。我们有许多企业单位、事业单位也增加过多，最近几年大发展，工厂也开多了，事业单位也多了，什么研究院，各种事业单位，搞了很多，就要人，架子大了。因此，职工人数增加过快，非生产人员比重加大了，浪费劳动力的现象很严重。党政机关比过去更加臃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就比以前更多了。

总起来说，我们犯了这么四条缺点、错误，看够不够。你们如果说还不够，再加几条也可以，有多少就说多少。横直有了这四条也差不多了，再加几条，虱多不痒，无非是那么多，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实事求是。

我们有这么许多缺点，许多错误，有困难，但是，我们不只是有缺点、错误，不只是有困难，我们还有成绩。我们不应当忽视当前的困难，不应当隐瞒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隐瞒缺点、错误不对，但是，我们也不应当，或者说尤其不应当否认工作中间的成绩，抹煞成绩也不对。事实上，开国十二年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十二年以来，我们国家的面貌，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都是事实，总不能说没有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不是小，而是很大，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总是事实嘛。建立了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先进的经济制度已经确立了。不能说我们现在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占优势，而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占优势。我们有了比较发达的工业。过去，我们中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没有什么，现在我们已经有了比较发达的工业。过去我们中国基本上没有重工业，现在已经有了部门比较齐全的、基础比较雄厚的重工业，汽车能够造了，飞机能够造了，拖拉机能够造了，大炮能够造了，各种工业设备都能够造了。多数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各民族之间，建立了相互合作、相互帮助的新型的民族关系。除开个别地方、比如青海那个地方的民族关系就搞得不好，多数地方的民族关系还是好的。我们国家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他们的思想水平、政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大多数在政治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全国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在国际，国内的许多重大事变中，经受住了反复的考验。这几年算是一种考验。国际上大反华，国内经过大跃进，经过这样的困难，这是一种考验，经受住了。工农联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巩固了。这就是说，我们的朋友经过了考验。越在这种困难的时候，越是个考验。顺利的时候是朋友，那当然是朋友，顺利嘛，在困难的

时候还是朋友，这就不容易啊。我们总记得这一条。不是利用我们的困难来扯后腿，而是比较合作，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克服困难，这是经得住考验的。在困难的时候更需要朋友，我们也需要朋友。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形势是好的，是有成绩的。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有了根本的改变，我们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所以，十二年来，我们国家的变化是很大的，我们国家所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是做得很不错的，是有成绩的。但是，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事业，不是一个短期的事业，现在还只是一个开端。这个开端，应当说，还是一个好的开端，不是一个不好的开端。这是从十二年来讲的。

…………

一方面，我们有成绩，另一方面，我们又有缺点、错误。成绩和缺点、错误，那一个是主要的？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到底是成绩大，还是缺点、错误大？我们讲，总的说来，这四年(从1958年以来)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位的。到底多少？看是不是可以来个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错误。是不是可以这样讲？这是一种大体估计，没有那个去算。但是，各地方的情况也不一样，有的成绩大，有的缺点大。

我们经常讲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现在这个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是不是到处可以适用呢？恐怕不能到处那么套，不能到处适用。有一部分地方还可以适用。有一部分地方，工作搞得好，年年增产，缺点、错误虽然有，但是小，是一个指头。有一部分地方，还可以说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成绩是九个指头。但是不能到处都这样套。也不适用于总的情况，总的也不是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关系。刚才我讲三七开，三个指头对七个指头，看是不是可以?还有些地方，三个指头对七个指头也不行，而应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在那些地方，应该说，缺点、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也不能说一点也不没有，也有一点，但三七开站不住。各个地方也不一样，各个地方可以自己去作出判断。先去判断一下，判断得不正确不要紧，明年、后年再来判断。算作过去了的事情，算作历史情况，现在来估计，一次割断不正确，再过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七年、八年再来判断，可以多次总结的。

总而言之，这几年的经验教训，我们不要忘记了。1958年以来，我们的经验教训很重要，绝不要忘记了，要好好总结，好好学习。一方面，我们有成绩，这是好事；另一方面，我们又有许多缺点、错误，这是坏事。但是，现在这些缺点、错误大部分已经停止了，不再犯了，已经改正或者正在改正，就是说，这些缺点、错误大部分过去了，并不是现在还是这样。比如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病基本上好了，现在只是一个恢复的问题了，就是身体还没有力气，要复原。比如公共食堂我们不搞了，供给制我们不搞了，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我们也不搞了，许多“大办”我们现在不办了，停止了，基本建设战线我们也缩短了，不搞那么多了，水利建设也不搞那么多了。就是说，许多缺点、错误已经改正或者正在改正，大部分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了。在这些缺点、错误改正以后，就有可能使坏事变为好事。问题是要我们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事物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的。我们这些缺点、错误，这也是一种事物，它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就是说，要使缺点、错误这种坏事变为好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要一定的条件。条件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善于学习，善于总结经验，改正了，有了经验了，坏事就变为好事了。因此，我们犯了这许多缺点、错误，用不着悲观，也用不着丧气，努力学习，努力总结经验教训，以后做好嘛。悲观，丧气毫无用处的。一个犯过错误，有过许多缺点的人，他又改正了，北那个没有犯过错误的要好。他没有犯过，他还得犯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吃过很多苦头。我是到苏联去过的，他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我在莫斯科。那时，他们的困难比我们现在的困难还严重，根本没有烟抽，那里还有茶吃啊。我们也曾经想过，他们犯过的错误，我们可以不犯了吧。现在看来，人家的经验是人家的，你还没有经验，你要搞，你还得犯，你要犯过，要有亲身体验，才能变为自己的经验。有许多事情，要亲身经过以后，才能真正懂得。

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我们说，现在不是路线错误，不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错了，而是在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政策、具体工作中犯了错误。等一等我还要讲一讲总路线的问题。

犯这些缺点、错误的责任，什么人负责？如果要问，出了这样大的乱子，人民饿了饭，东西少了，工农业减产，谁负责呀？应该问。我们应该说，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负责，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你们没有责任，或者有也很少。共产党首先负责，因为他是领导党，一切主意，很多事情，都是他搞的嘛。那么，在共产党内部又是谁负责任？共产党这样大，一千七百万党员，你去找谁呀？……首先是中共中央负责，其次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要负责，再其次才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责任应该这样看。所谓中共中央负责，这就包括中央的各部门，也包括国务院，国务院的一些部门。就是说，中共中央决定的某些政策，发出的某些文件、指示等等，有些是不适当的，有些甚而至于是错误的，或者说有些是部分错误的。

工作中间发生缺点、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发生这些错误？而且某些错误拖延了相当长的时期不能改正。公共食堂办了这样久，还要办，不能很快的改。基本建设战线进长，搞了几年。某些错误拖延了相当长的时期不能改正，为什么？我们说，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经验不够，因此，在工作中间犯一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讲，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没有经验呀，为什么第一个五年计划没有犯严重错误，到第二个五年计划又犯了严重错误，又是什么原因呀？这个问题提得相当可以。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这么说：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们利用了根据地的经验(我们在根据地里面搞了多少年，也要搞饭吃，也搞商业，也搞工业，也要搞经济工作)，也利用了苏联对我们有用的一些经验，很好而且很快地组织和恢复了我们国家的经济生活，三年就恢复了。那个时候，有些人觉得出乎意料之外，比如黄任老就说，你们拿了上海，不晓得你们怎么办。料不到我们到上海以后，还把上海搞得这样，工厂还可以开工，人民还有饭吃。那个工作，我们还算是做得不错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基本上还是保持了恢复时期的那种经济秩序。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党的、国家的工作重点不是搞社会主义建设，不是搞建设工作，重点是搞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也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做了不少工作，但还是边改边建，还不是我们党的工作重点，也不是国家的工作重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一方面，我们对于建设工作没有经验，象小孩子一样，自己还不会走路，只好靠人家，照抄苏联的经验，又是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来进行建设；另一方面，那个时期，我们党的许多干部一般地还是保持了实事求是和谦虚谨慎的作风。因为这两条，所以，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没有犯严重的错误。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不是严重的错误。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情形就不同了，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已经基本上胜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就变为我们党和国家的重点工作了，重点转移了，重点是搞建设工作，这个时期，我们对建设工作就开始有点经验了，同时，这个时期，我们也想按照中国的特点来进行建设，要学会自己走路，因此，就根据中国的情况，中国的特点，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和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同时并举的方针。但是，这个时候，一方面，我们的建设经验还是很不够的，另一方面，我们的不少负责同志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的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间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因此，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没有经验，倒没有犯严重的错误，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有了一定的经验了，反而犯了严重的错误。基本原因大概是这样的。这个时期，我们调查研究不够。中央的同志，省的负责同志，自己不去亲身作调查研究，只是听汇报来了解情况，而且轻信那些汇报，人家一报，我们就信了。但是人家的汇报，有许多是浮夸的，不符合事实的，或者是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我们就相信了。又没有很好地同群众去商量，没有很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经过大家通过，也是简单的通过，不是详细的通过，真正的同意，真正地跟党内外的群众好好商量，就犯错误了。我们的许多高指标，都不是从群众中间来的，是上面定的；拿到群众中间去，又没有很好地听群众的意见，他们的不同意见又不好好听，因此，有些缺点、错误就不能很快地发现，不能很快地改正。有些地方，就是完全依靠命令办事，用电话，开电话会议，来瞎指挥。有一个时期，开群众性的大会，也是形式主义的。讨论问题，不决定问题，没有真正地讨论，不能反映群众的真正的意见。同时，在这个

时期，有一段时间，在党内，在群众中间，又进行了一些错误的过火的批评斗争。这样，就使得群众和干部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有意见也不敢讲。这就严重地损害了民主集中制，上下不能通气。因此，工作中间即使有了错误、缺点，人家知道也不告诉你。因此，缺点、错误就长期不能发现同改正，到事情差不多相当厉害了才知道。此外，也有党内不纯的问题，我们党内也不那么纯，一些坏分子钻到党内来，党内有些人蜕化变质，本来犯了错误，他们又加油加醋，兴风作浪，搞得更厉害，使有些错误的恶果进一步加强了。我看，这就是我们这几年犯错误的原因。一共八条：第一条，经验不够；第二条，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第三条，违反实事求是的作风；第四条，违反群众路线的作风，第五条，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恐怕这五条是基本的。还有第六条，依靠强迫命令办事；第七条，党内和群众中间的过火斗争，使人家不敢讲话；第八条，党内不纯，思想作风不纯，组织不纯，他搞得更坏，对人民不负责任。有这样八条，我看就可以了吧。你们想有什么原因？你们说还要加几条也可以。

我们认真地研究了犯错误的原因，那么，我们就可以找到改正错误的办法。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我们犯错误的时候，也是老老实实地犯错误，改正错误的时候，也是老老实实地改正错误，不是假的。缺点、错误应该揭露，不应该掩盖。不揭露就不能改正，一揭就通了，还要隐瞒、掩盖，那就不行。别人不揭，我们自己揭。这几年，我们实在做了些蠢事，人家不骂，我们自己应该骂，自己应该揭：我们应该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真理应该坚持，不是错误，我们不能检讨，因为它不是错误，它是真理，为什么要检讨，为什么要说它是错的？是错误，必须改正。因为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也没有不犯错误的党。那里一个党不犯错误呢？那里一个人不犯错误呢？不过错误的大小、时间的长短不同，还有一个犯了错误承认不承认、改不改的问题。孔夫子也讲：“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有过，人家都看到，如日蚀、月蚀那样，“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大家就敬仰。我们就实行这一条。列宁也讲过这一条，他说，犯了错误，认真地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犯错误的环境，找出改正错误的办法，这是一个郑重的、对人民负责的政党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我们党是不是合乎这个标准？我看，我们应该合乎这个标准。有错误，就承认，就改。是缺点就是缺点，不是缺点就不是缺点。不能把黑的说成白的，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有缺点、错误，要让人家讲，让人家批评，自己也应该讲。不让人家批评缺点、错误是不对的。孔夫子还讲过一句话：“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我们现在正处在这种情况。有了过错改不改呀？如果能够改，就“善莫大焉”；不能改，我看就是恶莫大焉。我们同蒋介石不同就是这一条。蒋介石有了错误他不承认，他又不改，他只好垮台。我们还有点希望，就是有了错误能够承认，能够改，孔夫子作了结论，这样就“善莫大焉”，这是好事。所谓“善莫大焉”，就是好事。有过失，这是坏事，过而能改，就变为好事了。孔夫子也懂得这个坏事变好事的道理。我们党内也是这样。我们愿意跟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界的人士、各位朋友一道采取这个态度，坦白的，实事求是，大家团结起来，大家努力来改正错误，发现缺点，揭露缺点，渡过困难。这样好不好？恐怕也只有这一条路，除此以外，还有别的什么路？也没有别的路了。

我们犯过这些缺点、错误以后，我们许多干部，我们全党的干部，党外的许多干部，各民主党派的干部，全体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经验。既有正面的经验，就是说有成绩，做出成绩来了，又有了反面的经验，有了两方面的经验，有了正面经验与反面经验的比较，就清楚了，就晓得那些事情是应该做的，那些事情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有了这样的经验，缺点、错误又改正了，又总结了经验，我想，我们以后的事情就会比较好办了，也比较容易说得通了，认识也比较容易一致了。

目前，我们虽然还很困难，但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困难是暂时的。虽然这个困难还要延长一个时候，不能很快改变，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会要克服，会要好起来。

我们全党，党内、党外的全体干部都经验过了，我们年纪大的人、年纪轻的人都亲身体验过了，广大的人民群众都经验过了，都取得了经验教训，都懂得那些事情是应该干的，那些事情可是不能这样干，

这是长期要起作用的。因此，我们到底是更弱了，还是更强了呢？犯过这些错误以后，我觉得，我们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我们犯错误以前，犯了错误还懵里懵懂，不懂，你说那个时期还强呀？现在可就知道一点厉害了。应该说，现在比以前更进步一些了，更强一些了，不是更弱了。我们在工作会议上面，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建设的基本的经验教训，搞了一个十六条的初步总结，今天发给各位了。这是我们议出来的。这个东西还不算成熟，我们写出来了，还可以商量，请各位提意见修改，看这样行不行。主要的经验教训就在这十六条上面。这是一个初步总结。现在也只能作初步总结，现在就作出一个最后的总结不可能。因为有很多问题还看不清楚。要再等多少年，或者再过五年，再过十年，我们农业恢复了，工业恢复了，继续上升了，又有发展了，到那个时候再看，就看得更清楚了。那个时期再来总结，再来修改这个十六条，可能比现在总结得更好。也可能多几条，也可能少几条，但是无论如何会比现在总结得更好，看得更清楚。

关于今后的任务，总理要说的，我不多讲了，无非是增产节约，精兵简政，这些事情。要大力增加农业生产，增加日用品的生产，保证市场的供应。主要搞这件事。基本建设慢一点，少搞一点，把东西拿出来做日用品，拿出来做农具，争取财政情况的好转，调整工业内部的关系，渡过困难。

此外，我还讲一个三面红旗的问题。

第一，总路线还要不要？我们说，总路线还是继续实行。过去我们有缺点、错误，是在执行总路线中间有偏差。过去多快好省没有执行得好，执行里头有偏差，就是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或者对好省注意不够。以后要注意好省，注意品种质量的增加和跃进，注意配套，使我们能够自力更生地进行建设。多快好省要执行得很好，也不那么容易，你晓得。自己订个多快好省，自己去执行，也要发生偏差的。以后就不发生偏差了？我看也难讲。以后更多地注意好省，数量就不够了，有可能发生那一方面的问题。但是现在要注意品种质量，注意配套。

我们在工958年制订总路线的时候，讲完全是这样几句话：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鼓足于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把主词去掉了，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谁鼓足干劲呢？应该说，全国人民是主词。以后说的时候，把主词省略了。但是在执行中间，许多同志没有注意使人民自觉地团结起来，不是由人民群众实事求是地去鼓足干劲，切切实实地力争上游，而只是由少数干部站在群众之上，命令群众，形式主义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就脱离群众了。有个时候，就是主观主义地命令，又只注意多快，而不是同时注意好省，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错误，总路线本身是正确的。难道全国人民不要团结起来，不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不要鼓足干劲，不要力争上游，也不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行不行？这样不行呀。不能这样。总路线的本身是正确的，而且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我们也说过，总路线还要继续发展，继续考验。现在我们来看，我们还说，总路线本身是正确的，我们以后还要继续实行这个总路线，就是要执行得完全，不要发生偏向。这个偏向纠正了，我们就会很好地、正确地、全面地执行总路线，我们就会是很好的。总路线，我们还是继续，不需要修改。

第二，大跃进。过去我们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是有片面性的，就是说，每年要翻一番，或者说要增长百分之几十，才叫大跃进，如果没有增加这么多，那还有什么跃进呢？这就发生问题了。这跟我们原来提的跃进的口号也不同。毛主席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这样讲的：跃进，应该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不是从一两件事情上面来看。毛主席说，马克思讲过，资本主义对于过去的历史阶段来讲，已经是一个跃进，社会主义的苏联就比资本主义更跃进了，走得更快，发展得更快。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快一点呢？是不是不但北资本主义的发展更快一点，而且比苏联的发展还快一点，是不是可能呢？毛主席说，建设社会主义可以用这种方法，也可以用那种方法，用这种方法比较慢一点，差一点，用那种方法就快一点，好一点。我们是不是可以实行一种比资本主义甚而至于比苏联还更快一点、更好一点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现在当然没有证明，我们是不是可以争取呢？可以这样想。苏联是1920年结束国内战争，到1940

年，布尔什维克执政20年到21年的时间，从1913年俄皇时候已经生产的420万吨钢的底子，发展到1800万吨钢，增加四倍，增加了1400万吨钢。这是苏联的速度。我们从1949年算起，90年是到1969年，21年是到1970年，我们原来的底子，加上日本人在东北搞的是90万吨，我们到1970年是不是可以增加1400万吨钢呢？如果增加了，我们和苏联的速度一样；如果不如，少于1400万吨，那就还不如苏联的速度；如果多于1400万吨，能够增加1500、1600、1700、1800，那么，我们的速度就不独是比资本主义快，比苏联也快。这是不是可能呢？现在还没有证明，我们说还可以争取嘛。因此，我想，大跃进这个口号还是不取消，还是继续，还是继续成为我们奋斗的目标。现在取消太早了。到那个时候争取不到，就证明不能大跃进。有一种可能是不能大跃进，有一种可能是能够大跃进，从整个历史阶段来看，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可以的。

第三，人民公社。从前提过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现在还有没有？还要不要？这个口号，现在似乎看不大清楚。人民公社大是大，公就看不那么清楚。也不那么大，现在又搞到小队(就是现在的生产队)核算，似乎不那么“一大二公”了。因此，这个口号要不要？要不要取消？现在这个问题看不大那么清楚，但是再过多少年可能看得清楚。因为人民公社自己可以办一些企业，增加积累，还可以从各生产队抽一些积累，将来实行一些机械化，再到那个时候，就可能看出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了。因此，这个“一大二公”的口号我们也还不取消，放到这里再看嘛。

现在的人民公社，我看是吸收了初级社、高级社跟人民公社的优点。现在的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队，它的规模，实际上是以前初级社的规模，就是二十来户、三十户，这样的基本核算单位，我们吸收了初级社的优点；我们又评工记分，土地没有报酬；对于五保户、困难户又补助，这就是初级社的优点我们有了，高级社的优点我们也有了，人民公社的优点我们也有了。现在也只能搞这么多优点，更多的优点就搞不成。实事求是，有多少就搞多少，能搞多少就搞多少，不要勉强去搞。

我想，人民公社还是我们的一面旗帜，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也是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旗帜。供给制，我们原来搞的时候也说过，供给制是起一种社会保险的作用，现在供给制当然不搞了，但是社会保险还是搞一点，对于五保户，困难户还是有补助，这也是一种社会保险。公共食堂不办了，但是那种自愿结合的农忙食堂还是要办，群众也愿意。因此，人民公社还是当作我们的一面旗帜，继续办。它的优越性现在不一定看得很清楚，但是到将来，再过多少年，可能表现出来。

有人说，人民公社办早了。也可以说，人民公社迟几年办是可以的。问题是群众已经办起来了，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共产党要表示态度，或者反对，或者赞成，或者不管。我们还是站在群众前面去领导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

还有人讲，人民公社一开始办的时候就以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照现在这样，不是更好吗？那是更好，但是，那个时候就是想不到，因为没有经验。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是有点聪明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聪明，因为没有经验。

所以，人民公社是应该办的。主要的经验，我看应该是这样的：不应该一下子全面铺开，搞得太急了。应该是经过典型试验，总结经验，有准备地、有步骤地、有秩序地、有区别地、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这就好了。我想，办人民公社主要的经验教训是这一条。如果是这样做，我们就比较稳当了，就会办得好了。我想，不只是人民公社运动如此，最近几年，有许多的群众运动，就是一下子铺开，全面推广，因此，出很多毛病。其他许多群众运动的主要的经验也是这一条。如果是经过典型试验，总结经验，有准备、有步骤、有秩序、有区别、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这样就比较好了。这是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总结出来的土地改革的经验。过去我们土地改革是这样做的，做得好。我们组织合作社也是这样组织的，搞得好。而这几年，我们违背了那些经验，所以，做得不好。我想，以后要吸收这一条，一切要经过试验，不论什么事情，总而言之有准备、有步骤、有秩序、有区别(这个地方跟那个地方有区

别)、分期分批，这样搞，我们就比较好了。这是一条重要经验。

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这回工作会议我们没有讨论。因为没有调查，材料不够。等以后调查以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因此，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而且继续为这个三面红旗奋斗。有些问题现在还看不大清楚，但是再过五年、十年，再来总结经验，就可以进一步对这三面红旗作出结论。我看，现在就来作结论还太早。随随便便地把它举起来，随随便便地把它丢了，都不好，搞几年再看嘛。我们横直实事求是，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

…………

我们这次确定了，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就是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的民主。过去这几年，我们在这方面出了缺点，不利，对我们的事业不利，对我们的团结不利。民主生活不够，民主空气不够，很多人感觉有点压力，这不好，要改正。所以，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在我们党内，要发扬党内的民主。毛主席说，要造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想，我们现在应该努力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而这种局面的造成，对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是有利的。要进一步密切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要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搞这五个统一，统一在中央。有些事情分散了，各个地方随便搞，不好。统一认识就是统一思想，政策要统一，计划要统一，某些事情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不要各个地方各搞各的。

我们党内也决定了，要重新教育干部，我们党内的干部要重新进行教育。这个工作，有些地方已经开始了。要恢复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的、批评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传统作风。我们要加强团结，加强党内的团结，加强同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全国人民，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团结，共同努力来克服困难，继续胜利前进。

我们的经验，经过这几年以后，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办法也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当前的困难虽然是严重的，但是我们有信心克服，前途是光明的。我们过去经过多少次困难，在反动统治时期，是有过困难的。我们共产党在革命中间经过很多困难，例如长征。现在总比在延安的时候好嘛，比长征的时候更好嘛。我们现在的困难比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也好。那个时候我在苏联，我们现在的困难比他们那个困难少一些。你们各位在蒋介石的时期不困难呀？通货膨胀那么厉害，军阀战争，那个时候也是很困难的。过去那么大的困难都过来了，难道我们现在有这么一点困难不能克服吗？我们全党，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全国人民，各民族，大家团结一致，来战胜这种困难，我想，我们不会没有办法。现在要努力增加农业生产，增加日用品的生产，把材料用在这个方面，基本建设少搞一点，某些东西还要进口一些，今年还要进口一些粮食。我看，有这么三、五年，情况就会有好转的。今年如果不过到大碱天灾，可能今年比去年好一点，明年比今年可能更好一点，慢慢逐步好转。但是不会好转那么快。多准备一点，精神土准备慢，争取快，这样好不好？多准备一点，快了就好；准备少了，结果可能延长，那就不好。

因此，我们还是应该立大志，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建设好，也不需要很长的时间，有几十年就行了。美国原来是印弟安人的，外国人跑去是一片荒地，经过一百多年，变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日本也只是搞几十年就强起来了。德国也是这样。难道我们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版图面积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事情到我们手里头，我们大家团结一致，更加努力，艰苦奋斗几十年，不把中国搞好？我就不相信。全世界只有这么一个国家，我们人口这么多，可能再过几十年或者百把年，那个时候，不只是超过英国，要超过美国的。我想，这个信心是应该有的。资本主义都可以做到，难道我们不能做到？难道要

那么久的时间？美国人只是一百多年嘛，我们也搞它百把年，不超过它？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方面看到我们当前的困难，另一方面，不要失掉光明的前途，伟大的、光明的前途的理想也是必需的。要有远大的理想，但是又要有切切实实的工作，了解当前的情况、困难，继续逐步前进。

关于国内问题，讲这样多。

……

中苏关系，可能改善。如果可能，也应该争取改善，也可能争取改善。但是，也不一定。如果不能争取改善，我看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天总不会塌下来，这是肯定的。中国这块地方总还是归我们管，别人管不了。我们也不去管别人的事情，我们只管我们这块地方。我们中国的上帝叫玉皇大帝，别的地方的上帝也管不到我们这个地方。苏联一个国家可以建设社会主义，难道我们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家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能够合起来，互相帮助，友谊关系，更好，这是我们要力争的。我们绝不挑起争论，绝不损害团结。但是人家要挑起争论，人家要拿这些事情强加在我们的头上，那我们也不能一切照办，那也不行。社会主义各国彼此是平等的，独立的，互相不干涉内政的。总的情况是这样。

至于讲全世界的人民，我们是要进行团结工作，要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革命斗争，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保卫世界和平。这些事情是肯定的。

关于国际形势，就不讲了，只讲这样一点。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25）对中央办公厅石家庄和无锡调查组的指示（1962年4月24日）

（一）有两种调查：一种是为了决定重大政策问题、带战略性的调查，为了决定战略部署的调查，如毛主席的农村调查；另一种是为了决定当前具体政策的调查，如你们这次的调查，就是为了有利于调整国民经济。

调查工作，涉及到一些单位的利害关系，真正搞清楚，并不容易。调查组只写个报告并不能解决问题，可能人家不看，必须干预事情。不了解世界，不能改造世界。工作组要纠正那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情。大家都按社会主义原则办事，就可以把经济工作调整出个秩序来。调查了二十多天，摸到了一点边，还不一定有很大价值，把一个城市各方面的问题摸清楚，没有一段长的时间，没有斗争，没有权力，是不行的。有些厂子，该关的就关掉，如你们反映的无锡的那几个厂子，硬撑在那里，极不合理，地方上又不好说话，你们就应建议关掉。这样，市委对工作组就有兴趣了。工作组要下决心搞好，搞不好，还要再去。这是光荣的事，信任你们去干。不要顾虑家里的事。

（二）一个城市的问题是多方面的，有厂内的，也有厂外的，厂外的问题更多，厂外决定厂内。抓物资就是为了解决厂外问题。抓两头（供和销），目的是为工厂服务，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供应好工厂用的原料、材料，工厂才能把生产搞好，反过来它又为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服务。三类物资问题多，无非是东西少、价格高。对农村生产的三类物资，现在不要用票子去买，应该以工业品去交换，价格要低对低，高对高，等价交换。你们在石家庄或石家庄附近，设立个物资交换站或收购站，就能够换回大量的农付产品。

（三）当前的经济情况很复杂，问题又多，经济失调，大量物资积压，资金周转困难。原因主要在上面，是计划安排和政策上的错误造成的。你们要向厂内的同志讲，向他们承认错误。按照我在中央扩大工作会议上的报告，陈云同志的讲话，和中央批转的财政预算报告去讲。你们代表中央检讨，市里也检讨，是非分明，实事求是。关厂就是因为有困难，讲清了，共同承担困难。实际上，他们已经承担了困难。要党员干部首先承担困难，要与群众共甘苦，群众才能谅解。在困难时期考验党员干部，要带头作模范，关了厂的厂长、党委书记，要带着工人一起下乡，一九五六年江西省的×××、×××同志，带领工人上山办劳动大学，影响很好。

（四）无锡反映，江苏对银行工作支持不够，这不好。银行必须关紧。关紧了，群众闹事怎么办？那里闹事，我们就知道那里有问题，再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要求合理的、可以做得到的，要答应照办；要求合理而作不到的，要说明、解释。只要党员干部带头，群众意见就不大了。财政上也要卡死，财政、银行松动，矛盾就暴露不出来。要让矛盾暴露出来，才好解决问题。问题由党委负责解决，财政、银行不可能自行处理问题。工作组要帮助党委解决问题。厂子该关的关，不该关的报销亏损，卸掉包袱，就走上正轨了。

调查深入了，一定可以发现大案子。但不要主观臆断。与坏人作斗争，不能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去处理。

（五）物资部门、商业部门为企业服务好，使企业集中力量去解决厂内的生产问题，有无可能？我想，是可能的。目前，工人的生活问题要解决，但也要有降低，开大会向群众认错，讲清楚，大家承担困难。

企业要根据物资部门和商业部门的要求进行生产，不能让企业盲目生产。工作组要创造个办好工厂的典型。

26） 在总结四年政法工作时的谈话（1962年4、5月）

4月28日的谈话

（在汇报到这几年产生问题的原因时）刘少奇说：苏联在垂直领导下出了问题，我们是在党的领导下也出了问题，看来垂直领导一点没有也不行的。

（在汇报到要检查总结这几年的错误时）刘少奇说：公安、检察、法院三家都要认真总结十二年的经验教训，首先要把问题揭出来，不揭出来，就不能接受经验教训，也不能改。现在问题已经发生了，人已经死了，问题是要总结经验教训，看到底是那些工作没有做好。……

（在汇报到法律制度和要搞刑法时）刘少奇说：民法也要搞。刑法草稿是否很快修改一下提请人大常委讨论一下试行。现在不搞不行，有了这个东西比没有好。（在谈到死刑案件的审判时）刘少奇说：××跟我说过，封建时代，死刑要到北京来审。你们过去这样办不行，现在只少一部分可以拿到北京来审。专政工作怎样专法还是个问题，不要专政不行，赫鲁晓夫不搞专政，实际上还有强制办法的。我们是要专政的，但是没有搞好，又要专政，又要不出问题，是个需要很好研究解决的问题。公安、检察、法院三家是搞专政的，这几年出了毛病怪不得你们。要总结经验教训。检察、法院要加强使他们真正能够执行职务。三家上下垂直领导要搞一点，法院要独立审判。

（在汇报中说到这几年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的问题时）刘少奇说：这几年主要是混我为敌，什么机关都可以捕人，打人。现在要搞些章程来，没有章程秩序就会搞乱。专政同民主是分不开的，人民犯了法也要办，这是比较少的。人民内部的许多问题必须有人管，要研究个办法，调解委员会还是要。人民内部问题公安不管要谁管？要党委管，党委总得抓个人来管，恐怕要有结合部，还是搞调处委员会。人民内部问题是最多最大最麻烦的问题，你公安不管，要谁管？劳教归别人管当然可以考虑，但如果归内务部管，由于机构干部不强也可能搞得更坏。

……现在看，无产阶级法律还不成熟，还没有很好建立起来。现在已经有不少经验了，一个是赫鲁晓夫，一个是斯大林后期的，有正面有反面。我们也有正面反面的东西，这几年主要是混淆两类矛盾。要从理论、原则、方针、办法上搞出一套来。对敌人要强调专政，对人民要说服。规定了不执行怎么办？党的组织部、监委要规定一套办法，非执行不可。要从办法到组织机构都要有系统的一套。有了系统的一套人民内部有人管了，你们就可以集中力量搞专政了。敌我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党内党外问题都要有一套。那些事情归那个管，要很好研究。有些归你们，有些归组织部，有些归监委。国家机关干部犯了法，要归检察机关，公安不要插手。总之，从组织纪律，行政纪律，到法律问题，都要有一套办法。

…………

处理人民内部的机构一定要有。当然有人管了，也可能搞错，错了再检查改正，调节委员会，是一种组织形式。民警也管一部分人民内部问题。农村已经有调处委员会，人民法庭，在乱的地方可否再设一些派出所。总之要研究一下，总要有个系统。现在把人民内部问题，当敌我管了。肃反领导小组搞隔离反省，限制人家自由，要考虑。五七年反右派时，中央规定把右派当人民内部问题处理，但实际执行上把面搞宽了。

总结经验，要把大量事实揭出来，这样才能认识，才能把问题说通，使大家出一身汗。这几年公安机关服从党委领导下犯了这样大错误，你们可以说这几年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犯了“左”倾错误。这一条一定要说。他反你的右，你可以反他的“左”，他批评你“左”，你可以反他右。有些问题你们可以向党委说清楚，听党的话，什么都听？该不该捕判主要由你们提，你们什么都听他的？检察、法院过去批判

了那么多右倾，有的可能对了，有的过了头。批判独立审判，是指有脱离党的领导的意思，现在看来，完全没有独立审判也不行。现在有些地方在批判独立审判以后不负责，这也是一种偏向。将来是不是还会犯右倾？反“左”必然出现右，将来有了再说。

……搞政法工作总结，邓力群可以去帮忙，把经验总结起来。既要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怕麻烦，怕麻烦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又要建设社会主义，又搞简单化，就是国民党作风。如果不改正政治上“左”的办法，组织上就会出问题，现在政治上松了，组织上的问题就好办了。真正按照党的政策办法，可能遭到批评，你们要支持下边。

政法部门有些报告可以不经过党委，党委不同意还可以上报。现在下边上报的材料是层层过滤，搞一个渠道，把什么东西都过滤掉了，要改变。规定不经党委不能向上报告是错误的。要搞点对立面，政法三家要搞互相制约。这几年你们是在党委绝对领导下犯了“左倾”错误，这是一条经验教训。

5月23日的谈话

目前这个时期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混我为敌，打击面过宽。文件上的这个看法，基本上对，但不完全。是不是应该这样讲：这几年没有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严格区分开来。这样讲比较好。就是说随随便便，没有清楚的、严格的、细致的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是马马虎虎，不那么严格区别。因此，就混淆起来。混淆二字可以用。(彭真插话：是在实际工作中间发生的)

错误又是没有严格区别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说服，民主的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处理敌我矛盾，是压服。这是根本不同性质的两种方法。报告稿子没有强调这一点，没有强调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几年的错误，主要是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处理小偷小摸，搞的时候不见得是把他当成敌我矛盾，而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了。这是方法上的错误。用对付敌人的专政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是国民党的作风，是站在人民之外，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强制，以至劳改。要着重讲方法问题。

要严格区分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还要严格区分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方法，错了，就要犯大错误。过去认识错了的也有，但主要是错在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报告稿中没有强调这一点，经验不完全。党和政府中的国民党作风，在某些方面相当普遍地存在，主要表现在这上面，用敌对手段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甚至党内的问题。这样处理的结果，不仅不会解决矛盾，相反，会使矛盾更加激烈，甚至造成分裂。这个问题要好好发挥一下，好好讲一下。

公、检、法三机关，只处理敌我问题，人民内部问题不处理，你们是专政机关，只对百分之四、五的人有作用，对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没有作用。问题是不是这样呢？是不是把人民内部问题一搞到公安机关就要犯错误。检察部门，也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有法院还开了点口子。这个观念要好好研究一下。你们是专政机关是肯定的，是否也可以处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彭真插话：实际上处理了不少人民内部问题，如消防、交通、户口，就是人民内部问题。)如果只对百分之四、五的人有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不是你们的事，你们的作用就不大了。你们对敌人是专政工具，对人民，三机关都要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关。你们叫公安局嘛，名为公安，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管公共安宁，公共是谁呢？是人民。苏联叫安全委员会，是统治者的安全，也讲人民的安全，国家的安全。苏联内务部，也不见得不搞敌我问题。人们害怕公安局，敌人怕公安机关，这是应该的。人民也怕公安机关，那不一定，如果把工作做好了，人民就喜欢你们。认为你可靠，名誉好。过去丘八，人人怕，我们人民解放军，搞得好，人民就不怕。这是个工作问题，态度问题。在严格区分两类矛盾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方法的前提下，帮助人民，教育人民，保护人民，人们就不怕你们，就喜欢你们。

不应做的应缩小一点。这个问题你们去讨论研究一下，我只是提出问题。反革命现在占人口的百分之四、五，将来要到百分之二、三，百分之一、二，越来越少。人民内部问题是大量的、突出的，触犯刑法的是极少数，大量的不触犯刑法，对这类问题，三机关要研究。两类矛盾如何管，要管好，又不出错误。

打击面宽了，是个事实，统计上要把逮捕、拘留、劳司教、集训、判刑分别一下，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劳教本来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结果变成了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打击面宽，从本质上看没有多大问题，但要分开统计。正式逮捕的、判死刑的比以前少了，也多了一点，但犯错误不那么大。主要错误是长期拘留，不依法办事。行政拘留、集训、劳动教养，变成和逮捕一样，没有区别，错误就在这里。……这几年所谓打击面宽，主要在这些方面。

要有一段写非专政机关办劳改队，公社、大队、企业、水利建筑工地办劳改队，这都是非法的，不允许的。这个问题要写一段，自己随便搞劳改是非法的。

法制问题，你们这个稿子中提社会主义法制，法院有个文件提无产阶级法制，恐怕无产阶级法制的提法比较好。无产阶级法制，就是人民民主的法制，也就是社会主义法制。提社会主义法制不清楚，无产阶级法制有阶级性。现在赫鲁晓夫把社会主义法制提得很高。法制不一定是专政的，人民内部也要有法制，国家工作人员与群众还要受公共章程的约束。我们太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就容易和赫鲁晓夫混淆。法制问题，不强调不行，但要和赫鲁晓夫区别一下，我们所讲的法制，内容与他是不一样的。

…………

报告稿子中提到，反革命越打越少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是不是客观规律？看怎么打法，打得正确，打得好，就越打越少；不正确，打错了，就可能越打越多。那是的，死也要死完的。但也要打得好。还有新的反革命。某些情况不好的地方，有人登高一呼，会四方响应。但是反革命要复辟，最重要的还是要经过党和国家的组织，没有这个，危险性还不是那么大。一定还要有现在当干部的参与活动。文件上讲了敌人企图复辟，还要注意复辟的方法。对少数反革命复辟，我们要注意他们的方法，少数大队地主儿子当了会计，当了秘书，这个地方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统治，就是复辟。

人民内部还有阶级矛盾，这个问题要好好研究分析一下。

为了缩小打击面起见，我们党有时把一些明知是敌我矛盾的问题，而当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如对右派的处理就是这样，其目的，就是为了缩小打击面，为了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绝不可把敌我矛盾扩大，不能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相反，只要是没有危险的，倒是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处理敌我问题。此外，还有些问题，不容易区分，有一个敌我界限很难分的接合部，有些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如青年学生，家庭出身很好，但搞反革命活动。这个问题可以研究一下。有个消灭阶级的长期性问题，即是百分之四、五的人都死完了，还有他们的后代，还有受反革命阶级的影响的人，工人阶级内部也会蜕化出一些反革命分子。新的反革命是少数，但还会有。

司法独立是不对的，是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该干涉他们判案子。法院独立审判，允许上诉，不允许上诉是违法的，要批评。（彭真插话：当事人、检察院、公安局、审判员四个方面都可以上诉，组织法规定很细，你们自己也忘了。）党委不要审批具体案子，只是极个别的才批。这个问题要好好给下面的同志讲一讲，讲清楚应该怎么办。

检察院的一般监督问题，这个问题报告稿中没有讲清楚。过去我们没有叫你们不搞一般监督，只是要你们暂时不要那样搞，不要把工作重点放在这里。公社、大队、水利工地乱办劳改，扣押那么多人，你

就不去监督一下？有些地方违法乱纪，这种违法乱纪恐怕检察院要监督一下。检察院一般监督不是主要任务，但也要做一点，着重搞明显的违法乱纪的事。……本来集训，劳教、行政拘留，都是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办法，问题还是要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不能把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变成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检察院组织法，写了这一条，可以试试看，犯了错误再总结经验嘛！你能犯错误，他就不能犯错误？检察院可以搞点垂直领导。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反对一般监督，只是说把检察院驾凌于国家之上，是不对的。文件另一个地方又提法律监督，究竟一般监督同法律监督有什么区别呢？搞不清楚。文件上又写了一条检察院应同一切违法乱纪现象作斗争，这样的说法比较好，不管任何机关任何人，这是比较明显的，比较确切的。一般监督，含义不那么清楚。

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领导，这种写法怎么样？还有双重领导嘛，上级也要领导。不要写绝对服从，一般服从就行了，如果地方党委的决定同中央的政策不一致，你服从那一个？地方党委和中央政策抵触，当然这是特殊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服从中央的政策。他违法，就不能服从。如果绝对服从，势必对青海的高峰、安徽的曾希圣也要服从了。恐怕不写绝对两字好。

报告中说，“公社、大队，要用主要力量去做政权工作”，你这个报告中不要规定公社，大队的任务，这不在你们的职权范围以内。要写，可以由中央批转时讲一下。而且这个问题涉及政社合一问题，中央还要讨论。报告中可以一般讲基层政权要做些调解工作。

四道关中，调解委员会、人民法庭，是个新东西，要着重讨论一下，找人来开个会，要搞个文件。

搞这个文件，总结经验，要从实际出发，然后提高到一般原则和理论的高度。那些方面需要作理论说明的，就从理论上讲清楚。用这种方法写，比较容易，也比较解决实际问题。不要光从原理出发，要解决实际问题。我们搞东西，要从群众中来，经过加工制造，化为系统的意见，再到群众中去。至于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将来另搞，现在一下搞不出来。

过去党委搞肃反小组，确定捕人，隔离反省，三反、整风也搞了小组，整了很多人，当时是对的，今后不能再多搞。现在下面搞习惯了，要约束一下。法制没人管了，谁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

还是要按制度。章程办事，靠制度、靠阶级、靠群众。

（彭真说：本来有规定，行政拘留只有公安机关才有权，捕人起诉只有检察院有权，判刑只有法院才有权。但这几年没有执行，今后三机关要按自己的职责办事。）要让他不乱搞拘留，要做相当大的宣传教育工作。（彭真插话；今后，要发个宣传提纲。我们不是没有法，还是有法的，当然还不完备。但这几年对已有的法都不执行，你们自己搞乱了。今后要规定，公、检、法三机关办的事，别人不能办。政法工作当然主要靠政治领导，但不能规定了法律不用。凡是按法律办事的，错误不大；不按法律办事的，错误就大。）

三机关要加强，一长代三长是不对的。事情总要乱一下，趁这个机会努力一下，把工作活跃起来。

文件，你们先写，写出来后送书记处，还送彭真。

再回到政法机关能不能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究竟怎样，你们实际上处理了大量的人民内部问题，不要怕公安一插手人民就害怕，反革命怕你们是必要的，人民是会喜爱你们的。专政的作用：要镇压反革命；消灭阶级，包括消灭农民这样的阶级。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是按无产阶级意志决定问题，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教育机关，要把人民教育成共产主义者，不是靠学校教育，而是用国家形式的领导教育农民，我们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无法得到解放，制度决定他的意识，我们也可以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决定人们的意识。教育农民互相团结，互相帮助。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意识是把自己的幸

福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在我们的制度下，也还有少数人不团结、不帮助别人自私自利，到了共产主义，是不是一个杀人犯也没有呢？我不相信，比如争风吃醋也可能杀了人。当然，那时的处理不用专政办法，社会会处理。你们是专政工具，同时也有教育人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任务。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一下，我看×××同志的思想就不那么通。好象事情一到了公安机关，就阴森森的，反革命是这样感觉的，人民就不是这样。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27）对下放干部谈人民公社问题（1962年7月18日）

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现在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不够巩固，相当多的集体经济不巩固，发生动摇，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而至于干部，要求单干，要求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集体经济不巩固的原因有多种，有集体经济内部的原因，有集体经济外部的原因，有天灾的原因，有过去的五风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的破坏的原因，有国家征购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太多的原因。还有国家的价格政策的原因，卖一斤粮食只有×钱，卖给自由市场一斤粮食×钱，有卖×钱的，最近自由市场又跌了价的，一斤粮食只有×钱。内部的原因，就是干部的作风，集体经济内部的小队长，大队长，干部作风不好，多吃多占，不劳动，工分搞得多，组织制度不好，比如说责任制、评工记分搞得不好。还有国家支援不够，国家对农业集体经济的支援，虽然国家过去花钱不少，花了×亿，可是用得不适当，效果不大。这都是引起集体经济不巩固的原因。你们可以去研究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的地方散了，单干了，或者包产到户了，大概每一个地方都有，数量不算很多，有一部分，全国大概已经有×％以上采取各种形式散了，包产到户了。有一些现在没有散，但是要散。这个形势，就是说，集体经济现在发生一种瓦解的危机，散的危机。

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去要注意这个问题。特别是到农村工作的，到地委、县委工作的，要抓紧这个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而且你们现在下去，现在就要采取措施，就要想出办法，抓紧今年的秋收分配，要使社员多得到一点好处，今年使积累、公积金扣留少一点，准备国家征购也少一点，尽可能使农民在集体里面多分一点。如果今年的秋收分配又搞不好，农民分不到什么，那么，估计今年秋后还有一批生产队会要散。所以，这个问题带有若干紧急性质。

一方面要巩固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另一方面又要抓紧生产，想办法。现在有一种议论，有一种意见，说要发展生产，就要单干，单干能够发展生产，集体经济不能够发展生产，把发展生产跟集体经济对立起来。这种意见，群众中间有，基层干部中间有，地、县干部中间也有，省委干部中间也有，从高级干部到基层干部，都有这种意见。这几年，因为五风，国家征购太多，瞎指挥，对集体经济的信念有所丧失，农民这几年从集体经济中间没有得到好处。但是曾经有一个时期合作社是增产的。这几年减产，不能证明集体经济就不能发展生产。那么，为什么有一个时期就能够发展生产？不是说以后搞好了，集体经济更能够发展生产呢？我们的提法是这样的：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生产，这两句话并提。这跟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不能发展生产这个话就有点不同了，跟发展生产就要单干那个意见不一样了。但是，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生产，现在要采取许多办法，采取许多具体措施，纠正许多缺点错误，才可能。集体经济能发展生产，是要在一定的条件下，不是任何集体经济都能发展生产。干部又多占，不是一个保长，而是几十个保长，干部又不劳动，责任制又实行得不好，国家支援得不够，征购太多，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体经济的确不能发展生产。但是，在另外一种条件下，集体经济能够发展生产，而且如果搞好，可能比单干发展生产更好，更有可能，集体经济能够发展生产，是有条件的，不是没有条件的。不是只要组织起来，就能发展生产。你们去，应该去办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把中国5亿多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轨道上面来，这个工作是一项头等重要的、光荣的工作。有什么工作比这个工作更大，更重要呢？在中国，头等重要的工作，或者头等重要的任务，头等光荣的任务，就是把中国5亿多农民引导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轨道上面来。在全世界，至少在今天，恐怕这也是一个头等重要的任务。因为其他国家没有这样一个5亿多农民的问题。毛主席讲过，困难的任务在于教育农民。现在你们就可以知道，困难的任务在于教育农民。教育农民是困难的呀。教育农民干什么呢？教育农民干社会主义，干共产主义，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困难的任务

不是别的，要教育农民，中国农民又这样多。而我们中国如果没有农民中间的社会主义，没有农村的社会主义，那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不能巩固的。5亿多农民他不搞社会主义，我们这个国家能巩固吗？

发展农业，要使农业过关，使粮食过关，只能是大农业。历史经验证明这一点，大农业才能发展农业生产，才能使农业过关。不是资本主义的大农业，就是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或者反过来讲，不是社会主义的大农业，就是资本主义的大农业，总而言之是大农业。现在全世界农业过关的只有一个美国，美国就是大农业，那是资本主义的大农业。最近法国也在那里搞农业，大量的投资，听说也搞好了。小农经济是不能使农业过关的。无论是资本主义也好，社会主义也好，小农经济不能更大地发展农业，使农业过关。虽然苏联的农业现在还没有过关，但是它是大农业，集体农庄。有美国的经验，有苏联的经验，现在还要创造我们中国的经验。中国不能照抄美国，也不能照抄苏联。我们有我们中国的特殊情况。要使中国的农业过关，要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而且能够发展生产，要创造中国的经验。这是一个长期的、很大的、头等重要的工作。因此，值得我们共产党花很大的力量，值得我们国家花很大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毛主席提出以农业为基础，农、轻、重的次序，就是感到这个任务的重大。中央最近准备讨论这个问题，讨论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派你们下去，到农村去，就是为了解决这个任务。

这里我还举点例子。在马克思以前，就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办公社，办新村，那是满腔热情，长期去工作，工作一辈子。因为他们的国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最后是失败的。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精神，很可以值得学习的。英国的圣西门办合作工厂也是办一辈子，他没有死以前，他那个新村还维持着，他死了以后，那里就办移民村，从英国移很多人到美国去，到那个新村去开荒。他在那个地方就办新村，办社会主义。等他死了以后，就变成资本主义的大农业了，变成现在美国的大农业了。那些人的确是有理想的，充满热情去作试验，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村。所以，马克思称空想社会主义者是思想家，他们的精神很值得佩服。但是，他是空想的，不科学的，做不到的、失败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有那种精神，在那种条件下，在那个时候，都能那样去作，那么，在今天，我们既然有了无产阶级专政，有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有国家的社会主义，有国家的支援，有这样大的党，我们按空想社会主义的那种精神去办，我想是一定可以办好的，就不是空想，是可以实现的，可以成功的。

本来，农民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无产阶级的帮助，甚而至于没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帮助，没有懂得社会主义的、有理想的人去帮助，没有国家支援，没有无产阶级的组织作用，单纯靠农民办好社会主义，那是困难的。列宁讲，无产阶级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组织作用，帮助他们去组织，使他们组织起来。你们下去就要成为组织者，成为有共产主义理想的人，满腔热情地帮助农民，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再加上国家的支援等等，就可以办好。你们去是担负这个任务，这个任务，100多年前就有人搞过的，难道我们现在不能搞？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决心。

准备从中央以至省委还能够继续有一批干部下去，准备派几万干部到乡下去，长期在乡下工作，下本钱，把这个工作搞好。从前我们搞土地改革，也是几万干部下乡，不是几万，是十几万。土地改革是把地主打倒，把田分掉，就完了，现在办集体经济，办农业，办公社，比土地改革难，不是搞一下就可以回来的，要在那个地方真正组织好，见了效果，而且在那个地方培养了干部，培养了当地干部，或者有一批新的知识分子下去，培养了干部，能够代替，才能走。

办好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这完全不是个简单的事，是一个很严重的、头等重要的任务。而农民不走上社会主义，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巩固，就不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经济就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有多种经济成份，有个体农民，就产生资本主义。

生产队也有几种：有已经巩固的、办的好的生产队，还有已经散掉了的生产队，还有比较动摇的、要散的、不巩固的生产队。你们到那里，是抓那种生产队呢了那种已经巩固的生产队，现在可以不去抓，

它已经巩固了嘛。是抓那些比较动摇的、有问题的、不那么十分巩固的生产队，抓一下，把它巩固起来。那些已经散掉了的，看采取什么办法，恐怕已经散了，只要它对困难户照顾好，把农具、耕牛保护好，不急于去改变它。

怎么样去巩固生产队这个集体经济呢？一方面是调整集体内部的关系。现在集体内部扣留太多，机动粮搞得太多(这种机动粮恐怕要取消，不再搞了)，干部太多，干部工分补贴太多，多吃多占，干部命令主义，不是民主办社，不是勤俭办社，经济不公开，这些关系要加以调整。上面有人去帮助他们，这些关系可以改变的。干部不能太多，干部不能多吃多占，补贴工分、扣留不要太多，干部不搞命令主义。如果实行真正的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经济公开，社员就会满意，就会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一方面要按劳分配，另一方面对困难户要照顾好，保证困难户最必需的生活水平。因为困难户照顾不好，集体经济也不巩固的。要说服农民，说服那些劳动强的，要有个道理去说服他，使他服。理由就是困难户在资本主义的时候他也能过，难道我们社会主义的时候不保证？困难户他总有几亩土地，他有生产资料，他有这个权利，如果分几亩地给困难户，他也可以过活的，我们现在不是分地给困难户，但是对、困难户要照顾。现在困难户就提出这个要求：你分几亩地给：我，我可以活，我不靠你。困难户提出这个道理，这也是个道理。我不分几亩地给你。地还是集体种，我照顾你。同时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劳动力多、劳动好的人，能够多吃一点多分一些。如果劳动力强的人吃得不好，那困难户就没有吃的了。一方面说服困难户，另一方面说服劳动力强的人，双方说服。

现在因为按劳分配的结果，出工积极了，大家去抢工分，但是农活的质量不好，所以就影响了产量。如何能积极出工，又能够提高农活质量，这个问题要去研究解决。必须实行一种农活的责任制。河南新乡地委书记耿其昌那个地方就是实行责任制，他叫作大农活集体干，小农活分散干，组包片(一个生产小组包一片)，户包块(一个户包一块)，超产奖励。我就问他，超产奖励怎么奖法？他也不是单收单打，还是集体收，集体打场，既然集体收，集体打场，怎么叫超产不超产呢？他说，到要收的时候，农作物已经成熟了的时候，找那个有经验的农民看一看，估计一下，这块地产量多少，他说，大体上估计得差不多，按照这种估计，如果他超产了，就奖励。我问他奖什么？他说，一个是奖工分，一个是奖实物，工分实物都奖。他说，这样就使农活质量提高了。但是，这种农活质量比起农民种的自留地的质量还不如，比初级合作社的还不如。因此，我看这个责任制是可以推广的。工作一定要有责任制。工厂里面都实行计件工资制，计件工资制的产品不是归工厂，是归国家。责任制，包一块，或者一个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现在是如何使责任制(比如包这一块)跟产量联系起来。现在分开打场有困难，不分开打场就只能找老农估计，大家定一下。如何使产量跟责任制联系起来，这是要研究的。

此外，集体经济要多种经营，集体经济现在没有钱，不搞多种经营，就没有现金收入。

同时，还要生产队外面的帮助。单靠生产队难于搞好，要去帮助他把集体经济搞好。把集体经济内部这些关系调整好，农民就不一定要单干。现在单干有很多困难，散了伙以后他难办，还不如把集体经济搞好。

此外，国家支援。国家支援一个是征购多少的问题，一个是商业的价格问题，收购农产品的价格问题。此外，还有国家其他的支援，比如农具、机械化，这些事情还要搞，努力搞，过去搞过一些什么轴承化、车子化，搞得不好，没有效果，现在又停了。但是这些事情是不是可以搞了是不是要搞？现在机械没有那么多，一下子又造不出来。所以，把现有的农具加以改良，是比较最实际的办法。过去轴承搞得不好，那是因为粗制滥造，没有试验推广，乱搞、乱教，现在真正要拿比较大的、技术比较好的工厂搞点轴承，卖到农村里去，就比较好了。马车也好，人力车也好，有一点轴承，就可以使用。车子化是可以的，问题是那厂子搞得不象样子，一下子搞坏了，并不能节省劳动力。经过试验，定型，真有工程师、技术人员来搞这个事，还是要搞的。还有改良农具。现在有这末多手工业工人制造农具，是不是可

以搞点机械化？比如打锄头、打镰刀，拿100个手工业工人打镰刀，是不是可以拿10个人用机器代替这100个手工业工人？在机械厂里面切实研究好.找工程师设计，搞一种打镰刀的或者打锄头的机器，有机器，10个人代替100个人，提高了9倍的劳动生产率，节省了90个人的劳动力，这是不是要搞呢？还是要搞的。许多东西都可以机械化，可是不要照过去那样，还没有搞成熟，一股风，把原有的农具破坏了，新的农具不能用，结果，只好的搞坏了。是不是可以改良一下，谨慎一点搞，我想还是要搞的。你们去工作，不是一个时候，而是相当长时期，你们在这些地方想一些办法，真由那个有技术的工厂，有技术的工程师，有技术的工人，经过典型试验，一次不行，几次，几十次，来搞这个改良农具。犁头要翻砂，铁锅也要翻砂，我们现在就有机械化的翻砂厂，用机器翻砂，难道不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呀？是可以的嘛。所以，不要把过去一些事情的方向否定了。过去犯了许多错误，做得不好，这是一回事，吸取经验教训，但是方向还是照这个方向，无论如何，搞大农业总要机械。有农业的社会改造，组织了集体经济，而没有技术改进，没有机械化，集体经济也不能巩固。所以，在社会改造以后，紧跟着就是技术改造。国家要花很大的力量来搞技术改造。技术改造，一个是近代机器，一个是就现有的农具加以改良，而开始最现实的是就现有的农具加以改良，然后逐步机械化。因为机械化不是那么很快。不是大工厂制造的小农具都不适用，农民都不喜欢。那是因为设计得不好，做得不好，应该经过试验，时间不是一下子，可能要一年、两年、三年，你要晓得，用机器打把镰刀、打把锄头没有两三年的时间是不能定型的。我从前在莫斯科看过用机器打斧子，那是用汽锤打的，三汽锤就是一把斧子。没有试验成熟，没有经过很多的程序，就不好，先试验，然后小批生产，然后大批生产，是可能的。

你们去到地方工作，是准备相当长时期的工作，要采取当小学生的态度，准备当农民的小学生，要真正了解农村情况，学习农业知识，走群众路线，办好人民公社，办好现在的集体经济。一个是组织任务，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另一方面要搞农业的技术改造，从改良农具到机械化。只有农业技术改造见了效果，向大机械化发展了，集体经济才能最后巩固起来，农业机械化了，现代化了，农业集体经济要散也散不了，而这至少是10几年以后的事情，现在还不能完成。但是现在就要下手，中央准备现在就下手，提出农业机械化的任务，农业技术改造的任务。准备集中全党、全国的力量，集中一切工业部门，集中工程技术人员，集中材料，头一件搞这个事，把农业提到首位，优先发展。搞农业机械化，农业技术改造，成为优先发展，优先安排，搞个上10年，10多年，我看也差不多了。10年不成，再加5年，5年不成，再加6年，20年，经过20年努力，我们不把我们的农业搞成大部分的工作由机械来做，我就不信，总可以机械化的。当然，使用什么型号的机器，如何在山区、在梯田使用机器，这都是一大堆的问题，这都是困难的。中央准备这样做，而你们首先是去加强组织工作，现在就可以搞，改良农具也不要随便搞，县的机械厂，甚而至于专署的机械厂，不要搞。至少由省的机械厂先开始搞，要有工程师，到成熟了，然后到专署、县的机械厂造，按照一定的技术规定，工艺规定，要检验质量，又要遍地开花，任何工厂都搞。这样，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把农具加以改良，再进一步机械化，从半机械化到机械化。

搞好中国的农村，办好人民公社，搞好集体经济，实行农业的经济的技术改造，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光荣的、伟大的任务。所以，你们去做的工作，也可以说就是头等伟大的，头等重要的、头等光荣的任务。不要看不起中国的农村。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中来的，现在要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好转，要把中国发展起来，要把中国工业化，要抓农村，农村不发展，国家工业化没有希望。

28）在晋南地委负责人汇报关于加强生产责任制提高农活质量问题时的讲话(1962年8月27日)

这两个材料都看了(指陶鲁笳送的侯马市委关于杨谈生产大队提高农活质量的报告和《山西日报》八月十四日登载的关于如何有效地提高农活质量的报道)，你们有些什么，再讲一讲。

(×××说，我们主要是把生产责任制的问题汇报一下)刘少奇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首先讲，我们的生产责任制是什么样的生产责任制？是包、定，奖生产责任制，包就是实行作业组小段包工，有的是固定地段连续包工。定是定任务，定质量，定时间，定报酬。奖是两级验收，双评双奖。两级验收是，每项农活以作业组验收为主，生产队重点检查验收，每段农活以生产队为主和作业小组相结合检查验收。双奖双罚是农活质量奖和评产奖或年终综合评奖。即对每项每段农活，根据质量要求，加记或扣减工分。在固定地段，连续包工的作业组，每收获前根据评产加记或减记工分，对不固定地段的作业组，分季或年终综合评奖。奖励，主要是奖工分，因为有了工分可以分钱，也可以分粮。)刘少奇说：工分奖就包括实物嘛。

(我们夏季有百分之七十左右的生产队，每个劳动日能分到一斤左右粮食，我们的粮食分配办法是，基本口粮和按劳分配相结合，加照顾。根据我们的经验，基本口粮定死好，最少定到每人一百八十斤，即最少每人每天能平均到五两粮食，其余按劳动日分配。每个劳动日能分到一斤粮食，对调动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大有好处。对五保户，四属户，多子女困难户要有照顾，需要照顾的粮食大致占社员分配部分的百分之三左右。)刘少奇对这个办法很重视，反复问了几次。

(我们继续讲，生产责任制主要是对农活质量负责，我们的责任制是连质量，不是连产量，保证了质量，就保证了产量。为了提高农活质量，我们主张，实行作业组固定地段，连续包工的地段责任制和社员按件计酬的农活质量责任制相结合的办法，这样就把集体负责和社员个人负责统一起来，以集体劳动，集体负责为主。集体劳动，便于互相学习技术，便于互相推动和监督，能够培养和锻炼社员的集体主义思想意识，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和保证农活质量。因此，除少数适宜于个人做的农活应包给个人做外，多数农活应当实行集体操作。根据我们的调查，需要长年或临时包给个人单独操作的农活占农活总数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主要是饲养牲口、割草、运输、担茅粪等。用工约占总用工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需要集体操作的农活，占农活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五左右，用工约占总用工数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其中除少数需要大集体操作，即生产队统一组织操作的农活外，如全队性的基本建设，抢救灾害，洪浇等，这种农。活一般占农活总数的百分之一左右，用工占用工总数的百分之四左右。其余大部分农活都是适宜于三人、五人、十人、八人集体操作，合伙操作或统一劳动个人操作的。实行个人计件的农活，一般占农活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其余的是根据农活情况采取评工记分，按底分记工，按时记工的办法，也有少数特种经济作物是包工连产)刘少奇问：连产的有些什么？(连产的一般是务西瓜，有些果树，少数菜田等。)

(其次，根据我们的体会，加强生产责任制，提高农活质量，必须解决好以下五个问题。(一)组织好作业小组，这是建立生产责任制的重要基础。作业组的组织是根据农业分工的需要和劳动力的情况来组织的。一般是自由结合，领导搭配)刘少奇问：搭配是搭配什么？

(搭配主要是搭配骨干和技术好的，以及捣蛋鬼。我们地区作业组的组织，一般有两种：一种是翼城县庄里生产大队的作业组，专业分工较细，短小精干，每个生产队部有畜工耕作组，包括饲养员和使役人员，负责饲养牲口和耕作土地。有的生产队还有种菜、杂工、副业组。田间管理组一般是五至七人组成，有些老年和妇女单另编组，分配适宜他们体力的农活。另一种是侯马市杨谈生产大队，只有大的分工，除牲畜饲养和副业，组织专门性的作业组外，田间耕作是综合性的作业组，也比较大，一般是十五

人左右，必要时由作业组临时组织操作小组。(二)搞好定额管理。定额应该以质量为中心，质量第一。根据定额给社员合理计酬，给社员计酬不仅要有数量工分，而且要有明确的质量工分。例如侯马市杨谈大队，收麦时规定割四亩记十六分工，割净(一方丈不丢十五穗)记十分，茬高不过寸记六分。打棉花顶，一亩十二分，其中打顶二分，留足果枝七分，打净油条三分，全好记全分，那项不好扣那项工分。有些农活的质量工分可以超过数量的工分。杨谈大队提出，保证农活质量就是最大的增产节约)刘少奇说；是最大的增产节约，没有质量就没有产量，没有产量，工分就不值钱，工分不值钱，大家越不干。

(我们认为，能够标定定额的都要标定定额。根据典型调查，除了少数抢救灾害、查苗补苗、洪浇以及某些临时突击性的农活外，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农活都可以标定定额。要尽量扩大标定定额的范围。有了定额还必须建立严格的检查验收制度，才能保证定额的贯彻执行。)刘少奇说：你说不好他说好，要检查。

(我们认为，能够标定定额的都要标定定额。根据典型调查，除了少数抢救灾害、查苗补苗、洪浇以及某些临时突击性的农活外，百分之九十五左右的农活都可以标定定额。要尽量扩大标定定额的范围。有了定额还必须建立严格的检查验收制度，才能保证定额的贯彻执行。)刘少奇说：你说不好他说好，要检查。

((三)加强对社员的政治思想教育(略)(四)提高社员的技术水平，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技术水平，是保证农活质量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翼城县和侯马市杨谈大队的调查，回乡转业和休学的青年，约占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占青年的百分之六十左右，这些人生产技术相当差，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安心农业生产，不好好学技术，这些人做活质量很差，群众意见很大。)刘少奇说：很多青年对农业不熟悉，农业这一套本领学会很不容易，犁地、摇耧播种一年才有一次吆，十年学会农业这一套本领就算不错。现在有些人不会还不学，你没有奖励制度，他为什么要学？有技术的工分要高。

(翼城县和杨谈大队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办法是：第一、教育青年安心农村，发动青年学习技术。第二、鼓励老农带徒弟。例如摇耧，不少地方老农带着青年学。)刘少奇说：调牛，调会一个牛需要三、四天，你总得给他记工分，带徒弟也应该给记工分。

(第三、建立技术夜校，请老农和技术人员传授技术。第四、建立试验田，组织青年实学。这些办法效果都很好。我们主张除了继承和学习老农的生产技术外，还要学习新的科学技术知识，要把老农经验和科学技术知识结合起来。(五)对捣蛋鬼，要有一套治的办法。这种人虽然不多，但影响很大。……对于这些人，根据我们的经验，必须分别情况，从政治上、经济上、行政管理上和法制上采取措施进行教育和改造。具体办法是：第一、建立严格的三投制度和严格的农活质量的检查验收制度。在检查验收农活质量时，重点是检查这些人。第二、在组织作业组时，把这些人搭配到有坚强骨干的作业组内，不少地方是搭配在队长在的作业组内，有的地方还固定专人教育监督。)刘少奇说：对捣蛋鬼，几个人夹一个人，把他们夹起来。

(第三、实行基本劳动日和基本口粮相结合的制度，凡达不到基本劳动日的要扣减基本口粮。有些地方经过群众讨论，还实行了集体代管口粮的办法。第四、对一贯小偷小摸的人，采取退赃和赔偿损失的办法；对投机倒把分子要实行重税、重罚的办法。对这两种人，总的是不能让他们在经济上得到实利。)刘少奇说：对投机倒把，要抽所得税，让他干不成。美国垄断资本对漏税的要收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八十五的税。自由市场，是不是要加上所得税，不过要可靠，要弄清楚。农村有百分之二十的富裕户，他们种自由地比较多，卖鸡蛋、卖菜等每年拿工人的工资×元，对这些人也抽他点所得税，看看有没有办法。

你们讲的生产责任制和提高农活质量，是集体经济巩固的重要问题。国家同农民的关系是一个方面的

重要问题；另一方面是分配问题，干部多分、多占，领头的不好，你多分，社员就有意见，他就不积极；再一个是生产责任制和农活质量的问题。大体上是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国家和集体，征购减一点，等价问题还不能完全解决，要逐步解决。分配问题，干部多分、多占是个重要问题，领头的要好，要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生产责任制问题，你们百分之三十的队基本解决，只能说基本，还需要提高巩固，杨谈大队也是去年才解决了。另外还有百分之七十的没有解决好，其中百分之五十好些，百分之二十很不好，这还是个大问题，反过来说，即使百分之七十解决了，百分之三十没有解决，也还是一个重要问题。

如何解决？你们讲的这些办法是好的，自由结合，领导搭配是好的。搭配是两头嘛，好的，不好的，对多数人应该相信。这和初级社不同，必须要有领导搭配。初级社是自愿结合，不好的，不要你进来，现在好坏都进来了，每个队都有几个捣蛋鬼，如果没有个好办法治，会影响大家都不好。

领导问题，生产队干部，上边派人不行，我们派的人只能到公社，还解决不了生产队的问题，生产队干部主要应该在本队选。驻队干部主要应该是保证民主办社，勤俭办社，分配公平。

奖工分和奖实物一样，奖工分实际上是奖钱、奖实物。大家抢工分，工分就不值钱。质量第一，提高农活质量就是最大的增产节约，一个队节约几十个至百个劳动日，每个劳动日分的就多了。越不讲质量，用工很多，浪费了劳动日，产量很低，工分就越不值钱，收入就越少了。这只要给农民讲清楚，农民是会懂得的，大家就精心了。

落后队的问题，一个是国家要得多，一个是干部不随心，多吃、多占，一个是捣蛋鬼。勉强搞下去，农民是担心的，群众没信心，你今年搞不好，明年还搞不好，你不让单干，不行嘛，今年不单干，明年要单干，你不让他单干，他暗单干。

你们山西，山多，你们不是停耕了一部分吗？(×××说：停耕的大部分已经还耕了。)你们不是还有封山育林吗？这些不耕的山，有些还可以产粮食嘛？可以产橡子、山梨，核桃。橡子比玉茭只少百分之十五的淀粉，多了百分之一点五的单宁，处理好可以解决饲料问题。你们不是还有榛子树嘛？山多要多搞点粮食，不花多少劳动力，不要怕多，可以酿酒，可以喂猪。美国每人平均产两千斤粮食，百分之八十五是喂牲口的，每人口粮是一百余斤粮，一百多斤肉，三百多斤牛奶。你们有山嘛！我看搞一下有前途，要很好的利用这些山。土地是有限的，再开荒，全国开十几亿亩，都在边疆，是几十年的问题，每年开一千万亩，一百年才开十亿亩，开一倍，需要一百六十年。耕地加一倍，那时人口也加一倍，还是不行。把山地都利用起来，这是一个方向问题，是一个移民的方向。橡子萌生需要八至十年，整一下十年八年收入就很大。要认真想一下，搞一下，要当作一个事情搞。要集中的种，这样好收打。把这项成猪的精饲料，就可以腾出粮食来给人吃，猪多了，可以搞肉吃，人的粮食也解决了，现在我们的粮食并不少，就是肉少，没奶。

29） 对组织部负责人的讲话(1962年11月12日)

刚才望了一下你们送来的材料，问题很多，要谈些什么？

党员课本要通俗一点，不要摘引毛主席的话，就当课本上的话说。

干部的三本教材，是教育干部的，就不同了，可以摘引。

干部下放，不要叫这个名字，想一想叫什么名字好？要叫个光荣的名字，下放比坐机关光荣一点。组织工作组到农村去搞社会主义。在农村中搞社会主义，就要有党的领导，要有组织保证。农村六十条，要民主办社，勤俭办社，没有组织保证，他就不那么搞，又不民主，又不勤俭，结果办不好。办不好，集体经济就不能巩固，有些人就要散伙。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一吆喝，有些贫农也就跟着跑。集体经济散伙不是就这一次，现在有，以后还会有。单干风不能保证以后就没有，一个时候还可能刮起来，要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有组织保证。你们能不能保证？

教育五亿农民搞社会主义，不要看得那么容易。党不下大力，不努一把力，不会搞得那么好。苏联是不是搞好了？集体农庄是不是那么巩固？很难讲。你说他不好，他要散伙也不容易，因为有那么多机器。你说他好，也不见得。自留地很多，每户有十几亩，农民都去搞自留地。他几十年都没有搞好，我们如果不注意，几十年也不一定搞得好。

现在大家办人民公社，是不是感到有些为难？下放干部×人，不少了。问题是质量问题。要经过选择，选那些能办社会主义人民公社的，能办集体经济的，有能力，有办法，情愿生活苦一点，首先自己下决心，抛开城市生活，为了一个理想，真正自愿，有理想，有决心的人。

这次下放干部，不要同一般的下放干部混淆起来，因为这几年下放了很多干部。这次就是要领导骨干，下去的人就是要领导，要北原来的公社党委强一些。下去叫工作组也好，不叫工作组也好，实际下去是当公社党委书记，这是低标准。要派一些县委书记下去，有些人可以比县委第一书记还强一些，一般要强于现在的公社干部。工作组名誉不好，有些人担任实际职务也可以。

下去搞几年，真正把公社办好，保留原来的待遇，工资不变。真正要办好一个公社，没有几年不成，下去不是一年，而是多少年。要自己下去真正办好一个公社，取得经验。你们是不是有办好公社的经验？我是没有经验，因为我没有办过。包括你们在内，大体上也没有经验。像你们，也应该下去搞一点经验。主要是省一级要下去，省、地、县都要选一些干部下去，中央机关也要选一些下去，当社党委书记。

一方面要估计到多数农民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多数农民需要的，集体经济是可以办好的，这是基本的估计。另一方面又要估计到多数农民没有经验，不晓得怎么办好。有一部分办好了，有一部分没有办好。现在要求单干的，是那些没有办好的地方，三类社队。现在有些没有办好，对集体经济丧失当心。办得不好，搞出个办法来，他也赞成。要办好，得有个过程。现在还没有机械化，机器一来，还不晓得怎么个弄法。

机器一来，如何搞，如何经营管理？技术干部要放到有机器的地方。总有些人愿意这么搞吆。有些是工作组，有些人担任实职，搞三、五年。

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讲重新考察干部好，这个需要。这几年有些人提拔得不适当，有不少人有意见。

干部不是每年要鉴定一次吗？几年没有搞了，要恢复起来。今年鉴定说好，过了两年又不好，再过几年又好了，人是在变化的，这样做有教育意义。

甄别工作，工资原则上不补，困难的应当补助。档案抽出来，开了端，档案可以抽掉，这样好不好？

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基层组织问题，一个是干部问题。组织工作要正常化，党没有人管了，党不管党不好，要有人来管。两个问题，起作用更大、影响更大的是干部问题。要重新教育干部，选择干部，鉴定干部，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对干部的要求同一般党员不同，应当有更高的要求，干部是从党员中出来的。干部当中，特别是高级、中级干部中有不好的，有坏人，蜕化变质的，他们所起的影响同基层党员几个人所起的影响不一样。

十中全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党将来是不是有人搞修正主义？现在有人要搞，高岗、彭德怀就是。高级干部中有，青年干部中也有。有人公开提出要按着赫鲁晓夫的办法搞，如×××的儿子，到苏联留过学的，不留学的也有。将来我们死了，你们也死了，你们的儿子、孙子，靠得住靠不住？从苏联、南斯拉夫的经验来看，搞社会主义，有些曲折，不是什么奇怪现象。从打倒资产阶级，消灭剥削制度，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共产主义，中间经过几个曲折，是合乎情理的，历史发展是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是这样，封建主义国家的经验也是这样，要经过几个反复，最后才能巩固。我们现在当成一个问题提出来，要大家注意，加强教育，将来曲折可能少一点。有点曲折，不至于占优势，或者发生了曲折，很快就能转过来。

你们的儿子、孙子，能不能保证？现在留下个遗嘱，留下个作风，留下个制度，留下个办法。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就可-使后代有所遵循。他们有了理论，碰到这种问题，知道前小+是怎么说的，这样可以好一点，保证不了，也可以引起注意。

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一种保证。国家的民主集中制，也是一种保证。最基本的制度，就是这个。因为多数党员，多数工人、农民是要搞社会主义，不愿意资本主义复辟，不愿意搞修正主义。我们知道，斯大林对敌人是很坚决的，做了很多好事，但毛病不少。他把民主集中制破坏了，确实受了很大损害，一切是他个人说了算，一切光荣归于斯大林。斯大林没有把民主集中制搞好，赫鲁晓夫利用了这点，赫鲁晓夫自己也搞这一套。多数的党员、工人、农民不赞成赫鲁晓夫，也没有办法。要很好地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

此外，干部当中确实有蜕化变质的，思想变了，感情变了，生活也变了。那样的人要开除党籍。要搞几个大头头，象高岗，搞了那么一帮手人，生活腐化，影响很大，听说青海也是这样。这些人开除党籍，如果他们以后好了，还可以恢复党籍；不好，就不恢复。有个刘鹏，薄一波他们在邯郸把他开除了，以后一直表现很好。这些人不开除，下边不服，是高级干部，你可以搞，我们也可以搞。这些人在党内，他们又是高级干部，一有风吹草动，事情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就会使资本主义复辟，革命果实就丧失了。有两类典型，一类是表面上生活艰苦朴素，如彭德怀、饶漱石，这样的人是少数。一类是贪污腐化，从中央委员起，军队还有一部分将官。象这样的人要开除，不然就不能保证党的纯洁。留下这批人，党就纯洁不了。这些人是标兵，不处理，别人就处理不下去。警告一下，不起作用，留党察看，也不起作用。当然，先留党察看一下也可以，表示我们做到仁至义尽，恐怕以开除党籍为好，因为这些人实际上已经是资产阶级。当然，一般生活问题，犯了些小错误，政治上没有问题的，不在内。我们指的是那些突出的，长期不改的。

干部的重新教育很重要，这些人不听教育，抵抗教育，走他自己的路，还要引导党走他的路。一种是违法乱纪，蜕化变质。还有一种是反党篡党，是政治问题，问题更严重，危害更大。但他们的问题一下子不容易搞清楚，不要简单处理，留在党内多争论几次，做反面教员。

什么叫贪污腐化，什么叫蜕化变质，要有个界限，大家讨论一下，对于这一类问题，比较容易看清楚。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不必留在党内当反面教员。这种人，开除一批有好处。开除了他，他清醒了，不搞了，反而挽救了他。好了再进来，不好再开除。登记党员，这些人登记不登记？

登记党员是一次登记，集中力量搞一次。全党这么多党员，不集中力量搞那么几个月，搞不好。教育训练党员、登记党员搞两三年，党委还要搞别的事呀，工作一忙，又放下了，好不好？

我们党对开除党籍，长期以来采取慎重态度是对的。现在搞社会主义，有的组织一帮子人，有组织地违法乱纪，搞贪污集团，对这些人采取爽快一点的办法，不会犯错误。这些人也不会多，高级干部当中更少，下个决心开除一批，影响就好多了。改正了可以回到党内来，军队上有些人革命几十年，身上挂过花，好嘛，你就改嘛，开除了反而有一批会回到党内来。如果不采取断然手段，这些人就没救了，对这些人的处理不能拖拖拉拉。

注意不要搞多了。生活上的问题，犯点小错误应当教育。不要把小错误搞成大错误。我主张开除少数人，不会犯错误。这对保持党的纯洁会有好处，大快人心。这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历史毁灭了，荣誉毁灭了，作为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光荣称号也毁灭了。这些人愈多，搞得愈久，愈处理不下去，党内的事情就不好办。要搞那些突出的，不要搞那么多。事情没有调查清楚的，不忙搞。初次犯错误的，经过一个过程，可以先不开除党籍。搞清楚的，搞了多次的，撤消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再讲。这样就使那些人知道没有便宜可得，就会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采取这种办法，其中有一部分人可能改变，可能教育过来，每个省都有那么几个。这样处理他们，你说会不会犯错误？将来会不会又要平反？不会的。

一个是教育。

一个是干部员正变了质的，变久了，不是无产阶级的战七了，成为资产阶级分子了，无产阶级党内是不能容许的。至于说政治上犯了错误，象邓老主张单干，彭德怀搞了一套假的，人家看不清楚，不要轻易处理。又如习仲勋，表面看来还很好，里面搞那么一套，别人一下子不容易看清楚，这种人危害大，影响大，但是简单处理，解决不了问题。那些贪污腐化的容易看清楚，可以简单处理。保留起来，危害也大。

交流干部，你们怎么想的？第一批交流百分之五，有的可能多一点，有的可能少一点。你们去执行一下，试试看。因为过去没有搞过，没有经验。交流一些，有很大好处。对于干部本人有好处，多跑一些地方，多做一些方面的工作，多接触一些人，总有好处。一个人长期总是在一个地方，)？知不觉地就要受限制。人总是要碰到一些问题的，碰到一些困难的。困难是不好的，但是有好处。你总碰过，碰总比不碰好，你根本不去碰，结果碰了，就不得了。特别是有那么一些地委，县委，还有那么些部门，搞得很久了，新的东西进不去，形成一帮子，先调开再讲，调到别的地方就好了。比如安徽曾希圣，把他调到山东去，没有帮子，他就做好事。他这个人我很熟，你说他很坏，我也不相信，后来变坏了。张仲良在天水搞个反革命案件，抓了一百多人，后来发现搞错了，虽然没有检讨，但他放了。曾希圣就不是这样。曾希圣对“××、×××、×××明知道是搞错了，后来还是那样整。曾希圣在安徽搞久了，现在把他调个地方，没有处分他。如果早调出来，可能好一些。

有一帮子的，先把主要人调开，免得他陷得更深。调到一个地方，没有一帮子人，他就要小心谨慎。根据这个标准，可以订个计划，可能不是百分之五。为了慎重起见，先搞百分之五试试看。小集团搞久了，关系固定化了，互相包庇。你生来就是领导者，我生来就是被领导者，好象贵族一样，生来就是贵族，共产党从来就不承认这个。今天你可以领导我，明天我也可以领导你。

党委第一书记是党委会的领导人，而又服从党委会的领导，是领导者，又是被领导者。党委第一书记

不承认他要受党委的领导，他只认为他是党委的领导者。要打破书记领导固定化的这个关系。要注意有这样一些机关、企业、部门、地方、组织，有这样的事。可以先交流交流，头一回没有经验，少交流一些，因为以后还要搞，但是要做到心中有数。

把他们调开，放在一个大的范围里边，眼界宽了，就不是小组织了，变成大组织了，包括外国。比如卡斯特罗，我们人也不认得，见也没有见过，就是喜欢他，就是和他很好，感觉很亲密，什么话都可以和他说。赫鲁晓夫人也见过，同他打过多少次交道，就是不那么喜欢。

我们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不是少数几个人团结起来。只搞一个部门、一个省团结起来，那就不是无产阶级的事情，那就是违背马列主义的事情。有些人是有意识地这样搞的，有些人是无意识的，搞久了就不知不觉，变动一下，就好了，陷得不深了。全国的山头大部分打破了，有些人关系密切一点，但不是山头。对党内的问题还是按原则，不是按山头的关系来处理。西北有几个不好的领导人，象高岗、习仲勋，还要搞山头，是非以山头分，是我的山头的就是是，不是我的山头的就是非，对的也是错，错的也是对。西北的干部要有这个自觉，西北这个山头至今还没有完全消灭。有人要组织山头，维护山头，这对西北的干部也是不利的。这违背了马列主义，违背了全党团结的方针，违背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的方针。过去我们提照顾山头，是为了消灭山头。现在山头在全国还有残余，但不多了。在西北的干部中，还要做些工作，留心这个问题，注意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讨论这个问题。有些人为什么要搞山头呢？就是没有阶级分析。要搞阶级分析，不要搞地方分析，不要搞山头分析。每个地方都有阶级，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西北也有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阶级分析，就有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无产阶级思想。习仲勋不光是搞西北的，还搞姓习的一家子。他不管阶级，只要是姓习的，就很感兴趣，河南一个姓习的老头，讲习家的家谱，那一个朝代有人做什么官，他听了很感兴趣。这是一种落后的表现，是从马列主义的倒退。陕甘宁边区，我在那里住过，没有具体管那里的工作，有几件事我过问过一下。西北的同志多数是好的，后来出了一些干部，多数搞得也好。我的家乡解放以后第一任县委书记就是陕北人，以后当过地委书记现在是省委书记，他也没有搞在里边，可见人是受环境影响的。西北就是原来几个领导者不好，高岗、习仲勋、贾拓夫，有意拉这么一帮人，有些人就陷进去，要解散，转过来就好了。要以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来判断是非。不要以地方来判断是非。本地人做错了也要反对，外地人做对了也要赞成。如果不搞干部交流，还会出现新的山头。

讲山头，我也是华东的，我是新四军的政委，曾希圣是七师师长，是我的部下，可是我到安徽，他对我封锁，不向我讲老实话。他那个山头是后来形成的，他做错了事，怕别人进去揭露。有些人在一起搞久了，外边的人进不去，外边的话也听不进去，彼此互相包庇。这些人首先要交流，这个不要去宣传，你们自己心里要有个底。

可能交流的人很多，一次交流不了，以后再交流，首先是这一批。以后没有这个问题的也要交流，不要使人感到有了问题的才交流。调开有个缺点，可是有好处，什么问题都碰过。我到中央工作以前，经常调动工作，只有在三个地方工作过三年，安源、华北局、华东局，其他地方不到三年就调开了。要去的地方常常是工作上出了问题的地方，我也不说困难，总是要有人去，与其别人去，不如我去，收拾收拾，去了搞好就是了。调动多，有缺点，但也有好处，各种干部都接触过。过去有个时期，说过干部要稳定，那是必要的。

在一个省委、一个地委搞久了，要调动一下。有些人是会提上来的。总之，我们是要死的，你们也是要死的，死了谁来呢？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工作了十几年、几十年，而且只是在几个县工作，到中央来无法工作。如果到多少县、多少省工作过，到中央工作就不同了。对优秀的干部，好的干部，为了培养，也要调。不是交流的干部都不好，优秀的干部也要交流，为了使得他更好。干部就是要出些难题给他。交流干部不只是为了今天，也是为了明天，不只是在一个省的范围内，而且是在几个省的范围内。搞得

好的调出来，派到工作差的地方，把这些地方也整顿好。

干部鉴定很有必要，不是一年一次，两年、三年一次，总是需要。中央直属工交企业的干部管理，还是由中央管起来好。中央组织部增加十几个人，不算多，中央几个部都撤消了，你们加几个人嘛。

干部管理不是管多了，而是管少了，不是管细了，而是管粗了。过去管了等于没有管，下面报来就是照批。比如青海×××，副省长，就是中央管理的干部，你们还不是批了吗？安徽×××、×××、×××，都是中央管理的干部，都开除了党籍，开除了那么多的人，你们管了没有管？还不是曾希圣管，中央并没有管，也就是中央组织部没有管。中央组织部是中央的一个机构，现在需要真正管起来，要管得细一点，要去了解干部。过去连人都不认识，不但我们不认识，你们也不认识，这样对党对工作不利。别的地方少几个人，你们这里要多几个人，管干部的要多几个人。现在党的工作、干部工作根本没有人管，党委没有一个部门管，结果连提意见的人都没有。发生那么多事情，应当看作是你们的责任。你们这个部门严格起来，突破你们那一关，就不那么容易，就没有空子可钻，对党对工作就有利。如果你们松松垮垮的，就有空子可钻，对党就不利。当然，过去你们只好靠省委管，以后还要靠，但是你们总要了解。有些不同的意见，总有好处。

管理工程技术干部，你们要有点那方面的知识。你们也需要有些工程师来管干部，了解他们的情况。我们这些人都是革命的，讲革命，我们是熟悉的，工业我们不熟悉，技术我们更不熟悉。有些搞技术的干部，在我们看来，可能有大毛病，在懂技术的人看来，可能是小毛病，因为他们钻了技术，少搞政治，势必政治上弱一点。政治上他们依靠党领导，在政治上他们没有独立见解，但是，在技术问题上可能有独立见解。所以你们既然要管这些人，就要找一些懂技术的人来做这个工作。搞组织工作的人，也要慢慢换班子。你们死了，什么人来？大概总要比我们文化高一点，技术懂得多一些，是大学毕业的。要注意这方面的问题。技术干部将来很多，全国要有几百万人，高级的要有几十万人，有全国闻名的，有全世界闻名的，要把这些人管好。组织部要有新的成份，也要换班子，不然你们又是一帮手。将来你们死了，高级知识分子来了，不会搞组织工作，就会出乱子。苏联就有这个问题，接不上。科兹洛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做党的工作，国家的领导工作，不懂得技术。要调一些懂技术的人来学马列主义，这就比科兹洛夫他们好些。有计划地调些人来，慢慢地学点马列主义，而且要到农村去看看，在中国，不熟悉农村，做党的工作就做不好。

军队转业干部有一部分可以回农村去，比如连排级干部就可以回到农村去，都分配工作有问题。这次军队转到财贸去的×万人，不一定要那么多，有一部分愿意回农村的，可以回去，有些人也可以分配工作。如果要人，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找。这个问题要赶快向军委和财办商量。

军队转业的干部有二部分要回农村的，有一部分要派工作。有工作就派，没有工作的怎么办呢？要与军队商量一下，不一定转多少，就收多少。

每年有多少万大学毕业生都是需要的，他们大部分都派到经济企业中去，多一点不要紧，这同国家机关、党的机关不一样。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也需要安排一些大学生，但是要在厂矿工作过的，不要以为大学生多了就是一个问题。组织部门一个工程师也没有，有困难，但是都是工程师问题就大了，主要是谁领导谁的问题。厂矿企业的技术干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大学生到厂矿企业不是去当厂长，不是大学毕业一个，中等技术学校毕业一个，就顶走一个。那一个工厂的技术干部多了？这不是编制问题，就顶也只是顶那些不懂技术的科长、科员，就是非生产人员。技术干部是生产人员。现在并不是要那些大学生去管行政，现在的厂长并不是工程师出身，相反地，应该有一些工程师出身的人去当厂长。

干部休假也不一定一年休息一次，两年休息一次也可以，可以作些临时规定。身体不好的，疲劳了，可以休息一个月。不疲劳就不休息。所有的干部都规定成一个制度，恐怕还不到那个时候。病了当然要

休息，有些人没有病，疲劳了也可以休息，不要等病了再去休息。有些身体好的，就不要休息。现在就可以这样做。有些人休息的时候带多少人到处乱跑，群众意见很多，休息就要认真休息。

党员教育，可以。党员登记还没有经验，可以先搞点试验。除了集中地进行教育以外，也要进行经常的教育。登记可以集中到一个时候登记，也可以这一个地方登记，那一个地方不登记，参差不齐。

发展党员问题，有的地方党员很多，有的地方不发展一点就没有青年了，这些事没有人管，还是要有人管才行。支部工作就是要组织部管，省委、地委、县委的组织部要管起来。没有人管干部、支部不行，管干部、管支部的机构不那么纯洁就不好。健全组织部就是说党要管党，就是要建立经常工作。要提出这个问题，党的组织没有人管，要不要管，什么人管，怎么管法？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可以发个加强组织部、宣传部的工作的通知。

一个是干部，一个是党员。干部要从党员中出来。干部当中的问题不少，干部的提拔、挑选、鉴定、管理、教育，也还有处分。处分不对的要平反，处分对的就不平反。干部中有那么多问题，有些不象党员，不处理就不好。党外很多人担心：共产党没有当权是好的，当了权是不是会腐化？这的确是个问题，我们自己也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列宁也提出过这个问题。执政的党，有的干部可能腐化下去。个人是可以腐化的，但是党不会灭亡。如果对腐化堕落的不处理，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可能变质，这是个严重的问题，革命等于白革。有些人名字是共产党，表面上是搞社会主义，实际上不是共产党，是国民党。不好的要处分，包括开除党籍，不这样就不能保持党的纯洁性。搞错了的要平反，但是该处分的还是要处分，不过不能处分太多。苏联党就是发生了很多问题，新疆跑过去的人写回来了两千多封信，××了一千三百多封信，这些人很后悔，说那个地方就是只认得钱，有了钱什么事都可以搞，为了搞钱什么事都可以干，晚上一个人不敢走路，父母不管子女，子女不管父母。社会风气搞成那样子，首先是党的问题。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不注意、不留心，就是党也可以变质。我们的个别地区、个别部门的组织已经变质了，比如××、××，这是一种类型。还有××市委，中央的什么口号来了，他们应付一下，平平淡淡，也不反党，可是几个书记勾结起来，贪污、腐化、堕落，这不是变质？还有安徽，也是一种类型。这些问题要处理，其中有些人要开除党籍。要大张旗鼓的处理，要通报全党，进行教育。至于一般的多吃多占，搞了一点，就不同了。党内容忍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就会发展，变质的人就更多，愈到后来就愈难处理。我们党有这个好处，只要一发现，舆论上大家就反对。多数是处理了，有的还处理得不够干脆。苏联就不能发现，发现了他还说没有，也不处理，结果愈到后来就愈多，就愈难处理。苏联的扒手、流氓那么多，是有组织有集团的，与他们的内务部有联系，不然为什么有些东西丢了他们就能够找回来？过去北京警察局也是这样，重要人物丢了东西，限他三天找回来，找不回来就撤职，他就找回来了。他们同盗窃分子是勾通的。解放后，把北京的警察机构彻底改造了，他们就没有勾通了。我们有的公安机关也变了质，××，××、××的公安机关变成了国民党的资产阶级的机关，就是资产阶级复辟，那里的问题就麻烦，当然，专政的机关还有军队、法院，只要他们没有变质，光是公安机关变质，他们也没有办法。我们的军队是好的，公安机关有个别的变质了，这是一种阶级斗争，应当提高警惕。彭德怀、习仲勋这一类问题你们不好管，要由中央来管。贪污腐化你们能够管，要好好管。对贪污腐化要注意大的，越大越好。现在有些大案子处理不下去，有人顶住。不要怕，处理了这些人，大多数人是拥护的，这就能保证党的纯洁性和无产阶级的本质。

总而言之，不要脱离党员多数，不要脱离群众、干部、工人、农民的多数，要认真的搞民主集中制，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保证一个领导、一个多数，这可以使我们党保持纯洁，将来曲折少一点。一点曲折都没有也不会，不过少一点是可以的。苏联、东欧这些国家是大曲折，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文化水平比我们高，但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将来要落后，我们将来要超过他们，因为少走曲折、少走弯路。有龟兔竞走的故事，要提高警惕，乌龟也会快的。这个话不要到外面去讲。他们已经走了弯路，转过来不容易。

我们前两年也有些问题，有些困难，有些人吃不饱，社会风气有些问题，现在好些。苏联不是这样，有些人并不困难，吃得饱，但是搞些乱七八糟的事。我们有些人也是这样！德州市委有些’产部搞坏事，并不是因为吃不饱，而是因为他们吃得太多了、太好了，用得太多了、太好了，这就是资产阶级了，一般的多吃多占要教育，突出的要处理。

刚才谈的都是执政党以后的问题，不脱离群众，干部交流，加强监察委员会，加强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要好好执行，民主集中制不只是召开代表大会的问题，还有党内、国家整个一套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党要有人管，组织部、宣传部要加强。党没有人管，将来要吃大亏。毛主席讲，取得政权后阶级斗争还存在，问题是采取什么形式，在那些方面表现出来。那些人听到我们讲阶级斗争，很不喜欢，这恰恰证明我们是提对了。有敌我矛盾，有人民内部矛盾，不要划分错了，不要把敌我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当做敌我矛盾，这两方面的问题过去都有过。有一个时期，把许多人民内部的问题当作敌我问题，但也有应当开除没有开除的，象贪污腐化，性质是敌对的。

取得政权以后，如何进行党的建设，就是这些问题。

30）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1958年11月18日)

同志们：

你们的扩大会议已经开了许多天了。我看了你们会议的一些文件，但是没有看完，又听了周扬同志以及其他同志的关于你们会议的汇报，我认为，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

在这次会议上，你们提出了在哲学、社会科学各个战线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的任务。我认为，这是很正确的，很有必要的，很及时的。

在最近几年，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些重要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我们发表了不少的重要的文章，这在我们国内和国际的人民群众中，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目前，是需要更进一步，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这种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我觉得，需要在中央一级的各种报纸刊物上，在各大区的，在各省、市、自治区的报纸刊物上，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文艺理论以及其他各个学术战线上，来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因为，现代修正主义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进攻是深入到各个方面的，是深入到各个学术部门的，他们的挑战是从许多方面进行的，在各个方面，都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向我们进行挑战。我们不能回避这种斗争，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粉碎他们的这种进攻。

为了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我认为，各方面的科学工作者和各级的党政领导干部必须要很好地团结起来，参加到这个斗争中间去，必须有更多的人参加到这个斗争中间去，一方面是为了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的进攻，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使更多的人在斗争中间得到锻炼，得到提高。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是在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左”倾机会主义各种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而目前正是一个关键的时刻。现代修正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各方面举行了进攻，使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有一个具体的斗争目标，这是件很好的事。在目前，我们如果不参加这种斗争，就不能使自己成为好的革命者，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不能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提高各门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平，就不能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反，如果我们积极参加到这个斗争中间去，那么，就可能使原来不是好的革命者也成为好的革命者，原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原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理论水平不很高的，会要提高，各门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平不很高的，也会要提高，就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需要发展的。现在世界革命的规模已经极大地扩大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在许多国家更加深入了。新的经验已经大量地积累起来。正确地总结这些经验，使之成为系统的理论，就能够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今后的运动。

在这些新的经验面前，现代修正主义者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作出了他们的结论，向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举行进攻，实际上否定最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并且在全世界向那些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政派和个人举行疯狂的进攻，首先是向中国共产党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起来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对于被修正主义者所歪曲、篡改、阉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我们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总结新的历史经验，提出我们的看法，作出我们的结论，在全世界的人民中间树立起我们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同现代修正主义者对立起来，要彻底驳倒他们，粉碎现代修正主义。

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是很贫乏的，它的表现形式也是庸俗的，形式主义的，他们的行为是下流的。许多国家的现代修正主义领导集团中间的大多数人，可以说已经完全堕落了，我怀疑，有许多人已经被资产阶级收买了。造谣，说谎，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明目张胆地歪曲，篡改，斩头，去尾，挖

心，对于一切不完全听从他们指挥的人，他们是放肆地、广泛地使用威胁利诱的手段。他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广泛使用阴谋特务手段，进行颠覆活动，以至于进行收买，在你的房子里面安窃听器，用美人计等等，这一套的坏事，可以说他们是无所不为的。因此，在理论上绝不要过高地估计现代修正主义，以为他们在理论上有什么高明，他们的理论水平是很低很低的。现代修正主义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说，在理论上面是一种大倒退。要从理论上驳倒他们，并没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对于他们的阴谋和流氓行为，却应当有充分的估计。

我们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和著作，不只是给现代修正主义看的，而主要的是给我们国内的人民群众看的，也给世界的人民群众看的，而且首先是给那些革命者，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的。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地总结世界革命的新的经验，要正确地分析当前国内国际上的重大问题，要对国内国际的人民革命斗争有所帮助。因此，我们写出来的东西，特别是公开发表出去的东西，应当有比较高的理论水平，应当采取科学的、老老实实的态度，要摆事实，讲道理，并且要力求通俗易懂。所有现代修正主义者在争论中间采取的那些造谣、歪曲、断章取义、谩骂等恶劣的手法，我们都不要采取。

为了粉碎现代修正主义，为了写出具有较高水平的东西，我们就需要重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就需要占有大量的资料，要鉴定一些材料的确实性，还要审订一些经典著作的译文(因为一些译文译得不完全正确，要加以审订)，需要就一个专题组织若干人座谈，提出意见，拟出纲领，然后写出初稿，初稿写出来以后，再进行讨论，然后再写出第二稿，第三稿，第四稿。不要怕多花点工夫，多努一点力，不要怕多征求人家的意见，不要怕人家多提意见，特别是提反面的意见。写出来的文章，就是要人家驳，看驳得倒驳不倒。凡是驳倒了的，站不住脚的，都不要用，驳不倒的，那才是可以的。我看，写文章需要采取这种方式。要组织多少人，集体来加以研究，加以创作。最近我们发表了许多文章，就是集体写出来的。……应当尽可能征求更多人的意见。而且除开征求有理论水平的人的意见以外，我看还要征求读者的意见，水平不高的普通的人，我们的秘书，我们的警卫员，要他们读一读，看他们感觉怎么样。也要征求党政领导人的意见。你们写出来的文章，不论是那方面的，使我们也参加一下嘛，或者也可以提点意见嘛。我想，中央，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的各级党政领导人，应该尽量地同你们合作，尽量地帮助你们，支持你们，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中间作出成绩来。这样跟你们一道合作，我看可以搞出东西来的。我们有我们的缺点，我们的知识水平有些不够，很多学问是你们清楚的，我们不清楚，当然，你们也有你们的缺点，某些方面我们比较清楚的，你们不清楚，是不是？但是，我们一合作起来就会好了，就可以作出成绩来的。那些东西应当写，那些东西不应当写，那些应当先写，那些应当后写，一共要写多少，有多少题目，我想应当分门别类地拟出题目来，定出一个初步的规划，然后按照这些题目，根据先后，组织一些人来进行工作。一个题目总要组织几个人，更多的或者十几个人，来专门搞。至于讲征求意见的人，那就可以更多了。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这不是一天的事情，恐怕是要搞多少年的事情。而这个斗争也是复杂的，是各个方面的。这个斗争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关系到世界人民革命事业的成败。这是当前世界上头等重要的大事。在这个斗争中，一定会要大大提高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一定会要成长许多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家。凡是不畏艰苦，努力学习，努力钻研，不怕犯错误(还有个不怕犯错误)，勇于改正错误的人，那就不论他是党内的，或者是党外的，都可以在这个伟大的斗争中作出贡献，并且使自己得到改造，得到提高，成为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而也就可以在学术上作出更多的建树，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这里，我想讲一讲犯错误的问题。一个革命家，一个革命者，要改造世界，要进行斗争，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等等(写文章于什么？写著作干什么？就是要改造点什么东西嘛)，犯些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就不能怕犯错误。如果怕犯错误，你就不能革命，你就不能改造世

界，那就什么事情也不能做。要在错误中间锻炼出来，成长起来。同时要勇于改正错误。我们这些人就是不晓得犯过多少错误的呀，不犯错误就是不行的呀。犯了错误，又改正了，就取得成绩，再犯错误，又改正，又取得成绩，总是这样，正面的经验，取得成绩的经验，跟反面的经验，犯错误的经验，两方面结合起来，无论他是理论家也好，学术家也好，以至于革命者也好，他才能够成熟，成长，不然，不能成长的。所以，有几位讲怕发表东西，怕犯错误，怕受批评，怕人家指出他的错误，我看这也不好。马克思就不晓得人家骂过他多少，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共产党，挨骂最多，并没有把我们骂倒。无非是人家批评得对，批评得不对嘛，总是这两条嘛。批评得对，那是人家应该批评的，就改嘛，接受嘛；批评得不对，人家不对，人家站不住脚的，那是不可怕的，他不是真理。

百家争鸣，百花齐敖，推陈出新，这是中共中央老早定了的政策，现在还是继续执行这样的政策，坚定地执行这样的政策，特别是在学术方面。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面讲过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六条标准，大概这六条标准你们还是赞成的嘛。六条标准中间，最基本的是两条：一条是共产党的领导，第二条是社会主义道路。只要不是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只要不是反对共产党(从前那个右派就是说要共产党下台，要轮流作庄，这样不行)，那就不要紧。凡是学术上有不同的意见，尽量讨论嘛。是不是还有人想争取要我们放弃那个六条标准呢？说在六条标准以外也可以百家争鸣，同时又不要人家批评，不要人家驳，我写的东西是为了反对共产党的，同时你们不准驳，要驳就是一棍子打死，这样不行。请同志们注意，是不是有人有这种要求。至于讲讨论意见中间有不对，特别是写出好东西来，特别是那个善意地提出意见，有缺点要改正，那这是完全需要的。就是我们中央写出来的文件，也要经过多次修改，有的时候，一个草案多少年还是草案，还是可以改的。最近不是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十个问题吗？我们还是当作草案，你们可以攻，说那一条不对，那一条还可以修改，是不是明年再作为正式决定发出去，看嘛。

现在有了一个现代修正主义出来，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就要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为纲，来带动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也带动各方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术研究工作和写作工作。

在国际上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大大有助于防止国内修正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当前我们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外国的修正主义。外国的修正主义已经有很多东西。要把这个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深入到各个方面去，深入到政治经济学方面，文学理论方面，历史方面，其他方面。我们这样做，就会在中国，在我们国内，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打开人民群众的眼界，那么，修正主义在国内的发展就困难了。我们反对外国的修正主义，中国的修正主义要发生发展就困难了，因为人民的觉悟提高了，眼界打开了。我们进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也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进行这个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虽然反对的是外国的修正主义，不是跟中国没有关系的，是有关系的，对中国人民有利的。

我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现在有许多工作要做。首先是粉碎现代修正主义，然后我们要写出各方面的著作来。不只是要批判人家，而且我们自己要写出我们的东西来，写出我们的历史，写出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写出我们的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还有法学，国际关系史，世界史，很多东西。过去，这些东西都是外国来的，后来一个时期是苏联的。现在帝国主义不好了，苏联搞现代修正主义，垮台了，那些所谓“文明”国家的，就是帝国主义国家的，日本人的，苏联的，都不能用了，这一下好了，只好自己搞，统统要自己搞出来。但是，要能够写好这些著作，现在马上要抓紧这个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要从各方面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在各个学术方面的那种歪曲，那种歪道理，然后我们才能写出我们的好东西，区别于帝国主义，也区别于资产阶级的东西，也区别子现代修正主义的东西，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

做好这些工作，有伟大的国际意义，在国内也有伟大的意义。特别是我们的近代史，从鸦片烟战争以来中国的革命史；一直到我们一九四九年取得胜利，一直到我们合作化完成，一直到现在，这段历史，

现在凡是革命没有胜利的国家，都要学我们的。苏联有些经验，有些经验是好的，是可以学习的，有些经验是不好的。我们是不是能够写出比较更好的东西？如果我们写得好，的确有全世界意义，在国内也有伟大的意义。所以，我觉得，应当大大加强这一条战线的工作，就是说，哲学社会科学这条战线的工作要大大加强起来，应当有更多的青年投入这一条战线，扩大这一条战线。

这中间包括一个培养这条战线的干部问题。我们必须用正确的方法来培养社会科学方面的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我觉得，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必须抓紧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干部的工作。当然，各研究机关也要注意，也要抓紧。怎么样培养呢？什么是正确的方法呢？我的意见是这样，看行不行：我觉得，科学研究工作的干部应当同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干部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交流。青年干部应当参加一个时期的基层工作，就是农村、工厂这些基层工作，以后逐步参加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工作，同时也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以后再做一个时候的科学研究工作，从事写作。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我们应该避免苏联在培养干部工作，特别是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队伍的工作中间的某些缺点，这就是理论工作者脱离实际工作的缺点，实际工作者缺乏理论的缺点。苏联的理论队伍搞了这样久了，有不少的人，现在写出来的文章是那个样子，实在不象样子，不晓得你们看了怎么样。理论家，理论工作干部，缺乏实际工作的经验，而实际工作的干部又缺乏理论，苏联几十年是有这个缺点的。这也算是经验之一嘛。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避免他们这个缺点，以后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干部不要搞成苏联那个样子就好了。以后，特别是青年，要使他们能够当县长，能够当厂长，能够当党委书记，又能够坐到科学研究机关进行某种研究。当然，还有各方面的捷径的问题。我提出这样一个意见，看是不是可以做好，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做。我想，中央的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当把关于以后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队伍的问题，社会科学研究干部的问题，当作一个问题来研究一下，采取一些具体办法，扩大这个社会科学方面的队伍，这是不成问题的。

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些问题，你们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就简单讲这么一点。

下面再讲一讲目前的国际形势。目前的国际形势究竟怎么样？许多人有这个问题。在工人、农民中间有这个问题，在学生中间有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机关干部中间也有这个问题。

现在就是这样的：美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台湾蒋介石匪帮我们还没有消灭他，还在那里；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也在不同的程度上反对我们，印度的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的支持下反对我们。特别是苏联以及其他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出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世界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被修正主义的领导集团所控制。如此看来，世界革命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中国是不是被孤立起来了？这个问题到处地方有。你看，一个美国，南面一个印度，北面又来一个苏联，那怎么得了呀了天是不是黑了？我看不是这样。苏联是一个大国，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革命胜利有四十多年了，又是列宁的故乡，到现在出了这么严重的修正主义，无疑在世界上要发生相当大的影响，刚才讲资本主义世界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集团被修正主义控制，就是它的影响。这是一件坏事。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并且可能成为一件大好事。它可以教育我们，并且教育全世界的革命人民，来重新考虑问题，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以后，革命胜利以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甚而至于又打败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取得胜利，还可以出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还有复辟的危险的。这就使我们考虑问题了。单是一个南斯拉夫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还不注意，全世界的人都不注意，不能教育我们，不能使我们警觉起来，或者其他的小国搞修正主义也不警惕，一定要苏联这一搞起来，我们就警惕起来了。为什么列宁的故乡，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样久，工业化完成了，农业集体化很久了，农业机械化相当长时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打倒了法西斯，现在还搞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有复辟的危险，为什么？经验在那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中国，怎么样可以避免将来发生这种危险？这就教育我们，来考虑这样的问题。我跟一个越南同志谈话，他说，代价太大了，我说，不花这样的代价不行呀，你看，南斯拉夫搞了这么一个事情我们不注意嘛，你们也不注意嘛，一定要苏联出这个修正主义，我们才警觉起来的。

代价是大，但是只要我们很好地总结了经验，正确地总结了经验，以后能够避免这种事情，在我们的国家能够避免出修正主义，而且在以后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都能够避免，那就是大好事了。不然，在我们国家，以及在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得出的，那个代价可能更大。所以，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在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可避免的。这就证明，斯大林一九三六年在他那个宪法报告上面讲的一段话是不完全正确的。他在那个宪法报告上讲，现在苏联的剥削阶级已经最后消灭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在苏联的国内最后解决了，只是在国际范围内没有最后解决。这是斯大林这样讲的，原文如何，我记不清楚了。现在证明，就是在苏联的国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也没有最后解决，他这个话说早了。出修正主义嘛。修正主义就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在共产党内部的反映。但是，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总是要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的，这一条是不变的。只要有帝国主义，有反动派，它就是要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群众，因此，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总是要起来革命的，这一条也是靠得住的。

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已经起来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并且在许多国家已经取得了胜利。帝国主义不可能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些国家的革命运动镇压下去。修正主义也不可能阻止这些革命的发展。现代修正主义的丑恶面目已经在世界人民群众中间暴露出来相当多了，并且将在以后继续要暴露。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政党，其中有中国共产党，越来越取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就是在那些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控制的党内，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左派现在是到处地方迅速地形成起来了。现在除开中国以外，还有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的。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亚、泰国、缅甸、老挝、菲律宾、新西兰等国的共产党是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古巴共产党是不能不反对美帝国主义的，也是不能不革命的，所以，古巴共产党是个革命的党，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拉丁美洲，有委内瑞拉的共产党，还有其他几个国家的共产党，是坚持革命斗争的。巴西共产党现在已经分裂成为两个党，一个叫巴西共产党，一个叫巴西的共产党，稍许有点不同，一个是革命的，一个是不革命的。在澳大利亚、锡兰、印度这几个党里面，有强大的左派。现在澳大利亚的左派已经出版了刊物，出版了报纸，要建立新党。在锡兰，今天报纸上看到，有四个中央委员发表声明，也是准备出版报纸，建立新党的。印度也有强大的左派。在欧洲、意大利、法国党里面的左派很多，很活跃。在比利时，有个很大力量的左派，现在也建立起了组织，也出版了报纸。在荷兰也有左派。在瑞士，也建立了一个新党。英国最近不是有十四个党员发表声明吗？西班牙、丹麦这些国家的左派都很活跃。就是在苏联以及其他某些被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所控制的党里面，他们的领导是越来越不得人心。而中国党和毛主席在世界人民中间的信仰是越来越高了。我们有不少的人到苏联去过，我们有留学生，有大使馆在那边，还有些工人，最近回来了。比如最近我们十月一日派到苏联去一个友好代表团，他们回来讲，见了苏联的普通的人，都是对我们友好的，一方面不敢跟我们接近，另一方面都向我们表示友好，各种表示，甚而至于自己不好招手，手里抱个小孩子，要小孩子招手。有很多这种事情。这种事情，周扬同志还可以多讲一点，这个新闻多得很。在捷克、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都是这种情况，人民中间，除开极少数的人以外，对于我们并没有什么反感。因此，我们完全不感觉孤立。有些人感觉孤立，我们是不感觉。

现在，世界上的革命力量正在重新组合，世界革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帝国主义阵营的情况相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进一步分裂了。美帝国主义已经没有法子指挥法国的政策了。法国这一闹独立性，给美国的打击相当大。西德以及共同市场的其他国家也必然要跟着法国，要摆脱美国的控制，日本也会要跟着来，要摆脱美国的控制的。我们不能相信西德、日本这样的国家长期听美国的话，那是不可能的，一定会要摆脱它的控制的。美国的指挥棒越来越不灵了。南越的吴庭艳被杀害了，台湾蒋介石很恐慌。美国的政策是要搞掉李承晚，搞掉吴庭艳，还有一个，要搞掉蒋介石，现在两个都搞掉了，就剩下蒋介石了，他现在是非常恐慌。巴基斯坦这样一个国家，是参加东南亚条约和中央条约的，现在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改善了。还有亚洲、非洲许多的友好国家同中国的关系有进一步的

发展。我到东南亚几个国家去访问过。年底我们的总理周恩来同志也准备到锡兰，到非洲这些国家去进行访问，发展这方面的关系。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苏联搞修正主义，他们就不跟中国友好了，没有这个事。除开跟着指挥棒走的那么几个国家以外，共他国家都对中国表示友好，而且进一步表示友好。

目前革命同反革命的力量对比到底怎么样？这个问题，就全世界范围来讲，也很难讲，我举一个例子，各位就看清楚了。比如在越南南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越南南方有人民武装力量，听说有那么×万人，不脱离生产的恐怕多，一就是有那么一点人民武装游击队，可是它就超过美国和吴庭艳的力量。美帝国主义是有飞机大炮，有原子弹的，而这种人民游击队就是步枪，轻武器，打游击，可是就越南那个具体力量对比来讲，人民武装的力量超过美国和吴庭艳的力量，美国和南越的反动派不能消灭人民武装力量，相反，人民武装力量就可能把美国人和反动派赶走。这总是种力量对比嘛。在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力量已经把法国和北大西洋联盟的反动力量赶走了。这是法国愿意走的呀？那是死硬赖到那个地方不走，说是那个地方有一百多万法国人，就是属于法国本国的领土，无论如何也不允许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以至于赫鲁晓夫说那是法国的内政问题，联合国也不敢讨论，说那是法国的内政问题，联合国要讨论，法国不出席，不准联合国讨论，毫无办法，联合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赫鲁晓夫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这十几万游击队把法国赶走了。这也是种反革命跟革命的力量对比的具体表现嘛。总而言之，人民的力量是超过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力量，只要那个地方的人民力量真正发动起来，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现在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就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在西欧和北美，现在人民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在南越和阿尔及利亚，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只要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照南越，照阿尔及利亚那样，就有可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因为这些地区帝国主义国家力量薄弱。不薄弱，为什么在南越它不能消灭这些游击队？为什么在阿尔及利亚不能消灭这些游击队，它要走呢？所以，只要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坚决的斗争，那么，就可能战胜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革命的人民面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确实是纸老虎。

现在人们不放心的就是苏联出了现代修正主义这个问题。现代修正主义已经干了许多坏事，以后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的修正主义者他们到底还能够干出一些什么坏事来？以后他们还是要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的，这是他们要做的，出卖人民的革命，这是也要做的。但是，苏联和其他某些被修正主义统治的利：会主义国家同美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苏美矛盾基本上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帝国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都不可调和痲，美国人同修正主义就那么喜欢呀？是不可调和的，它们在基本上要取得妥协也是不可能的。某些妥协可能，现在就是外层空间，上月球之类，那些不关系当前利益的事情是可能的，关系到当前利益的事情不可能取得妥协。虽然赫鲁晓夫真要跟中国闹翻，对美国表示好感，可是美国人还是不能给他什么好多东西。所以，苏美在基本问题上取得妥协是不可能的。

中苏关系，在目前的情况下要取得根本的改善，我看也不可能，进一步恶化是可能的。即使进一步恶化，我看也没有什么可怕的。现在苏联对我们还能做什么事呢？已经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了。什么援助，技术援助，这些东西老早没有了，我们也不希望了。现在只剩下这样几件事：第一，两国还有国交，两国的大使还没有赶走，再坏，无非赶走大使，断交嘛。第二，还有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毁约嘛，把这个条约废除嘛。第三，不作生意。第四，在中苏边境上闹事，他开点军队放在我们边境上，陈兵边境，制造紧张局势，在边境上挑衅。我看，最多他只做这四件事。这四件事，我看也没有什么。国交，我们是不要断绝的，是他要断绝。毁约，废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也没有什么，现在它已经不大起作用了。毁约，无非告诉美国人，你可以去打中国，苏联不管，无非是这样。美国人打中国，我们也不要靠苏联的援助，应该靠自己。美国人也不一定能打。只要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废除，美国人要打中国呀？不会的，相反，它要拉中国反对苏联。美国人怕的还不是中国，它第一个怕的还是苏联，它不一定打中国的。那么，真打起来了，我们到华盛顿，到美国去，我们跟它的力量对比，我们是不如它；可是，我们不到华盛顿去，我们也不到美国去，它到中国来，那至少我们比南越，比阿尔及利亚的力量要大一点嘛。到中国的土地上面，我们可是不怕。越南也有几个同志到延安去看过。讲起延安，我

就说，我们的延安跟你们的太原差不多。我说，我们就是在延安那个时候，讲起力量对比来，我们样样不如人家，不如蒋介石，不如日本人，更不如美国人，我们的优势只有一条，就是说，真理、正义在我们方面，我们比较得人心，除开这一条以外，一切不如人家。可是，就是在延安的时候，我们的力量，革命的力量，超过蒋介石，超过日本人，也超过美国人，不然，为什么把他们赶走了呢？我说，你们越南在太原那个时候的力量超过法国人，不然，法国人为什么要走呢？你们不需要到华盛顿，到巴黎，跟法国帝国主义，跟美帝国主义较量，到那里去比力量对比，而是在你们北越，在南越来比力量对比，那么，法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比你们不赢。此外，就是不作生意。不作生意就不作生意，没有什么，其他国家要跟我们作生意的人很多，我们倒还没有这样多出口物资供给他们。相反，现在苏联怕我们不作生意，他总是说我们降低了对他们的贸易是不好，在这一点上攻击我们，他不敢断绝贸易关系。现在他的肉也没有吃，面包也困难，特别是蔬菜、水果困难。我们北京的水果摊子摆起这样多，对他的吸引力相当大。你晓得，以前莫斯科的许多东西就是中国供应他的。我一九六。年到莫斯科去吃的水果就是中国的黄岩桔子，此外还有点保加利亚的水果。所以，断交也好，毁约也好，不作生意也好，我看没有什么。能够不搞到断交，毁约，不作生意，那更好，他不愿意干，拉倒。至于讲边境事件，过去已经有，现在也有，以后还会有，这也没有什么，就是边界上闹闹事嘛，造点紧张空气嘛，搞点紧张局势嘛。许多人的问题不在这里，许多人的问题就是怕中苏开战，打仗，怕这件事。中苏开战有没有可能呢？我看没有可能，这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苏联和中国都是两个大国，如果要同中国开战，苏联就要动员全体苏联人民和全体苏联军队，才能和中国作战。而苏联人民现在是不可能被动员起来和中国作战的。现在这个时候要苏联的人民动员起来跟中国作战，动员不起来。我看，这一条完全不应该怕。湖南的农民讨论这个问题，大家有点怕，因为过去精神上没有准备。反美，反对亲美、恐美、崇美，这些事情，多少年以来就宣传教育的，不怕美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在人民中间不大那么怕。同印度发生冲突，人家也不怕，都晓得印度人打我们不赢，这个不可怕。现在一个苏联束了，你晓得怎么样呀？过去没有宣传过，没有听说过，打原子弹，你晓得怎么样呀？精神上毫无准备，过去我们总是讲苏联好嘛，中苏友好嘛，现在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打起来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要我们的人在农民中间作解释，讨论不能解决问题，议论纷纷。忽然之间，有个支部书记起来讲，他说，我们现在在湖南，假如湖北人搞修正主义，要湖北人打湖南人行不行？他说，那不可能。他说，假如你那个生产队搞修正主义，要你那个生产队打我，可能不可能？那不可能。就是这样解决问题了。所以，现在要动员苏联的人民，苏联的军队同中国作战，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所以，中苏开战的可能性没有，修正主义做坏事，这件坏事他不可能做，他做不了，做不到。至于讲断绝国交，毁约，不作生意，边境闹事，这个他可能做的，但是做了对他也不利，他也可能不做，而做了我们也是不怕的。一方面，我们要作最坏的打算，但是现在的形势是这样，最坏也坏不到那里去了。至于打笔墨官司，彼此写文章，今天跟你们讲的就是要打笔墨官司，那是要作长期的、充分的打算的，那还要打下去的。

以后我们仍然应当很好地进行中苏友好工作。我们不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批判他，中苏友好工作就不要做了，相反，我们要做，仍然应当很好地进行中苏友好工作，仍然应当学习苏联的经验，苏联的经验还是要学。苏联的经验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好的经验，他们做得正确的，取得成绩的，我们应该学习；还有不好的经验，坏的经验，犯错误的经验，我们也要很好地研究，也要很好地学习。比如苏联如何产生修正主义这样一个问题，就要很好学习的。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是会要继续发展，是会要永远存在下去的，要继续友好下去的。

总起来说，目前的国际形势是很好的，确实是很好的。

我们现在的国内形势也已经全面好转了。这有利于我们的国际斗争。国内形势好转，有利于我们在国际上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和帝国主义、反动派进行斗争。相反，现代修正主义的国内形势倒是越来越不好过了。苏联以及东欧某些国家，它们的国内形势越来越不好，这也不能不削弱它们在国际斗争中间的地位。

总而言之，帝国主义的寿命是不很长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寿命我看也长不了。帝国主义的寿命都不很长，修正主义的寿命能长得了？也是长不了的。所以，总的形势还是好的，斗争是有，困难还有，前途是光明的。

我讲这一点，讲完了。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31）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1964年1月8日)

刘少奇：现在开个会，请中宣部的同志以及文艺界的同志来，谈一谈文艺问题。请周扬同志谈一谈。

周扬：文艺问题，主席最近写了批语。前年十中全会的时候，少奇同志就讲了，在文艺战线上有一种资产阶级的现象。去年主席说，在文学艺术战线上要反对资本主义倾向。(刘少奇：十中全会讨论了反对修正主义问题，那个没有上公报。)这一年多来，主席很注意文艺问题。文化部也讨论了一下，做了一些工作。根本问题，就是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就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在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前提下面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九四九年开第一次文代会就提出了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提得迟一点。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承认这个方向，提倡这个方向，同实行这个方向，坚持这个方向，这不是一回事，这里有一个距离，有的时候就是违反这个方向，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坚持这个方向。现在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真正认真地贯彻执行这个方向。为什么这个方向不能贯彻执行得很好？我想，少数人就是根本反对这个方向的，不管他是公开的形式，或者隐蔽的形式，他就是不赞成这个方向，他就是要搞资产阶级方向，封建主义方向，对于我们的方向，他根本抵触，尽管口头上赞成，实际上是不赞成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恐怕是个认识问题。包括我们领导，包括我们自己，也包括我在内，并不是都认识得那么很清楚，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那么很坚定地坚持这个方向。(彭其。也有一个领导没有抓紧的问题。)我看最主要的是这么一个问题。

在认识上有什么问题呢？是不是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就指出，我们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在看起来，主要是个大众的问题。主席说，大众的就是民族的。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实际上就是为当时的抗日、民主、反帝反封建这样一个政治目标服务的。同样是为工农兵服务，但是解放前和解放后有变化，现在为工农兵服务，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刘少奇：性质变了。)这是一个根本的历史阶段的变化。都是为工农兵服务，但是那个时候的为工农兵服务是反帝反封建，是民主革命。当然，那个时候的文化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思想，但是，那个阶段的文化，社会主义只是一个指导的思想，只是其中的因素，当然是起决定作用的。而开国以后就不是因素的问题了，全民的文化都应当是社会主义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刘少奇：时代的问题，一个民主革命时代，一个社会主义时代。整个文化不只是包括文艺，而且包括社会科学，包括教育，在社会主义时代都应该是社会主义的。)过去是反帝反封建，而现在要直接批判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现在是反帝反封建、也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文化，而反资本主义是主要的，因为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反对的目标不一样了。还发生一个对旧有文化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过去还没有发生这个问题，开国以前和开国初期，还是民主革命性质，比如不要把头，不要封建的太落后的东西，现在则是要把旧有的文化改造成为适合于社会主义的需要。时代变了，经济基础变了，现在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就要跟这个基础相适应，就是说，现在的上层建筑必须也是社会主义的，如果上层建筑不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是半社会主义的，半资本主义的，就不能适应。这是一个历史阶段的变化。这个变化，在认识上不是很清楚的。

现在我们具体分析一下，应当说，现在的文学艺术，有相当多的东西还是同社会主义适应的。主席说，不可轻视这个成绩，这一点要估计到。十几年来，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不少的适合社会主义需要的，适合人民需要的东西。十多年来，文学艺术的发展是空前的，是过去历史上不能比的。现在长篇小说销到一百万册以上的不少。《红旗谱》、《红岩》，出到六百万册，《青春之歌》也突破一百

万册。过去历史上，就是鲁迅、郭老、茅盾的长篇小说，也只是销到几万册。时代变了，需要不同了。电影也有一些好的。这一方面要充分估计到。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东西不适应社会主义和人民的需要。这种不适应的情况，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的东西太少了，还不能占领阵地。新的不来，旧的不去。要拿那么多作品，才能够占领。(刘少奇；描写社会主义的少。)用社会主义的观点描写过去的事情，比如写抗日战争的，那还比较多一点。(刘少奇：《红岩》是描写解放战争的。写新民主主义时候的革命斗争故事多，而描写解放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合作化运动跟反右派的少。描写大跃进的有一点，后来把它搞掉了。描写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的东西太少。《朝阳沟》、《李双双》是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就不能巩固地占领阵地，有的时候占一下，以后又不行了，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又来了。

这里有一个领导问题。前几年大跃进的时候搞了好多东西，也反映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也产生了一些好的东西。反映新的事物本身有点困难。从领导来说，对新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支持不够。新东西总是比较幼稚一点，总是比较粗糙一些，如果不顽强地支持它，保护它，就搞掉了。在文化工作的领导上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象主席所讲的，也有一些对于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东西有兴趣，对于社会主义的艺术不成兴趣。因为旧的东西是多少年了，几千年、几百年了，它比较成熟。

再有一点，就是在认识方面没有看到新的东西占领阵地，不经过反复的、激烈的斗争，是不行的。如果设想很容易占领阵地，是不合乎实际的。比如开国以来，坏戏跟好戏经过好几次斗争。开国的时候，处理了二十几出坏戏，反对了那些落后的东西。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时候，那些东西又来了，一九五七年又反了一次坏戏。去年又反了一次坏戏。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要经过反复的斗争，新东西才能巩固。从领导方面来说，对于这个反复的阶级斗争还不够敏感。他们回想一下，右派进攻的时候，那种斗争形式是公开写文章反对社会主义，而在三年的困难当中，这种形式比较少，因为他已经有经验了，他晓得采取公开的诽谤社会主义的形式来进攻我们，一定会很快地遭到打击。现在是采取另外一种斗争形式，就是离开社会主义，搞死人，古人，洋人，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来挤社会主义的东西，来占领阵地。比如鬼戏，从一九五七年以来，赞成和颂扬鬼戏的文章有二百篇之多。这代表一种势力，它对于旧东西总是要尽量地保护它，鼓吹它。(刘少奇：赞扬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说过去的那些东西有高度的水平，而公开鄙视社会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东西，说社会主义的东西祖糙，文化低。这也是一个很直接的斗争。)

我们现在简单回顾一下开国以来文艺方面的思想斗争。从《武训传》开始，有《红楼梦》批判，反胡风，胡适批判，反对右派，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在文艺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这里有属于人民内部的，有属于敌我性质的，但性质都是属于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这些斗争，都是直接在主席，中央的领导下进行的，斗争的意义，现在看起来是很明显的。象胡风那种理论，在苏联是很吃得开的，现在苏联的理论还没有胡风的理论那么完整，那么高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这一段的斗争，主要是做了一些扫清基地的工作。扫清基地以后，怎么样生长出社会主义的文学，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同群众不结合。反右派以后，我们提出同群众结合的问题，把这个问题提到第一位，但是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

一九五七年以后，又可以分作两段：第一段，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到一九六。年下半年。第二段，是一九六。年下半年到一九六二年，这是调整巩固阶段。大跃进这一段，因为总路线提出了，全国人民的确是有革命干劲，革命情绪高涨。文学艺术在当时不管有多少粗糙的东西，站不住脚的东西，但是的的确确是反映了当时群众的革命干劲，表现了一种很可宝贵的革命精神。(刘少奇：雨后春笋一样地跑出来了。)民歌，剧本，出了很多新的东西。《朝阳沟》是一九五八年的产物，这是站得住的。还有一些该加工的没有加工，把它否定掉了。电影也有一些好的。有一些电影反映的事情不一定那么正确，但是那个电影还是很好的，比如写引洮的《黄河飞渡》，事情不一定是这样，但是这个电影看起来是很激

动人心的。还有，那个时候跟群众也比较结合。这两点，在当时是很突出的，现在也是应该肯定的。

大跃进时候的文学艺术，现在看起来，有一点缺点，就是当时的作品里边也反映了当时工作中间的一些缺点错误，比如几天几晚不睡觉，“共产”风，浮夸风，有些虚假的东西，那些也反映了。(刘少奇：满腔热情要跃进，结果碰了钉子，后来又改正。对于人民内部的缺点不是不能批评，但批评不是暴露，是教育。)现在倒是很需要写这样的作品，写点大跃进里面的革命精神。(刘少奇：大跃进碰了钉子，后来改正就好了。人民中间的缺点错误，党内的缺点错误，我们从来都是不禁止批评的，可以批评，而且提倡批评，提倡自我批评，自我教育，但是，不是暴露的问题，而是为了改进，为了教育群众，不是跟暴露敌人一样来暴露人民群众。暴露就是为了打倒，你打倒人民群众，打倒工农兵，那怎么行？但是，他有缺点错误，而且有相当大的缺点错误，应该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来教育人民。)当时是把错误的东西当作正确的了，比如搞跳舞来表示干劲，把一本书丢到地下，书上写“科学”两个字，说科学害死人，这样就不好了。当时这类的东西不少，有这个方面的缺点。但是，当时主要的方面是好的，有革命精神，而且有些作品现在还是站得住的。

另外还有一个缺点，就是采取了一些比较简单粗暴的方法，办法不那么恰当。北方人民作诗之类，那是做不到的。后来我们研究了一下，这个粗暴也要加以分析。现在看起来，恐怕至少有这么三种情况：一种，他的意见是错误的，方法也是错误的，强迫人家。还有一种，他的意见是对的，方法简单一点。这应当说他基本上还是对的，他的意见对嘛，总是意见为主嘛。还有一种，意见也对，方法也对，但是保守的人看起来觉得粗暴。凡是改这个，改变那个，不管你怎么样客气，他不想改变，你要他改变，他就说你是粗暴。(刘少奇：另外一种粗暴，就是那个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他粗暴得很。苏联的文艺界粗暴得很，我们这里反对社会主义的那些东西也粗暴得很。要注意那种反对我们的粗暴。胡风也粗暴得很。)有一种革命方面的粗暴，还有一种反对社会主义方面的粗暴。

所以，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下半年这一段，主要的方向是好的，精神是好的，而且有好的作品，但是有简单化的缺点。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到一九六二年这一段的情况怎么样呢？一九六〇年开了第三次文代会，肯定了大跃进。一九六一年开了全国文艺工作会议，开始注意纠正工作中的不民主的现象和粗暴的现象。这种现象也确实是有的。有反对社会主义的粗暴，我们的粗暴也有。北方有很多演员都想自杀，连常香玉这样的人都觉得很难混下去了。写《朝阳沟》的那个同志也整得相当厉害。一九六二年文艺八条，主要是强调百花齐放，强调民主作风。这方面还是收到了一些效果的。(刘少奇：整《朝阳沟》的作者什么？)批评他五个一贯，批评他右倾，自由主义。

一九六。年下半年到一九六二年这一段纠正一下这些缺点错误是必要的；强调一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强调一下艺术上要民主，还是有好处的，对促进艺术工作者的积极性是起了作用的。但是，这个时候反映了一个问题，就是“两为”和“两百”总是摆不好，强调“两为”，就不能“两百”；强调“两百”，就不能“两为”。现在也有这样一个问题，一强调“两百”，资产阶级的东西就恢复起来了，他们是只要“两百”。所以，强调一下“两百”有好处，但是也确实产生了一些右的东西。这一方面是由于领导上和工作上注意不够，也有当时的一种空气。那次彭真同志讲了经济上的单干问题，政治上的“三多一少”，文化艺术方面就是“死人”多，社会主义少。(刘少奇：演历史戏跟外国戏，就是演外国人和“死人”，北如演什么喂茶花女》，演十八、九世纪的资产阶级的东西。)那些东西里面，社会主义的东西是没有的，有一些民主性的东西，但是那个民主是资本主义的。(刘少奇：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不过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经起过一段进步的作用。其中有些艺术标准是可以吸收的。)恐怕吸收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当然，研究可以大量研究。(刘少奇：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到底起什么作用？群众看了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那个消极作用比正面作用大得多，它不是促进工农兵团结，而是促进资本主义思想的发展。十八、十九世纪的那些理想，资产阶级也没有做到，而且永

远不可能做到。)

前年十中全会以后，开始注意了这些问题，并且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加强剧目的管理，停演鬼戏，进行了关于戏剧的推陈出新的讨论，组织文化工作者下去。到去年下半年，现代的作品在舞台上面就开始多起来了。比方一九六二年的话剧是历史的、外国的东西多(外国的十个，历史的九个)，现代的东西很少，去年十月，外国的没有了，历史的只有一个。后来我们感觉，十中全会以后，我们还是抓得太迟了，也抓得不是很有力量，对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还是认识不够，还可以抓得早一点。后来，就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方向问题上，这不是一个个别的问题，不是一个个别的鬼戏问题，也不是一个个别的外国戏的问题，把这些现象综合起来，说明一个文艺工作的方向问题。拿戏剧来讲，你只讲鬼戏问题，老是纠缠不清，比如说是不是要厚神薄鬼，鬼戏就没有好的呀？讲不清楚。(刘少奇：有社会主义的鬼没有？)现在修正主义的文艺里面也有鬼戏。(刘少奇：是个文艺的方向，文艺的性质问题。我们的文艺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文艺？是资本主义的文艺，还是封建主义的文艺，还是新民主主义的文艺，还是社会主义的文艺？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后来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到方向问题上来，提到基础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上来，提到上层建筑要同基础相适应这样一个原则问题上来，提到文学艺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来，还提到反修问题土来，把这些现象综合起来，提到这么一个高度来看问题，就比较清楚了。有一个时期，我们有些同志，包括领导同志，对文艺界的问题，估计不够，觉得没有右派进攻了，三年困难时期没有发表右派的文章，觉得还不错，没有看到这些现象里面实际上很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刘少奇：这些戏里面，也有反社会主义的斗争形式，有隐蔽的反党。我看过《李慧娘》这个戏的剧本，他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似道那些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郭沫若同志以前不是写过《信陵君》吗？也是影射反蒋的吧？蒋介石也看不出来，他也不能禁止。这个《李慧娘》是有反党的动机的，不只是一个演鬼戏的问题。田汉写的那个《谢瑶环》，我在昆明看了那个戏，恐怕也是影射反对我们的。武三思的儿子瞎胡闹，替武则天修别墅，也是影射的。)我想，要从方向问题上来把这两个阶段的经验总结一下，经过调查研究，把这些问题搞得更清楚一些，至少在领导干部里面，包括各级党委的领导干部，把这个方向坚定明确起来。要采取总结经验，调查研究，发动讨论，经过试验这么一些方法去解决。因为这里面有些是方向性的问题，有些是属于艺术性的问题，理论性的问题也不少。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意见。

第二点，文艺问题一大堆，中心问题恐怕还是要创作社会主义的东西，要有产品。文艺跟农业、工业一样，没有产品总是不行。就是要有社会主义的好的作品，好的电影剧本，戏曲剧本，能够逐渐地把旧的东西排挤掉。有些旧的东西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坏处，但是多了就有坏处。方向明确了以后，就要用很大的力量来做艰苦的工作，来搞作品。这里面有这样几个问题：

首先是推陈出新的问题。这个口号是在延安提出的，后来到了北京，又加了百花齐放。看起来，推陈出新是整个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新东西从旧东西里面发展出来，新东西代替旧东西，否定旧东西，总是这样一个辩证过程。离开旧的东西，新东西就没有基础，没有出发点。特别是中国这么一个国家，旧的文化很多，更有这个问题。

推陈出新，其他方面也有这个问题，重点是戏曲、曲艺。(邓小平：电影，我们自己的东西太少了，外国的好多东西很坏。)现在要搞大量的电影。现在全国×多个艺术表演团，其中×多个是戏曲，话剧只有×个。戏曲队伍有×多万，是最大的一个队伍。(刘少奇：整个文化系统有×多万人。)至于业余的，多得不得了。特别是在农村中，都会唱旧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是大量的。×多个剧团里面，第一位是京戏(有×多个京剧团)，第二位是评剧，第三位是豫剧，第四位是越剧，第五位是川剧。从最近这个时期看起来，在推陈出新的问题上，主要是反对两种倾向：一个是反对保守，一个是反对粗暴。保守，就是多保存一点封建主义的东西。(刘少奇：听说我们各级干部喜欢看京戏，喜欢看帝王将相那些东西。京戏为什么这样多呢？北方干部到南方去，要搞个京剧团。本来广东、湖南、南京那些地方是没有京剧团

的。就是因为领导上面他喜欢这些东西，正如毛主席讲的，有些共产党员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而是喜好封建主义跟资本主义的东西，领导干部一提倡，一喜欢，甚至用挖墙脚的办法，高薪的办法，这些东西就多起来了。）现在戏曲里而有一种倾向，就是对于封建的东西采取不批判的态度，认为大部分是好的。张庚就是一个代表。有人说，封建性就是人民性，宗软和封建道德可以继承。历史界也有这么一种论调，强调封建道德的继承问题，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当然，过去的好东西的确很多，但是大部分是今天不能适用的，适用于今天的只能是一小部分，不可能是大部分，小部分也还要经过改造。在这个问题土，主要是领导的问题。演员是好的，包括赵燕侠，她并不拒绝演新戏，问题是要有好的剧本。对于推陈出新的理解也有问题，我们是要推封建之陈，推资本主义之陈，出社会主义之新，而有的人则是推封建主义之陈，出资本主义之新，实际上还是陈。

在推陈出新问题上，现在是不是有这样几个问题：

一、提倡演新戏，我看这是促进戏剧革新的很好的办法。真正要革新，首先是内容的革新，然后才是形式的革新。内容引起革新，剧本变了，舞台艺术自然也会跟着变。没有新的内容，很难变。所以，现在看起来，抓现代戏有很大的好处。我们想一想，×多个戏剧团，如果只表现封建，那个问题就很严重了。戏剧能不能发展下去，要看它能不能表现现代的生活。（刘少奇：就是为新的经济基础和新的政治服务。）演员演历史戏，他就欣赏帝王将相那些作风，他演现代戏，演向秀丽，她就要学向秀丽。（刘少奇：红线女不是很弱吗？她演刘胡兰，她就要学刘胡兰。）

在演现代戏的问题上，要注意这么几点：

第一，现代戏要提倡，还要搞好，注意质量，不要盲目追求数量，追求数量的结果，站不住，反而使演员失掉信心了。当然，不能要求所有的现代戏都要站得住，至少十个里有两三个要能够站得住。（刘少奇：要做艰苦的工作，要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再拿出来。）

第二，提倡现代戏，对历史戏、传统戏还是不要偏废，还应当继续搞些好的传统戏，历史戏。现在，现代戏的比重很小，还没有超过一斗。（刘少奇：历史戏要整理，而且要能够为今天所用，古为今用。有一部分古为今用的，还有一部分总结历史经验的。）（邓小平：历史上反映人民智慧的，包括将相智慧的，比如《将相和》，就是好的。）（刘少奇：但是有很多要经过改造。有些历史戏改得不好，比如《李慧娘》、《谢瑶环》之类。）京剧演现代戏是比较困难一些。

二、文化部门过去对剧目的管理太差了。剧目是每天同群众见面的，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常常忙得很，但对于最重要的事情没有管。最近文化部门比较注意这个问题了，要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这些方面，管这个生产品。这个生产品同物质生产品不一样，它要影响人的精神的。所以，要加强剧目的管理。

剧团究竟怎么搞，恐怕需要有一个全国的比较长远的规划。现在有×多个表演闭，业余的更多，如果都向旧戏发展，那怎么行呢？现在每一个县都有县剧团，但是它不能下去。为什么不能下去呢？闵为它要自给，它就要往外跑，它就要跑外省，跑北京，不往它那个县里面跑。当然，这里有经费上的问题，也还有思想上的问题。每一个县群众的经常的娱乐主要是县剧团，如何改造县剧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剧团成分很不纯，有国民党军官，有妓女，有劳改犯，没有人管。

三、要搞一个编剧队伍。话剧是新的，联系生活的，而戏曲里面有很多旧的人，思想意识也是旧的，他也不下去。恐怕要建立一个比较好的象杨兰春这样的政治上比较好的编剧队伍，我们的戏曲就能够站稳。否则，你讲改革剧目，而那个剧目就是掌握在不可靠的人手里，那就不行。

四、戏剧革新，要依赖艺人的自愿，采取合作的办法，不要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我觉得，演员还是

很不错的。(刘少奇：演员是跟我们合作的，他们在旧社会是那样，他们现在比较好了。)象常香玉这样的人，对我们也是好的，她现在是党员。

其次，是民族化的问题。音乐舞蹈怎么样搞成自己民族的东西，这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假定说推陈出新的重点是戏曲，那么，民族化的重点就是音乐舞蹈；推陈出新问题上主要的是反对保守，那么，民族化问题上主要的是反对崇拜。有的人，就是喜欢资本主义的东西，把十八、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当作高不可攀的，只能向它看齐。演一个《茶花女》、《大雷雨》的配角都感觉不晓得多么舒服，演《白毛女》就没有什么味道。这是一种殖民地思想。这十多年，我们反对了这种思想，但总还是有盲目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情况。

外国的东西要不要？肯定是要的。话剧、电影、音乐、舞蹈，都是外国来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外国的。问题就是要反对那个崇拜。(刘少奇：反对艺术上的教条主义。)那个教条主义相当厉害，总理多次反对过那个东西。(刘少奇：也可以用外国的芭蕾舞演中国的故事嘛，只能演《天鹅湖》呀？日本人就用芭蕾舞演了《白毛女》，中国用芭蕾舞演《朝阳沟》好不好？苏联在斯大林时代也搞了一点社会主义的戏，如《带枪的人》，还有一些，不过斯大林那个时期也搞那些封建的、资本主义的东西。还有《彼得大帝》那些东西。苏联搞了这么多年，我看社会主义的东西也少。斯大林讲了文化是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实际上他们社会主义的东西不多；民族形式，也就是《彼得大帝》、《天鹅湖》之类。)跟我们的京剧一样，他没有大胆革新精神。艺术工作中受外国影响比较深的就是音乐舞蹈。音乐历来是搬外国的，中国历来没有自己的一套。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外国的东西不能拒绝，要吸收，但是一定要批判。同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也吸收嘛。现在对亚、非、拉不发生崇拜的问题。(刘少奇：音乐里头的《黄河大合唱》，那是中国的。)用外国的科学的音乐知识来帮助中国人民的斗争。京戏也是音乐，所有的地方戏都是一种音乐，都是一种歌剧，跟《罗米欧与朱丽叶》一样的东西嘛，为什么音乐界不可以从京戏里面，从这许多戏里面吸收一些东西？搞洋的东西有一种坏的倾向，就是认为外国的东西好。这一点不打破不行。音乐有共同规律，但是还有特殊规律，还有中国自己民族音乐的规律，还有革命音乐的规律，现在是不找特殊的，只找共同的，就是学西洋。还有西洋的表现手法和表现程式，比如芭蕾舞的程式，可不可以吸收呢？是可以吸收的。至于工具，比如乐器，更可以吸收。不要因为反对洋，把那些排除。问题是要用得恰当，不要不中不西，把那个东西破坏了。比如大提琴，并不是不用，而是有些用得不是地方。比如川剧里面用大提琴，相当多的人不满意。教条主义就是不管用得着用不着，就是去用，而且要用西洋的格式来改中国的，这是最坏的。比方歌剧，一定要从头到尾唱，如果不从头到尾唱，按他的标准就不是歌剧。(刘少奇：这个结合的问题是一个很大的工作。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跟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音乐的普遍规律也要跟中国自己的民族音乐和中国群众喜闻乐见的东西相结合。这个结合过程，是一个艰苦过程。同时，这中间需要有高度的创造性。)鲁迅就结合得很好。徐悲鸿也结合得很好。但是结合得好，需要有修养，需要有才能，需要有过程。中国的很多作家，比如郭老，茅盾，中国的新文艺，都是吸收了外国的东西的。对于结合得不好的，要帮助他。要反对那种不中不西的，强加于自己民族的，破坏自己民族的，不是拿外国的东西丰富自己，而是把自己的东西改成外国一样的教条主义。这个问题，恐怕要用点时间才能解决。

最后，归根到底，关键问题还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跟群众结合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所有的问题解决不了。同群众结合了，其他问题就容易解决了。主席说，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长期过程，需要八年、十年，可能这个时间还要长。这里有个反复的过程。他以前结合了，以后进了城，又不结合了。最近我们搞了文化工作队下乡，有很多同志是在延安下过乡的，他们自己深深感到，进城以后离开群众了。(刘少奇；在城市里边跟工人结合嘛。)这是个根本问题。现在有不少人下去了，但还不是下去得很深入，下面有一句话讲得很好，有很多干部，从上面看，下去了，从下面看，他还在上面。有些文艺工作者还有一个错误的观点，认为下去就是体验生活，找点材料，然后自己回来创作，缺乏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思想。我跟文化部的同志谈，在这一方面，中央比起部队和地方来，比较落后，新的东西也是

部队和地方搞得多，而中央搞得很慢，也不一定高。原因就是一个同群众结合不结合和结合得好不好的问题。部队在这一方面的确是走到前面去了。(刘少奇：部队里面写兵，写军官，比较真实。反映农民的就不那么很象。象《朝阳沟》这样生动反映农民的很少。反映工人的恐怕就更少一些，不大懂工人。作家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和五反运动，可以写五反，写贪污盗窃集团如何搞，结果五反把他反出来，改正了，群众情绪大高涨，这还不是很好的戏？可以写正面的现象。)恐怕大跃进、反右派是可以写的。同群众结合的问题解决了，推陈出新、民族化问题就解决了。(刘少奇：有些年末已轻、身体好的，就要他下去，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年纪比较大的，身体不那么好的，可以想一些办法，比如让他去观察观察，谈谈话，参加他们的会议，跟他们交点朋友，在那个地方蹲下来。下去住在贫农家里面，和贫农同吃、同住，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是有很大的困难，不是容易的，要有很大的决心，装备都要重新做，要重新做衣服，要重新做鞋子，整个生活习惯要改变。住在招待所就不好改变，你到那里去就得改变。有些人是下不去，身体也不大好，下去他就生病。可以想点办法，或者专门搞几部汽车，那上面架起铺末，架起灶来，就住在那个汽车上，所有有公路的地方都可以去。)朝鲜有个办法，他们有自己的房子。(刘少奇：或者在农村里面也可以搞点房子。不过苏联有这种情况，就是他们下去住在另外一个地方，而且用墙围起来，脱离群众。)

刘少奇：今天时间不很多了。周扬同志作了一些情况的汇报，我看周扬同志讲的这些意见好。

主席最近有一个批语，批语上面讲，我们的艺术部门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所谓“死人”，恐怕就是指演历史戏，过去的观点，资本主义观点，封建主义观点。主席的批语讲了成绩，但是又说问题不少，戏曲的问题更大一些。主席说，现在基础改变了，为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还是大问题，不是小问题。周扬同志刚才讲，整个文学艺术的阵地，我们无产阶级跟社会主义占领得很少，封建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的东西，占压倒优势，阵地是它们占了。而这个阵地，你不去占领，它势必占。队伍又这样大，×万人，天天在那里演，影响很大，而演出的东西，跟我们的经济基础，跟我们的政治，是不适合的，许多东西是相反的。这里有厚古薄今的问题，就是毛主席讲过的颂古非今的问题，还有颂洋非中国的问题，这就是“死人”统治着，外国人统治着。

在文艺跟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我劝同志们再去看看《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上详细说明了文艺跟政治经济的关系。我最近又看了一遍《新民主主义论》，那里边有好几大段说了文化问题，《新民主主义论》是一九四。年写的，毛主席在那里说明了文化的性质问题，他指出，那个时候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主席批评了文化性质问题上的偏向，指出当时的文化有社会主义因素，因为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在国际上，中国的新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但是当时中国的新文化不是社会主义文化，如果认为当时中国的新文化是社会主义的文化，那就错了。毛主席把问题区别开来，他指出，要用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方法论去教育干部，教育群众，研究问题，观察问题，这是一回事，但是，整个文化的性质是另一回事，它是反映当时的新政治、新经济的。毛主席说，当时在中国有帝国主义的政治，帝国主义的经济，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所以，就有帝国主义的文化，封建主义的文化，还有买办资产阶级的洋奴文化，这都是旧文化；当时也有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当时的新文化就是反映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主席说，中国有一个时期会经有过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但是很无力，一出现就被封建的文化打倒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它的力量的软弱，比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力量的软弱还要软弱些，因此，中国的旧的资产阶级文化就没有象十八、十九世纪那个时候的资产阶级文化那么有力量地发展起来。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它是很有力量的，它比旧文化高明，能够把它反掉，反革命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都失败了，到后来没有办法，只好用数量胜质量。

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的时代变了，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代了。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了，到现在已经十四年多了。现在的经济基础变了，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现在的政治也变了，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无产阶级专政，所以，现在的新文化北《新民主主义论》那个时候讲的新文化又进一步了，反映现在的政治和经济的文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的文化。我们现在的文化的性质，不是封建主义的文化，更不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不是资本主义的文化，也不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是社会主义的文化。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工农兵方向。那个时期的工农兵方向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现在的工农兵方向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还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不属于社会主义范围，所以，那个时期的文化不反对资本主义，只是反帝反封建，而现在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反帝反封建也还是要，但主要是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在一九四九年以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主要的斗争。社会主义就是要反对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同志们必须明确。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毛主席说，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艺术标准是第二位的。艺术标准必须要，不能没有艺术标准，但是，艺术标准是第二位的，第一位的是政治标准。毛主席讲，那个时候的政治标准是“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了六条政治标准。这六条标准，不只是适用于政治，适用于其他科学，而且适用于文艺。这六条，反对我们的人，反对社会主义的人记得，倒是我们自己的人常常不大记得，常常忘记，所以，我今天再念一下：

第一条：“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乌兰夫同志跟我谈过，他说，那个《昭君出塞》是不是可以改一改，昭君在我们蒙古那个地方有很好的影响。《文成公主》人家是喜欢的。《蔡文姬》在这方面也值得注意。(周扬：《蔡文姬》是民族团结的。)

第二条：“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好的，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就是不好的，

第三条：“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

第四条：“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

第五条：“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

第六条：“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

毛主席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两条。”要“用这些标准去鉴别人们的言论行动是否正确，究竟是香花还是毒草。”这是一些政治标准。至于艺术标准，这里没有讲。

此外，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还讲，“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香花，各人有各人的毒草，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看法不一样，有的人就喜欢那个封建主义的文化，资本主义的文化，他认为那是香花，从广大人民群众看来，就是要有这六条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就是要根据这六条来审查剧目，审查你们的歌曲，小说，

诗歌，图画，音乐，不要忘记这六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讲了一些辨别香花毒草的标准，但是讲得最完整的是这六条。

最近在《宣教动态》上，××同志批了陈半丁画的一些画，他是用很隐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诗，用那些画，来反对共产党的。现在用戏剧、诗歌、图画、小说来反党的相当不少。那些右派言论他不敢公开讲了，他写鬼来讲。我们的宣传部，文化领导机关，各方面，要拿这个六条来判断香花毒草。而六条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跟共产党领导两条。

现在，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还只搞了十年，还需要有很大的创造。社会主义时代是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是比过去的民主革命更深刻，时间更长，规模更广大得多的革命，实际斗争，实际生活，有这样伟大、这样深刻的斗争，在文化上只要把它真实反映出来，就会比过去任何历史上的文化都更高，更深刻，更伟大。在这方面，需要有很大的劳动。首先是作家，戏剧作家，小说作家，文艺作家，音乐家，各方面的作家，要在这方面努力，力求反映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有各种伟大的斗争，比如公私合营，统购统销，合作化，以及大跃进，犯了错误又改正，等等。现在我们的经济已经全面好转了，这个好转，比我们的预料还要更好一些，因此，在经济土以后会要更好一些，不久又会有一个大跃进来的，而这个人跃进不是过去那个大跃进，要避免那些缺点错误。比如石油工业部在××油田苦战三年，得到很大的成绩，那个地方的工人是新的面貌，工厂管理，政治思想工作，整个工人，都是革命化，很可以去考察一下，写一写那个地方的工人。如果我们以后在政治工作、经济下作上又有一个高涨，那么，文化工作就要能够跟上来。过去那个大跃进，有很多正面的东西，文化上面也有很多反映。因为跃进本身的确有些缺点，因此，文化创作上面也有些缺点。但是，那些东西基本上应该说是好的，是社会主义内容的，反映群众的。大跃进中间的缺点错误，我们改正嘛。共产党领导好的一点，就是有错误他承认有错误，他改。作家要有很大的创造，演员群众也要有很大的创造。演员演工农兵要演得象，也要有些创造。要使现代戏占优势，要把历史戏、外国戏挤到第二位去。而这个现代戏要是社会主义的现代戏。过去新民主主义时代，反帝反封建，土地改革，抗日，那些戏没有什么消极作用，而是有积极作用的，有些没有写出来的也可以写，已经写出来的也可以演，也可以唱。但是，现在要搞社会主义现代戏，要提出这个任务。抗日，土地改革，那些事情搞完了，现在是跟地球作战，跟自然斗争，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混在一起，贪污盗窃有共产党员，而且有党委书记，厂长，或者科长，要反映这样的斗争。这样，才能鼓励现在的人民，现在的工农兵前进，这才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仅是革命传统不够，要鼓励人民立大志。有各种各样的志向，各种各样的理想，我看，总的就是这样：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彻底胜利而奋斗，把所有帝国主义消灭，把所有剥削者消灭。把中国搞好，把中国建设好，不只是为了中国人民，而且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为了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为了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人民要树立这样一个大志。什么叫立大志？别的星球现在不去管它，至少要把这个地球改造一下，把地球上的这三十几亿人口都搞成社会主义，将来建设共产主义。把中国搞好，一个是为了中国人民，但不只是为了中国人民，也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只是中国搞好了，全人类没有解放，中国人民没有自由的。现在苏联它要一个国家建立共产主义，那是不行的，违背国际主义的。当然，各人有各人的大志，有人要多写小说，有人要多作诗歌，有人要多写剧本，但是各行各业都要为这个总的目标奋斗。

要搞革命传统的教育，更重要的是革命前途的教育。社会主义的文艺，要鼓励现代的人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因此，就要表现现代的人。戏剧的形式，话剧应该更多一些，其他的京戏，地方戏，应该减少。是不是其他的剧种也可以演话剧呢？我看见过京剧演员演电影，演得很好。他只能演京戏，就不能演话剧呀？恐怕其他剧种也可以演现代戏。历史戏也可以演，有些历史戏是好的，可以古为今用，有些要重新编。比如《将相和》，内容也还是好的。我看过《恶虎村》，黄天霸原来是那

样，后来又改成那样，把自己的哥哥嫂嫂统统杀掉，投降了统治者。此外，有些历史剧也有改得不好的，比如《谢瑶环》、《李慧娘》之类。《团圆之后》这个戏恐怕也不能演，因为作者的观点、思想是不清楚的，实际上他是要人们同情那个团圆之后的父亲母亲，而那是不能同情的。花很大的力量来改编那么一个历史剧，跟现在不适合。当然，也有些改得好的。《三打祝家庄》也是改得好的，《逼上梁山》也有教育意义。

是不是要在文化界里面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搞社会主义改造？所有这×万人，一方面是搞五反，另一方面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绝大多数人是要用社会主义教育的办法来教育，其中有些跟我们不一条心的，有二心的，反党的，也要批评。不过这一回不要象反右派搞得那么厉害。毛主席不是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收效甚微吗？是不是搞一下，收效多一些。文学家他是要世界一一切服从他的，他是要按照他的面貌改造世界的：，问题是他的面貌是什么人的面貌？是无产阶级面貌，还是资产阶级面貌，还是小资产阶级面貌。文艺界他是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可是他自己的面貌并不那么好看，有些是帝王将相的面貌，封建的面貌，资本主义的面貌，不过他有一个时候挂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招牌，这就是修正主义面貌，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面貌，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我们现在是要用无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也要在改造世界的斗争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其他的人更需要改造。

还有一个字画买卖问题。我批过一个文件。现在有人搞字画买卖，而且是我们的干部、党员、负责人买卖。邓拓同志就大买卖字画。(彭真：已经调查清楚了，邓拓同志他不是投机倒把。)我跟×××同志谈了一次，他也不承认他赚钱，可是跟一个荣宝斋就是几万块钱的来往。我听×××同志说，文化部的人收藏字画最多。是不是这样？又搞这个买卖，这个买卖又不归商业部管，又没有政策。既搞买卖，就应该有一个政策。大家一买，就提价，涨了几十倍的价钱。是不是不要买卖了，要看，拿去挂一下，再拿回来，轮流挂嘛。人大会堂不是挂了一点吗？天天挂那个东西没有味道嘛。换一下，轮流一下，大家挂一下嘛。如果要搞买卖，就要搞一个政策，归什么地方管。这个问题，也请你们议一下。你要爱好文物可以，可以送到你家里挂一个时期，收租钱。我在昆明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那个投机倒把里头有买卖字画这一项。文化部要把这个事管一下，搞个政策，有个办法，不要没有政策。

请你们去讨论一下，是不是需要有个指示或者文章，把方向搞明确。现在详细搞比较困难。这样搞了以后，就更可以促进了。

邓小平：主席批的这个问题是很及时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方面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方面的问题，按它的性质来说，同农村里面的社会主义道路、城市工矿企业里面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性质是一样的。是不是这个问题比那些问题更轻呢？不是，不能这样说，它是[：层建筑里面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一个集中表现的方面。我们要搞革命，要搞建设，要保证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出修正主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不亚于农业政策问题和工业政策问题。我们搞革命，开始也是从这个方面搞起的。反革命复辟也是从这里搞起的。苏联现在也是从这里搞起的。匈牙利的裴多斐俱乐部是什么东西呢，那并不是拿枪的人搞的。现在我们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可以说不但找到了方向，而且找到了方法。比如农业问题，从“十二条”以来，又有了“六十条”，又有了后来的几个决议和指示，又有了现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这一系列的东西，包括道路，方法，都可以说走上正轨了。在工业战线上，过去我们还摸不着，现在看来，第一是学解放军，而在工业本身，有了一个××平原石油部的经验，也找到道路了。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是很现实的，很及时的，确实我们现在在这方面还摸不着。而根据我们解决农业问题和解决工业问题的经验，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过去，在我们领导上，确实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忽略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应该抓这个问题。少奇同志讲的我完全同意。周扬同志讲的我也同意。现在看来，可以说有三句话：第一句话，统一认识，第二句话，拟定规划；第三句话，组织队伍。

第一、统一认识。这是一个方向问题，道路问题。少奇同志讲了这个问题，我不重复了。所谓方向问

题，就是要搞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所谓为工农兵服务，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所谓道路问题，就是要把我们的文学艺术这个方面建立在共产主义的道路上，保证走向共产主义，避免走向修正主义。文学艺术这个东西，看来好象不容易见效，可是影响深远得很，一个娃娃，从小就要受它的影响。还有一些关系问题，比如历史的和现代的关系，外国的和中国的关系，现代又有过去斗争历史跟现成问题的关系，这都属于统一认识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个形式问题。要根据这个方向来检查我们现在的形式，比如戏剧界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形式是什么等等。这些方面都应该有一个方针，并且要使每一个演员，包含跑龙套的，都知道这个方针。比如我们农村的方针，每个农民都是了解的。所以，不只是我们各行各业的领导人要统一认识，整个的人员都要统一认识。关于这个统一认识的问题，少奇同志刚才也讲了，我觉得，需要有一篇分析形势，提出方向，提出办法的文章。现在恐怕是时候了，也写得出。最近我们在工业上就准备把××平原的经验搞成口语的报告，用广播员广播，中央搞个指示，在城市范围内，在工业范围内，包括交通、商业、机关，都来宣读，都来讨论。在文学艺术这个方！画，恐怕也需要搞这么一个东西，那倒不一定在工人和农民里面宣读，但是至少在于部和文学艺术方面，包括跑龙套的，都需要让他知道。有了一个统一的认识，把方向明确起来，大家就有一个奋斗的目标了。

第二，拟定规划。上次谈了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能不能搞规划的问题，那恐怕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在文学艺术方面，看来是可以搞规划的。比如戏剧，要求好多年现代剧占领导地位，这是完全可以的。舞蹈也好，话剧也好，京戏也好，都可以搞规划。当然，可以不要要求得太急。确实，在文学艺术方面有个艺术水平的问题，它站不住，就搞得灰溜溜的。郭老的科学院各个单位可以搞规划，为什么这个方面不可以搞规划？有了这样一个规划，就逼迫大家来实现这个计划嘛。

第三、组织队伍。恐怕第一是写作队伍问题，这是组织文艺队伍的中心。电影有个写作问题，音乐也有写作问题。有好剧本，总会出一些好演员。有许多演员的技巧并不坏，但是，组织队伍不只是写作队伍的问题，比如说各个剧种的人员也需要有个规划。现在京戏还有好多娃娃学生，恐怕应该限制一下。现在戏剧学校太多了。还有一些问题，比如李少春，是个党员，一个月拿一千七百块钱，戏也不演，天天作梦代替梅兰芳那个位置，袁世海也不满意，这样的人不少，又不谦虚，又拿高薪，还要当共产党员，这些问题，都应该有个政策，都应该有个解决的办法。

中央的主管部门，政府系统的文化部门，要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少奇同志今天的讲话，认真地把这个思想统一起来。是不是在今年上半年能够搞出一个规划来，普遍地讨论一次。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具体问题，中央宣传部要组织各行各业来解决这些问题。我就讲这样一点。彭员：周扬同志、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讲的，我都赞成。主席这个信是写给我和刘仁同志的。主席为什么写这个信？他就是觉得北京这个文艺队伍是相当的鸦鸦乌。在文艺这个战线上，我们的革命搞得比较差，可以说比较落后，也可以说最落后的。在经济方面，我们建国的时候就接收了官僚资本，跟着以后农业合作化，手工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公私合营，什么叫公私合营？就是要他投降，把管理权交给我们，给你点利息，我们现在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咱们这个社会主义革命，很清楚，是很彻底的。咱们的解放军，也有程潜、陈明仁的军队，也有傅作义的军队，也有张治中、陶峙岳的军队，现在还有他们的残余没有？资产阶级军队和封建军队没有了。咱们的国家机器，不是说没有那些旧的官僚主义，那些影响有，但是旧的困家机器被粉碎了，咱们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在政治上，咱们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右派，还有反对单干，各种各样政治的斗争，搞得是很不错的。当然，我们的革命任务还多，都还要继续做。但是，文艺这个战线的革命，老实讲，是比较落后的。主席的信也讲了，我们在文艺方面确实有很大的成绩，不可忽视，但是，还有这样多的封建主义的东西，特别是还有这样多的资本主义的东西，而我们居然跟它和平共处，不跟它斗争，有时它还斗我们，整我们整得满凶，我们一个新东西一出来，他就乒乒乓乓地整我们，这样不行，那样不行，那个小苗苗一家伙就完了。这个方面，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比重究竟各占多少？我看做这方面工作的同志很可以研究一下，我们也研究研究。

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所以落后，首先是我们领导方面有责任。拿我来讲，北京的日常工作是刘仁、万里他们抓，会议我也不参加，但是大问题我还是抓了的，你单子就不行，包产到户就不行，在北京搞自由市场就不行。在文艺方面，我也是一个看戏的，但是老实讲，在整个文艺上我没有注意。前几天，我跟周扬同志和林默涵同志谈话，我说，你们在上海的时候是怎么革命呢？无非是出点刊物。鲁迅怎么革命呢？还不是写点文章？有时候，发表一篇文章，有点革命的味道，就觉得是很大的胜利，就相当满意了，利用合法演个话剧，也要作很大的斗争，现在我们办了这么多刊物，这么多剧团，有这么多文艺工作者，反倒不管了。首先拿我来讲，没有注意这一点，偶然讲几句，那不算数，主席讲；一个问题没有系统地解决，就是没有解决。当然，你们也有责任。我们还有一个推脱，说我们是外行，我们还管别的，你们干什么呢？你们是吃了饭专干这一行的。咱们今天都是党员、同志，今天的名单是给刘上席和总书记看了的，咱们什么话都可以讲。我看，你们要振作精神，深入地搞一下这方面的工作。这个问题可是不能忽视。有很多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是因为看了小说，看了文艺作品。匈牙利事变的时候，并不是将军组织了司令部，而是裴多斐俱乐部。现在我们让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在那里泛滥，连我在内，我也是让人家泛滥的一个，咱们大家分担责任。我看，主席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很及时，再不搞要吃大亏，包括我们的子女，都要让人家挖了墙脚。

文艺战线上的革命所以落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建国以来，虽然很早就搞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是由于我们同资产阶级合作，整个的批判资产阶级搞得比较少。还有一条，就是我们文艺界的同志进了城以后[；去得比较少了。你不跟工人农民生长在一一起，下跟战上生长在一起，你怎么写他演他？我看要搞个规划，一年拿儿分之儿的人轮流下去。现在最关键、最中心的还是创作问题，如果没有好的剧本，没有好的歌子，你的演技再好，嗓子再好，也不行。大家下去的问题，少奇同志讲得很清楚，年轻力壮的要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余秋里五十岁了，他跑到大庆油田跟人家在一块，康世恩四十八岁了，就在那个前线。他们这么大了，可以下去，文艺界的年轻力壮的同志为什么不可以下去呢？有些神经衰弱的，一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神经就不衰弱了。年老的，身体不好的，可以搞别的，可以同群众建立联系。你又描写社会主义的工农兵，又不跟他们建立联系，那怎么描写呢？耶还不是从古董里找，从外国找？

现在要搞文艺这一条战线的革命。从那方面搞起呢？我看，第一步还是先从认识问题搞起。这里面确有敌我问题。但是第一步先作为认识问题搞。党中央提出要反映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工农兵服务，你只要为这个服务就好了。，如果有人要坚持他那个道路，到最后再整他。确实，现在绝大多数人还是认识问题。现在的情况是两头小，中间大：很正确、很明确的是少数，坏人也是少数，中间是多数。对于过去所有的各种文艺作品，戏曲也好，音乐也好，曲艺也好，小说也好，有个区别对待的问题，能够小改的小改，能够中改的中改，能够大改的大改，实在是毒草，就把它毁灭。在文艺这个战线上，现在要重新教育人，重新组织队伍。刚才少奇同志讲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主席在那里讲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到一九五七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入新的阶段了，现在的文艺是为社会主义的工农兵服务。兵，严格地讲，就是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业无非是工人和农民。我们的文艺队伍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不能让搞裴多菲俱乐部。

现在要象哲学、社会科学那样，搞一篇文章，搞一个指示。今天三十几个人，是不是分分组，由周扬同志主持，座谈座谈，需要的话再开会，或者你们准备好了，开个全国的文艺界的干部会。

刘少奇：今天到会的同志讨论一下，由周扬同志去分一下组。今天是提个头，今天只谈了一点方向、形式和性质，也谈得不充分，这方面到底如何搞，各方面还要继续讨论。是不是你们讨论以后，看能不能准备一个成熟的东西，能够有一篇文章，或者有一篇报旨，搞好以后，交给中央，中央帮助大家一起来搞。准备好了以后再开一个大会。现在就开始搞这个工作，看行不行？

你们讨论了以后再下去一下，回来又讨论一下，然后再搞。不限你们的时间，总而言之，你们努力搞。看这样行不行？今天就这样。

32）同王光美谈四清(1964年春节期间)

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那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于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这是基本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边有根子没有？要不要挖？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般：厂部的不好作风的影响)。这就是说，地、富的影响，不独在下级干部中发生作用，而且在上级高级干部小发生作用。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基层干部，在公社、区、县和地委有根子，要切实追查一下，要切实整一下。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厂部，在上面大体都有根子。下面的干部给上面干部送礼物、请吃喝，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面就有人保护他了。很多事实说明，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如果没有上面干部的保护，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不敢犯大错误。科员不拉科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科长不拉处长下水，就不敢乱搞、大搞；处长不拉部长下水，也不敢乱搞、大搞。生产队干部，没有大队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撑腰，不敢胡搞；公社干部没有上面干部撑腰，也不敢胡搞。这些干部犯错误的时候，以为有上面的干部支持，用上面的根子压群众，可以控制群众，这时候，他们不怕群众。比如，吴臣(原文按：前已介绍吴臣是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的支部书记，有严重的经济四不清和政治四不清错误，已撤职。)就已经发展成为群众的统治者。当我们把党的正确政策同广大群众见面，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他才怕群众了。

群众对于干部的监督要加强。同时，我们上级应该树立一种勤劳、廉洁、朴素的作风。凡是蜕化变质分子和有严重四不清的干部大都有一个或几个享福的窝子，如苏长吉(原文按：苏系褕关区付区长，已调到县里反省)在桃园和牛头崖都有享福的窝子。难道只有苏长吉一个人？因此，要强调群众的监督。群众要监督大队、公社和区、县的干部，上面的干部也要接受监督。有的大队，有的公社，蜕化变质了。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势力或者反革命势力复辟了，就是因为这些干部，有下面的根子，也有上面的根子。蜕化变质，就是这样变的：有上面的保护，没有群众的监督。要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只要上面不变，即使下面变了，问题不大，因为上面发现了下面的问题，可以下决心整好。真正发动群众，就能整好。这里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下面变了，上面敢不敢整？对下面的错误，是庇护、掩护、保护？还是彻底革命？只要上面不变质，有彻底革命的决心，仅仅基层变质，好整，也能整好。上面干部对下面：厂部的庇护、掩护、保护，开始，可能是不自觉的，慢慢地变成自觉的了，不能彻底革命了，还有的变坏了。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可以提挖上面的根子，这是群众提出的，是有事实根据的，要好好想一想。在什么时候提，什么时候往这方面引导，要看情况。现在就要搜集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同上面联系的材料。在全县搞完四清以后，再开一次县的三级干部会，公社、区委和县的各部门干部参加，帮助县委、区委搞五反整风。同时揭露地委、省委某些人的问题。不把四清搞透，要把五反搞透相当困难。四清和五反以后，要制定出一些新的制度和规定。如：今后干部下去应该如何工作，遵守什么制度，以便：厂群众监督，保证坚持勤劳、廉洁、朴素的作风。在你们那里(指抚宁县)，如果其它大队，其它公社的四不清，其严重和复杂的程度，也象你们卢王庄公社那样，县委就应该很好的检讨自己的责任。全县搞了四清，县委就清醒了。县委不清醒，基层工作搞不好。

任何生产关系中发生的问题，比如分配中的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是要向上面找根子、找靠山的，就是要找上层建筑来保护的。我们的上层建筑(这里指的主要是上级党政和业务领导机构)，一不是那样纯洁的，二不是很清醒的。要好好地为利：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服务，而不要为这些非社会主义的和反社会主义的事情服务，不保护它们，而且，要及时地反对它们，这并不是那样容易和顺利的。因此，单单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注意上面的根子是不行的。上面的有些干部是不注意，有些干部是不清醒、没有觉悟到这一个问题；少数干部就是不好，包庇坏人坏事。县、地多数人可能没有觉悟到这个问题，省是否

觉悟到了？省委清醒，多数地、县就不会变质，变了也可以变回来。县委清醒，公社、大队多数就不会变质，变了也可以变回来。事情就是这样。如果公社是真正革命的，发现有的大队变了质，公社就会有决心，坚决发动群众，使大队变成革命的。如果，县委是真正革命的，发现有的公社、大队变了质，县委就会有决心，坚决发动群众革命，把公社、大队变成革命的。地委、省委也是一样，一旦发现下面有严重问题，或变了质，就有决心去解决，去革命。有些大队和公社、个别的县，在一个时期内，变了质、变成修正主义，并不可怕，只要上面清醒，发现了这种情况，能够下决心革命，就好了。危险的是上面不清醒，因此，要不犯反人民的错误，必须有省、地、县委和政府来保证。这也就是列宁所说的，一切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上级党政机构的各个环节，都是坚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经常注意克服各个环节中的动摇分子、不清醒的盲目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是经常要发生一些的)，那它就能把一切非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改变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并且不断巩固这个基础。

不能借四清运动搞宗派斗争，也不能借口有宗派斗争，就不能批评四不清。否则，也是宗派。

33) 给王光美的一封信(1964年8月27日)

董朴同志：

二十四日来信收到。这封短信使我想了想。“支委已经选出，但支部分工定不下来。”赵品三坚决不当支部书记，并提出“有我没有关景东，有关景东没我”。又说：“在支部酝酿大队干部时，吴臣的某些人对四清中积极提意见的人有群起而攻之的现象”。这就相当明显，吴臣及其它某些人在进行宗派活动，集中火力要打倒愿改正错误的关景东。吴臣的一伙要复辟，以便彻底推翻四清的成果。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你们应该细心的认识，宗派活动如果达到了这种程度，是否已经是一种严重的反党活动，是一种实际上的反革命活动？他们在实际上进行着坚决反对党的路线的活动，破坏党在四清和对敌斗争中所取得的革命成果，要那些四不清的贪污盗窃分子、和敌对阶级勾结、用暴力(表现形式是无顾虑地打骂社员群众)统治群众的分子重新复辟，掌握权力。

应该了解，吴臣领导的桃园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吴臣的支部领导核心，是按吴臣的面貌建立起来或改造过来的。他们在以前一段时期，是否曾经是共产党，你们应该在调查之后做出判断。但是后来，他们确是反党反人民的，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在这次四清中，他们受到揭露和失败，他们决不甘心，他们一定要在机会到来时复辟，而且立即要复辟(这就是他们还没有真正被打倒)，如果他们不能复辟，他们会采取一切他们能采取的手段，进行破坏，把桃园一切工作搞乱搞烂，他们才称心。而别人改正错误，并且把工作搞好了，他们是不高兴的。他们的是非善恶标准，完全不是人民的共产党的是非善恶。如果吴臣等人确是上面这种情形，那他们在今后可能进行的破坏，比任何其他反革命分子所能进行的破坏都会要更大。党和群众可能受到很大损失。

情况和性质是否如我上面所说的这样，请你们经过细心调查加以证实或否定。你们工作队的负责同志应从正反各方面多想一想，交换意见，在情况明了之后，下决心揭露和解决这个问题。

我考虑现在在桃园本地找一个能够团结大多数群众，制服吴臣等人，并改造关景东等人的好支部书记，恐怕是难于实现的。为此，就要从上面从别处选派一个好支部书记去，或者派一个好指导员去，支部委员会在上级和指导员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农村工作也要学解放军，要建立政治部，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为此，河北省委是否可以在抚宁进行试点。就是在县委设立政治部或政治处，在公社设政治教导员，大队设政治指导员。县的政治部或政治处接受县委领导。县委组织部或者还有宣传部应属政治部成为政治机构的一部分。但是，公社的教导员和大队的指导员应当和军队一样，指导公社党委和大队支委工作。为此，要选择和训练一批好的教导员和指导员。选择一批立场坚定、思想好、劳动好的初小、高小、初中毕业生，请解放军派教员加以训练，然后派去进行工作。这样做，似可不必增加编制，因为这些派]；去的人要参加生产劳动，可以得到收入，只要补贴一点就行了。

在一个人队的党员中难于找出一个好支部书记，形成一个好的领导核心，可能不是很少，而会有相当一部分。对于这样的支部，人体上都要从外面从上级派好的支部书记或指导员去。派外地好的党员去当支部书记或指导员，可能有许多好处。缺点就是不会很快深入了解情况，但这个缺点是可以克服的，他可以依靠积极分子了解情况。

先进的公社或大队，如果长时期来是过得硬的，它应该多出产品和好的经验，也还应该出好的干部。可以从这些先进的公社或大队调一些好的干部到别的公社和大队去。但预先要做好准备工作。

以上意见，是随手写来，可能很不成熟，同你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或不完全符合，这就需要由你们负

责去判断，能否采纳这些意见或采纳某些部分。如果你们认为可以的话，也可以把这些意见转告省委。

祝你工作顺利！

少奇三月二十七日

又及，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也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这是运动和斗争要达到的最终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能不经过批评和斗争。对于那些违反人民利益、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只顾取得少数人的非法利益，而且坚持不改，并企图进行破坏的人，是不能不继续进行坚决斗争的。否则，是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的。在经过适当的斗争之后，首先是群众满意了，犯错误的干部绝大多数也可能改正错误。如果一时不能改正错误，只要他不进行破坏，也可以。也还是团结的对象。但是，如果他在某种借口下进行破坏，那就不能不继续进行斗争，直到他解除武装为止。情节十分严重恶劣，群众又要求的，还要依法惩办。这也应该告诉群众和干部。

34) 同某国文化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4月19日)

刘少奇：中国文学艺术界问题很多。最近我们找他们谈了一下。就是搞古代历史的小说多，成了压倒优势。地方戏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那一套。一个是古人，一个是外国人，外国的是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中国的是古典小说，提倡那一套而不加以批判。音乐也说是外国的好。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反映一定社会经济和一定社会政治的。现在，经济、政治都变成社会主义的了，但文化还是资本主义的。所以文！举艺术跟经济基础不适合，也不能鼓舞人们前进。现在的文学艺术，应当是社会主义的。斯大林讲过，社会主义内容、民族形式。斯大林讲后，有过一些效果，但后来不是这个内容了，搞了些别的东西。现在，苏联的小说，诗歌、电影、音乐、戏剧……就离开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相当远了。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人，学修正主义的文学艺术。现在我们向他们(指整个文艺界)提出了要求，就是反映现代题材的要占压倒优势，要占作品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帝王将相”的也搞，但要少搞些。我们提出这一问题后，他们发急了，社会主义的诗歌、音乐、小说、戏剧，有些人根本写不出来。我们提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到农民、工人、士兵中去；深入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中去。这样慢慢就可以写出来了。演员也一样。让京剧演员演工人、农民，他们就演不像，特别是演士兵，更不像。一些军队文工团演士兵还演的像。可是我们演戏的将近×万人，有百分之八十演古代形式的。现在要他们演现代戏，碰到的问题是：一一个没剧本；一个不会演。只好慢慢学，还是可以学会的。这是一个文化的带有根本性的方向问题。其实，这一问题早就提出来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多年了，为工农兵服务、为经济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那时就提出来了，但没有很好的作；最近虽然出了些好东西，但还是少。

我们全国有×个话剧团。话剧本来最适宜演现代戏了，但他们还是以演外国的、古代的为好，如“茶花女”、“武则天”、“关汉卿”、“蔡文姬”……。电影也一样，演古装戏。脱离现实。文学艺术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方面，应为经济基础、为政治服务，但它脱离政治，有个时期它还起了坏的作用。

出版方面也是这样。出版外国小说、古代小说多。有些大学生读外国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入了迷，陷进去了，越看越糟。还出版了外国民歌集，一本二百首，两本共四百首。当然其中也有革命歌曲，如“马赛曲”、“国际歌”……但多数是不健康的。这个集子销的很快，五十万册一下就卖完了。特别是轻音乐，除少数革命的外都不是鼓励人们革命、劳动和斗争的。

我们批评了这些事情，批评后好些了。文艺界在报纸上也有反映了，但系统的批评文章还没有写出来。我们提出要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文学艺术要有这方面的创作和表演，各大学还要进行革命理想教育，这从两个方面。关于革命理想这方面，文学艺术表现很少。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一个是将来。现在的少，将来的也少，而我们恰恰应在现在的基础上再向前进。整个人民，整个政治、经济，都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前进。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成了历史上的东西了。

我讲的就是：中国文学艺术在最近十多年来有些成绩，但缺点还不少；就是根本方向性的缺点，现在还大量地存在。

…………

我访问你们国家时看了些节目，也是反映现代生活的多，特别是业余剧团，他们就是搞现代的。他们都是演自己的事情，工人演工人的，农民演农民的，要他们演历史的、外国的，他们也根本不会演。

团长：他们不会演，他们也不想看。我们这次到海南岛兴隆国营农场：看了业余文艺演出，尽管他们的服装、化妆很朴实，但演的很好，节日都是反映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

刘少奇：方向是对的，但他们的缺点是艺术水平低，今后提高水平就行了。

文艺批判什么叫好坏？有两个标准：一是政治；一是艺术。这两个标准应以政治为第一，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如果政治上是反动的，可是艺术水平高，那么起的坏作用就越大。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有艺术水平的了，所以中国年青人看的入了迷，看完了就苦闷，影响很坏。十八、十九世纪的小说，是反对封建的资本主义文学，拿到现在来看就有害处。

中国音乐、外国音乐，说是外国的水平高，就学外国的。要学中国的，就学过去的。中国古代封建文化发展的比其他同家高，中国资本主义的、我们叫新民主主义时代的音乐。小说、诗歌、戏剧，在艺术水平上讲，不如封建时期的高，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有些文艺界的人，反对现代的东西，没有别的理由，就是说艺术水平小行。艺术水平不行可以提高嘛！

革命发展时代应有好的作品。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艺术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因素。我们革命胜利已有十多年了，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已基本完成，经济基础已经变了，单是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就不够了。必须更进一步，要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艺术。这需要创造。外国也有些，就是从“国际歌”时起，反对资本主义的小说、电影、诗歌、音乐、戏剧不少。十九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就开始有社会主义的文艺了，它的主要斗争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文艺没别的，就是反对资本主义，一直到它灭亡。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作品，高水平的不少，美国也有这样的作品，苏联十月革命之后有很多这样的作品，但要加以批判，加以选择，有些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不是。列宁讲高尔基是位无产阶级作家，但他也有些错误观点，列宁也批评过他。从根本上讲，自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多年来，反对资本主义的作品不少。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这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对文学艺术的要求又不同了，所以要搜集一百多年来的有关作品加以研究。也还是要学外国的，过去历史上的也要学，就是学什么的问题。我们关于这方面的问题，还没解决的很好。在教育方面也未解决好。小、中、大学到底怎么搞，我们也有不少缺点。这些问题需要解决了，也到了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我想跟你谈谈，不要什么都跟我们学，我们这里有些缺点，当然也有好的。

团长：我们这次来学了好多东西。

刘少奇：我想我们两国文化交流，要交流过去革命中的作品，特别是要交流现在的作品。

关于出版方面，要出世界上反对资本主义的、马列主义的东西。什么“茶花女”、“罗密欧与朱丽叶”、“红与黑”……不搜集，不研究，也不出版。过去翻译人员尽翻这些，翻译人员、出版人员脑子里没方向。自从马克思主义出现以来，反对资本主义的东西很多，就是我们翻译出版的很少，苏联的，翻译出版了些。在这方面我们共同努力，好不好？

团长：好。

刘少奇：我们是邻居，马列主义的观点一致，共同反对修正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现在，产生了问题。早有白劳德主义，但那时是部分现象，现在苏联方向一变，成了全局性的问题。开始几年，我们也有点被动，不知怎么搞好，也没想到要批评苏联领导。中共党员没一个人想到，没有精神准备。，到现在搞了七、八年了，一步步发展。我看我们现在是居于主动了，他们尽要求停止争论。开始时，我们说不要公开争论，他们说非要不可，可是到现在他们说不要了。我说不行。对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形势变了，最近西方报纸刊物都讲赫鲁晓夫走下歧路了，陷入了困境，解脱不出来了。

35）在河北地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2日)

今年农业生产是否比去年好一些？今年的秋收作物比去年生长的怎么样？灾荒渡过了吧？表面上也看出来了，逃荒的少，房子问题慢慢来嘛。

四清，每个地委都搞了一点吗？粗线条四清起了刹风作用，多吃多占少了嘛，不然灾民吃不到口里。你们搞了这么多，已经结束的有多少？(答：全省共搞了三千六百多个人队，已经结束的只有一百三十六个。说是搞五个月，实际五个月结束不了。)为什么省风搞的卢王庄公社五个月就结束了？(答：林铁挂帅，工作队的干部多，干部强。)

还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铺的少一点，干部力量集中一点，结束一批再搞第二批。铺的太宽了不解决问题，不是打歼灭战的战略战术，与其搞那么多，三千六百个人队，搞上六七个月还不能结束，还不如分作两批搞，一批只搞一千五，一千五还不行搞一千，这样，干部也就锻炼出来了，然后以这一批工作队为骨干加上些力量就分为两队。集中优势兵力，集中到一个地方，打歼灭战，把问题解决。时间拖久了不好，干部情绪不高，群众麻烦，基层干部越搞越顽皮。问题是你们组织什么力量，你们地委书记是不是亲自搞了？怎么搞的？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省委书记是不是都亲自搞了，怎么搞的？还是过几天去一下听别人的汇报，还是真正蹲点？(答：过几天去一下听听汇报的占多数，真正从始至终蹲下来的很少。)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要下去蹲点，至少搞两个，一次只搞一个人队，亲自负责，自己当组长，不要搞一个公社，搞一个公社就会陷于听汇报，队长让县委书记当，你在他的领导下，至少搞两个大队，准备一个成功的，一个失败的，取得正反而的经验，取得感性知识。必须亲自搞扎根串连，和干部谈话，参加贫下中农开会，发动群众搞四清，这样就有感性知识了，也考验一下你们的本事。听汇报有很多缺点，省委听汇报，地委也听汇报，县委听汇报，公社党委也听汇报，听汇报、要表报。真工作组下去接近社员，找人谈话，也不吃他们的饭；假工作组下去，和干部谈一谈，吃吃喝喝，要张表报然后就走啦，也不找社员谈话。吃亏就吃在这个地方，这样领导革命肯定不行。大跃进为什么出那么多毛病，就是因为没有亲自蹲点，没有亲自试验，比如办食堂，我们就没有亲自去试验，一个食堂占那么多劳动力，干部多吃多占，说是群众的要求，实际群众不赞成。那么多的假数字，开始我们也相信，省委给地委打电话，地委给县委打电话调查，都说确实那么多。听汇报不可靠，表报也不可靠。有些专门汇报干部，很会汇报，但工作并不好，很多是假的，表报也有很多是假的；有的干部工作做的很好，但不会作汇报。不晓得你们的经验怎么样？(刘子厚插话：是这样，基层工作到底怎么搞法，长期没有解决。)这样是不行的，这样不能领导五反、四清人革命。好呀！今天我还是听你们汇报，你们汇报的我相信不相信呢？你们是地委书记、省委书记，不相信你们，相信谁呢？这里有个可信可不信的问题，可信的信了就对了，不可信的信了就犯错误，他犯错误，首先是你犯错误，不可信的你偏偏信了，谁要你相信他呢！相信不相信基层干部呢？首先了解信得住信不住，他说的是真是假，要经过实际考查，不经考查就不能断定是否可信。实际情况是，一部分可信，一部分不可信；某些事情可信，某些事情不可信，比如瞒产，基层干部报产量，你查也查不清楚，他自己是清楚的，就是不告诉你，告诉你的是假的，土地隐瞒百分之十五，瞒产可能更多一点。卢王庄大队二点八万亩地，宫风你信不信？一万多人，你数过没有？人口也不可靠。还有些干部讲的许多事情很不可信，比如讲贪污多少，多吃多占多少，不可信。打人骂人的听说河北乡村还不少，我们身边的有些是河北人，他们回家回来就讲打人骂人的事。可信不可信，还有个可靠不可靠，可靠的你靠了就对了，不可靠的你靠了，你就要犯错误。在四清中你光靠基层干部，贫下中农就不满意，只要和基层干部一密切，群众就不讲话了，脱离群众，他们说你们是一个路上的人，《夺印》里面不是可看到了这个问题么！蹲点，恐怕这个问题是领导工作里边很重要的领导方法。过去大跃进中出了那么多毛病，就是因为中央、省委、地委负责同志自己没下去蹲点，下边乱讲一阵你就相信了。是不是可以这样，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轮流下去搞四清，去搞一个大队，不要搞一个公社，搞一个公社只能听汇报，搞一个大队也有听汇报的问题，一个大队一、

二百户，听了汇报还可以到户里去跑一跑，自己亲自去做工作，接触实际，可以做得过来。一个公社二千多户，中间隔着一层，除了听汇报，照管不过来。包括我们派下去的工作队，包括公社干部，有些人汇报的很好，有些人不大会汇报，但他的工作做的好。这次开会是不是可以定下这一条？所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搞两个大队，从扎根串连到四清搞完，自始至终全部贯彻下来，搞两次，搞两个冬春，才算毕业，可不可以？冬春搞四清，夏秋搞五反(领导干部搞五反的也要搞两批五反)。下去蹲点，给干部一个考验，多少搞的好，多少搞的不好，我看多数是可以及格的，可能少数不及格，不及格也不要紧，还可以继续学习嘛。

刚才我讲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那个地方搞彻底了就可以抽调干部帮助别社别队去搞革命，他们到贫下中农中去扎贫下中农的根比较容易，这是土改时候滚雪球的办法嘛。我们很多县委书记就是那个时候起来的，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农民能当县委书记，现在的农民就不可以当县委书记呢？搞的好的队，生产搞好了，核心搞好了，而且还可以抽出干部帮助别的地方去搞四清。一个大队、一个公社的成功经验，具有典型性，非常重要。不要经验主义，问题都差不多，有些队有这个问题，有些队有那个问题，有些队问题严重，有些队问题不那么严重，情况比较复杂。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解决一批，不只工作队得到锻炼，而且可以扩大干部队伍，滚雪球嘛。铺的太宽了不解决问题。要多少时间能解决问题就搞多少时间，五个月不行，几个月才行？是的，冬春搞四清，夏秋搞五反。王光美在卢王庄公社搞了一个大队，我听了她的汇报，搞的怎么样，是否有缺点，是不是使地委感到为难，是不是使肖风同志感到为难？(答：不存在这个问题，王光美同志在那里搞点给了我们很大帮助，特别是少奇同志写的信提高了我们的认识，起初我们对苏长吉、吴臣的问题认识不够，没认识到上边有根子。)

注意上边的根子是贫下中农提出来的，贫下中农说："不仅下面有根子，上面也有根子。"贫下中农这个意见引起了我的注意，不是我发明的，是群众发明的，是群众告诉我们的。群众有他的经验，为什么搞不动，因为上面有根子。下面的权子，地富反坏是基本的棂子，要追清楚，上面的根子也要追，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一律要追，追到什么地方算什么地方，革命嘛，天不怕地不怕，是公社追到公社，是县委的追到县委，是地委的追到地委，是省委的追到省委，是中央的追到中央。不要有任何顾虑，上面的根子更危险不追不行。土改的时候我们就搞过嘛，你们省委当时也有保护地主的嘛。这样农村搞四清，就帮助机关搞了五反。两个根手下面的是根本的，要追清楚，上面的根子也要追清楚。要给工作队交代清楚，不要怕，敢追，不要有任何顾虑。中央也好，省委也好，我们给他们撑腰。属于诬告的，不要紧，我们会查清楚。追上面的根子，不要有顾虑，不要怕伤面子，他包庇了坏人，还要什么面子？过去我们就出了这样的人嘛，中央出了高岗、彭德怀，省委就不出吗？地委就不出吗？也出了嘛，和平演变，无非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结合起来和平演变。

一条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这样搞能够确实解决问题，锻炼干部，又出经验。一批一批地搞看来似乎慢实际快。再一条是省、地、县书记真正去蹲点。所谓蹲点不是到点上听听汇报又回来了，而是从扎根串连开始一直到四清搞完为止，一直搞下来，取得完整的经验。没有典型经验，领导一个地委就领导不了，领导一个县委就领导不了。你们相信不相信？六一年中央一个同志带了一个工作组，在湖南的天华大队搞了两个月的调查研究，未搞出问题来，我住了十八天发现了问题，然后就找县长，叫他召开贫下中农会议，扎根串连，没让支书参加，他就造谣，说我搞乱了，耽误生产，我一听就知道他是要赶我走，我是国家主席，基层干部要把我赶走，有人不赶你们！问题是搞乱了什么，搞乱了他的秩序，因为不是照他的意志办的，超过他的计划之外了。一个大队干部就有这样的本事。有些基层干部问题严重，政权不是在共产党手里的，你们讲有百分之三十，恐怕大体合乎实际，那个百分之三十不好的，也不是所有的干部都不好，有些好的，也有些是可以教育过来的。那百分之七十中有百分之三十是比较好的，百分之四十是一般的，基层干部对付我们有一套办法，双十条念了，应该放心了吧，讲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嘛，地富子女也放心了嘛，一个不杀，大部不捉，双十条能起安定作用，即使如此，有四不清的干部还是抵抗的，不抵抗的很少吧？他抵抗是有一套办法的，他一抵抗你就不好办，不要轻

视基层干部，要知道我们工作队力量是不如他，工作队什么也不清楚，他什么都清楚，他有一帮人。因此，没有强的工作队，没有有经验的工作队是搞不开的，特别是坏分子控制的基层组织，更是要派坚强的：工作队。所以，搞四清必须派强的工作队，人数多一点，负责干部亲自下去。这样，我们各级党委才能真正领导好这次革命。现在讲，应该说我们的经验还不够，自己直接的经验还少。打歼灭战，把一个大队搞开了，再去搞第二个大队就好搞了。大体基层干部有几手，我们不能不听他的汇报，谁是贫下中农，多少人口，多少土地，产量如何，多少户，首先得听他的，然后考察他讲的确实不确实。扎根串连不能依靠基层干部，要自己去扎根串连。依靠干部，依靠贫下中农，基本的还是依靠贫下中农，依靠群众。应该确定这一点。基层干部是好的，他和我们一道依靠群众嘛；基层干部是不好的，邮你怎么依靠他，我们依靠群众他就不喜欢。基层干部，有些好的是可以依靠的，有些是不能依靠的，或者又依靠又不依靠。问题是放手发动群众，根子扎正了，确实是贫下中农，才能搞好四清。贫下中农一团结起来，群众就团结起来了，基层干部的错误就可能改正。不要把两个依靠平列起来，决定方面是依靠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基本的，依靠基层干部的目的还是依靠群众。当然，第二个十条上讲的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也就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这也是对的。关键还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包括犯了错误愿意改正的，不是表面改，而是真改。基层干部躺倒不能怕，工作队下去了，他躺倒就是抵抗的方法，就是用躺倒和我们作斗争，躺倒就是有问题。

过去没搞清的问题一个是搬石头，一个是夺权。过去搞群众运动毛病出在什么地方？搬石头，就是有的情况没搞清楚就搬了，一脚踢开，那是主观主义。你没弄清以前还要听他嘛，然后调查清楚，再作处理。是不是有石头？确有，和地富一起压迫群众，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办国民党的事情，这样的石头不搬怎么行？过去搬石头，有的搬错了，如果真正是石头压在人民头上不搬怎么成。还有夺权问题，也有夺错了的，如果权真正在坏人手里不夺怎么成。干部思想有问题，中央也有责任。你们这里这些问题不解决，不能发动群众，不能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夺权问题，也是有的没有弄清楚就夺了。

总之，我们现在搞群众运动，比以前历次群众运动都进步了，比土改进步了，比搬石头进步了，北夺权进步了，比大跃进也进步了。现在有了双十条，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少捉人，一个不杀，矛盾不上交，处分干部在百分之一至二，就可以有保障，这样就可以防止出大的毛病。(大家插话：处理：厂部的控制数不能以一个队算账，应以县为单位算账。)对，县也不同，和平土改区和土改彻底的地区不同，县也要有区别。双十条向下一念，把我们的政策交了底，大家放心了，但是有些人利用双十条来抵抗四清，说什么我是团结对象为什么不团结我，我是依靠对象为什么不依靠我？扎根串连，把贫下中农发动起来，把群众发动起来，这是关键。有了群众，你躺倒也好，我有办法。他就是在你还没有办法的时候躺倒，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他就不敢躺了；群众发动起来以前，他躺倒，交印不于是假的。因此，放手发动群众这是最基本的，必须做好这一条。对于四不清的干部(他们不是敌人)，我们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没有团结的愿望不行，一脚踢开不行，凡是可以团结的，能真正改正错误的还是团结。开始是愿望，不是事实。经过批评或者斗争，真正改正错误，在新的基础上，在双十条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事实。不经过批评斗争，愿望也不能达到。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是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才讲的，什么时候讲什么政策，讲政策的哪一方面，应该根据时间的不同，加以具体掌握。毛主席讲，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开始是重点在发动群众、团结群众，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轰轰烈烈！而且有些偏激，有的主张打人，有的主张关起来，有的主张怎么样，这个时候就不要作尾巴主义。我们当过几次尾巴主义，土改时扫地出门、打人、杀人多了。大跃进开始也当了一次，有些事作过了。群众发动起来了就要强调讲政策，政策要向群众交底，不要打，不要骂，讲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肖风的报告里讲有更好的办法对付四类分子，不是打，是说理斗争。经过调查研究，掌握材料，争取、分化他们一伙的揭露他，比打他几下还厉害。

（刘子厚转达×××同志的意见，请求把刘少奇五九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在华北区各省市的工作会议上再作一次传达讨论。）

那个讲话，是反对彭德怀的，他是反对群众运动的。那个时候讲，在群众运动中，出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甚至三个指头的毛病我们也要干的，不能因此不革命。现在那么讲落后了，现在的问题是，是不是可以作到缺点、错误发生的更少一点？我看是可以做到的。现在要求的标准是高标准的，缺点、错误，至多不要超过一个指头。我看是可以做到的。蒲蓝试点中发生的缺点可以算一个指头，卢王庄就不到一个指头。那次讲话讲两个问题：一是讲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二是讲领袖问题。那个讲话允许你们出三个指头的缺点，现在看是落后了。（刘子厚建议，把刘少奇今天的讲话附在刘少奇在那次会议讲话的前边，印发大会讨论一下。刘少奇表示同意。）

这次革命给你五年时间，还出那么多乱子！还搬错石头，还逼死那么多人？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一定不出乱子不可能，恐怕死个把人还会有的，他要死嘛。这次要求要高，首先是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动群众，进行大革命，既是社会主义革命，又是民主革命。把革命搞好搞彻底，促进生产斗争，促进科学实验。关键是搞阶级斗争：一个是搞地富反坏，一个是搞四不清。四清也是阶级斗争，但它是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次要求高标准行不行？花的时间多一点，可以不打骂，不强迫，不大批死人。所以说这次革命比土改伟大、艰巨、复杂。因此各级党委书记要亲自去搞点；如果你们不去搞，你们这个省地委书记就领导不了，是个损失，去了是个很大的提高，可以锻炼大批干部。我们革命搞好了，就可以实现毛主席在第一个十条里讲的，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小国要出现新气象，这样，对国际土的贡献就更大一些。这次革命搞好会出现大跃进，真正是多快好省，搞的比较更好，而又没有过去的大跃进那些毛病。肖风写的总结昨天晚上看了一下，写的好。但有一个重要问题，写的不那么清楚，就是放手发动群众，要单写一段。放手发动群众才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我们要基层干部去发动，他不发动我去发动。他抵抗，躺倒不干可以，这是消极的，也不好，但破坏不行。很多政策是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执行的，不要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就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群众正给提意见，你去讲实事求是啊，不要冤枉人家啊，群众就不讲了，那不行。应该首先发动群众，让他讲出来提出米，是真是假然后查清楚解决问题就行了。政策的重点前后有所不同，所以，在什么时候强调什么，这就是群众运动的规律。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今天以这为重点，强调这一面，明天以那为重点，强调那一面。

这次五反、四清是一次大革命，对整个革命，教育群众，转变基层干部的作风，发展生产，有极大的作用。

那个讲话落后了，现在要印不能认为是允许你们出百分之三十的乱子，有后遗症，人家怕，我也怕。但是，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就怕后遗症那不对，那是反对群众运动。怕搬石头那是借口。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可能出乱子，就要防止后遗症，少犯错误，这个时候要讲政策。这么大的群众运动，一点乱子不出不可能，力争少出，不要超过一个指头。这次运动，允许你们时间，不追赶你们，要放手发动群众。过去我们那么急躁，群众也不赞成，他有意见不敢讲，把地主扫地出了那么多，群众也不赞成。可能出什么乱子呢？有的人表现假积极，可能搞的乱七八糟，基层干部中可能有，公社可能有，县里是不是也有？他不是想革命，是故意“左”一点，领导群众运动要抓到共产党手里，不要抓到坏分子手里。反对我们的人可能从右的方面反对我们，也可能从“左”的方面反对我们。你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出点乱子也没什么，出了乱子也警惕我们。这么大的运动一个乱子不出也不可能，我们要求尽量少出乱子。

作为共产党人害怕群众运动不象样子。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彻底革命的嘛。群众起来可能走过头。群众不起来，好人不敢讲话。群众起来之后，注意不要当尾巴主义。讲实事求是，讲证据，没有证据就去查，没有证据不算。你们这个问题解决了吗？什么怕后遗症，怕伤害基层干部，怕干部躺下，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重点，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放在次要地位，怕影响生产，等等。这些问题要注意解决。

肖风那个报告，可以修改一下，群众发动起来以前怎么办，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怎么办？有些政策是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前讲的，有些政策是在群众发动以后讲的，因为有些政策是在解决问题时用的。我们注意政策规定，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但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假的。

两个依靠，依靠贫下中农是基本的。依靠基层干部，只要他依靠贫下中农，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这样的干部才可以依靠。不然你靠了他，群众没有了。工作组与吴臣下棋，贫下中农看见了，不接近工作组了。我们想依靠贫下中农，贫下中农让不让你靠？第一贫下中农是可靠的；第二你信任他，他才信任你，不然靠不上。

就是这么一个大队的典型经验，作用就很大。自己务必取得这种经验。现在不只是调查研究，你去搞四清，就要调查研究又搞斗争。在改造世界中认识世界，不改造世界不可能完全认识世界的。把地、富、反、坏斗倒了，改造了，群众面貌也改变了，然后你才能认识，认识内外联系。过去有的人调查研究的，不参加实际斗争，那样的调查是不行的。天华大队那个调查材料，我是看了的，是假的。

我们希望省委书记、省委负责同志，包括厅局长，都要下去蹲点，实际到那个地方搞四清、搞生产。每个负责干部最好搞两个大队，做城市工作的搞两个工厂。我相信这样搞了之后，会大大提高一步。这是一种领导方式。毛主席讲领导方法问题，叫做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你们只搞一般号召，没有搞个别指导，因此你们是空的。河北是唐山蹲点好，唐山说怃宁好，但抚宁县委强华蹲不住，只是听听汇报，他那个蹲点不算，必须重新另搞一个大队，不然不能搞县委第一书记。别人比他高明，别人超过他了嘛！今后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采取这个方法。有时一般号召也可以的，但必须有个别指导，才有一般号召。有了具体经验，开会到下边去开么！中央的会到各省去开，为什么省、县不可以到农村去开？

听说你们叫肖风搞四清报，是否下去再搞一次好？再搞一次就有经验了。王光美准备再参加你们一次四清。

（刘子厚汇报了河北省蹲点的情况，蹲不下去的原因主要是认识问题。）是蹲点重要，还是坐办公室重要？要整顿一下，不要名义上陨点，实际没蹲下去。过去你们同地富斗你们有经验，最近地富同你们作斗争的方法你们不熟习，不蹲点你们不懂，蹲了就懂了，这样你们才会提高，工作才会进步，群众也就进步了，不然领导落后了。除开身体不好有病的以外，身体还行的都下去蹲点。无论如何要蹲下去，取得直接经验，领导现在革命。今后一件新事、新任务来了也要这样搞，领导人自己不去搞不行的。

庐山会议后反右是不对的……。本来反“左”，结果会后反了右，搞的全国后遗症，中央要负责。(有的同志说当时有彭德怀的反党干扰)彭德怀干扰我们，我们可以不受干扰嘛。搞四清也还会有人干扰，我们不受他的干扰嘛。

任何事情都有规律性的，所以，这次你们可以讨论一下历次群众运动的经验，正确总结历史经验，使我们这次群众运动北历次群众运动搞的更好，要求高标准，充分发动了群众，毛病少，不超过一个指头。群众也有经验了。基层干部从土改以来，他们也吃过苦头，我们也吃过苦头，群众也吃过苦头，两个十条就是群众运动的总结。也不能怕出一个指头毛病，出了再搞好取得经验。过去讲山三个指头毛病，这次要求乱子不超过一个指头，要彻底革命，放手发动群众这就使你们为难了。因此，要求你们亲自下去搞一个大队，首先做到出点乱子不超过一个指头，取得正面经验。

当前主要顾虑是怕放手发动群众。但充分发动了群众，群众起来之后，又可能“左”，现在主要是这个问题，要掌握群众运动火候。将来群众发动起来，你们脑子热了，也叮能犯错误的。你们可就不要作尾巴主义。现在有可能既不犯右的错误也不犯“左”的错误，我们“左”的错误也犯过，右的错误也犯

过，领导干部、广大干部和群众都有了经验。单是领导干部有经验还不行，还要全党有经验，群众有经验。为什么我们党在七大时听主席的话，才统一了呢？以前也有主席么！就是以前人家不听他的，经过失败，经过斗争。经过几次“左”的右的错误，抗战时又有一个大发展，白区、苏区老干部都有了经验。这样七大时全党才统一了，确认了毛主席的领导。

以前提高标准不可能，现在高标准有可能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领导群众运动，这次五反运动比过去打老虎运动好多了。要求乱子不超过一个指头，一个指头都害怕，不是革命家，不能当领导干部，当然为当领导干部，不怕群众运动搞乱也是不对的。办法是你们亲自蹲点，取得经验，指导运动，可以少犯错误。

今天就讲这么多问题。这个问题在县委书记中间解决了就好多了。省委安排一下，一个省委书记、两个地委书记、几个县委书记组织一个工作组，搞一个大队，三级干部都取得经验，然后县委书记、地委书记可以另搞一个大队。最好隐蔽一下，不暴露身份，以一般工作组的身份出现，使地富不警惕。

36）在济南部队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9日)

现在一个是国内的阶级斗争，一个是国际的阶级斗争，两个都是阶级斗争。国内阶级斗争，就在我们面前，军队也有嘛！军队中恐怕也有地主、富农的子女隐瞒了成分。这个问题工厂企业比较严重。最近我听了一个大队的汇报，有一个地主，四个子女，连媳妇共六人都在革命队伍里，有两个党员，他自己还当了六年的会计，儿子有一个在我们空军，(王光美：在轰炸机上当通讯射击长，他报的是中农。)还有个在总参谋部。看了你们的简报也是这样。农村地主、富农跑出去了，他们的子女，有的到了机关，有的到了部队，可能不是个别的。就是我们中国也出修正主义咧！事实上中国有相当一部分工厂、企业、机关，农村的公社、生产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领导权是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有的是共产党员，打过游击的被他们拉下了水，被糖衣炮弹打中了；有的原来是贫农、雇农，和地主、资本家的女儿结了婚，或者吃了请，吃了几包香烟，就给他们办事，给他隐瞒成分。凡是找不到家的，找不到证明的，成分不清的，都是他自己不肯讲，那样的一律算四类分子好了。为什么找不到证明呢？你找不出证明，总有特殊原因，你不是吃饭长大的吗？找不出就算四类分子，你说不是，就查。将来城市划阶级，很多人搞不清楚，你宣布这一条，他就会找很多人证明他不是四类分子。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单位不是我们领导，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或者原来是我们领导，现在变了；或者原来反动统治并没有打倒，他换了个方式在那里领导，叫两面政权。过去我们搞过两面政权。地主、富农、资本家他们很会搞两面政权，他们的秘密工作比我们搞得好，他对什么人有什么态度，很灵活，我们装的呆呆板板，他们装的很象，他骗了我们，你这个人喜欢什么，想吃、想穿、想女人，他都给你找。有些是我们的人变成了他们的人，和平演变，变过去了。修正主义不只苏联有，我们这里也有，革命还没有到底，有些地方革命还没有革，有些虽然革了，但又变了，被人家拉过去了，表面上看都是共产党员。苏联有赫鲁晓夫这个经验，对于我们大有好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缔造的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胜了，这还靠不住，还出了赫鲁晓夫。他的祖父是个贵族，他父亲在矿山当了工人，后来他又做了工，可能就是个逃亡地主。德国人写赫鲁晓夫的历史，收集了好多材料。只有一个南斯拉夫出了修正主义，人们还不大注意，看作是偶然的，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这就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引起人们的警惕。没有苏联出修正主义，大家受不到教育，只出一个南斯拉夫还不够。恩格斯组织的党(第二国际)后来大部分背叛了无产阶级，列宁组织的党(第三国际)就不能背叛无产阶级？列宁死了，斯大林也死了，出了个赫鲁晓夫。这是个很重要的经验，它的重要性同十月革命的重要性一样。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经验，苏联出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变质的经验。取得了政权还有失掉的可能，无产阶级革命可能一次不够，可能要革几次。中国是不是会失掉，资本主义是不是会复辟了不一定，现在不能讲。毛主席说，如果不搞社会主义教育，“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苏联现在就是法西斯党。我们吸收了这个经验，也可能不变，可能不出修正主义，一直保持下去，一出现那种现象，我们就反对，就把它反掉。现在搞四清，五反，四清不只是经济的，是经济、政治、思想、组织四个方面的不清，统统要搞清；五反现在也有发展，叫挖修正主义根子，这样产生修正主义的可能性要少一些，但是还不能说完全不会产生，以后还会继续产生，继续产生就继续挖，那天产生就那天挖。产生一批也有好处，看到了，挖掉它的根子，有了挖根子的经验，以后照样挖。反动派总是越挖越少，不是越挖越多。但搞彻底不容易，挖绝了不容易，要几百年。几百年，我们这些人都不在了，你们也都不在了，那时你晓得怎么样？所以有接班人的问题。

各级，各方面都要培养好的接班人。毛主席提出五个条件，这五个条件是接班人的条件，也是我们的条件，我们也要以这五个条件要求自己。第一条是比较的懂得马列主义，不是搞修正主义。第二条是为了多数人，不是为少数人，我们总是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被压迫者一边，不是站在百分之几的剥削阶级一边。如果是为少数人，为小集体的利益服务就不够条件了。第三条是能够团结多数，不是团结少数。所谓多数，是多数干部，多数党员，多数群众，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第四条是民主

作风，不是自己说了算。第五条是自我批评。这五条是对接班人的要求，我们也要学习，我们革命几十年了，现在要交班了嘛！要检查一下还有那些不够的地方，努力一下，使它够起来，有缺点错误就改嘛！何必带到棺材里去呢？时间不长了，你们年纪比我小，四十岁、五十岁，我是六十岁以上了，你们比我小，也不算太小了。人总是要死的，没有不交班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就培养接班人，他们培养比我们早。山西有两个材料，一个是大寨，一个是南柳，他们有一个培养接班人的故事：大寨的贾进财是战争时期的老支书，他很早就注意培养接班人，现在的支书陈永贵就是他培养起来的，他发现陈永贵比他强，就提议叫陈永贵当支书，他当副支书，以后他又发现一个人比他强，又把副支书让出来，他当委员；后来又发现一个比他强的人，又把委员让出来，！勺已当党员。他是个模范党员，大寨建设山区很多石头是他开的，他一个人开，够几十个人抬。这个支书这个想法，就不是为了少数人，是为了多数人，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是革命的。他个人的威信更高了。他把支书、副支书、委员让出来，就不革命了吗？他当党员，还是革命。你支书当不好，他也可以提议撇下来。把位子让给能干的人，自己当助手，不会吃亏，威信也不会降低。死啃着不交，威信要降低。你现在不交，最后被迫要交的。有了革命的接班人，就可以对付将来资本主义复辟，我们不在了，他们可以对付。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中国可能不出修正主义。但是还要看，还要事实证明。毛主席说，出了也不要紧，特别是在中国，打倒过多少朝代，军阀出了不知道有多少，段祺瑞、吴佩孚、阎锡山、张宗昌、韩复榘……。中国是统一的，不能破坏国家的统一，党的统一也不能破坏。党内有党章，有党内的民主作风，党内要讲道理，决议、指示，大家赞成了才算数。中央的政策规定要和各省。打委’日记商量，不是给一个省商量，是给很多同志商量。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你们还要开会，还要给地委、县委的同志商量，中国党内民主讨论的很多，为了搞通思想，开会很有必要，我们会开得多一点就是了。赫鲁晓夫的办法在小国可能行不通，象他突然袭击，召开二十大，做秘密报告，逐级作决议，这个行不通。中国党有民主的传统，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如果犯了错误，也是大家犯的，大家负责，批评自我批评，大家改。大跃进中不是犯了很多错误吗？中央改，地方改，群众也在改。

庐山会议我们批判彭德怀的反党宗派活动，但是庐山会议犯了个错误。那个时候应该继续反“左”，不应反右，结果反了一右。本来庐山会议开了十几天是反“左”的，后来彭德怀搞了这么一封信，把大家注意力引到这个方面来了，引到中央犯了个错误。犯了错误不要紧，就改正嘛！我们国家是统一的，党是统一的。在党内不允许搞突然袭击。赫鲁晓夫政变的方式在中国行不通，中央不允许地方搞，地方也不允许中央搞。如果搞了，就重新讨论，大家多数都同意那样办就办，错了大家负责，大家改正。我们党犯过那么多错误，没有把党搞垮了，革命还是胜利了。不犯错误不可能。犯点错误不要紧，但是不允许破坏党内民主，不能不允许人家讲话。不能象赫鲁晓夫那样搞突然袭击，破坏党内民主。军队干部要保证这一点。军队除了保卫国家、镇压反革命、抵抗帝国主义侵犯以外，也要保障党内民主生活正常地进行。有了充分地民主生活，国家和党内民主生活正常进行，就是犯错误也不要紧。王明“左”倾路线那个时候那有民主？他不准讲话，讲就得讲百分之百的正确，布尔什维克化。……你说意见不能讲，我们不讲也可以。讲过几次，你们不赞成拉倒。你们多数人要那样办，你就办。到延安整风，中间用了十年时间，才把错误清算了。即使受那么多损失，长征发生了张国焘叛变，结果党还是没有搞垮。看来搞垮我们的党不容易。我们保持了党内正常民主生活，即便出了修正主义，搞它几年又会变过来的。当然王明“左”倾路线时期不杀人，将来出了修正主义可能杀人。杀人不行，我们上山打游击。如果道理讲不赢，多数人赞成，就拉倒。真正出了修正主义，就只好让修正主义搞它几年看看。无非再来个二万五千里长征，几年后再变过来。

此外，还有个国际上的阶级斗争。我们不只是搞国内的革命事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历来就是国际事业。现在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还这么强大。德国、日本又起来了，但还未全面武装起来(开始有些武装)。不可能设想要世界革命胜利，不给帝国主义打仗。只要帝国主义不在世界上消灭，中国革命就不巩固。一是国内有他们的人，一是国际有帝国主义，这个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目的没有别的，不仅把中国搞好，把中国革命搞胜利，而且要争取世界革命胜利。就是马克思说

的，无产阶级革命失掉的只是身上的锁链，得到的却是全世界。要解放全人类，把地球改变过来。这是我们的目的。消灭中国反动派，成绩不错。中国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还有些地方有隐藏的敌人，通过五反、四清把它消灭。不仅是把中国的反动派消灭，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反动派都要消灭，要解放全人类。现在也只能管地球，别的星球上有没有人还不知道，可能没有，也可能有。首先把地球搞清楚。所以我们有国际任务。人民解放军干什么的？主要不是对国内的。对付逃亡地主，还用你们来解决？对付国内的敌人，有公安部队和民兵就行了。人民解放军主要是对付国外敌人、帝国主义，履行国际义务的。

37）在安徽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64年7月13日）

王光美报告六个钟头，值得不值得听下去？（李葆华：启发很大。）（李凡夫：有启发，还有震动。）今天我也想谈谈这个问题。

蹲点问题，中央早几年就提出来了，到底蹲下去没有？有些人是蹲下去了，但一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没有下去，蹲不下。蹲点方式大都是派个工作组下去，自己部署一下就回来了，隔个把礼拜下去听听汇报，指示指示，又回来了，如此三四次，这就叫蹲点。我听说多数人蹲点是这么个蹲法。没有蹲过点的也有，就是跑到那里打一转，听听汇报，然后他又跑到上面汇报，一级一级汇报上来。当然还有电话、文字报告、表报，靠汇报、靠电话、靠表报，领导工作，领导革命，自己没有下去蹲过点。看来，这个作风不大好，完全这么做法不大好。汇报还是要的，电话还是要打的，报告还是要看的，某些表也还是要的，但一级一级靠这些东西领导工作非常危险。下面汇报有些不确实，基层干部汇报，有些事情他讲，有些事情他就不讲，讲一面之词。有些表报数目字可能是确实的，恐怕很多是不确实的。两个最基本的数字，一个上地，一个人口，就不确实。一个大队、一个公社多少上地，多少人口，他报的数目字，你就相信？人口往多的报，上地往少的报，产量更往少处报，不确实。有许多表报是办公室搞的，如社会主义教育办公室、五反办公室等等，这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划的表，负责人并不知道，打电话催下面报，下面说没有这个数字，他说你无论如何要搞个来。有的地方专门有个汇报干部，不做别的事情，专门做汇报的，他并不了解实际情况，也没有参加实际工作，就是做汇报。有些干部，工作做得很好，但汇报讲不出来。所以光听一下汇报，就下工作决心，这个东西很危险。中央，毛主席提出省、地、县各级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包括市委，领导企业的、商业的负责人，都要下去蹲点。看来多数没有蹲下去。

什么叫蹲点？提出个标准好不好？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蹲点要从进村开始，扎根串连，组织贫下中农，发动群众，搞好“四清”、迟赔，搞好对敌斗争，贯彻“六十条”，“四十条”，整党，搞好生产，这些工作全部结束，这样叫蹲点。河北　“四清”，你们不吗“四清”，叫社会主义教育。现在山东、河北的“四清”，也不是原来那个“四清”，过去叫经济上四不清，现在还有政治上四不清，思想上四不清，组织上四不清。各个地方内容不一样。（王光美：“四不清”成了个代名词。公安系统提的四不清，包括敌我不清，真假革命不清。）敌我不清，真革命假革命不清，有这么一些问题。搞一期社会主义教育，大约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住在农村里面，亲自扎根串连，亲自开贫下中农会。我的意见，省委书记，省委其他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地委其他负责同志，县委书记，当然还有区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都要下去，省、地、县这三级下去了，他们也不能不下去。每个人到农村搞两期，每个冬春搞一期，半年一期。夏秋到城市搞工厂、商店、街道五反。分期分批，不要统统下去，留人管日常。第一书记下去，第二书记代理，到省里开会也是第二书记来，到中央开会另换一个人。你不在家，你不上去开会，就不得了吗？我看没有什么不得了。你生病，生它一年半年也可以，离职休养一年半年也可以，上党校学习一年半年也可以，甚至说不吉利的话死了也可以，就是蹲点不可以。我看这些理由都不对。没有你，我们的事业都不前进，工作就不前进？也可能出些问题，出些乱子。那你在，工作也会出问题，也会出乱子嘛！山东的同志说：上面说的这些都不是理由，实际是怕艰苦，这是地委书记讲的，这位同志讲的怎么样，有没有代：灰性，能不能代表今天在座的同志，值得你们自己考虑一下，自己做结论。如果怕艰苦就不好了。实际上，做领导工作做长了，生活安定了，稍许艰苦一点的工作就不愿意去了，这是思想起变化，很危险。现在和过去不一样，过去打仗的时候，哪个怕艰苦，那个时候，总是在乡下走，哪个怕下乡。架子放不下，怕丢面子，要不得！有人讲，当了县长、县委：书记，和贫下中农“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好象有点丢面子。这种思想要不得，这是脱离劳动人民，离开了贫下中农，不是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这不是有面子的事，相反是没有面子的事情。

城市也一样，要搞一个工厂，把一个厂生产搞好，有各种问题，有团结问题，也有阶级斗争问题。军队也是如此，我在山东，济南部队给我一批材料，有到连队蹲点的报告。一个连队也很复杂，要搞好不容易。有个连队指导员和连长不团结，对下面态度粗暴一点，他就不听你那一套，结果四好连队不四好了。有个排长老婆生病，住院去了，向指导员请假回家照料一下小孩，指导员不准，排长又要求调他到河东那个班去，照顾那个班的工作，他家就在那个地方，顺便照顾家里，指导员还是不准。结果小孩在家里没有人照顾，跌断了腿。因此排长对指导员一肚子气，这么个事情几年不能解决。谭启龙发现这个情况，要指导员向排长主动道歉，主动关心干部、战上生活，态度变好了，才把情况改变了。一个连队如此，那么一个工厂确实比连队复杂得多，要把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大家齐心一致努力搞好生产，不解决许多问题是不行的，搞不好的。工业厅长就没有搞过这个事，可是他要领导，要听他的。有一个工厂蹲点，要把生产情况改变过来，把工人内部问题解决，还有阶级斗争问题。也要划(阶级)。这些问题全部解决了，这才算一个过程。

你们下去不要搞一个公社，只搞一个人队。搞一个公社，实际上不能蹲点，又是听汇报，指示指示，自己不做。搞一个大队，也听汇报，因为大队也有几个生产队，但自己可以搞一、二、三个生产队，有许多事情是直接的，比如自己可以参加贫下中农会议、支部会、队委会，等等。我看省、地、县三级干部，还有中央一些同志，也可以这样下去蹲点。除开有病的、年纪太老的可以不去以外，每个人都要轮流分期分批搞两个大队，两个工厂，这样行不行？我的意见要这样搞，你们才能有资格做领导工作，否则就没有资格做领导工作，不能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运动。这个运动是个大革命，实际上北上地改革、合作化，比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广泛、深刻、复杂得多，它和过去历次革命不同，非要自己亲自去做不行。过去土地改革时，对地主、富农看得清楚，把上地一分，大致不错。现在地主、富农不出头，出头的是基层干部，贫下中农劳动者，有些人实际上不是贫下中农，过去划成分时他隐瞒了，划错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既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四不清，又要开展对敌斗争，还要解决干部参加劳动，这些事情过去都是没有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比上地改革困难得多。你们做领导工作，领导这个事情自己没有经验，没有搞过两个大队，可是又要领导别人。那就很危险，可能要犯错误，或者被别人骗了，人家汇报那个地方搞得很好，你也相信，人家说那个地方要打击、处分很多人，你也同意，搞错了将来又来平反，或者难下决心，没有把握。自己不去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这个工作，领导这个革命。叫别人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五反运动，别人搞好了，有了经验，就超过你们，你们没有经验他们有，你们就落后了，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刚才说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五反运动，北过去的革命运动更深刻，更广泛，这就是形势的发展。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别人，那你们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就当不下去了。别人搞好了，超过你们，别人搞不好，你们也没有办法搞好，没有办法去指导别人，怎么领导呢？所以要蹲点，搞两个大队，这样可以比较一下，也许两个都搞好了，取得了全面经验，也可能有一个搞好了，一个搞不好，还有一个成功的经验。

下去搞社会主义教育并不容易，不要以为你是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别人怕你。你斗得过地主，不一定斗得过基层干部，你可能打败仗。他是基层干部，什么情况都清楚，你什么都得听他的，不听他的又有什么办法呢？要不听他的，只好做艰苦的工作，发动群众，扎根串连，把情况搞清楚。如：果你带个工作组下去，你们力量对比不如基层干部，就搞他不赢，你们每一个行动，他都清清楚楚，而他们干什么，你一点也不清楚。可能工作组一进村仙就布置好了，订好攻守同盟，搞好的给你吃，陪你们玩玩，那你就要上他的当。一开始进村，贫下中农也要看看你们态度，不要以为你是县委书记、县长，他就完全相信你，他还要看几天，看几天还不行，他要看个把两个月，试探试探你，有话才对你讲。基层干部在你一进村时，给你一篇汇报，讲得很完整。一九六一年我在湖南天华大队住了十八天，在我去之前，胡××和人民日报工作组在那里住了几个月，写了一厚本调查报告，大多数材料是不确实的，他被基层干部骗了。天华大队是湖南一个多年的模范大队，支部书记是个女劳模。这个队生产也不错，比其他队稍许好一些，但不是一类的，也不是三类的，是中等。我相信，胡××的报告，也找劳动模范汇报了，又找贫下中农座谈了，住了十多天，才发现这个队有问题。那里真正当家的，是一个

地主的儿子，当她秘书，劳模是出面的，劳模也并不是那么真，并不那么模范。发现问题后，给长沙写了个信，叫县长带了一个工作组去了，召集贫下中农开会，扎根串连。开了一个用湖南的话叫三部分人的会议，即贫农、雇农、下中农，没有斗支部书记参加会，没有按照她的安排去做，于是这个劳模生气了，要赶我走。我是国家主席，又有几十个人一道，她赶我走，我就不走。我用打游击的办法，住老百姓家里，困卧草。公安厅长也去了，还有带枪的，她要赶我走，说我把她秩序搞乱了。湖南称年纪大的人叫胡子，你姓李，叫你李胡子，她叫我刘胡子，说刘胡子呆这么久，把她秩序搞乱了。什么“秩序”搞乱了呢？就是没有按照她的计划办事，她就说打乱了她的秩序。这些人敢赶我走，就不敢赶你们走吗？县长带工作组去了以后，安排了生活，召开贫下中农会议。据了解这个支部书记还不是坏人，是个中农：不是贫农，开会批评了支部书记，不好的干部不让他们参加会议，把地主的儿子不要了。我只发现问题，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更没有解决问题，解决问题是交给县长，搞了半年。你们能够住十八天发现问题就不错了，住一个月能了解情况就不错了，开始一个月也不容易发现问题。我去她要赶我走，还可以大骂；如果你们去把他“秩序”搞乱了，他就不赶你走吗？我就不相信。她说你妨碍生产，搞乱了秩序，或者向上告状。所以你们下去最好保守秘密，不要说自己是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厅长、局长、师长、政委，叫工作人员，让基层干部轻视你，对你估计不足好些。本县县长叫人家不认得也很难，可以到邻县搞一个大队，我到你那里搞一个大队，你到我这里搞一个大队，好不好？过了县，人家就不认得你了。

要取得一个大队或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的领导经验，对你们继续做领导工作很重要，不然你们就不能继续领导下去。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五反运动很不容易，这也就是说，今天这个革命和以前革命不一样，要取得新的革命经验很有必要。以后每一项新的工作，凡是没有经验，都要经过试验。谁去试验呢？当然技术问题由专家参加试验，对于党的工作，经济工作，就要党委、经济领导人员去试验，然后推广。经过亲自试验以后，听取别人的汇报，也就听得懂了。

表报是不是可以减少一些，是否由书记签字，书记不签字一律不许发，发了的一律不填。要招呼办公室，就是办公室发表报、打电话，一个干事或者是一个科长都可发表报，实际上他也不懂，他也没有填过。你要发表报的人自己去填，他也没有办法填的。总之，不要随便向基层发表报，要数字，不要逼他们，要就要确实的，不确实的不要，催来的表报都是假的。会还没有开，他就说到会的有多少人，发言的有多少人，百分比多少。而且确实有些人认为这样做是合法的，正规的办法。要这样的正规办法有什么用？这件事请你们讨论一下，看行不行。

下去蹲点每个月回来住一两天，那是可以的，不是一时一刻都抽不出身来，运动过了一个阶段可以休息几天。这是个方法问题。

不论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好，五反运动也好，根本问题是要发动群众，扎根串连，根子要扎正，要组织贫下中农开会，将来要建立贫下中农协会。干部中的四不清，贪污盗窃相当严重，多吃多占，占干部很大一部分，不是很小一部分，至于有点多吃多占，不那么严重的那就更多了。他贪污盗窃，你去清他，他不抵抗？就是好人，开始他也要抵抗的，至于后面站有地主、富农分子的，他更要抵抗。地主、富农比我们过去做秘密工作做得还好。他搞两面政权，比我们做得好。有些人甚至被一顿饭、几包烟就收买过去了。有些地方政权，实际上是操在四类分子手里，不在我们手里，有的是贫下中农，被他们收买，成了他们的代理人，你们不要以为，下去搞社会主义教育那么容易，不一定，你们下去可能打败仗。问题在于发动群众和依靠贫下中农，这样他才愿意，把话告诉你。放手发动群众，发动到什么程度呢？领导和群众结合，才能搞清楚，不发动群众一两年也搞不清楚，处分一些人也可能处分错了。中心问题是发动群众，中央双十条的第二个十条有些具体政策规定，要经过一些修改。文件对放手发动群众强调不够，群众还没有发动就规定那么多政策，结果那些政策变成了清规戒律，什么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相信和依靠基层干部。你相信他，群众就不相信你。你开始去，什么情况也不清楚，你不相信他

也不行，但是听了以后，再发动群众，扎根串连，把问题搞清楚，实事求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不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不可能的。少数支部没有多吃多占，没有贪污盗窃，和地主富农分子界限划得清楚，这样的支部可以相信他，如果多吃多占，贪污盗窃，和地主富农界限不清，你也依靠他，团结他，结果就团结不了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这是最基本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就不怕干部躺倒了，有些干部对搞运动有几怕，怕基层干部躺倒，怕搞过头，将来要纠偏，怕后遗症，怕妨碍生产，因此只好不革命。不革命，于是生产也不妨碍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也团结了，也不躺倒了，也没有后遗症了！我看，这样后遗症更大，生产更搞不好，因为他四不清，多吃多占，群众生产积极性就那么高？生产能搞得好？当然，发动群众就可能出些偏差，可能发生一些缺点错误。因此，我想这回来搞这个革命，要求缺点错误尽可能少些，乱子少一些，一点乱子都没有，恐怕也不可能。少一点是可能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要求：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四不清搞清了，退赔了，阶级斗争搞好了，地主、富农气焰扑下去了，生产搞起来了，缺点错误不多，至多一个指头，不超过一个指头。这是高标准。时间可以长一点，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六个月不够延长一点也行，要不急，看最后结果。如果不搞这个革命，就不是一个指头的缺点，而且十个指头的错误，那就是不革命，就是修正主义，不搞，缺点错误最大，搞了可能发生一点缺点错误，但这次运动缺点错误不要太大为好，有缺点错误不要很久就改，自己发现，自己去改，以后发现，再去把它改正。既然充分发动群众，就要了解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可能有缺点错误，可能过点头，一点头不过不可能。总结了历次运动的经验，就不要再犯了。从历史经验教训看，我们有什么经验？就是要善于观察群众运动的火候，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强调实事求是，是多少就多少，不要搞过头，不要认为越多越好。群众没有发动起来，自己着急，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自己又可能头昏，群众也可能头昏，不冷静。过去土地改革不彻底的，这次要搞彻底，根本没有土改的，表面上改过，实际上没有改过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一次搞成功。还有些党内遗留问题没有解决的，这次一起顺便解决，从前没有发动群众搞不清楚，这次把群众发动起来是可以搞清楚的。

凡是基层干部有严重问题，四不清，贪污盗窃，和地富分手界限不清，大体上大多数和上面的有些人有联系，和公社、区有联系，或者和县有联系。公社干部发生问题，和区委、县委有些人有联系，一个工厂发生问题，和区委、市委，工业管理部门的某些人有联系，有他上面的保护人，代理人，上面的保护人，有些是不清楚的，糊里糊涂，到下面去吃吃喝喝，送给你点礼物，就认为这个干部不错，你吃他一顿，他就不知道要吃多少顿，你接受他一点礼物，他就要开支很大一笔，这是一种人。还有一种人，就是跟不好的人搞在一起，包庇他，这种干部是不好的。他知道人家贪污盗窃，多吃多占，但是分给他了，小辫子被人家抓到了，有这样的人，基层干部四不清的棋子，我们说在四类分子那里，群众说不只是下面有根子，上面还有根子。我听了这个话很注意。有的同志问，上面的根子可不可以追，应该不应该追？我说不仅可以追，应该追，而且必须追，一定要追出来，不管那一级的，公社、区委、县委也好，地委，省委也好，中央也好，都要追，至于那些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以及地主、富农搞在一起的，糊里糊涂也好，有意识的也好，一律要追清楚。你们赞成不赞成？怕追到自己头上？这恐怕也难免，接受教训就是了。魏文伯是华东局的，与华东局有关系的也要追，不管是谁。当然这里也可能有诬告的，本来没有这个事情，他把事情夸大，有意识的搞乱。有些坏人，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他有意识的搞乱，他本来贪污一千元，他说贪污一万，他自己坦白的，他说送给谁多少，送给华东局多少，那你就不要随便相信了。实事求是查清楚，没有就没有，一时查不清的，放在那里，摆一摆，把它保留起来，以后再讲。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是可以查清楚的。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彻底发动群众，事情才能搞彻底，才能搞清楚。

充分发动群众，就不应该害怕。共产党员怕群众运动，就有点不大象样子。共产党员就是搞群众运动的，搞了一辈子革命，到现在还怕群众运动？群众发动起来，可能过点头，我们纠正一下就是了，但要少出乱子。恐怕也还有不彻底的，不得不搞深透的，可能还有百分之十不彻底，不深不透。当前是主要

的，恐怕多数是不深不透，这就不是补课问题，而是要重来，不是基本解决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搞开嘛；问题没有暴露出来，没有解决问题。群众没有充分发动，怎么能搞开？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可能过点头，但也还可能有百分之十不彻底，这也不要紧，反正有时间，不急，不彻底重来，不过既然做这个工作，搞革命，不要故意走弯路，耽误时间，群众革命运动，不要搞很久时间，几个月就行了。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不要很久就会搞清楚。第一个月扎根串连，第二个月充分发动群众，第三个月开展对敌斗争，根本问题是充分发动群众。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自己着急，群众发动起来又害怕，又制止，结果可能一年也搞不完。以上讲的，一个是蹲点问题，一个是充分发动群众问题，发动群众害怕不害怕，过点头，上面根子追不追，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可能使这个运动前进一步。

此外，过去曾希圣在这里犯了错误，听说现在省、地、县多数问题都解决了，还有某些问题没有解决。多数问题解决了，少数问题没有解决，要向前看嘛，什么叫向前看，就是要搞社会主义教育，搞五反。把运动搞好了，你过去是错误的，现在就变成正确的，搞不好，你过去是正确的，现在就是不正确的，在这个革命运动中考验自己，到底怎么讲。你以前革命是行的，今后革命到底行不行？搞几期社会主义教育试试看，希望你们蹲点真正蹲下去。我相信只要你们蹲下去，多数是行的，因为你们过去有经验嘛，也可能有某些人不行。

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做好今后的工作，实在不行的，还有些问题不好解决的，调动一下工作也好，调个环境为什么不可以，换一下新鲜空气，接受教训，去受考验，重新建立信仰。这次处理曾希圣的问题，除把曾希圣调开了，大多数人还在这里，这次没有象曾希圣那样处理问题，划右派、降级、开除党籍。违法乱纪是另外一个问题。刚才讲上面的根子，如果有上面的根子还是要处理，不管你是什么人。批评了一下，有些发言难听一点是难免的，最后结论不是那样就可以了。过去处理错了的平反了，以后团结起来。当前有伟大的革命任务，社会主义教育，五反，是伟大的革命运动，摆在我们面前，要我们来搞，想当前的问题还想不完，过去的问题没有时间想了，至少马虎一点了。

还有一个问题要讲一下，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管教育的同志来了没有？我讲的恰恰不是大专学校。我们的教育制度只有一种，劳动制度也只有一种，这种制度很被动，当工人当一辈子，动员回去很困难。吃了很大苦头，以后还这样搞吗？我们有了经验，以后不增加或少增加固定工人，尽可能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里面也有一些剩余劳动力。安徽也有农闲时间，可利用农闲时间，组织农民到工厂做临时工。你们的纱厂现在开三班，恰恰是农忙时间，以后可不可以这样做，农闲时开三班，农忙时开一班，农忙时候，工人回家种田。这也是你们的理由，全国有些厂还吃不饱哩。以后再办纱厂，就不要放在合肥了，放到产棉花的县里去，由老厂派一班人去，做骨干，招一班农村姑娘做临时工。农忙种地，农闲做工。还有缫丝厂、弹花厂、糖厂、榨油厂、碾米厂等，只有季节性的工作，我们把它搞成固定工，不生产也要发工资，很不合算，煤矿在解放前从来是农忙时工人走了，农闲时又回矿里来，我们现在把他们统统改为固定工了。城市工厂也可以有一部分临时工，现在有人说，临时工多少年了还不转正，转正又没有事做。我们要搞一部分亦工亦农的工人，专、县工厂，除特殊的手工业工人以外，不要搞那么多固定工。临时工也要搞亦工亦农，固定工可以减少。煤矿、铁矿可以在冬天把坑道挖好。当然这些事情要经过试验，不要一下子搞得很多，那是搞不好的。

你们这里适龄儿童入学的有多少？不到一半，这个问题严重，有一半儿童要变成文盲。我们学校如果这样办下去哪一年能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又当农民又读书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把这种学校叫做简易学校，应该就叫它正规学校，农忙种田，农闲读书，有时间多读一点，没有时间少读一点，教员也要种地。农业中学你们这里有没有？要总结农业中学的经验，总之一方面要他不脱离生产，一方面让他读书。这样办一百年也不能普及教育，国家负担不起，家庭负担不起，一家五、六个小孩读书，你供给得起？有的读小学，有的读初中，有的读大学，都靠你这点薪水。没有人管，我看可以设个机构来管，设第二教育厅，不要现在的教育厅管，他们老脑筋，就是那一套，放暑假，放寒假，我们搞另外一套，农

忙种田，农闲读书。农村要多办一些半工半读的学校，大队办小学，公社办中学。有些学校自己可以有土地，有生产资料，学生可以离开家庭，在学校里参加劳动生产，离家近的可以在家里生产，太远的要有单独的生产资料。有些国营农场可以搞这个事情，这样使许多人可以读书，国家不要负担，家庭不要负担，小孩可以自己搞饭吃。我们可以有另外一种算法，这种学校在农村可以多办。五八年我去天津时，提倡了一下，有一百个工厂搞半工半读，到现在自生自灭还剩下七个，这七个坚持下来了，已有二千多人毕业了，毕业的人有些当技术员，有些当工人，这种学校毕业的人，就是一种新型的人，跟我们不一样，跟你们不一样，跟工人不一样，跟农民不一样，跟知识分子也不一样，既可以体力劳动，又可以脑力劳动，既可以做工，又可以在科室办事。一个工厂有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这样的人，技术进步就可以很快。开始他们提议读四小时书，四小时劳动，后来他们感到每天交接班有困难，讨论改为读两个礼拜的书，做两个礼拜的工，每天做八小时。他们一律招初中毕业生，上中技课，中技三年毕业，它四年毕业，四年半也可以嘛！有个工厂准备办大学了。工厂比较难办一点，因为有个吃商品粮问题，城市人口不能太多，但是可以试验。你们合肥有多少工人？可不可以这样设想，再过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半个世纪，那时候，现有工人都老了，都要死了，用半工中读办法培养出七万新的工人，都是中技毕业生，那时候工人阶级完全变了。这些人和原来的工人不一样，和我们不一样，是新型的人，全面发展的人，既能体力劳动，又能脑力劳动。马克思说过：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大提高，第一条是由于工人的全面发展，由于工人生产技术提高了，生产才能大发展，到那时候，就可以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人的全面发展头一条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都能搞，到那时候，官僚主义就搞不成了。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产生官僚主义，因为劳动人民文化水平不高，要他们当厂长，别人欺骗他也不知道，要他管科室工作就有困难。现在工厂里面非生产人员太多，要科室人员下车间参加生产，半天生产，半天办公行不行？学点技术，这样工人也就服了，思想问题也就没有了。厂长、支部书记、车间主任、科室干部都参加劳动就没有好多事要办了。

我们还设想，到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劳动时间缩短，每人每天四五小时就够了，其余时间干什么呢？尽打牌，尽玩，甚至打架？空余时间还是要学习，还是要办公，有的唱戏，有的搞音乐，有的画画，那个时候没有专门唱戏的，专门画画的，专门搞统计的，专门搞机关工作的。宣传工作也是业余的，以后办报纸，工人会写文章、写小说，要专门文学家干什么。帝国主义反动派全部打倒了，军队就可以不要了。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所有的人都要劳动，九岁以后每天劳动两小时，十三岁以后每天劳动三小时。劳动也包括我们这些人，你们这些人在内，一参加劳动反而事情少了，一脱离生产，皮就扯不完。现在非生产人员参加生产，两个人或三个人顶一个工人也好。

刚才讲过的半工半读，半年当农民，半年读书，工厂里面半工半读这种形式，现在是少数，将来是主要的，全日制学校将来很少，甚至可以不要。这样国家负担，家庭负担可以减少，小孩子十三四岁慢慢就可以搞到饭吃。开始可以由国家补贴一点。这种人就要包下来，倒是包你们这些人国家包多了困难，包固定工困难。他们这些人既可以体力劳动又可以脑力劳动，为什么不包呢？这种人将来比全日制中学大学毕业出来的人更好一些，他们对劳动没有反感，对劳动人民有感情，又懂生产技术，你骗他骗不倒。这种人是容易分配工作的，天津近几年毕业的二千多人，毕业以后分配到什么地方都不愿意去。培养接班人主要靠这种办法。城市可以搞几个试点，先办中等技术学校，将来再办大学。全日制中学、大学算了，不要增加它劳动时间，以后增办这种半工半读的学校。办农业技术学校更适合，可以进农业大学，也可以种田，可以搞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排灌站。这些单位以后统统不要固定工人，都是又是工人又是农民，慢慢转过来。可不可以用教育经费的四分之一，办这种半耕半读、半工半读的学校，招收的学生能够和其余四分之三经费办的全日制学校一样多。用这种办法可以普及教育，而且升学率高，他反正吃自己的饭。我看这种人最好分配工作，你不分配，他也有办法，但不能说不包下来，只包那个全日制的，这种人思想好，能文能武，包下来有好处。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机构来管这个事，是不是设个机构来管。我想回去向中央建议，单设一个部，另外调人来搞，教育部搞他那一套，要他搞，他就是老脑筋。这种教育制度是长命的，你那个全日制教育制度是短命的，最多一百年。一百年以

后还要读书，一万年还是要读书的，全日制的一百年、二百年以后恐怕就没有了。要你们带队。为什么要负责同志亲自参加，每人搞两期呢？这样就可以轮换了，每期都有熟手，不然搞一期不搞了，来的都是新来的。除此以外，还要有社会主义教育专业队，一直搞下去，不搞完不收兵。每人参加搞两期怎么样？

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要具体化一下，先搞试验，不要一下铺开，最后又垮台，这种事要再过四、五年才可总结经验。过去已经办的，可研究一下，以后搞得更好一点，更正规一点。国家负担减少了，家庭负担减少了，这个东西，连我们干部，包括在座的恐怕也需要，家里有五、六个小孩读书，负担不得了。也读点书就好了。农忙种田，不是农忙的时候可以读点书。

今天就讲这几个问题，具体的由你们讨论，对不对请你们考虑。一切事情都要经过试验，不试验成熟不推广。这种劳动制度、教育制度、学校制度，不经过四、五年是不能取得初步经验的。天津半工半读学校二千多毕业生，他们讲了一点情况，到底怎么样还不清楚。你们也可以试办一点，坚持下去，办它多少年，就有经验了。有些问题中央工作会议上已经讲了，有些问题今天讲的详细点，有些还是一些想法。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过去也有些经验，应该把这种学校当成正规学校，两种学校要平等看待。今天晚上就谈到这里吧！讨论一下，不要一下推开，要经过你们思考，试办，取得经验。

38)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问题的报告(1964年8月1日)

现在我要讲一讲关于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就是“四清”，“五反”的问题。

最近，我到几个省(市)去跑了一下，从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后头又到郑州，都碰到它们开三级干部会议。在这几个省，我就找地(市)委书记谈了谈，把今天所讲的问题讲了一下。但是我没有向在中央工作的同志们讲，这是个缺点。昨天经过中央同志们同意，还是向同志们讲一讲这个问题。

在这几个省开三级干部会议的时候，我都看了三级干部会议初期的简报。这些简报中间，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有反映，发言中间都有反映，但是一直找不到一个比较象样的经验总结，发言都是很一般的。……也有那么一些典型材料，就是那些基层单位被敌人篡夺了，但是，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如何进行“四清”、“五反”？中间有些什么关节？有些什么问题？怎么斗争的？解决了没有解决？搞得彻底不彻底？都没有。我在各省又问了一下省委的负责同志，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自己下去蹲点没有？他们答复说，有些人蹲了。我就问怎么蹲的？大体上都是这么 的：带个工作队下去，住两天，把工作安排安排，回来了，等个一个多月，又去两天，听听汇报，指示指示，又回来了。如此去过三次的、四次的，也有，不多。就是徐子荣同志在山东曲阜的那个蹲点的报告，我也问了山东省委，徐子荣同志，我们大家知道的，是好同志，到底他瞻了点没有呢？蹲了好久呢？听说在那里住了一个礼拜，真正在那里住了四个月的，说是公安部一个处长，山东公安厅一个付厅长。那么，这样叫不叫蹲点？蹲点这么个蹲法行不行？据我看，这样不叫蹲点，这个蹲法不行的。

现在我们的各级党委，都是听汇报，看表报，来领导工作，或者看书面报告，打电话，来领导工作。我在几个省找了一些军事干部谈了谈，也看了几个军队的蹲点的材料，这个比较好一些，的确有些军的干部，军区的主要负责干部，到连队里面去蹲了点，写了报告，搞清楚一个连队，找新战士谈谈话，老战士谈谈话，解决他们中间的问题，有这种典型，比较好一些，而地方党委，恐怕包括中央在内。中央各部门，都没有真正去蹲点，都是听汇报，凭表报，凭电报、电话来领导工作。这样行不行？据说不只是县委，而且区委、公社党委也是听汇报，不找群众谈话。到一个大队，到一个生产队去，先一天去，上午去，叫他搞一顿饭吃了，有的根本不找群众谈话，只找那些基层干部谈一谈，拿一个表回来了。也还有些比较好的公社党委，还找群众谈一谈。中央开了许多工作会议，各部门也开了许多会议，这些工作会议解决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呢？也是在这个会议上面听汇报，各省、各个地方汇报一番，然后决定政策，而不是凭着自己蹲点取得经验，经验而且相当成熟，然后开会，加以推广，不是这个方式。毛主席在大跃进时期就提出蹲点问题。大跃进中间发现许多缺点错误，有许多虚报浮夸，比如麦子亩产七千斤等等，长久不能发现，有些缺点错误相当长的时期不能改正，其原因是什么？毛主席说，就是你们省委负责人，中央负责人，自己没有下去蹲点，因此不能发现。毛主席在那个时候就强调负责同志要去蹲点。麦子亩产七千斤，如果我们自己下去到那个地方看一看，蹲它一个月，保管发现了嘛，为什么等了几年呢？主席在那个时期提出，负责干部要蹲点，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但是，这个问题我看是没有解决，蹲点问题没有解决，调查研究没有解决。几年以来，包括中央的同志，中央各部门，以及省委、地委、县委，没有真正蹲下去。

什么叫蹲点？我想，我在各省也讲过了，要提出一个标准。例如现在的社会主义教育，“五反”，应该是负责同志带领一个工作队，从训练工作队，进村，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搞好“四清”，搞好对敌斗争，搞好“六十条”、“四十条”，搞好整顿组织，干部参加劳动，一直到搞好组织处理，结束，善始善终，这样才叫蹲点。其他工作要蹲点，也就是要把整个过程搞完，从开始到最后，这样才叫蹲点。例如说搞“四清”，大体上最少也得四个月、五个月、六个月搞一期。“五反”可能时间也不会短，一个工厂的“五反”可能五个月还不够，可能要七、八个月。这样才叫蹲点嘛，你自己取得经验嘛。过去

那种蹲法，一律不叫蹲点，叫走点或者看点，到这里转一转，那里转一转，这里指示指示，那里指示指示，这个领导方式不行。

因此，我认为，现在党的许多领导机关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许多重要的情况不知道，严重的问题发现不了。为什么？因为单单听汇报，那个基层干部，以及还有些干部，对于一些重要的情况，重要的问题，他不向你汇报，他不讲，你从汇报中间听不到。还有些人是这样的，汇报是很会作的，讲得天花乱坠，但是，工作并不大行。还有些人，汇报他不那么很会，结结巴巴，听他的汇报并不一定那么觉得好，但是工作很切实。至于讲表报的数字，许多是不可靠的，是假的。开始两个最基本的数字，北如说你这个大队到底有多少土地？有多少人口？这两个数字它总有的，一个公社总有的，凡是报告，它就有这两个数字，这两个数字就不确实，总而言之是上地越报越少，人口越报越多。最近我们的同志在一个大队里面参加“四清”完了，然后鼓励这些干部，新的老的干部团结起来，说老实话，当老实人，做老实事，要他说老实话，说老实话不让你吃亏，然后就问他，你这个土地到底多少？他原来报说是两千九百多亩土地，至少是少报了三百亩，少报百分之十五。至于讲瞒产，我看总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人口没有查。那个土地也没有最后查下去，因为你讲了就算你是讲老实话，就算了，就没有认真去查。其他许多表报，比如山东省农业厅向中央农业部报了一张表，讲农业生产的耕种进度，积肥多少，下种多少，多少亩棉花等等，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就问这个农业厅长，你这个表报是真的假的呀？他说是假的。假的，你为什么要往上面报呢？农业部要啊。就要这些假数字，假的表报，凭这些表报来下决心，来指示工作，我看是危险得很。现在这个表报还是多得很，“五多”并没有改变。是不是改变一下，不要发这么多表报。是不是我们中央各部门要发什么表，一律由部长签字，或者口长签字，才发，没有签字的，一律不发。而且不要催，限定什么时候要他报数字，一催，就是假的。有那种专门填表的、专门造假数字的人，他向你报告了假数字，他自己有一个底子，他讲出来要对头的。有一个会还没有开，他就说这次会到了多少人，多少人发了言，男的多少，女的多少。有许多表报，就是那个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搞的。什么“五反”办公室，“四清”办公室，各种办公室，那些办公室的人吃了饭没有事，上面天天打电话要数字，他也没有数字，他就造假数字。把这一点切实控制一下好不好？我看，从中央一直到县委、区委、公社党委都是靠汇报、靠表报领导工作，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再这么搞下去，搞个多少年，我们要灭亡。

因此，我在各省都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省委书记，以及其他的负责同志，除开有病的以外，都要在这五年之内分期分批地去蹲点，搞好两个大队的“四清”(搞两期)，两个工厂的“五反”。为什么只搞两个人队，不搞一个公社呢？负责一个公社也只能听汇报，自己亲自去扎根串连，开群众会，找群众谈话，就不行了，只能搞一个大队。主要负责干部搞个大队，公社的一般领导可以叫别的人来听汇报。但是，搞社会主义教育，农村的“四清”，一个公社同时搞，那是必要的，因为它有那么一片，就可以有一种声势。公社不搞，只搞大队，搞不下去的，同时也不巩固的。开始那个公社就不大那么同意，等你一走，他又翻过来了。所以，到农村去蹲点，负责同志自己要去搞个大队。在城市里面就搞一个工厂，或者一个学校，一个机关，一个街道。你搞一个大队，你搞好了的话，反而能够领导全公社；你坐在公社里面，你不能领导全公社，而是别人领导你。当然，不一定说是你们负责干部下去了，在那个人队，一定是你那个队搞得好，那不一定，可能别人搞得比你更好。别人搞得更好，就用别人的经验嘛，学人家的嘛。

我认为，现在负责干部自己到农村工厂去蹲点，取得社会主义教育的直接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说，我们的“四清”、“五反”，社会主义教育，是一次大革命，是北过去的土改、合作化还要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大革命。的确是这样，的确是个大革命，的确是比土地改革还要深刻得多，要广泛得多，要复杂得多，要艰巨得多。我们各级负责干部，领导同志，自己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领导今后的工作，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因此，我主张，除开有病的，年老体弱的以外，

凡是能够下去的，都应该去参加这个大革命，搞两个典型。我讲的是最少搞两个大队，搞两个工厂，这是最少的，这是一般都需要的。为什么搞两个？因为我还准备你们有一个搞不好，准备你们失败一次。

为什么现在自己不去取得这个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经验就不能做领导工作呢？因为现在的革命形势已经发展了，阶级斗争中间出现了许多新的形式，有许多新的特点是过去没有的，仅仅有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不能够领导现在的革命斗争，今后也不能领导。过去的革命斗争经验，土地改革的经验，合作化的经验，大跃进的经验，过去了，今天搞的社会主义革命，今天搞的“四清”、“五反”，这是过去没有的。所以，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取得这个革命的直接经验，才能够领导现在和今后的革命斗争，否则不能领导，不能作地委书记了，不能作县委书记了，不能作省委书记了，中央委员恐怕也成问题了，部长恐怕也不能作了，司局长恐怕也不能作了。

过去一年多的“四清”、“五反”是起了一些好作用的，是有它的成绩的，主要我看是起了煞住歪风的作用，也起了推动生产的好的影响。但是，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据我的估计，“四清”、“五反”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甚至没有搞开，没有入门。邓小平同志在东北走了一下，他讲工厂的“五反”，他也说是没有入门，根本没有入门，还在门坎外边。这就是说，过去一年多，我们在这个革命斗争中间打了败仗，不是打胜仗。过去派去的工作队太弱了，有的还把一些有问题的干部派下去。同时，有些地方对于工作队下去，规定了许多限制，限制他们的手脚，不让他们放手发动群众，不让他们跟基层干部中间的严重四不清，公社中间的严重四不清，不让工作队跟农村和工厂这些阻碍群众运动发动的现象作斗争，甚至有一些工作队被他们赶回来了。山东有一个大队，派三次工作队去，都被他们赶回来了。我看，大体上那个被赶回来的工作队恐怕是不错的。

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的。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一个公社里面开三级干部会放包袱，几个公社干部就带头放什么包袱呢？他说，我瞒了产。瞒多少？他也不讲。公社干部这一搞，大队干部都检讨，放包袱，都说是瞒了产。你说这是什么呀？这不是阶级斗争？他就是反对我们搞“四清”的，反对要他们放包袱的，他收买人心，吸引群众。这是一种计划好的、布置好的放包袱法。

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阶级敌人对我们的斗争方式摸熟了，晓得我们有那几套，工作队下乡来干什么，有那几手，他熟了，摸得很熟。阶级敌人研究我们的政策比我们共产党员研究得好，那一条，那一条，他记得清清楚楚。那个坏了的干部也研究得很清楚。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间，敌人是拿着枪的，地主、富农、资本家也是明明白白的，摆在面上的，看得清楚。现在呢？阶级敌人一不拿枪了，二不收租，也不开工厂了，都站在后边去了，他隐蔽起来了，而站在前面的可能是他隐瞒了成份，他是以贫农的面貌，或者中农的面貌，或者工人的面貌出现，或者他自己不出面，出面的是他的代理人，也是贫农下中农，或者中农，或者工人，或者公方代表，公方经理，那些人站在前面，他站在后面，因此，敌人看不到了，看到的净是我们的干部，净是我们的共产党员。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列宁在白党向喀琅斯塔特进攻的时候说，他们拥护苏维埃，反对布尔什维克，要组织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列宁借此大作文章，你看，这个敌人是苏维埃政权它可以允许，但是不允许布尔什维克。你们去看一看那篇文章。现在的敌人不只是列宁那个时候了，他不只是要苏维埃，而且要布尔什维克，要共产党，要社会主义，甚而至于也要“四清”、“五反”，就是我们的一切口号，一切招牌他都要，但是内容是他领导，他把持。这是敌人向我们作斗争的主要方式。现在敌人同我们进行斗争的方式，主要是采用和平演变的方式和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方式。敌人的斗争方式变了。而我们呢？有些同志看不大到，不警惕。

我们的有些基层单位原来就是阶级敌人把持的，在那里，阶级敌人并没有被打倒，被推翻。有不少的地区上地改革不彻底，或者基本上没有土地改革。照华北局讲，华北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地区是所谓和平

土改区。天津说，它那里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地区是所谓和平土改区。(彭真：西北几乎是全部。)西北，据刘澜涛最近的报告，几乎全部是和平土改区。真正进行了土地改革的地区很少。北京郊区不晓得怎么样？(彭真：也是和平土改，后来加工的。所有大城市郊区都是和平土改。)加了工了，那要看还有多少。最近×××同志跟周扬到天津南面去蹲点，那个地方就是十几年来一直被三个反革命集团统治着，都是“劳动模范”。所以，那里地主富农的统治并没有被推翻。有些单位是敌人打进来把持了领导。有些单位领导人原来是我们的，但是被敌人拉下水了，当了阶级敌人的代理人。这在公私合营企业中间就不少。还有一些单位的领导人，贪污盗窃很严重，已经蜕化变质了，实际上在那里反共反人民。当然，口号不提。从有些材料看来，我们有些干部很容易被地、富、反、坏、资本家收买，听说有的只有几包香烟，请他吃了几回酒，几顿饭，就基本上过去了，以后当然他可以越陷越深。有些人讲，这个和平演变过去，是舒舒服服就过去了，有吃，又有穿，也得到其他的东西。而真正要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流汗；真正要改造思想，那是要进行艰苦的斗争。……农村里面犯一般四不清错误的，可能不是少数，可能是多数。还有不少的单位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

一切有严重问题的人和集团，都要积极向上级领导机关找靠山，找保护人，找代理人，就是要找上层建筑来保护。发生了严重问题，大体上是这样一个规律性：一个科员，如果不拉科长下水，他干坏事不敢大搞，不敢乱搞的。一个科长不拉处长下水，也不敢大搞乱搞。处长不拉局长下水，也不敢大搞乱搞。局长不拉部长下水，也不敢大搞乱搞。部长就要拉市长。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市委书记就要拉你们下水。生产队的干部不拉大队干部下水，他也不敢乱搞的。大队干部不拉公社的干部下水，不拉区委的干部下水，他也不好大搞乱搞。公社、区委不拉县委、地委下水，他也不敢大搞乱搞。地委、县委他就拉省委，就要拉中央的人。所以，他上面有牵连。最近我们的同志在农村里面搞“四清”，“四清”搞完之后，就来追查这个四不清的根子，工作队提出来，四不清的根子是在地、富、反、坏(这是对的)，群众就提出来，不只是我们下面有根子，你们上面也有根子呀。这就是说，有上面的人牵连。我听了这个话很注意，我很注意这个话。这是群众提出来的。上面的根子要不要追？要不要挖？应不应该追？我觉得应该追，一律追，一律挖，不管是那一级。生产队、大队牵连到公社的干部，要挖出来；牵连到区委、县委，要挖出来；牵连到省委、中央，都要挖出来。过去土地改革的时候就牵连到我们一些中央委员嘛，我就接过好多这种信嘛。上地改革中间牵连到中央委员，那个工作队写一个报告，我把这封信转给这个中央委员，他只好赶快作检讨。最近农业展览馆不是发生严重问题吗？搞那么久，就是牵连到副部长、部长。建筑工程部也是这样，也牵连到副部长、部长。

上面的根子有几种：有一种是不清醒，糊里糊涂，受了人家的礼，吃了人家的，他汇报得也很好，招呼得你也很好，恭恭敬敬，哎，这是个好干部呀，不知不觉地做了下面那种四不清以及违法乱纪的根子，保护人。还有一种是官僚主义，严重的官僚主义。再还有一种，就是有意地包庇坏人坏事，明明白白晓得他是干了坏事，不是好人，干部不是好的，在那里违法乱纪，他就有意包庇他，跟他搞到一起。不管是那几种根子，一律追出来，追得那个不清醒的使他清醒起来，追得那个官僚主义也改一下；追得那个包庇坏人坏事的要处理。

现在敌人跟我们作斗争的方式已经改变了，敌人已经变得聪明了。而地主、富农、资本家很会搞合法斗争，很会搞两面政权，很会搞和平演变，北我们要搞得好。他们做秘密工作，作合法斗争，公开与秘密结合，搞两面政权，比我们共产党员会搞。过去我们也曾经采用两面政权的方式对付日本人，对付汉奸，对付国民党，用这个办法，国民党斗我们不赢，骗了它们，国民党没有办法对付我们。而现在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却至今没有学会反对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采用的两面政权的方式，不会跟他作斗争。现在我们全党没有学会，我们的干部很多人没有学会。因此，在和敌人作斗争的时候，或者跟坏干部作斗争的时候，打败仗，被他们骗了，斗他不赢。

因此，我们必须自己直接去参加今天的革命斗争，去取得今天革命斗争的直接经验，新的经验，才能

够领导现在和今后的革命斗争，否则就不能领导今后的革命斗争了，不能继续做领导工作了。总是打败仗，那怎么行呢？中央委员，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省委书记，我看当不成了。如果自己不去蹲点，取得直接的经验，别人去 了点，他取得了这个经验，那他就超过我们，超过我们的主要负责同志。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直接经验，别人没有搞好，他来欺骗领导，向我们作汇报，我们也听不懂，因为自己没有直接经验嘛。他一篇报告，讲得天花乱坠，他说搞得很好，我们也听不懂。或者他请示，要开除那个人的党籍，要怎么样整理，那个人要奖励，那个人是模范，我们也不好下决心，或者下决心错了。

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因为基层干部的汇报，有许多重要情况不告诉我们，或者是假数字；而贫下中农，或者是工人，也有很多顾虑，不向我们说话，或者不向我们说真话，不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就是找贫下中农开调查会，你就把情况调查出来了？那样容易呀？调查不出来。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呢？应该在“四清”、“五反”的运动中间，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间，来认识客观世界。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五反”，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为得了解那个地方的情况，了解一个工厂的情况，一个农村的情况，要经过艰苦斗争，你才能够了解。(彭真：很激烈的斗争。)有时候是很激烈的斗争。

负责同志蹲点，为什么蹲不下去？原因是什么？有几个省的讨论说，是对于蹲点的重大意义认识不够，对于“四清”、“五反”是伟大的大革命这个意义认识不够。我看，这也对，是对于现在的大革命意义认识不够，对于负责干部必须自己亲自下去领导，对蹲点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其次，在几个省，我讲话之后他们再讨论，他们说，要蹲下去是可以的，其所以没有蹲下去，就是怕艰苦，是一种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而不是革命的领导方式。我们的领导同志首先自己必须革命化，然后机关才可以革命化，然后各级党的组织才可以革命化，然后整个工人农民才可以革命化，把整个中国的面貌有所改变。

还在二十多年以前，中央就有一个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在延安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中间有九条，第一条就是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现在是只有一股号召，而没有个别指导，就是不去蹲点。没有个别指导，不取得典型经验，甚而至于自己不去取得典型经验，只有一般号召，这是不行的。我觉得，不只是“四清”、“五反”要去蹲点，以后每一项新的工作来了，全党还没有经验之前，负责干部都要自己去蹲点，去取得经验，才能够进行一般号召。等到全党有了经验了，那就好办了。

其他还有许多不能蹲点的理由，比如说是一般工作离不开，说是忙得很，工作丢不开，等等，理由很多。我看，有这么一些原因，但是，这些理由都不能成立，也不应该成立。我们有许多负责同志，各级的负责同志，可以离职休养一年、半年，这个行，生病也生得。薄一波不是搞经济委员会吗？那是最不能离开的嘛，最近不也是离职休息了好几个月吗？休息了一年。刘澜涛不是休息了多少年吗？×××同志也休息了。离职休息又休息得，离职学习也学习得，甚至于死也死得，独只蹲点蹲不得，我看不成其为理由。你们死了，工作就没有人做了？我不相信。所以，那一些理由都不能成立。

自己去取得今天这种直接革命斗争的经验，是很有用处的。因为这个革命不只是今天要进行，要进行几十年，几十年以后还有用。土地改革嘛，改完了就没有了嘛，只还有那些不彻底的地方我们还有工作做嘛，可以说那个斗争方式也变了，再要去搞上地改革，只有到外国去，而外国又不请我们去，有什么办法？去的只有几个人：所以，有许多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现在用不大着了。但是，有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有群众路线、发动群众的经验，再去取得今天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是比较容易些的。所以，今天去取得这种经验，在以后几十年还有用。我并不是说今后几十年都不要蹲点了。今后几十年还得要蹲点，还会有新的情况，新的任务，新的事情，而敌人的斗争方式又会变。但是，总而言之，今天取得的经验，取得今天阶级斗争的经验，这不只是今天有用。这就是说，我们要学会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阶级斗争的经验。在这一方面，我们现在落后于我们的敌人，落后于那些坏干部，我们的各级主

要领导同志都落后。

为了搞好“四清”、“五反”，除开负责干部去蹲两个大队、两个工厂以外，我看还要组织专业队，有专搞农村“四清”、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专业队，有专搞城市“五反”的专业队。这些人，就不只是蹲两期，就要蹲多少年，要搞多少年，搞它十几期二十期，然后他们就熟练了。一定要搞多少年。我们的负责干部，至少搞两个农村，搞两个工厂。此外，还有参加锻炼的青年等等，也至少要搞两期，两期农村，两期工厂。搞一期不行。搞一期就换了，都是新手。搞两期，总有一批是老的，有一批是新的。还有专业队嘛，交叉嘛。这样配起来，才可以斗得过敌人，不然不行。

城市的“五反”，工厂的“五反”，我看一般应该派工作队。没有工作队，不发动群众，不放手发动群众，这不行。城市“五反”应该派工作队，由负责干部率领去搞，没有工作队不行。不论是农村，或者是城市，没有负责干部率领的工作队去善始善终地搞，是斗不过那一些有组织的、上下左右都有联系的阶级敌人和坏的干部的。派一般的工作队，负责干部自己不下去，斗不过他们。不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不能把“四清”搞好的。没有广大的群众运动，你能够把“四清”搞好呀？办不到。不放手发动工人阶级和团结各工厂、机关、企业、学校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也是不能把“五反”搞好的。最近华北的“四清”比原来“四清”的内容扩大了，保定那个“四清”，只是讲经济上四不清，现在不只是搞经济上的四不清，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的四不清都要搞好，就是包括整个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政治上的四不清是那些？据说是敌我界限不清，两条道路不清，还有什么东西，我现在也数不出来。政治上的四不清，思想上的四不清，组织上的四不清，都有的。

现在许多地方的“四清”、“五反”没有充分发动群众，或者发动群众很不够，因此，搞好的很少。各个地方也承认“四清”、“五反”是个大革命，但是大革命又不发动群众，又不放手发动群众，那有什么大革命呢？凡是不放手发动群众，没有广大的群众运动，就没有革命的，那个所谓大革命，那是口里讲的，空谈，是讲给我们听的，他没有真做。

说到放手发动群众，许多同志有无穷的顾虑，前怕狼，后怕虎。有好几怕：第一，怕妨碍生产。第二，怕工作队和支部、公社党委、区委、县委的关系搞不好。第三，怕群众运动过头，发生乱子。此外，还有怕产生后遗症，怕纠偏，将来又要平反，怕干部躺倒，等等，有好多怕。有的有四怕、五怕、六怕，可能还有更多的怕，总而言之是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一个共产党员，而且是一个领导干部，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是不能允许的，不象一个共产党员，不象一个领导干部。一九五九年在庐山开会的时候，我讲过这个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什么态度？是采取热情支持、积极参加和领导的态度，还是采取反对、讽刺和旁观的态度？这是区别无产阶级革命家与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分界线。害怕群众运动，就走上资产阶级立场了，立场就变了，就不是无产阶级立场了，就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立场了。在这个问题上，现在我们有不少的同志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因此，必须迅速地纠正过来，否则是危险的，是不能在今后领导群众进行革命的。

还有些同志只管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管阶级斗争。不是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伟大的革命运动吗？他只管一项或者两项，独只不管这个阶级斗争。在目前时代，只要你不管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搞不好，生产斗争你也会搞不好，科学实验也会搞不好，或者不能根本搞好，某些地方搞得好一点，但是根本搞好不可能。我们的冶金部在白银厂，几年来不只是在那里搞生产斗争吗？就是它只搞生产斗争，不在白银厂搞阶级斗争，结果，白银厂的生产也上不去。最近派了工作队去，搞了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搞好了一些，也还不能说完全搞好了，生产很快就上去了。生产大长，从前只产×吨铜，去年产了×多吨，今年可以产×多吨。你看，阶级斗争一搞，生产就上去了。

许多同志有单纯业务观点，他们是为搞好生产而搞好生产。为搞好生产而搞好生产，常常是搞不好的。

在中国，很久以前就有所谓“实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等等，但是都救不了中国，实业也没有发展起来，教育也没有发展起来。而我们是搞革命救国论，搞阶级斗争救国论，结果救了中国，实业和教育也大大发展起来了。

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都是为生产服务的。为了发展生产，增产节约，必须首先搞好阶级斗争和搞好科学实验。为搞好科学实验，也要搞好阶级斗争，不搞好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也搞不好。

所以，不能把放手发动群众，搞好革命的阶级斗争，认为是妨碍生产的，认为是同发展生产是对立的，这是不正确的。当然，搞阶级斗争中间，随时随刻都要抓生产，生产总是经常要抓的。而且搞好阶级斗争是为了发展生产。

一切党员，一切党的支部，一切公社党委、区委、县委、地委、省委、市委，一切工厂企业的党委，都必须同派出的工作队密切合作，放手发动群众，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基础上，把“四清”、“五反”搞好，把社会主义教育搞好。如果有任何党员，任何党的组织，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动，阻碍工作队去发动群众，对工作队发动群众的方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必须迅速纠正。有些公社党委把工作队赶回来了，可能工作队也有些缺点错误，但是，赶回来是不对的。因此，害怕搞坏某种关系，而不放手发动群众，这是不对的。任何党员(不管他是那一个)，任何党的组织，如果有阻碍发动群众运动的行为，阻碍工作队去发动群众的行为，都必须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批判和斗争，以至于给以纪律处分。

还有些地方规定，工作队到乡下去，要归那个公社党委领导，有的还要归那个大队支部领导。只有那个公社党委是不阻碍发动群众，支部是不阻碍发动群众，而且是赞成发动群众的，那跟它合作是可以的；如果阻碍，不能在公社党委、县委跟支部的领导之下。所以，一般地规定工作队归公社党委领导，归区委，县委领导，我看不对，许多事实上办不到。如果我们主要负责干部下去了，这个问题我看也可以解决。

怕干部躺倒，而不放手发动群众，这也是不对的。基层干部所谓躺倒，这就是他们反对群众运动，和工作队进行斗争的一种手段，这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基层干部躺倒，是一种和我们作斗争的、反对群众运动的反对“四清”和“五反”的一种手段。他们决不是真正躺倒，他对工作队不合作，但是另一方面他很积极，他积极在那里反对“四清”、“五反”，积极反对群众运动，他做的是另一件事情。他其躺倒呀？他没有躺倒，他们不干了是假的，不是不想当干部，他口说不当干部是假的，实际上想当得很。问题是我们要不要他当的问题，群众让不让他当的问题，不是他自己当不当的问题。如果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也不怕基层干部躺倒，他们也不会躺倒。群众发动起来了，他躺倒呀？他不会躺倒了，他会赶快起来的。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了，不起来也不要紧，现在农村中间也好，工厂里面也好，新干部大批地出来，因为经过十多年的锻炼，多次的运动，农村里面的新干部多得很，好角色，能干的人很多，不是找不到干部。问题是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

在这个地方要说到中央的双十条的第二个十条，就是《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这个十条是有些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可以使许多人放心，包括地主富农，地富子女，犯了错误的干部，我们把底交给他，他摸了我们的底，起了安定作用。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说你不团结我，我算百分之九十五以外，还是百分之九十五以内？(彭真：就是强调发动群众，强调“四清”要彻底不够。)

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唯一的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

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你靠得住才靠嘛，它靠不住就不能依靠，至少在搞好“四清”以前不能依靠。要靠犯了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基层组织、基层干部自己去搞好“四清”，或者工厂自己去搞好“五反”，一般不可能，不能依靠他们。要依靠贫下中农，要依靠群众，要派工作队，发动群众，才能把“四清”、“五反”搞好。

有一些模范支部，也有一些三类支部，这些也可以听一听，但是，必须是实事求是，最后查实作结论。有些“模范”并不模范。比如最近发现曲耀离是漏网的富农，小站的几个“模范”是反革命。我在湖南搞一个天华人队，也是多年的“模范”，结果也不行。有些三类支部并不是三类支部。

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不能把它平列起来，应当把团结贫下中农和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基层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相反，团结群众的百分之九十五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群众真发动起来了，基层干部也可以团结了，错误可以改正了。许多基层干部犯有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只有充分发动了群众，弄清楚了情况，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了适当的批评和斗争，他们改正了错误，贪污盗窃、多吃多占的真正退赔了，划清了敌我界限，认真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可能在新的基础上面达到团结。虽然这还不是已经蜕化变质了，虽然不是后面有敌人，不是很坏的，可以争取的，但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必须经过适当的批评和斗争，使他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然后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当然，首先有一个团结他们的愿望，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必要的。要有团结的愿望，满腔热情要团结他们；但是还要满腔热情要他们改正错误。开始没有搞清楚“四清”以前，那个团结只是一种愿望，不是事实，你要团结他，他不跟你团结。事实是要充分发动了群众，情况完全搞清楚了，实事求是了，退赔了，敌我界限划清楚了，改正错误了，参加劳动了，这个时候才可以团结百分之九十五，跟他们达到团结。这是事实，这是工作和斗争的结果。

讲到退赔，有许多地方说退赔很困难，死硬不退，迟赔得很少。我看，这些都是没有搞彻底的，或者没有搞开的。(彭真：群众没有起来。)据我所知道的，基层干部有东西退，退起来容易，不那么困难。为什么呢？大多数他有手表，有自行车，有缝纫机，有收昔机，有肥猪，还盖了新房子。有那个贪污盗窃、多吃多占一千多块钱的，他把这些东西一卖，一次就退完了。同时他还感谢，他说，幸得你是从一九六一年算起，假如是从一九五八年算起，你把我磨成粉子，我也没有办法。还说，幸得你们来搞“四清”，把我挽救了，不然我们非进法院不可。不过在这个地方还要做点妇女工作。因为那个肥猪是他的老婆喂的，缝纫机是他的老婆要用的，收昔机也是老婆要听的，老婆反对。干部通了，要退，要卖他的猪，卖缝纫机，老婆说，你在外边大吃大喝，现在来卖我的猪，那不行。结果，就向老婆做点工作，也容易做通，就是讲，你还是愿意你的丈夫做一个贪污分子，还是愿意你的丈夫做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和干部？猪卖掉了，以后可以喂嘛，再喂个肥猪就是嘛。就是这几句话就讲通了。有的卖了一间、两间新房子，但是他起的新房子还有几间没有卖，他还是落到。而且政策的减免，退赔的规定，是相当宽大的。还要调查研究核实，不是确实的不要他退。此外还有个价格，这个表以前是×块钱买的，现在卖只有×块钱，从前×块钱买一辆自行车，现在只卖×块钱。这个价格问题也是一个问题。群众会算账，交给群众，群众算账算得公公道道，不挖苦。而这些东西不让他退出来不行的，群众看了你带了手表，你骑了自行车，你家里有肥猪，你盖了新房子，有缝纫机，有收音机，一看，群众就恼火，这些东西必须要他拿出来，拿出来群众才高兴，才服气。也还有那样的人，他根本就不买这些东西，净吃，吃掉了，这些东西没有，难退，(彭真：分期退。)但这是个别的。

当然，也有那个基层组织是好的，他取得群众多数的拥护。这种好支部，好的基层组织，它并不反对你去发动群众，也不阻碍你去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他稍许有点缺点错误，帮他一下，改正了，虽然拥护他的没有百分之九十五，但有百分之七、八十，我们帮助他，使他取得更多的群众的拥护，那对

他是有帮助的嘛。所以，好的基层组织也要发动群众，使他的工作更进一步，更好。总有缺点错误嘛，那怕就是大寨，一点缺点错误都没有呀？那就不是一分为二了嘛，总还有一点缺点错误的，而发动群众也就可以揭露出来，他就清醒了，对他有帮助。

如果这个基层组织是脱离群众的，那就不能够依靠这个基层组织去发动群众，搞“四清”。不但不能依靠他去发动群众，而且他要阻碍的，比如放出点风声，放出点谣言，布置点人，这也有的。他这个时候来阻碍，也是很可以理解的。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连，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有些基层干部虽然犯有严重错误，但还不是跟敌人搞在一起，他基本上还是好的，这样的人，在把“四清”搞好之后，在对敌斗争的时候，他又可以和我们一致的。总而言之，如果是劳动者出身的干部，农业劳动者、工业劳动者出身的干部，虽然犯有一些严重的错误，在充分发动群众的条件下，大多数是可以改正错误的，和我们团结的。但在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以前，他犯有严重的错误，他一定要抵抗“四清”工作队或者“五反”工作队的。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那种基层组织，那种基层干部，在开始的时候，没有不抵抗的，一般是要抵抗的。但是，这些人出身好，他们虽然最近几年不劳动，但他们是劳动者出身，他还是可以劳动的，这些人大多数可以争取。如果他抵抗“四清”，这个时候，就看你怎么样了，你斗得赢他，那你就搞好了“四清”；斗不赢他，那你就是走过场，或者被他骗了，或者被他赶出来了，打败仗。这还是讲基本上是好的。至于那个后边有阶级敌人的，那抵抗得更激烈。这个阶级斗争很激烈。

不要以为，你们负责干部带一个工作队下去了，到了工厂、农村，就马到成功，你们一去就行，你们就一定斗得过那些犯严重错误的基层干部，一定斗得过那个地、富、反、坏，不一定，不见得。因为你们工作队即使是负责干部率领的，进村以后，在开始的时候，力量对比的优势不在你们工作队这方面，而在基层干部方面。因为他了解情况，他有一帮人，他预先有准备，而工作队呢？什么也不清楚，在开始的时候，你还只能听他汇报，介绍你住在什么地方，介绍那些人可以做根子。常常基层干部介绍你住的地方就住不对，说是贫农家里，结果不是贫农，或者是基层干部的亲戚朋友。而他介绍的根子也有很多是不正的，不能做根子的。在上海，还有这样的事情，工作队一下去了，他就不给他地方住。一个男同志带五个女同志，到一个生产小队里面，那个队长就硬跟他讲，女同志可以住在我这个仓库里面，你这个男同志没有地方住，要住，住在牛棚里面。这个同志也好，他就住在牛棚里面。（彭真：那还算好的，郊区有两起用刀子砍了我们的干部。还有一起把“四清”的人推到井里面。就在郊区。)这个同志住到牛棚里面，恰恰倒好了，他开会、谈话只有牛听到，别人听不到。但是他去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刚刚从那一家出来，就有一个人进去了，再从别家出来，那个人又进去了，钉梢。工作队初进村的时候，一切行动都在他的掌握之中，而工作队什么也不清楚，你这就没有优势了，力量对比基层干部是优势。

有严重问题的基层组织，常常有一套对付我们工作队的办法。这多少年工作队去，他对付过多次，他有一套办法的。有地方总结有这么几项(也不一定都是这样)叫做：喂，顶，拖，哄，饿，赶，躺。开始叫喂，给你好吃的，要你住到他的家里，住在基层干部家里，给你好房子住，或者住到其他好房子里。顶，就是顶你。还有一些不给你饭吃，饿你。然后赶你走。还有躺，躺倒。这个赶，我就被赶过。我是个国家主席，在湖南住到一个天华大队，那是他们一个“模范”队，多年的“模范”，开始胡××在那里进行调查工作，写了一厚本调查材料，我都看了，然后我也去，大概这是好地方嘛，省委也介绍的嘛。胡××跟胡绩伟他们都在那里搞了几个月，根本没有发现问题，调查的那些材料大部分是不确实的。我在那里住了十八天，公安厅派了几十个人，带了枪的，跟着我一道，把那个人队部让出来，大队部搬家，我住到大队部，一幢房子归我用，我住了一个时候，才发现问题。发现问题之后，要那个长沙县长带一个工作组去扎根串连，开贫下中农会议，开始扎根串连开会，就没有要这个支部书记参加，她就不大清楚了，事情不照她的安排那么进行了，她就发急了。她开始就说我“妨碍生产”，说是我们在那里妨碍生产。我说，这是赶我走的，因此我这个时候绝不能走。因为过五一，回长沙去了一次，然后

又回来。我到长沙去的时候，她就蹲到大队部门口(她进不去，有守卫的)大骂，说刘胡子(湖南人骂人叫胡子，我没有胡子)把天华人队搞乱了，因此我要搞乱他。什么叫搞乱了呢？就是不照她的秩序那么办了。这个人不算是很坏的人，坏人是她后面的一个秘书，是一个地主儿子，一个人队长也不是好的。这个女的劳动模范不是贫农，是个中农，还不算是很坏的人，她是个招牌。她骂的时候，我没有理她，等两天，结果把那个坏人整下去，贫下中农开会，交给那个长沙县长去搞。我在那里没有解决问题，是交给别人解决问题，我才开始发现问题。我去了，我是国家主席，带了武装队去，都要赶我，说我搞乱了，你们去他不赶你呀？我就不相信。他贪污了几百，上千，他害怕你搞清楚嘛。他跟地主富农有勾结，他害怕你搞清楚嘛。你触犯他的利益，他拼了命要跟你斗争嘛，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嘛。所以，对于这种斗争不能掉以轻心。她不好告我的状，我在那里，她怎么好告状呢？她告到省委也不行，告到中央也不行，她不好告状，她只好正式大骂一场赶我，要赖。(彭真：采取直接行动。)在那些有严重问题的单位，工作队进村以后，还要做些秘密工作。

所谓“一切经过基层”，“一切经过公社党委”，这么一个规定是错误的，特别对于那些有严重问题的地方不能够适用。相反，有些事情还要向他们保守秘密。

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不能当参谋。你当他的什么参谋呢？当他四不清的参谋？当他勾结敌人的参谋？所谓“工作队只能当参谋”，是不适用于这样的基层的，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已经证实了是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新干部，或者他们改正错误了，积极参加劳动了，这个时期工作队才能当参谋，让他们站在第一线。所以，这个第二个十条上不分好坏，讲一切基层都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只适用于那些很好的基层组织，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好的基层组织。

工作队进村以后，基层干部他有几手要对付你。他开始向你汇报，恭恭敬敬，吃得很好，住得很好。只要你吃了，他就有把柄了。据钱大姐讲，她到湖北走了一次，说是有一个工作队到一个农村里面，结果那个基层干部就告了这个工作队一状，说他吃了几十个鸡，多少蛋，还跟那些女人发生了关系。那些事情都是基层干部安排好了的，都是基层干部给他吃的，你吃了，他有状告了，就好赶你走了。所以，工作队进村以后，首先就要与四不清划分界限。工作队下乡，不要去大吃大喝，给你吃也不要吃。他们就那样吃的，如果你吃了，那当然你工作队就四不清哪。所以，还是四清改造四不清，还是四不清改造四清？还有个改造你这个工作队的问题。你要了解，这个里面都有阶级斗争，日常生活事情里面充满了阶级斗争。

同时，工作队进村以后，贫下中农他也要观看你一个时候，才敢向你讲话。他要看，看到你总是跟基层干部谈话，住也住在他那个地方，或者住在他的亲戚朋友家里，不象个解决问题的样子，贫下中农根本不跟你谈话。如果你表示得好，参加劳动，找贫下中农多谈，也不住在基层干部家里，不住在他的亲戚朋友家里，贫下中农才会跟你谈话。开始谈的时候，他是秘密谈，一个人找你，跑到这边，左顾右盼，然后跟你说几件那样的事情，说了之后，左嘱咐右嘱咐，说是你不要说是我讲的，他也是做秘密工作的。只有到以后，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这个时候，贫下中农才敢于面对面指到鼻子说你犯了那些错误，你有那些多吃多占，你那些贪污了，那个时候他不怕了。(彭真：这个时候才能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你的工作方法做得对，做得好，至少要一个月、两个月，才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不然你要走弯路。

在群众运动中间，群众在大会、小会上面揭发的关于基层干部的材料，必须要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工作，经过调查核实。群众发动起来了，在这个时候，有人要说假的。就是基层干部中间，就有那样的人，故意说某个人是万字号，某个人投机倒把，某个人怎么样。这个你才不要相信呢。(彭真：乡村里还有些派别斗争。)而且有些宗派斗争这些事情。别人揭发了，经过调查核实，然后说，他说的是假的，那个时候，那个基层干部会感谢你，说你替我洗清楚了，万字号不是，投机倒把也不是，而是有点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搞了几百块，那个是，那个不冤枉，其余的是冤枉的。

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有些积极分子可以当面批评揭发，最后要他坦白，有些人他不坦白，就组织个小会，几个积极分子跟他去谈，也有些调查的材料，这个时候，过分的行为就开始会要发生了。本来他一个人只贪污了一千，一拍桌子，瞪眼睛，叫他站起来，把头低着，这样一搞，结果就搞成七、八千或者四、五千，其中大部分是假的，一千是真的。(彭真：那是群众起来以后的事情。)搞出这么多来，积极分子高兴得很，向工作队报告，今天我成绩很大，搞出七、八千。可是到第二天、第三天，他就翻案。一翻案，积极分子就火了，明明你跟我讲了的，为什么你又翻案？这个时候，工作队就要冷静，就要做冷静的促进派，做冷静的革命派。翻案翻得好，与其将来翻，不如现在翻；与其工作队离开之后再去平反，不如工作队在村子里面自己平反。这个时候就要说服那些积极分子。

要基层组织或者公社党委、区委、基层党委对工作队员做鉴定，恐怕这也不适宜的。要看是什么基层组织，什么公社党委。它如果是共产党，真正无产阶级的党的支部，那可以作鉴定；如果它就是四不清的，它跟敌人有勾结，要它作鉴定，那会好呀？没有搞好“四清”以前，它的鉴定一定不好的。搞好了“四清”，它的错误改正了，或者新干部起来了，这个时候的基层组织作鉴定又不一样，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一般地要基层组织对工作队员作鉴定是不好的。就是那个新起来的干部作鉴定，恐怕也有某些偏的。这个问题，如果负责干部自己下去，就比较好办一些了。

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可能发生一些缺点错误，发生一些过火行为。这个时候，就要强调实事求是，有多少是多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不要故意扩大了。他本来只贪污一千，他承认了七、八千，如果你不把他平反，不把他改正，核实，基层干部他也知道，横直将来你们要平反的，将来一平反，连我这真正的一千也平反了。

既然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发生某些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一点乱子都不出，一点缺点错误都不发生，那是不可能的。要准备它出点乱子。但是，我们要求尽可能少出乱子，少发生缺点错误。我们有多次群众运动的经验，也有过火行为，过火的经验也有，“左”的、右的经验都有，我们总结历次群众运动的经验，这一回我们搞得好一些，要求一个高标准。是不是可以这么要求：第一条，充分发动群众，把“四清”、“五反”革命搞彻底。第二条，出乱子尽可能不超过一个指头。乱子少，革命彻底了，这就算高标准。说是彻底了，实际上恐怕还要准备，至少也有一个指头不彻底。一个指头过了头，出了乱子，一个指头还是不彻底，有百分之八十是好的，那还不是高标准？(彭真：十分之一不彻底是很好的情况，不彻底一定会超过十分之一。)恐怕不彻底的会要不只十分之一。(彭真：现在看来，有些所谓搞得好的，三分之一不彻底。)

不要过火。要在几个事情上控制一下：不要打人(这一条死硬控制)，尽可能不要骂人。完全不骂人也很为难，他实在也是讨厌，要赖皮，说谎，搞得那个积极分子气了，拍桌子，瞪眼睛，叫你站起来，这个事情总是会要发生一点。但是，就是这么搞了一次，你瞪了他的眼睛，你这个积极分子以后要跟他搞好关系，即使你赔礼道歉，他的心里还是有疙瘩。这是过去的经验嘛，不伤感情嘛，可以的。要教育积极分子，教育我们的工作队员，不要采取那个气势汹汹，实际上并不凶。过去中国有些在那个法政大学毕业的法官，他审起官司来比那些军阀不一样，军阀就是拍桌子，瞪眼睛，搞那一套，我们不怕他，就是那个法政大学毕业的，讲话和和气气，一个问题一个问题，问得我们哑口无言，没有办法。此外，组织处理，除开个别的必须在运动中间处理，借以发动群众，推动群众运动的发动以外，一般的组织处理要放在运动的后期，在运动结束的时候来处理。一切都搞完了，最后来做组织处理，这个时候，总比较看得更清楚。只要有这两条，一条，不打人，尽可能少骂人；一条，一般的组织处理放在运动结束的时候来搞，这就可以避免那个过分的错误。四类分子，那当然要很快处理。但是也要查清楚，要核实。

工作队在村子里面的时候，必须办完处理手续和批准手续，才离村。有一些工作队处理了，但是公社不批准，县委不批准，区委不批准，拖一个月、两个月不批准，我看那个不好。既经派了强的工作队下去了，应该在工作队离村以前处理完毕，而且批准完毕。不要区委、县委、公社党委拖拖拉拉不批准。

发生了错误缺点，当时要纠正，该翻案的翻案，该平反的就平反，不要等到以后再平反，这比较好一些。

有个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的问题。群众发动得怎么样？还是发动不充分，还是充分了？是不是开始有过火的行动了？这要掌握，要掌握得好。转早了不行，转慢了出乱子。开始的时候，要强调发动群众；群众发动起来以后，要强调实事求是。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而且有某些过火行为了，在这个时候，不敢强调实事求是，不敢翻案，不敢平反，这也是不敢革命。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敢不敢实事求是来平反，翻案，也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比较为难的是这一条。又要放手地、充分地发动群众，可是又要不出大乱子，不出多的乱子，出了乱子很快纠正，了解群众运动的火候，引导群众走向实事求是。在开始的时候不能强调实事求是。你讲话，我说要实事求是，不能乱讲，这群众就不讲了。(彭真：第二个十条的付作用就在这里。这里讲的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的事情，没有强调发动群众。)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以后搞到那一条就实行那一条，不要多讲了。

此外，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上面有根子，下面有根子，左右也有根子。应不应该追？我觉得，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那里是那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板子危害性更大，比下面的根子危害性还要大些，必须追出来，应该处理的给以处理。否则，上面的根子不迫出来，基层革命的成果是不能巩固的，你在那里革了命，上面还有人，他马上又翻过来了。

此外，还有这样的问题，有严重错误的干部，或者跟敌人有关系的干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撤职了，群众也不选他了，或者受了点处分，他不服气，他以后要进行破坏，他不只是躺倒(躺倒可以，躺倒那是消极抵抗)，他积极进行破坏活动，他真要捣乱，使你新的干部搞不下去，使你生产降低，然后他再上台复辟。还有这一手哩，搞到最后也还有这一手，或者是工作队没有离村他就反攻，或者工作队离村之后反攻。如果这样做的，进行破坏活动的，我认为，这是一种现行的反革命行为，应该当作反革命分子办，严办。因为这种干部他从前当过干部，又是共产党员，虽然开除党籍了，或者撤职了，他进行破坏活动，可能比那个真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更大，受的损失会要更大。所以，决不允许破坏。预先就要宣布这一条，谁破坏，就当现行反革命办。因为他破坏“四清”的成果，“五反”的成果，(彭真：这是反社会主义的现行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反社会主义革命，而且破坏生产，这是现行的破坏活动，而且是严重的破坏活动。没有这一条还不行。

不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搞好“四清”、“五反”，那个乱子是几个指头呢？我看是十个指头的乱子，不只是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的乱子。发动一部分群众，搞不彻底，这个乱子也很大。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例子，发动了一下群众，贫下中农讲了一些，又没有最后解决问题，结果工作队走了，那些揭露过问题的贫下中农就受打击，就整死人，那个乱子很大，那你不如不去搞好一点。搞不彻底，乱子也很大。搞彻底了，乱子反而少一些，后遗症少一些。有些人怕后遗症，独只不怕那个不发动群众的后遗症，不搞彻底的后遗症，他就是怕那个群众运动过头的后遗症。有些地方，我讲话之后，他们讨论，他们形容他们的“四清”、“五反”，说他们是“和平四清”，“和平五反”，说他们是“改良主义”，“不是革命派”，有些地方也有这么一种讲法。还有地方讲，负责干部没有去蹲点，实际上是怕艰苦，而这个怕艰苦实际上也就是和平演变的开始，说他们自己已经开始在和平演变。

负责干部下去，我看还是改名换姓好，用个假名字，不要带着什么长什么长下去。县委比较难于改名换姓，但是我这个县可以到你那个县去搞，你那个县可以到我这个县来搞。工厂也可以这样，我这个工厂搞你那个工厂，你那个：工厂搞我这个工厂，换易，横直都不清楚。你清楚的也靠不七仁。(彭真：必须这样，要不然，没有那么多干部。)

此外，还可以用在土地改革时期用过的那个滚雪球的办法，真正搞好了的地方，积极分子起来了，他可以搞旁的大队，搞别的公社。有些有文化的初中毕业生，劳动了几年，有些是很好的。用滚雪球的办法，可以扩大工作队，锻炼大批的人材。

此外，工作队下去，可以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看，同劳动、同住没有办法。有些队部反而没有人在一起，好商量事情。开会的地方最好不让人听到比较好一些。住可以住到人家家里。自己带个伙食单位去，自己做饭吃，我看也可以。

此外，你们住惯了暖气房子，在北方，如果你们要下去，你们不做厚的棉衣、棉鞋、帽子，你们会下不去，下去了马上冻病回来。要准备冬季服装，搞一个冬春嘛。

此外，下去以后，在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回来一两天，我看那是可以的。住要住到那里，不是你一次都不能回来。但是，斗争紧张的时候是不能抽身的。

至于讲工厂，你也可以早出晚归，在那里吃一两顿饭。因为在城市里面有公共汽车、电车，横直容易。

“四清”、“五反”，现在看来至少搞五年，可能五年还不够，必须还要抓紧时间来搞。这回好的就是我们不限制时间搞好。总而言之要搞好，时间不严格限。但是必须抓紧，不能拖拖拉拉。

如果充分发动了群众，又没有大的缺点错误，“四清”搞好了，对敌斗争搞好了，生产也搞好了，干部参加劳动了，最后就形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毛主席讲的，叫做“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是我们最后的目标。关于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里。

此外，再讲一讲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问题。

我所说的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有一部分是结合的，既是劳动制度，又是教育制度，又是学校制度。就是在农村里面办半农半读的学校，在工厂里面办半工半读的学校。农忙的时候种地，农闲的时候读书。工厂里面一个星期做工，一个星期读书。既是劳动制度，又是学校制度。而这都是正规的，要把它作为正规的劳动制度，正规的教育制度。只有你那个学校是正规的呀？

就当前来说，只实行一种学校制度，实行我们现在这种学校制度，是不能普及教育的。我问了一下，山东学龄儿童入学的只有百分之四十九，有的农村里面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学合儿童不能入学。安徽比山东的学龄儿童入学的还要少一点，不到一半。江苏多一点，有百分之六十的学龄儿童入学，农村里面也有一半的学龄儿童不能入学。所以，现在用目前这种教育制度不能普及教育。如果用目前这个办法去普及教育，那我们国家负担不起，家庭也负担不起。一个家庭有四、五个小孩子要上学，有的进小学，有的进初中、高中，有的要进大学，不但一般的工人农民家庭负担不起，恐怕今天在座的同志的家庭也难于负担，也要发生困难。用一种什么办法，又能普及教育，而国家和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呢？那只有除开现在的全日制学校以外，再办那种半农半读或者半工半读的学校，就是小孩子大体上自己可以搞到饭吃，国家稍许补贴一点，家庭补贴一点。因此，可不可以设想，现在的这种学校以后不再增加了，现在这种学校的教育经费也不加了，以后每年国家还可以增加一点教育经费，把这种增加的教育经费都拿来办这种半工半读或者半农半读的学校。从当前来讲，从普及教育来讲，我看是必须采取这个办法。

从长远来讲，可以逐步地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一九五八年，我在天津讲了一次，那个时期，他们就搞了一百多个工厂来办这个半工半读的学校，这几年让它自生自灭，大部分垮了，但是，这回我去，还剩下七个工厂办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多毕业生了，学那个中等技术学校的课程，就是高中课

程。上海有工业大学，它是一个礼拜占工作时间十六小时，业余时间占八个小时，一个礼拜上二十四小时课，五年毕业，今年就有八百多学生可以毕业。江西办了劳动大学，也是有成绩的。江苏、广东有农业中学。其他地方还有工业中学。已经有一些初步的经验。据说，这些毕业生是比较好的，他们说能文能武，就是说，又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有生产技术；既能当工人，当农民，又能在科室办事，又能在研究机关工作，有些当了技术员。我认为，这种在中工半读的中等技术学校或者大学毕业出来的人，已经是一种新人，是我们新社会里面成长的一种新的人；这种人跟我们不一样了，跟你们不一样了，跟现在的工人也不一样了，跟现在的农民也不一样了，跟现在的知识分子也不一样了，而是一种新的人了。他们没有那个知识分子架子。这个知识分子的架子是个大问题。我们现在普通学校的学生，初中毕业就看不起农民了，高中毕业就看不起工人了，大学毕业那就连我们这些人也看不起了。他们认为，要他们去参加体力劳动是浪费，不觉得是光荣。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观点，决不是无产阶级观点。

在社会主义的时期，是要消灭三个差别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在社会主义时期就要消灭，然后才能进入共产主义；在社会主义时期不消灭，不能进入共产主义。但是，消灭三个差别的过程将是严重的斗争过程。不要认为消灭三个差别是平平稳稳地、和和平平地消灭，而是一种严重的斗争过程。就是有人要坚决反对消灭这三个差别，就是要保存他们脑力劳动者的特权，保存城市的特权。旧知识分子反对消灭这三个差别，我认为，旧知识分子的反对还是无力的，没有力量的，因为他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果再过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大批的新知识分子出来了，那个时候反对消灭三个差别的力量会更大，大体上会和今天苏联的情况一样。如果我们再过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不想办法，那就会跟苏联现在的情况一样，就是阻力很大。将来出来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反对消灭三个差别，首先反对消灭脑力劳动跟体力劳动的差别，他们是有力量的，比旧知识分子反对的力量末得大，大得多。就是你们的子女，我们的子女，将来要反对。那个时候，你说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呀？他说，如果我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你们教得不好，也是你们的罪过。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对于这个事情不开始着手试验，我们迟了。有鉴于苏联的经验，我们现在必须着手来进行试验。

大概一种新的学校制度至少要五年才能初步总结经验，扩大试验，十年才能总结比较成熟的经验，加以推广。再过十年，那个时候我们革命胜利就二十五年了。今天着手，十年才能推广；今天不着手，十年以后还不能推广。因此，我主张每一个省，每一个大小城市，都来着手试办，着手试验。

在农村，初级小学可以多办一些全日制学校，因为他不一定依靠初小学生劳动，就是贫下中农也可以抽出来的。有些需要劳动的，也可以办半日制的学校。高小、初中以上的学校，那就只能中农半读，贫农子女才能进学校。应该是一个大队或者几个大队办一个，可以回家生产，不要另搞生产资料。但是，在农村里面仅仅办农业初中不够，还必须办一种中等农业技术学校(不要办高中)。这也可以同家生产，也可以在国营农场生产，或者开荒，另搞生产资料。我的意见，应该充分利用现在国营农场的生产资料来办这种学校，训练出来的人具有中等农业技术学校的水平，回家去当农民，也可以到技术推广站、畜牧兽医站、拖拉机站等等地方去工作。

在人中城市，可以由工厂办一些中等工业技术学校，半工半读，四年或者四年半毕业；也可以由现在的一些技工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改为半工半读的中等技术学校；也可以把一些停办的中等技术学校改为半工半读的学校，四年或者四年半毕业，招收初中毕业生。

我想，可以这么设想：在半个世纪以后，到一个世纪，就是五十年以后，到一百年，中国的工人能够有百分之七十、八十是半土半读的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出来的，农民的半数也是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半工半读毕业出来的，这些人读完了中等技术学校的课程，进一步学大学课程就容易了。还有些人学政治，有些人学经济，还可以有些人学文学艺术，也就容易了。而这些人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在他们本身，脑力劳动跟体力劳动的差别已经是没有多大了，就开始消灭了。可以由他们来当厂长、车间主

任、党委书记、市长、县长；而他们当了厂长、车间主任、党委书记、市长、县长，都不要完全脱离生产，都是半日做工，半日种地，或者半日坐办公室，不脱离生产。只要厂长和这种科室人员能够半日参加劳动，半天办公就够了。如果到那个时候，就是五十年以后，到一百年，能够达到这个要求，我们国家的情况就会同今天的苏联大不相同，消灭三个差别的阻力就小得多了。

我们还可以设想，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制度和学校制度会怎么样呢？马克思、列宁都讲，到那个时候，体力劳动者，工人农民，每天只要做四、五小时工作就够了。但是，其余时间干什么呢？都玩呀？跳舞呀？那就会不得了，那就会打架打得一塌糊涂。其余的时间就是要学习，或者办公，或者写作，作文学家，或者唱歌，或者演戏，或者办党，或者做政府工作，或者做计划工作。到那个时候，没有专业的什么作家，什么演员，什么画家，也没有我们这种专业的党委书记、厂长，什么市长、省长、国家主席，都得要去做工，都是业余的。国家主席也可以业余的当嘛，有半天还不够呀？到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马克思曾经设想过，他说，将来的儿童九岁就要做两小时工作，就是做两小时体力劳动，十三岁就要做四小时的体力劳动。那么，九岁、十三岁还是读书的时候，所以，他所讲的，我看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列宁也讲过综合技术教育，我想也是这种制度，学习一门技术，或者学习几门技术，同时也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平，科学水平。

苏联和我国现在的教育制度是不好的，必须改革。而现在我们这种教育制度不是照马克思、列宁设想的那样来办的，要来一种根本的改革。现在的全日制学校还不能不要，还是需要的，我认为以后不能再增加了，或者还可以缩小一点。但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可以办，以后可以多办。现在是少数试办，不要大办，不要一下铺开，一下又垮台。现在是要试办，取得经验，但以后要大办，而且将来要成为我们的主要的教育制度和学校制度。现在的这种学校寿命是不会很长的，但是，这种半工中读的学校我看一万年还要。

这种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的学校由谁来办？办学的人思想不通，教员思想不通，工厂领导人思想不通，教育厅、教育部的人思想不通，他也不会办，不晓得办，的确是件新事。因此我提议，为了办好这种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的学校，应该办这种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农业高级师范或者工业的高级师范和中级的农业师范或者中级的工业师范。要利用现在的国营农场，利用现在的工厂，利用现在的中等技术学校，或者可以利用现在的大学，来办一些这样的师范学校，重新培养教员，将来他们可以去敬这个中等技术学校的课程，也可以教初中、、高小。而他们本身毕业之后，将来去教书，也是半农半教，半工半教，做半天工，教半天书，种半天地，教半天书，不要完全脱离生产。要培养新的教员，新的校长。

此外，我还想，现在工厂里面的非生产人员以及县的、市的机关工作人员，是不是都照四川的办法，实行三定一顶的办法，两个人、三个人顶一个工人，或者顶一个农民，也实行半天做工，半天种地，或者半天坐办公室。

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不要等我们的后代，从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好不好？如果我们这一代不开始，尽是坐办公室，结果包括你们的儿女，我们的儿女，会照我们的样就是了。我们这一代就要带好头。如果不带头，到将来阻力越来越大。现在是有阻力，阻力相当大，但是现在不搞，以为将来阻力就小了呀？那个时候知识分子多了，大学毕业生多了，阻力会越来越大。现在苏联阻力就很大，苏联现在就很难办，我们巧；要走苏联那条道路。……所以，这种制度是劳动制度跟教育制度结合的。

此外，还有个劳动制度。不只是两种，现在总理又提第三种。我也提出另一个性质的，就是实行亦工亦农制度，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在农村的工厂，季节工厂，农村的技术推广站、排灌站等等，都实行亦农亦工。城市里面有些厂可以搬到农利去办，就那个地方的剩余劳动力，比较便宜。大城市是不是也可以办呢？大城市的季节工厂也完全可以实行，它只生产半年就够了，其余时间回农村去种地嘛。其他工厂是不是也可以办呢？我看也可以办，就是农忙的时候开一班，农闲的时候，农民来了，开三班，

行不行？特别是机器制造厂，将来要机械化，我们要训练农民懂得机器，机械厂就可以吸收农民，农忙的时候叫他回去，农闲的时候来学习，做半年工。这样的好处很多，家属可以不进城，又可以使农民学到技术，缩小城乡的差别，工农的差别，对个人，对集体，对国家，可能都有好处。

临时工转正，我历来是反对的，但是后来还是转了，反对不了。我看以后应该减少固定工，或者少增加固定工，比较多地用临时工。劳动保险制度应该修改，讲了几年了要修改，还没有改，请那一位负责，马上修改一下嘛。有些人说，临时工做了十年了，做了二十年了，不转正实在没有道理呀。这有什么道理呢？就是有临时工嘛，整个制度嘛。说临时工不是正式工，只有固定工才是正式工，我曾经反对正式工这个名字，所以后头不用正式工了，改个临时工跟固定工，他还是固定了，临时工不算劳动制度，劳动制度里面没有这一条，不算正式工人。应该临时工是正式工人，都是正式的。

此外，还有些矿山，以及其他一些工厂，可以用一些义务工，几年轮换一次。因为我们这个国家人口多，劳动力多。

城市的青壮年现在有多的，应该有相当大一部分要每年下乡从事农业，同时从农村里面用一部分临时工。不是说农村里面的临时工来了，城市人就不要下乡了，不是，下乡的更多。因为以后不增加或者少增加固定工嘛，城市人下乡就会更多嘛。同时，他们到乡下去也可以半工半读、半农半读，有书读，他们也就愿意下去了。

消灭三个差别，最主要的是消灭脑力劳动跟体力劳动的差别。只要这个东西大体搞得有成绩，搞得照我那么设想，就是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的工人能够有百分之七、八十是有高中水平，中等技术学校的水平，还有些大学水平，农民上半数也是高中水平，那我们整个国家的面貌要改变，整个劳动生产率要大提高。马克思讲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一条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脑力劳动跟体力劳动都发展，要从这里着手。他既能脑力劳动，又能体力劳动，他做起工来，办法就多了，劳动生产率就高了。天津有个电子仪器厂，做电子的，不是很复杂吗？老工人就看不清图样，这种半工半读学校毕业的就看得清图样。叫他焊接，老工人两个月焊不好，而这种学生两个礼拜。你看，劳动生产率提高几倍呀？特别是那些尖端工厂，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彭真：将来自动化、机械化以后更容易学了。）我们的工：人阶级，我们的农民，必须是有文化的，而且是有相当高的文化的，我们这个国家的整个面貌才可以改变，才可以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将来有希望进入共产主义。而这三个差别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就要消灭的。

这个问题就讲这样多，讲完了吧。

此外，我还有一句话讲一讲，就是王光美蹲了一次点，她有个报告，几个省都讲了，妇联也做了，在天津有录音，在上海有录音，上海录音比较好一点，把那个录音拿来你们听一听好不好？因为她自己下去过，她有发言权，那有什么办法呢？她那一篇我讲不出，没有办法，你们没下去也讲不出。因为现在大家要下去，既然要下去搞“四清”、“五反”，人家有点经验，（彭真：是从头蹲到尾的。）听一听嘛。我有那么一个建议。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39）在湖南省直属机关及地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4年8月10日)

今天讲一讲社会主义教育问题，也就是四清和五反问题。我感到这个问题很重要。与其他各方面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与发展生产、培养接班人、准备战争、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是当前各项工作最中心的工作。抓住了这一环，把这一环搞好了，农村的四清，城市的五反搞好了，其他各方面工作都会好，就会象毛主席所讲的“全中国就要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这种局面一形成，就会改变我们国家的面貌，我们国家对国际的贡献就会更大。

为什么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还要讲这个问题呢？最近我到几个省跑了一下，到了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遇到这几个省开三级干部会，并看了这几个省的会议简报，他们都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从简报上和地市委书记的汇报中成到他们的发言是很一致的，没有深入下去，讲不出什么名堂，讲不出什么经验。可以说这几个省没有一个象样的从头到尾比较完整的经验总结。因此我感到这个问题是个重要问题。……材料不少，但都是一些统计数字，什么搞得好的百分之几，一般的百分之几，不好的百分之几，那么一些东西。我一听那些发言，就听出他们是未下去过的，他们自己未搞过，是听别人讲的，根据别人讲话，根据别人汇报、表报或统计而搞的那么一篇。因此在这几个省一问：到底省、地、市、县负责同志下去蹲点了没有？都答下去过。他们下去开过三级干部会，或者下到点上安排安排又回来了，过个把月下去听一听汇报，走一走又回来了。江渭清同志说，我们过去下去蹲点是蜻蜓点水式的蹲点。那实际上没有蹲点。

我昨天翻了一下你们送来的材料，你们第一批不是搞得比较好的吗？群众送了一句话，说是多、大、狠的工作队：这倒是句好话，就是说，来的干部多、大，搞得狠。但是时间搞的太短了，问题没有搞深搞透。而且第一批主要是开三级干部会的经验，发动群众、扎根串连的经验看不大到。扎根串连，也是公社党委、支部书记去扎根的。这些经验是不完整的，是片断的。昨天跟省委的同志谈，问他们下去蹲过点没有(张平化：下去了，就是下去的时间短了，连续搞过三个月，半年一年的没有)。下去三个月也好。地县委的同志有下去蹲点的吗？(张平化：不是多数，少数同志蹲得比较好。)靠什么来领导工作？就是靠听汇报，人家来汇报，自己下去听汇报，靠看表报，看人家估计的数字来领导工作嘛！根据估计、表报来：于事情，来下决心、作指示，这样来领导工作。我也看了军队的材料，军队蹲点比较好些。军队干部下去两个月，找战士谈话，开干部会，闹清有什么问题，然后解决什么问题，军队干部蹲点比地方干部是好一点。军队比地方简单得多，可是搞好一个连队也不容易，在一个连队，讲起活思想来也有各种矛盾，有些问题也不好解决，也有老大难的问题。

靠听汇报、看表报来领导工作，可以说从中央、省委、县委以至区委、公社都如此。我以为公社干部蹲点可能蹲得好一些，其实并不如此。公社干部到大队、生产队转一下，找会填表的会计、秘书填一张表，搞一顿吃的就走了。听说如此。比较好的基层干部下去，除了跟基层干部谈话、填表之外，还找农民谈一谈，不吃饭，也是拿一张表就走了。因此，公社也不了解大队、生产队的情况。对于群众的呼声，群众的活思想，群众想些什么，有些什么问题，他都不清楚，他也不听。

公社听基层干部的汇报，区委听公社的汇报，县委听区委的汇报，地委听县委的汇报，省委当然听地委的汇报，中央听你们的汇报，整个党，整个政府就这样来领导工作，这样下决心、下指示，危险得很。如果长期如此不加以改变，我看我们要灭亡。就是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群众的呼声听不到，听的尽是从基层干部那里来的，表是他们填的，汇报是他那里：求的。什么我们中央领导他们，还不是他们领导我们，他们说怎样就怎样，说好就好，说坏就坏。也跟我第一次到安源煤矿搞工人运动一样。那时，我刚从莫斯科回来，住了抗大式的学校，学了点马克思主义，只学八个月，就跑到上海，又跑回到长沙，那时，毛主席在这里，没有几天，就叫我去指挥粤汉铁路的罢工，粤汉路车已停了，中央来了

紧急信，叫我到安源去，出了六元钱买汽车票才到株州，爬上株萍铁路的火车，跑到安源，没几天就罢工，一罢工之后，别的人都躲起来了，那时李立三在那里，所有党员都躲起来了，只剩我一个，人也不认识，什么也不清楚，罢工中有各种问题发生，我有什么办法呢？还不就是听工人的，他叫我们怎么办就怎么办，就是他在那里领导我，那里是我领导他们。当然啰，他说怎么办怎么办，我也是经过一番考虑，有一些我也没采取，有二种意见的、三种意见的，我也综合一下。我看我们现在，不是省、地、县、中央去领导基层，而是基层在领导省、地、县和中央，你们相不相信？实际上是。当然，也有一些综合，有一些也没有听的。汇报和表报有些是不可靠的，他们在汇报的时候，恰恰是最重要的问题他不告诉我们，不汇报。象白银厂那样的问题，他汇不汇报？他都不汇报的。表报，更不可靠。有一个地方，会还没有开，就把报告写好了往上面送，会议到了多少人，诉苦的有多少，发言的有多少，占百分之几，情况都有。但是会还没有开。谭启龙同志问过他那个农业厅，农业厅有个表要向中央农业部上报，谭启龙同志问厅长，数字是真还是假的？厅长说，是假的。谭启龙同志说，既然是假的，为什么还上报？厅长说，农业部要哇！一个是农业部要，这是一个问题，要的不好，应当检讨。一个是假的也报，也不好，假的就不报嘛！宁愿受不了解情况的责备，说我不了解情况，不要受作假报告的责备。中央的许多会议，也是靠听汇报来了解情况、决定政策，而不是靠领导同志去蹲点，取得经验，然后再来开会推广。而且会前毫无把握，就把全国的几百人都找来，大家汇报，根据各地的汇报来起草文件，发指示，我看，这个办法也不好。

从大跃进以后，由于大跃进中发生了缺点错误，而且相当长的时期不能发现、改正，人民受到了一些损失。毛主席有鉴于此，就提出各级干部都要蹲点，这个问题他已经提了几年了，但是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那时候的一些情况，只要负责干部下去一蹲点都会发现是假的。例如河南省的麦子亩产七千斤的问题，就是没有人查，如果有人去查，中央、省委的负责同志，下去住几个月了解情况，就会马上搞清楚的。自己没有去查，问一问省委，省委问一问县委，县委说是真的，我们也说是真的，长期相信，其实是假的。一九四七年土改的时候，毛主席要负责干部亲自解剖一个麻雀。只要亲自解剖一个麻雀，搞一个乡的土改，而且搞好了就有经验了，就能领导一般了。毛主席在十几年前就提出了解剖麻雀的问题，大跃进以后又提出负责干部要蹲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但是，许多同志没有照毛主席讲的这些指示真正去作。这几年没有真蹲下去，讲是讲了要蹲点，没有蹲下去。没有蹲下去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许多最重要的情况在汇报中、简报中是看不到的，或者数字是假的。所以我们不了解情况，群众的呼声听不到，听的是各级干部的呼声。表报数字甚至是假的，不可靠的。连两个最基本的数字也靠不住，土地是越报越少，人口是越报越多。这两个数字就不可信。我建议你们以后写报告的时候加上“据说”两个字，“据说”有多少土地、多少人口。你没有查过嘛！不然你也深信不疑，别人也深信不疑。我看大体是有很多不可靠的。这两个基本数字都不可靠，其他的数字有多少可靠的！

既然表报不可靠，数字有些是假的，如何把表报减少一些，这个问题还未解决。请省委讨论一下，不要那些假数字的表报，宁愿什么情况也不清楚，只好自己下去调查，反而有好处。那些假表报只有害处没有好处。是不是以后发表报的时候统一由一个人负责签字，那些发那些不发，不该发的到签字人那里就卡住不往下面发了。没有签字的表报下面一律不填。行不行？

我再强调一下毛主席提出的负责干部蹲点的问题。没有 下去，或者没有蹲好的，非补课不行。趁这次搞社会主义教育，负责干部都去解剖麻雀。农村四清，城市的五反，你都没有经验，你怎么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呢？因此，除非有病的，年老体弱的以外，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和省地县各级的其他负责同志，都要分期分批地下去搞两个人队的社会主义教育，搞两个工厂的五反。为什么说只要你们搞两个大队不搞两个公社呢？因为搞两个公社不行，又是只能听汇报，跟坐机关一样，还是要别人来汇报。就是去搞一个大队也有汇报，一个大队也有几个小队，也听小队汇报，但自己可以搞一个小队，可以扎根串连，可以开贫下中农会，可以找人谈谈话，可以找好的人谈谈话，也可以找有严重问题的人谈话。所以只能搞一个大队，不能搞一个公社，搞一个公社跟你们坐在县委机关、省委机关一样，差不了

多少。为什么要搞两个大队呢？就是搞两期，准备有一期搞不好，准备失败一次，还有一次不失败，胜利了，成功了。一个大队至少要五个月或者六个月，工作才能做得细，才能搞清问题，解决问题。从训练工作队到工作队进村扎根串连，召开贫下中农会，发动群众，搞好干部中的四清，搞好对敌斗争，搞好六十条、四十条，搞好干部参加劳动，整党、登记党员、发展党员，一直搞完，直到形成一个新作风新面貌，欣欣向荣。恐怕时间短了不行，搞不细。有强的工作队，恐怕少也得五个月，或者六个月。工厂恐怕也是这样，需要的时间也不会少。蹲点搞五反也要搞两个工厂，也是准备失败一次。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五反，这是新的事情，没有经验是可以学会的，只要认真去搞，象毛主席在第(一个)十条上说的那样去搞，问题也并不难解决的，问题是你没有真正认真去搞，负责干部没下去，所以问题就好象很难解决，几年解决不了，其实不是那样的。省、地、县各级领导干部，当然也包括中央，除年老体衰有病的以外，其余的人都分期分批下去，搞两个大队或者两个工厂，以便于取得直接经验，来领导一般，领导整个运动。你们自己不亲自去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这个运动。取得一两个典型的直接经验，对负责同志来讲非常重要。否则，不能作领导工作罗！不能作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公社书记也不能作了，其他厅局长、中央的部长、司局长，我看也作不下去了。因为你一个大队都搞不好，你还作什么省委书记咧！作什么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咧！作什么中央委员咧！一个工厂的革命你都搞不好，还有什么资格作什么市委书记、市长咧！这很明白嘛！

为什么说不下去蹲点就不能作领导工作？原因就是因为现在革命斗争的形势发展了。现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比土改、合作化更深刻、更复杂、更艰巨的大革命。运动的意义，中央文件上有，你们也常常这样讲：这是一次空前的大革命，比土地改革要复杂得多，的确如此。既然是一次比过去任何一次革命运动更复杂、更深刻、更艰巨的大革命，领导同志就得亲自出马，去参加斗争。现在革命斗争的形势发展了，阶级斗争出现了许多过去没有的新的形势新的特点。仅仅靠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不能领导今天的革命了，只有老经验来领导今天的革命不够了。用过去打游击、支前、土改的那一套经验来搞社会主义教育，是不行了。那个经验不能领导现在的革命，也不能领导今后的革命。所以你不下去蹲点，就不能取得直接的经验，就不能做领导工作。

过去一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当然也有成绩，在某方面来讲，成绩也是很显着的，我看起了煞住歪风的作用，对推动生产有好的影响。某些地方、某些单位，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恐怕那些问题基本解决了的单位很少，解决了一部分问题的有，但是还有许多是搞得不深不透的，甚至有些没有搞开，根本没有搞开。邓小平最近到东北走了一趟，看了一些工厂，他说工厂五反也起了煞歪风的作用，对推动生产有利。但是，问题根本没有解决，还没有入门，还在门框外面。五反还没有入门，农村四清恐怕也有些是如此，没有入门。

你们这里第一批派出的工作队相当强，以后派的就弱些。对工作队有很多限制，限制不能搞这样，不能搞那样，限制太多。这表现我们对于这场大革命重视不够，表现轻视藐视。应该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嘛！就是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能战胜修正主义的，但是要了解我们没经验，战胜修正主义的经验还没有。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经验是有的，列宁就有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出修正主义的经验也有了，出了赫鲁晓夫、铁托，东欧的一些国家都出现了修正主义。但是，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不出修正主义的经验。不出修正主义的经验现在那里有呀？我们中国，在大队里面，公社里面，工厂里面就出了赫鲁晓夫，出得不少，是不是中国也会出个大赫鲁晓夫？现在还很难说，也可能出，因为这个事情没有经验嘛！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应当说马列主义能战胜修正主义，但是由于没有经验，还可能出修正主义。我们和修正主义还要打几次大仗。我看出了也不要紧，出了就上山打游击。我们是有这套经验的。假使中央出了一个什么修正主义，他要把全国几十个省都统一起来，我看不容易。如果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我就往山上跑，那个时候我也劝你们都往山上跑，修正主义是统一不了的。我们是马列主义，他是修正主义，总要打败他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对于那些小赫鲁晓夫都打败仗，都被他们骗倒了，而你们都看不清楚，你们还说他是好干部，说他汇报得好，表填得好，招待你吃饭也吃得好，有什么理由要反对他

咧！他的确又是贫下中农，不是假的，可是后面有地富反坏，搞不清楚，你就被他们骗了。我说打了败仗，是这样打的，被他们骗倒了，他们在那里庆祝胜利，而你们不是胜利者。虽然我们失败了一次，不要紧，不要气馁，还可以战胜的。

现在阶级斗争出现了新的形势，就是讲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阶级斗争。在过去十五年的多次的运动中，敌人对我们的斗争方式摸熟了，知道我们那一套，你们：工作队是怎么下乡，下乡后又爱听什么话，而你们又急急于想回城里去，不想在乡下呆久，他都摸得清清楚楚。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对我们斗争的方式，而我们的方式没有变。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敌人是拿着枪的，现在他不拿枪了，过去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看得很清楚，而现在看不清楚了，他们隐蔽起来了，他站到后面去了，他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前面出面的是他们的代理人，不是他自己。我们的口号政策他邪利用，而且利用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苏联在一次白党的暴动中，白党曾提出一个口号，叫做拥护苏维埃政权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借此大作文章，他说白党、资产阶级对苏维埃他都可以容忍，他只不容许布尔什维克。而现在的白党可不是那时的白党，他们不仅能容忍苏维埃，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也容忍，社会主义他也容忍。凡是我们提出的政策、口号他都“拥护”。但是，内容他另搞一套。这就是敌人新的斗争的方式。现在的敌人同我们斗争的方式，是和平演变和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这是他们的主要方式。我们从前不是用过两面政权嘛！那是革命的两面政权。而他们现在也搞两面政权，那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对付我们的。我们有些基层组织原来就是阶级敌人把持的，不少地区的土改不彻底，或者基本上没有土改，地主、富农的统治至今维持着。有些单位敌人打进来了，改换面貌，把持着领导。有些单位原来的领导人是我们的，但是被敌人拉下水，成为敌人的代理人。这件事很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我们的不少的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甚至有公社、区、县的干部，很容易被敌人收买。有的就是几包烟、几斤肉、几斤油、请吃两顿饭，屁股就坐到那边去了，向我们说假话了。所以毛主席说，有三分之一的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我到过几个省，开始有许多同志是怀疑的，不相信，我觉得你要怀疑，完全可以怀疑。但是，你怀疑，有什么证据？你查过没有？没有查过。主席之所说这个话，他是有根据的。要查清楚，实事求是，领导权在我们手里就是在我们手里，不在我们手里就是不在我们手里。有多少算多少，少于三分之一我也不反对。我看，恐怕有些地方三分之一还打不住，还不止三分之一，可能超过。当然，有些地方少些，有些地方多些，不管多少，必须实事求是。农村中犯有一般性的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各省都说是多数，有百分之六七十。严重四不清，贪污盗窃，多吃多占，几百几千的也不少，我看也不少于三分之一。有些单位的领导人贪污盗窃严重，已经蜕化变质了，跟敌人搞在一起，反共、反人民。一切有严重问题的人和集团，都要向上级领导机关找靠山。他有严重问题，他那么放心？他不放心，他要向上级机关找一个保护人，找靠山，要到上边找根子，找保护人、代理人。也就是找上层建筑来保护。大体上是这样的：科员如果不拉科长下水，他是不敢大搞乱搞的；科长不拉处长下水，他也不敢大搞乱搞；一个部长要大搞乱搞，就要拉市长、书记下水。生产队也一样。生产队长不拉大队长下水，就不敢大搞乱搞；大队长不拉公社下水，他也不敢大搞乱搞；公社不拉区委下水，他也不敢大搞乱搞；公社、区委不拉县委下水，他也不敢大搞乱搞；县委下了水，他就要向地委、省委、中央找保护人。恐怕这是一个规律，这是敌人向我们斗争的一种手段。而我们上面有一些人，上了当，就作了他的根子、做了他的保护人或代理人，替他辩护。所以在农村四清的时候，四清完了，向群众讲四不清的根子，根子在那里？我们工作队的人还不了解这个根子，他就说四不清的根子是地、富、反、坏。群众告诉我，他说，不仅我们下面有根子，你们上面也有权子。我听了这个话，就很注意，很留心。“朝里有奸臣”，“朝中无人莫作官”，朝里没人，没有保护人，他是不敢大搞乱搞的。办坏事，贪污盗窃以及投机倒把等事情，反动的事情，他既已搞了，而且长期不能发现，势必是上边有人保护，人体都是上边有根子。严重问题又长期不能解决，不能发现，总同上边的人有关系，不是所有的人，是同某些人有关系。你只要去找，就会找出来。你们常宁县不是烂了吗？只一个常宁县，上面就没有人啦？我就不相信。你查清楚确实没有，我才相信。没有查就说只是一个常宁县烂了，其他无关，那我不相信。上面的根子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不清醒的，糊里糊涂。他出身不错，过去对革命有功，打过游

击，他汇报也汇报得很好，表报也填得很好，很听话。你去了他招呼得很好，又吃了，又送了礼，就认为是好干部。总之，不清醒，糊里糊涂，官僚主义，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有意包庇坏人坏事。上边的人知道他不好，做了坏事，包庇他，他得了点好处的，送了礼，受了贿，跟他是一邦。所以我说，敌人已经改变了跟我们斗争的方式，敌人已经变成很聪明、很狡猾，而我们是用老眼光、老办法对付他们，这样就斗不过他们，在斗争面前我们失败了。过去我们也搞两面政权，对付日本，对付汉奸，对付国民党。我们用这一套，日本人对付不了我们，国民党也对付不了我们。现在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是很会搞合法斗争的，很会搞两面政权的，比我们过去做得更好。而我们的干部就没有学会反对两面政权的方法，如何跟敌人进行斗争，如何跟反革命两面政权作斗争。这个经验没有学会，全党没有学会，甚至于没有引起注意，没有留心，熟视无睹。

由于敌人的斗争方式改变了，所以中央、省、地、县当然还有区委、公社党委的负责同志如果不去真正的蹲点，不去取得今天的革命斗争经验，就不能在中央、省、地、县机关作领导工作，不能领导今天的革命斗争了，领导不了啦！但是，只要踌下去搞两个大队、搞两个工厂就行了，没有那么困难的事。我们到底还是老革命嘛！搞两次，就行了，不会的事情，搞二次就行了。如果不去搞，别人蹲了点，真正从头到尾搞了，而且搞好了，那他就超过了你们，他们知识比你们多。如果他也搞得不好，他就向你汇报，你也听不出，他骗你，你也不晓得他骗你，他向你汇报说是要开除某某人，要奖励某某人，你也不好下决心，或者是决心下错了。现在要去做调查研究工作，毛主席不是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吗？现在，在许多情形下，召集基层干部或贫下中农开两天座谈会，他就把情况告诉你，那样行不行呢？能不能够调查得真实情况呢？调查不了。中央调查组在长沙天华大队调查了一个月，写了一本调查材料，我都看了，省委也介绍说是一个模范大队，要我去。结果，那些调查材料大部分是假的。我也只在那里住了十八天，也没有把情况完全调查清楚，只是发现问题，仅仅发现问题，至于如何发动群众、如何解决问题，交给了你们长沙县县长李满城去搞，后来搞得怎么样，我就不大清楚了。现在仍然按中央调查组那样的调查方式，不行了。只听基层干部的汇报，他有许多重要的情况不告诉你，或者告诉的是假的，贫下中农和工人也不能无顾虑地和你们谈话，是不是你开调查会他就会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不会的。现在，在许多情形下，真正作调查研究，常常要在四清五反的革命斗争中，才能调查清楚。就是要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去认识客观世界。你把一个不好的大队搞好，四清、对敌斗争搞好，干部参加劳动了，整党搞好了，贯彻了六十条，四十条等等，局面改变了，最后对这个大队的情况才算调查了解清楚了。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认识客观世界，就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在实践中来认识。为了搞好调查研究，负责同志要真正蹲下去，要蹲点。不认真蹲点，不认真在那个地方搞革命，你就不能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就搞不清楚情况，

负责同志蹲点为什么蹲不下去？有许多人讲了许多原因。说是一般领导工作离不开，上面会议多。这两点提得最多，我看这两个理由以及其他的理由都不能成立。我看原因就是对蹲点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看不到如果不蹲点，不真正蹲下去，就不能领导今天的革命了，就不能做省委书记，不能做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了。这个意义他不了解。对蹲点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口里说是一场大革命，实际上就没有把它看作是一场大革命，自己就不上前线嘛！自己又不懂又不上前线。

山东省的同志在讨论中间，他们讲了一点老实话，说实际上不　点就是怕艰苦。蹲点比到这里走一走，那里看一看，谈一谈，吃一顿要困难些。离开自己的办公室，而且住在乡下，苦一些。恐怕这是老实话。怕艰苦这是不对的，山东的同志说，怕艰苦就是和平演变的开始，说我们这些人正在和平演变。又有人讲，和平演变舒舒服服，舒舒服服地演变过去，父有吃的，又有穿的，甚至还有女人。真要搞革命，作个革命者，又要批评和自我批评，又要检讨，又要思想斗争，实在痛苦得很。作个革命家很“痛苦”！而和平演变成为修正主义是舒舒服服。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也是他们的干部，怕艰苦、图舒服，不是我们所应当有的。超过无产阶级，超过劳动人民，跟他们不一样，我看，我们就开始脱离群众了，脱离无产阶级，脱离贫下中农，脱离劳动人民。

总之，我们的领导方法成了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不是革命的领导方法。必须使我们的领导同志革命化，领导机关革命化。中央在二十多年以前就写了一个关于领导方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一般号召要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而蹲点就是个别指导，突破一点，取得经验，以便于进行一股号召。你不去蹲点，没有个别指导，不在个别单位取得经验，就去搞一般号召。结果你就只有一般号召，是不行的。所以，不蹲点，这就违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不只是这一次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五反要阶点，而且每一项新的工作，都要蹲点，改变领导方法。因为没有经验嘛！不止是我们没有经验，全党没有经验，有什么办法咧！我们去解剖一两个麻雀就有经验了嘛！这就不是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是确实解决问题，而且是解决得快，不是慢。

其他许多同志提出的不能蹲点的理由都不能成立。什么面上的工作离不开，上面又要开会，等等。要讲起来，确有其事。一般工作紧得很，无非就是填表报、听汇报，上边开会也无非是听汇报，也是那么一套。搞那一套，北抗蹲点那样重要呢？蹲点北面上工作，比搞表报、听汇报重要得多。而且那些面上工作，经常工作要别人招呼一下就行了。总之这些理由都有事实，但是，都不能成为不蹲点的理由。许多同志生病也生得，学习也学习得，甚至于死也死得，独只瞧点就蹲不得，这有什么道理？我看没有道理。等于你离职学习、离职休养一样，而蹲点是进最好的党校。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一：扫没有写完，本来还有两章要写，还有巴黎公社的经验，领导一九。五年的革命的经验，后来因为十月革命的事情就躭搁了。列宁说，躭搁得好，与其写文章来论革命，不如作革命更有意义。你们现在与其在党校翻书本、学革命，不如自己去作革命，北进党校重要。我看也是一种休养，办公室坐久了实在不好，坐久了要生病，不如下去到革命斗争中去学习革命。

取得今天革命斗争的经验，不只今天有用。因为社会主义革命还要进行几十年。如果说还有点用，就是现在有的地方土改不彻底的，需要我们去补补课。今天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不只今天有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都用得着的。所以，我们各级的负责同志要取得直接经验。不是只这次蹲点就够了，以后几十年就不要蹲点了？以后还要蹲点。

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五反，除了负责于部蹲点以外，还要组织专业队。负责干部搞两个大队，两个工厂。这是一般的，这是至少的，至于专业队就不只搞两个人队、两个工厂，而是搞多少年，要搞七八上十回十儿回。此外，还有参加工作队锻炼的，要参加两期，参加一期太少了，参加一期就走了，下一期又都是新手，应该轮换参加两期，每期都有新的老的，还有专业队，这样结合起来。这样每一批工作队中，有参加过一批的，有没有参加过的，这样的工作队就强了。而且专业队要有负责于部率领。负责干部下去蹲点，工作队才会强。如果省委、地委、县委的负责干部自己不下去，只是叫一般干部下去，结果工作队很赐。昨天看宁乡工作队的反映，那个工作队就很弱。例如某一公社派八十个人参加工作队，人数是八十个，大部分不是主要干部，而是一般党员凑数。恐怕就是大队支部书记半脱产干部，就这么召集起来组织工作队，我看也不行。因为他们都没有搞四清，要搞过运动的，而且是搞彻底了的，积极分子产生了，跟上改一样，滚雪球的办法。现在的工人、农民与过去不一样，真正发动了群众，真正搞彻底了，搞深、搞透了，就有大批的积极分子产生，有人材。负责干部下去，就是书记下去，部长、局长、厅长都下去，中央也要下来一些，工作队才强。现在没有强的工作队，就打不开局面，斗不赢狡猾的敌人，斗不赢同干部勾结起来的敌人。

蹲点对各级负责同志是一种考验。党要考验你们，你们自己也要考验自己。你们以前革命是行的，现在革命到底行不行？你说是行，没有考验，党也不知道，你们现在也不知道，要考验一下。大多数负责干部过去有革命斗争经验，也有群众运动的经验，只要自己舍得干，不怕吃苦，总是比青年好一些，容易学一些，是可以学会的。是不是也还会有少数人考验了，不行的，恐怕也有，考验了不行那也没有办法嘛！你自己也考验了，党也考验了，就是不行，不行就不行嘛！就只好让位，让别人来嘛！还有什么二话可讲。至于你过去有功劳，要优待你一点，那是有规定的。

城市的“五反”也应该派工作队，机关的“五反”也要派工作队，看来不派工作队不行，搞不开，搞不好，要由负责干部率领工作队去搞。无论农村或者城市，没有负责干部率领强的工作队去，有始有终地搞，是斗不过那一些有组织的、上下左右都有联系的阶级敌人和坏干部的，是斗不过他们的。

此外，不放手发动群众，不放手发动贫农、下中农，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也是不可能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的。在农村要放手发动群众以及其他农民群众，在城市要放手发动工人以及其他可以团结的群众。这是关键。没有这一条，运动就一定搞不好。现在华北的四清范围扩大了，除了搞经济上的四不清以外，还有政治上的四不清，思想上的四不清，组织上的四不清，包括了整个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容。这样一个内容极其丰富而复杂的大革命，不放手发动群众，是无法搞好的。许多地方的四清、五反，由于没有深入发动群众，或者发动群众很不够，因此搞好的很少。一方面说这是一场大革命，另一方面又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发动群众怎么革命呀？不要说大革命，连小革命也没有！没有群众，就没有革命嘛！既然是一场大革命，就必须放手发动群众，而且要发动得很充分。你们的材料上也有扎根串连，也有发动群众，可是没有看到扎根串连扎错了的。通通扎对了？没有犯过错误？你们也开过全省贫农、下中农代表会议，到会的都是贫农、下中农？是不是也还有假的？这次运动势必要重新审查成分。要扎根串连，要组织阶级队伍。就要把贫农、下中农划出来，地富也要划出来，其他中农也要划出来，都要搞清楚，是不是有搞错的？是不是有冒充的？

说到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动群众，就有许多同志有无穷的忧虑，前怕龙，后怕虎。有几怕，叫做怕妨碍生产，怕和县委、区委、公社的关系搞坏了，怕群众运动过头，怕出乱子，怕产生后遗症，怕纠偏，怕将来平反，怕干部躺倒等等，我看就是害怕革命的群众运动，我认为这是不能允许的，不象一个共产党员，不象一个革命干部，更不能当领导者。凡是不要革命的事情，接受得很快，不打折扣，什么评功摆好，和平四清，和平五反，就喜欢，很合乎他们的需要，不推而开。革命四清，革命五反，就害怕，嗳呀，又搞革命呀！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态度这个问题，我在庐山会议上讲过一次的。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什么态度，是采取热情支持，积极参加，加强领导的态度，还是采取反对、讽刺、旁观的态度，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分界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不少同志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离开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必须迅速地纠正过来，否则是危险的，不改正过来就不可能领导群众进行革命。

我们有些同志只管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不管阶级斗争。而在目前，只要阶级斗争搞不好，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也是常常搞不好的。中央冶金部多年来对于白银厂是只搞生产斗争，不搞阶级斗争，多年来生产上不去。最近他们搞了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部搞好，生产就很快上去了。有些同志是单纯的业务观点，为搞生产而搞生产，常常是搞不好的。中国在很久以前，就有什么实业救国论和教育救国论，但是都救不了中国，中国的实业也没有发展起来，教育也没发展起来。我们是革命救国论，阶级斗争救国论，结果救了中国，实业也大大发展起来了，教育也大大发展起来了。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都是为发展生产服务的。为了发展生产，增产节约，必须首先搞好阶级斗争，也必须搞好科学实验。不能把放手发动群众和搞好阶级斗争认为是妨碍生产的，不能把它同发展生产对立起来，而是密切相关的。只有搞好阶级斗争，生产才能发展，不然那个地方就浪费，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不起来，生产就上不去。当然，我们搞运动随时随地都要注意生产，不要把生产丢了。

各级党委、公社党委、区委、县委、地委、市委、省委，一切企业党委，一切党的支部，都必须同上面派去的工作队密切合作，放手发动群众，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基础上，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好，把四清、五反搞好，同时把生产搞好，把科学实验搞好。任何党员任何党的组织，如果阻碍工作队发动群众，对工作队发动群众的方针，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都是错误的，必须迅速纠正。这种事情过去是发生过的，有些省的一些县委、区委、公社党委、基层组织三番四次地把工作队赶走。当然也有些工作队是不纯的，这种情况也有。怕搞坏某种关系而不放手发动群众，这是不对的。是不是可以依靠公社党委、

区委、县委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些是行的，有些是不行的。如果它的精神状态就不对，害怕群众运动，依靠它怎么能把运动搞好呢？怎么搞深搞透呢？任何党员，任何党的组织，如果有阻碍群众运动的行为，有阻碍工作队去发动群众的行为，都必须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批评和斗争，以至给予纪律律处分。只有那个地方的党组织不反对四清、五反，不阻碍发动群众，工作队才可以跟它合作，共同去发动群众。有些地方规定公社党委一定要参加工作队的领导核心，甚至大队支部书记也要参加工作组的领导核心，我看这里面有问题。有些公社党委跟四不清有密切关系，支部书记本人就四不清，让他们参加工作队、工作组的领导核心，你怎么搞，他马上就透露了消息，工作队怎么能把四清搞彻底呀？我看有些公社党委、支部书记不能参加领导核心。是不是可靠的可以参加领导核心呢？问题是你不知道他可靠不可靠，查一两个月还查不清楚。当然查清楚了确实可靠的，可以参加。没有查清楚以前，不能参加，而且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工作队采取什么策略，要保守秘密。

不要怕干部躺倒，怕他们躺倒就不放手发动是不对的。基层干部躺倒，是他们反对工作队，反对群众运动，反对搞四清的一种手段，这本身就是一种阶级斗争，躺倒就是阶级斗争。躺倒是假的，他绝对没有真正躺倒，而是在积极反抗，开秘密会，反对工作队，反对四清，反对五反，反对发动群众，反对群众揭露他，很积极啊！他们实际上是想继续当干部，口说不当干部是假的。如果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也不怕他躺倒，群众起来了他也不会躺倒，躺倒了也会起来。不起来的也不要紧，当干部的人多得很，他不革命，别人要革命。

我在这里说一下第二个十条这个文件，其中有个缺点，强调放手发动群众不够，中央准备改一下。两个十条都在群众中念一念，这样有好处，把政策交给群众和基层干部，让大家放心，不恐慌。但是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要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才执行，做那一条就执行那一条。文件中关于依靠基层组织，依靠基层干部的问题，没有讲清楚。如果基层组织、基层干部是好的，可靠的，依靠是对的。但不好的，靠不住的你去依靠他还行吗？还不犯错误？到底可靠不可靠要查清楚。讲查清楚并不容易，要有一段时间，不是一下子就能查清楚的。同时一开始你总不能说他不可靠，还得说“大概你还可靠”，不过有所保留就是，再慢慢查吧。我们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农村中唯一的依靠是贫下中农，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这就不那么妥当嘛！如果基层组织它本来就是依靠贫农、下中农的，贫农、下中农也信任它，那么我们依靠它是对的。我们依靠了它，也就是依靠了贫农、下中农。假如基层组织它依靠的是富裕中农，是地富反坏。贫农、下中农的要求和困难，它不解决，而且加以歧视打击，你依靠了它，就脱离了贫农、下中农，只要脱离了贫农、下中农，我们在农村就毫无作为，任何事情都办不好了。有些模范支部，有些三类支部，我看也要查一查。有些模范支部实际上并不模范，有些三类支部实行上并不一定很坏。有些基层组织基层干部，在四清的时候是不能依靠的，因为你要搞他的四不清嘛，只有在四清搞完以后，他退赔了，改正了错误，这个时候要团结他对敌斗争，就可以依靠了。就是说，要经过一段批评教育斗争以后，再团结他们依靠他们。还有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农民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的基础和前提。第二个十条里而有这么一句话：“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就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这句话不对，讲反了，要改过来。许多基层干部犯了各种不同程度的错误，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弄清情况，经过适当的批评斗争，改正错误，真正退赔了，划清了敌我界限，又真正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他。否则，他跟你是两条心，怎么团结呢？不晓得你们这个地方基层干部多吃多占、贪污盗窃退赔起来是不是很困难。华北有些地方退赔起来并不难困，基层干部前几年弄了不少东西，买了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有的养了肥猪，有的盖了新房子，只要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查实了，不冤枉，他把这些东西一卖，上千的一两次也就退清了。总之，退赔要坚决，那些东西不退出来不好，群众一见就恼火，团结群众，发动贫农、下中农就发生困难。有些基层干部基本上是好的，但是犯有错误，应该从团结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斗争，改正了错误，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有些基层组织是好的，这些基层组织取得贫下中农与多数群众的拥护，它们是不害怕你去发动群众的，群众发动起来，对他有好处。另有一些基层组织是脱离群众的，那就不能依靠它去发动群众，就必

须由工作队直接去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才能把真实情况弄清楚，基层组织的活动，工作队不清楚，而工作队的一切行动，基层干部却清清楚楚。有严重问题的基层组织常常有一套办法对付我们，有喂、顶、拖、饿、赶、躺等等。首先是喂，给你好的吃，叫你一下来就搞四不清。所以工作队一进村就要与四不清划清界线。生活细节上面有阶级斗争，不要粗心大意。喂不行，就顶，或者拖，或者饿，或者赶，或者躺倒不干。一九六一年春，我在天华大队的时候，彭梅秀就赶我。我刚进去十几天，她就说影响生产。可是中央调查组他们在那里搞了一、两个月，她没有说影响生产，为什么我在那里十几天，就说影响生产了？我知道这是赶我，那不行，我就偏不走。接着她就要赖，骂我刘胡子，说刘胡子把天华大队搞乱了，因此她也要把天华大队搞乱。我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有公安厅长一道，她还要赶，你们下乡下厂搞四清、五反，就不赶你们？！如果不赶，或者是因为你特别好，或者是因为他特别好，或者因为你同他一样好。他贪污几百几千是拼了命的，有严重问题的，大体上都是要赶你的，要想尽办法赶你的。

因此工作队进村以后，有一段时期还要做秘密工作，工作的部署不能告诉他们。有些地方提出，一切要经过基层组织，这是错误的，对公社党委和大队支部不适用。工作队当参谋，对有严重问题的地方也不适用。确实证明是好的，那可以，但到底是好是不好的，又一下子搞不清楚。工作队进村以后，不仅基层干部看我们，贫农、下中农也看我们，如果我们工作队的行为不好，大吃大喝，跟基层干部的关系很密切，住在基层干部家里或大队部，还跟他们下棋打扑克，基层干部再在群众中一吹，贫农、下中农一看，是这个样子，有话也不讲了。如果贫农下中农看见你们与基层干部并不密切，看见你们还参加劳动，还找贫农、下中农谈话，就开始有人来找你。开始谈也是秘密的，把你拖到一个偏僻地方，说一点事，而后还要求你替他保守秘密，不要说是他讲的，他怕打击报复，怕穿小鞋。贫农、下中农有秘密工作，基层干部也有秘密工作，唯独我们工作队没有秘密工作，那是斗不赢的。

当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敢于指着干部鼻子揭露的时候，大概就不怕了。不过在这个时候，群众揭发的材料常常是不完全的，有些只是怀疑，比如只知道你有贪污，但不知道你到底贪污了多少，因此就需要工作队做大量的调查核实工作。一方面群众揭发，另方面工作队派人调查核实。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会有人讲假话，说某某人是万字号，某某人是千字号，可能发生一些过火的行为。这个时候，要强调实事求是，强调调查研究，强调核实，尽可能少发生缺点错误。要切实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注意防止大轰大嗡的形式主义，那不是真群众运动，开什么万人大会，轰一下，那不要搞。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有一个火候问题，火候掌握得好，就可以少发生缺点错误，少出乱子。群众运动一点乱子不出，一点错误缺点没有，是不可能的。但是掌握火候，可以少发生。

我们提出这么一个标准：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革命彻底了，但是缺点错误不超过一个指头，我看这就是高标准。有两条控制好了，就不会发生大的缺点错误，一条是不动手打人，尽可能不骂人。这就要说服群众。但有些基层干部过去不仅是骂过贫农、下中农，而且打过，现在贫农、下中农发动起来了，难免要骂几句的，完全避免也很难。我们要教育贫农，下中农尽可能不要骂人，虽然不动手打人，骂人也不好。另一条是组织处理，除了个别的要在群众运动中进行处理，借以发动群众以外，一般都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不要急急忙忙，但是工作队离村子以前，必须办完一切处理、批准手续，不然，一拖就是几年，那是不行的。因为负责干部去了嘛，完全可以做到。发生缺点错误怎么办？我看要当时纠正，不要等到以后，该翻案的就在那里翻案，该平反的就在那里平反，当时翻案好。积极分子有意见，工作队要说服他们，不要发火，与其以后翻案不如现在翻案好，没有那么多，就要翻，翻得好。群众发动起来以后，既不要泼冷水，也不要当尾巴主义。

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该强调发动群众的时候就强调发动群众，该强调实事求是的时候就强调实事求是。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求：第一，充分发动群众，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彻底；第二，乱子尽可能少出，不超过一个指头。这两条要求行不行？这样就算高标准。该强调发动群众的时候不敢于发动群众

是不对的，该强调实事求是的时候不敢于实事求是也是不对的。这是尾巴主义。我们过去右的错误、“左”的误错都犯过，要认真总结一下。这次运动既不要犯右的错误，也不要犯“左”的错误。所谓不犯右的错误，就是不彻底的也不超过一个指头。所谓不犯“左”的错误，就是过了头的也不超过一个指头。就是要做到百分之八十的又彻底，又不出乱子。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两个不超过一个指头行不行？我今天讲这么一次话，是来鼓劲的，是怕你们搞的不彻底，不深不透。但是当群众起来了的时候，我们就要清醒，不能发热。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是我们革命者必须学会的一种本领，一种硬功夫。要总结历次群众运动的经验，就可以少犯错误。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还要注意运动的不平衡性，往往这个生产队搞过头了，那个生产队还不彻底；这个大队过头了，那个大队还不彻底；这个公社过头了，那个公社还不彻底。所以要在实际工作中，由前线司令掌握，要由大队工作组掌握，公社是掌握不了的。

上下左右的根子应不应该追？要追清楚。该追到哪里就追到那里。特别是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越要追出来。

还有一种人，在斗争中有些坏干部撤职、开除了，他就搞破坏，或者工作队离开以后搞破坏。他要使生产搞不好，事情办糟，生产搞的越坏他越高兴，事情办得越糟他越高兴。搞坏了，他就好复辟了。这是现行反革命活动，要当现行反革命处理，这种人造成的破坏比任何反革命分子造成的破坏还要大。王光美搞的那个人队，支部书记撤职了，工作组还没离开他就反攻。一反攻就好了，全大队开大会讨论，群众就要求开除他的党籍，说你们不开除他的党籍，我们就没有办法，你们开除了他的党籍我们就可以把他管制起来。

不放手发动群众搞好社会主义教育，搞好四清、五反，是不是要出乱子？我看要出大乱子，那不是一个指头的乱子，那是十个指头的乱子，是大乱子。搞不彻底，搞了一下，贫农、下中农也提了一些意见，但很不彻底，这样是不是也要出乱子？也要出大乱子，甚至那里死了人，他也不汇报。搞不彻底的乱子比搞过头的乱子大的多，你们相信不相信？你们就只怕过头的乱子，就不怕不彻底的乱子。搞彻底了，乱子反而小些。搞不彻底有很大的后遗症，和平土改、和平四清、和平五反的乱子更大，你们不怕，我是怕的，我是头一个怕的。贫农、下中农提了意见，结果打击报复，死了人，我们又不知道。所谓和平四清、和平五反，就是改良主义，就是不敢革命。

一个区，一个公社一起搞社会主义教育时，应该是什么行业都搞，商业、文教、税收、银行、手工业等一切行业都搞，如果这回不搞，就留下许多死角。当然，有些可以到农忙的时候搞。

负责同志下去蹲点，是以省委书记、省长、厅长、部长、县委书记、县长这个名称下去，还是改名换姓好？我看改名换姓下去，使人家轻视一下有好处，这样他就估计不足，不大注意你，他就放肆，就是要他放肆，越放肆越暴露，越好办。

县级领导干部下去蹲点，是蹲到本县好，还是蹲到别的县？蹲到本县，都是本地人，上下左右都有联系，搞起运动来有框框，到别的县去了，就什么框框也没有了，重新搞。你说在本县了解情况，我看不见得，你了解什么？到别的县去，开始就是“我不了解情况的”，抱着一个谦虚态度。农村、工厂都这样调换，这个问题你们部署运动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

工作队下去可以与贫农、下中农同住、同吃，也可以自己办伙食单位，只是不要吃的同农民太特殊。我们打那么多年游击就是自己做饭，农民也不反对嘛！工作告一段落回来两天，那是可以的，其余的时间应该蹲到点上。工厂在城市，到工厂去搞五反的，可以早出晚归，在工厂吃几经饭，在工人宿舍找工人谈话。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五反，我看至少要搞五年，没有五年搞不好。恐怕五年还不够，那就再加

一点，但是不要拖拉，要紧张地搞。紧张地搞，搞彻底，高标准，可能五年时间还不够，加一点不要紧。如果拖拖拉拉，十年也搞不好。湖北原来说搞了百分之五十以上，我同王任重同志谈，到底你们是搞快了还是搞慢了？他说过去搞过的不算，重来。这实际上是搞慢了。

我们要通过这个运动，形成那么一种欣欣向荣的局面，就是主席所说的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如果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真正搞彻底了，出了乱子当时就纠正了，那就可能形成这种局面，那就对发展生产，对社会主义建设大有帮助。而真要搞好，必须实行林彪同志对解放军提出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搞社会主义教育，不学解放军，不抓活思想，是搞不好的。工作队就是要有革命作风，又处理敌我矛盾，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得清清楚楚，团结了两个百分之九十五，问题解决了，结果就会很好，不仅是政治上好，生产上也会好。

40）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1964年9月1日）

“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

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顾虑，不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唯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为框框，到处套用。到底各个地方、各个大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较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不能偷懒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或其他取巧的办法的。桃园大队的经验，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顺利地去解决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问题。这是各地同志阅读这个文件时必须注意的。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41) 附件：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1964年7月5日)

王光美

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到河北省参加了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经过五个月的革命实践，我才真正理解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一次比上地改革更为复杂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涉及的问题很多，牵连的面很广，斗争也很尖锐。的确是这样，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实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尖锐、更复杂、更艰巨的阶级斗争。

我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下乡，一九六四年四月底回北京的。地点是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从我所接触到的地方看，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情况大好；其他的好事情也很多。但是，今天我专门讲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

怎样讲呢？我们那里怎么做的，我就怎么讲。碰见什么矛盾，存在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按过程来讲。主要讲一个人队的事，也涉及到公社、区、县的一些干部和那里的某些工作问题。

先说一些基本情况。我参加的是河北省委组织的省、地、县“四清”工作队(在河北，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为“四清”)。为了有利于工作，我改了名字，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身份，在工作队里作一个普通队员，在桃园大队工作组做副组长。这样办，确实是好。既决心下去，主要是多做直接工作，尽量摆脱领导事务。

卢王庄公社在北戴河车站西面，离休养胜地海滨不远。这个公社有十四个大队，六十九个生产队，二千五百户左右。这个公社的大部分村庄是一九四八年底解放的。因为在铁路沿线，比县城还解放得晚。县城是一九四七年解放的。我们整个工作队，有二百二十多人，其中有一半是省属各机关的干部，另一半是县属各级的干部：有县的、有区的、也有由其他公社调来的公社干部。有少数地委的干部，还有中国青年报的少数同志参加。工作队由省委林铁同志挂帅。队长是抚宁县委第一书记强华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的副主任肖风。

我们工作组分配到桃园大队。这个大队有二百一十七户，四个生产队(小的队四十八户，大的队六十五户)，一千零八十多人，二千多亩地。当时说有两户地主，两户富农。桃园工作组有二十个人，其中有八个是县属干部，有县委委员，有区一级的宣委，还有四个是附近公社的副书记、社长。另十二个人，包括我，是省级各机关的干部。看来，组织综合性的工作组，是比较好的，因为熟悉各方面工作情况的人都有，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对工作有利。

我们进村以前，先在秦皇岛学习了一个星期我也参加了。在这个公社里有一个蒲蓝大队，去年夏天，省委已经在这个大队搞过了“四清”试点。省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摸索在一个公社范围内，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同时展开“四清”，上下推动，互相配合的经验。根据蒲蓝大队试点了解的情况，这一带是和平土改区，阶级阵营混乱，干部“四不清”问题很严重，多吃多占、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都是比较多的。群众非常欢迎“四清”，非常欢迎“四清”工作队。我们工作队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蒲蓝大队试点的经验，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了几个步骤：先搞扎根串连，讲“双十条”，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河北省其他地方的试点也是按这个步骤进行的，先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看来这个作法好。因为在敌人的活动不是特别明显的地方，一下子搞不清谁是敌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且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掩盖着敌我矛盾，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作，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以后，才摸得清真正的敌人是谁。除非那个地方敌我矛盾很突出，很明显，一下子就弄准了谁是敌

人，那当然可以也应当先处理敌我矛盾。工作队在秦皇岛订的初步计划是三个月，想用三个月把这个工作搞完。可是越搞越复杂，实际上我们搞了五个月，才算基本上搞彻底。

（一）

我们工作队在大批人马进村以前，曾经派了少数人作为先遣组进了村，让他们先了解一些情况，为讲“双十条”时提供一些材料。同时，帮助把一九六三年的分配落实。还有，工作队进村不是要住在贫农家吆，可是住在谁家，一进村进哪个门呢？先遣组的同志，要同支部联系，找好住的地方。他们是管这几个任务的。

进村以前，公社向我们介绍，桃园大队是一类队，一类支部，生产还好，征购任务完成得也好。支部书记吴臣是贫农，忠实可靠，“四不清”的问题大概没什么，因为他家人口少，生活富余。这个人不识字，很能干。副书记赵树春有工作能力，如果：真5记不在，可以依靠他。公社还提到，去年春天，支部领导搞过一次“四清”，只有一个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关景东清出大概是二百块钱的问题。当然，也讲了一些迷信、赌博等一般性的问题。他们说群众非常欢迎四清”，现在已经磨了米，砍了肉，准备接待“四清”工作队。

进村以后，支部书记吴臣给我们介绍情况，他说，“小小不言的，有些多吃多占和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保证没有。如果有了，你们就开除我的党籍。”说得干脆得很。这个人不是不识字，也识点字，不会写倒是真的，可是真能讲话，记忆力好极了。他说：“春天我们搞了‘四清’，经过县和公社验收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关景东的二百块钱，到现在只退了一百元，那一百他不愿意退，一直拖着。”他总觉着就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工作组长比我们先到一天，他是县委委员，原来曾在这个地方做过工委(现在改称区委)的副书记，来过这个村子，熟悉这里的干部。他说，这个村子的干部和群众，都特别讲人情，这个支部书记听话。只简单地介绍了这两句。，先遣组先进村十来天，也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他们讲：这个人队干部团结比较好，没有两派的问题，支部书记吴臣，有一定的威信，他没有什么“四不清”，就是有点用人不当，有点家长式领导。

我们工作组的同志，有好多人把事情看得比较容易，特别是那几个当社长的同志。进村来一分工，我们二十个人管一个大队，一个社长就管一个小队了，而且还给配一两个人做助手，两三个人管一个小队。刚一分工的时候，有的人就有点闹情绪，说：“我过去一下去就包一个片，一个片就好几个大队，现在分我一个小队，还给我配几个助手，不几天我就把大门数过来啦！”并且说，“咱们定牛皮合同吧！”好象觉得有点大材小用了。他们讲这个话，主要是因为把问题看得简单了。我自己当时也没有把“四清”运动看得象后来了解的那么复杂。学文件的时候，虽然也看到讲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呀！比土改更复杂呀！可是没有感性知识，就认识不深刻。进村到底怎么做，我也懵里懵懂。听到介绍的情况，这里基本上是好的，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到底实际情况怎么样，到底这个工作好做不好做呢？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不了解真实的情况。介绍的情况说没有什么大问题，而蒲蓝试点的实践证明问题不少，到底我们这儿是有问题，还是没问题，首先得弄清楚。

到了村子里，要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就得找人。但是，好人、坏人脸上都不写字，不象演戏那样，一出台他就亮相，再看他的服装打扮，就给我们个印象，这个人八成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到了一个生地方就不同了，一下子看不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要扎根串连，访贫问苦，不了解那个是扎根对象，谁是真贫农，往谁身上扎？只好跟基层干部要土改时的成分表，人家说早就丢了。这么容易丢！是不是真丢了？这里：上改后期划过一次成分，在高级社的时候，又摸过一次成分，摸过阶级分化的情况。两次不一样。让群众自己说自己的成分吧，他反正就低不就高。问干部，干部就说谁是什么成分，

肯定极了。他们的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少数几个干部坐在那里一捏估，一合计，就定了谁是什么成分，真假难分。怎么办？我们就自己深入群众去了解。

开始，下去接触群众，群众对我们并不那么热情。同他们说话，他们只说这次“四清”工作队一进村，我们今年就多分了一千块钱，本来说要分八千，现在一下分了九千，要不然，这一千反正是分不下来。好象“四清”就有这么点好处。别的就不多说了。地主、富农的活动，在公社、支部介绍情况时，就没有多讲。同群众接触，他们也没多谈，看起来对地主、富农并不讨厌。一提起干部来，群众可是有一肚子气，却又不讲具体意见。复员军人、下放工人、青年学生，一般说还是比较胆大，敢讲一些。可是，他们又受父母控制，老婆拉后腿。他们家里的人怕事，往回叫，不让接触我们，说“你给我回来，别给我惹事！”有的，一问三不知。问他分多少粮食，吃多少，都说不知道。“我不管家呀！”“我不清楚呀！”有的敢谈一点，也是害怕，“说了你们得给保密呀！”谈了一次，再找他们谈，就躲我们。我们感觉到群众是顾虑重重，情况不对。

再说基层干部的态度。桃园有两个大队长。原来的大队长是个女同志叫袁秀英，我们去以前，请产假休息，由一个男同志卢彦来代替她的工作。我们进村时，她产假已过，这样就有了两个大队长。他俩和支部书记经常来我们这里问寒问暖，表面上很关心我们。来看我最多的是袁秀英，问有没有灯油，烧的送来没有，炕凉不凉，被子够用不够用，一天间好几次。可是要谈问题，就躲躲闪闪，问个人经历，她谈。问她对“四清”的看法，有些什么问题，很慎重，不敢谈。有时候这次来不谈，下次来她就讲一点。这个干部讲了，那个干部也就讲了，他们都象是对过表的，后边好象有指挥棒。该讲不该讲，他们回去汇报，统一了讲哪个，才来讲哪个，就这么个味道。我下去后抱着这样的态度：和群众或干部一认识，就先声明，我是城里人，下乡少，很多农活不会干，这个村子我第一次来，情况不了解。实话说在前头，有好处。否则，人家也看得出来。人家挑水挑一挑，轻飘飘，我挑半挑还吃力。开始时，我挑一次水，要把水桶掉到井里好几次。这个地方提水的方法是很特别的，要学会这样一件具体事，也要摸清它的规律，要经过多少次失败，才能学会。我第一次和支部书记谈话时，也是这样声明的。他是怎么回答的呢？他眉飞色舞、得意洋洋地说：“董朴同志你听着，我总是这么说，你们要是依靠我，有两个星期，你们就搞得清清楚楚。你们要是不依靠我，搞上两个月，也摸不清个东南西北。”他瞧不起我们。开始让这样的人瞧不起有好处。他瞧不起我们是两条：第一条我们不了解情况，第二条我们也了解不了情况。他有他的经验，他对付了多少年上面下去的人，他有把握控制住群众不讲，他有一套手法。他讲这个话，实际上是企图引我上钩。你不是城里人吗，到乡下住在贫农家里，难道不苦吗，煤油灯，没暖气，反正总得吃点苦吧，你还不想早点回去？！又想把任务完成，又想早点回去，还不找点窍门，这个窍门就是你要依靠我，有两个星期就解决问题了。他的话，有意引我上钩，倒引起我的警惕，我越琢磨越觉得应当警惕。当时我是这样答复他的：“我们不了解情况，谁反映情况我们都欢迎，可是我们是省委派来的工作队，你作为支部负责人，应该向我们汇报，汇报这里有些什么‘四不清’的问题。有错误不要紧，错了就改，可不要错上加错。现在干部、群众对我们‘四清’工作组，对我们这次‘四清’工作有些什么意见，你要随时向我们汇报。不要再来问寒问暖，都是同志，我们需要什么，会找你们的。”

上面这些说明，我们接触到的情况，和我们所听到的介绍，不一样，有些可疑。

离开北京以前，曾请示少奇同志，我应该注意些什么，工作怎么做法。他简单地讲了两句。他说：“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当时还觉得他讲得很原则，经过这几个月的实践，越琢磨越觉得这几句话重要。就是说，马列主义和党中央的精神一定要把住不放，可是，不能有别的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定义出发，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或从人家给我们介绍的情况出发，这是区别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的标志之

一。出发点根本不同。要从实际出发，可是，桃园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呢？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吴臣认为，我们不了解情况，也了解不了情况。他完全估计错了。我们一定要把真实情况了解清楚。可是，怎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呢？必须直接到群众中去，认真发动群众。各方面的意见都听，却又不能完全相信。要有调查，有分析。要从不同意见里找差别，从差别里发现问题。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真实情况就能了解清楚。要真正发动群众，真正发动起贫下中农，要在贫下中农中间真正把根子扎正，真正做到“三同”，并不容易，而且是有尖锐斗争的。

我们是怎么发动群众的呢？党中央的政策“双十条”，是我们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我们就大讲“双十条”，先党内后党外，使党中央的政策直接跟广大群众见面。对地、富分子，公安厅的同志还专门给他们讲了一次。我们第一次向群众讲“双十条”，到了三百七十多人，据说是解放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北戴河一带冬天很冷，大北风一刮，两个棉袄都要打透的。人们站在院子里，一直听到底，还有很多抱小孩的妇女也来听了。大家聚精会神地听，把冷都忘了。他们非常重视中央的政策，很愿意听，特别是愿意听“四清”那一段。“双十条”给贫、下中农很大的鼓舞，他们听了以后，非常兴奋地说：“毛主席好象来过咱们村，这里的事他都清楚。”对其他各方面的人，听了以后，起了个安定作用。讲了以后，我们又进行了各种形式的补课，以便做到家喻户晓。经过大会、小会动员，一般发动与个别发动相结合等等办法宣传了“双十条”，并且着重地说明了“四清”的决心。开始有人讲话了。说：“盼‘四清’可盼得不得了”，讲了好些顺口溜形容基层干部不好好劳动，却发了财，什么干部“溜溜达达两千七八”(不劳动，反而记二千七、八百工分)；“一等劳力门前站，二等劳力笔尖转，三等劳力满头汗”；“飞鸽车，罗马表，缝纫机，大皮袄，再不搞‘四清’，就会有人住楼，有入佳庙！”这几年有些干部盖了新房，而贫下中农住房挤得要命。一说起这些干部发了国家困难的财，群众就非常气愤。群众开始动起来了，不过还是：敢说话的不大了解情况，了解情况的不敢说话。我们就采取分组讨论的办法，把党员、团员、干部分开单独讨论，群众按队分组讨论。这样，我们以为可以谈啦！可是党员、干部主要是谈认识和体会。群众会上，大家还是不吭声。我们分别去问根子：“你们为什么不讲话呀，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一肚子话，象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吐不出来！”为什么呢？：有于部的亲信在场，给干部通风报信。你们解决不了问题，意见白搭了，空伤了人”；“了不得呀！人家都是上边的红人，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我们怎么敢提呢！”“你们一走，我们是八寸的脚要穿七寸的鞋！”原来如此。怎么突开呢？我们就先组织少数根子开会，逐渐扩大范围，从小到大。每次开会我们都声明，我们是贯彻“双十条”来的，谁的“四不清”都要清，这是党中央的政策，省委派我们来的，工作不搞彻底，工作组就不出村。鼓励他们提意见，不要怕报复。他们开始揭露了一些人的具体材料。根子开会，一会跑出去一个人，一会又出去一个人，说是解手。我想，这么重要的会为什么他们的精神不集中呢？其实不是解手，是自动出去放哨。真有人偷听。这些情况我们都估计不足。群众要求搞意见箱，我们说好，立刻钉了意见箱，每个队一个，挂在工作组门口。群众说最好挂在公共厕所里，为了便于群众投放，公共厕所也安了意见箱。

这样背靠背开会，基层干部不知道群众提了什么意见，开始感到有了压力。这个时候，我们就分头找干部谈话和开会，启发教育和推动他们自我革命。我们的态度是满腔热情地说服他们，要认识到必须彻底革命，不要错上加错，如果破坏“四清”就变成了大错误。因为有了群众压力，谈话有收获，有些干部开始交代问题。这时，发现干部有几类：一类是真正劳动者出身，只要能谈透，敢于自我革命，如关景东就属这一类。经过谈话，他谈了不少事情。还有一类，出身也还好，本人上过几年学，好象比较纯洁的，就是不敢讲，讲话躲躲闪闪，明显地是有人控制他们，袁秀英、卢彦来就是这一类。第三类，见了我们满不在乎，说话嘻嘻哈哈，说：“我没什么大问题，检训叫金讨就过去啦！”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也有些慌张，越到后末越慌张，他们对“四清”抵触很大。象支书吴臣，副支书赵树春都是这一类。这些人说是贫农，却不是农民出身，根本就沾不上“农”字，也不是工人。有的在东北做生意，有当店员的，也可能还有股金。他们能说会道，都是解放军围困长春时跑回来的。一般说来，真正劳动者出身的干部，工作好做一些。变坏了，经过教育，可以变回来。有的干部向我们说，这几年就一

直往个人生活怎么搞好上使劲，坐在一块就是谈什么样的手表好，什么牌的白行车好，这些东西什么价钱；就是没往把集体经济搞好上使劲。他们是怎么变坏的呢？开始就是不劳动，老琢磨着吃点好的，越吃越馋，想吃又没有，手就长了。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政策就没法贯彻了。人家杀了猪给他送个猪腿吃，他吃了，怎么能说人家私杀猪不对呢！从沾小便宜，多吃多占，逐渐发展到不分敌我界线，谁给吃的谁就是好人。他们变坏的规律，确是象毛主席所说的是：懒一一馋一一占一贪一一变。开始都是由于不参加劳动，这就使我们更加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再三指示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

问题逐渐暴露，斗争日益尖锐，“四浦”和“四不清”的斗争，确实是包含着严重的阶级斗争。

根子能不能扎正？是这场革命能不能搞好的关键。要自己访，要多方了解。选什么人当根子，是有斗争的。开始，得先听支部的介绍。我们把选根子的条件告诉支部，让他们给我们推荐，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安排他们的亲信。他们给我们提了二十六个根子，其中有九个是干部的亲信，还有富裕中农，丧失立场的人，这样的，我们都没有用，只选用了十四个。我们自己又发展了十一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讲话，选他们做根子，他们却躲着我们。支部说我们找的根子，是“鸡头鱼刺”，挑他们的小毛病。而他们确实有点小毛病，比如偷过几斤玉米之类。这几年干部贪污几百斤，贫下中农偷几斤就不叫他做根子吗？我们党的多年的干部还有毛病，贫下中农在觉悟提高以前哪能一点毛病也没有。我们选定的根子，干部就分配他们“好活”做，把挣工分多的事让他们做。如三队的根子安福海，吴臣让他负责卖挂面，早出晚归，根本使我们和他见不着面。他本人也愿意干，因为一天挣十二分，每天还奖励一斤挂面。在扎根上，支部不是帮一手，共同搞革命，而是同我们唱对台戏。

实行三同，也是有斗争的。先说同住。我住了个贫农家，住了三几天，就发现有个小青年老在我窗前转，再三追问，才知道他是大队长卢彦来的弟弟，而我住的这家原来是大队长的亲叔叔。我就感觉住在这里不对头。接着，就有人向我反映，女主人的亲弟弟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曾在卢王庄当小学教员，搞“博爱党”，扣押在县公安局。支部书记、大队长都知道这个情况，还让我去住，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后来我提出非搬家不可，支部几天也不给我找房子，说难找，贫农家房子很挤，找不出地方。他们还向工作组的一些人讲：“你们是整人的，谁也不愿意让你们去住。”于是我们自己找，搬到一个根子家去。他就是后来的贫协主任刘玉森。他家人很多，还给我们腾出厢房，孩子们出去寄宿。整个工作组住在七个地方，后来我们才逐步了解，这七户中，一户是隐瞒成份的地主，一户是反革命亲属，一户是富裕中农，三户是中农，只有一户是真正的贫农。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支部如果有问题的话，工作组要住到贫下中农家，很难一下就住对。同住，有斗争。

同吃，是不是也有斗争？也有斗争。我们吃的是派饭，除地、富、反、坏和没人做饭的户以外，轮流在社员家吃饭。虽然说是吃一样的，可是他们总想给我们搞点好的，不是象《夺印》里的陈拐子对何文晋，一下子大鱼大肉都拿上来，而是慢慢来，开始加碗蒸鸡蛋，加点肉，如果我们愿意吃就逐渐增加。这里面，确实有好的贫下中农，真想叫我们吃点好的，他们也借机会改善改善生活；可是，也有的是干部授意的，让他们搞好一点。一般的贫下中农愿意搞点好吃的给我们，他们是这样想的：“你们搞运动嘛，总会对我有点好处。”有的直率地说，“你们是省里来的，将来总会有事找到你头上，交你这个朋友嘛！”他们有这么一套习惯势力。给好吃的，实际上带有贿买性质。我们的工作队，对于这个问题很重视。工作队决定：肉、鱼、蛋，一律不许吃。开会讲，个别也谈。可是，工作队里有的人觉得一天交四毛钱、一斤二两粮票，也差不多，这么规定有点过分。还有的人看起来对决定也遵守，他也通知人家别做好吃的，群众一摆出好菜来，他就说：“不是说过不让你们这么做嘛，下回可不能这么做了。”可是，一吃起来，荣是有荤有素，对荤菜却特别感兴趣。这和《拾玉镯》那出戏里的孙玉姣一样，说是镯子不要不要，实际还是要。也有的社员说：“你吃吧，不要紧，吃了我不给你说去。”这样的，可更吃不得。我们不是怕他说不说出去，而是要真正地坚持三同。所以，我们就坚决顶了。这个顶，有的时候

搞得两不得劲，有的贫下中农真是好心好意地想给我们吃，不吃他真难受，他不得劲，我们也不得劲。有时，他还找：工作组来说："我不是地、富、反、坏，又不是'四不清'干部，为什么不吃我的呀！我也不是收买你呀！到底有点什么问题呀！"我们给他讲："你是积极分子，在你家吃了就得在别人家吃，假如天天吃肉，把我们也吃得又馋又懒，我们不是也成了'四不清'干部吗！"讲了好多次，顶了好多次，后来他们谅解了。有的地方规定，给什么吃什么，不许要。这样规定不解决问题，是没有分析的。问题在于给什么和要什么。如果给细粮要粗粮，不要鱼肉要白菜，就对了。这个地方吃吃喝喝的风很严重，只要贪吃，慢慢地吃下去，就有被"四不清"改造过去的可能性。所以，必须顶住。

同劳动有没有问题？也有问题。帮助做些家务事，如：挑挑水，扫扫院子之类，还没有什么大阻力。子集体劳动就有人不赞成了。说什么大冬天，"男人的活都没有，那有你们女人干的，你们就认真搞'四清'吧！""四清"工作确实很紧张，日日夜夜，可是不管多紧张，也得挤点时间去劳动，那怕干一个钟点，一千就不同。开始我们和社员一起挖坑泥、打井，大队长、支书揣着手在那儿站一会就走了，不动手，也不提意见。他们就是看我们工作忙，能不能坚持劳动。如果我们说"四清"忙，可以不参加劳动，他们就可以找到借口："我们平时工作也忙，也可以不参加劳动。"我们干一点，立刻村子里就传遍了，所以，再忙也得挤时间参加一些集体的生产劳动。靠劳动了解情况，开始不行，很多人一起劳动，人太杂，没法问情况。可是只要我们参加劳动，就有人愿意找我们讲情况。

我们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和"四不清"划清界线，这是个取得发言权的问题。所以，真正做到"三同"不简单，有尖锐的斗争，但一定要做到，也做得到。事实说明，三同是可以做到的。可以住下去，住得很好；可以吃得饱，活得很好，可以工作，而且工作得更好。

自从要支书吴臣来汇报以后，一连几天，他没有露面，他确实不来问寒问暖了，可是也没有来汇报。于是就派人把他找来，我说："怎么搞的，几天没见你的面？"他说："唉！我经过多少次运动，我都懂得，你是来发动群众的，我往你这来多了，怕妨碍你发动群众。"他还说："工作组有人老找我下象棋，我就不跟他下，干什么叫群众一看你们又这么热呼，妨碍你们工作。"不叫他汇报，他天天来问寒问暖，叫他汇报，他就不来了，还讲了一套理由，自以为聪明，却露了马脚。我们查了一下，工作组确实有人同他下过象棋。但是，有许多次是吴臣提议的，有时是工作组的同志找吴臣下棋的，吴臣根本没有拒绝过。本来下下象棋，打打扑克是没什么的，可是对这些事基层干部是怎么想的？值得注意。吴臣比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们的脑子复杂多了。工作组有的同志开始没觉得这是问题，可是吴臣却是有意的，他要在表面上做出同工作组很亲密的样子，让人们看起来工作组同他们搞得很亲热，都听他的，搞成一片了，用这个来迷惑群众，使群众不敢揭露他的问题。他故意当着群众的面称呼工作组姓吴的同志"当家子"，套近乎。还故意当着人送几块热白薯给工作组的一些人。表面上同我们的关系很密切，实质上不向我们说真心话，不说老实话。后来群众告诉我们："你们刚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讲话，就是看到你们又和他们搞得热热呼呼的，又象是一个链链上的，我们就凉了半截。"

所以，我们一进村有一个了解情况的过程，群众也有一个了解我们的过程。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群众都很注意，他们要看我们是不是与"四不清"干部一样，是不是具有彻底革命的决心，是不是真正贯彻中央"双十条"，是不是真能解决问题，可不可以信赖我们。我们了解这个问题也有一个过程。有一次我到一个贫农家里吃饭，小伙子叫王洪业，劳动很好。他说："老董你今天到陈家河沟干什么啦？"我说去看水源。我想，那一天去，没有碰见老乡，没有碰见王洪业，他怎么知道的呢？我就问他："你怎么知道我去过陈家河沟？"他说："我看见你的脚印啦！"这个话教育我可深呀。看来小伙子粗里粗气，却粗中有细，连谁的脚印都认识。原来我穿的是塑料底的棉鞋，鞋底花纹和别人的不同。这证明，群众在仔细地观察着我们，看我们是干什么的。因此，坚持"三同"，和"四不清"作风划清界线，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认识到这一点，坚持"三同"就更坚决了。

在我们进村以前，这个公社的蒲蓝大队已搞过"四清"试点，群众知道"四清"好，日夜盼"四

清”。可是，“四不清”干部也有准备。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在我们进村以前，吴臣对如何对付“四清”工作组早有布置，有分工。支部的几个人，谁管问寒问暖，谁管拉拢工作组，又是下棋，又是送白薯、送被子的。还布置了由哪些人给工作组出难题，出什么难题，他都计划好了。如果我们不搞革命还可以，如果搞到他头上，他就出难题，把队与队之间的土地纠纷问题向我们提出来。我们根本不了解那些上地的情况，这不是难题吗？他们计划了在什么时候拿出这一手。他的布置，我们刚进村那晓得呀！为什么我把这一段讲这么细？因为听说你们都有决心去蹲点。我说细些，也许有好处。开始，对一个好支部，不可能怀疑它是不好的，可是一件事一件事教育着我们。这是个什么问题呢？省委派的工作队，来贯彻党中央的“双十条”，支部却对我们采取了这么个态度。从我们碰到的事情来判断，他们硬是有一套影响和抵制我们的办法。先影响我们，影响不了就抵制我们。不是老说斗争尖锐吗，是怎样的尖锐呢？不仅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破坏“四清”运动，有严重“四不清”问题的干部，在没有觉悟以前，也是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设法来抵制、抗拒甚至破坏“四清”运动。对于某些人来讲，“四清”是你死我活的问题。

这里有个谁改造谁的问题。我这样的党员，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在解放前又受过长时间的资产阶级教育。所以，我老警惕自己，要改造思想，永远要注意思想改造的问题。我们深入到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去，要不要自觉地改造思想？要，可是要用什么来改造思想，谁改造谁，这里边是有这个问题呀！我们必须用“四清”去改造“四不清”，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思想，同时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也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工作队要在这次运动中受到锻炼，要好好学习农民的勤劳、朴素、老实的思想作风。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提高以后，立场很坚定，这也是应该学的。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年我们的不少基层干部沾染了很多坏毛病，懒呀，馋呀，说谎话呀，……这些毛病是劳动者的本色吗？当然不是，是地主、富农作风，是资产阶级作风，对这些坏作风，千万学不得。又想吃好的，又不劳动，哪来的？就是手长，多吃多占，贪污盗窃，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所以，如果稍不注意，就有受这些坏作风影响的可能。我举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做工作，不是常写报告吗，可是，有的同志，会还没有开，报告就写好了。有一次，报告上写着到会人数多少多少，占的百分比多少多少，都算好了，送到我这里来。我说：“这个会咱们还没有开呀！”他说：“是没有开。”我说：“没有开你这人数是从哪来的？”他说：“我估计的。”我说：“这样的报告不能发。要么你就写清楚，这个会还没有开，我估计能到多少人，估计百分比是多少，我同意你往上报。要不，你就开完了会再报。会还没有开，你估计，你知道估计的对不对呀！”多少年来，表报这玩艺多得很，下面的同志有这么一套应付的办法。有时，上面发的表，我就不会填。可是有人就有办法，一估计就填上了。这种作风学得学不得？硬是学不得。如果同意打这样的报告，就等于说谎话。我们党的干部不是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吗，其中有一条就是如实反映情况。“四清”工作队，首先就应该有彻底革命的精神，应该经过严格的挑选和训练。工作队应该树立一个勤劳、朴素、廉洁(不收礼)、民主的新作风。既然是“四清”工作队，就是用“四清”来改造“四不清”的工作队，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四不清”的工作队。工作队就应该是一个革命思想和革命作风的传播队，就应该是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队。在“四清”革命的实践中，工作队也锻炼了自己。

怎样对待基层组织，怎么样对待支部呢？我们在入村的第二天就碰到了这个问题。因为第一天我们先烧热炕呀，煮开水呀，打扫打扫屋子呀，搞这些事情了。第二天，先遣组的同志向我们介绍情况，同志们陆续到会，因为工作组的同志多数都互不认识，第一次合作共事，所以来一个人我就问一个人的名字，问来问去有一个是桃园大队的大队长卢彦来。奇怪，我们工作组内部汇报，大队长怎么来参加？后来一问，原来县里有个指示，说是工作组的一切工作，都要经过基层组织，一切工作都要经过支部，工作组的会，要请支部书记参加，并且说那怕就是汇报他个人的问题，听听也没有关系。工作组的会要让支部派代表参加，支部书记不在，大队长就来了。这一来，这个会就汇报不下去了。因为当时正在开始摸根，汇报的人要讲根子的心理状态，要讲根子反映的意见，而根子再三叫我们保密。有大队长在场就不好讲。汇报会不能进行下去了，我们就借故停下来。支部是好是坏，还不知道，就决定“一切经过基

层组织”，这是束缚住自己的手脚，这样的决定明显地是错误的。象我们碰到的这样的支部，我们要依靠它发动群众，群众就发动不起来，要依靠它扎根，就扎不对，依靠它住房，就住错。中央的指示并没有说一切要经过支部。所以，我们对支部采取的态度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又依靠，又要独立思考，全面分析。我们对基层组织，不是一脚踢开，是教育他们自觉革命，由支部领导生产。我们工作组白己直接搞扎根串连，发动群众，也常常听取支部的意见和建议。支：部如果是好的，是不是我们也应该采这个态度呢？我看也应该。因为，支部好，也会有缺点的，发动群众提提意见，改进改进，不就更好了吗！如果真是好支部，它会同我们一起发动群众的。就是好的支部，群众中可能还有些传言传语，其中有对的，有错的。如果是错的，我们帮它查清楚，给它去掉一个包袱，也没有坏处吧！所以，在支部是好是坏还不清楚的时候，就决定“一切经过基层组织”是错误的。

（二）

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我们有了二十多个根子，各生产队组织了贫协(贫下中农协会的简称)小组，大队建立了贫协筹委会，革命的阶级队伍初步形成了。这时，我们就宣布“四清”正式开始。我们采取边洗澡、边揭发、边查账、边查证的办法。同时和基层干部谈心，指明前途，我们到底还是希望他们能自觉革命：自觉洗澡、放包袱，自觉下楼。为了教育干部，不知道说了多少话。“四清”班子一接账，事就更多了。名堂多得很呀！改账的，丢账的，做假账的，白条子很多，弄虚作假的名堂多得很。我对这些事一点也不懂，我们去看账，看不出问题。他们把账都弄好了，收多少，支多少，收支平衡。他们有好多地方走了“天桥”，走了“地沟”，卖了东西不上账，我们那里知道呀！这些事情非依靠群众不行，只要交给群众，群众是知道的。咱们哪一年哪一月卖了什么，怎么没有账呀！那笔账上是多少钱一斤，数不对呀！一车萝卜是多少斤，一车白菜又是多少斤，一筐萝卜是多少斤，一筐白菜又是多少斤，我们是没有这个知识的。可是，群众都知道。有管装车的、管运的、管卖的，有的虽然没有经手，他们也懂得一筐萝卜装多少斤。去年、前年什么东西是什么价钱，他们都知道。所以，完全要依靠群众。一宣布工分账，群众就议论纷纷，气愤得很。有些干部一年挣了五千多分，他们的十几岁的孩子，也记高分。而有些劳动力最强的贫农，一年只挣了三千多分。基层干部多记工分的花样多得很。有不少：工种的工分记得不合理，有一些所谓有点技术的工种，工分都记得很高，有些人故意把这类劳动“神秘化”，由少数干部或他们的亲信，甚至他们信任的地、富、反、坏把持了这类肥差。群众对很多不合理的事情，过去都不知道，因为，从来没有公布过账目。不要认为查账是单纯的技术工作，它也是群众工作。群众工作中，也有专业技术工作，专业工作和群众工作互相结合起来就好了。三队查出饲养员支了八百块钱的草钱，是白条子。我们搞不清一个牲口吃多少草，同群众一算就算出来了，根本不可能买八百块钱的草。后来查清是会计偷偷盖了饲养员的戳子。因为他不认字，把戳子交给会计了，会计就利用他的戳子，在白条子上打图章。弄清了这个事，饲养员很感激我们。他说：“要不‘四清’，我那知道背了黑锅，用我的名义出了八百块钱买草呢！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四清’，忘不了阶级斗争。”经过接账和查账，揭出来的事更多了。群众开始揭发具体问题，并且发现有攻守同盟。问题严重的人，硬是不讲，说：“刀搁在脖子上我也不说！”就是这么坚决，那工作是真不好做呢！

这时候，我们发现桃园人队原来有两股黑风：一股是打骂成风，一股是赌博成风。赌博，在过年时赌一赌，在别处可能是个一般的情况。但是，在这个地方，群众说：“赌出花来了”。大人赌，小孩赌，男人赌，女人赌，屋子里赌，下地也赌。春耕时，扛耠子的在前边做宝，扶耠子的在后边押宝，到地头上看轮赢，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群众玩纸牌，大概是块儿八角的轮赢，干部一赌，就是几十块，上百块。吴臣的弟弟是个搞投机倒把的人，身上带着四千块钱来赌博。据说赌钱是钱归大头，钱多的轮了可以捞回来；结果真正输了的都是贫下中农。赌输了，就卖东西。赌风这么严重，不仅影响了社会秩序，也使投机取巧的心理大大滋长。不是安心搞生产，而是想搞赌博赢钱。为什么赌风这么严重呢？就是干部带头。干部赌的时候，叫党员放哨，请人给做夜餐，吃饱了再赌。白天睡觉，工分照记。听说有一次公社来抓赌，有一个干部跳墙逃跑把腿摔伤了，养了二十八天，这二十八天还记了工分。不仅这个村的

干部赌，就是上边的副区长苏长吉也常到这个地方来赌，他还带着县委办公室主任王守敬到这里来赌过。上边干部来参加，下面干部赌起来就更有理了，谁也管不了。小孩也赌。有一个小孩叫吴臣抓了赌，吴臣说："你给我掷个四五六，掷成了，就叫你走。"真巧，一下子就掷了个四五六。吴臣说："你有运气，走吧！"就放走了。

另一股黑风就是打人骂人的风。有不少生产队的干部打人，骂社员的就更普遍。干部打群众，打贫下中农。小学校的一个教员，是伪职员出身，他打了二十一个学生，多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体罚的形式有十一种。为什么敢这样打呢？我们就追这两股黑风的根，追来追去，就追到支书吴臣身上。群众开始揭露吴臣赌博和打人的事。正当群众运动趋向活跃的时候，又出了问题。一个积极分子来找我们，说："你们怎么骗我们呀！'四清'就搞二十天，搞了就走。过去你们不是说过不搞清不走吗！"我们说："这是谁说的呀？"他说："有人说'四清'二十天，熬也熬过去了，'四清'过后，干部还是干部，社员还是社员。"这一来，群众情绪大受挫伤。我们追查来源，原来是吴臣的老婆放的风，故意给群众泼冷水。吴臣的老婆当然是听吴臣说的。吴臣又怎么知道的？又为什么现在放出这个风？这很值得我们深思。进一步查，原来是公社党委开扩大会议时，把我们原来的工作计划宣读了，支部书记吴臣是从那个会上听来的。按工作队的那个三个月的工作计划，"四清"预计搞二十天。我们进村前吴臣就知道了，可是他一直没有说。单等群众开始要揭露他的时候，他才把这个"法宝"放出来。他是有步骤的，到什么时候拿什么"法宝"。为什么他这时候拿出来呢？就是为了挫伤群众的积极性，阻止群众揭露他的问题，他就是同我们这么斗。我们就联想到，在前一个时候，工作组汇报时研究了各个生产队谁的问题严重，第二天吴臣就知道了。他在底下说："嘿！就看工作组定的那些重点，什么也搞不出来。一队的那样糊里糊涂，二队的关希颜大老粗，三队的赵树同结结巴巴，四队的赵砚臣，盖房时借了点豆子也还上了"。这几个人都是队长和副队长。他说我们搞不出来，意思是叫我们拿关景东当重点。难道结结巴巴就不贪污了吗？糊里糊涂就没有"四不清"吗？他这些都不成理由，可是他偏偏与我们唱这个对台戏。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我们的一举一动，我们内部讨论的事情，他都能很快地就知道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我们工作组的组长同吴臣谈话时告诉他的。这两件事联到一块，就更提起了我们的警惕。

这时，我们认真研究了桃园大队的斗争形势。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起。而我们工作组的二十个人，来自各部门，主观上都是想把工作搞好的，但是，在一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政策问题上，实际上有不同的意见，看法不一样。再加上群众还不完全信任我们，对敌人的活动，我们又不大摸底。所以当时当地的力量对比，我们"四清"工作组的力量，就不如"四不清"干部的力量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怕我们。他们怕的是敢于贯彻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敢于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工作队。可是，恰恰在如何理解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要不要放手发动贫下中农，要不要放手发动群众，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个问题上，工作组的同志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看法。所以，对这些问题，非讨论不可了。

有的同志就觉得这个地方"四不清"问题不多，干部好，似乎是没有必要放手发动群众。有的同志自以为是"四不清"干部的老上级，干部会听他的话。听什么话？叫他们给送二十斤花生，几十斤大米，他们听话，给送来。叫他们"四清"，可不是那么听话啦！叫他们打扫卫生，马上就布置下去，行动可以很快。叫他们自觉革命，就不那么听话了。没有那么高的自觉性。尤其是还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他们就不肯自觉革命。

有的同志唯恐群众提意见会刺激基层干部，影响干部情绪。有的人一开始就强调实事求是，在动员会上讲："你们提意见，可得要实事求是，要有根有据，不许胡说，不要惹麻烦。"在动员会上这样讲，就是不叫群众说话。群众开始只能提怀疑意见。谁偷东西还叫人看见！

还有的同志怕影响生产。当然，我们要注意运动与生产结合。在冬闲时搞运动，安排好生产，完全可

以搞好。因为有严重的“四不清”存在，它本身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群众积极性不高。群众说：“我们劳动，都让干部大吃大喝了”，他们生产就不积极。“四清”搞好了，大多数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生产就会搞得更好。

有的人说，基层干部躺倒不干怎么办？有几个同志向我讲：“过去每次运动完了我们就得‘哄’干部。干部不干，什么事情都玩不转了。”有人向我们工作队长肖风同志说：“过去整风整社时，上面来了一个工作队，整了一家伙就走了，我们‘哄’了一年，才把基层干部‘哄’积极啦！我真担心你们这回来，又要给我们惹乱子，运动搞完了，干部躺倒不干了，怎么办？”因此，就过分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要一切经过基层组织，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怕团结不了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有的人专门抓“双十条”扣字眼，说工作组只能当参谋等等。总之，顾虑重重，束手束脚，老怕犯错误，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把某些具体的政策规定，变成了东缚发动群众的清规戒律。运动还没有搞，就怕干部躺倒，怕平反，怕后遗症。中央政策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如何正确地理解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中央“双十条”的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搞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第一条政策就是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贫下中农。应该抓住中央“双十条”的主要精神。抓住个别的具体的一条，丢了主要的精神，那不叫正确领会中央的精神，是歪曲了中央的精神。

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要不要？要。但是，只有搞好了“四清”，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贫下中农真正站起来了，真正团结起来了，中农就靠拢，把“四清”搞清了，群众高兴，就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只要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干部洗澡就搞得彻底，真正改正错误，我们就有可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是“四清”革命的结果，是检验我们“四清”工作结果的标准。开始的时候，这两个团结不能并重、不能平列，重点应该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因为，决定的环节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开始时，对“四不清”干部只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才能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四清”基础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除非是象山西大寨那样的地方，象河北的耿长锁那里，有好的领导核心的地方，可能已经团结了大多数的群众和干部。一般的不是一进村，就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和干部的。开始我们想团结基层下部，他们不跟我们团结，我们想依靠他们，他们不叫我们依靠。象我们这个大队的“四不清”干部，他们也研究政策，也利用这一条来同我们作斗争。不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吗，正合他们的要求。他们历次运动都是这样搞的，抓一个倒霉的一整，其他的人都没有了事，正合百分之九十五。可是被整的这个人不服气，因为没有实事求是，别人也有问题，为什么不整？真正的敌人，也没有整到。“四不清”的干部，在他们没有觉悟以前，也利用“双十条”中某些规定、某些辞句来抵制我们，反对“四清”。所以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首先还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这是关键。

“四不清”严重的干部，没有上级的正确领导，没有群众的监督，不可能自觉革命。工作组找他们谈话，他们就说妨碍了生产。用种种借口赶我们走。开始我找几个干部谈话，有人就说我妨碍了生产。他们一说，我们对生产就抓得更紧了。但是，不能因为他们这么一说，就把我们吓跑啦！他们是要赶我们的。谁不怕把生产搞坏呀！到哪里一告，这还得了吗！所以有些事情就不能怕，越怕问题越多。毛主席的诗不是讲过“无限风光在险峰”吗！为什么不说无限风光在平坦的大道上呢？作为革命者，就不能怕犯错误。这也怕犯错误，那也怕犯错误，到头来就要犯一个大错误，“四清”搞不彻底。怕后遗症，倒弄了个大后遗症，就是保护了修正主义的根子。过几十年，出个赫鲁晓夫，这是大后遗症，还是小后遗症？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怕这，怕那，结果“四清”搞不彻底，就犯了个大错误。怕一个指头的乱子，结果搞不彻底，走了过场，没有革命，是十个手指头的大乱子。宁左勿右是不对的，宁右勿左也同样是不对的。我有那么点感觉。在我接触到的县、区、社干部里有宁右勿左的情绪。怕犯错误，框框很多。革命又不是绣花，绣花还难免要缝错几针的。革命过程中，总要犯一点错误的，一点不犯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力求少犯错误，发现了立即改正就是啦！

所以，敢不敢革命，首先表现在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四清”就没法搞彻底。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中农就靠拢。问题搞彻底了，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主席不是说要团结大多数吗！只有搞彻底，才能挽救大批干部，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

正是由于有人怕干部躺倒，工作没人干。某些基层干部就是拿躺倒当法宝来吓唬我们，抵制“四清”。怕得怕不得？越怕，他就越躺。怕躺倒的原因是什么呢？群众没有发动起来，没人敢挑担子。群众发动起来，人材多得很，贫下中农扛起大旗来，事情更好办。躺倒是坚持“四不清”，抵抗“四清”的一种办法。他要躺就叫他躺一下，有什么了不起。他躺倒了，不革命，还有别人革命。有些人躺倒了，经过我们教育，是可以起来的。有的人因为不怕他躺倒，他倒起来了。我们桃园大队：首个副书记兼三队队长赵树春，我们一进村，他就装病躺倒了。他说有病，谁知道有什么病。开始我们还是去看他，坐在炕头上给他讲双十条，说服他：“你是支部副书记，要自觉革命，带个头吧！”几个人都去过，好话说尽，他也不起来。后来我们就有点经验了，我们有意不去理他，我们也放风，说：“叫他好好休养，不用急，等其他三个队“四清”搞完了，工作组的人，都搬到三队，帮助搞，叫。他先养病要紧。”这个办法真灵，说了不两天，他就起来了。后来，他说：“我以为你们离开我不行。”他是想用这个办法拿我们一把。事后我们才弄清楚，他原来整天闷在家里“钻研双十条”，专门找可以利用的字句，好来同我们斗争，他是搞合法斗争呀！

我们把要不要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和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讨论以后，基本上统一了认识。我们就响亮地提出：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只有领导有决心，又采取了正确的方法，革命形势才能够形成。正如卢王庄有人所总结的那样：“群众看骨干，骨干看核心，核心看工作组，工作组看领导。”看领导上有没有彻底革命的决心。

工作队和工作组的同志们，对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认识，会有不同意见的。这些不同的意见，在革命的实践中，是能够得到统一的。因为，革命群众的革命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桃园大队的“四清”，曾前后掀起了三次放包袱高潮。

第一次放包袱高潮。“四清”开始时我们开了公社三级干部会。这次会是三级干部加上贫下中农代表。原计划让公社干部在这个会上放包袱，开个好头，可是，公社书记讲得一般。这个公社，大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没有搞出什么来。不过，问题也比较严重，就是吃吃喝喝，糊里糊涂，姑息“四不清”干部，工作飘浮。工作队队部把它们总结为新“五风”(吃喝风，糊涂风，护短风，散漫风，老爷风)，的确是这样。公社有个副：书记，叫薛保玉，我们一进村，他就讲了，在这里搞“四清”，搞不出名堂，我们公社没有什么好检查的，搞了，检查了，也不会生动。他在会上检讨得很不好，不疼不痒。大伙给他提了不少意见，说：“你整天骑着新车子，穿着‘多米索’(绸料衣服)，到处转，哪里有好吃的就到哪里去，有一壶酒，有一盘菜，就是好人，受了酒肉包围，把我们贫下中农忘到脑后去了”；“上级提倡劳动，你车子后边就带着个锄头，挂了三年还是新的”；“把集体耕地，划成你们的保命田，你们带头分散集体的耕地，说是为了保干部自己的命，社员的命还保不保？”“你是社长，三面红旗，丢了两面，人民公社这一面也没有扛好，你怎么对得起贫下中农，怎么对得起党，怎么对得起毛主席！”提意见的人，有材料，又有分析。开始还是薛书记长，薛社长短，后来就说薛保玉变成老爷了，变成公子哥贾宝玉了。这一批评，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原来我们想，发动群众给生产队干部提意见，挺困难。让大家给公社干部提意见，不知该怎样困难呢！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生产队的干部，是社员的顶头上司，怕提了意见，不给派工，或派不好做的工，给穿小鞋还得让人讲不出来。公社干部离得远，不知道多少日子才转到村里来一次，所以对公社的干部敢提意见。贫下中农代表敢提意见，“四不清”干部在会上受到很大教育。唉呀！敢给公社干部提意见，我们不交代可不行啦！我们桃园大

队“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关景东从会上回来说：“会上老农的发言，真叫人感动。批评公社干部时，就象爹娘发现孩子不争气时一样，又是恨又是心疼。”又说：“会上每叫一声薛保玉，我的脊梁骨就冒凉风”。这说明，许多贫下中农代表敢提意见，“四不清”干部认识到不交代过不去。在会上，有几个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交代得很好。一个是老鸦窝大队的贲少先，一个是桃园的关景东。关景东讲的时候很动心。他说：“过去，我爹第一次带我赶集的时候，我给背了东西，劳动了，到集上给我买了两块煎饼，我爹自己什么也没舍得吃，饿着回来。现在，我给队里办事，就大吃大喝了，上高价饭馆，一顿就吃十块八块钱，根本就不知道省吃俭用了，完全是忘本了。”关景东表示要决心改正，还当场提出退赔计划。这次会议开得还算好。好的是有人敢给公社干部提意见，提得很好，有推动作用。缺点是，公社干部一开始就笼统地检查了瞒产问题，讲了一大段只顾社员，不顾国家呀2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没有摆正呀！结果，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依样画葫芦，也是大讲只顾社员呀，等等。我们会后就感到这是个手法，他们这不是检讨，是有意讲给社员听，收买人心的，“为了大家，干部才犯了错误呀！”“搞‘四清’就要追咱们的瞒产呀！”有意堵住社员的嘴。我们及时地把他们这个手法揭穿了。

公社三级干部会，对桃园的“四清”有推动作用。干部开始洗澡交代问题，也互相搓澡，互相揭发。一般性的错误，大家都有份的事交代了。大的问题，有攻守同盟的，还没有交代。吴臣开始洗澡，但不老实，先说没打过人，后来又说打了两个三个，一点一点往上加，严重的问题都不交代。有的干部在开过这次会议以后，就偷着来找我们，揭露吴臣。以前，一直都不敢讲。现在他们偷偷来找。可是，吴臣也发现了这一点。他知道干部一开始揭他，坏事就要露出来了。加上关景东在三级干部会上检查得比较好，他自己在会上讲了几句，不受欢迎，这样，吴臣就估计到可能要迫他的问题了。他怕关景东这些人揭他，就想转移目标。于是，他就到处散布民兵连长关景东的问题严重，说了很多事，还叫大队长卢彦来以四队社员的名义，给我们写匿名信。根据匿名信上讲的材料和吴臣散布的材料，关景东的问题，起码是个“万字号”。有人揭发，我们也不能一下子说他就没有这么多。我们就一桩桩，一件件，认真地查对。为了查清关景东的问题，我们派了一百三十八个人次，出去调查。调查的结果，还是关景东在第一次三级干部会上自己交代的那些属实。关景东的事情不少，有两个七百，七百斤粮，七百块钱。这和原来搞的那次“四清’比较，多了。那一次关景东是重点，搞出二百块钱的事情，还不服气，不退赔。为什么他不服气？当时别人的“四不清”都不清，单清他一个，单整他，他怎么会服气。我们搞了他个双七百，他倒心服口服，退赔得很快。有人揭发，有人写匿名信，我们采取的态度是，谁的意见都听，吴臣说关景东如何如何，我们也听。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完全是给我们制造麻烦，混淆是非，企图引导我们搞个乱七八糟。我们采取了正面、反面意见都考虑，有鱼没鱼淘干了看，谁问题多就是多，少就是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谁的“四不清”都要弄清楚。

这时候，有的人积极要求加入贫协，贫下中农的队伍逐渐扩大，中农开始向贫下小农靠拢。我们吸收了一些中农积极分子到骨干队伍中来。这时，基本上还是背靠背提意见，我们把干部检查的材料转达给贫协，由贫协讨论分析，哪个说得对，哪个不对，然后再让干部继续交代，洗透。有很多问题，干部说了，我们没有办法辨别是真是假，必须依靠贫协，依靠群众，由他们分析和发现问题。把干部检讨的问题向贫协一说，对贫协也是个鼓舞。“嗳呀，干部检讨了。”他们的腰板也就逐渐硬起来。“我们团结起来，当家作主了，管事了。”

“四清”中期，在抚宁县城召开了工作队会议，传达了华北局太原会议精神和省委要坚决搞彻底的指示，工作组回村后组织了第二：次放包袱高潮。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大规模的查证相结合。虽然以前我们是搞边查账边查证，但是，查证工作到底还是落后了一步。查证工作很重要，不经过查证，很多揭露的材料，和查账时发现的问题都不能肯定，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能促使干部承认错误。这个时候，就特别抓紧了查证工作，又注意了随洗澡随解放。有一些干部“四不清”问题不严重，交代差不多了，就把他们解脱了。这个大队的问题虽然严重，也真有好干部。多少年来一直参加劳动，没有多吃多占。三队有个副队长叫张力，算来算去他就是两斤挂面的问题，而这两斤挂面还是

队长说照顾干部们而发给的。象这样的干部我们就表扬了。这个张力后来当选为生产队长。还有一些干部，只是几十块钱的事情，一块吃喝了，或一块分了些东西，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就根据他们检查的情况，经过贫协和群众同意，让他们下了楼，有些还吸收到贫协队伍中来。

争取了多数，逐步壮大了“四清”革命队伍。力量对比，发生了显着的变化。群众和干部揭露出吴臣的不少问题，也突破了一批一般性的攻守同盟，犯有一般“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大体都交代清了问题，贪污比较多的，也有一部分人交代清了，剩下的都是一些难搞的，群众叫做“钉子”，就是死不交代的人。

还要说一下，这一段工作是有曲折的。工作队到抚宁县去开会，正是一九六四年新年，也正是运动的高潮时期。经过开会学习，工作队的思想有提高，正如群众的话，“磨镰不算误工”。但是，正在运动的紧要关头，工作队不该到县城去开会，特别是不该去过新年。革命要紧，过不过年，会不会餐有什么要紧。这时候工作队离村，必定会使工作有些回生。当时我衣]另外三个同志，没去县城开会，请了假，留在村里，同社员一块劳动，串串门，表示我们没有走。即便如此，吴臣还是钻了大多数工作组的同志去开会的空手，进行活动。他向干部封官许愿，说：“咱们将来工作怎么做，我想好了，将来专职书记就我一个人，你当什么，他当什么”，……封了一批官。他这样做是怕干部揭他的底，为了堵大家的嘴。同时还大肆宣扬蒲蓝大队“四清”搞糟了。蒲蓝“四清”本来是搞得比较好的，周围村的贫下中农都很赞扬那里的“四清”。可是“四不清”的干部在没有觉悟以前，却故意说蒲蓝“四清”搞糟了。这里也有个搞好了和搞糟了的问题，贫下中农说“四清”好得很，而“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就说四清糟得很。缺点错误总会有的，因为那里是第一次试点，我们这个试点也有缺点错误，这还是在蒲蓝试点以后搞的呢{吴臣说蒲蓝搞糟了，省委工作队走了，留下一个烂摊子，推给县里了。陶克日(县监委书记)在那里拔不出腿来了。还说祖荣功(蒲蓝原大队书记，蜕化变质，撤职了)现在挺起来了，省里的干部，县里的干部，都来央告他，还让他千书记，祖荣功高低不干。他就散布这些东西，意思就是我们早晚也要央告他。他还向“四不清”干部说：“让他们(工作组)搞去，反正他们不给我搞清楚，我就拉住几个不叫他们走。”吴臣以为工作组的人都是急于回城市的，他想拿这话威胁我们。我们没听他这一套，而且批评了他，揭露了他的问题。根据他活动的情况，看来看去他的问题比较严重。我们把掌握到的材料，听到的情况，索性都交给了贫下中农，交给了社员，由他们讨论。这一讨论，更多的事实揭露出来了。

原来不是说吴臣是贫农出身吗！不是的。他父亲是小商小贩，他自己是捣动小买卖，卖破烂，跑单帮，一贯吃嫖赌博，无所不为，同一些流氓分子混在一块。政治上的“四不清”严重，一贯重用地、富、反、坏，许多好差使，副业里的重要位置，多挣工分的活，都安排给地、富、反、坏。他到底打了多少人？我们查清楚的，有人证的，是三十一个人，三十九次，其中有一个贫农被他打了七次。他打的这些人，除了一个曾参加过军统，一个是富农的儿子，其余都是贫下中农。他为什么专打贫下中农呢？很值得深思。一直到蒲蓝大队“四清”试点以后，我们进村以前，他还打了两个人，而且打的时候还骂：“我就打了你了，你到蒲蓝去找工作队罢，找你们的祖宗去吧！”全村男女老少几乎都被他骂遍了，谁见了都怕他。干部们也怕他骂，开起干部会来，干部就是不敢吱声，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搞不对劲，提个什么意见，他就骂祖宗三代。他自己检讨说是脾气不好：“我这个人就是火爆子脾气，谁一跟我说什么我就蹦起来了”。好象他还是为工作。难道仅仅是脾气问题，为什么单打贫下中农，偏偏不打地、富、反、坏？当然我们不是提倡打地、富、反、坏。被他打过七次的贫农，群众说那是他的“小菜”，干部里也有挨过他打的，有一个挨他骂最多的干部，也是他的“小菜”。他打人是给别人看的，以便他好统治群众。他经常和别的干部说；“你们当干部非有点迫力性不行。”他讲的迫力不是革命的魄力，是压迫性。他说：“社员是属破车的，三天要不收拾就不合辙。”这是他在干部会上多次讲的话。他的眼睛里哪有群众，哪有团结大多数呀！就是欺压贫下中农。对地、富、反、坏却非常体贴。贫下中农的房子他不盖，一九六二年给伪保长盖房子，他亲自去组织、拨工和锯公家的树。后来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过去他从长春跑回来，无依无靠，伪保长借给他二十块钱，批准他开了个小烟铺，现在，

是报他的恩。吴臣做为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不报共产党的恩，不报贫下中农的思，而是报伪保长的思。要讲他的经济“四不清”问题，是最严重的，又不算是最严重的，由他自己贪占的大概一千块钱，一千斤粮。倒卖了自行车五辆，缝纫机六台，手表三块，棺材板四副半等等。一贯弄虚作假，贪赃枉法。他把两个弟弟都安排到副业里。一个是搞木业加工，一个搞运输，都是最能拿钱的差事，都是给他弄钱的，他这两个弟弟，都是买卖人出身，最会投机倒把，他们给吴臣弄了多少钱物就不知道了。谁同吴臣谈，他也不检讨。这个人我同他打交道不少。我说：“你搞这么多鬼，到底是怎么回事？”他说：“贱买贵卖，人之常情。我一向是捣动买卖的，我脑子里老想捣动。”“那两年自由市场刚一开放，我真觉得当这个支部：书记倒霉了，我要不当书记，哪天不挣个十块八块的。”他当面就是同我这么讲的。高价卖粮票，高价卖粮食，他说没错误。我说这是错误，他说：“你不懂基层工作”，“只要我有粮食就换得了粮票，卖粮票和我卖粮食是一样，给集体，给个人，我都是这样干的”。他一口咬定高价卖粮票不是错误，硬是不承认错误。

这个人对上是很会阿谀奉承的，这次对待我们，开始也有点奉承，我们不吃他那一套，他就同我们对立，闹别扭。他给上面的一些人送礼送钱，他有一套对付上面的办法。比如一九六二年发现四队瞒产，县人委办公室的副主任吕树环，到这个村来查瞒产。他一听说，就跑到场里告诉生产队的干部和群众：“你们这粮食还不收，县里查的人马上要来啦！连夜把粮食藏了。”群众就很害怕，说县里来查怎么办？他说：“你们不要害怕，只要你们不讲，他没个知道。”这个检查的人，刚一进村，他就好吃好待。他从副区长苏长吉那儿打听到这个人经济上不富裕，于是，就从队里借给他一百块钱，然后给他一个填好的上地、粮食数字的表，这个人就走了。到我们进村，他送的这一百块钱账上还有。我们进村以后，吴臣替给还上了。他有空子就钻。他打听了，缺钱的给钟，要粗粮换细粮，他就给弄细粮，也不找价。这是对上。对下，则是敲诈勒索，谁要让他办点事，央求他，书记长、书记短，叫甜了，他可以给办，要不然就得送东西。回乡的上户口，起码得给他孩子送双皮鞋。谁回乡来，都得这点什么东西。他的老婆，原来在长春是个拉帮套的，就是暗娼。一解放，她混得作了第一任妇联主任。她的手特别“长”，这次查出来她贪污上改果实很多。后来，虽然她不当妇联主任了，可是，她常到一些社员家去串门，特别是常到几个单身汉的家里，看见她喜欢的东西，她就拿人家的。发烟了，她就把烟拿走点，发布票了，就把布票拿走点。死了人发的布票，她从中也要扣几尺！吴臣夫妇就是这样一对，真是有缝就钻，听起来简直不是我们的人。所以群众都说，吴臣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办的是国民党的事。群众指出了这一点。共产党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应该是听党的话，贯彻党的政策的。吴臣完全不是这样。他对“四清”运动一直是抵触的，到处说“四清”革命的坏话，甚至破坏“四清”运动。吴臣一直不好好检讨。他说，就是打人有点错误，别的没有错误。我们在他打人这件事上还上了他一次当。他打人，我们调查了是三十一个人。他开始交代说两个，三个，七个，后来他一下就交代他打了三十五个。后来才知道他说过这样一句话：“嘿，这次我走在前边等着他们。”有一次开会时，有个干部引用他说的打了三十五个人的数目，他就抓住这一点往公社告我们的状，说；“我没打三十五个，冤枉人了。”他故意说打了三十五个人，我们有人就用了他这个数，结果让他抓住我们的把柄，“你三十五不实！”他的名堂多极了呀，实际真不是三十五个，而是三十一个。三十一个同三十五个性质是一样的。

“四清”进行到这时候，剩下的少数人，包括吴臣，都是一些难搞的。这就到了攻坚的阶段，普遍地出现了顶牛。支部书记吴臣，副书记、三队队长赵树春，他俩一个是顶着的，一个是躺倒的。二队是“关家五兄弟”掌握实权的队，一切命脉都在这五个兄弟手里，这个队里问题最多。可是，副队长关希颜(五兄弟的头)和副区长苏长吉是千兄弟，他的老婆是苏长吉的姘头，就是这么个关系。反正苏长吉一来，他就搬到饲养处去睡。关希颜新盖了三间房子，是全村最高大的，他原来还准备要盖一座门楼，要比全村的门楼都高，后来，苏长吉告诉他，要搞“四清”了，先别盖。因为有这么个门楼的故事，群众在看过《夺印》以后就管二队叫关家门楼了。关希颜盖房子的木材是苏长吉给买的，据说还拨了三立方米抗早做水箱用的木材给关希颜盖房用，群众的意见可大咧！关希颜这个人，偷摸渗漏什么事都作，

大的也拿，小的也拿，成口袋的东西他偷，一点一滴他也不放过。群众管他斗“手上沾满浆糊的人”，走到哪里也得沾点走。在一九六一年困难的时候，他还公开抢人家的东西。附近村的一个小学教员，是个妇女，在地里开荒种地，把棉袄脱下来放在地头上，棉袄兜里有一百块钱，还有一些粮票。他赶着大车从那儿路过，就把人家的棉袄抢了。后来人家告到公安局，当时他只退回棉袄。这次“四清”才退了粮票。苏长吉还批评了公安局，说什么公安局怎么能扣党员，把他给要了回来。所以群众都怕这个关希颜。我们刚进村时，这个队的社员就问过我们工作组：“你要我们提意见，你是作什么工作的呀？”我们这个同志回答说，在公社当社长兼副书记。群众说：“那你还叫我们提的什么意见，公社是归区里管的，我们这里的关希颜，人家上边是有靠山的，副区长苏长吉就是人家的根子，那你能管得了吗？我们的意见，给你提了也是白搭。”我们那个同志当时答得好。他说：“我这个干部管不了区长，可是我是贯彻党中央‘双十条’的呀，我们这个工作队是林铁同志挂帅，我是‘官小根子硬’啊！”所以，根子有两种，真革命，上级是支持我们的。咱们别当支持严重“四不清”那号的根子，咱们要支持真搞革命的那些人，给他们撑腰是应当的，必要的。为什么问题最严重的那些干部现在顶着牛？原来，正在这时，苏长吉给他们捎来了话。关希颜的弟弟关希成(赶大车的)到榆关去赶集，苏长吉对他说：“你给我捎话回去，告诉你哥不要怕，要顶住，早晚有咱们说话的时候。”苏长吉是现任的副区长，我们是省委派去的工作队，在搞“四清”，这位现任副区长在蒲蓝大队试点时还参加过“四清”工作队，他对“四清”是个什么态度呢？不是让干部自觉革命，是“别怕”，“顶着”，“早晚有咱们说话的时候”。群众听到这些话，还能不增加顾虑呀！吴臣、关希颜之流还会老实检讨么！对这个问题，我们采取了认真负责和坚决的态度，多次给群众撑腰，要群众不管谁的问题都可以讲，谁的“四不清”都要清，谁也不能保护“四不清”，不管他是苏长吉还是李长吉。

在这时候，我们又掀起了第三次放包袱高潮。这是在太和寨又开的一次公社三级干部会以后，掀起来的。这次三级干部会，林铁同志亲自参加了。在这次会上，林铁同志讲了省委的决心，要我们一定把“四清”搞深、搞透、不乱、不漏；号召干部自觉革命，号召群众帮助干部洗澡。这次会上一些有严重问题的干部放了一些大包袱。虽然有严重错误，只要彻底交代，决心改的，大家都是抱着欢迎的态度。变坏的可以改回来。吴臣的问题，经过再三查对，实在严重。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其他的基层干部和工作组的同志，对吴臣的问题都非常气愤。他打了这么多人，胡作非为，敲诈勒索，贪赃枉法。这样的人是否可以当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呀？该不该撤职呀？以前没弄清楚，不好说撤，现在已经知道了，该怎么办？我们工作组的组长王兴武同志，他不是一直说支部书记听话吗，后来他转变了。我们动员他到群众中去，去听群众的意见。他听了两次群众哭诉着揭露吴臣的事，就有了变化。他来找我说：“过去我只晓得吴臣完成任务好，听话，我就不知道他是怎么完成任务的。”认识有变化了，而且不断进步。后来，他也认识到吴臣根本也不是什么完成任务好。对吴臣这样的人到底该怎么办？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人认为撤职不好，想看看再说。过去不知道没法，现在已经知道了，已经有那么多材料，又查证属实了，能不伸张纪律吗？工作组、工作队队部、公社和县里的同志都讨论过。讨论以后，内定了把他撤职。桃园的贫下中农和干部，在三级干部会上对吴臣的坏事进行了系统的揭露和批判。贫下中农代表当场向林铁同志要求，说：“这样人非撤不可，我们不要吴臣这样的书记，林铁书记得给我们贫下中农作主。”这个时候，我们是要群众，还是要一个坚持错误的干部。能官官相护么？难道因为他是个共产党员，是个支部书记，作了这么多坏事，我们就不过问，保护他，原谅他？我们绝不能护短。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个区别呀！所以，我们工作队的队长宫风同志在大会上讲，好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坏干部一个也多，共产党绝不护短。对呀！他已坏到这个样子，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他这样一个坏人，不要群众呀！公社党委在会上宣布接受桃园贫下中农的要求，决定撤了吴臣的职。原来，当时的确有些公社、县里和工作队的同志不大同意撤，提出冶处理还是热处理这么个问题，怕当时脑子一发热给处理错了。实际上处理前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材料，我们一共派了三百多人次查证吴臣的问题，证明材料有二百二十页。而且，在这时候，如果是确有把握地撤他一个，对整个运动是有好处的。当然，不是呼鲁呼鲁都撤掉。错误严重，只要彻底交代，认真退赔，决心改正，就欢迎，还许再当选哪！坚持错

误那就不行，搞破坏，那就更不能容许。在这个会上，还宣布了让副区长苏长吉到桃园来做检讨。

开完这个会，贫下中农代表真是高兴极了。回村后，奔走相告。好多人说这次咱桃园可好啦，咱们得吃顿饺子。后来我们调查了一下，很多人都吃了饺子。这是河北的习惯，有了好事、喜事，心里痛快，才吃饺子。撤了吴臣，“四不清”干部的靠山倒了一个。又叫苏长吉来桃园检讨，关希颜的这个靠山也不牢靠了。所以这时候群众的情绪很兴奋，贫下中农腰板更硬了，说话吃香了，顶事了。“四不清”的干部呢？真是“爹死娘出门，各人顾各人”了，靠山靠不住了，攻守同盟，也守不住了，就各顾各了，纷纷找工作组，找贫下中农来检讨和交代。有的是干部自己来，有的是干部的家属来。这时候的革命形势，是急转直下，几个大案子都是这时候突破的。四队的粮食问题，二队的关家门楼问题，都突开了。还突开了大队木业组、米面加工厂的问题。整个大队(包括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一共搞出了两万二千多块钱，三万四千多斤粮食的问题。一千块钱以上的是五个人。

每次三级干部会议以后，我们都是大借东风来推动大队和生产队的“四清”。但是，在会前会后，我们都作了大量的动员、准备和查证工作。从土到下带好头，确实可以减少顶牛。可是，从下到上作好工作，才能保证三级干部会议开得好，只有对群众和干部做好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和认真的查证工作，才能保证“四清”搞深、搞透、搞彻底。

这几天，情况变化很快，“行市”一天天涨。积极分子和社员群众一方面是兴高采烈，另一方面是气愤填胸。揭发出来的大量问题，都是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大吃、大喝、大拿(贪污)，吃什么四鲜馅饺子、二十块钱一只的鬼子肉等等，名堂多极了，谁听起来都会有气。同时，在运动中对“四不清”干部作了大量的耐心的教育，有些人还是瞪着眼说没有了，结果又有一宗，说没有了，结果又有一件。查出一点他说一点，象挤牙膏似的，真叫人生气。不光积极分子生气，我们工作组的同志也生气。在积极分子追问“四不清”干部时，也发生了态度不好的情况。气极了，就叫“你站起来！”站了一会，其他人又让他坐下来。我们大队，虽然没有发生打人、自杀、死人的事，但是，个别骂人的现象是有的。个别工作组的同志，还拍过桌子。这些都是处于顶牛状态时，发生的事，这时更突出了。我们认为这是办法少的表现，这个方法不好。有些被骂过或者被人叫起来站得久了的人，会记一辈子的。一般说，当农民发动起来，腰板硬了的时候，这种现象也难免。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不是好办法。这时候到底搞到什么程度了，摸摸底吧，积极分子摸，工作组也摸，看还差多少？积极分子说：“噢！一丈还差着八尺，早着呢！”我们摸的底和积极分子摸的底相差很多。比如三队有个老会计张巨，我们摸底他可能有一千七八百块钱的事，可是积极分子非说他有七千块钱的事不可。这就证明积极分子的情绪有点过分了，说话没边了。这时工作组有的同志也想连夜搞，趁热打铁。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发现有的基层干部说假话了。说假的就对不上牙口。四个人偷了粮食，一个说偷了玉米，一个说偷了高粱，另外一个又说偷了糜子，对不上。我们有些同志就怀疑里边有假。甚至发现有人故意说假话，提供一些假材料，制造混乱，使得我们伤了些人。如，副书记赵树春，就胡说了一些人的事，我们照他讲的材料去追，追了几次，才发现是假的。这时工作组里有些同志，也不敢说这里边有假，怕翻案，翻了案不挫伤积极性吗？“行市”一直在涨，我们能往下减？有的同志也有点顾虑：“我们过去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强调一切实事求是，受了批评，这时我们再一讲是否会批评我们右倾啊！”种种迹象：积极分子的态度，工作组的态度，“四不清”干部的态度，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从这些动态看来，应该说群众已经真正发动起来了，敢讲话了，当面也敢讲，也敢查，而且已经发现有过激情绪的苗头了。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个关键时刻。群众没发动彻底，搞不透，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又有了过激情绪，如果不给以正确指导，搞过了头，就得纠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及时地研究了形势、火候和时机，我们觉得是该强调实事求是的时候了，该强调贯彻政策的时候了。积极分子当时有点过激情绪，不要批评说他们左了，这样一说就泼了冷水。我们可以正面提出，强调贯彻政策。所以，当时我们就响亮地提出了：敢不敢实事求是，就是敢不敢真正革命的问题。当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敢不

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充分发动起来了，已经有点过激情绪了，这个时候，该强调贯彻政策，强调实事求是了，敢不敢实事求是，要考验我们了。因为大多数群众是赞成实事求是的，那些喊七千，八千哪，只是少数积极分子。只有真正实事求是大家才满意，“四不清”干部才能心服口服。“四清”运动是教育人的运动，不是故意整哪一个，要作到有多大问题，就解决多大问题，作到使大家心服口服，受到教育。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样，才能真正教育人，才能真正搞深、搞透、搞彻底，达到中央、华北局和河北省委对我们的要求。这个时候，我们工作组内部的意见不统一，工作组同积极分子的意见也不统一。所以我们就花了一段时间，统一工作组内部的看法，统一工作组同积极分子的看法，说服那些有过激情绪的人，要实事求是。这要作大量的艰苦的说服工作。因为前一个时候大家都是鼓劲，这时，须要改变强调的重点了，有的人就说：“你看，宵风现在改口了。”该改口的时候，就得改口么！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还不改口，就会跟着积极分子搞个尾巴主义，犯左倾错误。

一九四七年，我在晋绥边区参加了一年土改，搞了两个地方，一个村，一个镇。参加上改，对我的思想改造起了深刻的教育作用。但是，那时我不懂群众运动的规律。我们那个工作组大部分是“洋包子”下乡，是南京办事处和北京军调处执行部的同志，这样一些同志，还配了一些地方的同志，也有些老同志参加。开始我们放手发动群众不够，领导上批评了我们，我们就认真注意了，认真去发动群众了。可是等群众起来了，该刹闸的时候我们还在提“一切由群众”，结果我们又成了少数积极分子的尾巴。我在土改的时候，这两种错误都犯过。开始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后来又来个尾巴主义，不懂得群众运动的规律。这个问题，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解决了。

真正发动了群众，真正掌握了这个火候，才能既把问题搞清楚，又少山后遗症。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提出要敢于实事求是，主动核实。本来大家也开始搞核实工作了，但认识没有提到这么高的水平。如果有假，我们就主动翻案，迟翻不如早翻，与其将来翻案，不如现在我们自己主动翻案。只有真正实事求是，才能使干部心服口服，挽救他们。如果搞过了，有了假案，那还不是有后遗症，将来别人要来搞平反的。“四清”搞不透那是保护修正主义根子，是个大错误。但是要搞过分了，也要犯错误。人家没那些事，给人家弄成那些事，弄假了，也是错误吧！这就使人为难了。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领导一个地方的革命运动，就得要处理各种困难问题。一个马列主义者，就得要学会大体上恰如其分地处理各种困难问题。不仅一个公社的“四清”运动的领导者，要懂得和掌握群众运动的规律，在大队里挂帅的，也要懂得。因为在一个公社内，大队之间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个地方发动彻底了，那个地方也许不彻底。彻底还是没有彻底，什么时候该转入实事求是，这个火候要根据很多迹象来判断。转早了不彻底，转晚了要纠偏。当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发动群众；当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就要强调实事求是。毛主席讲，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

我们应该学会，在什么时候，强调什么。有人一上来，就先讲实事求是，那群众就不讲话了。可是该强调实事求是的时候，他又不敢讲了。我们不是要总结过去历次运动的经验教训吗？主要经验在这儿。一说人家搬石头，咱也搬石头，一说人家搞夺权，咱也夺权。这是没有从实际出发，没弄清实际是什么，不放手发动群众，就弄不清实际情况是什么。该放手发动群众的时候没有放手，一看落后了，嗳呀，别右了吧，赶紧就发动。发动了，该节制时又没有节制，结果又出了左。根本问题就是没有掌握好群众运动的规律。现在中央提出高标准的要求，“四清”、“五反”要搞高标准，既要搞深、搞透，又要少出偏差，尽可能地少出偏差，缺点、错误不超过一个手指头。现在有条件了，有这么多经验可总结么！我接触了抚宁县的一些干部，他们有好多顾虑，实质上就是没有正确地总结这几年群众运动搞好和搞出缺点错误的主要问题在哪里，没有学会在运动中掌握这个规律，没有摸准这个火候。这个东西比较难掌握。我过去学过自然科学，总觉得搞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要难得多。当然搞自然科学有它难的东

西，比如搞尖端就不简单。可是，到底发烧不发烧，有个体温表一量三十八度，就是发烧了。研究别的东西也有个仪表，它能精确到几个九。群众有没有发动起来，就没有仪表可以测量。要根据各种迹象，各方面人的各种动态来学会判断，到了什么火候，该强调什么，这就是领导群众运动的艺术，是过硬功夫。要学好这个硬功夫，才能把革命的群众运动领导好。

该强调实事求是了，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我们就搞了三次核实。第一次是三定：定事实，定时间，定性质。在定的当中发现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我们都主动作了纠正。第二次搞了三允许：允许翻案、允许补充交代、允许别人来给他申辩。我们还允许当事人自己找证人。比如二队有个副队长关希英，他有一千多块钱的事。他说："别的事我都记得清楚，就有一笔卖薯秧子钱一百一十二元，我总觉得模糊，好象没有经过我的手"。问他有证人没有，他说能找。我们吗他自己去找证人。他到附近的万庄小学，找到买薯秧子的李校长一问。果然，那一百一十二元没有交给他，是交给了另外一个人。李记不起那个人的名字，说见了能认识。关希英把李校长请来了，正赶上二队开会，所有的干部都在坐。他望了望，指着另外一个副队长岳广云说，就是他。在人证面前，岳广云承认了。关希英感激得不得了，说："真实事求是呀，我坚决一次退清。"认真查证核实，也允许他自己找证明，结果，既没有漏掉一个贪污的人，也没有冤枉人。实事求是作细了，也就把工作做深了。第三次，搞了个三对口：把个人检查的材料，别人揭露的材料，和我们的调查报告，三部分东西对了一下。经过这么一核实，"四不清"干部心服口服，退赔很快。对于那些交代彻底的，退赔积极的，经过贫协提议，和群众讨论，是不是应该给他们减免点。根据中央的政策，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以前的，问题和性质不很严重，退不退，该算什么价钱。对于交代问题和退赔很积极的，也别让他们太困难。群众很实事求是，说那二年钱毛，那时贪污那么多钱，现在退，得卖不少东西才赔得上。因此，贫下中农就主动提出给他们减免。这一减免，干部感动得不得了。他们说，最困难的时候，贫下中农困难，群众困难，我们没有照顾群众，只想自己吃好的，现在我们犯了这么大的错误，给我们改正机会，还主动地照顾我们的困难。他们受了很深的教育。贫下中农掌握了政策，很会处理问题，作得合情合理，因为他们了解每一个人的情况。很多干部一次就退清了，这证明他们有钱，也说明他们服气。有的说："我坚决退，坚决改，宁可苦几年，好把'四清'记得深。"关希英退了一千多元，还常说："感激来自北京的救人之心，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好，挽救了我。要不然，早晚得进法院。

"四清"，只留下两个专案，一个是支部书记吴臣，他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性质，还没有最后弄清。还有一个就是副书记赵树春，他开始不是躺倒了么，所以他没洗完澡，也没有下楼。其它的都结束了。于是各生产队和大队都开了退赔团结大会，会开得很好。把"四清"胜利果实分了，除了地、富、反、坏本人以外，其它人都有一份。这样一分，对很多人又是一次教育。"四不清"干部本人分不分？也分了。其中有的干部退赔了三十块钱，分回来的是一百多块钱，以后他向我们讲："贪污了点，我总觉得占了便宜，不晓得实际上是吃了亏，因为别人贪污更多。'四清'搞得清清楚楚，就是好。"在会上，干部群众发言很热烈，一致表示要团结对敌，干群关系一定要搞好，争取一九六四年的大丰收，情绪都很高。

在"四清"和退赔基本都完成了以后，干群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群众洗澡就成了社员的要求。积极分子和社员找我们说："嗳呀，我们也洗个澡吧！我们也有些事，洗了痛快，省得是个疙瘩。"原来这一步准备要搞五天，因为，干部在"四清"初期会散布过，社员别神气，将来整完干部整社员。我们担心群众会有顾虑。所以想先作动员，告诉他们不要有顾虑，要完全自觉自愿，退不退也由自己，还准备了典型发言，带个头。实际上这个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有的队开了两个晚上的会，群众发言热烈极了。一个叫陈询的军属讲："我们是得洗洗澡，过去是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就缝了两个大裤兜。裤兜都装了东西呀，现在大队干部、小队干部都检讨了，退赔了，我们也该洗个澡呀"。群众洗澡会，是谈心会的形式，开得很活跃，无拘无束，什么样的事都说了。各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的包袱一共放了几百件，包括小偷小摸呀，搞了一两次投机倒把呀，什么歪风邪气呀，迷信呀，买卖婚姻呀，光顾自己不顾

集体呀，都讲了。他们说，不这样洗洗，集体经济就办不好。不少人还把他们拿了队里的小农具、小家具，自动地往队里退。看起来，有些事情得水到渠成，开始硬搞群众洗澡是不行的，干部洗了澡，群众顺气了，自然也就洗起澡来。

这时，我们分析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基本上差不多了。标志是什么？第一，群众所提出米的很多问题，弄清楚了。第二，贫农下中农的觉悟提高了，贫协的大旗树立起来了。贫下中农的态度，从开始的观望不满，后来到敢于揭发“四不清”，最后做到敢于当家作主。第三，大多数的“四不清”干部放下了包袱，从开始抵触，以后发展到认错，到最后是感激而且积极参加生产和工作。如果我们工作作到家了，他们是真感激的。当然这其中不包括吴臣、赵树春两个专案。

做完了这段工作正是腊月二十三日，群众要过年了，我们工作队的同志都回原机关休整学习。大多数干部和群众都高高兴兴地过了个春节。

现在，我把前一段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简单地重述一下。

第一、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少奇同志的这个指示很要紧。我们不是讲总结过去运动的经验吗？这就是很重要的经验。有的时候没弄清情况，听到别人夺权我也夺，不管该夺不该夺，都是夺。现在的情况是明明该夺，有些单位和地方，阶级敌人已经掌握了领导权，又不敢夺了，如果该夺又不敢夺，就是没从实际出发。“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从我们这段工作看，非常重要。

第二、要从实际出发，但是，如何才能弄清实际情况？只有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弄清实际情况是什么。要正确地理解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搞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第一条政策就是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贫下中农，不要有清规戒律。

第三、要正确地掌握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火候。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有过激情绪时，就要很好地掌握火候，要强调敢不敢实事求是，：之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在开始，“双十条”要总的讲一下，要讲好，让群众了解中央“双十条”说的什么，总的精神是什么。但是，有些政策是不应该在开始时就强调的，开始强调这些，就会限制了群众，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就应该强调贯彻政策，强调政策界限。领导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过硬本领：就是要既敢于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又会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有了些过激情绪时，能够及时地转入强调实事求是，强调贯彻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央所要求我们的高标准，既搞深搞透，又不出乱子或少出乱子。

第四、工作队应该清醒。有个谁影响谁、谁改造谁的问题。“四清”改造“四不清”，还是被“四不清”所影响和改造。“四清”工作队应该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政策精神去改造一切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势力，以及它们在劳动者(包括干部和群众)中间的影响；并且在改造世界中，改造我们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在这几个问题上，我们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革命的实践，教育和锻炼了我们。

今天讲到这里。但是，吴臣是个什么样的人？桃园的支部是什么性质的？有没有隐藏的敌人？幕后的指挥棒在哪里？有些重要人物还没有出场。明天再接着讲。

（三）

春节后，进村情况就不同了，群众真正欢迎我们了。前一段工作因为集中搞“四清”，阶级教育做得不普遍、不深入。干部回避政治“四不清”问题，群众揭露的也不太多。这时，除了戴着帽子的四户地主和富农以外，其他隐藏的敌人是谁，他们的活动如何，还搞不清。虽然有些怀疑，但是没有真凭实据。政治上的“四不清”搞不清，经济上的“四不清”也不可能很彻底。这两者是有密切联系的，经济“四不清”问题多的，大体都有政治“四不清”问题。不彻底查清上敌人的当，提高阶级觉悟，洗手洗澡也不会很彻底。春节后，我们开始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发动群众忆苦思甜，通过写家史、村史，登记阶级成分，转入揭露地主、富农的活动。干部集小到一块座谈“四清”收获，挖“四不清”错误的根源，怎么变坏的，受了谁的影响，搞思想归队，然后转入揭露敌人和反击敌人。

这里土改时敲锣打鼓，却没有搞真正的群众运动。贫下中农觉悟没有提高，政治威信没有树立起来，地主的成风没有打掉。有些人见了地主、富农还是恭恭敬敬的。成分不清，阶级阵营混乱。他们是怎样定成分的呢？那里每人平均上地二亩七分，不进不出就是中农，进地就是贫农。好多小商小贩和从城里跑来的地主、富农也划成贫农。二斤挂面就能隐瞒个成分，简便极了。副区长苏长吉是当时土改工作组的干部，建党那一段是他主持的。土改的根子扎得不正。这个地区是拉锯区，加上一九四六年我们搞了一下开仓济贫就走了，伙会(还乡团)一回来，搞了反攻倒算，贫农吃了苦头。刚解放的时候，一些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起来，有的分给他们房子也不敢要，起来的多数是能说会道的、从城里跑回来的，不农不工的那么些人。所以，根子扎得不正。苏长吉发展的第一批党员是八个，其中四个是根本没搞过农业的。他们是怎样入党的呢？据他们说：“苏长吉召集我们八个人去开会，我们不知道是有什么事，吃了一顿烙饼炖肉，吃完以后他向我们说，从今以后你们在党了，以后有什么事可得保密。”说起来和笑话一样。第一任支书叫岳广玉，小商贩出身，土改时捞了一笔土改果实，结束了土改就跑到东北做买卖。前两年回来，在村子里卖梨，一直没有参加集体的农业劳动。第二任支书赵王林，也是小商贩，还有历史问题，当过奉军的排长，给伙会头子做过保镖的。现任支书吴臣是个流氓，入党后也私分了土改的果实。我们刚进村时有的群众就说过，土改时没分到什么好东西，把挑剩下的分给了我们，好多金银财宝我们都没见到，弄浮财的时候，干部就往兜里装。这个说法也许有点夸大，但总是个问题。一问干部，他们就说当时卖了，分了钱。这一次吴臣和他老婆交代，他们夫妇就贪污了五十多颗珍珠，一副金镯子，三个金镏子(戒指)，一个翠簪子，两包袱衣服，一个座钟，等等。不仅他们贪污，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也贪污。一个叫林宝的挑了一副最好的棺材板送回老家去。苏长吉也搞了金镏子、衣服等。吴臣贪污土改果实后也出去做生意，同有顽伪伙会身分的人合伙，跑了一趟天津买卖旧衣服，又跑到北戴河做了八个月的生意，没带党的关系，回来还当了支书。

土改就是这样搞的，所以，干部和群众敌情观念模糊。开始搞忆苦时，：有些贫农怕说过去的苦，丢人，显得自己没本事似的，不理直气壮。有的人怕露出家底薄，担心儿子将来找媳妇要困难。驻三队的工作组和积极分子都说：“我们三队是有名的富队，四队是有名的穷队，仇大苦深的都在四队，是不是诉苦的时候从四队给我们借两个诉苦的人来，带个头，受受教育。”还说：“对敌斗争最好是大队范围统一搞，因为三队的地主、富农，老的老了，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没啥可斗的。”好象这个队对敌斗争就搞不起来。不仅积极分子讲，工作队的同志也这样讲，因为他们没掌握到多少材料。这说明要搞好阶级教育也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把阶级教育工作认真做深做好，这是个基本建设。搞忆苦，开小会，唠咯(谈心)似的，这样形式好。在小会上讲讲过去妹妹怎么卖去童养，自己当时怎么冷，没有鞋穿，冬天放牛时把脚踩在牛粪里取暖。一讲，把别人感动了，自然地就纷纷说起在旧社会的各种遭遇。开大会不行，因为讲到最痛苦的时候声音很低，有时泣不成声，别人听不见，会场秩序不好，效果也就不好。个别访问也搞得比较成功，我们动员了很多青年，访问完了就帮助写家史。可是也出过些问题。青年们很积极，一听说谁家仇大苦深都往那一家跑，一班来好多人，一班挨一班。有的人不爱讲，还老找他们，他们就紧张。四队有一家贫农，儿子只能讲一点，母亲最知道过去的苦，可是，母亲在解放前当过女招待，是否被人污辱过，我们不知道。好多青年一班一班地到他家访贫问苦，越问她越不爱说，见人就躲。恰恰她儿子打井受了点伤，我和几个同志去看望，一进去她就说：“儿子受伤了，我不能讲话

了。”我就安慰了她，劝她别着急。送了点止痛药给她的儿子，什么也没问就出来了。我们一出来，又去了几个访问的。我们一发现这个情况，立刻就通知负责青年工作的同志，不能这么个搞法。本来是好事，想受到教育，人家恰恰有不愿讲的，就不要硬追着让人家讲了，自发的积极性太高也不得了。青年们确实作了好多工作，写了二十几篇家史，几十篇感想，对青年的教育确实很大。诉苦会上一听，几个小青年晚上一夜不睡觉，画连环画，还配了快板诗做说明，硬是能把几个关键问题抓住，会画的就画，会编的就编诗，画和诗都很动人。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什么人才都有。我们那个村子搞了七套连环画，有四套是忆苦的，三套是揭露敌人活动的。把这些东西一展览，群众看了非常成功，说，开会听报告不如看连环画动人，看着看着就掉了泪。看了贫下中农在旧社会的那一片凄惨景象，好多人都说：“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比讲十天都强。”有些青年看完了以后向我们讲：“过去我们看了一些电影，看了一些小说，总觉得那些故事是编的，半真半假，那晓得在我们这个村里，天天见面的人，就有这些事，而且比电影、小说上说的，贫农苦更大，坏人也更坏。”

经过普遍忆苦，群众和干部的阶级觉悟提高了，真正苦大仇深的人出来讲话了。阶级敌人活动的材料大量地揭发出来了。就说三队吧，原来说要借人来诉苦，结果有几个人诉出的苦，听了真是叫人心酸。有一个饲养员王振元，当了二十几年长工，小的时候要饭，地主逼死他的父亲，母亲又自杀了，饿死了弟弟，妹妹送去童养，他本人受尽了苦。可是，这几个诉苦的都是中农，又都是当了十几年、二十年长工。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些人一辈子省吃俭用，积了一点钱，土改前夕，地主消息灵通，大量卖地，逃避土改，二斗粮食可以买一亩地，贫雇农觉着好便宜啊，就买了不少地。扛十八年长活的王兴然，把积蓄的钱买了十亩好地，土改时被定为中农。他买了“上当地”，买了个中农成分。是他一个人吗？不是。王振元也是几辈子雇农，也买了“上当地”。有的人一九四八年秋收以后买的地，年底就解放了。既有人买地，就得有人卖地，有人买了中农，是不是有人“卖”掉了地主成分？我们就抓住这一环不放，原来怀疑几户成分有问题，可是没有证据。这个时候我们就讲，凡是于了一辈子长工，当了十几年长工，土改前夕买地的，拿出地契来，有证人也行，可以给他们降成分。这个时候经过阶级教育了，大家都愿意成分低，就呼噜呼噜地往外拿地契。地契一出来，好了，凡是买了“上当地”的人，谁买的谁卖的，是哪一年，都登记清楚。不少贫农、雇农因为买了“上当地”定成了中农。四个队的材料一对照，卖地的是谁了一下子就集中在赵家三兄弟身上。他们哥三个在解放前两、三年内共卖了二百多亩地，两户订成中农，一户跑到了北京，没有订成分。地契花样也很多，比如地契上写的卖地人，这一张写名，那一张写号，另一张就写堂号，还有的写子女的名子。有的，卖地人写的是他的名，中人写的是他的号，其实都是他一个人。有些地契上买地用的粮、款数目都没有添写，是空白的。地主是准备变天的时候，这些地契都不做用的，还想要回来的。这证明地主为了应付土改，绞尽脑汁，骗了贫下中农，也骗了我们政府，拐了一笔钱，一批粮食，更重要的是卖掉了地主成分。

赵家三兄弟中有一家叫赵学瀚，一九四六年他有八十五亩地，仅一九四七年就卖了六十五亩，土改时只剩十八亩六分地，全家七口人，按二亩七算恰恰不进不出，还欠一点，给他定了个中农。一定成中农，从初级社时他就作了会计。我们进村的时候，他是大队的现金保管兼四队的会计。“四清”开始时，一个群众说，干部中比较好的，就是赵学瀚老会计，人家学过成本会计，账码清楚，什么时候找他都是好应承，从来没向我们说过硬话，这个人没问题，信得过。也有少数人向我们反映，赵学瀚家过去是首户。我们一直怀疑着他，但是，没掌握到他的具体材料。为这个事，我们曾几次问过支部。吴臣当时告诉我们：“赵学瀚的中农成分没问题，人家没进地，也没出地，劳动了两三年。这几年是不许发展党，要许发展党，我早就把他吸收入党啦！”其实，赵学瀚从土改前三年算，有八十五亩地，全部出租，全家住在长春，家里没有一个人参加过农业劳动。一九四七年听说东北解放区搞土改，赵学瀚回了一趟桃园，布置他的伯父等赶紧卖地。他是我军围困长春时跑回来的，回来就装穷。时间不对头，长春什么时候围困，什么时候解放，他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劳动了两三年？一查毛选注解中长春解放的日子，证明他就不可能在土改前劳动过两三年。从长春出来，他没回这个村，等土改要结束的时候才回来的。后来我们问吴臣“你说他劳动了两三年，是什么时候劳动的？”吴臣说：“土改以后，合作化以

前他不是背过粪筐吗！”这显然是有意替他隐瞒。“四清”阶段时，我们同赵学瀚谈过几次话，动员他把自己的问题说出来，也揭露其他人。他是怎么谈的呢，他说：“我都懂得，已经到什么时候了，我还能不说吗！我这个人是最胆小的，老思想，怕事，和绵羊一样。”接着又说了一句“象羊羔一样！”一清查上地买卖的情况，真相大白。羊羔式的中农，原来是用高级伪善的手法，骗到了个中农成分，混进我们的干部队伍。羊羔是外皮，实际鬼得很！工作组有些同志都没想到这么复杂。从开始一直到划阶级的后期，四队的一些社员还说：“别动赵学瀚的成分，我们还要他当会计哩！”工作组也有的同志觉得动不了。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动或不动，必须拿出材料来，是中农得有材料，是地主也得有材料，不然，我们没法向省委交代。实际上赵学瀚钻进干部队伍以后，他是吴臣的后台，大队的经济账他起码掌握了百分之九十五，所有弄虚作假都是他出的主意。表面上装穷卖傻，迷惑群众，实际上出谋划策，出坏主意的就是他。一直到“四清”时，干部交代哪个，不交代哪个都是他提醒。指挥棒就在这儿！吴臣坏，可是吴臣后边还有人。吴臣作检查，不会写，就找赵学瀚替他写。我们让赵学瀚揭露问题，他从来没揭露过一件事。他却常向大队长说，那次借的还有多少钱没还，还借了多少棉花。这是提醒，实际上也是通知大队长交代。我们进村前，吴臣安排如何对付工作组的办法时，都有他参加。真正掌事的是个地主。后来我们就把这些情况，还有他贪污九百多斤粮食，二百多块钱，每天给四队记完工分都偷一捆柴禾回家等等问题，都交给群众讨论，把地契给大家看，人们大吃一惊。群众说：“过去根本不晓得他有这么多地，只知道他叔叔家、伯父家有地，搞不清他搞了那么多名堂，不提高阶级觉悟可不行啊！几次运动赵学瀚都滑过去了，这一回差一点又滑过去。”因为他骗了个中农成分，儿子、儿媳、女儿一共六个，都是在外边上学、做事，没有一个在家劳动。大儿子是空军的一个上尉军官，二儿子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助教，老三在唐山铁道学院学习，老四是天津南开大学自动控制系的学生，小女儿在抚宁中学，今年高中毕业，儿媳是国营企业的会计。赵学瀚不仅自己钻进了我们的干部队伍，他的六个子女，有两个是党员，四个是团员而且有的是搞机密工作的。空军是机密，当大学助教的那个是搞尖端科学的，自动控制系的那个也是准备让她搞尖端的。因为他们是中农，劳动者家庭出身，父亲又是干部，如果这些青年表现得好些，我们的哪个机关和学校还不是都会重用他们么！机关派人下乡去调查，还不是问吴臣，给写材料的就是他们的父亲，地主本人。从桃园来看，原来的地主和漏划地富的子女基本上都不在农村，这样的户一共十六户(土改时订了五户地主，四户富农，其中有五户，全家都搬到城市去了)，他们的成年子女一共三十四个，只有三个在农村干农业活，那三十一个都是在北京、天津、东北的厂矿、企业、学校，还有的在机要部门。在北京的八个人，有在工厂的，有在学校工作的，有在军队的，他们中只有四个人登记了地主成分。所以，和平土改区一定要认真登记成分，这个马虎不得。有的地主跑到厂矿变成工人，几十年以后还不跟赫鲁晓夫一样！因此，不管工作量多大，这个工作非做不可。这不仅是给土改巧；彻底补课，还是个百年大计，是基本建设。搞革命，敌、友、我没弄清楚怎么行。凡是漏划的，进城以后都填成中农、贫农，甚至填成市贫，就是城市贫民，实际上是地主。如果我们现在再不搞清楚，以后熟悉土改情况的人就更少了。现在搞就有些吃力，十五年前的事，有好多人不大清楚了，再过多少年要搞清楚就更困难了。现在有强大的“四清”工作队，不搞，难道将来再派工作队去搞？反正我们进村就得接触成分问题，扎根要了解成分；了解干部出身，也要了解成分；搞对敌斗争也要了解成分，索性就了解清楚吧！如果农村“四清”不搞彻底，城市登记成分也难以弄清。好多人原来在农村就给定错了，农村定的贫农、中农，实际上却是地主。要到农村去查，如果没有搞“四清”，还是给证明说是中农、贫农。农村“四清”搞彻底了，城市的成分才能搞清楚。当然，“四清”中查成分，首先就是要弄清敌我。对敌人，搞清楚以后，就能更好地改造他们，监督他们好好劳动。只要真改，不搞破坏活动，还不是改造他们。我们是相信我们党的劳动改造政策的，我们有把握改造得了他们。怕的是面目不清，情况不明。至于地主的子女，我们主要还是看他们的个人表现。我们不是唯成分论者，因为有些地主子女，现在十八岁，解放时才两三岁，还让他们对父母所做所为负责吗？不是那样。主要看他们对家庭的态度，自己的表现，是不是说老实话。只要他们真正愿意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愿意做劳动者，我们向来是对谁要真正革命也不反对的。桃园大队有的地主子女，因为他们好好劳动，我们还是争取他们，教育他们，让他们来监督他们的父母亲进行改造。可是，必须说实话，隐

瞒成分不行。他们光说好好劳动、好好工作还不行，我们还得看他们的实际表现。

桃园大队一共查出了漏划的地主五户，富农两户。有个叫林树生的，开始支部介绍工作组的同志住在他家，说是中农。他有一百亩地，从来没有劳动过，原籍在齐各庄，离桃园只有五里地，有七十亩地，在桃园有三十亩地。土改时他跑到桃园来，给干部送了点挂面还有点什么东西，然后干部就向群众解释，“林树生三十亩地，定中农可以啦，齐各庄给他定了地主，如果咱们村也给他定成地主，咱村的这三十亩地齐各庄会要走的。”就这样林树生就算是中农了。他也当过于部，很会腐蚀干部。还有一个叫单立中的小学教员，是抚宁县城的地主，县城解放时，他跑到桃园，土改时，因为他在桃园没有房子没有地，就分给他房子也分了地，订了个贫农成分。房子他卖了，吴臣又给他盖了三间新房子。这次议成分，他一直和我们板，他说解放前三年他就不收租了，订不上地主。要以桃园解放时算起他确实有三年收不上租子。但是，他家在县城里，一九四七年县城解放，而他出租的土地所在的地区是一九四五或一九四六年解放的老区，一九四六年就没有人给他送租子了。他就拿着划成分的规定和我们扣。他是逃到桃园来的，怎么能以桃园的解放时间算起呢！地主也和我们搞合法斗争。我们不掌握材料，常常要上他们的当。而这个单立中，就是那个当了十几年伪职员，打了二十一个学生的人。还发现一户原来定为贫农，实际是富裕中农。降成分的是二十八户，大多数是买了“上当地”的。大家觉悟提高了以后，不仅揭露出了漏划地主、富农，而且揭露出地、富、反、坏大量的破坏活动。比如反攻倒算，变天账，挑拨干部与干部，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破坏生产等等。这样的事情都有。但，主要的，最突出的是什么呢？是隐瞒了成分，自己钻到干部队伍里，或者拉拢干部，使干部成为他们的代理人。用影响干部的办法，使干部代表他们的利益，这一着更高、更鬼。他们干什么要自己出头露面呢！他们在那里出主意，又不出面。用各种办法，腐蚀了很多干部，使干部贪赃枉法。

这个时候，有了敌情，也有了敌人，我们就开展对敌斗争。开了几个小型批判会，既训练骨干，又教育群众。根据地、富、反、坏有没有破坏活动，和破坏活动的情节，决定对待他们的办法，严重的就开了说理斗争会。开会以前群众有气。有的人提出要求动手打几拳，说：“唉呀]是不是让我们打他们两下子出出气啊，真气死人了，这么骗我们，这么害我们。”后来我们就同积极分子、贫协和社员讨论了一下，是文斗还是武斗。武斗是最简单的，一人推他们一下子也就够他们受的。我们掌握了领导权，为什么要用打的办法呢？是不是有更高明的办法，能够管制得了他们，而且有把握改造他们呢？我们掌握了大量材料，用这些材料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批判和斗争，不用打骂的办法。后来同大家说通了，就是靠摆事实、讲道理，以我们的正气压倒邪气。我们都团结起来，这一股子劲，就能压倒他们那邪气，不是用打骂的办法压倒，也不是形式上轰轰烈烈地喊喊口号就压倒，我们是理直气壮，要用摆事实、讲道理把他们斗倒。要斗得他们真正低头，就是要使周围熟悉他们情况的人，他们的亲属，他们的邻居，以前他们最瞧不起的那些“黄毛丫头”，这些人都起来敢于揭露，敢于批判。这个办法对他们挖得最痛。特别是他们自己的亲人，我们用分化的办法，争取过来了，起来和他们斗争，这个最痛。而且那些人觉悟提高了，将来可以监督他们。因为他们知道四类分子的底细，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这个办法确实比武斗、比上交更能管制他们，对他们更能监督得好，也有可能改造得好。到说理斗争的时候，贫下中农发言很踊跃，没有冷场，都抢着讲话。特别是有一个根手，就是让吴臣支出去卖杂面的那个安福海，他出身很好，劳动很好，群众也很喜欢他。吴臣把他支出去卖杂面，使我们见不着他，他自己也有点躲着我们。即便如此，我们一直拿他当根子。能开会就欢迎他来，来不了就不来，来了听也行，打瞌睡也行，一直等待他。在对敌斗争会上，他忽然发言了，他站起来讲了一大篇，气愤极了。连讲了两次。他说过去对不起大家，一直不积极，为什么呢？“我就老看着惠振林(隐瞒成分的富农，钻进干部队伍，帮吴臣做了好多坏事)是个坏蛋，你们老不动他，我就不放心，我就不敢讲，有顾虑，没有揭露他。今天，我看到这劲头，你们都看出他是坏人了，我得大量揭露。”他就一件接着一件地揭了好多材料，说惠振林和吴臣关系密切，给吴臣净出坏主意，故意破坏生产，贪污抗美援朝的捐款等等。对于不讲话的人，别忙，到一定的时候，他就讲话了。这个人从这次会起，一直很积极，到选举时，还被选为三队的副队长。最近有人来信，说他工作和劳动仍很积极。开了这个斗争会以后，给这些地、富、反、坏四

类分子都定了些条条，让他们遵守。怎么改造，怎么劳动，一个月怎么向贫协汇报一次等等。看来群众完全能够管制得了他们，用不着把这个矛盾上交。当然，我们还得经常做工作。

这时，根据地主、富农交代的，根据大家揭发的，好多地富活动和隐瞒地富成分的这些事，都跟吴臣有关。证明吴臣的政治“四不清”问题非常严重。我们本来是一再让他自己查上当，给他揭露和反击敌人的机会，那怕在以前阶级觉悟不高，丧失立场，现在检讨出来，向党交代也可以。他不查，一直没讲。是群众揭发，地富交代，把他扯出来了。比如说他给伪保长盖房这个事，就是发生在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的那个时候。他曾说过：“我们这时候管人家叫顽伪伙会，将来人家叫我们什么呀！”所以他积极给伪保长盖房，不仅是感恩问题，他是想同伪保长拉好关系。还有，他管事的时候，放走了一个叫潘其昌的，也是个伪保长。这个人同他关系密切，镇反以前跑了。在东北一个城市被公安人员发现，那个人被镇压了。这样的事儿不少。另外，还有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在搞经济“四不清”的时候，他交给我们几个受礼的清单。清单上，记着什么人送了什么礼，几斤猪肉，多少羊肉，还有烟、布、鞋。什么都有。可是地主、富农送的全没有，实际上他是收了。奇怪地是漏划的地主、富农，这些单子上也没有。这是什么问题呢？这就说明吴臣不是糊涂。我们过去是不知道情况，不知道谁是漏划的，谁是隐瞒的地主、富农，而吴臣是清清楚楚的。他知道哪些人有问题，他回避这个就证明他和地主、富农的关系，不是因为他糊涂而上当，他是明明白白的。因为一般的上当，丧失立场，总可以查上当反击敌人吧！所以吴臣到底是个什么样人呢？我们脑子里一直划着这个问号，不知道怎样下结论。原来说是个好支书，后来又发现那样不好；又说是完成任务好，完成任务的方法不好；后来看看也不是完成任务好，上边的政策到他那里就变了样；而且，他同地、富、反、坏的关系也越搞越清楚了，他不是一般的丧失立场问题。所以吴臣到底是个什么样人呢？我们当时没有给他下结论。

对敌斗争这一段，就是这样过的。只剩下一个地主没有找到。他叫高卫亭，是个国民党区分部委员，军统特务组长，在一九六一年公社集训时，要追他有没有潜伏任务，他就逃跑了，到现在仍是下落不明。我们这次追查了他的亲属和过去同他一起参加军统的人，都没追出什么。这个人很可能改名换姓钻进我们的什么厂矿或城市里。只要全国都搞了“四清”、“五反”，是一定可以把他查出来的。搞完对敌斗争，运动就转入组织建设阶段。

（四）

原来以为做了这么多工作，经过了群众性的“四清”斗争和对敌斗争，组织建设会顺利的。实际上组织建设这一段，依然不是风平浪静的，从桃园大队看，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很严重、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在太和寨会议上，撤了吴臣的职，这个大队就没有支部书记了。按常规，支部书记撤了职，副书记代替，但副书记又躺倒了。当时支委还没有改选，谁当书记？那一个人也担当不起来。当时，我们是煞费脑筋，想了个办法，说来个临时的领导小组吧。支委共八个人，里头有好几个有严重的“四不清”，还没洗干净。所以就物色出三个人，其中两个是支部委员，一个是三队副队长、党员，他们的“四不清”问题比较少，而且检讨得好，劳动也挺好。由这三个人搞了个临时领导小组。当时，公社和县里也有人讲：“你们这个叫做什么呢，按党章这是怎么个弄法？”其实这是党在革命的紧急时机必须采取的办法。比如在战争中，或在敌人统治区，某个党组织的领导成员，多数被捕或牺牲的情况下，都必须采取这种临时办法。这个支部就是那样一些人，只好从这里头选人，看谁是能够培养的，我们就教育培养他们，让他们做工作。同时我们注意了培养贫下中农的骨干，提出了要立大志，树新风。因为这个地方，过去没有好样板，谁当令，谁说了算，从来没有什么民主讨论。所以我们提出要立大志，树新风，要树立一种勤劳、朴素、老老实实、大公无私的作风。我们经常教育贫下中农，党依靠我们，这是光荣，我们就应该要靠得住。经常开一些生活会，及时地抓活思想，好的就表扬，缺点就批评。不少贫下中农觉悟起来，表现确实非常好。比如二队有一个贫协代表叫李永平，他从“四清”开始就非常好，不仅积极参加“四清”，还非常关心生产。他看到饲养员那时工作态度不太好，喂牲口夜里偷懒，他就每

天夜里来喂一次牲口。开始饲养员不知道，连搞了十几天，饲养员知道了，很受感动，说：“哎呀！到底是贫协代表啊！为什么他做的好事从来没有向别人讲，这不是我们队里的活雷锋吗！我要好好向他学习，保证把牲口喂好。”这样动人的例子很多，我们就表扬了。可是也有不争气的例子，有些贫下中农对于干部多吃多占，批评尖锐，可是他们当选为贫下中农代表，说话吃香了，也贪占起小便宜来，分东西的时候，他们也多拿点，把自己的自留地往外“拱”一点，实际上没多少，顶多“拱”一垅，闹得影响很不好。他们的心思大概是这样想的：“这时候我腰杆子硬了，都听我的话了，大概我‘拱’这么一垅没人敢说话”。得那么一丁点好处，影响却很坏。我们就抓住这些活思想、活材料，拿到生活会上。不同规模、不同范围的生活会，大家把问题摆在桌面上。培养一种好的作风。有小事在桌面上一谈，可以不成大问题。我们几次向贫下中农的积极分子讲：“你批评‘四不清’干部的时候那么尖锐，结果自己刚刚当点权，就办这些事。事虽小，可是恰恰让那些‘四不清’干部，特别是象吴臣那种没承认错误的人看笑话，他们等着你们犯错误呀！”吴臣早就讲过：“瞧着吧！他们上了台，比我还厉害，还霸道”。所以，对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抓紧教育很重要。经常教育他们，不要占小便宜，吃大亏，丧失群众对他们的信任。那些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多数原来是好的，也是从占小便宜开始，逐渐贪占得多了，结果吃了个大亏。干那号事，多丢人呀]要检讨，还得退赔。给贫协代表，这样讲清道理，他们接受得还好。毛主席讲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确实重要。

这时候，我们发现桃园的许多党员比较落后，落后于四清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积极分子。因为桃园这个支部是苏长吉建立的，而且是按苏长吉和吴臣的面貌所改造的，一直没有进行党的教育，党课没有讲过，有个别人进过一下县里办的党校，回来也没有传达。他们经常讲的，完全不是我们党的思想。比如，我们党讲为人民服务，他们讲，社员三天不收拾就不合辙。吴臣打人的方法，前边我没细讲，在这补说一下，他是打嘴巴子，乒呀乓呀上去几个嘴巴子，再加上脚踢，凶得很。有时还用皮带，用扁担打，打完了还许关几个钟头的禁闭。打人，他还嫌累得慌，有时候旁边站着团员，他就说：“过来！你们青年团是党的助手，过来帮我打！”请看，吴臣就是党。因此，好多党员的觉悟不高，加上里头什么人都有。所以我们就抓紧了进行党课教育、讲人生观等等。利用开会前后，选了一些报上动人的好经验，给他们念念，或者讲一段毛选。等开会不要干等着，要分秒必争啊！把点滴的时间都充分加以利用，给他们补课。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四清”革命。

组织建设，要在十天内选出十大组织的负责人。十大组织是：党支部委员会，团支部委员会，生产大队管理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大队贫协委员会，妇代会，民兵干部，调解委员会，文教卫生委员会，生产队的队委会。十天的时间真够紧，怎么弄呢？我们就讨论了一下，都要让群众民主讨论，大家酝酿候选名单，对所有组织都用同样的时间讨论，平均使用力量，实际上是走过场，一个组织一天，哪个组织也不能讨论透。我们就主要抓了几个，就是支部委员会，大队和生产队的生产管理委员会，还有大队贫协委员会，这四个。我们说豁着时间，让大家充分地讨论、酝酿，需要几天就几天，都讨论好了再选举。其他的组织，我们同支委和贫协共同拟了个候选名单，尽我们的可能安排好，交给他们各个有关组织去讨论，自己选。进行组织建设，也要抓住关键。群众对于选举干部非常重视。在我们搞四清时，群众经常提醒我们：“对‘四柱’，你们可要安排好啊！”四柱是什么呢？就是国家栋梁的意思。我们说，大家的事，要大家考虑，要大家安排。群众关心印把子交给谁，这是树立了当家做主思想的一种表现。生产队的干部是先选的，几个队选得都比较好，经过了充分酝酿、讨论，最后票选。进行得很顺利，群众也很满意。

可是，在酝酿大队干部名单和支委分工时，出了问题，吴臣来了个反攻。原来吴臣在支部里还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一说话，还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他的样办。要是不知道情况的人，来参加支部会，还会以为吴臣仍然是支部书记哩！他在支部里还是挺神气的。在讨论大队管委会名单和支部委员名单的时候，吴臣借机反对犯过严重“四不清”错误，但是，积极参加“四清”运动，又肯于改正错误的干部当选。他一讲，就有些人跟着群起而攻之。吴臣和他的一伙人攻的是什么人？就是在“四清”阶段揭露他

最痛的那些人。对于过去有“四不清”错误，真正彻底交代，坚决退赔，以后又积极工作、积极劳动的人，我们是支持他们当选的，群众也愿意选他们，包括那个关景东。关景东是七百斤粮、七百块钱，这个错误不算小。原来我们是准备让他劳动两年，考验考验再说。后来又安排了他，主要是因为他能把生产拿得起来，而且确实表现了坚决改正错误。人家真改正错误，我们总不能不欢迎吧！重要的是，群众愿意让关景东当干部。但是，吴臣不同意。还有人附和他。这说明吴臣在支部里还很有市场。

支部委员酝酿好了以后，选得很顺利，票也很集中，但是，在分工时，又出了问题。我们原想让赵品三任支书，他是三人领导小组里的一个成员，是我们一直在培养的。这个人“四不清”问题不多，劳动确实很好，人很耿直，就是倔。等到分工时，他提出坚决不干。那时候，我和另外一个副组长正在北京汇报，那两天没在村里。赵品三向支委和工作组的同志提出他不干的理由：“我管一个小队行，管一个大队没经验，能力小，懂得政策少”；“我不会团结人”；“对学习没有兴趣”。其实他是和关景东有意见，过去他曾说过：“有关景东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关景东，他千我就不干。’他还说：“董朴同志回来同我谈话，能把我驳倒，不过她不了解基层干部。”他为什么说我能驳倒他呢？就是因为他提“有关景东没我，有我没关景东”时，我驳了他。我说：“关景东如果不是好人，作干部不适当，你提出求，可以不叫他当，可以说服群众不选他。假如只是你们俩合不来，就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合作。你们这几个人不团结对谁有利，谁在等着看你们的笑话？你是让地富反坏和坚持四不清错误的人，看笑话呢，还是觉得应该团结起来把印把子掌稳，大旗扛好，生产搞好？”说得他没话好说。他说我不了解基层干部，实际意思是：“我们基层干部，就是你整我，我整你，谁同谁合不来的，都是自己顾自己。”好象我把基层干部估计高了，不应该要求过高。说真的，我对不少基层干部这几年干了这么多不好的事，甚至坏事，确实不了解，但是，要求一个党员做到象个党员的样子，是完全应该的。说穿了，赵品三不干，是上了当，是吴臣给他煽了风。吴臣制造了一种空气，说：“我是关景东整掉的，以后谁同他合作，也得被他整掉。当支部书记，就没好下场。”桃园去年冬天就开始修建扬水机站，干部们常常到县水利科去联系。正在这个时候，县里的水利科科长向桃园的干部讲：“你们别神气，将来你们的下场，还不如吴臣”。这个科长向桃园的干部提出了一个水利投资的数目，去的干部一下子不敢做主，说得回来商量商量。这个科长就说：“要是吴臣，打也把钱打出来了！”讲这个话，对“四清”是个什么态度？这是政治性的，不是一般的认识错误。冶空气来自好多地方，这个科长那里就是一个刮冷风的地方。

后来我们考虑，赵品三在关键时刻发生动摇，不适合当支部书记，不是他自己当不当的问题。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人材很多，有人能扛这个大旗。党员中就有一个很好的雇农，他的名字叫卢伦。这个人四不清问题不多，一直参加劳动，群众很拥护。因为过去他不是支委，是管委会委员，我们觉得一下提成支部书记恐怕不行。后来看，这个人很好。他民主，肯征求别人意见。就是文化水平低，听了报告，回来传达有困难，记个什么事也困难。可是，他真正是好庄稼人，忠实可靠，立场坚定。他几次和我谈话，对我教育很深。他三言两语，能抓住关键，讲到刀口上。后来我们就推荐卢伦当支部：书记。对赵品三，我又同他谈了一次，谈的时候没再说服他，也没批评他。只是说：“你讲的那些不干的理由是对的吗？”他说都是对的。我说，不是说假话？他说，不是。我说，不：是上人家的当？他说，没有。我说：“那好，如果你说的那儿条都是真话，你不配当支部书记。”这么一谈，他没想到。他以为我们培养他这么久了，要靠他，没有他不行，完全是想拿我们一把。一说不叫他当了，他紧张了，一再表示：“我一定好好干，分配我什么，我绝对好好千。”他完全变了样子，这证明他不是真不愿意当支部书记，确实是上了别人的当。不是吴臣当面支使他闹的，是吴臣间接煽动的。

我们进村以后，“四清”初期，同吴臣几次谈话，他都一再说，这里“四不清”问题不多，要讲“四清”的重点就是关景东。吴臣早就确定了“四清”的重点应该是搞关景东。这个时候，他从来没有说过他们干部不团结，也没有说过有宗派，他就是一再宣传关景东的问题严重。在三级干部会议后，他开始讲关景东是“万字号”，我们也查了，不实，没这回事，是蓄意给我们制造麻烦。可是，在太和寨会议

撤了吴臣以后，他回来就大嚷："关景东有宗派呀，他一直是搞我的，你们二队工作组(关景东家住二队)听了二队积极分子的话，二队积极分子就是听了关景东的话。"当面也对我们讲，好象我们上了关景东的当，参与了他们的宗派。他的意思是我们支部有两派，你们现在一撤我，是参与了关景东那一派。没撤他以前，从来没听他讲过宗派的问题，而他却老向我们讲，关景东是"四清"重点，现在又说撤他就是参与了他们的宗派斗争，这显然又是一个手法。我们采取的态度是：不管谁的"四不清"，都要弄清楚，不能借"四清"运动搞宗派斗争，也不能借口有宗派斗争，就不能搞"四清"。就是只许搞别人，不许搞某些人。就是"我有'四不清'，你们不许清，你一清，就是参加了我们的宗派斗争。"这是借口有宗派，来反对搞"四清"。这是不能容许的。不管谁的"四不清"问题都要弄清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因为党内有宗派，是不合法的。不能借"四清"运动搞宗派斗争，可是，也不能借口有宗派斗争，就不能批评"四不清"，否则，也是宗派。谁有没有问题，问题多大，我们是凭材料，凭事实来下断语的，不能说什么，就是什么。他们有没有宗派，我们为这个事，也曾经征求过一些党员和群众的意见，问他们是不是有派呀？关景东有没有派呀？谁同关景东是一派？他们说关景东这个人派不成，他是个有口无心的人，毛毛草草，缺点不少，可是他憋不住事，他搞阳谋可以，搞阴谋他这个人是搞不了的。别的干部也说没有发现关景东有派。吴臣起先也没有说关景东有宗派，直到撤了吴臣以后，他才说有。这是吴臣要手腕。

过了春节，我们一进村，有些群众就曾向我们说，吴臣可改了。一个军属老大爷向我讲："大年初一，人家就背起粪筐，过去从来不劳动，现在劳动了，还是'四清'有办法"。"他过去见了我吹胡子瞪眼，现在见了我大叔长大叔短的，说话可和气了"。我们专案小组也有的同志说："吴臣的问题差不多了，再搞也搞不出个鸭子鸡来了。"这一类看法，吴臣可能听到了一些，春节我们离开这个村的时候，公社的社长薛保玉到桃园来了一趟。说是来了解情况，安排过春节的事。可是，他一到大队办公室就找吴臣，值班的干部说他不在这里。于是又跑到吴臣家里找，据说薛保玉是专门来了解"四不清"干部的思想状况的，可是只找了吴臣一个人。他们当然会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实际上就是问有什么委屈没有。吴臣也谈了一些："说我打人三十五个，没有那么多，说我封官许愿，我没有这事，我只同几个干部，商量了今后工作的分工。"薛保玉这一来给群众带来什么影响呢？就是说工作组一走，公社社长还是得来找吴臣。虽然吴臣被撤职了，还是得来找他。而且，过去吴臣也讲过这个话：蒲蓝大队支部书记撤职以后，：工作组再三央告叫人家干，可是人家祖荣功不干。他散布过这个空气呀！看哪，现在不是又有人来央告吴臣来了？！这件事引起了群众的错觉。其实，这个社长本人的问题也没搞完，他也是个专案。后来，群众弄明了真象，说；"啊！原来是专案找专案呀！"

吴臣敢搞反攻，就是由于外边有人支持他。他搞反攻，这是个大好事。要不，有些事情我们还弄不清楚，他一反攻，就逼着我们想一想了，得搞彻底呀，不能马马虎虎。他一直在反对"四清"，我们工作组还没有出村，他就集中火力反对想要改正错误的干部当选，这证明什么呢？吴臣想把持桃园的领导权，想要复辟，他要推翻"四清"和对敌斗争的革命成果。他企图仍然回到台上统治群众，要那些有严重"四不清"错误而又不想改正的贪污盗窃分子，同敌人勾结用暴力统治群众的分子，重新复辟、掌握领导权。这是坚决不能允许的。不搞破坏可以，搞破坏不行。所以，我们看到了工作还没作透，必须补课。从吴臣这次反攻看来，他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不是党的标准，不是贫下中农的标准，不是人民的标准。我们说好的事他就说不好，贫下中农说好的事他就说不好。别人把工作搞好了，他就不高兴，而且是仇恨的。这时，他就是要把桃园的工作搞乱搞烂，才称心。我们工作组对他的反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吴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他坚持"四不清"的立场，发展到同党对立？因为有宗派斗争发展到反党程度，由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还是这个人本来就是坏人呢？因为他与地、富、反、坏有那么些密切关系么！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不敢下结论，只好交给群众讨论。是什么就是什么，让党员群众，社员群众，从党内到党外，来一个彻底的揭露和批判。把吴臣的问题全部向党员和群众讲清，这样既可以提高群众的觉悟，又可以防备他将来搞破坏活动。如果他这一次不合，肯定我们出村后他也要闹。他带着个党员帽子，在支部里，要起破坏作用，就可能比任何的反革命分子所起的破坏作用还要

大，党和桃园的群众可能会遭到很大损失。所以我们下决心，交给全体党员和群众讨论。把情况都讲给他们，还提了一个问题：到底吴臣的问题是个什么性质，是严重的“四不清”错误，是好人犯错误，好人办坏事呢？还是本来就不是好人。党员和群众按生产队组织讨论，一致说吴臣从来就不是好人。这样一讨论，又揭出了不少的材料。各组一致提出：开除他的党籍，非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不可。说他就是个坏分子，原来就是流氓。一直和坏人搞在一起，为他们服务，打贫下中农，谁打这么多人，也该坐法院了。群众一致要求把吴臣定成坏分子，说：“他有一肚子坏水，眼珠子一转，主意就来，几个人也到不了他跟前。把他清除出党，戴上坏分子帽子，我们好监督他，警惕他要什么花样。吴臣的个人报复性太厉害。要不定成坏分子，就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定时炸弹。”

过去群众和干部讲话还是话到嘴边留三分，现在什么都讲出来了。根据大家敞开讲的情况来看，吴臣是钻进党内的坏分子。过去他所领导的桃园支部，确实就象贫农所说的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办的国民党的事。”吴臣实际上是钻进共产党内的一个国民党分子。直到我们走，还没查出他和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也没有查出他与反动组织或特务组织的联系。不过，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吴臣把持的桃园支部，过去基本上不是共产党。他把持的这个政权，基本上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他多少也做过一点好事，总得交点征购，搞点生产，不然，他隐藏不了这十好几年。桃园这个支部，我们原来也考虑，是不是变了颜色了？经过讨论，我们认为不是变颜色的问题，根本它就不是红色的。后来公社党委同意桃园党员的意见，批准把吴臣清洗出党，而且同意定他为坏分子。可是，据说到现在，我们已经离村两个多月了，还没有正式文件批下来，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们开了一次批判吴臣的大会，到会的人很多。那一天是下雨，屋里挤满了人，外边还有不少的人顶着雨听。他们说：“我们宁可把衣裳浇湿了，也比我们挨打受骂好。”这次会，发言的人很普遍，除了积极分子以外，包括以前被他打过的人，都敢于当面讲话，质问他。过去调查吴臣打人的问题，一队老雇农李升平，说：“别问我了，我一想起那时的事，腿就发软，就打哆嗦。”可是在这个大会上，他站起来讲话了，质问吴臣为什么单打我们贫下中农？对地主、富农、军统特务、伪保长就那么亲，重用他们，信任他们。有一个被他打过七次的贫农，以前我们问他，吴臣打他的情况，他说：“唉，我也有错误。再说，他每次打完了，还给我的小孩点稀粥吃，还给我买过一次点心。”群众说吴臣是“打一拳揉三揉”，他打了人还给点好处。在这次会上，这个被吴臣看不起的、被吴臣当小菜的人，也站起来了，领着人们喊口号。贫下中农对这个会很满意，兴高采烈。参加这次会的有工作队队部来的同志，还有卢王庄公社的干部。我们说开得差不多了，可是群众都不愿散会。贫下中农说：“这是我们第二次解放，第一次翻身！”

在这次会上，我们把苏长吉、薛保玉都找了来，让他们听一听，受一点教育。他们坐在旁边，当时就有人点名批评他们。为了不使群众转移目标，以便集中精力把吴臣的事搞透，在会上，我们没有让大家畅开批判苏长吉。所以，好多人对我们说，这次会的唯一缺点，就是没有把苏长吉留下，连夜搞，也把他批评一通。我们认为群众的意见是对的，因为队部许过这个愿，说过让苏长吉到桃园来做检查。

苏长吉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零零碎碎地介绍了一些。苏长吉在土改后期发展党的时候来到桃园，他发展的这批党员里边有吴臣和关希颜等，并且同关希颜结拜成干兄弟。后来，苏长吉一直包庇吴臣和关希颜做坏事，为他们“服务”。他常来桃园吃喝嫖睹。睹博的时候，他身上还带着个枪，把枪交给关希颜的孩子玩并且让他拿着枪到街上去，随便吓唬人。群众非常恼火苏长言，对他很有意见，很气愤。苏长吉对“四清”一直抱着抵触、反对甚至破坏的态度。他在蒲蓝大队参加过“四清”工作队，可是他常到桃园来散布蒲蓝“四清”的坏话，说蒲蓝搞糟了，搞左了。我们把掌握的材料，向队部反映了，向县里反映了。于是，经县委同意把苏长吉调到县里去反省。可是他一直不好好交代。后来查出他不仅在桃园这一个地方有享腐化福的窝子，在别的地方也有。离桃园不远有个牛头崖，牛头崖公社就有他的吃喝

朋友。牛头崖公社的社长张贺堂，是有名的“花和尚”，他俩气味相投，搞到一块。苏长吉垃了一批酒肉朋友，这些人都是基层干部。他拿这些基层干部作为他的群众，跟工委搞对立(他那时是东风工委的副书记，后来，东风工委改为榆关区委，他改任副区长)。他的群众是谁呢，就是那么一些不好的、最脱离群众的基层干部。他们到一块就是吃吃喝喝，讲女人。白命为才子，到处找佳人。据我们了解的材料，完全可以肯定他是个蜕化变质分子。区长在群众中是个很大的官，生产队长、大队干部、公社干部，上面才是区，在大官里边有这样的人，发现了好。应该坚决挖出来，弄清楚。因为他在县里不检讨，工作队队部同县委商量，把他调到卢王庄公社来了。由县委和队部合组了一个专案小组，专门审查苏长吉的问题。他到了卢王庄，写了几份检讨，净是些大道理，没有多少实际内容。后来，他觉得不老实交代过不去，问来问去他也没有办法了，就从兜里掏出一个笔记本，以后又找出三本。他一交出这个笔记本，使好多人才清醒了。真教育人呀！他的笔记本与众不同，管专案的人拿来给我看了，实在让人看不下去。里边记的都是些卑鄙、骯脏见不得人的事。他记一段听的报告，底下接着就写那些乌七八糟的打油诗，什么都有。我没看全，翻了翻就看不下去了。证明他听着听着报告，就听不下去了，脑子里就想他的那号“甜蜜事”，写起打油诗来。接着又记了一些汇报的材料，如：什么成份、多少户，下面又是他和女人来往的信和记事，他干的那些事，就是西门庆干的那些事。他这样乱搞，根本就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做工作。上面写着多少女人的名字，怎么搞的都有，标题就是“云雨日记”。真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原来还怕定蜕化变质分子定错了，有了这些笔记本，就进一步地证明了，这个人确确实实是烂透顶的。他和工委闹对立和分裂，是想夺取领导权，以便他更有条件搞腐化堕落。

桃园群众要求开会当面批评苏长吉，卫作队同意了这个要求。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教育苏长吉，因为他这样的人不是几次谈话、几次会能教育过来的，因为他已经变得不象样子了。叫他到桃园来检讨，是因为他给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经过这次会，可能把坏影响挽回一些，同时，也可以起个反面教员的作用，教育我们的干部和群众。

这次会，工作队和我们商定请县监委书记陶克己同志来主持。他既是我们工作队的成员，又是苏长吉专案小组的成员。当时为什么请他来主持呢？因为，这几年群众对公社、区、县的干部，不大信任。我们都有这样个感觉。对省的干部群众比较信任。所以我们想让县的同志出面来处理这个事，这是给群众办好事，可以在群众中树立县委的威信。因为当时县委书记强华同志和王云波同志去地委开会，所以就请陶克己同志来：拦持会。可是我们这位陶克己同志，不是那么清醒啊！工作队长通知他来，他同意了，可是以后他又对我们的工作组长说：“我有别的事，没功夫。这个会我不去了，你主持吧！”还嘱咐说，这个会，可不能象搞吴臣那样搞法，苏长吉是现任区长，群众提意见可得有分寸！他先给我们组长打招呼，组长说：“我也没有把握，群众要提意见，我有什么办法呀”。我感到陶克己同志有不少框框，一方面他同苏长吉很熟，有些破不开情面，另一方面，可能：他认为这个事还不定搞得对不对呢，将来这个犯错误的担子会落在他身上，而我们却推卸了责任。其实，我们既然在这个地方工作，就要负责把这里的：工作作好，就应该设法把以前在群众中给党造成的不好影响挽回。我们是想把好事让给县里的同志来作。这样，就可能使县的威信提高。我们的意见是这样。可是我们两家的言语不通啊！不过，因为工作队队长叫他来，他还是来主持了会。我们向干部和群众一再介绍，陶克己同志是县委常委、监委书记，是专管干部违法乱纪的。这两年基层干部对县监委有这么个看法，当然违法乱纪也管，好象是管平反管得多。所以有些四不清干部，当我们一批评他们或者处分了他们，他们就想找监委保护。这个事有点伤脑筋。对这个问题我反正没有弄清楚，在这说一下，是觉得有点这么个味道。当然，工作队下乡，工作做错了，工作队队员乱搞一气或者有违法乱纪的事，监委也应该管。

那一天，这个会开得很好，群众提了不少意见，牛头崖公社来的人也提了不少意见。不少人提出，象苏长吉这样的区长，应该撤职，应该开除党籍，应该叫他回乡劳动。当时我们向群众说，感谢桃园的群众和干部帮助我们党清出了一个蜕化变质分子，大家的意见提得好，我们将把他们的意见转报县委和地委：考虑。听说现在还在考虑，还没有决定。到底因为什么下不了决心，我不了解。

这个问题是这样；当问题涉及到公社，区、县、的干部时，我们一个大队的工作组要不要管？我觉得是非管不可。既然党派我们去工作，我们就要对党负责。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怕犯错误，也不能怕和地方党委搞坏了关系。我们应该把材料搞确实，报告上级党委，积极建议上级党委调查处理。不然，四清就搞不彻底。一个大队真正搞彻底了，是可以发现一些公社干部、区的干部、甚至县的干部的问题。比如桃园大队就是这样。根据桃园群众和干部的揭发，我们就挖出来了一个副区长苏长吉，一个有十几年党龄的烂透了顶的蜕化变质分子。这就是说，区长一级的干部，有的已经和平演变到变了颜色。区里搞了五反，他混过去了，这次四清发动了群众，他就混不过去，被挖了出来。所以四清搞好了，又可以帮助五反搞彻底。当然，是不是仅仅涉及到一个苏长吉呢？不是，还有。吴臣的行贿、拉拢，还涉及到一些县里的干部。前边我讲了，县委办公室的主任，县人委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他们曾在一块吃吃喝喝，赌博，借钱也搞过。这样一来，他们下来检查工作，怎样个检查法呀！他们会赞成搞四清吗？又比如县的水利科长那样的人，有一笔水利费，这是党交给他们的，投资应该用在最需要而又有条件，最能发挥效益的地方。可是他们是个什么思想呢？老子有这笔钱，谁请吃点好的，就恩赐给那个地方。谁给送大米，这个地方就能上马，钱就能拨。党信任，才交给他们这部分钱，应该负责使用好，分配好。我们进村前几天，水利科同意在桃园修建一个扬水机站，选好了地点，并且要群众立即动工，很积极。为什么呢？查账查出来，给县水利科的一位副科长送了一百斤大米，很快地就上了马。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我们也不知道，就上了马，开了工。四清开始，吴臣一撤，水利科长又说不行了，他又不吗上马了，说桃园的水源不够，可是那时他又没有到桃园来看过，还说什么水利款没批下来等等，说了好些理由。我们没有进村时他已批准了，我们一搞四清，他就又批到别的地方去了，批到不搞四清的地方去了。这是个什么问题呀？这类人不是真正向党负责，手里掌握的钱多了，不是觉得个人的责任更重，应该做得更好。而是谁对他好，谁请他吃吃喝喝，谁对他恭维，就把钱批给谁。上面我介绍的这三位，到底有什么性质的错误，我们只发现：有问题，把我们知道的情况报告上去，没有能追查清楚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抚宁县委的负责同志，在对待这些问题上是不清醒的。现在不能说他们是有意包庇这些人，因为还没有证据。可是我们刚一下去就感觉到，县委的负责同志不是清醒的，总觉得基层干部辛辛苦苦，考虑到这方面，对四不清千部就原谅和姑息，老印象就打不破。老怕委屈了四不清干部，可就是不去了解贫下中农受了委屈没有，受了多大委屈。另外还有刊‘么顾虑，我就不清楚了。

县委第一书记，我同他谈过几次话，开始他不知道我去，不是我不信任他，是省委批准我改了名字的，是为了有利于工作。住了两个月，他知道了，就找我来谈，后来我也找他谈，临走时我还约他谈了四个钟头。我要说的话都告诉他了，因为县里的事他要向党负责的。对的、错的意见，我都向他交心了，而且对他个人我也提了点建议。不过他是没有向我交心的。为什么我同他都当面讲了，现在还要向同志们讲讲呢！我想有他那样想法、有他那样做法和同他处于同样的精神状态的可能不是他一个人。我们为什么不使别的同志也从中吸取点教训呢？县委领导同志清醒不清醒，是很重要的，这关系到一个县范围的革命事业，责任重大呀！

县委第一书记也是我们的一个队长。第一次开公社三级干部会以前他没有下来，因为县里开三级干部会。我们开会那天他是坐吉普车从县城赶来的，一到村就参加了会。那天我是和群众坐在一起，听得很详细。县委书记讲话，大家都非常重视，好多人都拿出笔记本来记，准备回去传达。那天的会是群众开始给公社干部提意见的时候，大家很希望县委书记给大家鼓鼓劲。如果他能讲几句鼓劲的话，如四清一定要搞清，一定坚决贯彻“双十条”，话不在多，讲几句关键话。对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基层干部和工作队的同志提出些什么要求。鼓励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放手提，不要有顾虑。县委书记不可能每个村都到过，很多情况并不了解。大家多提些意见，起码也可以帮助他了解些情况。可是，那一天不是这样，他刚下车，也不大了解情况，就照稿子念了一篇。这个稿子里，都是“双十条”里有的话，特别是强调第二个十条里的一些具体政策规定。听起来，似乎是四平八稳。可是在那个场合讲那么一篇，不疼不痒，实际上就泼了冷水。作为县委领导，是不是应该支持群众大胆提意见呢？根据我们县委书记的水平，只要了解一下运动的进程，了解一下群众的情绪，完全可以讲几句解决问题的话。在群众还没有充

分发动起来的时候，大家刚提点意见，他就大讲：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依靠基层，干部犯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等等。这时候，讲这些话，很不适当，这个公社有什么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能讲这些话呢？大家明明已经提出不少意见，县委书记讲这些话，不是泼冷水么？好多人，特别是工作队的同志说，唉！算了，甭记了。证明他们抱着很高的希望，县委书记使大家有点失望。特别是他那一天引了个例子，引得不好。他的话是想检讨的样子，他说过去也下来过，下来的时候群众还招待他吃过饭，总觉得这是爱护和照顾领导干部。没有注意到会造成什么影响，所以就吃了，没有给粮票，没有给钱。后来一查账，有一次好几个干部陪着吃的，记下了他十块钱的饭钱。他说：“查出来了，我是要检讨的，以前没有认识到。不过群众说不让我退赔了，我谢谢了！”这个话很泄气。实际上，这十块钱要他县委书记赔也有点冤枉。这十块钱确实不是他一个人吃的，县委书记吃饭，各级干部都陪着吃，账上到他身上，都让他赔是冤枉。可是正在发动群众的节骨眼上，我们动员四不清干部交代、退赔的时候，应该表示坚决退这十块钱吧！不讲也行，要讲就得说不让我退我也要坚决退。他一退，就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群众。我到他家去过，看来不富裕，家里情况，是艰苦朴素的样子。假如过去有人真是出于照顾领导干部，照顾的结果县委书记多出了十块钱，反倒降低了他的生活，人家就会想，我们不能这样照顾领导干部，也有教育意义。

我们有些好同志，这些年，不大听、也听不见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意见和反映。但是，我相信这些同志，只要真到群众中，他就不会是这样做法。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没有放下县委书记的架子。重要的会议要出席，出席的时候又不了解情况，怎么办呢？别人给拟个稿子，念一念，名义上县委书记也讲了话，实际没有考虑效果。以后碰到这种情况，要么就别参加，要参加就先来了解一下运动进展得怎么样，应该讲几句什么话，恰恰是推动这个运动。这是河北省委的同志要我如实讲的。后来，县委书记下来比较多了，到卢王庄公社住了些时候，一下来就不同了。我们谈过四次话，每次在领会中央精神上都有进步，但是，差距还是有。我几次征求他的意见，间他我们的工作有没有搞错，有没有不妥当的地方，他都说搞得好，搞得对。但是，他从来没有主动提出什么问题和建议。对我们那里揭发出的问题，不积极表示态度，而且几件重要的事情，到现在还没有批准。下到卢王庄公社，是工作队的队长，一当队长，就有好多领导事务，听汇报就听不完。我们工作队的工作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开始一个时期，也是靠表报，靠听汇报，来领导“四清”，因为摊子很大，十几个大队。县委书记是下来了，好，但还是做得不够，因为净听汇报，听不到第一手的东西。参加汇报的干部多数也不是做直接工作的，比如我们这个工作组，有个副组长基本上是专搞汇报。召集人来就听，听完后连夜赶紧整理到一块，相当辛苦。到队部汇报回来，先向大家传达队部的意见，研究我们怎样搞法，刚布置完，接着又该准备汇报了。所以，他就没有时间去做直接工作。这个同志倒是要求过好几次，他说：“我得下队，不然，我这个副组长光听汇报、作汇报，两边趸两边卖，这不象个讣商小贩’吗？”这个话讲得很深刻。这种工作方法，应该改。我们工作队注意了这个问题，曾决定队长、组长都包一个生产队，不过领导事务一来，有时也搞不成。后来有改进，表报减少了，会议也减少了，有些队长也亲自到各队去抓抓，到战场上去看看，有些队长还做得比较好。表报多确是问题，中央三令五申，省里也有决定，就是解决不了。基层干部也真忙，辛辛苦苦，多是忙在表报上。坚决不许有表报以后，变成了提纲。据说提纲比表报还要长，还难填。“四清”这一段表报又多了一些，因为有各级“四清”办公室，有省委“四清”办公室、地委“四清”办公室、县委“四清”办公室，还有我们队部的办公室，都要表报，还限期上报。我在那里做工作，对表报很恼火，我就填不上来，有不少是真没法填。“四清”办公室就希望要一些数字，向领导同志反映运动的概况，也有通过报表“督促”工作的意思。数字要有一些，不能太多。弄那么多表，我想不会是或不全是省委、地委、县委、工作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自己要的，大都是办公室里的人要的，他们主观上可能是想帮助各级领导同志的，可是他们没有搞过“四清”，这些表报，大多数是他们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有些真难填。我讲个例子，刚才不是讲诉苦么，大会小会诉得很好。两二天后给工作组的同志们出了个题目，让登记个材料，到底有多少贫农诉苦，多少中农诉苦，这个还好说；还要登记那种苦有多少件，就是说逼死人的，要粮的，抓夫的，苦有几十种，各有多少件。第二天，有一个队给我

们汇报那种苦是多少多少，我心里就琢磨，我也参加了诉苦会，根本就没注意是那种苦，反正是被诉苦的情节吸引了，眼泪都不知不觉地掉了下来，根本就没有注意那种苦有多少件。我纳闷，大概有人在那儿划“正”字吧，后来一问，那个队是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费了很大劲回忆出来的。另一个队感到没有办法填，对要这样的表很生气，就随便估计了个数字。填这类表有什么用呢！白浪费时间。这个事我们工作组的一位同志要负责。工作队长宵风同志专门为表报太多做过检查，而且告诉抚宁县的其他工作队千万不要把表报搞得太多。我们很多单位、很多同志靠表报领导工作，群众也知道。有一次群众会上，一个贫农向我们讲：“过去下来的干部，有真工作组，有假工作组。”我说，怎么还有真工作组和假工作组呢？他说：假工作组来了先说吃什么，然后就拿出一个表，交给会计给他填，酒足饭饱以后，表也填好了，拿起来就走了，这是假工作组。真工作组呢？他说：真工作组来了，是先到大队部，稍微谈谈，然后交出个表叫会计填，自己到地里去看看庄稼，等到看完回来，表就填好了，拿着就走了，这是真工作组。给他作饭他不吃，或者吃了给放下粮票。贫农说的真工作组同假卫作组区别在吃喝上，可是都没有离开那个填表呀！就是说，过去很多单位，很多同志是靠表报领导工作，而表报又有很多不实。同志们！耽悮了好多时间呀！这有多少是无效劳动啊！这些数字好多是假的。依靠这些表报下决心，有多危险啊！所以，很有必要改变一下我们的工作方法，看看怎样才能使领导工作更深入。我们看到了这么些事情，要总结经验教训吧！我们共产党员是从来不怕说我们的缺点，从来不怕说我们的问题，改正就是了。可是必须真正改正，彻底改正。

各级党委的“四清”办公室和“五反”办公室，应当同时也是反对五多的办公室，决不能由“四清”和“五反”办公室也来搞五多，并增加五多。如何真正地反掉五多？应该由各级党委的“四清”工作队和“五反”工作队去解决这个问题。

一些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一追他们的事就联系到上边，有人包庇。这就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干部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也是基本的根子。可是，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靠山，有人保护。我们进村不久，群众就提出不敢给吴臣和关希颜提意见，他们上面有副区长保护，是上面的红人。我们说要挖下面的根子，群众却提上面也有根子。到底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上边有没有根手？如果要有，要不要挖？值得我们深思。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里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些干部的不良作风的影响。这就是说，地主、富农的影响，不仅仅在下面干部中发生作用，也对我们上级和高级机关的一些干部发生作用。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基层干部，大体土在公社、区、县都有靠山、有根子。送礼，请吃，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边就有人保护他了。有很多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上面的保护，下边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科员不拉科长下水，他就不敢胡搞乱搞。科长不拉处长下水，他也不敢胡搞乱搞。拉上级：千部下水也很简单，只要送一个手表，多少粮食就行了。生产队的干部没有大队干部的撑腰，他就不敢胡搞乱搞，他不放心。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给他撑腰，他也不敢胡搞乱搞。如吴臣，就已经成为压迫群众的统治者。为什么呢？有上面的保护，没有群众的监督。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以前，他就用上面的根子压群众，群众就不敢给他提意见，结果由小错误就变成大错误，甚至蜕化变质。当然吴臣的问题，还有些特殊性，他原来就是坏分子。凡是蜕化变质分子和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都有一个或几个享腐化福的窝子。苏长吉在桃园有，在别处也有享腐化福的窝子。难道只有苏长吉一个人？所以，必须加强群众的监督。要群众监督生产队的干部、大队的干部、公社的干部和区、县的干部，上面的干部也都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没有群众的监督是不行的。只要上面不变，下面变了，问题不大，好办。因为上面没有变，发现了下边的问题，就可以下决心整好，敢于革命，没有什么顾虑。只要敢于发动群众，真正发动了群众，就一定能整好。一般的收了点礼，退嘛，可以查上当，放包袱。可是有些人就不只是收点礼的问题，而是被拉下水去了。这里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下面变了，上面敢不敢整，敢不敢革命，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去整好，蜕化过去的帮助他们变回来。敢不敢这样做，就要看我们清醒不清醒。对下面的错误，我们是庇护、掩护、保护呢？还是彻底革命。上面的保护，开始可能是不自觉的，收点东

西，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好象挺熟的同志，给我解决点什么，要点什么，没有想到后果和影响。可是慢慢地就变成自觉的，不能彻底革命了，有些人根本就变坏了。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受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的影响，这个根子一定要挖清楚。可是，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有靠山，这是有事实权据的，不仅我们那里有这个事，听说别的地方也有这个问题。要不要挖？要挖。在运动的什么时候挖呢？要看情况。我们是这样做的，开始就汇总材料，如实往上反映，而且建议上级认真调查处理。下面“四清”搞不彻底，上边的“五反”也不容易搞彻底。任何生产关系中发生的问题，比如分配问题上的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等，都是无偿地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凡是这类问题，总是要向上面找根子、找靠山的，就是要找上层建筑来保护。而恰恰我们的一些上层建筑，第一，不是那么纯洁的；第二，不是那么很清醒的。不是所有的都不纯洁，但总有一些不纯洁。这里我说的上层建筑，主要是指的我们的党、政机关，业务领导机关和它们的成员。按道理，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应该很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不要为那些非社会主义的和反社会主义的事情服务，不保护它们，而且要及时地反对它们，这并不是那样容易和顺利的。当然上层建筑不只这些，意识形态也是上层建筑。比如说唱什么歌，演什么戏，我们的舞台是什么思想在占领，是宣传什么，鼓励什么。这几年在这方面问题更多。有奸的作用，也有不好的作用，主要是不好的作用，也给了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不少的坏影响。如果仅仅注意下面的根子，不挖上面的根子，革命是不可能搞彻底的。只要是县委清醒，公社和大队多数不会变质；如果变了质，县委就能下决心把公社和大队整好。假如公社是真正革命的，大队的干部一般的不会变质；只要一发现大队变了质，公社就会有决心敢于革命，敢于发动贫下中农，发动群众，使大队变成革命的。所以，一旦发现下面有严重问题，或变了质，就应该去解决、去革命。危险的是我们不清醒。这就是要解决毛主席讲的，要看得见，要抓得起的问题。要解决得彻底。

毛主席最近提出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的五条标准：即贫下中农是否真正发动起来；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否彻底解决；干部是否参加了劳动；是增产还是减产；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说服，以至于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根据这五条来看，我们的桃园大队是基本上达到了要求。当然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主要是非常需要摸出如何巩固“四清”革命成果的经验，我们现在留下了几个人的一个巩固组，主要负责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发现了，立即改正。不足之处，随时补课。当然，可能还有些缺点和错误到现在还没有暴露出来，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暴露出来，我们欢迎同志们指出。发现缺点、错误是好事，我们可以改正，可以把工作搞得更好。我们的工作，要经得起检查，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一个大队的问题要真正搞清楚，搞彻底，很不容易。要真正做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真不容易。多少事几乎滑过去，有多少次几乎上了当，还有可能被坏人利用。比如说对一个好支部，我们怎么能在一开始就设想到支部书记是个坏人哪！不可能那样设想，如果那样想，有意整他，就是主观主义，不是从实际出发。必须根据大量的事实来判断，在大量的现象暴露出来以后，通过这些现象抓住本质，看他是什么问题。可是这许多现象和事实，又不是一开始就能暴露出来，它是逐渐暴露出来的。在问题的性质确定以前，还要正面、反面地多观察、多调查、多想一想。我们做基层工作少的人真是提心吊胆，经常睡不着觉的，因为硬是不敢说这是个什么性质的事情。凡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找贫下中农，找社员群众，找中央的政策，找毛选，找老师。所以，认识任何一个问题的本质，必须有一个反复的过程，才能搞清楚。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工作也有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一下子不可能把工作搞深入。我们搞了五个月，现在还留着一个巩固组在那里继续做巩固革命成果的工作。这一次我们的工作并不是顺利的，是经过了曲折和反复的，才把问题真正搞清楚了。而且，是由于吴臣发动了反攻，才促使我们把问题真正搞清楚。恰恰是因为他反攻，才使我们在最后的决战中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当我们搞组织建设工作时，知道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在农村要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河北省委要我们搞试点。我们工作队印了几个地方搞的农村政治工作条例；同时，决定任命支部：书记兼指导员，生产队设了政治副队长。干部有了，条例也有了，我就有点犯愁，不知道怎么搞法。我没当过兵，不晓得解放军的政治指导员怎么做政治工作。后来我把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找来读了读，又再看看我们印的那两个条例，基本上是按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套下来的。到底具体工作怎么做呢？确实要从基层试点搞起。我们那个新支部书记，在我临走时他向我说："我又是支部书记又是指导员，你给我留下个纸条，写上我以后该怎么做工作，你们走了，我遇到困难好看看。"这个同志过去大概看过或听过三国演义，临别前想要个锦囊妙计之类的东西。我没有给他留什么纸条，只是告诉他要依靠贫协、依靠群众，有事同大家商量，听党的话，要坚持参加劳动，要注意大家的思想情况，及时解决问题。可是，他倒给我出了个题目，哪些工作是指导员要做的，哪些工作是支部书记做的？我们如何在农村工作中学习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呢？后来我才想通了，我们"四清"工作要搞好，必须是学了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必须是真正贯彻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才能把"四清"搞好。而只要是把"四清"真正搞深、搞透、搞彻底了，那一定是象解放军一样，是做好了政治思想工作的。为什么呢？做好"四清"，就是搞好教育人的运动，做好人的工作，调动大多数社员和干部的生产积极性，人的因素当然是第一；我们是搞阶级斗争的，是专搞政治的，所以政治工作第一；既搞政治工作，就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个别谈话、小会和大会，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所以是思想工作第一；而我们在思想工作中最有成效的是抓活思想，还不是活的思想第一吗！再说三八作风：我们坚决搞社会主义，坚决搞"四清"，正确地理解和贯彻中央的精神，这就是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搞三同，工作组的大多数人废寝忘食，日日夜夜地搞，相当的艰苦，是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吧！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也得有。不是让某一个或某一些具体政策规定把我们束缚住，应该掌握住中央政策的彻底革命精神，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强调不同的重点，这不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吗！还有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也做到了。要做好"四清"，就得按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去做，把"四清"革命搞好了的，一定是真正学到了解放重的政治工作的一般原则。这是毛泽东思想挂帅。这样做，是真正地学解放军。中央提出的号召，我们有两种学法：一种就是形式主义地学，条条定了，干部任命了，制度也订了，但是工作还按原来的样子做，那是形式主义地学，不是真正地学。就象有人学大庆，光学评功摆好，不学革命精神，不学自力更生，不学艰苦奋斗。还有一种是在工作中扎扎实实地学，"四府"要搞好，就要按解放军的政治工作那样做，搞好"四清"和学好解放军是一致的。在搞"四清"中，就学了解放军的政治工作。以后，还要研究如何搞好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真正学解放军，不能光是定条条，重要的是从基层搞起，从一个大队、一个公社搞起，搞好了把经验总结上来。我们不是讲帮助省委么！真正帮助省委，就要提出具体的经验。这样，才能帮助省委，帮助我们的党中央。

（五）

当我们做好了上面介绍的那些工作以后，绝大多数群众高兴极了。真是兴高采烈。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干部从"四清"中期就参加劳动了，后来越参加越积极，哪里困难，哪里最艰苦，干部就到哪里去干活。大队部不再留专人听电话了，有事干部们在地里商量着办，有什么问题及时在地里同群众商量着解决。干部和群众都心情舒畅，干劲很足，出勤率非常高，所有能出勤的都出勤了。支部书记卢伦出身好，民主作风好，参加劳动好。只要他这样带头搞，群众自然就跟着上。困难的地方干部上了，群众没有话说。有身教，不光是言教，以身作则。过去有人说怕"四清"妨碍生产，从我们那个地方看来对生产没有妨碍，而且生产大有进步。就是冬天搞"四清"的时候，基本建设也搞了很多，搞了一个扬水机站，搞好了两个机井，还拉了高压电线，等等。今年要搞上百亩水稻田，还有七百亩水浇地。挖渠，平整土地，都做了，也没影响"四清"，基本建设比每年冬天还搞得多。有人说，运动会妨碍生产，不是这样，它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大多数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搞得人们心情舒畅。

新的革命的领导核心，在我们那儿看来是形成了。这个时候，我们领导群众又学习了六十条和四十

条，展开北学赶帮，掀起生产高潮，订了计划，做到既有革命干劲，又要扎扎实实，有科学的态度。天刚亮，群众就集合下地了，议论该干什么活，不光队长说，社员也提意见。过去公社二队是最难领导的，现在雷锋式的贫农李永平当选了队长，生产积极性特别高。群众说，队还是那个队，人还是那帮人，就是情况变了。原来有些青年，觉得在农村无用武之地，总想进城，现在他们认识到农村的天地很广阔，不是知识多没有地方用，而是知识不够。他们组织了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我们工作组帮助他们上课。图书馆和俱乐部，都组织起来了，文化生活也活跃了。

我们进村时，大家都说妇女是死角，可是经过教育，在整个运动中妇女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每一个阶段的工作中，妇女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扎根时，我们注意要有妇女；发动群众时，特别注意了男女一起发动；“四清”时，家属工作很重要；诉苦时，旧社会妇女受苦最多，她们诉起苦来最能感动人；搞生产，她们并不比男人差；而且，我们一直比较注意培养妇女骨：千和妇女干部。真正做好了妇女的工作，才能使我们最后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她们占着人口的一半呀！开始，有的同志，对妇女不大重视，口虽不讲，实际却是不重视的。但是，在“四清”阶段，事实打通了他们的思想。例如：有的“四不清”干部交代了一些问题，回家一说老婆不同意，他又推翻了。因为过去他们在外边吃喝了，老婆说“你大吃大喝了，什么都没有往家里拿，现在你承认了，退赔得拿我的缝纫机，拿我的猪，猪是我喂的，我不给。”一发现这种情况，我们就加强了干部家属的工作。向她们说清道理，妇女还是听得进去的。我们说：“你家里的白行车、皮袄、缝纫机是哪来的钱买的？别人也有一个劳动力，为什么买不起？你的男人既作了对不起人的事，你是让他改了好呢？还是让他一辈子老抬不起头来好呢？”讲通了，她们很痛快，不仅不再拉后腿，还可以起促进作用。有几个干部的家属，在“四清”中，起了突出的作用。每一段都注意妇女工作，到最后涌现出大批的妇女积极分子。她们积极参加生产，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新修的大渠上，只要我们从那里一走，就能听得到妇女唱夯歌的声音。过去这些妇女是不打夯的，现在她们不仅打夯，而且愉快地唱着夯歌。有一次，我们正在劳动，华北局有几个同志去找我们。我们说，咱们是不是唱个歌欢迎客人，她们拉起队来就唱，说同他们劳动就劳动，休息时说谈天就谈天，不是扭扭捏捏，而是大大方方。那些女民兵特别积极，组织了突击队，自告奋勇地种良种棉、丰产田，搞得很好。她们还组织了广播组，每天晚上跑到房上宣传婚姻法，宣传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

在冰天雪地里就开始修建的扬水机站，到我们离村的时候，搞好了。社员多年来向往有电，这次省委批准办电，他们高兴极了。有些七、八十岁的老人，看到了十吋的水管子滤滤地冒水，笑得闭不上嘴，他们说：“真不白活，看到社会主义啦！”扬水站建立在一个叫做“哑叭坑”的泉水坑上。因为解放前有一个哑叭，受压迫，没出路，在这里跳水自杀了，因此叫“哑叭坑”。桃园四队的贫农赵铁金，他因为受窝囊气“哑叭”了好几年，在我们进村以后，渐渐能发声了，进行“四清”的时候，他就能说话了，虽然不太清楚，但是，可以听懂。他揭发了不少别人不知道的“四不清”问题。哑叭在“四清”中说了话，坑也在“四清”中和洋河挖通了。所以群众把“哑叭坑”改名叫“四清”河。这都是真人真事呀！

我们刚进村时，打扫卫生都要我们亲自拿着扫帚带头去搞，到后来大清早我们还没起床，群众早把街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开始，群众躲着我们，不敢说话，现在见了我们，无拘无束地随便谈，就连那最难摸清的瞒产、私分的数字和办法，这些事都说出来了。这也证明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是真正信任我们了。我们和干部、群众一块讨论了生产计划，去年平均亩产四百二，今年亩产订的是四百九。据说上区里汇报，区委还说我们这儿是暮气。我们当时觉得，会不会再重复过去的虚报浮夸？每亩平均增加六十斤，还少吗？所以我们决定工作组的大多数人都在同群众一齐劳动中，认真摸一摸产量问题。把增产计划落实，增产措施落实，管理方法改进。在摸产量订计划的时候，发现四队亩产增加六十斤，而总产倒比去年减少一万多斤。贫协代表和干部们说：“你们别摸了，地亩数是假的。”瞒地有好多办法，如多报渠占地，多报河滩地，调整社、队规模时，有些地“开了小差”。所以黑地很多。大家都愿意瞒，不

仅多分了粮食，瞒了亩数，亩产量就高了，评比时就显得先进。不仅瞒地，还假报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比如三队，吴臣在的那个队，种了一百亩早稻，只报了三十亩，剩下的报成高粱。去年高粱减产，闹虫子啦，所以产量一下就差了好多。家家都知道有这个事，具体数字不大清楚。经过这次“四清”，才觉得上了当。到这时候，我们工作组的同志才明白，吴臣打骂群众，群众为什么能容忍？除了打一举揉三揉，给被打的人一点好处以外，就是搞瞒产，给社员多分点，大家都得了好处。当我们选干部的时候，就有的人说：“我可不行，连汇报也汇报不上来，我弄不清那个地亩数。”当时我还劝她：“你只要参加劳动，就知道地亩数了。”其实不是那么回享，他们向上汇报另有一个口径。一个说多，一个说少，对不上牙口，会暴露的。所以吴臣垄断了这个东西。他每次造表，都是地主赵学瀚给填，他去报告。群众现在觉悟到这一点，一户多分一百斤，可是干部搞了多少呢？吴臣就上千斤，还搞了多少钱呀，总是大家吃亏吧！而且，这样瞒，国家也吃亏，影响国家的建设。他们觉得要真正跟党一个心，就应该跟党说实话。我们对这些事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我们同他们这样讲的：“向党说实话，我们欢迎，一定向县委、省委给你们反映，不叫你们吃亏。”不能因为他们一说实话，今年就只给留七两口粮，那样做群众就要埋怨，吴臣要翻案的。吴臣会借这个机会活动，他会煽动：“你看，你们不让我当支部书记，马上得吃七两，肚子不饱。”起码以后留粮要按去年一样留，如果他们有剩余再卖给国家。要不然，新的干部站不住脚。周围有很多村子也瞒地、瞒产，人家会攻他们的，也会用这个末反对“四清”。所以，我们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不搞反瞒产。提倡向党说实话，是多少就应该说多少，但是，我们没有追查。可是领导上必须保证，不使说老实话的人吃亏。

我们离开桃园是四月底。那个时候，可以说是春满桃园。我们亲自参加栽种的一排一排的小柳树，都长出了嫩绿的新芽。麦田返青了，菜地也是一片新绿。可是，我所要讲的这个春，是指人们的精神面貌，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包括那老人、青年、男人、女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曾经向我们提出要造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的意志，又有个人的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桃园，这种局面是基本上形成了，或是初步形成了。真正为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政策所武装起来的贫、下中农和社员，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什么困难都能克服。现在要学大寨，桃园就有基础了，有了好的领导核心，又有觉悟了的群众。这个时候叫我们回来，真是依依不舍。一方面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工作没做完，如党员登记，小学“四清”等等。现在，是留了一个巩固组在那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同那里的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干部们建立了感情。对比一下，我们进村的时候和出村的时候，村里的一切情况，我们的心中也有种愉快的感觉。如果问我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可以说，我尝到了毛主席在“咏梅”那首诗中所讲到的那种心情：“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我们的毛主席是讲的我们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反修问题。可是，真正把贫下中农发动起来，把群众发动起，来把一个大队的反修、防修问题搞好了，它和我们整个党的事业是联系的，和我们党的国际义务也是联系的，把我们每一点小的工作都同我们党的伟大的事业联系起来，我们也可以尝到一点这个滋味。

现在桃园有了革命化的贫下中农，有了革命化的领导核心，这给桃园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可是，这种局面是不是能够长期坚持下去，还要看我们今后能不能做好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还要看有没有革命化的公社，革命化的区委，革命化的县委的领导。要不然，顶不下去的呀。我们估计，那里的斗争还可能有反复，因为阶级斗争是复杂的，不是万事大吉了。

我临走的时候，找了几个公社的干部分别谈了谈，他们向我讲了很多心里话。我问他们，经过这一段“四清”，回想过去的工作，考虑今后公社工作怎么作才好，他们讲了一些很好的意见。过去，他们的确忙忙碌碌，可是工作没有作好，没有作扎实，漂浮得很。经过这次“四清”，认识到了公社工作的重要。他们说，过去贫下中农和其他社员群众也向他们反映些情况和问题，他们没有注意给以解决，有的就向基层干部交代交代，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也许还使群众遭到了打击报复。以后，群众就不向他们说什么了，他们电没有主动去听群众的意见。只听基层干部的话，慢慢地就不知道群众的呼声和反映

了。这种状态必须改。如果不改，实际上是使领导同贫下中农和其他的社员群众隔离开了。他们还说，原来到处要表报、到处听汇报，实际上不实，反映上来说不是欺骗领导，也是给领导上一个错误的印象。如桃同大队，瞒地二百多亩，产量一瞒就百分之二十以上。表报上是显不出来的。我们是计划经济呀，假情况会给我们带来什么苦头哪！看来应该认真地把我们的工作方法改进啦！

抚宁县的负责同志，我是接触了几位县委书记，我看他们下来一下就比不下来人有进步。听说他们下来搞过一段“四清”工作的县委书记，回县以后同别的县委委员就感到有点语言不通，也感觉到有冶空气了！我们应该真正做到下去蹲点。我临走还劝了县委第一书记最好他自己去搞一个大队，直接作，听听贫下中农的意见，听听群众的意见，他搞“四清”革命的决心就会大了。我们有许多好同志，多少年不直接听取贫下中农和其他社员群众的意见了，不直接摸群众的情绪和心理了。要真正蹲下去，真正卷入火热的群众运动中去，当然就会听到群众的意见的。如果，真正听到了群众的意见，我认为他们对“四清”革命的态度一定会坚决的。我感觉到，直到我离开的时候，县委不能算是很清醒的，而且革命的主动性也不能算是很够的。我们遇到的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抚宁县。象我们这些人都是没有干过县委书记的，如果县委书记真正蹲下去，肯定北我们发现的问题要多，解决的问题也要多。为什么群众反映吴臣这么多意见？去直接调查一下么！为什么到现在不批准哪？是怀疑我们搞出来的材料不可靠，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哪？怀疑也可以，但，要讲真理，真理只有一个。要有材料。直接召集贫协会或群众会，听一听，看一看，立刻决心就大了。我们原来也不了解，就是贫、下中农教育了我们，群众教育了我们，他们给我们反映了情况，他们给我们提出了问题，他们给我们出了一些好主意，我们才能把这些意见反映给县委的领导同志，反映给省委的领导同志。我不是有意和抚宁县的同志过不去，因为我在那个地方作了一个时期的工作，对那个地方的工作有感情，我愿意把那个地方的工作搞好。所以我是将点军，想拉他们下来，不是拉下水搞坏事，是拉他们到贫下中农中去，到群众中去呀！为什么今天要在这样一个场合讲呢，我觉得有些问题，可能有点代表性。这一点我没有作任何调查，不能判断，请在座的各县的同志们自己判断。如果有点代表性的话，大家都在省里开会，跟省委交交心吧！既然决心要搞革命，我们大家都想想有那些顾虑，把我们的思想敞开。象我所接触到的这些问题，你们那个地方是否也有？咱们把它们解决深透，才能够达到党中央、华北局和省委对咱们提出的要求，把“四清”真正搞成一个高标准的，搞深，搞透，搞彻底，后遗症少，错误不超过一个手指头。不是讲抓活思想吗？我想这些就是我接触到的一些活思想，我把它们都讲给你们了。

“四清”非搞彻底不可，不搞彻底，就是保护了修正主义的根子。真正搞彻底是很不容易的，每一步都有滑过去的可能。我们这次就是这样，稍不注意就可能滑过去了。要不滑过去，我们就要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如何才能搞彻底，关键在于敢于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才能把真实情况搞清楚。当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以后，就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强调实事求是。

工作队应该有个好作风，它的言论、行动都应该同“四不清”划清界限。我是参加工作队的，我并不袒护工作队。我们那里大多数同志都表现得好，也有人表现得不太好，不齐么！什么人都有。工作队应该有这个决心，我们是搞革命去的，我们就要在那个地方树立一个新榜样。不要被“四不清”所影响和改造，要在“四清”革命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也改造自己。工作队应该是革命思想、革命作风的传播队，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队。如果工作队是过得硬的话，他们所工作过的地方，就应该多出好的产品，多出好的经验，也多出人才。多出好的产品，就是生产搞好；多出好的经验，就是不仅要出搞好“四清”的经验，也为今后做各种试点创造了条件；一个地方搞好了，还会出大批的人才。每一次革命运动中都出了大批人才，这一次的“四清”、“五反”运动中，一定会要出现大批的人才。

要真正了解情况，必须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蹲点。　下去，要搞好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四清”革命。我们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可是也只有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地认识世界。搞几个月“四清”，就弄清情况了，这就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同贫下中农、同绝大多数社员

打成一片，在共同搞革命的过程中，了解情况，认识客观世界，而且这个情况，比较可靠一些。以后再作调查研究，就有了基础。

在我刚刚回到北京时，因为大家都关心农村阶级斗争的事，有些同志就问我到底农村阶级斗争矛盾的焦点在那里？根据我们接触的情况看，主要的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搞和平演变，有些是钻进革命队伍，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潜移默化，使我们的一些干部，舒舒服服地就演变过去了，代表了敌人的利益。不是一下子收买，一下子给大鱼大肉吃，是逐渐逐渐地影响，这最不容易引起我们的警惕。在战争时期，阶级敌人是要搞武装反革命，配合帝国主义。在和平时期，和平演变是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主要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我们的身份是清楚的，而敌人却躲在后面，出面的是戴着“党员”和“干部”帽子的人，所以斗争是更复杂了。“四清”中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和复杂。现在我们搞的“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保定地委原来提的那样，清工、清账、清财、清库。现在是政治上的“四不清”、经济上的“四不清”、思想上的“四不清”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反正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情都要清。所以，河北省的群众和干部，都把农村的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为“四清”。“四清”的内容广泛了，意义深远了。确实是比上改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而且是更尖锐、更复杂、更深刻的一场大革命。根据我们那儿的情况看，我觉得包括这么几项任务：一个是土改不彻底，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补课，一个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有的地方就没有好好搞社会主义革命，也要补课，还有一部分更艰直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以后，有些党的干部又蜕化变质了，变坏了，我们要解决怎么把他们变回来这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革命问题。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还有没有革命任务？还有。就是当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以后，它还有可能腐化变质，资本主义还可能复辟。我们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世界上还没解决的。这个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现在作的这件事情，是我们党的伟大事业中的一部分。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就指出了“四清”、“五反”的严重的深远的意义，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解决这个掌握领导权以后不贪污腐化的问题，不和平演变的问题，演变了的，又如何变回来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的，很不好作的，是史无前例的呀！可是，我们党一定能解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情况明，决心大，而且方法对。找到了“四清”和“五反”的自我革命的方法。在苏联，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苏联就出了修正主义。这就教育了我们。少奇同志在反修的报告里说，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是在于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则搞了个使无产阶级丢掉政权。这个反面教育意义的重要性不亚于十月革命的正面教育作用。问题是我们必须吸取教训。苏联的无产阶级丢掉了政权，我们的政权是否会丢掉？我们现在的“四清”、“五反”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管是一个人队也好，一个公社也好，一个县、一个地委也好。“四清”、“五反”的意义是深远的。我们党在国际上担负的任务是很重的，现在全世界革命的人民和全世界的马列主义者都仰望着我们的毛主席，仰望着北京，仰望着我们的党。我们应该把党交给的革命任务真正做好，真正尽到一个党员应尽的责任。每一个人虽然分工做的事情是很小的，可是它们都是和我们党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

根据我参加这么一期“四清”革命来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不亲自参加“四清”或“五反”，是个大损失。不仅工作需要，从我们必须受到锻炼来说，更需要。毛主席说读书是学习，更重要的是在革命实践中学习。

我所讲的只是一个大队的经验，是很狭窄的。因为人队同大队之间不一样，各种各样的都有。有大寨那样的大队，有一般“四不清”问题的大队，也有同桃园一样被坏分子控制的大队，还有比桃园更复杂的大队。所以我们的经验，是很狭窄的。从我个人讲，少奇同志指示要我、我自己也愿意至少再参加一期“四清”和两期“五反”。要作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必须不断地在各种复杂的革命实践中磨炼呀！最后，我愿意和同志们共勉，咱们都坚决做彻底的革命者。让我们永远记住党中央和毛主席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依靠贫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工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底！为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彻底胜利而奋斗到

底！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42）关于“四清”、“五反”蹲点问题的报告(1964年9月16日)

我听了安子文同志报告，有许多同志要下去蹲点，我想向下去蹲点的同志讲几句话。散会以后，还想请组织部、监察委员会、公安部的同志到那个房子坐一下，我们谈一谈。

听说正副部长×多位，司局长×多位，要下去蹲点。这就很好了，这就象个革命的样子了。从北京去的，听说一共有×人(包括大学生)，各省都有很多工作队在那里进行学习、训练，一个省有×万的，有×万的，有×万的，有×万的，大概今年下乡搞“四清”和在城市搞“五反”的有×万人。(安子文：×万。)这是个人革命。

是的，现在需要我们共产党的领导人，领导干部。具有一种彻底的革命精神。你出去革命，自己没有彻底的革命精神，革命就革不好。留在家里的也要有彻底革命的精神。这么多的人走了，你们留在家里，如果没有彻底的革命精神，还照常规办事，那不行的。大量的、大批的是面上的工作，经常工作，要搞建设，要搞生产，又有这么多的人走，不打起精神来工作，不打破常规，还照老样子，做官当老爷，养尊处优，高官厚禄，自己不动手，我看面上要出大问题。所以，外出蹲点的，在家的，统统要有这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家里出了问题，外出的同志不安心的，他有牵挂的。家里的同志应该保证，打起精神把工作做好。这样，就支援了外出的同志，使他们安心在外面工作，没有后顾之忧。这是我的一点希望。不论外出的同志，在家的同志，在当前特别需要有一种彻底的革命精神。学习解放军好久了，学习空军，机关革命化，也搞了好久了，现在真要搞了，马马虎虎不行了。

今天主要是向外出的同志讲话。

我觉得，同志们只要认真下去蹲点，在点上进行仔细的观察，把根子扎正，发动贫下中农，发动群众，你们就会了解那个村子或者那个工厂的真情实况。只要了解了真情实况，解决问题就不困难了，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只要情况明了，真搞清楚了问题，了解了真情实况，至于怎么解决，中央已经有规定嘛，党的原则，党的方针政策，都有规定，大家也熟悉的，解决问题并不难。就是要了解真情实况。上一次我讲话，说这是一个新的革命，出现了许多新的斗争形式，有许多新的特点，如果你们不下去蹲点，你们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不能领导当前的工作，讲得好象是很困难的样子。又说我们没有经验，我们还需要学习。那也确实是这样，我也不是讲假的。仅靠老经验，仅靠你们原来的知识，已经不够了，这也不是假话。今天我来讲话，就是说，解决问题不那么困难，可以解决的。但是，必须怎么样呢？必须你自己下去，认真下去蹲点，进行细致的工作，充分发动群众，把真实情况了解清楚。只有这样，解决问题才并不困难，否则，就不能解决问题。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要掉以轻心，不要粗心大意，不要马马虎虎。下去是不能当老爷的，那硬是要用心思，仔细观察，仔细跟人家谈话，听人家的话里面有什么问题。人家话里面有话，这个人谈话跟那个人谈话不一样，有矛盾，为什么？要用脑子去想。掉以轻心，粗心大意，是不行的，解决不了问题的，下去也做不好的。另一方面，如果你们真正蹲下去，仔细观察，把根子扎正，充分发动群众，进行细致的工作，那么，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并不困难，有几个月，半年，就可以把农村的“四清”和社会主义教育基本上搞好，再有几个月，县以下的“五反”，城镇的“五反”，县的各行各业的“五反”，也会搞好的。乡村里面统搞了“四清”，大体上县级机关和各行各业的问题就会出来，会有很多的线索，搞清楚很多的问题，问题就可以解决。

现在看来，仅仅搞好乡村的“四清”，把县委、县人委、区委、人民公社这几级的问题解决了，而不把财贸、文教、工交、政法、农林、党群各个战线上的问题解决，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搞不好的。搞好了也不能巩固的，还会回生的。最近我又叫王光美到桃园大队去了。她离开那里几个月，这次去了以后，只打了个电话给我，她没有回来。她说，村子里面的情况还是很好，农民情绪也很好，生产也很好。苏长吉的问题，一直拖了很久，地委、县委还没有批准。我在河北省委提了这个问题，王光美

的报告中间也讲了这个问题，省委就发急了，地委也发急了，赶快派人处理，但是派了地委组织部长去，他根本不是去处理，不是看这里面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处理不下去，而是找那些曾经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人和他们的家属一起开会，要出气，看有冤枉没有，要不要翻案。我从河北省委回来以后，看了唐山地委书记马力给我的一个报告，说他们已经派了一个工作组到卢王庄去整了苏长吉的案子，在那里充分发动了贫下中农，彻底搞清楚了，处理了他的问题，开除党籍，开除政籍。还有刑事上的责任等等。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什么充分发动贫下中农，没有那回事，而是去泼冷水的。可能这个地委书记马力他还不清楚这个事，我叫王光美到那个地委去把这个情况告诉他。所以，在农村搞“四清”，必须把县以下的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统统搞清楚。如果县委不行，要改组县委，县政府不行，要改组县政府，各行各业不行，要改组各行各业。上一次×××同志跟我讲，抚宁县公安局没有问题，我今天带来了一个文件。那个卢王庄有好几个地主子女在我们的要害部门工作，比如有一个在我们的空军，有一个当外交信使，有一个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有一个在天津南开大学，都是搞尖端的，工作队决定，一律由县公安局把这些人的家庭情况统一通知他们所在的单位。这个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就是卢王庄公社对敌斗争工作组的组长，这些地主子女的情况都叫他通知，但是压在他手里一个多月，他根本不管。然后又觉得由公安局通知不好，还是要县委通知吧，把材料写给县委，县委就转给县委的“四清”办公室，而“四清”办公室里面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地富子女，“四清”办公室也根本没有通知。这是省委去查的，省委写了一个报告，查出县公安局不只是有这个问题，还有其他的问题。我为什么要他们查呢？可能是刘亚楼同志的夫人听了王光美在妇联的报告，回去讲有个地主儿子在空军，刘亚楼他们一查，果然有这个人。后来王光美写一封信给刘亚楼同志，要他查一查得到县公安局的通知没有，刘亚楼同志写一封信来说根本没有得到通知。于是，我就一批，批到河北省委，说抚宁县公安局或者县委有问题，要省委派人去查。查的结果，就是刚才讲的那个情况。总而言之，县委的问题不解决，区委的问题不解决，公社的问题不解决，大队、生产队的问题解决了是不行的，不能巩固的。有革命的群众，有革命的生产队，必须有革命的公社，革命的县委，革命的区委，上下一起来保证。上层的县委、区委、公社是革命的，那个生产大队不革命，他发现了，他就会整嘛，烂掉了，他就会整好嘛，生产队不好，他可以整好嘛。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可是上层建筑在这个地方可以起决定作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它的作用就在这个地方。一切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好的上层政权，有了革命的县委，革命的区委，革命的公社，不怕你这个生产大队不革命，你不革命，它会改造你的，横直群众要革命的。我们的革命没有别的什么窍，也没有别的什么保证，保证只有一个，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跟广大劳动人民结合。必须具备这两个条件：一个，上面的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核心；单一个领导还不行，再一个，还必须跟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结合，结合了，就保证了，中间有坏人，上挤下压，一夹就夹出来了。有些基层干部就是怕说上下夹击，就是怕承认这个上下夹击，实际上就是上下夹击，没有上下夹击怎么行？不只过去是上下夹击，今天要上下夹击，以后也要上下夹击。凡是坏人，不好好搞革命的，脱离群众的，都要对他上下夹击，就是上层领导，发动广大群众，错误缺点都要改正，坏人都要被夹掉。请你们不要公开宣传说我是要上下夹击的，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口里不讲就是了。但是，人家说你们是上下夹击，那也不要否认。你为什么怕上下夹击呀？你怕什么呀？你如果是革命的，你如果是为人民服务的，为大多数群众利益服务的，你为什么怕群众？为什么害怕呀？这样，就把他顶回去了。自己不要口头上讲，也不要去宣传，但是也不要回避，做起来确实要这样，以后永远是这样，永远需要这样。列宁说，一切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手了，生产关系可以改变的。地主的生产关系可以被摧毁嘛。个体经济的生产关系可以改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改成集体经济嘛。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变成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嘛。必须要政权在手，才能改变生产关系，才能保证。我讲的所谓上级的领导，不只是县委，还有地委，还有省委，还有中央。但是，在乡村里面，县跟公社这两级很重要。所以，这一回大概多数省是这样搞的，就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是每一个县搞个公社，搞个区，而是每一个地委搞一个县。一个省，比如河北搞十个县，湖北搞六个县，湖南搞十来个县，广东搞七个县。听说华东也想这样搞，云南、贵州的同志也想这样搞，四川也想这样搞。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就是连县一起搞，县的“五反”，各行各业

的“五反”，公社的“五反”，城镇的“五反”，一起搞。

各行各业都应该派人到下面去了解各行各业的情况，搞清楚下面业务部门的问题。比如财贸机关，你们到底晓得不晓得那个乡村的财贸工作怎么搞的？我看你是不清楚的。供销合作社，你晓得下边那个合作社怎么搞的？商业部在县里面也有机构，你晓得它怎么搞的？县里面也有银行，还有手工业合作社，也有些工业，还有文教。大体上乡下的中小学教员都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现在大概这个问题解决了。从前我们没有教员，现在乡村小学一律可以改组。因为乡村里面有知识分子了，有高中毕业生，初中毕业生，而且已经劳动了几年了，在乡下，教员已经够了，而且有多的。那些不好的教员，历来不大好的，现在不要他当教员了，有些还要监督劳动。就是王光美去的这个地方，有个小学教员打了几十个小孩子，搞得很不好，跟那个坏支部书记搞在一起的，这一回把他的问题解决了，不让他当教员了。开始说县里面不同意，说我们中央宣传部有通知，小学、中学不搞“五反”，不晓得有没有这个通知。上一次叫张子意同志查了。(彭真：上一次工作会议决定，全国的“五反”，在学校中是先搞大学，小学、中学不普遍搞。)要通知，凡是搞“四清”的地方，所有有工作队的地方，一律交工作队去解决。(彭真：没有工作组的地方，小学校不要搞。)那个小学教员他是个破落地主，不让他当教员了，县委不同意，县委把他调到县里去了，县教育局说，这是我的编制。有没有这个事，教育部？小学教员是你的编制，是你的人，你的兵，动不得？(安子文：小学教员不是县委编制。)说是教育部的编制，调到县里面去了。后来一查，这个教员的儿子就在这个县教育科工作。宣传部要取消那个通知，教育部要通知一下，所有有工作队去的地方，中小学的“五反”一律交给工作队去搞，教员也归工作队处理。有些人是地主富农出身，要监督劳动。不会失业的，就在乡下有土地嘛。当然，那个好的教员，老老实实教书的，搞得好的，还是让他当，不要撤换他，不要把这批人赶走，又换另外一批人，就是换那个坏人。大概县以下的中小学里面坏人不少。所以，你们下去蹲点，各行各业都应该有人到乡下去，搞清楚县以下你们自己业务部门的问题。

总而言之，这一次运动都是由工作队领导。这次中央派下去这么多的人，各省委、地委、县委都是负责人下去，许多领导干部都要下去蹲点，工作队是很强的，从来没有这样强的工作队，而一个地委又是搞一个县，有的搞半个县就行了。因此，一切问题要工作队处理。该开除党籍的，该判刑的，该逮捕的，该撤职的，能不能当教员，工厂应不应该开，还是应该关，这些问题一律由工作队处理。如果要得到批准，也不要县委批准，要省委批准，经过地委同意。因此，你们下去责任很大。同志们下去都在省委领导之下，因为你们离开中央这么远，又在那个省工作，应该在省委领导之下工作。说你们在省委领导下，而不说你们在地委领导下，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地委也不齐，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不管省委、地委好不好，你们这回下去是要彻底革命，是要把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以及城市工厂的“五反”搞彻底。这样强大的工作队去，应该有彻底革命的精神，把这个革命负责搞好，搞到底。

为了搞革命，就不要怕跟地方党委，跟县委，跟地委，跟省委，有不同意见，就不要怕争论。有意见摆在桌子上讲，敞开讲。也不要怕搞坏关系，不要怕跟省委、地委、县委搞坏关系。要革命，他跟我们一起革命，那很好，关系应该好，不革命，就应该不好。闹别扭应该闹，不闹不对。不要怕搞坏关系，目的是要把革命搞彻底。

北京有三万七、八千人下去，都是夹在各省，一个省也不过几千人，而他们一个省有几万人。我们多数同志大概是要到大队去蹲点的。在公社，在县委，可能也有个把人加入那个县的领导，或者公社的领导，那是少数，也可以不要主要负责人，无非是传达，了解情况，通知，一般掌握。一个中等的大队，二百户左右的大队，大概工作队员有二十个左右，一个三、四百户的大队，那就有三、四十个人。我的意见是，我们中央下去的人在一个大队里占四分之一就行了，最多不要超过三分之一，不要占半数。你们去了，不要一下子包一个大队，不要北京去的人包一个大队，省委去的人包一个人队。你们包一个大队，尽管你们搞好了，你们走了以后怎么办？势必要跟省委的人，跟县委的人，区委的人混在一起，而

我们中央下去人的只占四分之一，最多不要超过三分之一就够了。中央的人跟省委、地委、县委的人混在一起，人就来自各方，思想认识就会不一致，意见就会不一致，那是势必有的，而且不是坏事，是好事，这样你们才了解各种意见嘛，然后在各种意见中间求得统一嘛。中央“双十条”上不是说，要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在革命的基础上，求得统一吗？工作队内部自己不一致，工作队多讨论几次，多商量几次，解决思想问题嘛。不然，省、地、县派去的工作人员有什么事情，你们不知道，你都不晓得，那有什么好处？没有好处。让他坦白地讲出来，有各种意见，这样才好。人来自四面八方，各种认识不一样，（彭真：各种意见都充分的发表。）然后逐步说服，慢慢求得认识一致，统一思想。

为的统一思想，我们中央下去的人是不是可以这样：不要说是部长副部长，也不要说是司局长，一切长都去掉好不好？改名换姓，普通工作人员。也不要说是北京去的，就说我是省里面来的，至多说省里面来的就可以了。也可以说县里面来的。因为一个地委有好多县，彼此不认识。这样好不好？这样，就让人家好发表意见。你说是中央来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这么多长搞到那个地方，他有意见也不讲了，听你的，请你指示指示，他有话也不讲了，反而不好办了。（安子文：叫老张、老王、老李，不要暴露身份。）

这样去虽然有些困难，但是有很大的好处。王光美到卢王庄去，就是她一个人，中央没有一个人跟她去，她一个人跟人家一道，还不是一样可以搞好？也有各种不同意见，那个认识不一致比现在还多，议论纷纷，工作队自己内部不统一，一个问题要说清楚，要说好多天，大家才统一。说撤某个人的职，处理某种事情，意见不一样，这样就真正有了工作，真正有了细致的工作。这就是学习解放军，就是“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做人的工作，傲思想工作。“三八作风”，首先工作队要是“三八作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首先工作队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四个第一”，首先是在处理武器和人的关系中，人的因素第一。农业中间也有武器，就是犁耙，农业机械。在处理各种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关系中，政治工作第一，农村也是政治工作第一。在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是第一，首先要统一思想。而在思想工作中，是活的思想第一。“双十条”要念，有时候要念点毛选，念中央过去的各种文件，但主要是抓活思想。真正把那个地方的工作搞好了，学习解放军也学好了，不搞好“四个第一”，不搞好“三八作风”，你那个革命搞不好。你要是真搞好了，那就真是“四个第一”、“三八作风”搞好了，不然你搞不好的。所以，这回下去是认真地学习解放军。

为什么我上一次讲话单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四清”、“五反”问题？我就是认为，这个问题是当前的中心工作，最中心的工作。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发展生产密切相关，与培养接班人有关，与备战有关，与组织民兵有关。社会主义教育搞好了，这几方面就可以搞好，生产也可以搞好，接班人也可以培养好，备战工作也可以搞好，民兵也可以搞好。而社会主义教育搞不好，那些所谓发展生产，所谓培养接班人，所谓备战，我看也搞不好，或者可能搞好一点，基本上不能搞好。我是说当前的中心工作，而不只是今天的中心工作，这个工作搞好，要五年。所以，各方面应该支援和帮助这个社会主义教育，不要在各方面扯腿。所谓宣传部有个什么通知，小学不搞五反呀，教育部又是它的编制，人也不准调动呀，监督劳动也不行呀，各方面扯腿、妨碍是不行的。各方面应该配合这个中心工作。而这个工作搞好了，其他工作也可以搞好。

一个省只搞那么几个县，绝大多数是面上的工作。所以，面上的工作很重要，如果面上出问题，就不好了。但是，点上搞好了，一个地委有一个县搞好了，革命彻底了，充分发动了群众，那这个影响就大了，这个地委十几个县就都知道了。所以，点上的工作对于面上有很大的影响。点上的工作搞好了，也可以推动面上的工作。我想，这个影响主要是好的影响，主要是鼓舞群众，使那些犯错误的干部少犯一点，小心一点，谨慎一点，群众的积极性高一点，面上的工作也好做些，主要是这方面。但是，也可能有坏的影响，就是说，那个坏人他要搞破坏，地、富、反、坏分子看到你那个县搞的这个样子，看到你那种搞法，他藏不住了，他还不如乘早搞破坏，也会有这方面的影响。马克思讲，革命是历史的火车

头，革命是社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列宁讲，革命教育人民群众，教育革命的群众，而且教育领袖。你们下去搞革命，是发动群众起来自己搞，不是你们搞。搞革命要群众起来自己搞，这就教育群众，也教育你们，你们是领导人嘛，要接受这个教育。这样就推动了历史了。所以，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一个地委有一个县真是搞好了，那它的好处是讲不完的，了不起的。许多同志是中央苏区来的，你们想想，那个时候，中央苏区就是一个兴国县，还有一个瑞金县，福建就有个上杭县。今天有上杭的同志来没有？刘亚楼同志就是上杭的。一个县搞好了，就出好多干部。一直到现在，我们兴国的干部还不少，当将军的还不少。一个：省有上十个县搞好了，真搞好了，革命彻底了，搞成兴国那个样子，那还了得起呀？你们这些老资格，老干革命有这个经验。陕北苏区就是一个清涧出好多干部。反革命也是这样的，阎锡山就是五台人，他就是五台县的人统治山西。陕西就是杨虎成的家乡蒲城，一直到现在，讯；个地方的军阀不晓得好多。那些地方土地改革难搞，社会主义教育也难搞。但是必须搞，也好搞。正是因为军阀多，就好搞，群众就容易发动。反革命统治它也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们这一回的社会主义教育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大革命。而这次革命不只是一个省搞好几个县。我看经过这一回，是多数应该搞好。搞成兴国那样，看可不可能半数以上搞成兴国那样，一般的，不那么彻底的，要在半数以下才好，看行不行？一个省几十个县，上百个县，有五、六十个县都搞成兴国那样，其他的县也是一般的，也都可以赶上，都可以追上，追上先进县，那就是革命的彻底的胜利，那就真正是毛主席所讲的，要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出现了这种气象，那我们的国际主义贡献就更大了。是不是这样？要改造世界，我们先把世界四分之一搞好嘛。只要把这四分之一搞好了，那个四分之三就有把握了。我们这四分之一其搞好了，群众热情高得很，真正是欣欣向荣的气象，那个四分之三就可以搞好。我们中国也是这样的，抗日战争以后，我们根据地一亿人口，军队一百二十万，而蒋介石的军队四百二十多万，我们也是人口、军队只有四分之一，结果，依靠这四分之一，把那四分之三搞过来了。我们中国是这样，世界也是这样，依靠我们中国这四分之一，那四分之三可以搞过来的。那就要整个中国变为兴国县，变为抗日根据地。

因此，我们可以估计，如果今冬明春有一百多万人的工作队下去搞“四清”、“五反”，在今冬明春就可能有一个革命高潮要来，就会要形成一个革命高潮的。而这个高潮一起来，各方面会有很大的反映，会要反映到我们机关里面来，反映到北京末，反映到每一个人的脑子里头，反映到军队里面。那个时候，你们会听到很多风声，从家里，从老婆那里，从小孩子那里，从媳妇那里，从儿女那里，都可以听到反映的。这个反映，大体会比土地改革的反映还要大。因为这回搞的是不只地主富农，这回地主富农他们站在后面了，站在前面的是我们一些干部，甚而至于是共产党员，他们有些还是贫下中农出身，可是他跟地主富农勾结起末，或者虽然没有勾结地主富农，但是犯严重错误，他们一定会有很大的议论，这个议论一来，就影响我们，影响领导，影响每一个人。列宁讲，在大革命中间，每一个人都要采取态度的，他不能隐瞒的。在真：正的大革命中间，每一个人，每一个阶级，每一个阶层，它不能不反映。在今冬明春就会有个大革命来，我们预先就讲清楚，大家要站稳立场，不要动摇，不要跟着地主富农以及绑种坏的基层干部一道叫喊。因此，好得很，还是糟得很，这个问题会要来。下去工作的同志要听到这个问题，在家里工作的同志也会要听到好多反映的。如果有人要怀疑，怀疑那个地方的工作搞坏了，出了乱子，搞糟了，我也不反对你们下去看一看。你有怀疑，你去看一看嘛，跟毛主席作湖南农民运动调查一样，去调查一下，到底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再说话嘛，再表示态度嘛，不要听到什么风声，听到什么传言就叫。传来的话，不论是从那里传来的，即使是你很相信的人传来的，或者是你的朋友那里传来的，或者是从你的老婆、岳父、岳母那个地方来的，有的是自己的父亲写来的，自己的兄弟写来的，不要以为就是确实的，我看就靠不住。我的儿子也靠不住，我的岳父、岳母也靠不住，就是说假话，才靠不住哩，我就历来不相信我那个家里写来的信。不要听到传言就叫喊，不要接到信就怀疑。如果真正怀疑，我不反对你下去看看，可以下去看看，真是搞糟了，那个时候再说话也不迟。他真是搞糟了嘛，搞糟了也不好，那就纠正嘛。

当前我们的主要危险到底是什么呢？“左”倾是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是主要危险？我上一次做报告的

时候没有讲这个问题，也没有提这个问题。我差不多跟所有的省委书记都谈了这个问题，对中央正副部长不讲也不好。我上一次的整个报告内容，全篇都是反右的，不是反“左”的，只没有说是右倾这个帽子。因为在上一次那么几千人、几万人的会上这样讲不大好。今天的讲话不要你们去传达，就是你们听了，你们自己心里明白就行了。你们应该清醒，要了解这个问题，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不是“左”倾危险。你看，怕搞社会主义教育，怕发动群众，不是有几怕吗？怕妨碍生产，怕干部躺倒，怕运动过头，怕平反，怕后遗症，怕将来翻案，怕赔礼道歉，不管七怕八怕也好，多少怕也好，都是怕“左”，没有一个人怕右。我跑了几个省，都碰到他们开三级干部会，他们的发言我都看了，没有一个是怕右的，全部是怕“左”。你们听到有那么一个怕右的没有？没有一个怕右的，就是怕“左”。因为过去几年大跃进中间犯了一些“左”的错误，后来又平反，在平反中间，也不完全是平反得对，其中有一部分应该平反的，有一部分不应该平反的也平反了，有的平得过头了一些。所以，讲起“左”来怕得很，就是被蛇咬了一口，看见绳子也害怕。可以说，从中央到基层干部的情绪普遍都是这样的：早几年是宁“左”勿右，现在是宁右勿“左”；从前是怕右不怕“左”，现在是怕“左”不怕右，说右了不要紧，右了不会出乱子，右了似乎不妨碍生产，右了也没有后遗症。完全反过来了，党内的思想状态是这样的。实际上，右的乱子最大。“左”了有人叫，我看不会不叫的，右了没有人叫的，谁叫呀？右了没有乱子吗？右的乱子比左的乱子大得多。上次我说了，不搞社会主义教育是十个指头的乱子，那就是右的乱子。搞得不彻底也是大乱子，也是右的乱子。搞彻底了乱子小，搞彻底了，出“左”的乱子，那只是一个指头。大概现在可以不出两个指头、三个指头的乱子，因为过去有经验了：，右了没有后遗症？那个后遗症才人呢。已经出了那么多小赫鲁晓夫，再出个大赫鲁晓夫，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复辟，这还不是后遗症？是大后遗症。说“左”了死人，真正发动群众搞革命，那是要死点人的，有些人死得不冤枉，有些人也可能死得冤枉。但是，右了就不死人吗？右了死得更多，你晓得那些坏干部，那些地主、富农篡夺了领导权，整贫下中农，整死多少？他不汇报，你不知道就是了。所以，怕后遗症，怕平反，怕出乱子，怕什么东西，都是右的，不是“左”的。现在好在有人敢于反“左”了，真“左”了，有人敢讲话，跟大跃进时期不一样了。大跃进时期真“左”了也不敢讲话。这回我们小心一点，总不要让人家不敢讲话，总要让人家叫，不要禁止他。“左”了，会有人叫的，你只要不去禁止，总有人讲的，倒反而右了没有人叫。我在上一次讲话中间全部是反右的，防“左”也讲了一段，说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这就是防“左”。你掌握了火候，运动就不会过头，稍许过头了一点，你就转了嘛，就防了“左”嘛。还有，真正要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不反对“左”倾错误不行的。你不反对“左”倾错误，不能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左”了怎么行？不能团结的。所以，政策规定上面就防了“左”的。当然，犯右倾错误也不能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你犯右倾错误，革命搞不彻底，严重的“四不清”你没有搞清楚，退赔的没有真正退赔，地主富农的气焰没有压下去，那你怎么能够团结群众的百分之九十五？团结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也是假的，表面的。不要被那个表面现象所迷惑。叫你们下去蹲点，就是要仔细观察，了解真情实况，不要为那个表面现象所迷惑，要掌握运动的火候。为什么现在有些好同志，有些负责同志，也害怕“左”呢？其原因，就是他不会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他没有把握。群众发动起来了，好象野马一样，控制不住，因此他害怕了。群众不发动就不发动，一发动就一定要出乱子，一定要过“左”。你们做军事工作的同志，会打仗的同志，在接火以后，打响以后，会看到底是有把握消灭敌人，还是没有把握消灭敌人，没有把握消灭敌人，就赶快走，免得受很大的损失；有把握消灭敌人，就放手搞，放手攻击，把自己的预备队统统加上去。这就是看到火候了，有把握。其所以害怕，怕群众运动过“左”，就是不会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许多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学会，因此就怕群众运动，怕那个运动搞大了，自己控制不住。要控制群众运动，这是资产阶级的话，无产阶级从来不讲这个话的，只有资产阶级才说群众运动起来他要控制。美国的新闻记者常常讲失去控制，比如说越南局势他控制不住。薄一波同志他们在山西那个牺盟会要阎锡山发动群众抗战，阎锡山就讲，群众不发动是个空子，共产党要发动；发动起来是个乱子。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那就没有出路呀。这是阎锡山那个时候向薄一波同志他们讲的。这就是说，群众发动到一定程度，他要控制的，他才敢于发动。共产党从来不讲这

个话，共产党是站在群众的前面领导群众。群众中间出现了“左”的情况，有过急情绪，这个时期就来说服群众。我们相信，我们是能够说服群众的。实际上，真正过分了，群众中间就有一部分人不赞成，他只是暂时不好讲，只要我们负责人一讲，就有人赞成的。如果看见群众运动已经过头了，过急现象出来了，乱子也出来了，有过急情绪了，我看你们就去找那个贫下中农，找那个老实的人去商量，看这样搞对不对呀？这样是不是搞错了呀？同他商量商量，找积极分子谈话，他就会告诉你的，他就会说，我们已经不赞成了，已经过分了。你叫他在群众大会上讲，他不讲，找他一个人谈，或者几个人谈，他讲的。然后我们领导人起来向群众一讲，然后群众开小组会讨论，那个积极分子不赞成的就敢讲了。大概是这样的，没有学会的东西可能是有点害怕的，真正学会了，没有多少危险。对于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没有把握，所以就有些真正革命的同志，老同志，也有点害怕。假如你有把握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你怕群众运动干什么？打仗都不怕，打仗是要死人的，而且宁可打一仗牺牲几百人，几千人，我们也要打，群众运动这个仗又不那么死人，为什么那么怕？有些同志所以怕，我看其原因就是对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这个问题没有把握。没有把握不要紧嘛，学会嘛。所以，现在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这个问题要向你们讲清楚，你们应该清醒。这一点，不要你们去传达的，你们自己了解就行了，如何去运用，由你们自己掌握。我也跟各省委书记谈了，由省委书记他们自己去运用。如果由我来做一个报告，就是反右，大家就发急了。所以，我在那个大会上面没有讲，我也是有意没有讲。我在各省的司局长会议、厅局长会议上都没有讲，只是向省委书记讲。因为省委书记他们都不清醒，中央的正副部长都不清醒，我看不到，你们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要能够好好去掌握。

最近中央开了一个大区书记会议，我在会上提了这么一个问题，我说，现在到底是我们中央和省委领导基层干部多一些，还是基层干部领导你们省委和我们中央多一些呢了我提这么个问题，这个问题奇怪，历来中央、省委、地委、县委领导基层干部嘛，那有基层干部领导我们的？过去这一个时候，就是基层干部领导我们，领导省委。议论从那里来呢？大体上都是基层干部那里来。表报也是从那里来，汇报也是从那里来，意见也是从那里来，无论是工厂、农村，都是听基层干部汇报，表报也是他们填，意见也是从那里来，所以，基层干部就领导我们，不是我们领导基层干部。虽然我们不是一点也没有领导他们，问题是那个领导多一些，主要领导者是谁。我说，是基层干部，而且不是那个好的基层干部，是那个坏的基层干部领导我们更多。你们相信不相信？杭州会议，毛主席搞了第一个十条，这本来是很好的，去年上半年又搞了第二个十条，那个第二个十条就反映很多基层干部的意见。什么依靠基层组织，依靠基层干部，一切要经过基层，公社党委、支部书记要参加工作队的领导核心，工作队只当参谋，基层干部当司令，净是他们的意见，反映到中央的第二个十条上。中央开了一次会，说要根据社会主义教育试点的经验来起草这个第二个十条，而参加会议的人大概自己都没有下去的，自己没有去蹲点的，也是听了汇报的，这样集合各种意见，还不是基层干部的意见？贫下中农的意见就反映不上来，群众的意见反映不上来，基层干部的意见就反映上来。至于中央的政策，基层干部爱听就听，不听就不听，他是这样的。而中央和省委对于基层干部，那是听的，那是尊重的，你提了意见，我们就改，就决定自己的政策，决定自己的办法。你们这回下去，没有下去以前就有议论了，这个议论就是从基层干部那个地方放出来的。最近我看了北京市委一些简报，从那些简报反映的县委的情况看来，社会主义教育要那些县委去搞，是搞不好的。恐怕多数县委是这样的。因此，我们要了解，要清醒，我们要听群众的呼声，听贫下中农的呼声。现在贫下中农的意见很难反映上来，反映上来的不多，而基层干部的意见是大量的反映上来。如何冲破这一点？这就要你们下去蹲点，直接接触群众，听他们的议论，听他们的意见。而你们下去还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听到的，必须做艰苦的工作，他才跟你讲话，才把心里话告诉你，不然他不告诉你，有话他也不讲，他怕打击报复。

此外，最近江苏省委江渭清同志到北京来了一次，我找他谈了一次话。最近批了江苏淮阴高沟公社打击报复的一个文件，你们可以看到，或者你们已经看到了。原来我批的就是批评了江苏省委，后来他们声明，他们做了处理，我说，作了处理，可以不批评了，可以改，所以后来就修改了。我找江渭清同志谈了一次话，我问他这么一个问题，也可以跟同志们讲讲。江渭清同志在抗日时期打游击，江苏解放以

后，一直在江苏工作，开始做省委副书记，后来做省委第一书记。我说，你做省委第一书记做了十多年了，你对于江苏的情况算是最了解的吧？我说，你现在了解江苏的情况到底比十年以前多一些，还是比十年以前少一些？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就不好答复。我说，高沟这种事情你晓得不晓得？你知道不知道？你就不知道。我说，你就是背起个包袱，你是老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做了十多年，自以为了解江苏的情况，我就说你不了解，我说你了解江苏的情况比十年以前少了，不是多了。因为十年以前农民是个体经济，那个时候跑到乡下去，还可以听到老百姓讲话，群众的意见容易反映上来，你比较了解，反而到十年以后，经过十年，你了解得更少了。我说，不是说你一点也不了解，不是说你比十年以前什么知识也没有增加，那个山有多高，那个河有多深，也许你了解得更多了，比十年以前多一些了，除此以外，你对于阶级斗争的情况，对于群众中间的情况，社会上的情况，你了解得比十年以前少了。到后来，他也承认这个问题，他承认是比十年以前了解少了。我也问他，我说，毛主席讲的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大概你们江苏省委是除外的吧？他说，那怎么能够除外呀？我说，既经不除外，为什么不下去蹲点呀？我想今天来讲一讲这个问题。我想，这不只是江苏省委，不只是江渭清同志的问题。同样的话，我也告诉了李井泉同志，李井泉同志讲，这样的问题不只是江苏有，我们那里也有。恐怕这个问题不只是江苏、四川如此，恐怕各个省委、地委、县委虽然情况有些不同，程度不一，但是我看大体如此，就是他们不了解情况。你以为县委了解情况呀？不见得。上一次我在山东讲过这个话，我说，你们县委书记是在本县搞“四清”好，还是到外面搞好？他们说，本县搞有好处，叫做了解情况，熟悉，人也熟悉，情况也熟悉，比较好搞。我说，不见得，你对本县的情况就是有许多不了解，而所谓熟悉情况，这是个包袱，骄傲自满就表现在这个地方，自以为了解情况，实际上不了解，被人家蒙蔽了，净是看表报，听汇报，就不接近群众嘛，不接近贫下中农嘛，听不到贫下中农的意见嘛。县委书记在本县做工作是有许多框框的，许多框框妨碍他真正了解情况。省委书记也有框框，地委书记也有框框，那么，只有省委、地委、县委如此，中央各部、各局你们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呀？你们做部长也有做十年多的，至少也有做几年的，你们对于你们那个部的情况，下边的情况，就那么了解呀？有一些可能你们更了解得多一些了，业务上面的问题以及某些技术问题了解得多一点了，至于讲阶级斗争的情况，群众中间的情况，那个工厂里面到底怎么样，车间里面到底怎么样，我说你们各部、各局大概也差不多，不要把自己除外，你们也不那么了解，你们也可能是比几年以前十年以前了解得更少了。刚才我就说过，财贸各部门，你们对于县以下财贸的情况了解不了解？完全是一团黑暗，根本不了解。教育部门也是这样的，县以下的小学教育到底怎么样？根本不了解，但是又发指示。这方面解放军好一些，也不是没有缺点，比较好一些。但是，也不是所有连队的问题，特别是家属里面的问题，也是不清楚的，解放军也得自己努力去继续深入了解。至于其他各部门，各省委、地委、县委，都有这个问题，对于真正的情况是不那么清楚的。比如鞍钢，最近派了一个工作组去，只搞了三个单位，就说这个领导不在我们手里面，这三个单位都是坏人掌握领导权，是伪满时候的先生、把头领导的，那是经过五反的。冶金部搞白银厂搞了多少年，建设了多少年，结果发生了那样的问题。中央信任你们去领导各部门，领导一个省，领导一个地委、县委，结果情况你并不了解，但是天天要发指示，就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中间，这样怎么能够继续下去嘛？这样不行嘛。我看各部也是听基层干部领导。因为你听他汇报，表报是从那里来。我在广州的时候，听说造这个烟的那个烟厂，有八百个工人，陶铸的老婆曾志同志在这个厂里面搞“五反”，搞了八个月，一直没有搞清楚，厂长也撤职了，总支书记也撤职了，但是还放在厂里面，没有离开那个厂，工人还是听他的，曾志她们下去没有人听她的。搞了八个月搞不开，可是又发现很多问题。就是这个厂长、党委书记他们用这个烟收买工人，大概最困难的时候每个人一个月发一条烟，一块钱一包，几条就是几十块。此外就是送礼，向区委、市委这些人送礼，上面有根子，保护他，一直搞不开。曾志是广东省委候补书记，一个书记在那个地方搞了八个月，一个七、八百人的工厂，就是搞不开。方法不得法，没有决心，你下去搞不好就是了。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要认真地蹲下去，要仔细地观察，要充分发动群众，这些事情都很重要，要能够这样做，才可以搞好，你才可以了解情况。而你们这样做，你所了解的情况就超过那个县委，甚而至于超过公社。公社也不了解情况，你晓得。被坏分子篡夺了，公社党委不知道，有些是不知道，有些是他明明知道，他也不管，有些还跟坏人勾结，有些他

并不是勾结，他就是糊里糊涂，就是不了解。鞍钢这个经理并不是坏的，党委书记并不是坏人，现在只搞三个单位，三个单位都是坏人掌握，鞍钢几十个单位，你晓得有多少？就是在他的部下，坏人在那里掌握领导权，为非作歹，投机倒把，他不知道，而需要北京派去的人搞工作组，蹲到那个车间里面，蹲到那个矿山里面，搞几个月，才搞出来。所以，北京去的人比那个经理了解情况。你们下去认真这样做工作，接近群众，发动群众，你们可能比省委了解情况，比地委了解情况，比县委了解情况，甚而至于比公社了解情况还要多。首先是个了解情况的问题，情况明了，才能下决心嘛，决心才能大嘛。而了解情况就是不容易，要经过许多曲折，要经过艰苦的工作。只要你真能够这样做，情况是可以了解的。你提高警惕，一看就知道了，一听就知道了。看基层干部到底贪污没有，多吃多占了没有，只要看他戴了手表没有，修了房子没有，有自行车没有，有收音机没有，一眼就望到了。当然，有些藏起来了，他不露出来，有狡猾的人，但大多数还没有这样狡猾。为什么普通的社员不能修房子，不能买手表，为什么你买？你不要去讲，不要对外宣传，查清楚再讲。一看就大体清楚了。但是，你要真正搞清楚，必须再通过内部的人来讲，内部分化，他才可以把内情讲出来。所以，你们真正能够下去蹲点，比那个没有蹲点的人就会变成内行，不管他是县委的，或者公社的，或者区委的，或者地委的，省委的，到一个生地方，你了解的情况比他多。

了解了情况，然后就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先有框框。如果要有框框的话，只有个大框框。大框框是什么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党中央政策的基本精神，而不是那个具体政策某一条。只有党中央政策的基本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就行了。然后你去了解情况，从实际情况出发，看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而要从实际出发，你首先要了解实际。别人都讲他了解实际，省委讲他了解实际，地委讲他了解实际，县委讲他了解实际，公社讲他了解实际，到那个大队，支部书记向我们汇报实际情况，也是他了解，你不了解，你是从北京来的，你不了解情况，我了解。才不要相信，才不要相信省委、地委、县委就那么了解实际情况。甚至于公社也不了解实际情况。那个支部是了解实际情况的，那个基层组织是了解情况的，他不向你汇报就是了。有许多情况他不向你汇报，你从汇报中间听不到，或者听到是假的。就是从实际出发，首先得搞清楚实际是什么。而要了解实际情况就不容易，要经过斗争，经过争论，要做许多艰苦工作，然后才能了解实际，然后才可以从实际出发，然后才能发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你们真正能够这样做，解决问题也不困难，了解情况也不困难。有许多现象，有许多汇报，这个子部这样讲，那个干部那样讲，贫农这样讲，下中农那样讲，其中有矛盾，你在发动群众以后加以揭露，再加以调查核实，最后就搞清楚了。搞清楚情况，这个问题要处理，要解决，并不困难。

你们这次下去不只是一个了解情况的问题。你们下去搞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除开在一个大队里面搞农村“四清”以外，恐怕还要帮助他们搞县以下的“五反”，把县以下各行各业的“五反”跟城镇“五反”也要搞好。而不搞好这个，农村“四清”搞好了也不行。如果把这些工作真正做好了，刚才讲了，那就不只是会形成一个欣欣向荣的气象，而且会锻炼出我们大批的干部。群众的革命运动不只是教育群众，而且是教育领导者，我们要在革命运动中间受教育，你们要在革命运动中间受教育。

中央有个“四清”办公室，有个“五反”办公室，两个办公室，一个办公室五个人，可以看看材料，你们下去也可以跟北京联系一下，跟办公室打打电话，写写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也可以来问问，主要是靠你们自己。我相信，你们过去是老革命，搞过许多工作，也有经验，只要真正能够放下架子，不再高官厚禄，不再养尊处优，不再骄傲自满，故步自封，跟群众接近了，真正了解了情况，问题就会解决。你们不会碰到困难的问题解决不了。可能你们跟省委、地委顶牛，省委就是说不服，地委就是说不服。这个时候，你们可以打电话，把你们的意见跟省委的意见告诉中央。当然，中央还要看，到底省委意见对，还是你们的意见对，可以帮助你们判断，中央也可以跟省委商量。不要以为你们这样一下去，中央讲了，我到各省走了，再念了“双十条”，下去就不顶牛了。大概跟基层干部顶牛你们有办法，跟公社顶牛你们也有办法，跟县委顶牛你们也有办法，就是跟地委、省委顶牛你们的办法就少了，

意见不一致，就是不能取得一致。这个时候，你们就需要中央来帮助一下。这个时候可以打电话，或者写信。中央有办公室，虽然只有×人，也接接电话，可以了解了解情况，加以帮助。这个办公室是不发表报的。同志们，你们这回下去，同时要反对“五多”，不要你们下去又搞“五多”，又搞许多表报，工作队也搞好多表报。你们一下去就会了解，一到大队里面去，各种表报，你们自己填一填，看一看，有各行各业发下去的表报，看你们晓得不晓得填？你们如果不晓得填，问他那个大队里面是谁填写的？他又怎么填法的？你就了解这个情况嘛。了解了情况，你才可以反对“五多”。所以，这回不只是把基层的情况弄清楚，把工厂、农村搞好，而且可以使领导机关的工作得到大大的改进。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真正搞好了，工厂的社会主义教育真正搞好了，势必我们的机关工作也会要来一个大跃进，也会要搞好的。

大概我今天讲的就是这样。今天讲的话不需要去传达。但是，也不是每一句话都不能向工作队讲。可以当作你们自己的意见来讲，不要说是我讲的，不要普遍传达。至于运用，要自己去运用，自己运用得好就好，运用得不好，出了乱子，也是你们的，不要说我在这里讲了，要你们出乱子的。你们会运用嘛，正副部长还不会运用，那怎么得了？运用得不好，出了乱子，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不要推到我身上。但是，我想，我这样跟你们讲一次有必要。

再见吧，同志们。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43） 在经委党组汇报工作时的讲话(1964年9月23、26日)

（当汇报到过去“五反”对阶级斗争新形势，新特点认识不足时)，刘少奇说；没有去年一年的侦察战，就不能暴露这些问题，就不能提高认识，就不能取得经验。

工业方面还没有一个从头到尾系统的“五反”经验。白银厂的经验也不全面，只是总结了夺权斗争。白银厂上面没有根子？不能相信。白银厂要继续搞，创造典型经验。应当总结出；一是运动是怎样进行的。二是发现了什么问题，怎么解决的？作法，步骤。三是有关单位和干部犯了什么错误，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总结要写出过程，别人才好学。典型经验长一点不怕，要写得清楚，别人才好学。虽然长一些，但干这件工作的，就愿意看，就不嫌长。

白银厂的“五反”工作，不要冶金部直接领导，要经委直接领导，工作组就算是经委的。如果要冶金部领导，就追不到他自己。省、市委也是。

（当汇报到各地究竟有多少人参加“五反”，有了一个初步统计，没有催下面报，怕催急了要报假时)，刘少奇说。不要去催。

（当汇报到一个部除同省、市合作抓几个点外，还要负责包干四、五个点，取得直接的经验时)，刘少奇说：四、五个点搞得了不？一个部包五个点可能多了？一个也太少了，搞两个、三个可以了。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吞下。今年主要是练兵练将，点少一点，先取得经验，明年就好搞了。

（当汇报到白银厂牵连到白银市的问题时)，刘少奇说：证明只搞白银厂、不搞白银市是不行的。集中力量搞一片时，可以上下左右一齐搞，上下左右联系起来，就一齐挖出来了。

（当汇报到打歼灭战有两种方法，很多地方现在是按片打歼灭战，中央部则是抓重点企业，有的重点企业正好在地方组织歼灭战的片上，这就配合上了，有的不在，在力量安排上就有点矛盾时)，刘少奇说：两种方法都可以试验，要注意配合。一种以地方为主，部派人参加；一种以部为主，地方参加。两种方法都可以试验。

（当汇报到有些部门有特殊情况，如地质队、建筑安装队伍应当利用冬季整训机会进行“五反”，就不能参加“四清”或其他行业的“五反”时)，刘少奇说：要考虑这种特殊情况，让他们利用冬训，先把自己整顿好。这些单位自己不整顿好，怎么参加别处的“五反”斗争？但地质部也不能布点太多，先少搞几个点，取得经验。

（当汇报到“五反”的步骤和做法，并介绍了各地的一些做法时)，刘少奇说：你刚才提出了一个问题，到一个工厂里，究竟从什么地方下手，经过什么步骤？有的说从这里入手，有的说那里入手。我看首先不要有“框框”。作个动员报告，放手发动群众，号召群众，有什么就揭发什么。看群众要求解决些什么问题，可能先是住房子、吃饭的问题，也可能是反对打击报复问题。无论农村、城市，打击报复问题可严重咧！群众要求解决什么问题，就先搞什么问题，不能按照工作队事前准备的“框框”去办。

王任重同志讲有些地方搞对敌斗争顺手了，要先搞对敌斗争，后搞“四清”。我说，不是工作队顺手不顺手的问题，而是群众顺心不顺心的问题。群众要求解决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先搞什么，后搞什么，主观上不要预先规定“框框”。

（当汇报到华北的做法，大揭大讲阶级斗争之后打六个硬仗时)，刘少奇说：先干部检讨，“洗澡”、“放包袱”也需要。应当向干部讲清楚，先打个招呼，是自己讲，还是让群众揭发？自己彻

底“放包袱”，就可以争取主动，放得不好，群众还会揭发的。可以这样做，先搞一段干部“洗澡”、“下楼”，也可以。但不是一定规定死，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不能有“框框”。

至于群众“洗澡”，×××同志说，他那儿洗得好，洗出不少问题。他听了王光美的报告后说，群众“洗澡”不如山西那儿搞得好。问题的关键是不要去整群众。只要干部“洗澡”洗好了，群众自然就会洗了，时间不要长，只要几天就行了。只有极少数的人才斗争、揭发一下。这一点，可能工厂同农村不一样。但问题都主要在领导方面。

（当汇报到群众怕打击报复时），刘少奇说：打击报复，这叫反革命，当反革命办理，而且是现行反革命。你打击报复，我不会打击报复？撤你的职，开除党籍，开大会，公开地讲，这样，被打击的人不是就积极了吗？

打击报复就是反革命，过去没有宣布这一条，要先打招呼。但党内也有过规定，打击报复要开除党籍。解放初，不是开除了黄逸峰党籍！就是因为黄打击报复。黄曾几次给我写信，要求重新入党。开除后，还允许你改正。

（当汇报到工作队与企业党委的关系有几种作法时），刘少奇说：问题是他们可以信任不可以信任的问题。可以信任不可以信任，要在运动中看。我看还是上海的办法好，工作队是上面派的，在企业党委之上，这种办法好。工作队受上级党委委托，整个运动由工作队领导，全权处理。企业党委如果是好的，赞成革命的，搞清楚了的，就可以参加领导核心。搞不清楚的，怎么能让他参加呢？他参加，是为了探听消息。你的司令部里有他的人，他的司令部没有你的人，对作战不利。所以，开始时，工作队不要吸收他们参加。但是，要听他们汇报，要叫他们“洗澡”。要看看他嘛！看他赞成不赞成发动群众。开大会也要他讲话，讲得不对的，你就当场驳嘛！譬如他要群众、：干部说话时“要实事求是，讲问题要拿出证据来，不能乱说……等等”，你就当场起来反对嘛！群众那儿来的证据？他贪污，群众也没有给他打收条，收条也不在群众手里，群众只能提线索。经过一个时候，发现党委是比较好的，是革命的，当支持运动的，可以参加领导。如果不积极，一点主动性没有，被迫革命，就不能参加。工作队下去，要规定这一条。有些企业领导干部，有点错误，但改正了，群众信任了，谅解了他仟9，这才能参加。如果群众不信任，害怕他，就不能参加。参加对运动会有妨碍。一到企业里面，工作队不要他参加，他就不高兴，就顶牛了，甚至有的市委也不欢迎工作队！大体都是喂饱了，不干净，也好嘛！这就发现问题了，你要没有问题，为什么要顶牛呢？城市“五反”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必然会把某些有问题的市委、某些有问题的部也扯出来。一定是这样。

（当汇报到有人利用过去规定每周搞运动不超过六小时来限制工作队的活动时），刘少奇说：这个规定要取消，通知一下。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总有那么个把星期，什么文化学习等等还能不停？这时每天延长几个小时的活动，群众也愿意。（薄一波：我看，如有必要，在这个短时间内，生产也可以减二小时嘛！）至于干部紧张些不要紧，应当紧张。他时间有的是。组织得好，不会影响生产。如果太紧张，群众太疲劳了，高潮过去后，可以让群众多睡几个钟头，不就恢复过来了！

（当汇报到有些企业抵制工作队，把反对自己的人，了解情况的人派任务调离工厂时），刘少奇说：湖南张平化化名章进，到公社蹲点，五里以外就下车，背上行李，走到衬里。工作队先去了几个人，扎下了几个根子。公社怕这些人反映情况，就把这儿个人调到外边去，封锁工作队。

（当汇报到如何划阶级还没有经验时），刘少奇说：你们先搞几个点，划一下嘛！主要是查过去家庭的成分、出身，查历史情况，政治面目，解放后的表现。主要问题是查坏人，查投机倒把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有右派，以及蜕化变质分子，历史上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分子。查这些人是怎么钻进来的，怎么夺得领导权的？取得领导权以后，又办了些什么坏事？没有取得领导权，又未办坏事，只要查

清历史就行了。

现在的阶级成分要不要划？值得研究。你只要查他的出身、在工厂中的表现嘛！查清每个人过去报的出身是不是假的，政治表现究竟如何？即使无产阶级出身，老干部、贫农出身，打过游击，现在当厂长、书记，但跟人家做坏事，变了，跟资产阶级走，也得查。虽然他出身好，但表现不好。不管你什么成分，你现在变质了，就不代表无产阶级，不代表工人。

查的时候，自己讲过了，还要查对，有些问题是自己交待的查信中农这样××××××××××××××××××有些是群众揭露的，有的还要派人去查。仅写一封调查信，要公社填不行，只问干部也不行，到农村要问贫、下问同他们有关系的人。过去国民党反动派整我们也是我们也是对口供骗他们。但只能对关键的地方，一些细节就说不清楚了。(薄一波：我们靠国民党军阀的官僚主义。)我们不怕军阀、官僚，打板子、动刑，那不怕。怕的是叛徒和法政学校毕业的那些人，他们专门问一些具体的细节，如见过几次面，穿什么衣服，坐在你左边还是右边等等，先问你，再问另外一个人，一对，就对不起来了，就知道是假的了。还有是注意查表现不好的，表现不好的，常常就是有问题的。

（当汇报到运动中要放手发动群众，不要前怕狼后怕虎时)，刘少奇说：运动出乱子，出“左”的错误，一般可能性不会大，只要有工作队在那个地方。出一个指头的错误，不要紧。如果你真的有了三个指头的错误，群众就会说话了，群众就会对你疏远了，就搞不下去了。大跃进时，就是没有下去听群众的意见。

（当汇报到城市“五反”对敌斗争的复杂性时)，刘少奇说：从前打明仗，明仗好打，现在打暗仗。从前我们在暗处，敌人在明处；现在我们在明处，敌人在暗处，我们有时看不清楚。

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敌我斗争，敌我矛盾，大部分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一眼看起来，是我们的同志，他嘻嘻哈哈，也向你汇报，表面工作也应付得满好。人民内部矛盾中隐藏着敌我矛盾。要把这两类矛盾分清楚，很不容易，如果你不深入发动群众，就分不清，你晓得他是不是？搞错了不行。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不行，把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也不行。所谓困难，就在这个地方。一方面是了解情况有困难，一方面是分清楚不容易。但真正深入群众，认真对待，也并不那么困难。只要认真蹲点，蹲下去，问题就发现了，也没有那么神秘。

（当汇报到托拉斯组织起来以后，部的职能将有变化时)，刘少奇说：托拉斯管工厂，管实际工作，部只管计划工作，搞综合平衡，做政治工作，监督托拉斯，管这些托拉斯。托拉斯也是要监督的。

我们管工业，科学性、灵活性应该比资本家高明，看怎么合理，就怎么办；资本家看到合理，有些也办不适。他们有竞争，统一不了，有市场、原料的争夺。有的一个行业还有好几个托拉斯，相互竞争；一个托拉斯下面还有几个小公司，有竞争，有矛盾。它也是垄断的，但垄断不全。同时，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赚钱，唯利是图。我们就没有这些问题，就可以办得比他们好。我们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人民服务，为国防服务。赚了钱也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人民服务。因此，我们就能发动群众，动员群众的积极性！只要领导干部不贪污盗窃，不腐化堕落，不搞“四不清”，能走群众路线，特别是参加劳动，同工人接近，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如果干部是官僚主义，不参加劳动，东走走，西看看，人家提出意见，你还不听，或者你在生活上还乱搞。那么，工人就不满意了，工厂就办不好了。

（当汇报到苏联也试办过托拉斯未成功时)，刘少奇说；苏联试不成。只有大公无私的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者才能搞成。这些人，是认真作事的，不是为自己的，工作方法也对。不懂不要紧，同技术人员和工人商量。开始都没有经验，都不懂嘛！我们过去打仗也是不懂，就知道革命嘛，只要方法对头就成功了，取得经验了。

（当汇报到工业管理机关很多，又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时），刘少奇说：工业厅、局到底是行政机关，还是经济机关？应该是经济机关嘛！现在的机关，就是要表报、开会，有时还要文字报告。

（当汇报到现在已经办了烟草等四个托拉斯时），刘少奇说：烟草公司办起来以后，是不是也是行政机关，是官僚机关。（答：已有改进。）托拉斯办起来了，上面的部的工作就少了，部只管作计划、监督、检查，做群众工作。你这个部长下去，就是开群众大会，听群众的意见。开会时，车间主任不要参加，背靠背，问问群众有什么意见，看车间有什么问题。你们如果深入下去，问题就隐瞒不了了。工厂是最好做群众工作的地方，它同军队一样，是集中的，是产业军，有时它比军队更集中。一个工厂有几万人，十几万人，军队那有十几万人常驻在一起的？

石油部改为公司好不好？同余秋里商议一下，石油部带个头，把部改为公司，不当部长了，当公司经理，副部长当公司副经理，待遇可同部长、副部长一样。

煤炭部也改为公司，好不好？各厅局一律取消，叫分公司嘛！改两个部好不好？

取消部长，不做官了。不过，搞不好同样会是做官的，不叫部了，就免掉许多事，可以不参加宴会，不接待外宾，减少许多行政事务。

（当汇报到烟草公司已将×个烟厂减为×个，精减了职工×人时），刘少奇说：为什么这么多？还是人太多了，还没有彻底。当然，有很大进步了，就是按照这种官僚主义的统一，也比原来分散的好。两个官僚主义，你也官僚，我也官僚，我这个官僚主义比你那个还好些。上海烟厂是比较好的，可以考虑搬到豫西，或者伏牛山去，那里不是出烟叶子吗！至少一分为二，接近原料产地。

×个厂太多了，要砍掉一半，一个省一个，也太分散了，要结合原料考虑。现在要乘调整一线迁厂的机会，加以调整。云、贵、川有烟叶子，就可以办厂。

托拉斯统管起来以后，就可以再进一步用共产主义和群众路线的办法来管理工厂，不做官了。不做官，不当部长，是不是降低了你的地位了？没有，而是提高了地位，改进了工作嘛！

（当汇报到由于烟叶集中调拨，高级烟，牌子减少了，质量提高时），刘少奇说：有几个厂烟的质量下降了，如越秀牌不如从前了。工厂没有管好，也可能有坏人。厂长、总支书记虽然撤了职，但没有调开，工人还听他的话，还在背后指挥。在困难时期，他们给每个工人发两条烟，收买了工人，也向市委送了礼，向区委这了礼。只有广东烟厂有这个问题，别的厂没有？

（当汇报到烟叶收购也将归托拉斯时），刘少奇说：这样好，集中产区由公司去收，分散的可委托代收。收购烟叶有技术问题，有等级问题，归托拉斯，可以同生产结合。

棉花将来也可以这样做。过去有个花纱布公司，但它不管生产，工厂也不归它，棉花收购也不管。棉花收购，分多少级，要同生产结合。

（当汇报到有的托拉斯成立后产品质量有所提高、成本有所降低时），刘少奇说：产品增加了，质量提高了，费用减少了，证明这个官僚主义比那个官僚主义为好。不要以为这(指托拉斯)没有官僚主义了，还要第二次革命。托拉斯要办就一定办好。必须用无产阶级的办法、共产主义的办法来管理，发挥工人积极性。托拉斯可以搞半工半读，办技工学校，搞科学研究，使工人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得更好。至于说办托拉斯办多了，收工厂不容易，怕同地方扯皮，不怕，我是马列主义，你不是嘛！如果你是，就同意你的意见嘛！

（当汇报到托拉斯要实行经济管理时），刘少奇说：首先是无产阶级管理，共产主义管理。同时也要经

济管理，技术管理。

托拉斯出的产品，要质量好，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不仅出产品，还要出经验，包括先进技术经验和管理经验，出人材，出干部，出接班人。将来政府的干部就从这里出。

（当汇报到先收主要工厂，次要工厂可暂不收，通过供销来统一管理时），刘少奇说：还有那些不听话的，不肯订货的，就要收。其他也可以暂时采取加工订货的办法。

（当汇报到收工厂有些省市比较支持，有些省市有阻力，例如沈阳等地，汽车配件广不愿让收时），刘少奇说：为什么他们要汽车配件厂，是不是自己想制造汽车不行，非收不可。

（当汇报到医药厂有×个。分属许多部门和地方公社管理，不少公社小厂的产品质量低劣，牟暴利，也影响人民健康时），刘少奇说：医药厂要归医药公司，而且要规定药厂产品要经过鉴定。国家要定一条法律，一切药厂的产品都要鉴定合格，才准生产，不好的一律查封。你们写一个简短报告，只要一篇纸，请中央批转有关部门和省、市委，所有医药厂一律归公司管，不准地方管，药品一律归卫生部门鉴定。

你不让收，这有什么道理？应当扯皮的你们就扯，要斗。

（当汇报到地方如何试办托拉斯时），刘少奇说：大家都办，全国就没有了。凡是需要全国办的，地方有什么道理办地方的托拉斯？地方办的主要是产、供、销可以就地平衡的。有人说，电机公司，可以上海办一个，东北办一个，钢铁公司，可以东北办一个，华北办一个。你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办？什么道理？为什么不全国办一个呢？我们是靠共产主义，不靠竞争。如果这些都让地方办，产品就可以归他。恐怕不大合适吧？

纺织部办了一个纺织机械公司，为什么不办棉纺织公司？怕办起来，部就没有了？将来就是要把一些部、省厅局搞掉。

（当有人汇报到公路运输可以由地方办时），刘少奇说：公路运输可以有地区性的，但也要搞全国的。有些跨区的一个地方就不好办。地方办，中央也办。有些航运，只能地方办的，如珠江航运等，就可以地方办。

（当汇报到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因考虑将来是否同汽车公司合起来，尚未开始试办时），刘少奇说；相同的将来就可以合嘛！这要碰到一些部的分工问题，不要管部长们愿意不愿意！就是要取消一些官嘛！要作斗争，你当官好，还是当普通老百姓好。

（当汇报到托拉斯供产销统一管理的问题时），刘少奇说：托拉斯管生产，也管供销。供销要与物资部及商业部联系，要有分工，有的产品归物资部门销售，有的归商业部门销售。托拉斯没有什么巧处，就是我管起来，你不能管，无非搞生产，搞原料，搞批发。

至于说，厂归你管，我就没有管的了，就没有官做了，实际上就是要取消一些厅局，就是要取消这些官。

统起来以后，还要走群众路线，用共产主义方法管理企业，反对官僚主义。

（当汇报到有些同志蹲点又回来时），刘少奇说：有些人名义上蹲点，实际上没有 下去。查查有哪几个，你们可以检查吗！（××：有几个部长回来是利用工厂国庆节假期回来换冬装的，是经过批准的。薄

一波：我们规定一条，不经过批准不许回来。)规定这一条好嘛！蹲点要改变生活方式，住惯了暖气房子，下去就不习惯了。过去我们是工人农民出身的多，现在当老爷了，就是要搞掉一些做官当老爷的。问他：你究竟拥护毛主席反对三自一高的指示，还是要做官当老爷。

(当汇报到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准备试点时)，刘少奇说：你们要支持，不要采取消极态度，不准刁难、反抗，以至反对。反对半工半读，就是反对消灭“三个差别”。

看了新华社的四川一个稿子，四川有个无线电厂，已经办了好几期半工半读学校，还办了大学，主要是培养本厂工人。今后工人上半工半读学校，不能拿全部工资，不能减工资就不要来，就上业余学校。工厂办半工半读学校，不能光吸收本厂工人，还要吸收外面新的学生。新陈代谢，逐步使工人阶级成为有文化的人。这样一搞，无产阶级就有很大改变。过去，无产阶级有一个很大的弱点，就是没有文化。写小说，搞科学技术的，都不是无产阶级，都是资产阶级。我们训练出来的“三门”干部，基本上也是资产阶级。

半工半读一搞，我看将有很大变化。五十年、一百年以后，我国工人阶级都将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了。这样办学校，国家可以省钱，学校可以多办，教育可以普及。

一九五八年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天津实行了，四川无线电厂也实行了，许多地方没有办。现在不能再等了，再等就要吃亏。

44）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你写的材料我没有看，我也想找你谈谈。至于材料那是次要的，主要是从大的地方考虑自己的问题，不怕小的地方的问题。郭洪涛也是这样。王明路线时，你有原则错误。当然，不是你的责任，但你是坚决执行的，是犯了王明路线错误的。你说你不赞成，但是你没有写出文章，没有发狠心钻马克思主义，虽然工作努力，但没有做出大成绩来。你受了打击，我看还太轻了，受了打击有好处，主席那时说有五不怕，包括不怕杀头，不怕老婆离婚。主席受打击，但更钻研马列主义，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主席就是在这个时候写了很多东西，例如《矛盾论》、《实践论》、《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等。主席并未因此而松懈，反而劲头更大，钻马克思主义，写出东西来，作出了成绩。我也是，从1929年起直到延安整风才讲清，也是十几年，并未泄气，而且写出了东西，《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白区经验总结》，都是在受打击时写的。越受打击越钻马克思主义，接近群众，写东西。你就不是，没有写出东西吆。有了东西，可以印发吆，那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我在陈独秀错误路线时，心里不满意，但没有公开反对，因为是做群众工作的，知道那样不行，但未公开反对。从瞿秋白起，开始反对。李立三、王明路线，我都反对，都遭受打击。一面打击我，一面还让我作工会工作。工会工作很重要，因为中国工会工作在先，党的工作在后。工会工作只有我作，他们不会作，所以，他们也不敢开除我。撤了我的职，我写文章反对，不点他们的名。李立三时写了文章送给他看，他也糊涂，看了也看不出来，说送去发表。奇怪的是撤了我职工部长的职，却让我作工会委员长。当时他们决定由××干，××不干要我干，他们也只好批准。到苏区时还让我作福建省委书记，当时××是江西省委书记，中央苏区只有两个省委。又打击我，又不能不用我，让我做福建省委书记。就是党的工作，他们也不懂。以后到北方局工作，实际我是按我这一套，做出了成绩，写出了东西，送给他们看，他们也看了。白区工作会议时，在政治局开会，他们反对我，说我在北方局有路线错误。洛甫写了十五年经验总结，说他们一贯正确，没有路线错误。我与他们辩论，他们驳不倒我。他们一面说我路线错误，一面还要我作北方局书记，我辞职不干了，他们还是让我干，因为他们不懂党的工作、工会工作、白区工作。撤了职更好，撤了劲头更大，相信真理好好工作，好更多读书，写东西。受打击，如打击错了，你拥护真理，相信你对，为什么垂头丧气？应该好好工作，更好地钻马克思主义，钻实际。即所谓抓两头，一头马列主义，一头实际，做群众工作。同时要守纪律，不讲闲话，越受打击越守纪律，背后不讲，当面讲。我和主席原来是互不知道受打击的历史情形的，一直到延安才和主席讲，他讲了他的历史，我讲了我自己。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受了打击不能泄气，不能觉得自己倒霉。反之，你相信自己对，有真理，劲头应该更大吆。撤了你的职，你可以更好地钻马克思主义，深入群众做工作，有经验写出来吆。你就没有写出东西来。洛甫反对我，我说你写出来。他知道我能写文章，他也不写了。

鲁迅原来不是马列主义者，人家反对他，他就钻马克思主义，懂了，变成马列主义者，更坚决。他从来写东西深刻，人家越骂他，他越研究马克思主义。革命越坚决，写东西越深刻。

不是呕气吆，呕了气，就要有股劲，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应该如此。关于你过去的问题，主要讲大是大非，至于那些具体材料对不对头是次要的。重要的问题是在这里。王明路线，你拥护，犯了错误不要紧，有错就改吆。无论谁，只要没掌握真理，犯了错误都要改。如果自己对，那就应该劲头更大。这是你的弱点，要再鼓起劲来。当然，受了打击更加谨慎，谨慎是对的。如主席写文章，为了几个字，改了又改，有的文章写了几年不拿出来。受打击就更加有劲，更加深刻地研究问题。如《矛盾论》、《实践论》是主席讲书时，研究了哲学(人家说山里不出哲学)，那是针对党内斗争情况讲的，是斗争，只是没有点名，所以光从文章字面上看不出来，现在不都了解啦，清楚啦？你光说你对，就是写不出东西来；如你有东西，我加批印发就行了。而你是受了打击，情绪不高，劲头小了，不是更深刻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这样就还会犯错误，犯了，好再逼着你去学，这才能锻炼吆。要吃透两头，一头马克思主义，一头群众。人的知识就是从群众中来的，从实践中来的吆。在立三路线时打击我，为什么仍然要我干，就是

因为我在群众中，做群众工作，我能提出一套意见，别人提不出来。凡是中央出了问题，你就到群众中去，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也只：有到群众中去，××的左派就是如此吆。因为上层建筑，人家掌握了，你没有么。当然，能掌握一部分，就掌握一部分。即使在上层，也要特别注意接近群众。总之，就是这么两条。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又去作群众工作，武装群众，而群众是打不倒的，你越打他，他越革命。所以，不要怕孤立，深入群众是孤立不了的，如果自己不是错误的话。如果自己错了那就改。至于水平不够，那就学么，但书也不要念的太多，多了用处不大，《资本论》我只读了第一卷，还没有读完。《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读了，李达的社会学读了，米丁的哲学著作一厚本也读了，但都忘了，也怪，越大本头书，越记不住。读书不在多，只要关键的东西读了，如《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史》。起作用的就是那些小册子，到了有问题的时候翻一翻。现在好办，有秘书帮助翻吆。在实践中碰了钉子，想一想那里犯了错误，这样，知识逐步增多。

决议错了，可以改吆。任何一个决议或者一项政策，不管是中央的或者是谁的，错了都要改，不改就是非马列主义。如中央第二个十条，错了就改。至于现在是否都对了，也不一定，将来还要改。如人民公社六十条，还能不改？我看要大改，可惜我们现在尚无经验。也有些，如大寨、耿长锁等的经验，要好好总结总结。

至于历史决议错了，也可以改吆。……总之，有错必改，不论谁都要反对，当然，有错而改了的，中央要拥护，那有人不犯错误的？如果不然，有错不改的，中央那就不拥护，当然也要看是大错还是小错。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45）在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期间的谈话（1966年8月31日）

（何伟：少奇同志到各地讲话以后，各地各级党委对半农半读教育非常：重视。现在农村耕读学校发展很快，耕读小学已发展到×万所，有学生×万人；农业中学也发展到×万所，学生×万多人。）

发展得很快啊！一下手就发展开啦！

（陆定一：一九五八年农业中学最多到×万所，学生×万人，到六二年下降到×千所，学生剩下×万人。现在小学已经赶上五八年了，农业中学还没赶上。）

这个靠住靠不住哟？你们还是要查一查。抽查一下，马马虎虎的查，是查不出来的，要认真的查一查。

（何伟：现在我们主要抓农村的半农半读，城市的半工半读我们还抓得很少。城市办半工半读学校更复杂一些，还正在试点。）一城市是复杂一些，难办一些。初中以上的半农半读学校你们有没有？要把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办起来，招收初中毕业生。这个办了才顶事，效果会显着，光是初中毕业还看不出效果来。中等技术学校你们管不管？

高等师范是不是归你们管？

高等师范的学生是你们的教员，如果不管高等师范，中等技术学校的教师怎么解决？高等师范设什么科，什么系，培养什么样的教员，总是要培养一些教农业的和工业的教员。现在培养的知识分子总是放不下架子。耕读学校办不好，主要是思想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是次要的。如果教师没有劳动习惯，没有亲身的体验，就无法当好耕读学校的教员。

（当汇报到普及教育主要问题是农村，而农村教育的普及问题又是贫下中农子女入学问题，要使贫下中农子女入学，非实行两种教育制度不可。办学要采取多种形式，千方百计为贫下中农子女入学想办法。）

对！那就基本上普及了，多种形式适合需要嘛！

（当汇报到耕读学校花钱不多，发展很快。例如山东肥城四十多所农业中学，三千多名学生，国家只补助八千三百元；而肥城一中，只有八百多学生，一年却开支了八万三千元。）

这样，国家负担不起，群众也负担不起。小学毕业要升中学，中学毕业要升大学，这是很自然的。这样，不只贫下中农上不起，包括你们在内，也包括我们在内，如果有四五个孩子都要上大学，我看你怎么办？所以，不推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这个制度是不行的。我们一定要以苏联为鉴+他们不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越来越缩小，而是越来越扩大，完全违背马列主义的原则。如果我们也照他们那样下去，将来就非出高薪阶层不可。这就是修正主义的基础。他们这样做，还有一套理论，说脑力劳动者参加体力劳动是浪费。他们生怕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了，这是极端反动的。这种理论在苏联社会里有，在我们社会上也有。农业大学里不是也有这种反映吗？不要你多劳动嘛，只要你劳动半天就行了嘛！

（当汇报到十五年规划中的设想，五年普及小学，十五年内普及初中，同时积极发展中等技术学校。）

对！他们总是要逐步升学嘛！将来还要把农业大学办起来，就在农村办大学。那里有学生，我们派教员去就行啦。你们现在要改一些中学为半农半读的学校，办成中等技术学校。有的办大学。以后国家增加一点经费，就办这个事业，全日制不增加了。办这个事业也要不了多少钱，只要给点材料，学生自己

盖房，他们会动手的，抗大就是这样的，自己挖窑洞。

（当汇报到现在农村的农业初中大多是小型分散的，学生学习在校，劳动在队，食宿在家。）

是走读。在城市搞中等技术学校，多数不能走读，没有自行车就不行。办中等农业技术学校和半农半读的大学，还要有点基地，县的国营农场就是县里将来办大学的基地。现在农村已经有些高中毕业生了，招生是可以招得来的。他们已经劳动过一两年了。主要的问题是教员和教材，此外就是物资和基地。

（当汇报到耕读学校经费的来源及广大工人、贫下中农支持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以及今后会不会再垮。）

你们有劳动群众作基础，有体力劳动作基础，城市的中工半读学校，工人高兴，农村的半农半读学校，农民高兴。就是还有些知识分子不高兴。当然，也许还会垮一点，总的是不仅不会垮，还会大发展。

（当汇报到半农半读，半工半读可以密切结合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很复杂。）

半农半读本身就是阶级斗争。

（当汇报到刘少奇原来讲，五年试验，十年推广，但是从现在的农村形势看来，还可能快一些。）

好呵，能快一点更好。有的人就是要维护脑力劳动，总认为脑力劳动高一等，就是基层干部、农村支部书记，生产队长、工厂的工段长，也成了脑力劳动者了。他们也反对体力劳动。大庆搞三定一顶，动员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时，有的干部就抱怨说，我搞了这么多年，好容易才搞了个干部，你又要我参加体力劳动！很抱怨。消灭三个差别，不要看得容易，这就是阶级斗争的表现，这就是资产阶级同我们争夺社会基础，争夺后代。你们教育部门的干部首先就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汇报到这次会议如何开，并准备搞一个文件时。）

搞个文件好！送到中央，给你们批一下。

（陆定一：上面号召是非常必要。同时县一级的领导和规划也很重要。例如阳原是个穷地方，是有名的“糊糊川”，经费没有增加，但学校发展得很快，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已经六年了。象这样，只靠教育部调济经费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今会议还应当把阳原的经验讲一讲。阳原的经验过去已经整理成一个小册子，曾在人代大会上发给每个代表，这次会上可以再发一次。）

从群众中来嘛！希望能把问题提出来，集中起来，依靠群众。现在看来，县一级很重要，依靠县里去调济，这样一来，经费问题不很大。

（陆定一：小学的问题，看来不很大，全日制小学不要去改半工半读。初中毕业生只有百分之×能升学，这个问题很麻烦。）

不要紧，没有什么麻烦，那百分之×搞半工半读，让他们去升学。要办一些中等技术学校，他们要求升学是正当的。一半以上不能升学，国家是不是应该替他们想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半工半读。想读书就进这种学校，要么你就不读书。上全日制上不起，就得上半日制，而全日制就那么多，要读书就只好进半日制学校。

初中百分之×、高中百分之×不能升学怎样办？初中毕业的得想办法，高中毕业的也得想办法。所

以，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这样一个体系就非办起来不可。你们的十五年规划，小学办那么多，不办中学不行；中学办那末多，不办大学怎么行呢？现在就不行了嘛！初中不能升学的已经百分之×了嘛！还有教师和教材等问题。现在看来，小学的教员和教材，问题不大。小学和农业中学的教师，年纪轻，有些思想问题应该注意解决，你们开开会，或采取其它办法，训练一下很必要。原来的全日制中小学教材，也还可以要，有些是没有用的就不要，例如‘鸡冤同笼’。那有鸡兔同笼的呢，本来就不是事实。增加一些农业技术知识、自然和社会常识，此外，增加一些农村常用字、珠算、簿记。簿记要简单一些，一本流水账，一本总账就行啦。(许立群；现在农村的簿记很复杂，麻烦得很！应该让中央那个部门抓一下。)就由你们教育部门抓，你们从教科书上改嘛。农业中等技术学校除了教员、教材以外，就是物资、经费上的补助了。钱总是要花一点的，花的少，但总得要花一点。此外还有个教学方法问题。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就定型了，这样才能站得住。要选比较好的教材，定型一种，当然以后还可以修改。还要注意地方性，有山区、林业、畜牧等，先把有共同性的、通用的定下来。教育部应组织一些人来抓、来研究才行。

教师采取志愿兵的办法，自愿教半工中读的就干，不愿干就拉倒，让他去教全日制。愿意干的，就要下决心，我们再把他们训练一下，教给他们一些教学方法，他们会努力去干的。这是个远大的理想。小学自愿，中学也自愿，将来大学也自愿，不愿意就拉倒，省得他去那里搞破坏。革命的教育，革命的事业，非得有一批革命的人不可。有了志愿，还要给他们点方法，又有教材，又搞点教学方法。教育部要抓教员、教材、教学方法。这样，基本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中等技术学校要不要学点外国文？不一定学很多，先学几个字母，再学一二三四五，麦子、稻子、以及工农业上的一些字，准备将来认一认机器上的型号，给点常识。过去上海拉洋车的都会几句“洋泾浜”外国话，但他会说，不大认识字。教几个字总比“洋泾浜”的外语强。外语教师的水平不要多么好的，只要认识些外国字就行。

教育部还要搞点基本建设，可以办些师范学校。师范学校原来的教师、学生，思想不通的不一定全改，可以从一年级新生改起，也可以一开始就办半耕半读的师范学校，给学生讲清楚。对教师，第一要参加劳动，第二可以分别他们的不同情况加以照顾。这样慢慢的他们就通了。思想不通，不愿去，不能勉强。

现在看来，中等技术学校是非办不可了，百分之×的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学怎么办，这就是形势。把耕读学校办成正式的学校，一方面不要办成全日制学校那样，另方面也得把学制、课程定下来。时间可以比全日制学校延长半年或一年，课程不要缩减的过多，真正能学到一些东西，才能有威信。这样，有了一套才可以普遍推广，办得比全日制学校还好才行。不要把它看作是临时措施，不是临时的办法，是要长期办下去的。以后是不是再改过来呢？不会的！小学全日制可能多些。这是正规的教育制度，将来会代替全日制成为长期的固定的制度的。半日制办好了，水平也不低，毕业出来的人，也不低于全日制，这样就可以代替全日制了。我们办这样的学校，要有志愿的校长，志愿的教员。教育必须抓教员、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法。有些共同性的课程可以定。技术性课程也要，也有共同性的东西，教育部要审定。和各省教育厅共同来审定，开会大家来审定。目前看，各方面还是不定型的。长期不定型不行，学制不定型、课程不定型、教材不定型，学校就不能稳定。

（当谈到耕读小学和农业中学的教员工资，下面多是采取记工分的办法，有的是在公益金中开支一部分，而公社六十条中公益金的开支项目，没有办学这一项，因此，有的地方就把办学开支公益金当作非法的开支，引起基层干部很大的顾虑。将来修改六十条时，是否可以把办学这一项也写进去？）

你们开会讨论一下，写在文件上，中央可以批下去。总是要有点经费，国家也要补贴教师点生活费。为什么办全日制学校国家给钱，办半工半读学校国家不给点钱？教科书和教员要点钱，总得解决嘛！这些问题不困难的，国家拨点钱。

你们教育部谁管半工半读？

（何伟：我们都管。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主要抓了中农半读，做了些调查研究工作。全日制管的少一些。抓了重点，又照顾不到面。）

只管半工半读，全日制学校不抓也不行。目前半工半读学校还少，全日制学校办好也很重要。

语文容易改，我们自己就可以改的，这并不难搞。非得专家不行吗？小学语文课你自己就可以改，搞出来让他们批评驳斥嘛！有道理就改，没有道理就不接受。算术要改也不难。

有些东西都是农村常见的，不画图画农民也晓得。

大学文科坚决搞半工半读，实在不通的，算了，也不要强迫。以前的学生不通，就让他念全日制毕业；以后新招的学生，要对他们讲清楚，还是有人来的。现在这一批让他们毕业算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开，已经是几千年的旧习惯，一下子让它取消，恐怕还是不行的。不要强制人家搞，强制就容易出毛病。不愿意废除的，就可以不改，一部分不愿意改的，就改另一部分。以后从一年级改起，这他们没话说吧！大学的教员就算了，不通的也可以保留下来，还是思想问题。

县的农场，可以讲清楚，作为办学校的基地，还可以保留一部分工人。

应当搞到一起，慢慢地校长、工人都是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就没有人反对了。

过去马克思讲过，原文我记不得，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工人，就是要一面劳动，一面读书。那时候一天只需要劳动四小时，其余的时间干什么，光玩，也没意思。劳动成了人们的第一需要，书也要读。你们教育部应当把马，恩、列、斯论教育的文章搜集在一起。已经有了，给我送一本。

搞半工半读，不能只搞小学、中学，还要办中等技术学校和大学。百分之×、百分之×的初、高中学生要升学，形势已经逼来了，耕读的中等技术学校和耕读大学究竟归谁来管？你们不抓不行了，一定要连接起来。你们只搞一截，那一截不搞不行了。工读性质的大学，有些要归工业部门管，教育部门要参加进去。

反复一定会有的。将来是不是还会反复，要看目的明确不明确，目的不明确，就会有反复。

有个外国人(冰岛的)问我，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有什么办法使资本主义不复辟？这是个世界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要我们来解决。过去南斯拉夫的复辟，当时我们还当成是例外，是特殊问题。等到苏联复辟之后，我们才看清了。这是个无例外的普遍性的规律，一切国家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都会产生资本主义要复辟的问题。包括我们国家在内。问题是如何防止。现在我们所想到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发动群众搞“四清”，要清多少次才能争取到社会主义的；一个是改革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将来劳动是人的生活第一需要，四小时劳动，四小时读书很舒服。搞四小时劳动满舒服，我在保定就搞过一年，是很好的。农业有季节性，忙闲不均，不一定搞半天。工厂可以一天做工、一天读书。南宁的同志说，最好是三天劳动、三天读书。最合乎身体需要的是四小时四小时对开，将来不需要搞八小时的劳动。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办法，现在我们能够想到的只这两条，是否还有第三条，还没想到。所以，两种

教育制度也是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方法之一。光搞“四清”，不搞两种教育制度，还是不行的。

知识分子那末多，书越读越多，越不参加劳动，普及教育，普及得没有体力劳动了怎么行！初中毕业不愿意搞农业，高中毕业不愿意搞工业，大学毕业什么也不愿意干了，怎么行！知识分子去劳动，不是自愿的，是被迫的。现在我们还只有这两条办法，这两条办法搞了之后，是否还有复辟的可能，还不一定，因为我们还没有经验。这要靠我们去创造！现在有了复辟的经验，还没有不复辟的经验，全世界也还没有这种经验。今后至少还要经过一个世纪的斗争。所以，一切国家都要发生这个问题，这是个普遍性的问题。我们所以要办半工半读的学校，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46）在工交系统四清试点座谈会上的讲话(1965年7月5日)

（当汇报到企业分类排队问题时），刘少奇说：湖北的报告提出一、二：类企业搞什么，两条道路斗争也有，官僚主义也有，不是说与工人阶级处在尖锐的对立吗？恐怕要搞这些问题。

（当汇报到知识分子多数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时），邓小平说：也是可以改造的。党一号召，还是跟得上的。

（当汇报到五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及其线索大多已搞出时），刘少奇说：五反，许多干部还是分清了界线，但是还没有搞清楚。

（当汇报到清除的坏分子是极少数问题时），刘少奇说：不搞不行。问题是什么风气占优势，风往哪边吹。老实人吃亏，调皮的人占便宜，大庆就不是这样，是“三老四严”。

（当汇报到工作队问题时），刘少奇说：有些单位搞得不好，这也是合理的，总会有些搞得不好的。没有经验嘛！不会搞嘛！一千多个单位，总会有些搞不好的。有些基本上搞好的，也有些遗留问题。发现没有搞好的单位，就是基本上还没有取得经验，这样的工作队可把它分散再搞一期也行。如果原建制再去搞，还是搞不好的。搞得好的工作队，也把它分散一下，好坏搭配。

（当汇报到运动的倾向，有的人说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不足，也有的人说纠缠住不放时），刘少奇说：两面都有。前面可能多一些，由这边偏到那边，由那边偏到这边，总是越来越正确。

（当汇报到运动的时间，战略上要快，一个单位不要走过场问题时），刘少奇说；运动可以快一点。一个单位不要马马虎虎。

（当汇报到大型厂要半年左右，小型厂四个月左右时），刘少奇说：这是一般地说。

邓小平说：群众发动起来了，风气搞好了，领导有经验了，就会搞得快一点。处理工作做得好，坦白从宽，顶牛的就会少，但也不会没有。

（当汇报到运动的内容问题时），刘少奇说：要搞到生产建设上去。

邓小平说：内容要求达到什么程度？

刘少奇说：集中到一个目标上。无产阶级专政，搞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

农村的婚姻问题，我们不管，地主、富农去作媒。共产党不去占领阵地，坏人就去占领，我们非抓不可。

农村还要抓文化俱乐部。贫、雇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去占领。

减人、干部参加劳动、经营管理制度搞不搞？不在运动当中搞，是搞不下去的。

邓小平说：技术革命，只能提倡一下。经常性政治工作，做出一些规定。党团组织，要总结经验。运动和经常工作，应有不同。

刘少奇说：方向对，风气对，就好了。

邓小平说：运动的内容八条要改一下。第一条，建立比较好的领导核心，从厂、车间到班组，班组长是教育问题。有些领导好的，当然没有问题。有错误的，要改正。有的要撤，有的要调。有了建立比较好的领导核心这一条，就有保证。

刘少奇说：一个是群众问题，一个是领导核心问题。

邓小平说：第二条，建立阶级组织，发动群众，提高群众觉悟，组织群众，看来要搞职工代表大会。

刘少奇说：代表人数可以扩大一些。工会委员会要成为经常性的监督机构，不要去搞事务性的工作，主要搞发动群众，做群众工作。劳保可以叫厂里去管。工会比较主动，可以提出一些要求，进行监督。现在工会变成官僚主义了，不参加劳动。过去列宁讲过，工会官僚。

邓小平说：工会要经常接近群众，访问工人家属。有问题提出来。劳保要交给行政去管，工会超然一点，就可以进行监督。

刘少奇说：工会委员会，不要脱离生产。

邓小平说：工会这样做，就处于超然地位。一个核心问题，一个阶级组织问题。地、富，劳动十多年，改造好的，也可以加入：仁会。当然，有少数的不能加入。

第三条，为班组服务，要改革机构，实际上是一个革命。第四条，干部参加劳动。这四条，要在运动中解决。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生产。建立经常性的政治工作，在运动中提出方案。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要提出一些方针性的问题。

刘少奇说：另外，还有四清问题。

邓小平说：洗手洗澡，清查坏人，双反，都要搞，是不成问题的。

（当汇报到选举行政干部问题时），刘少奇说：工会要改造，要选举，委员不脱产，要搞政治。工会不管钱，有些工人补贴问题，要有一个小的委员会去管。

可以选举，班组长、车间主任，逐步来。不选举，起码有罢兔权。

邓小平说：过去有规定，就是没有执行。

刘少奇说：选举，要经过充分酝酿，民主又集中，集中又民主，再民主，再集中……。

（当汇报到运动的做法，从何入手问题时）刘少奇说，要看实际情况，要发动群众，在运动中发现积极分子，但不要象过去搞那样长。’

邓小平说：要对群众、干部说明来意，要搞三结合。这是方法。

（当汇报到好企业派不派工作队的问题时），邓小平说：要派。少派一点，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

刘少奇说：派精干一点。有的工人不愿意同厂干部谈，愿找工作队谈。派有水平的工作队去，人数虽然不多，可以发现问题。

邓小平说：部长、地方党委领导人，不一定蹲一个点，可以兼顾几个点。企业党委书记，厂长有些矛盾，利用这个机会，打通一下思想，帮助他们解决一下。

刘少奇问：这次会议有没有请工会同志参加？

工会任务，一部分搞国际工作，一部分搞群众运动。劳保不要管了。交到业务部门去搞。

会费要不要？工会会费可以不要，工厂包起来吧！省、市工会脱产干部，列为行政编制。

邓小平说：作为一个设想，议一议吧！

(当汇报到三结合以谁为主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时)，邓小平说：不提谁为主为好，看干部情况而定。

(当汇报到一个工作队“一带一”问题时)，刘少奇说；这个方法可能是个好方法，可以试一试。

邓小平说：主管部对中央直属企业，要多花一点力量，这是一个很大的事，部和地方结合起来搞。

刘少奇说：政治部、工会、监委、公安部、组织部等要多搞几期，三、四、五期。搞完四清，政治部就会做政治工作了，工会就会做群众工作了。

(当汇报到面上工作不再搞“小四清”问题时)，刘少奇说：对，点已经铺开了，就是面。工厂与农村有区别，农村每年有一个分配问题。

(当汇报到发展党员问题时)，刘少奇说：党员应发展到占职工的百分：之二十，有的可达到百分之二十五。

邓小平说：经过运动，不吸收新鲜血液，什么时候吸收？应该吸收新鲜血液。

(当汇报到整党、劝退问题时)，刘少奇说：名义上是整党，实际上是政党，建党。

(当汇报到如何巩固运动的成果问题时)，邓小平说；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

刘少奇说：领导班子联系群众，就能巩固。

厂长自己讲话要秘书起稿，为什么这样搞？就是架子放不下来。能讲一点，就讲一点。不能讲，就不讲。叫秘书起稿，自己讲，这样的党，势必倒台。以后要禁止这件事。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懂一点，说一点。

(当汇报到几个政策问题时)刘少奇说：关于退赔时间，征求几个地方的意见，不一致。等八月中央工作会议定。

邓小平说：总之，要同地方一致。

(当汇报到企业干部损公肥私、乱搞男女关系、革命意志衰退问题时)，刘少奇说：损公肥私，实际上是一种贪污的方式。

邓小平说：这种行为要处分。

刘少奇说：这种行为是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破坏国家财产的。

刘少奇说：男女关系问题不搞。

邓小平说：这不容易搞好。

刘少奇说：只搞恶霸性质的，阶级报复性质的，强奸性质的。一般是教育问题，社会风气问题。

邓小平说：革命意志衰退，霸住位置，不让新的上来，阻碍工作前进，调工作，给饭吃，不要他影响工作，影响大家，影响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

（当汇报到贪污分子戴不戴帽子问题时），邓小平说：少戴几个。戴了帽子，就不能加入工会。

刘少奇说：要宽严结合。

（当汇报到划阶级、查坏人问题时），邓小平说：不要划阶级。

刘少奇说：就是清查坏人。独立劳动者划成小业主的，改过来。

（当汇报到定成分问题时），邓小平说：政策，要给人以希望。还乡团，十几年参加劳动，改造得好的，也可以加入工会。地主，没有血债，十几年参加劳动，改造得好，也可以改变成分。

刘少奇说：地富多少年做工，改造得好的，也可以赦免。过去成分，还是过去成分。有的现在改造好了的，有的还没有改造好的，有的还在捣乱的，要分别对待。改造好的，可以加入工会。

彭真说：体力劳动表现好的，技术人员有贡献的，也可以改变成分。团结百分之九十五，就是包括地富子女。政策就要改造这些人，给他们出路。

邓小平说：地富已经改造好的，可以改变成分，使改造好的有奔头。但是不能当干部，连班、组长也不给当。地富子弟，一定要按本人表现。百分之九十五包括地富子弟在内，这就是阶级政策。

刘少奇说：目的在改造人。改造好了，你又不承认他。

彭真说：马克思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形成过程，就是同化其他阶级的过程。

（当汇报到工作队问题时），刘少奇说：工作队，改造别人，也改造自己。

（当讲到工作队混合编队问题时），刘少奇说：赞成。

（当讲到企业工人加班加点，“苛捐杂税”太多，上面多头多级问题时），刘少奇说：政治部要管业余时间。厂的政治部给以最大的权力，控制业余时间。上级多头多级，砍掉。

从第一批四清证明，我们的党、国家机关、经济管理机关，要革命是可以革命的。是否可以得这个结论，党一号召革命，就可以革命。少数人不能革命，绝大多数是可以革命的。主席说，中印边境事件说明，和平十多年来，部队还是可以打仗的。农村、城市四清运动证明，干部绝大多数是可以革命的，只要党号召，提倡就行。不让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修正主义，有三项根本措施：第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二，半工半读；第三，干部参加劳动。干部参加劳动，还不巩固。“三定一顶”，一定要行通。我们这一代不行，下一代继续搞。原来体力劳动者，当了班组长、工段长，脱离生产，变为脑力劳动者了。加上大学生和知识分子出身的合起来，是一个大势力。不愿参加体力劳动，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和平演变的开始。有这三条措施，就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干部参加劳动，还不巩固。半工半读你们要想想办法，要注意。

人民民主。部队取消了军衔，看不见军官与士兵的区别，士兵很满意，纪律也一样好。在工厂，看不出厂长、工程师、工人的区别。在学校，看不出校长、教授、学生的区别。这也是人民民主的一种形式，和西方民主不一样。实质就是干部参加劳动，既是体力劳动者，又是脑力劳动者。主席不是批示

过，干部要参加劳动吗？

搞好这三条根本性的措施，就可以使修正主义不能占统治地位，使资本主义不能复辟。

干部参加劳动，要使它形成习惯、制度，不要看成小事。上海试验选举两套班子轮换，一套工作一套劳动，可以试一试。

你们要注意这三件大事，这三条根本措施。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47）关于城市半工半读问题的讲话（1966年11月6日）

今天开个会，是座谈性质的会。专门讨论一次城市半工半读问题。教育部正在那里开会，听说牵涉问题很多，牵涉到各个方面，如果不开个会，事情难办，很多问题不能解决。今天先开会讲一讲，然后分口去讨论，经过讨论，各口把问题集中后，再开一次会议。

普及城市初中、农村小学，就是大庆办法“干打垒”。这样城市规划是否也应讨论一次，把框框打破一下，盖学校，不盖在大马路上就是了。我到鞍钢、太钢、峰峰煤矿都看过，那里工人自己盖了好多房子，既不要钱，又不要你的材料，砖瓦是自己烧的，房子是自己盖的，可是这样做据说是非法的，让工程师去看着，他都不管，我看今后应该让它变成合法的。

在新工厂，对新工人，办四小时做工、四小时读书的学校，上四年，不给工资，最好接着上大学，除管吃饭外，再给几个零花钱。工厂不发工资，你还划不来呀！这办法工厂高兴，学生也高兴，又能做工、又能读书，精神也很好。搞六小时制也可以试行，但六小时制应北八小时制的工资低一点。

我先读三段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话：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8版，第520—522页：

“虽然工厂法规定的教育条款大体说来是贫弱的，但是它还是把小学教育当作劳动的强迫性条件来宣布了。这个条款的成功第一次证明了，有可能让教育和体操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从而也有可能让体力劳动同教育和体操结合起来。工厂视察员在听取学校教师的证言之后，发觉工厂儿童和正规日校学生相比，虽只受半数时间的教育，但学得的东西是一样多，并且往往更多。‘事情是简单的。他们虽只半日训练，但他们总是觉得新鲜，并且几乎时时准备并且愿意接受教育。一半时间劳动一半时间上学校的制度，使工作和教育相互成为休息和鼓励。因此，这种制度，比继续不断只搞一项的办法，对儿童来说是更适合得多的。一个从早晨起一直坐在学校的儿童，特别在暑天，不能和一个从工作下来，心情愉快活泼的儿童竞争，乃是当然的事。’299。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西尼耳1863年在爱丁堡社会科学大会的演说中，找到更多的例证。在那里，除了别的，他曾说到，上层和中层阶级儿童的单方面的，脱离生产的，漫长的受业时间，徒然增加教师的劳动，同时‘教师又不仅无益地，并且绝对有害地浪费儿童的时间，健康和精力。’象欧文详细说明过的那样，未来教育一一这种教育对一切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都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增进社会生产的一个方法，并且是唯一的生产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的方法一一的胚芽，就是从工厂制度发芽的。

299。《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18页。有一位天真的丝厂主对童工委员会的调查委员说：‘我确信，生产优秀工人的真正秘诀，是在于从童年期起，劳动就和教育互相结合。当然，工作不可太重，不可令人厌倦，并且要讲究卫生。我就希望，我自己的儿童有劳动和游戏来调剂他们的学校功课。’（《童工委员会第五报告》第82页第36号）”

初中生最好实行四小时劳动，四小时学习，劳动时间不能太长，同时粮食也要吃饱。实行四小时制，真正学习了，也真正劳动了，我过去在保定就搞过一年半工半读，它的好处是毫无疑问的。劳动不能太重，不能令人厌倦。现在不少地方都实行隔周轮换，或双周轮换，这些都可以试行。广西“五四”工读学校，他们原来也是隔周轮换的，他们感到时间长，学习的东西容易忘记，后来又改为三天轮换，他们认为这样较好。当然这些都可以试验，但最好的还是四小时劳动，四小时学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10月第1版第245—246页：

“正是由于这种工业革命，人的劳动生产力才达到了这样高的水平，以致在人类历史土破天荒第一次创造了这样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实行合理分工的条件下，不仅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充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实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一一科学、艺术、交际方式等等一一中间承受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承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和促使它进一步发展。关键就在这里。人的劳动生产力一发展到这样高的水平，统治阶级存在的任何借口便归于消灭。为阶级差别辩护的最后理由总是说：一定要有一个阶级无须每日疲于谋生，使它能为社会从事脑力劳动。这种一向都找到过不少历史理由的废话，已经被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一下子永远根除了。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阻碍工业生产力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同时也成为阻碍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阻碍文明交际方式发展的愈来愈大的障碍。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不学无术的人了。”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5月第1版，第413—415页：

“尤沙柯夫先生所根据的原则是：中学同时应该是农庄，应该靠本校学生的夏季劳动来维持。这是他的计划的基本思想。尤沙柯夫先生认为：‘这个思想的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第237页)我们也同意他的说法，这里的确有正确的思想，不过不能把这种思想硬套在‘中学’上面，硬套在用学生的劳动可能‘抵偿’中学的经费这一点上面。这个正确思想就是，没有年轻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数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这个思想还是伟大的老空想家们提出来的；‘学生们’也完全赞同这个思想，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原则上并不反对妇女和少年从事工业劳动，认为完全禁止这种劳动的企图是反动的，他们只是坚决主张这种劳动必须在完全合乎卫生要求的条件下进行。……

“为了使普遍生产劳动同普遍教育相结合，显然必须使所有的人都担负参加生产劳动的义务。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吧！可是事实并不如此。我们的‘民粹主义者’对这个问题是这样解决的：的确应该规定体力劳动的义务是一个共同的原则，但这决不是为所有的人规定的，而只是为穷人规定的。”

我们的国民教育有三种形式：一种是全日制；一种是业余教育，一种是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全日制也要参加一些劳动，即便参加一些劳动，但也还是全日制的。你们所说的“七一”制或“六二”制，即占用一两个钟头生产时间来读书，也还不能算半工半读，应列为业余教育的范围。现在正在试行的隔周轮换、隔双周轮换、隔三天轮换等办法，都属于半工半读形式，都应继续试行。但最好的形式是半天劳动、半天读书，因为半天真正劳动、半天真正读书，对劳动对读书都有利，对人的身体也最有利。方才读的，马克思不是讲过吗？一半时间劳动、一半时间上学校的制度，使工作和数育相互成为休息和鼓励吗？我以前在保定就这么干过一年，半天做工，半天读书，这对人的身体的确很好。

以上这三种形式，是讲的我们的国民教育。干部教育、训练班等在外，

半工半读学校要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毛主席不是讲过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吗？我们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有技术、有实际操作能力的新型劳动者。我们的目标应该培养到能当干部、当技术员、当工程师的水平。但是也要能当工人、农民。不是说要能上能下吗？

全日制高等学校规定培养工程师，中专规定培养技术员。清华大学的口号是培养红色工程师，就是说不当工人、农民，不当体力劳动者。这个问题请高教部同志研究一下，应当改定。资本主义社会都有知识分子失业问题，就是苏联和东欧一些所谓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着知识分子失业问题。大学生蹬三轮，就算失业，大学生当工人、当农民也算失业，为什么失业呢？就是只能当脑力劳动者，不能当体力劳动者。在我们社会里如果也是只坐办公室、当脑力劳动者，不能当工人、农民，那势必也有失业。过

去已经答应过的就算了，毕业后该分配什么工作，还照分配。从明年暑假开始再招生，就应该向他们讲清楚，你们毕业以后，可以当工程师，技术员，也可以当干部，但必须是也可以当工人、当农民，毕业后当干部、工程师当然他没有意见，他就是对当工人、当农民有意见，因此应该事先说清楚。当然我们现在的知识分子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今后还应多培养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分子。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办法，对我们事业不利，对他们也不利。

我们说今后不包，即不包当干部、当脑力劳动者，当工人、当农民都可以包。在城市办半工半读学校，中央各部应该有计划地统筹安排。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工人，每年也只是那么多。据说，冶金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职工有增有减，增减相抵，大约增加×万人左右，但现有在校学生已超过×万人。一机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需补充×万职工，现有的半工半读学校，还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总之，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主要是分配在工厂工作的，这就要各部计算一下，统筹安排，有计划地发展，逐年增加一点，不要盲目地一下子发展太多，以免被动。

城市为农村培养机器修理工、电工，这到处都需要，木工、瓦工等各种手工业工人，农村也很需要。但我们城市手工业已经是工厂手工业了，这一点请大家注意：现在一个人是不能单独生产的，所以城市为农村培养各种技术工人要能够单独工作。城市培养各种技术人员下乡，也要让他们学点农业，使他们不仅能做工，而且也能种田。将来农业实现四化，需要大量技术人员，城市应该为农村输送这种人材。但也要随着需要和可能逐步的输送。办法是两种：一种是把学校办在农村，招收城市学生，在那里既可以劳动，又可以读书，念那么几年，毕业了就在当地分配工作，这样既会农业劳动，又有文化、技术，农民也欢迎，他们也安心。我们在乡下办学，可以招初中毕业生，也可以招年龄大的高小毕业生。这样就把学校办在西北、办在黑龙江，城市就输送学生，输送教员，从安置经费中拨一点钱，国家也要拨点木材，先派一部分人作先遣队去盖房子，再搞些农具及车马，这样城市就成了他们的后方，后方要支援前方，市委要负责组织，要替他们负责到底。一种是办在城市，面向农村也可以，毕业后上山下乡，不过这就有劳动基地问题，也有个劳动习惯和农业知识问题。总之，最主要的出路，还是大批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究竟怎样办好？请同志们讨论一下。

在城市里有些企业的某些工种，适合招高小毕业生的，就招高小毕业生。例如纺纱厂的细纱车间、粗纱车间，招高小毕业生就比较合适，到四十岁以上眼睛就不能看细纱了。最好在新开工厂中，办“四四”制的学校，即半天劳动，半天读书。老厂有条件的也可以试办，那就调出一部分老工人另行分配到别的厂去，招收一大部分学生来试办“四四”制的学校。这样真正半天劳动，半天读书，是马克思从一个工厂视察员那里发现的，他发觉工厂儿童和正规日校学生相比，虽只受半数时间的教育，但学得东西是一样多，并且往往更多。那一个视察员报告中还说：连一个工厂主资本家，也希望让他的儿子有劳动和游戏，来调剂他们的学校功课。恩格斯不是也讲吗？从来也没有比我们现代的资产者更不学无术的人了。现在半工半读已经有几种形式了，我提议再补充一种“四四”制的形式，希望你们各部试验一下。这种工厂，少数老工人还是八小时制，学生是四小时制，这样的半工半读，你工厂又不要开工资，学生劳动，你只管饭吃，顶多再给几个零花钱就了不起啦！这样工厂不开工资你还不干吗？如果办半工半读中专，你四年不开工资，如果办大学预科两年、本科四年，那就是六年不发工资，这样你还不干？一个部试办它两三所学校，最好在新开工厂试验，这样的厂也不要办得太大，搞几百人、千把人就行了。例如办五百人规模的新厂，其中有一百个老工人是八小时制发工资的，另外四百人，你就招收八百个学生是“四四”制的，不发工资的，这样扎扎实实劳动四小时，又是两班倒，恐怕比一个人连续劳动八小时的劳动生产率要高一些，究竟如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

城市普及初中，还是提全日制和中工半读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城市全日制初中、农村全日制小学，不要提停止发展，这一条路不要堵死。我倒是担心五年能不能普及？现在我们一方面搞半工半读，全日制有些要改一部分，有些还可以再发展一点，这事由各地去办。自己动手盖房子，搞“干打垒”，拨一点

木材就行了，要打破城市规划框框，如果嫌不好看，就盖到偏辟的地方，就盖平房，二三十年以后不行了再盖。高小毕业生年龄太小，还不是劳动力，所以还是要这些孩子读完初中，初中毕业生就可以上山下乡了。初中学生因年龄还小，劳动时间不能太长。学习和劳动的结合，基本上两种方法：一种是能结合专业的劳动；一种是不能结合专业的劳动，例如在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工作，以及扫马路、背大粪等等，就不能结合，能结合专业劳动的最好，不能结合专业的，也要参加劳动，锻炼劳动观念，养成劳动习惯。

办全日制中学，不能按过去框框去办，要发展多少学生，需要多少平方米，一平方米七十元等死框框，要学大庆“干打垒”，自己动手盖房。同时要打破城市规划框框，嫌不好看，只是不盖在马路边就是了，就盖在偏辟地方。他们不是没有劳动基地吗？这样就有了。无非是不好看就是了，我看北京的老式房子也不好看，北京多数房子还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不是要备战嘛，城市还要准备将来被打烂的。不光学校，就是工人宿舍也是这样，都不受城市规划限制，打破所谓国家标准的框框，就是国家划一块地皮，拨一点木材，自己打土坯，自己烧砖瓦，自己动手盖房子。鞍钢、太钢我都看过的，实际上工人盖了不少房子，和农民的房子也差不多。

刚才讲的四小时工作，四小时读书，这是厂校完全结合的，是厂校合一的，工厂即学校，学校即工厂，这种厂校开始不要办的太大，几百人、千把人就行了。每一个部试办它一两个或两三个厂校，逐年招收一点，毕业后在全国范围内分配，以补充本行业劳力之不足和所需。我讲是在新开工厂里试办，在原来老厂里，有的八小时，有的六小时，不好安排，五八年会经试验过，是失败了的。现在在新开厂里试行，干净利落，我们就招收学生二顶一，不开工资，只管饭吃，搞四小时劳动，四小时读书，要劳动就真正劳动，要读书就真正读书，我们就试行这种劳动和教育结合的制度。反正是要招工嘛！现在实行八小时劳动，上下班加上吃饭时间，实际上只有七个多小时，扎扎实实干六小时，不会比八小时劳动效率低。六小时劳动就不一定要吃饭了，中间吃点点心，带个馒头啃一下就下班了。因此六小时制，你们也可以试验一下，但不要搞的太多，六小时工资应该比八小时工资稍低一点，到底如何？你们可试试看。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搞四小时制的。

半工半读也要办大学，要办半工半读的高等学校，可以招收高中毕业生，或者招初中毕业生先读两年预科，再上四年本科也可以。这样六年不开工资，只管饭吃，这是很划得来的。毕业后，可以留本厂，也可以分配出去，可以当工人、农民，也可以当工程师、技术员。即使当工程师，也不能全脱离生产，是半脱产工程师。我们说不包，就是不包光当脑力劳动者。大学生蹬三轮、种地、做工都不能算失业，教育大发展，不能都当技术员、工程师。我们办了半工半读高等学校，这样才可以衔接起来，逐步形成体系，才可以逐步定型。

城市职工的业余教育，一定要重视，现在已经在试行的“七一”制、“六二”制或五好职工、班组长集中短期训练等办法，这些都属于业余教育范围，不能叫半工半读，不要把半工半读制度内容搞乱了，不要滥用半工半读名词，因为制度内容不同。将来到共产主义就都变成业余学校了，那时不论是干部、工程师，也不论是工人、农民，都是半土半读，也可以说都是业余的了。

农村半农半读比较好办一点，城市半工半读就复杂的多了，现在还正在摸索中。就整个来说，我的意见，还是坚持五年试验，十年推广，不能动摇，发展不能太快。现在各种各样形式都可以试验，在实践过程中总结经验，将来就可以比较了，有比较好的形式，有最好的形式。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办起来的，要巩固提高，努力把它办好，不要发展太多。没有办的地方，还应该继续试办。

照马克思看，半工半读这是个根本问题，过去我们说过，也和一些外国人谈过，中国究竟会不会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会不会复辟？在实践中还没有完全证明不会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不会复辟，但我们要努力避免，有什么办法避免呢？根本的就是那三条措施；第一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定要坚

持到底，第二是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搞半工半读，全日制要改革！还要加强业余教育，第三是干部参加劳动。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这三个办法。同志们可以想一想，看是否还有第四个办法。我们把这三个办法实行了，也许能够避免，也许还不能避免。因为现在世界上只有两种经验：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失掉政权的经验。至于说，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建成了社会主义，而又不出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不复辟的经验，现在还没有。

应把半工半读学校办好，同时全日制学校也应该办好，全日制有进步，但还有许多缺点要加以改革，此外业余教育也要办好。农村半农半读已经讨论过一次，农业部也开过一次会。城市半工半读是复杂一些，牵涉问题很多，牵涉方面也很广，请大家讨论一次，统一思想认识，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同时也通通气，互相合作，把这件事办好。半工半读是三大根本措施之一。

中央是否要成立半工半读领导小组？也请大家议一议。

各部门都办了不少半工半读学校，何伟同志那里有很多典型材料，大家注意看看，其中工业的最多，财贸的不少，农业也有一些。你们分口去讨论，三四天或四五天之后再开一次会议。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48）转发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的批示（1966年1月23日）

中央同意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当前文化战线的形势很好。事实证明，只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文艺方向去做，整个面貌就会改变。文艺战线是一条重要的战线，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希望各级党委认真把这条战线的工作管起来。当前主要是组织文化艺术工作者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切实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深入工农兵群众，克服文化队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缺点；同时认真抓创作和领导好整个文化工作。这样坚持下去，几年之后，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一定会取得显着的成果。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49）附件：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

(1965年10月30日)文化部的整风运动，周扬同志已经作了总结。现在就当前文化工作的形势和今后的工作，特别是农村文化工作的打算，作一简要汇报。新的文化部党委成立不久，情况摸得很不够，我们的水平又有限，这个汇报可能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希望中央领导同志给予指示。

毛主席的两次批示，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督促和领导，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激烈的、深刻而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通过这一斗争，整个文化战线开始出现了蓬勃的革命形势。主要表现在：

(一)自大演革命的现代戏以来，整个舞台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性的变化。革命的现代戏已经占领了舞台，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开始代替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形象；散布资产阶级毒素的戏剧电影，受到群众性的批判。部队、地方和文化部直属各艺术单位，都创作了不少革命的优秀作品，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创作有很大增加，质量也有所提高；不少大中小型剧目获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二)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一个文化普及运动正在开始出现，文化下乡已形成热潮。农村的电影幻灯放映工作进一步加强了；艺术团体分批上山下乡，巡回演出；毛主席著作和革命图书在农村的发行量有较大的增长；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已蓬勃开展起来，农村俱乐部(文化室)已大量建立，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学习毛主席著作，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宣传时事政策和讲革命故事、唱革命歌曲等文化活动。

(三)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经过党的教育，对社会主义的文化方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大家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普遍要求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为工农兵服务，改造自己。现在全国已经有×万文艺工作者离开机关去参加四清运动，参加文化工作队，深入农村、工矿、连队，为工农兵服务。有不少年老的作家、名演员和高级知识分子也下去了。下去的同志的思想面貌，都有较大的变化，并且出现了一些上山下乡的标兵，初步摸索出了一些经验。这是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新气象。

总的说来，当前文化战线土的形势，同其他战线一样，也是大好的。事实证明，关键在于领导，这支队伍的绝大多数人是好的，或者基本上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只要抓紧了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鼓励他们下去蹲点，参加实际斗争，密切联系工农兵群众，他们就会有进步；就是那些毛病、错误较严重的人，其中绝大多数也是可以教育改好的，可以跟着党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现在，文化工作取得的成绩，毕竟还是初步的，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还不少，因此，不能对已有成绩估计过高。从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来说，目前还只是开始。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着阶级斗争，文化领域内的兴无灭资的斗争，更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有时还是激烈的。由于文化队伍中很多人过去长期蹲在城市，长期脱离工农兵群众，没有很好地学习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有些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状况十分严重，资产阶级世界观、文艺观还有很强大的势力，从苏联学来的框框还很多；加以许多单位政治思想工作薄弱，缺乏坚强的领导核心，所以在贯彻文化艺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问题上，不仅有人怀疑和抵触，也会有人反对，甚至会出现反复，斗争肯定是会有的。在具体工作上，由于长期轻视文化普及工作，忽视直接配合三大革命斗争，特别是在如何面向农村的问题上，对群众的情况和群众的要求“若明若暗”，要使社会主义文化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更好地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中心任务服务，并且巩固地占领农村文化阵地，还有一系列的认识问题、方法问题、工作问题需要解决。在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执行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正确地批判继承和借鉴中外文化遗产等问题上，由于我们的认识水平和工作经验都很差，也不容易掌握好。因

此，要全面地系统地实现文化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要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要把社会主义文化革命进行到底，需要我们坚定不移地进行长期的努力，艰苦的工作，并且准备随时同可能出现的大大小小的反复作斗争。

文化艺术一定要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使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并且为逐步消灭三个差别创造条件。为此，当前的文化工作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持不懈地贯彻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立足备战，面向农村，密切配合三大革命运动，大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大抓文化艺术队伍与工农兵相结合，大抓农村文化工作，争取在五年内，基本上把我们的队伍锻炼成为一支革命化的、思想、生活、基本功都过得硬的、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文化队伍。

按此考虑，我们打算在今后着重抓好以下几件工作：

第一，要坚决贯彻执行文化工作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当前特别要把加强农村文化工作放在第一位。

文化为工农兵服务，就是要为工农兵的利益和需要服务，就是要以工农兵为主要服务对象；而农业是基础，绝大多数的人在农村，无论打仗、搞建设，都要靠农民。因此，一定要把农村文化放在第一位。这是方向问题，也是战略问题。如果社会主义文化不去占领农村阵地，不积极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基础服务，其结果势必脱离正确的方向，使城乡文化差距越来越大，影响到工农联盟的巩固，影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也不符合备战的要求。

开展农村文化工作，必须注意两条：一条是依靠“两条腿走路”，即专业文化工作要面向农村，业余文化工作要适当地发展和加强，农忙生产，农闲演出的半农半艺剧团要积极试验和提倡；一条是必须从国家的经济条件出发，考虑到农村的经济水平，文化办少了不行，办多了也不行，要使国家和农民双方都能负担得起，要用“穷办法”办事。

(一)专业文化工作者要采取多种方法，通过各种渠道，上山下乡，传播社会主义文化，把适合农村需要的好的电影、好的戏、好的图书，尽可能及时地输送到农村中去，使农民能够看得到，看得起，看得懂，看得好；同时，要很好地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自己，并且对农村业余文化活动，进行辅导。

加强和改进电影的生产和放映工作。在一定时期内，要多拍摄一些反映工农业建设高潮和先进事迹、先进人物的艺术性纪录片，以便及时配合三大革命运动；拍好故事片和新闻片，重视科教片的生产，发挥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作用，其它片种，也要提高质量。认真推广“规划放映”的经验，改进农村的电影发行放映工作，逐步增加农村放映队，解决放映设备的轻便化，试办半脱产的放映员，适当增加供应农村的影片拷贝。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使农民看电影的次数逐步有所增加，看不到电影的地区，能够看到电影。在少数民族地区和方言地区推行涂磁配音，使农民看得懂电影。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幻灯工作，增加幻灯机、幻灯片的供应。

积极推广“乌兰牧骑”和各地艺术表演团体上山下乡为农村服务的经验，要求艺术表演团体每年有三分之二，至少是二分之一的人员或时间下乡、下厂、下连队(包括参加四清的)，经常在基层演出。学习“乌兰牧骑”主要是学习他们为群众服务的革命精神和短小精悍的组织形式，在演唱内容方面，大力推广革命的现代题材节目，在艺术形式上，要发挥各自的特长，照顾不同地区群众的不同爱好，内容和形式一定要丰富多彩，不要都搞得一模一样。各类艺术表演团体下乡要编成小型队伍，布景和道具要轻便化，不论平时、战时，都能行动敏捷。大力提倡革命歌曲。充分运用各地群众喜闻乐见的小型的艺术表演形式，如二人转、皮影、说书、评弹以及其它曲艺形式，演唱新人新事，反映新社会，传播新思

想。

加强对农村的图书出版，发行工作。整个出版工作应当贯彻“政治第一，质量第一”的方针，农村通俗读物品种应按照“少而精”的原则，加强出版工作的计划性，编选适合农村需要的图书。重视年画和连环画的创作。搞好农村图书发行，特别要做好毛主席著作在农村的发行工作。

整顿与健全文化馆、站，明确它们的方针任务，使之切实地担负起对工农业余文化活动的辅导责任，担负起培训业余文化艺术骨干、供应宣传演唱材料、图书和展览图片以及辅导群众业余创作等工作。文化馆、站的经费要根据工作开展的需要适当增加。

(二)大力开展工农群众业余文化活动，满足群众文化生活。群众文化生活不能单纯指望增加脱产的专业文化队伍来解决，而应积极开展业余文化活动来解决。开展工农群众业余文化活动，不仅是进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根本方针，也是为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创造条件的一项重要措施，因此，必须把它放到文化工作的重要地位上来。

工农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的方针，围绕三大革命运动，配合党的中心任务，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在组织上必须贯彻阶级路线，以工人、贫下中农和农村的革命知识青年和其他进步青年为骨干，广泛吸收一切可以团结的各种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参加，为广大的职工和农村人民公社社员服务，防止坏人篡夺领导权，防止把活动局限在少数人的范围内。

开展群众业余文化活动，必须坚持群众需要、自愿、业余、小型、多样、节俭等原则，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单位的条件和特点办事，不要强求一律，不搞形式主义，不能妨害生产。

农村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主要是农村俱乐部(文化室)，应当密切结合“四清”运动，积极发展，发展一批，巩固一批。中央指示，农村俱乐部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主要由共青团来管，这是完全正确的，有利于农村俱乐部工作的开展。文化行政部门应该积极配合共青团组织，加强对农村俱乐部的指导，很好地组织、安排对农村俱乐部的业务辅导、培训骨干、供应图书和演唱材料等工作。

文化艺术单位对农村俱乐部(文化室)有辅导责任，应当积极地、主动地把辅导工作做好。县文化馆、站是农村俱乐部的最经常最主要的辅导者，更应当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做好辅导工作。

关于如何进一步改进农村群众业余文化工作问题，文化部将与共青团中央共同起草一个文件，报告中央。

为了进一步推动文化工作面向农村，交流经验，我们打算六六年召开一次全国农村文化工作会议。

(三)改善经营管理，降低成本，适当减轻农民负担。目前在农村放电影、演戏，有些地方收费偏高，图书、幻灯机、幻灯片等价格太贵，一般贫下中农看不起、买不起。文化部门应从改善经营管理方面努力降低成本，调整价格，以减轻农民负担。因降价而涉及某些税收、利润标准的调整问题，文化部准备同有关部门研究解决。收费办法要按照便利群众的原则，因地制宜地加以改进。

(四)大力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为了进一步普及文化，更好地便于为工农兵特别是为农民服务，无论电影设备、印刷设备和舞台装置，都要大力开展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工作。技术革命的重点，要放在便于普及文化工作的方面，要做到既采用先进的技术，又要坚固、简单、便宜、容易使用、容易维修。开展技术革命，必须立足国内，发动群众，自力更生来进行。当前要抓紧做的是：加速轻便的十六毫米电影放映设备的投产工作，组织简易幻灯机的生产，积极试制八毫米成套电影设备，推广轻便化的舞台装置，提高印刷技术质量和产：量等方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拟同有关部门和有关省市一起研

究，加以规划和安排。

（五）做好全面安排。把加强农村文化工作放在第一位，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城市和工矿的文化工作。文化艺术工作者下去，主要是到农村去，但也要到工矿、连队去。对农民进行教育，既要用农村中的先进人物教育农民，更要用工人阶级的思想、集体主义的思想，用工人、士兵的先进人物形象去教育农民。文化工作面向农村，必将促进城市文化工作的革命化，只有认真实行城市文化工作的革命化，才能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加强农村文化工作。因此，在安排工作时，必须进行全面规划，既要把重点放在农村，同时又要安排好城市演出以及下工矿、下连队等。

关于如何加强工矿文化工作，我们拟与全国总工会共同研究，起草一个文件报告中央。

第二，坚持文化艺术工作者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针，建设一支革命化的文化队伍。

我们打算，在今后五年内，扎扎实实地抓好队伍的整顿、建设，切实改变队伍中有些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状况。建设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队伍。这是我们今后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放在第一位，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改造思想，统率业务，指导工作。要引导大家自觉地带着问题学，经常学，反复学。要形成风气，造成热潮，定为制度。每年要结合总结工作，检查思想，普遍组织学习一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有关文件。

（二）长期地分批把文化队伍放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放到群众火热的斗争中去，特别是到农村中去。通过劳动和斗争，更好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向，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并且获得丰富的创作源泉，更好地表现工农兵。

整个文化队伍，在最近二年内，先下去四清，回来再搞本单位的四清。凡是能够参加四清的，都要参加一至二期城乡四清。省、市以上的文化艺术单位，除了以三分之一的人员参加四清外，还应该抽调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员，组成文化工作队、演出队，或下基层蹲点等其他形式，深入社队、工矿、连队，实行四同，进行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参加基层工作，为工农兵演出，帮助工矿、农村开展群众业余文化等活动，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是一个长期的根本任务。因此，下去要有目标，有规划，无论剧目、组织形式和装备等，都要有相应的革新和落实措施，以便积累经验，形成制度。

为了使文化队伍真正能够下到农村、工矿和连队去，文化领导部门必须对生产任务、城市演出和外事文化活动等，统筹安排，认真做出全面规划。城市演出和出国演出都是重要的工作。出国演出是配合外交斗争，传播与介绍毛泽东思想和加强人民友好的重要政治任务，应该努力做好。由于今后三年，艺术表演团体大部分时间需要深入生活，出国演出任务，拟请中央在保证履行文化协定的前提下，适当减少。

（三）整顿艺术表演队伍。现在文化系统约有××万多人，分布很不合理，主要是电影放映队、书店、文化馆、站的人少，力量薄弱，而艺术表演队伍庞大。全国艺术表演团体共计有×个，×万人（其中集体所有制的剧团占×万人）。人员过多，队伍也比较复杂。我们认为：艺术表演团体应作为整顿的重点。据初步估计，艺术表演团体经过整顿、合并，可以精减百分之十五左右的人员。这是一项促进文化队伍革命化的重要措施。应当按照既积极又慎重的方针，认真地抓好这项整顿工作。艺术表演团体调整出来的人员，一部分可以充实文化馆、放映队、书店；一部分根据本身条件，请当地劳动部门安排从事工农业劳动，也可有领导地试验半农半艺的办法，组织他们继续为社会主义服务；年老的动员其退休退职，帮助他们安家落户。

当前问题比较多的是专县剧团，绝大部分发不出工资，有的甚至吃饭也很困难。这些剧团要参加四清，深入生活，演好革命现代戏，需要有一段整顿队伍的时间，各地应给予经济上的适当补贴。

(四)逐步改革艺术教育制度。艺术院校在文化革命中也有显着的变化，初步摸索出一些经验，取得一定的成绩。今后，要继续坚持党的文艺方向和教育方针，清除艺术院校中资产阶级的办学思想和教学方法，逐步进行教学改革，试办半农半艺、半工半艺的艺术学校，培养为工农兵服务的红色接班人。

要在群众业余文化活动中，注意发现和培养优秀的业余文化艺术人才，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后备力量。但应当切实注意不使他们脱离生产劳动。

(五)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一切工作中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大抓活的思想，发扬三八作风。提倡踏踏实实，雷厉风行，艰苦奋斗和勤俭朴素；反对浮夸、骄娇二气、自由散漫和铺张浪费，使文化艺术队伍不断的革命化。为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打算在直属单位逐步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构，并在今后努力总结一套适合文化艺术部门的政治工作制度。建讯各省市文化行政部门也把政治工作机构逐步建立起来。

第三，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创作。

抓创作是贯彻毛主席文艺方向的具体措施。明确了方向，深入了工农兵生活，就要狠抓创作。有了好的作品，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有了好的作品，才能性利地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巩固地占领文化阵地，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

根据先生活实践后艺术实践的原则，坚决把专业创作人员放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放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为繁荣创作打基础。同时要大力发展业余创作，发现和培养优秀的业余作者，特别是年轻的业余作者。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推陈出新”的方针，大力提倡领导、专业人员、群众三结合的方法，组织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努力创作反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当前应有计划地动员一批创作力量，到大小三线建设地区去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同时鼓励反映革命斗争历史和表现世界人民反帝斗争的作品。大型、中小型作品都要，为了便于下乡，特别要重视中、小型作品的创作。对创作人员既要有严格的要求，又要热情、耐心地帮助他们，不断提高作品的质量。

积极准备好六六年京剧会演的工作，以便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现代戏的阵地；对现有的革命现代戏的剧目，要不断提高其思想水平和艺术质量，加强优秀剧目的加工、交流和移植、推广工作。

要抓好重点创作，树立样板。主要是抓好重点影片和重点剧目、歌曲、美术作品的创作，出版一批较好的图：扫。文化部和各地文化行政部门，对于重要题材的创作，要有具体的规划和安排。

在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配合有关方面，做好作品的评论工作。大力表扬好的作品，积极热情地对待工农兵作者的作品；对有错误思想倾向的作品要进行有说服力的批评。评论工作必须有破有立，必须区别政治问题和学术、艺术问题；必须区别它是基本正确还是基本错误，是基本好，还是基本坏。凡是政治方向对头或者基本对头的作品，凡是基本正确、基本好的，应该基本上加以肯定；对于作品中存在的缺点，应该热情地帮助作者加以克服。对于学术上、艺术上的问题，应该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原则，鼓励展开讨论，辨明是非。对于反对社会主义的毒草必须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批判方法进行斗争，以促进文化艺术的繁荣。

第四，加强领导，改进作风。

关键在于党的领导，这是正确贯彻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保证。文化部党委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坚决不动摇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在全盘工作中，要突出政治，加

强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四个第一，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增强党的团结。一面要推动和依靠原有领导干部革命化，一面要大力培养新生力量，提拔一批德材兼备的青年干部担负各级的领导工作。加强对中央的请示报告，尊重地方党委对各地文化工作的领导。

文化部要坚决克服脱离群众的状况，领导干部要到基层去，认真摸索出一套如何办好社会主义的剧团、电影制片厂、出版、文物等事业的办法和措施。党委成员，每年要轮流下乡下厂，并有一、二人专抓农村文化工作。要提倡请工农兵评戏、评电影、评图书。

文化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充分发扬民主，坚决克服形而上学和自以为是的作风。要在文化艺术界提倡共产主义风格，树立相互讨论、相互帮助、交换意见、取长补短的风气，努力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文化战线情况比较复杂，上述汇报和所提出的几项初步措施，是否有当，请予指示。

50）关于大庆矿区建设的宣传报道问题的讲话(1966年2月96日)

（当谈到稿子上“这样的工矿区，历史上没有，外国没有，本本上也没有”的一段话时)，刘少奇说：不要那样讲。历史上有过，本本上有，外国有，不过你们没有看过。马克思在一百年前就说了。空想社会主义者过去写的很生动，当时欧洲风行一时，法国、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仅是写了许多书，他们还这样做了，后来还到美洲去试验，有些日本人把这些著作都翻译出来了，我过去也看过一些。比如，恩格斯说：“现代第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和傅立叶已经正确地认识了这一点。在他们的模范结构中，城乡对立已不存在了。”

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早已这样做了，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欧文是个纱厂主，不仅写了好多书，后来还在自己工厂里作了试验。这证明本本上有，外国有，历史上也是有过的。但过去因为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没搞阶级斗争，到美洲搞的农场，还是变成资本主义农场，欧文的工厂，仍然也是资本主义工：厂。消灭三个差别，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称为伟大的前驱，马克思、恩格斯自认为是他们的门生。蔡和森曾写了一本书，写的不那么清楚。

恐怕不要那么讲，历史上没有？外国没有？本本上没有？历史上有过，外国有过，本本上都有过，只是你们没有看过。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一理想，马克思、恩格斯是肯定的，但从体系上加以改造，他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不讲阶级斗争，马克思搞阶级斗争。

（当讲到稿子上“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的新风尚已经逐步形成，修正主义的思想在这里找不到生长的土壤”的一段话时)，刘少奇说：不要讲得那么绝对。大庆这样搞好是好，但不能说找不到一点修正主义生长的土壤。应该说这个地方无产阶级思想占了绝对优势。我们现在整个国家出不出修正主义，变不变质，还不能保证，你一个地区怎么能保证？当然，你这个地方好一点，无产阶级思想占了绝对优势。

（当讲到稿子上“只有劳动的汗水，才能把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洗掉”的一句话时)，刘少奇说：这句话也不能这么讲。马克思、恩格斯都是资产阶级出身，他们没有用劳动的汗水洗嘛！他们的思想也不是用劳动的汗水洗清的嘛！

还有许多农村干部，原来都是贫雇农出身，但在四清中还暴露出许多资产阶级思想。他们是流了多少汗水洗过的，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不见得洗清了嘛。有的流了汗水不见得洗清，有的没流汗水也可以洗清。

（当×××同志汇报大庆有×所学校，其中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学校×所，全日制中学×所时)，刘少奇说：大庆不要搞全日制中学了，到中学年龄就可以参加些劳动了。马克思说过，小学生到九岁即可参加两小时劳动。小孩子最少可以到地里拾些麦穗，做些轻微劳动。现在看来，中学全日制不好，读书统统搞全日制，读了十多年，什么也不懂，越读越蠢。读了十多年书，马牛羊、鸡犬猪，稻粱菽、麦黍稷，什么都不懂。你们那里有条件劳动，不要搞全日制中学。人又读书又劳动就聪明。书不要读那么多，读书是学习前人实践经验，知道点就行，读那么多，自己不实践，还不是自己的经验。别人犯过的错误，自己接受不了经验，自己犯了就好接受。全日制学校害死人。

重要的是实践，劳动就是实践，通过实践就有经验。半工半读训练班很好。北京石油学院搬大庆很赞成。

（当谈到大庆有三个工人镇，有研究院、设计院，加上家属，集中在一起有×万人时)，刘少奇说：三个镇子，一个×万人，太大。这些要，但也不要太集中了。不是说不要搞大城市吗？小城镇也不要搞那么多，你镇子上的东西，无非是粮食加工、生活供应、服务行业等等，也可分散到居民点去嘛。设计

院、研究院居住也可分散，便于参加劳动。

（当×××同志淡到自己盖干打垒，不要房租，负担轻，住的还舒服时），刘少奇说；这样搞法，住宅问题不就解决了嘛。

（当谈到植树一百多万株时），刘少奇说：每年都要种一点树。

（当×××同志讲到大庆当前农业产量还较低，今后要努力提高生产水平，一九七。年争取达到粮食自给时），刘少奇说：每亩产二百多斤，最初自己搞不熟练，可以派人出去学，也可以请进来。

（当×××同志讲到农忙时工业支援农业，农业上有四十多台拖拉机时），刘少奇说：要组织工人参加些农业劳动，一个星期参加一天农业劳动，实际上等于休息。搞农业的也可组织他参加一些工业劳动。这样，农忙时就要人有人了，有的还可停一下工，大家都去，紧张一阵也就解决了。过了农忙季节，平常也就不那么紧张了。（当×××同志讲到大庆农忙时间大约四十多天时），刘少奇说：那你工业就在这时候帮他一下嘛。

（当×××同志讲到四化中，水利化不够时），刘少奇说：水利化，也可帮农业一下，需要水的时候，工业帮一下，专门打几口井，横竖你有钻机嘛！这点钱要花，搞成标准的，机械化要搞。

刘少奇问：有公共食堂吗？（×××同志回答有，小孩在家到公共食堂吃饭，农忙时家属也到食堂吃饭，农闲时在家里吃饭。）

刘少奇说：证明你们全部食堂化了。有没有自留地？(回答没有)这篇文章上，自留地没有写，食堂也没写，都要写上。

（当汇报到家届中有政治部，有教导员、指导员时），刘少奇问：有没有代表会？（×××同志回答：有队员大会，管理站有先进生产者代表会。）

刘少奇说：队员会，代表会，三级干部会，整个大庆要有代表大会，中心居民点也搞代表会，也可以选举。这个还要，你们那更有很大民主，评比就是民主嘛！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搞代表会。

（当讲到家属学毛主席著作，五好评比，有地头评，每月一次评，半年初评，年终总评，评比成为一种政治力量时），刘少奇说：工分拿多的等于奖励，少的等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要写一段。

（当讲到一年有三，四个月搞冬季整训、政治教育时），刘少奇说：冬天搞政治教育，搞冬训，头一二年有事可做，搞久了是不是那么长时间？（×××同志答：每年都有一批新家属来，要教育。）你们那里要有一些调皮捣蛋的人，当反面教员，可以经常搞一点人去受政治教育，否则就没事情可做了。

家属恐怕不要把她们叫家属，她们也是劳动者，有工业劳动者，有农业劳动者，都是劳动者，都是大庆人嘛。有的搞工业，有的搞农业，只是分工不同。已经不是大城市通常意义上的家属了，还是不要称家属，这一点也得讲清楚。

刘少奇问：你们整个矿区的代表大会要不要？原来有没有？（×××同志回答：原有五级三结合干部会。）

刘少奇说：五级三结合干部会就叫代表会好不好？代表会要搞点右派进来，否则就没有味道。要搞点调皮捣蛋的进来，不当代表，也可以列席嘛！矿区政府没有代表大会制度好，矿区政府应搞代表会。

（当×××同志谈了家属中热爱劳动，夫妻一对红的事例，讲到无产阶级思想已经占领了家属阵地

时），刘少奇说：应当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她们。

刘少奇说：社论发表还早一点。报道写的不那么生动，要补充一下。

刘少奇问：家属中党团员有多少？（×××同志回答：一九六五年家属中发展党员×人，团员×人，现共有党员×人，团员×人。）

刘少奇说：事实上你们是个大公社，是工业和农业在一起，是一个共同体。

刘少奇说：欧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从空想到科学发展起来的。恩格斯专门写了一本书，叫《社会主义由空想发展为科学》。我们有了无产阶级专政，一切就可以搞起来了。他们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搞不起来。这样搞它几十年，两种所有制就可搞成一种全民所有制了，生产发展了，每人的收入就增加了。小孩子参加了劳动，也有报酬。当然，马克思说共产主义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你们那里有毛泽东思想，政治上有压倒的优势，但是将来能不能走上共产主义，现在还难讲。因为这决定于整个国家是否变质。整个中国、全世界战胜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才能有真正保证。现在还不能做结论。但现在无产阶级占压倒优势，就能把人教育好，把调皮捣蛋的教育过来。

党团员还要发展一些。群众对党团员的标准要求高，是好事情，大庆人是先进分子，要从先进分子中找尖子就比较难找，你们要重视对全体人员的教育，教育全体人。

是不是有改造不好的人呢？（×××同志答：有。一种是干部中革命意志衰退的人，一种是旧知识分子中落后的，这两种人难改造，现在都要他们下去劳动，在劳动中改造。四清中干部和工人里都清出一些有问题的人。）

刘少奇说：干部百分之零点六，工人中百分之一点几，也好，有点反面教员也好。

工人农民参加劳动，就容易改造(×××同志：就是干部和知识分子之中，前面所说的两种人不容易改造)。

改造好的调出来，再把新的调进去，这办法好。上次看到你们的材料，刚参加劳动有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

家属也要搞四清。

刘少奇问：大庆那里开荒有什么限制吗，与农民有无矛盾？（×××同志答：划了范围，油田以外归地方。)参加农业的劳动力，是否还需从外面调入？（×××同志答：孩子长大都劳动，恐怕还要调出来。）

（当×××同志讲到学校问题时），刘少奇说：你们学校先招生，后建校，（×××同志：主要招内部学生。)一步步办，不要忙。你们要办一点农业大学，将来好搞农业。大庆孩子将来长大了，大庆用不了，石油系统也用不了，还要调出去，主要向农业找出路。十年你能包，一百年就包不下了，要他们多学点东西，采矿、炼油、机械等等，还有农业，都要学一点。

你们那里如何利用农闲时间？可以开会，冬训，但半年时间那么长，用不了，要搞学习。一个要搞生产，还要广开生产门路；一个要搞学习，家属也要学点工业、农业，学一点机械。还要搞点文科，画画，学文化。还要学政治，学文艺。主要搞自然科学。将来大庆的小孩子出来，总要在中学以上，专科、大学程度。

要搞半工半读，这样出来的人就比较好。

学校不要那么机械，要搞活泼些，学两年、干两年活再学习也可以，也可以学习四个钟头，干四个钟头的活，要活泼，各色各样。

劳动的时间，也要搞的活泼些，按照需要来定，有的四小时、六小时、八小时，农忙可突击十小时，十二小时。特别是服务行业更不要那么机械，工人、家属、学生都去劳动了，上学了，还有什么务可服呢？可以服务四小时、六小时，农忙大家都去搞农业，要活泼一点。

（当×××同志谈到工人现在还可搞设计时），刘少奇说：有的搞发明创造很年轻，不一定学完大学。搞两年工作再学也可以。

你们这里是不是叫工人村？有工人，有农民嘛！这个稿子开头没个总概念，要不要写上工人总数，生产规模呢？（××同志：保密关系，不好写。）为了保密，总数可以不写。

“历史上没有”这话不写了。

食堂要写一写，倍倍尔特别讲食堂，他说食堂是解放妇女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不赞成一家一户生火做饭。你们食堂比较话泼，比较方便自由。食堂问题，马克思说过，倍倍尔的书也写过食堂。中心村有些什么都要写清楚。

（当×××同志讲到大庆家属劳动、评工记分问题时），

刘少奇说：家属参加生产，记工分制度，很好，这是一种分配方式，还不是各取所需。全民所有制是拿工资。生产力越发展，小孩学生半工半读，自己有收入吃饭，夫妻都有收入，收入多了，对报酬的观念就不强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就不计报酬了，劳动不是为赚钱来维持生活，而变成快乐的必需的了。

你们那里没有自留地，集体养猪养牛养鸡，也可以搞的自由一点，家里有老人的也可以养点鸡，没老人的可把孩子送到托儿所，要活泼一点。

恐怕那里的老人还没有教育吧？生产也要活泼一点，不一定整天搞，搞个半天也可以，老人小孩子都可以参加。你不给他一点工分就没兴趣了，也给他一点工分，他总可以拣一点麦穗。小孩子对劳动最有兴趣，小时候最容易养成劳动习惯。劳动是一切人的义务，马克思讲：脑力劳动改换一下方式，搞一下体力劳动，效果更高。要给一点工分。

你们这里最大一个问题，是解决了一个住宅问题，全世界没解决的问题，标准不那么高，工人还满意。

刘少奇问：取暖怎么办？能否统一搞取暖？现在烧渣油，将来渣油用得多，没有渣油怎么办？（×××同志答：集中要用锅炉多花钱）

刘少奇说；工人、家属参加生产，改善生活，将来农业发展了，生产门路广了，收入还可提高。

“修正主义在这里找不到生长的土壤”，不要那么讲，应讲无产阶级思想占压倒优势。

“只有劳动的汗水，才能把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洗掉”，也不要讲，贫雇农出身的干部有的还变了质嘛！不要那么讲。

社论里讲“一百个城市居民要十几个服务人员，大庆少。”不要那么讲，这不确切。大庆也有这个问题的，有工人、家属、小孩子，各方组织起来，可能服务人员不会少。多一点不要紧，反正家属不是消费者。将来服务人员还要从其他行业中吸收点。办学校首先要满足自己，还要为其他行业服务。

社论里讲“要消灭三个差别，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看来老城市是要很长时期，甚至要几百年。而新的工业区，现在一开始就这样搞，工农结合反而省投资，人们的劳动力更能充分利用起来，我看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农业也不要那么高水平才能消灭三个差别。大城市的劳动力没有事做，有些人很不好找工作，街道居民搞点生产很困难。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说，大城市劳动力有很大浪费。我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新的工矿区按这样搞，不一定那么长时间。我们现在搞工矿区就可以着手这样搞嘛。

社论上说干打垒不是临时的要永久住下去，将来条件好了也可重盖，不要讲那么死。农业四十条专门写了农村盖房子。现在住宅是解决了，将来再过几十年，生产发展了，标准还可提高。他农业搞好了，生产发展了，自己有了积累，他要盖，你能不让他盖？

消灭三个差别等等这一套，恐怕大庆这地方可以先走一步。

恩格斯讲，居民点二、三千人最理想，大庆现在就是二、三千人，同恩格斯想的一样。

每家都做饭生火浪费，还是要搞公共食堂，小孩子离开母亲吃奶就送托儿所，将来对一切人都是免费受义务教育。现在收一点钱，将来标准高一点，钱收一点，象征性的，逐步过渡。

最后一句话，一般情况下以小城镇为主，事实上搞分散居民点，要城乡结合，是不是要那么多小城镇？现在设计院、研究院、学校、都集中在小城镇，以脑力劳动者为主，这些人也都要参加体力劳动。设计院、研究院还是要的，要有点镇子，但不一定是以小城镇为主。

我看这样估计：这是一种新事物(不要讲历史上没有)，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有计划搞出来的，是最有生命力的，发展前途很大，有典型意义的。

51）转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的批示(1966年6月20日)

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52） 附件：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1966年6月18日)

今天(十八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全体工作队员正在开会的时候，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据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斗了四十多人。在这些被斗的人当中，有重点人，也有些有问题的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两个反动学生。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当时情况比较混乱。

事情发生后，工作组领导小组同志和各系工作组同志，立即赶赴现场，张承先同志在两个斗争地方讲了话，当即得到绝大多数群众支持。十一点以后，情况已缓和下来。

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带头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的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十七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姓名待查)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会议是十七日晚十时左右才决定的)，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来，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同时，在斗争时出现一些可疑的现象，据工人××同志反映，在三十斋有七个未带校徽，来历不明的人，用电话到处联络，说已斗争过什么人了，现在正斗谁，到十点钟到校办公楼集合等话。还发现有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索他们想斗的人，并且把这些被斗的人拉到同一个场合，在一个所谓“斗鬼台”，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群众中煽风点火。

从几个在乱斗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也可以看出这一事件的本质：

东语系二年级学生×××(团员，家庭出身旧职员)，有流氓习气，有人称他“小阿飞”。运动中不学习，不参加讨论，到处乱串，今天上午他是“斗鬼台”上的主角，专门把斗争对象拉上台，给被斗人脸上抹黑，戴高帽子，扭打。他自认打了八人，学生反映他打了十几个，还夸耀自己是打鬼英雄，并且要流氓，摸妇女的乳房，打屁股。

庶务科一赶车工人×××，国民党员，兵痞，当过国民党上尉连长，被俘后，隐蔽反革命身份，混入革命队伍，因贪污判过徒刑，后来到北大。上次社教就表现很坏，到处煽动打击党员，这次运动中打人最凶。几次打人他都带头先下手。

无线电系六年级学生×××(党员)，今天在斗争一个女干部时，撕破她的裤子，摸她的乳房和阴部。另外还在人群中乱摸两个女同学的下身。散会后已由同学把他扭送到校卫队，此人过去就有严重流氓习气，在王府井曾乱摸女人，俄东西，被逮住过，正在留察期间(已宣布立即开除党籍)。

还有个名叫×××的人，是个被开除的北大附中学生，今天拿一个一九六。年的出入证，混入校内，到处起哄。在张承先同志讲话之后，他还在人群中高喊：“不行，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斗法”！

除了这些坏人以外，参加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本身有问题的人，怕火烧在自己身上，趁机表现自己，假装积极，抓替死鬼，乱斗乱打。政治系二年级学生(调干生)×××，在围攻聂元梓等大字报时是个急先锋，今天捣乱又最厉害，很多同学讲应该说理斗争，不要打人，他则大喊“要坚决地打，非打不行”。另一种人还是单纯从个人出气出发，不听工作组的劝告，不顾党的政策，不顾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利益。

针对上述情况，领导小组立即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

(一)下午一时召开各系工作组长紧急会议。分析了上午的形势，指出这次事件与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问

题根本不同，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此决定抓住这件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旗，教育群众，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辩明是非，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增加革命警惕性。

（二）以系为单位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揭露今天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会后即分组讨论。同时还强调工作队要高举革命旗帜，坚决支持革命群众把北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三）今晚十时又召开了全体师生员工大会，由张承先同志讲话，主要表示工作组要坚定地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同时，明确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并指出这种作法会被而且已被坏人利用，指出今天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号召大家务必擦亮眼睛，不要上敌人的当。并组织全体讨论。

（四）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依靠革命的左派，组织起来，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还宣布：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按现行反革命论处。

通过以上措施，绝大多数群众热烈拥护工作组的主张，纷纷揭露并谴责了坏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如工人×××说：“工作组支持我们革命派，领导我们革命。但是有一小撮坏蛋却企图给工作组抹黑，把运动搞乱。我们决不答应，一定要把它顶回去。要和工作组一起，把这次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好”。化学系二年级许多学生，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假左派的活动情况。有些同学说：“坏人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搅浑，转移斗争目标。我们今天就是混战了一场，上了坏人的当”。许多系的广大师生在会上就高呼口号：“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53）同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部分组员的谈话(1966年6月20日)

现在左派在争取群众，右派也在争取群众，中间派摇摆子两派之间。因此左派如何争取群众争取多数是个大问题。斗争的中心问题是争取多数群众。没有多数，就不能战斗，少数人作战就不能胜利，少数人战斗一定要失败的。

现在不能斗刘×，内部不一致嘛，不一致就斗，中间是要出事的。

高一高二的同学不能骄傲，高一高二参加工作组的人多，现在高三没有人，现在你们受到信任，人家不服气，不服气是有道理的。他们比你们高，被高一领导有意见，怕丢面子，要理解人家的心理状态，如果你们是高三，他们是高一，他们领导你们，你们也不服气嘛。高一高二的人不要骄傲，不骄傲才能使他们服气。工作队可以跟他们讲清楚，为什么没有高三的人？因为你们当时选不出来人嘛，等以后选出来人再抽调。

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可以肯定的了。你们开一千多人大会，有把握没有？要充分分析学校的形势。到底是什么形势？以后怎么办？要研究这个问题。

开始出现了一些问题了，出现了你(工作组长)是黑帮的大字报，说你是黑帮，给你贴了十几张大字报，不要紧。大字报出来，证明内部意见不一致嘛，证明他们对运动不满，学生之间不团结嘛。你去了三天，和他们无缘无故，怎么知道是好人坏人呢？这是他们的态度。要贴还让他们贴。为什么要斗你呢？是因为你靠近左派，要好好看一看，现在多数不同意他们了。

在这种情况下，革命群众内部还不一致，所以斗争刘×是不是太早了？斗争刘×，这是阶级斗争。他是阶级代表人物嘛。权已经夺了。工作组来了，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他还有什么权？问题是如何斗倒斗臭。斗这些人，是阶级斗争。你们没有参加过，如何斗法不知道，只是要斗，但不知道怎么斗，和我们革命初期是一样的。

阶级斗争怎么斗法？和打仗一样，要有战略战术。毛主席说：“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则已，要打，就全部、彻底、干净地消灭敌人。”

打仗就要组织队伍，队伍组织好了没有？现在中间派，可以跟你们走，也可以跟他们走。中间派很容易被右派争取去，不是紧紧围绕在左派的周围。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争取中间派，戴高帽子，中间派不是也去了吗？队伍没组织好，打仗没队伍怎么行？

打仗没队伍不行，队伍要组织好。一个团就是一个团，一个营就是一个营，说冲锋就会冲锋。现在你们是两个司令部，往前冲往后冲你们没有把握。这样的队伍能不能打仗，能不能打胜仗呢？队伍要有训练，没有训练，往左往右冲锋陷阵都不晓得。那也不能打胜仗。其次，队伍组织好了，绝大多数跟着左派走了，队伍训练好了，队伍要有枪。没有枪，棍子也要拿一根。棍子、枪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二十三条”，就是《人民日报》社论。子弹就是材料，要掌握材料。

队伍组织好了，也训练了，武器有了，子弹也有了，再开始作战，就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败仗，争取胜仗打得多。只要胜仗打得多，打三仗胜二仗，领导就可以站得住。打三仗，两次败一次胜，领导就要站不住了。打败仗是不可避免的，但总要胜仗打得多，打胜仗多士气就越来越高。打仗不胜不败相持一下，相持一下怎么办？准备工作本身就是斗争。

可以讨论这张[给工作组长贴的]大字报，开班会，工作组派人听，各班派代表，讨论这张大字报对不

对，你们赞成不赞成，什么性质。这本身是组织队伍，统一学生思想的。这张大字报一煽起来队伍就不太整齐，这是组织队伍统一组织。这会有人跟他走的。讨论就有斗争，这就是组织队伍。

这张大字报和善意的批评不一样。你是组长，你是核心人物，这张大字报就是不要你来领导。

开讨论会他不来。你不开会，工作组决定一定让它开，我们召集嘛。看你来不来，不来更好，不来就分化了。不来，就作一个一个人的工作。来一半人开会，那七个人不到也可以。这样一搞，全班不会一致，他们就孤立了。七个人可以分化，一分化就弄清谁是积极搞的。要开几次会，直到讨论清楚为止。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要做七个人的工作。把讨论大字报这一仗打好，队伍才放心，先打好这一仗。

各班讨论，这张大字报内容是对的，是错的，是部分对的，还是部分错的，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

如何入手？一方面作斗争，一方面学习，在斗争中学会如何搞阶级斗争。首先要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有关战略战术，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二十三条”上工作方法都有，也讲了这一条。

武器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文化革命的五篇文章，《人民日报》社论，“二十三条”一一这一些都是武器。学习的时候，不要抠一字一字的，要体会精神，我们的队伍一定要掌握武器。

当前，主要问题，是不知怎么搞，我们也是第一次，不知怎么搞，我们和你们大家一起搞，一起学嘛，大家讨论，走群众路线，先跟左派、积极分子商量，再跟群众商量商量之后再斗。

先斗刘×还是早了，先攻敌人的弱点，再攻敌人的中坚，先打最容易打的仗，要孤立主要敌人，那几个都是受到刘×指挥的，要争取几个人起义。首先要争取学生，教员也要争取。我们和他们有矛盾，要对他们有压力，有压力就可以分化，找他们谈话。不要压得太厉害，要跟他们讲；不要另组织一套，要跟我们合作，指出你们高三知道情况多，你们要真革命，可以领导我们，不要自己走第三条道路，你们跟着我们走，还是跟着刘×走？还是组织第三派？指出你们好了，可以参加领导。你们态度不明朗不行。先争取和刘×合作的学生，这是子弹。学生揭发刘×，没有特大力量，教师知道内幕，他们起来揭发，力量大。先找少数人个别谈话，再争取一部分。大部分就可以争取过来。

那四个重点人物，也要去争取，也要争取他们起义，他们起义最有力，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要争取陶××起义，她不起义就批判，让她自己批判、揭露刘×、前市委，让陶××揭发。让她自己说。不要怕她捣乱。越捣乱越好。除了刘×以外，都让他们起义，孤立刘×。先背靠背的揭。揭的材料掌握到工作队手里，陶××不检讨，再斗也来得及。如果她揭得好，可开检讨会，从宽处理。如果揭得好，我们也做到仁至义尽。

假起义也要嘛，要弄假成真。但要说不够，进一步交代。如果不这样做就不策略，不好。希望你们在斗争中学习。

要斗刘×，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起义要欢迎，找他们谈话，就是训练队伍。开会让他揭露，起义也要欢迎，对检讨要有分析，不要把真检讨当做假的。指出你们检讨得不够，要指出不交代就孤立。对学生采取团结批评团结。

旧市委领导嘛，旧市委有错误，没揭刘×以前，跟他走不算犯错误，只要坦白就可以赦免。他是书

记，是校长嘛。以为听他的话就是听党的话。现在是工作组、文化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你再跟他走就是保皇党了。把这些人搞过来，使他们不再跟他走了，这样就有了多数。反对文化革命的人要建立司令部，要分化那七个人，工作组到校以前、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前，有问题要交代不算犯错误，不咎既往，交代就完了，不过来就可以压他，把主要的孤立了。不然自己队伍没有组织好，打最强的敌人，如果他不低头，说我没有错误，学生就要打他。你们就不叫打，你们又成了保护他的人，学生就会不满，这样就会抵消了力量。那七个人现在不是刘×的人，至少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向你们进攻，你们没有消灭他们，不能斗争刘×。对这七个人的大字报要讨论，一讨论必然有赞成他们的，他们就表明态度了，赞成他们的人有些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这七个人不一定是敌人，必然要分化，他们的后盾是地下的，你们不清楚，你们的一举一动他们清楚。你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现在发现情况，说明刘×的人组织了一个司令部要反对你，首先组织进攻。出大字报是好事，蛇出洞了，首先就要把敌人搞清楚。敌人进攻了，你不打他还行！所以一定要分化高三(8)、高三(2)，主力部队不是他们，主力部队没上求。高三同学要站起来。高三(2)、高三(8)一定要分化，要集中力量作他们的工作。一定要把高三(2)高三(8)同学的工作做好。这就是战斗，争取教员也是斗争。本来阻力是他们，他们不站起来，现在还不是你们的队伍，就是跟敌人勾结，刘×并没有真正的孤立。愿意革命的是绝大多数，一时没有站起来，是暂时的，左派靠不稳，领导权不巩固，不要因为群众已经团结在你们周围了，敌人首先进攻你们的，就是要把群众团结起来，教员工人也讨论，很好的讲讲斗争策略，让他进攻。争取高三(8)、高三(2)才能作战，争取的原则是团结批评团结，要有点压力，压力不要太大。太大就要使他们到对立的那面去了。不要伤感情。他们的错误是可以改的。要宽大，这样大多数队伍是可以过来的。条件成熟了，先找薄弱点，不要一下子打攻坚战。攻坚败了就会打人，一打人就上当了，这样不能斗倒斗臭。

现在是准备斗争。要争取初三同学不听他们的话。不好的教员开会压他一下，少数人跟他谈，工作组、学生跟他谈，叫他交待，指出你不是黑帮，既往不究。人家攻来了，要在班上讨论，正好包围他，要马上讨论这张大字报。要宣布既往不究。不要斗得太厉害，要压他一下，争过来。死顽固的不过来不要紧，讨论大字报也是斗争，斗争有准备，力争开好，几种可能性都要估计到。开坏了不要紧，总结经验嘛，再战斗嘛。你们热情高，能领导好。要注意坏人利用你们的热情，你们不是没有工作，这也是一种学习。

面对面斗不好怎么办？文斗还是武斗，要正面提，叫大家讨论，和大家商量，要走群众路线，吃透两头。要挑一些有关语录，学习“二十三条”，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了解情况，把坏事变好事，这样几个月学习等于多少年的学习，重点搞一、二个班，讨论好，其他各班就可以照样子，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相结合，自己没搞过不要紧，搞不好取得反面经验，叫他不再这样搞，具体到一个班蹲点，没有办法和大家商量，我们是革命的，要和左派商量，要叫学生做老师的工作。

54） 在听取北京师范大学一附中工作组汇报时的讲话（1966年7月11日）

那几个人怎么样？姓牛的学生是他们的后台吗？陈××、何××他们能承认吗？你们没有打他们吧？现在都在学校吗？（工作组：陈、何等人经过我们三次大辩论，已打下了他们的气焰，现在还在学校检查。第二次辩论有一个左派学生打陈一个嘴巴。牛××这个学生，害怕辩论，吓得跑回家了，三天没来学校，还扬言要绝食、要以死来威胁我们。）给他家讲：不到学校来，我们没办法，这是你们家里的事，我们不管，你们家负责好了，可以不要来了。假若真来了，也还可以。青年人嘛，只要改正错误，交待清楚。改正错误我们还欢迎嘛；如果有错误不改，就跟他辩论，摆事实、讲道理嘛。

你们要注意，不要打人，不要骂人。特别是对学生，不要压制自由。他们要反就让他们反嘛，要大胆放手采取宽大政策。只要改就行嘛，只要心里改，就可以了。否则口里要改，心里不改，还是改不掉。

这些人高三毕业了，还得留在你们学校，就交给你们了。反动的，留给你们去改造。他们不能到大学去，到农村又不愿干，留在家里跑跶在马路上，不是乱搞没人管嘛。他们有三条路：一个是下乡，一个是在家蹓在马路上，一个就是留在你们学校。

你们没有定他们是反革命分子吧？（工作组：我们宣布他是反对和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你们还可以给他们说，只要你不要再反，就可以了，给他们留个出路嘛。

工作组、团委不要讲人家是反革命，同学们可以讲，可以骂，我们不能。他们能骂勾××是黑帮，为什么我们不能骂他是黑帮？不要给戴反革命分子帽子，戴帽子还要经过法律手续嘛。青年人不戴帽子为好，再看看他们嘛。以后可能还要闹的，以后就不怕了，上次搞得你们措手不及呀。现在，你们有经验了，群众也有经验了嘛，争取多数群众，使他们孤立起来。最后让他们再闹嘛，再闹，可以教育群众，这是好事嘛。教师：有没有参加他们的？（工作组：没查出来。）这些假左派是真右派。

革命委员会可以加进来一、二个教师，进来会有争论，这好嘛，你们不要怕。

左派有百分之三十就了不起了，真正的左派，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可以了。不过左派要团结多数，一不团结，百分之三十就要孤立了，右派力量就大了。右派不会多，百分之几的右派势必是有的，不过有些人你们还没发现，右派有百分之五，这很好嘛。这样中间派有百分之六十多，中间派是大多数，这是合乎情理的，中间派是要变化的，右派也是要分化的。

没有武器就不能斗嘛，要准备发言呀。初中可以组织他们学毛主席著作嘛，可以学习乙种本，没有事的就组织他们学嘛。

初一的大多数愿意放假，就放。初二、初三的要在学校闹，就让他闹嘛。可以派几个好教师去，派高中左派学生去，一个不行，派两三个嘛。对初中学生不要让他们广泛讨论划分左中右，可以组织学乙种本，看谁学得好，看谁用得好。

现在读乙种本，可以学到政治，学到语文，要学了就做。不要按着顺序学，可以选着学，先学老三篇，还可以学些语录。可以组织他们开些会，但不要开得太多。

初中学生闹到什么时候才散呢？等到大多数都要求放假了，就放。可以组织学生参观，放手让他们干，但不能自流，自流也不太好。

初中学生学毛选能学下去吗？（工作组：可以学，就是念一遍，大家讨论一下，不好深入。）念一遍没有用，要念上多少遍，学了还得用。

高中学得怎么样？高中就应该带着问题学，根据你们学校的情况，带着斗刘×的问题，带着斗假左派的问题来学，要好好地抓。

你们(对在座的学生)一个多月学到的东西多不多？(学生：学的东西很多。)一个多月等于多少年。让你们闹半年好不好？半年以后再上课。

初中还要上课，九月一日上课，你们看行不行，你们有准备没有？初中下半年不上课，对小孩子不利，没有好处。

将来还要招生，还要毕业，怎么安排，你们要考虑了，如果九月一日上课不行，就拖到十月。到十刀可以了，就那么几个问题，讨论来讨论去还是那么几个问题，再讨论就没有味道了。你们要考虑考虑。

昨天发了通知：招收新生，要选政治上好，学习上好，身体上也好的。三好才能升学。第一条是政治好，再加上学习也好，身体也好。学习好要放在第二。政治上不好不能升学，这是一种压力，这也是一种动力。政治上不好，就要去好好学毛选嘛。政治上反动、政治很坏，功课再奸也不能升学，宁可要政治上较好，学习上不好的。政治反动，功课就是五分，也不能升学，肯定的不能升学。政治上不很反动、学习上好的可以考虑。

小学问题不大，一般都可以升学。初中进高中，小部分可以升学，大部分不能升。要回去算一算。大部分要回乡，这是很大的动力。全区要算一算，恐怕一大半不能升。不能升学怎么办？不升学，又不愿下乡的人，各种学校都不要收，一个也不要，明年还不要收，不准收，这回要宣布。这回可以从已经下乡的青年中招一批，这就是说非要下乡不可嘛。去年、前年没考上高中的一个也不要，包括干部子女。这个事你们要安排一下。这个问题一宣布，初三左派就会多起来了，这有个压力。

初中准备下半年开学、招生，(学生：没教员。)要准备教员。给学生讲清楚，不会没有教员的，教员是有的。高中毕业学生中，好的，可以抽出来教书。

斗刘×，可以先搞背靠背的批判斗争。先在班上练习嘛。先在班上练，然后再在年级里练，看哪个讲的最好，然后选那么几千。这可以出人材嘛，我们要搞集体创作嘛。

这次斗刘×，发言要争取比上次更好，要多练几次。练习中，也可以让刘×参加几个班级嘛。一定不能在斗刘×大会上讲不下去。讲话的不是个人意见，可以是班级的意见，把大家的意见整理出来，再讲给群众听，这样教育了大家，也教育了教员。

要求大家很好调查研究，充分准备，才能讲出好话，才能有教育意义。学生讲得好，工作队可以不讲，同意学生意见就可以了，有讲不全的，可以补充一下。要事先准备好，没有练习不行。

斗刘×，要积极把教师工作做好，多数学生去准备刘×的材料，少数人可以做教师工作。

多练习几次，不练习好不开会。

越搞越有水平就好，不要越搞越不行，批判斗争刘×，是要教育大家，教育对象是学生和教职员。

黑帮里的，也不要个个都那么恨他，他们中间还有能用的。如四清运动中的贪污犯，这样的人转变过来很有用，他们去挖贪污犯，北我们还有办法。

要争取把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反革命分子是消极因素，黑帮分子是消极因素，可不可以变为积极因素呢，变了有利于人民。

教师工作没做完，要争取多数，实在不好的，历来反动，教书也没本事，原来是三青团、伪军官的要清理。工人中也有不好的，都要清理一下。逃亡地主跑到城市来的，有的还搞不清。教师中要清理的恐怕不多，搞太多了也不利。对于那些可以教育改造的，教书还比较好的，还可以用嘛。

老教师，教了几十年书，这种人批评一下，改一些，还可以用。这些人没出路，批判一下，还要他教书。他不改，还散毒素，那你们也不要怕，可以批判嘛，自然科学他们可以教。政治教育和辅导员就一定要政治好的。语文教员也要有政治观点的，历史、地理也要政治好的。至于教物理、化学、数学的，可以看，用他对我们有利，还是不用对我们有利。撵走对他不利，对人民也不利。政治可以和语文课结合，就是历史课有问题，不学也不行，要有政治观点才能教。地理倒可以教。

教师工作相当多，要争取多数，老教师批判一下，还可以教几年书，过几年再退休嘛。还能教几年的不要轰走了，让他走到哪里去呢？还是要吃饭的，又不能饿死他。他们教书还要放毒，放毒你们就消毒嘛，随时放随时消，你们有经验了嘛。

教职员里还会有几个人(指不能再教书的人)，这种人不多了，这几个人怎么办呢？赶走？！赶走你们就轻松了？赶到哪儿去呢？还是留给你们，在你们那里吃饭，放在你们那里改造。就是法院判了几年刑，也还放在你们那儿改造。这些人又不能杀头，不杀头就要吃饭，如果他要杀人放火，就抓起来，其余的一律留学校。他们就是不老实，也不杀人，也不放火，就是放毒，你抓不住，不能杀，这就是个大麻烦。这是有困难，但是要把困难留给自己，方便让给别人。这就是左派的责任。什么叫无产阶级左派，马克思讲：“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你们不是无产阶级左派吗？你们的目的不就是解放全人类吗？所谓全人类就包括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这些人不多，这些人不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也就不能最后解放。无论资本家也好，地主也好……有一小部分杀了头，还有一小部分坐了牢，大部分不能抓，也不能杀。他们还有子女，你杀了他的爸爸，杀了他的父母，他就有对抗情绪，没有对抗情绪的很少。所以杀了头，问题也没最后解决，解放全人类也包括这些反动派，他们也解放。他们不解放，无产阶级也不放心，还只能说无产阶级占优势。你们的斗争进行的很激烈，实际是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解放以来，我们国家发展了生产力……做了许多大事嘛……能不能把阶级斗争停下来？不行，你不斗，他要斗。坏分子只占百分之几，可是造反的能量大得很。七个人就要把你勾××赶走嘛，你们几乎站不住脚，所以阶级斗争不能阵，要一直斗下去，斗个几十年，几百年，一直到共产主义消灭阶级为止。你停他不停，你不注意他注意，他天天在那里斗。所以我们不能不斗，我们不注意阶级斗争，就是让资产阶级斗。无产阶级不斗，势必就会搞成资本主义复辟。斗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就可以争取过来，团结过来，那百分之五的，让他留在社会上问题不大。

对三类也是大部分争取，对四类也要争取起义。老教师批判一下还可以让他教书嘛，只有几个不能教书，留在学校给他事做。

下半年初中要上课，初中高中要招生。初中毕业不必考那么多，这可以根据情况做结论嘛。不要照过去那个格式，什么毕业考试啦，什么招生啦，等等。

这次运动，高中搞到年底，怎么搞法？先斗争黑帮，学习毛主席著作，清理这些坏人，清出来留到学校。然后是批判“权威”。还要搞清经济，把学校经济清理一下嘛，没有贪污分子？我就不相信，查一查。一个学生每年花了多少钱，了解了解嘛，你们现在一点也不知道，糊里糊涂的。以后的经济要向学生公布，要制定一套财务制度，要节约，教师学生都要节约。最后搞一段教学改革，学制改革。这恐怕搞不完，开始了就好。教学改革怎么搞？没考虑过？中学六年就是净读书，没别的事。小学读六年、中学也读六年，结果什么事也不懂。不会做工，不会务农，不会做生意，也不会当服务员……这个制度还是老制度，解放以后也改了改。说是改，实际上没有改。高中毕业就那么聪明？既不会做工，也不会种地。高中毕业只有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工人，看不起农民，也看不起服务员。到底是教好了，还是教

坏了？这事国家要负责任，教育要负责任，领导的人要负责任。你们是高三的学生了，你们会做工吗？你会种地吗？你会做生意吗？扫马路呢，扫马路学过几天还可以。搞阶级斗争这次才开始学。既不会搞阶级斗争，又不会搞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读这么多年书，实际是不聪明的。你们的知识，实际上没有工人多，没有农民多，没什么可骄傲的。考上大学又是五年，大学毕业什么也不会，还得重新学，医科大学毕业的不能看病，要实习几年才能看。护士学校出来好一些。护士不能当医生，医生又不会当护士，这怎么行？用什么办法改？这个问题是个困难问题。我们国家的事，没那么容易，不是一喊就能搞好的。这个问题先不要在群众中讨论了，领导的人要慢慢想这个问题。

这次文化革命不彻底改革教育制度，那就不好了。要彻底改革，反对的人一定多。首先教员反对，因为学生劳动，教员也要劳动，恐怕是这样的。怎么安排呢？可以和工厂挂钩，让他们让出两小时来，听北京市委的万里讲，北京工人有××万，学校、机关中有劳动能力的人也是××万，一半一半。那××万做工，那××万读书或办公，这就不好，如果这××万人，拿一半时间去劳动，八小时工作就可改成六小时工作。如果能真正行的通，工人一定会欢迎你们。绝大多数人能读书了，你们跟工人、农民结合起来了，这样工人、农民、学生(包括家属)的面貌，就可以来一个很大的变化。

你们可以学做饭，买油、买菜，晓得怎么买法。大师傅相当累，让他们也读书，大师傅会很喜欢你们。当然有读的好的，有读不好的，你们不也是这样吗？反对我们的人也得想一想，就可以使他们不反对了嘛。这些问题都是设想，现在也没有办法，你们大家想一想，看有什么办法。

还可以考虑把学校分成两部分，把一半或一小半搬到乡村去。搬出一半就不错了，搬到北京附近的乡村，两三个小时就到了，教师在这里上完课，再到那里上课。在这里上两天，再坐上火车到那里上两天。到农村去，学生就要劳动，那里劳动的门路就多了。可以跟农民结合，或者到山区开一些荒，最好和农民一道种地。没有房子怎么办？到那里去自己盖，农村盖房子简单，有土和木头就可以了。看看这样行不行。这样子一年可能办不到，准备一两年。在那里半年或者大中年读书，同时学习庄稼是怎么种的，那里有阶级斗争，还可受到阶级斗争锻炼。只要你们认真劳动，又能虚心学习，农民就欢迎你们。你们不认真劳动，态度又不好，农民就不欢迎你们了。搬一半到农村去了，不是就空出一半房子了吗？就开工厂，安机器。再有一部分同学可以搞服务行业，扫马路，当营业员，有一时期不是要背粪桶吗？可以背背粪桶。商店忙的时候，你们去搞几个钟头就好了。电车上去卖票也好，人大会堂不是有服务员吗？还有些人可以跟工厂挂钩。首先可以搞学校里的服务行业，自己做饭嘛，读书读了十二年，不会烧饭、烧菜，让你们烧就都吃生饭。校工的工作让学生做，就不要请校工了嘛。一出门就有马路、商店、电车，不是什么事都有干的了吗？一天里有三、四个钟头，你们去劳动，服务员就可以有三、四个钟头学习，这不是很好吗？你们懂得了如何作许多工作，他们又读书了，可以快点提高嘛。我看卖票的都是些年轻人，至少是小学毕业，要让他们读点书嘛，你们就专门读书，他们就专门工作，这不好。让他们也读点书嘛，就许你们读？什么事都做，有好处嘛，这不是现在考虑的问题，斗了黑帮、“权威”之后，清了经济之后，要搞教改，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们是师大附中，要跟师大商量好，师大附中是实验性质的，你们不搞新学制，不搞教改，哪里搞？你说，你不搬出去一部分，办工厂就得重新盖房子。一部分当工人，一部分当农民，一天有三、四个钟头上课，三、四个钟头劳动，两个钟头自修，这样对青年最好，对体力、脑力都好。马克思讲过脑力体力轮流休息。文化革命后期，要搞这个。讲起来大家都赞成，消灭三大差别谁不赞成？实际做起来，不赞成的就多了。家里有不赞成的，教师里也有不赞成的，学生里也有不赞成的，这也是阶级斗争嘛，这是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和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斗争。这样学六年，虽然一天只几小时，出来就可以当工人了，晓得怎么开拖拉机，怎么种地，怎么做生意，知识就是多方面的了。神经衰弱、近视眼就没有了。不要你做八小时工作，而只是三、四小时，要认真做、努力做，当一个普通劳动者。这样毕业以后，可以升大学，不升学可以当工人、当农民。高中毕业以后，不当工人、农民，当干部行不行？当干部也行，搞阶级斗争嘛，这总比读十二年书，什么也不会强的多。如果半工半读、半农半读的学校推广开来，全日制中学就不吃香了，全日制学校的毕业生就不

能升大学了(学生：那就把学校都改过来)。现在要实验一下，没有经验嘛，几千年没有搞过，中国没有搞过，外国也没有搞过。你们搞个经验给我，：有些什么问题和经验，怎么改法，还要和各方面协作，你们区委跟各方面讲通了，城市里就好办了。农村还不那么好办。你们师范大学就是研究教育的，你们不实验，什么地方实验？首先让几个学校搞。不搞试点不能推广。首先在师大几个附中试验，你们受师大领导，要和师大讲通。

你们在运动中基本上站住脚了，这时候要小心，要听学生的意见。学生可能出大字报，有的意见对。不管哪派提的，凡是讲的对的，你就接受。你也得改，要不然还是站不住脚。犯了错误，还是要赶你们的。真是那样，我也保不住你们。

（有人提出要派工作组兼任支部书记，恢复党组织问题时），刘少奇说：可以派工作组同志兼支部书记，召开党员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吸收非党员教师和学生参加。我不是党员就不能开你们的会？可以参加嘛，参加会就有发言权。不许三十几个党员单独开会，开秘密会干什么，参加会的群众，至少要为党员人数的一倍，至少一个看一个。为什么怕恢复党的活动呢？要立即恢复。参加会的这些人有发言权，支部会讨论什么问题，要让群众知道，搞秘密活动是不行的。只许公开，不许秘密，这就不怕了。做个错误决定也好，大家可以反对嘛。支委开会也不许开秘密的。

团委开会也要吸收非团委委员参加，不能搞秘密活动。学校里没有党组织，不是很正常的。到底什么人好，什么人不好，可以从开会看出来。属于争取的人，也让参加。就是刘×参加，那也好嘛。就用这个办法，不是怕他搞秘密活动吗？团委、支委也找点非团员参加，就是不许乱搞，这样大家就放心了，你们通不通啊？同意不同意？那你们很好通啊。允许人家没想到办法嘛！你不是也没有想到办法吗？有人主张斗完刘×再恢复支部活动，这不好嘛。没有支部书记应该工作组派人去干。只要有一条，不是开秘密会就不怕了。以后可以这样，可以经常这样，这样他就难做坏事了。支委会也要吸收非党员参加，不然他们也会做坏事的。

别的学校，工作组强的也可以成立临时支委会，也可以这样做嘛。

***

（有人提到批判资产阶级“权威”后，要拿出一段时间专门清思想，同时清经济时），刘少奇说：清政治就是清思想，思想是贯串整个运动的，斗陈××是清思想嘛，斗刘×也是清思想嘛，清经济也要清思想。

（有人提到恢复党团组织问题时），刘少奇说；开几次党员会，自己批评，自己整风嘛！

教职员比较复杂，你们斗不过他，他们斗争经验多，社会经验多，你们斗不赢他，斗不赢，只好打败仗。

（汇报到三级干部会解决什么问题，是不是主要解决领导核心的问题时），刘少奇说：领导核心，主要是教职员的问题。教员在这里交待，大部分教员可以在这里交待。左派在这里提意见，听了教员的交待再回去报告嘛。学生里大部分背靠背，一部分面对面，两边通消息。教员里多数人可以解放，可以分几批解放。大多数要解放，最后留下一批不能解放的。要拿回去斗的，也先在这里斗。老教员也在这里批判一下，把教职员的问题解决。谁是不能回去的，谁是回去也不能教书的，谁是还能用。但是问题多的，可以向学生先讲清楚。不鼓掌嘛，你可以作工作，以后再看表现，这也是个压力，学生看着你嘛。人哪能一下就作结论，你们青年人经验少。看他几个月、几年，不好再斗，好就留下嘛。学校里要开斗争会，工作组不强的，上级可以派人去领导嘛，主要是解决教职员问题。学校里要留工作组的人。不能都集中。多数群众还在学校嘛。好的教师也要和同学见面，好的教员也要来开会，教员里也会分化嘛。

支部会也在那里开，支部改组也在那里改组。

教师，他不怕工作组，也不怕教师，就怕学生。学生一鼓掌就高兴了，就高兴的了不得。搞一个月压力很大，没有压力不行，有了这个压力还不赶快加劲，没了压力就不好办了，压力太大也不行，太大就压扁了。这个压力已经保持一个月了，再保持一个月，大部分教师就要解放。对教师要宽大处理、要从宽，一、二、三类都要从宽。当然仅仅从宽也不行，还要有从严的，不然三类不会低头。刘×当校长不行了，支部书记呢？搞一个从严的，开除党籍，三级干部会上，要拿出一个从宽的，一个从严的，你走这条路，他走那条路，大家就要想一想了。好的解放一批回去，还可以有一部分参加斗三、四类，他们可以回去宣传，争取多数。假若三类都从宽，他们是不会改的，搞一个从严的就会改，只有宽，没有严，也就没有宽，好的坏的都从严就没有宽，也没有严了嘛。没有宽就没有严，没有严就没有宽，主要是从宽，多数人从宽，极少数从严。

（有人提到教师去检查，不深刻，不老实，被轰出来了时），刘少奇说：轰出来这好嘛，这就是从严。这是个细致工作，作思想工作。开三千会集中起来，二个星期，二十天就搞个差不多。他们吃了饭没事嘛，光开会，两礼拜，时间就相当多了，还可以休息一天。如果两个礼拜不够，可以搞二十天嘛。最好两个礼拜把大多数解放。然后还可以搞第二批。可以开大会，开小会，还可以分组开会，两个礼拜到二十天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剩下少数人也可以基本解决问题。一批、两批就解决了。解决了第一批，就有经验了。没有经验就很难办。

55）在讨论《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时的指示(1966年7月13日)

一、关于目的和要求。

(当胡克实汇报到北京市中学中问题严重时)，刘少奇说：中学要彻底清理一下。

(当汇报到现在尚有百分之五十四的学校未查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刘少奇说：可能还没有挖出来。

(当汇报到以完全中学为重点时)，刘少奇说；初中占多数，也不可忽视，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

(当汇报到第一阶段的要求时)，有以下几点指示：

(一)我们就是要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这两种人。我们的教育，是从资产阶级的教育沿袭下来的，所以，不能对所有具有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人都批判，只是批判少数代表人物，大多数人从中受到教育，树立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

(二)建立、健全党团组织生活，恢复和发挥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的助手作用。这应单列一条。不要把党、团组织放在一边，要在运动中观察党团组织，看它能不能领导，同时也锻炼党团组织。要明确地提出，把建立、整顿、健全党、团组织，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的助手作用，作为一条任务。要不工作队走不了。不完成这个任务，将来学校由那个来领导。

(三)清经济。政治清了，组织清了，思想也清了，趁这个机会把经济也清一下。

第一阶段的工作，初中在八、九月底搞完，争取十月开学上课，高中在九、十月搞完。

在第一阶段结束以前，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初中要毕业，高中要招生。怎么搞法？不考了，评就是了。高中招一部分去年、。前年毕业后参加劳动的人。去年毕业后未参加劳动，等着升学的，一个也不收，逼着他们参加劳动。这个工作量不少。

二，关于集训。

中学太多，太分散了，不抽出来(指集训)没法讲通道理。要摆事实，讲道理，实事求是。在中学生里边一下讲不通，我们就通过集训的办法，先将这部分人讲通了，这样就好办了。搞集训不但便于掌握政策，也便于打通思想；不但便于打通教师的思想，也便于打通学生的思想。对学生来说，集训也是练习作战。

留在学校的学生，也可以进行揭发批判，背靠背地讨论。教育部的干部、师大的同学去帮助分析，上纲。然后，集训的人回到学校里，开大会。每个班、每个年级选代表发言，一个人讲一个问题，一个方面，这样，容易批判透。而且，由于事实经过了查对，事先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这样才能够讲出一篇道理来。

一、二类的人，一个月内就可以解放了。四类好办，三类比较难办。但是，也要争取他们，要认真地跟他们讲道理，坦白好的也可以从宽处理，极坏的开除，这样，三类人就分化了。要有从宽处理和从严处理的例子。

集训一批，半月二十大就可以了。

三、关于教学改革。

主席讲，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不趁这次运动改革一下教育，是改不动的。当然，这一次不会改完，这没有什么，要开个头，定出目标、方针和方案来嘛。这是学生的要求，也是一部分教职员的要求，而且教职员也不敢抵抗了。所以，各校都要动手做。现在改得冒险一点也不要紧，破掉那个旧制度好。这个问题还要谈一次，请经委、计委和管财贸的同志都参加，因为这个和你们都有关。要搞教育改革，势必要把学生插到工厂、基建和商店里去劳动。如果你们不接收，就是抵抗教育改革。这件事大家都要参与，这是关系到消灭三大差别的大事，是反修防修的根本措施。光靠教育部改是改不好的。也不要你们出钱，给你们来劳动，你们为什么不采取欢迎的态度？你们应该扶持，应该欢迎，应该帮助。学制和教育改革要定出内容来，要提出个纲来，要考虑给高中和大学安排劳动方案。

四、关于政策。

文件中提出的政策问题有七条，基本上是好的。什么叫牛鬼蛇神？牛鬼蛇神就是“二十三条”中讲的第四类人，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就是要戴帽子的人，就是敌我矛盾。

干部和教师，是一类的，职务保留下来。二类的，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缺点错误要改。三类就是问题多的，要批判，其中有的要撤职，有的不能当领导了，要改换工作，有的还可以看一下。还是要争取大部分留下来。四类是批判的重点，但是，也要给出路，给他们一个重新作人的机会。

对几类人怎么处理？对地、富、反、坏、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要分析一下，要有几种不！司的办法。解放以来，没有做过坏事，又有教学能力的，还可以留下一部分。农村逃亡的地富分子，送回原籍监督改造。城里的采取退职、退休的办法。中学里都是小孩子，留那么多的坏人，就是不行。对于不利于留在学校的人，在处理的时候要适当，国家要负责到底，要给他们饭吃。先搞集训或集中到一些领导力量强的学校，逐步处理，不要一轰而散。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政策。

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教师，能不能做到？教师中，儿类人加上根本不能教书的人，恐怕不至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五以外的人，是指打击对象。

学生中一定会有小流氓、小反革命。对他们怎么办？在他们中间，除了杀人、放火，对群众有直接危险的人要马上捕以外，其他人不要戴帽子，也不要捕。但是，应当指出他们就是反革命、流氓。这要留在运动的后期处理。要把他们孤立起来。也不要天天辩论，浪费时间。

犯错误干部的子女，人不少，影响很大。对他们的方针是争取、团结、教育。仍然是重在本人表现，不是排斥他们。包括升学，也要注意这一点。

五、关于整党、整团。

现在只是恢复了生活，还没有恢复领导。这么大的文化革命，党支部不能领导怎么行。要明确地提出，整党、整团，恢复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团支部的助手作用，是这次运动的重要任务。

首先要解决领导问题。领导恢复迟了不利。有条件的宁可早一点恢复。党支部恢复了领导，工作组帮忙就是了，依靠他们去搞教学改革，搞清经济。一、二类的中学一百几十所，这些学校的领导问题可以早一点解决，可以早一点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教学改革也可以早一点进行了。如果这一批学校领导的问题可以早一点解决，整个运动就可以搞得快一点。

两天前，找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同志和一部分同学谈了一下，叫他们恢复党团活动。他们说，党支部

领导恢复以后，那些入危险得很，怕他们打击报复。这就是说，群众对党支部不信任。不信任怎么办？我教给他们一个办法：这个学校三十五个党员，开支部大会时，请三十五个左派列席。党团组织开支部大会，开小组会，统统吸收左派群众列席，不能开秘密会议。党支部只要开会公开了，什么问题都可以由党支部讨论。党的会议别人不能过问，这是办坏事的一个重要原因。什么人列席？左派师生列席。多少人列席？一倍，一倍多，或少数人。参加的人可以是固定的，也可以是轮流的。学校里党团会议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除了市委通知的必须开秘密会议的以外，都要公开。工厂也是这样。至少在北京市要试试这个办法，当作决定，然后在全国推行。党处在执政的地位，党决定的事情都是和群众有关的，党支部决定的事情要在群众中讨论，征求群众的意见。

重要的是：(一)党内要把民主集中制搞好；(二)把群众路线搞好。党内团内的民主集中制就是党内团内的群众路线。在这次运动中，要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一下。

整党整团，组织处理放在运动的后期。

学生搞的自发组织还是要用党、团组织来代替。党外、团外，都不能搞秘密组织、秘密活动。搞秘密组织，后果不好。

六、关于加强工作队。

中宣部、教育部、师范大学，自己的文化革命搞一段以后，要参加学校的文化革命。只在自己的机关里搞，不参加这么大的革命不行。就是要在文化革命中学习嘛，还要怎么学习。不参加中学的文化革命，师范大学怎么革命。师范大学要抽出一半人来。抽出来的人，还是交给团中央，由团中央统一领导，教育部参加，和团中央合作。

工作队要训练一下，调整一下，要加强教育，要接受群众的监督。现在有些工作队不听不同的意见，不接受群众的监督，老爷态度，非垮不可。这个问题很普遍。前一段，有个赶工作队的风，强调一下听工作队的话是必要的。现在工作队已经站住脚了，再不听群众意见不行。

七、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的内容，不要搞得太长，内容不要搞得太多，要完全是同文化大革命有关的，同当前运动有关的。开一天、半天就散，不只开一次，过些时候再开嘛。

56） 附件：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的初步规划（1966年7月14日送审稿）

一、形势。

在中央和市委的直接领导下，北京市中学兴起了一个汹涌澎湃、急风暴雨式的文化革命的高潮。革命的左派队伍不断壮大，经受了斗争的锻炼，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盖子已经揭开；揪出了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牛鬼蛇神。十六年来始终搞不起来的教育革命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所谓中学不能大搞群众运动的“教育特殊论”被打破了。

北京市的中学，长期受前北京市委修正主义领导的统治，历次政治运动，由于右派势力的抵抗、干扰和破坏，搞得很不彻底。对广大干部、教师和学生的阶级教育又很薄弱。阶级斗争的形势是严重的，复杂的。但是，只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放手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政策，这次文化革命的任务是能够胜利完成的。

当前的问题是，全市三百十二所中学全面开花，群众的革命热情很高，而我们还缺乏领导这个运动的经验，干部力量也不足，运动的发展很不平衡。目前，群众发动比较好，情况比较明，领导比较强的，约占百分之三十；群众发动不够充分，情况不甚明，领导较弱的，约占百分之五十；情况不明，工作组还未站稳脚跟的，约占百分之二十。

因此，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使中学的文化革命更好地向前发展，

二、目的和要求。

“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主席的这个指示，是我们中学文化革命的总纲。

运动分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放手发动群众，组织革命队伍，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斗争，第二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教育和学制改革。第一阶段的要求：(一)揭发和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树立学校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二)清理教师队伍，处理地富反坏右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

(三)建立、健全和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和团的助手作用，

(四)壮大和提高左派队伍，团结绝大多数，促进教师、职工和学生的革命化；

(五)清经济。

第一阶段的任务，九月底基本完成。

第二阶段的要求：

(一)把毛主席著作列为学校的主课。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改革各种课程，彻底改革文史课的内容；

(二)拟定学生参加劳动的方案，向半工(农)半读的目标前进；

(三)缩短学制，改革考试、考核、招生和学校的管理制度；

(四)建立学校的民主集中制，实行教学民主，改进教学方法；

(五)认真加强党团组织的建设，建立和健全革命化的领导核心。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进行必要的组织处理。

三、办法。

三百十二所学校，教职员×万人，学生×万人。各校情况不同，运动的进度不同，领导力量的强弱不同，应当全面安排，分类指导，抓住重点，分批解决。

第一阶段的工作，分别采用以下三种办法进行：

第一种；以校为单位开展斗争。

工作组领导较强，群众发动比较充分，情况基本摸清，斗争初步展开的学校，采取这种办法。共八十校，教职员×千人，学生×万人。

斗争的办法是：首先在适当场合，让教师洗手洗澡，解放大多数，然后，团结全体革命师生，通过师生代表会，大、中、小会结合，集中力量揭发批判党内外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或者，先斗争重点人物，接着解放多数教师。

第二种：分批集训(即几校联合召开师生代表会)。

1．农村学生占多数的学校，学生放农忙假，教师、学生代表集训。共三十二校，教职员×千人，学生×万人。

2．纯粹初中的学校，初中一、二年级学生放假，教师、学生代表集训。共一百零七校，教职员×千人，学生×万人。

3．一部分完全中学，领导力量弱，单独作战有困难，也采取集训的办法，共四十校，教职员×千人，学生×万人。

以上三项，共计一百七十九校，教职员×人，学生×万人。

采取集训办法的好处：领导力量集中，工作对象集中，便于更好地交代政策和掌握政策，便于教师洗手洗澡，坦白交代，有利于工作组做到胸中有数，有利于左派学生的教育提高，而且校与校之间可以互相带动，互相促进。

集训的要求：一是着重解决各校领导核心的问题，重点批判党内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二是促进大多数干部、教师洗手洗澡，放下包袱，轻装上阵；三是提高左派师生的思想觉悟，锻炼他们的作战能力。

每批集训时间：半月到二十天。

参加集训的人：全体干部和教师，学生代表。学生代表主要是左派，也吸收一些中间派参加，由各班推选或由文化革命委员会提名的办法确定。学生代表的人数，人体与干部、教师一比一或二比一。

集训期间应当注意的问题：

1．对全体师生，特别是对左派学生，说明实行集训办法的理由，取得大多数人的赞成。

2．时时、处处、事事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狠抓活的思想工作。

3．充分交代和体现政策，运用典型示范的办法，有从宽处理的例子，也有从严处理的例子。

4．以会内活动为主，会内会外互通消息，互相推动。

5．安排好在校学生的活动，如学习“毛着”和有关社论，继续揭发、整理材料，组织短期军训，参加劳动和体育、娱乐活动等。留少数工作队员，帮助党团组织和左派学生加以领导。

集训人体要分两三批进行，第一批集训时，其它学校的工作照常进行。

集训并不是取消了各校的群众运动，而是为各校更好更快地开展运动创造条件。集训结束后，仍然以各校为单位，同群众见面，分别不同对象，有的开展斗争，有的进行批判，有的检讨过关。无论是集训还是回校以后，都应当采取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

第三种：区、校活动，两者结合。

有些同志主张，基本上以校为单位单独进行，辅之以区为单位作报告、典型示范、重点批判等统一活动。共五十三枝，教职员×千人，学生×万人。

总起来说，全市三百十二所中学，文化革命第一阶段的任务，可有一百余校八月底基本完成，其余学校九月底基本完成。初中争取九月上旬至迟十月一日以后能够恢复上课。

四、政策。

(一)“二十三条”和中央七月六日批转北京市委《关于当前文化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规定的各项政策，要坚决执行。

(二)干部和教师分为四类，即：好的，比较好的，问题多的，性质严重的。

对好的、比较好的，要以严肃、热情的态度，帮助他们洗手洗澡，认真检查，及早解放，恢复工作。

对问题多的要严肃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犯有严重错误的，要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处理，有的要撤职，有的可以调换工作，争取大部可以留用。

对性质严重的，也就是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要痛驳他们的谬论，清算他们的错误，撤掉他们的职务。如果彻底交代，认真悔改，也要给以出路。

(三)分类排队工作，要根据运动的发展不断进行，要认真掌握政策界限。

什么是牛鬼蛇神？就是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如：

有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言行，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一贯地仇视共产党，反对阶级路线，打击革命师生和工农子弟，有反革命言行的；

蜕化变质，包庇坏人，参与反党黑帮阴谋活动的；

始终对抗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反对中央方针，对左派师生进行严重打击报复的。

对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认识不足，领导不力，跟着前市委办过错事的，不看作是反对毛泽东思想。

对于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教师，只要他们不是一贯抗拒党的教育路线，不看作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对于团阶级观点模糊或官僚主义而用人不当，对工农子女关心不够的，不看作是有意反对党的阶级路线。

对于与黑帮分子仅有一般性的工作关系和私人来往的，不看作是黑帮分子。

(四)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漏网的要查出来。摘掉帽子后继续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活动的分子，要重戴帽子。一般的不宜再教书，但要注意区别对待。有的开除，有的退职；有的如果解放以来没有做过坏事，有教学能力，也可酌情留用。

(五)有些老教师教自然科学很有办法，虽然有些反动思想，只要没有现行反革命活动，仍可酌情留用。

(六)拿定息的资产阶级分子，不能继续讲授政治、文史课，不能参加工会，不能担任行政职务。

(七)混进教师队伍的，不学无术根本无法教书的人，应该另行分配适当工作。

(八)出身不好，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教师，已经交代清楚，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不再追究。没有交代的，要交代清楚。

(九)学生中的问题，除了个别严重障碍运动进行的必须及时解决外，一般地放在运动后期解决。对现行反革命分子，除了那些对群众有直接威胁的外，不捕人，不戴反革命帽子。对于有破坏活动的流氓学生，教育无效时，应依法处理。

(十)对犯错误干部的子女，对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重在本人表现，多做争取、团结、教育工作，不要歧视，不要随便斗争。

五、整党整团，发挥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和团组织的助手作用。

应及时恢复党团组织的活动。目前已经恢复党组织活动的学校有二百所，占百分之七十。恢复团组织活动的有二百四十所，占百分之八十。

在运动中，党团组织长期处于停顿和解体的状态是很不利的。工作组应当把整顿党团组织，恢复、健全和发挥党团组织的作用，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要采用边斗争、边整顿、边提高的方针，使党组织成为这次运动中的领导力量，使团组织成为党的有力助手。

党团组织，在运动第一阶段即应进行初步整顿，以便形成好的领导核心。凡党支部领导核心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应该在洗手洗澡后，恢复领导；部分成员错误性质严重的，应当加以撤换或调整；领导权被坏人把持的，应当改组，由工作组代行党支部的职权，或成立临时支委会。此事，在运动中以能及早决定更为有利，特别是第一和第二类学校，更要尽早解决。

要吸收党员中坚定的左派参加党组织的领导，吸收团员中坚定的左派参加团组织的领导，以便充实党、团支部的领导核心。要注意团结左派群众，可以吸收他们列席党团组织的一定会议。

初步整顿后的党支部，要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逐步实行工作组、党支部、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三结合”。运动中的重大问题，要首先由工作组和党支部加以研究，然后提交文化革命委员会讨论执行。班级的团支部应当逐渐成为班级文化革命的领导核心。

在运动中，党和团的会议，包括支部会和小组会，都要公开，邀请一部分非党的革命左派列席。列席的人员可以不必固定。除有市委通知的事项以外，都不开秘密会。这样，既有利于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加强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又有利于群众对党组织的监督。

在运动中，学生离开党团组织另外自发建立起来的一些左派组织，多数的在运动初期超过积极作用，但是长期下去后果不好，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巩固党的绝对领导，应当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把他们的活动逐步统一到党团组织和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活动里来。经过运动考验，可以吸收他们当中优秀的革命分子为党、团员。

党和团的组织，都要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认真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学会走群众路线。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扬民主，放手民主，充分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充分吸取群众在这场革命中的新创造，来改进党和团的工作。绝不要再用过去那种不民主的旧框框、老习惯，来束缚群众。

六、自始至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照毛主席指示办事，是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是办好无产阶级教育的根本。文化大革命归结到一点，就是要使毛泽东思想在学校中扎下根子。

在文化大革命中，要把毛主席著作作为我们全部工作的最高指示。要用毛主席著作去发动群众，统一思想，扫除障碍，斗倒敌人。

在运动中，要使“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的口号深入人心。写大字报、开辩论会，分析问题，执行政策，都要用毛主席著作作武器。工作组要认真学习解放军的经验，象解放军那样领导群众天天学，事事用，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空气搞得浓浓的。

教育提高左派学生和团结教师的大多数，是目前需要狠抓的两个环节。现在左派学生的革命热情同党的政策要求有一定的距离，大多数教师的革命积极性还没有调动起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根本办法，是组织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目前，要根据毛主席著作和《人民日报》《红旗》的有关社论，大讲阶级斗争，大讲党的政策，大讲分清敌我，大讲团结多数，使革命师生既敢于革命，又善于革命，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我们拟在最近期间召开中学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大会。

七、工作队的革命化。

工作队要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第一位。要认真地研究党的指示，阅读报刊社论。工作越紧张，越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去改造自己，做好工作，这是工作队革命化的关键。

工作队员：庄工作中要立场坚定，作风民主，联系群众，实事求是。要认真地执行党的政策，如实地向上级反映情况，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力戒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工作队员都要做到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商量。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注意倾听不同的意见，用谦虚和平等的态度待人，不能主观武断，更不能违法乱纪。

在运动期间，工作队要采取适当方式进行若干次整训。对不合格、不称职的人员，应当进行必要的调整。

工作团和工作队领导小组的成员，都要认真蹲点，解剖麻雀，总结经验，以点带面。

57）在北京市大专学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9日）

同学们，同志们！

我同意邓小平同志、×××同志的讲话。

我也是在党中央工作的人员之一。党中央(包括我在内)热烈支持北京高等、中等学校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我们党中央的方针。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主要的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际中间来学会革命。我们当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也是这样，也是青年，学了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比你们现在所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少得多。比你们更加幼稚，更不晓得怎么革命，只晓得要革命。怎么办？就在革命斗争中去实践。在革命中间经过各种曲折，犯了一些错误又改正，再犯错误再改正，慢慢地学会了一些。各种情况都遇到了。我们过去所遇到的一些事情大概你们也会遇到，因为今后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是在一种新的条件下(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革命，要重新学习。不仅你们要重新学习，我们也要重新学习，都是在革命中间来学会革命的。

怎样革命，现在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更具体的方法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两个月，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又不上课，党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不上课于什么？干革命，专门干革命。在这半年中间你们可能取得很大的进步。我们也可以跟着你们学习一些。我相信广大革命的师生员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一定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在运动中间会遇到很多具体问题，就要向毛主席著作请教，革命中间老老实实学习毛主席著作，运用毛泽东思想，使你们在这次运动中间能够更多地学习、更多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使之成为你们斗争的武器。

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斗争目标是什么，刚才×××同志、邓小平同志已经讲了，一是斗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这只是一小撮。第二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第三进行教育改革，改革教育制度，改革教学方针、教学方法。这三件事我们都不熟悉，我们都不能做，完全依靠各学校革命的师生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来作，才能搞好。

过去曾经派工作组，刚才××同志、小平同志、××同志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个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如果多数同学让他们走，就走，如果多数同学不让他们走，还有意见，要提意见，要批评，你们就批评，批评够了，他们向你们作检讨，多数同学觉得他们可以走了，再走。有些人要抽出来工作，文化革命委员会根据多数同学的要求，要他回去，就回去。工作队员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你们学校里面作的，他们犯了错误或者作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面作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当然，各学校工作组的工作，不会是一样的，或不完全一样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刚才说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各工作组组员的工作，更不会完全一样。他们在运动中间的错误、缺点或成绩，由你们多数同学作结论。至于讲某个人的历史情况及其他情况，你们就不大清楚，总的结论你们也不能作，由其他机关去作。

现在，你们高等、中等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你们作主，你们是主人，如果工作组留在你们那里听取你们的意见，听取你们的批评。同时，学校的某些工作你们如果暂时不能接收，他们可以暂时维持一下，等选出你们多数同学相信的人，能够接收的时候接收。你们的选举完全由你们办，怎么选了当然要经过大家酝酿讨论，多次反复地酝酿成熟了，再选举出来。以后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由你们作主来进行。党中央的同志如果能够帮助你们的话，尽量帮助你们，支援你们。但是，我现在要讲一句老实话，包括我在内，我们现在只能向你们学习，只能听取你们的意见，不能提出什么意见来帮助你们，我们不了解情况。首先要向你们学习，学习一个时候，然后看出一些什么问题，有点什么经验，我们可以提一提。

现在你们的责任更重了，也只有你们能够把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如果把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对于全国有重大意义，对于将来有重大意义，对于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有重大意义。我愿意到你们哪一个学校或者哪几个学校去向你们学习，刚才×××同志要求你们给我们自由，我也有这个要求。如果你们给我这个自由，我愿意到学校里跟你们一道，听取你们的意见。但是，我不能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没有那个可能，因为我不了解你们学校的情况。

今天我可以向你们提一点建议，请你们考虑、斟酌，由你们决定。根据最近运动中的经验，我只是提一点建议。就是你们在运动中间要保护少数，保护那些意见不同、而占少数的人。因为相互间有各种问题要讨论，有的时候要辩论。对牛鬼蛇神用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的办法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在同学中间有不同的意见，也要贴大字报，也要放手发表意见，对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要发表意见，也要讨论。讨论起来就有辩论，刚才×××同志讲了，辩论会和斗争会很难分，不要把辩论会变成斗争会。同时，辩论中间发生不同的意见，发生各种事件也是完全可能的。你今天是多数，经过辩论之后，明天可能变成少数。你在这个问题上是多数，在另外的问题上你又是少数。不只是错误的意见是少数，有的时候正确的意见也可能是少数。我自己有这个亲身经验，有些意见我提得并不错，讲得并不错，结果是少数。毛主席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也有过这种情形。所以，保护少数这个问题是一个重要问题，不然，运动不能很正常的开展。

怎样保护少数？就是说对少数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或者做了错事的人，讲了错话的人，不要限制他们的自由。不要打他们，因为是多数，大家一打就不好了。不要轮流跟他辩论，使他不能休息，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他可以放弃自己的观点，也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即使是错误的也可以保留，正确的当然可以保留。不要强迫他改变自己的观点。他可以参加辩论会，可以不参加，可以退出会场，要让他走。因为他是少数，大家骂他，各种帽子都来了，讲话中间没有分寸的多了，有的站在桌子上讲，举起拳头讲，青年人嘛，这些事情我们都做过。这个时候他要溜，准许他走。暂时不愿意讲他的意见可以不讲。辩论会，不过是大会辩论、小会辩论，会内辩论、会外辩论；或者大会讨论，小会讨论，会内讨论，会外讨论。对学生和教员中的一般问题，尽可能开讨论会，不开辩论会。各种不同意见的产生是经常有的，有了不同意见就要进行讨论或辩论。所谓保护少数，主要是这几条。

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要保护少数人？保护少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好人，当然也可能保护少数坏人。少数的坏人贴反动的大字报，贴反动标语，发表反动言论，大家可以跟他辩论，也要保护一下。因为他是少数。他只写了几张大字报，只贴了几句标语，只讲了几句话，定他为反革命分子，定右派、定假左派，材料还不够，证据还不够，保护一下，保护一个时候，让他多讲一点，最后就可以作结论，不然，结论不好作嘛。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写了这么一个口号，叫做“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同学们就揍他。这是反动的标语，一揍他，那么多人揍，公安机关只好暂时拘留，这是一种保护性的拘留。如果你们暂时保护他的自由，让他活动，就放回来。让他多活动一点，多写一点反动标语，多发表一些反动言论，让大家都看一看，不妨大局嘛。可能保护少数的坏人，例如，保护几个月，以后再作结论。这个时候就有充足的证据，作结论就不会错，不会冤枉人。如果妨碍、影响全局，那就要大

家讨论或辩论，不影响全局的就暂时放任一下，但要提高警惕，让他去活动，在这中间发现他的反革命线索，有好处嘛。保护少数，主要是为了保护好人，同时也可能保护少数坏人，保护一下，保护一个短时候不要紧，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不会垮的，多数人不会听他的，能够识别的，能够知道什么是反革命，什么不是反革命。我到清华大学看过一次大字报，是晚上去的，看了三个钟头。有一张大字报写了前校党委保护一个学生薛×，那个人的思想很反动，大概还在学校，让他活动嘛，让他讲话，让他贴大字报。在运动中间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分子，写反动标语，进行反革命活动。总的来讲，不是坏事是好事，让他进行活动，暴露出来，只有杀人的、放火的、在食物和饮水里面下毒的人要抓起来，对群众有威胁的抓起来。除此以外不抓，让他活动，活动一个时候，当然不一定是几个月，不是一茬齐，最后作结论，最后定案。定了案以后，是反革命分子就向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许他乱说乱动。没有定案就不许他乱说乱动，最后作结论的时候，材料就不够，就不能定案。怎么样定案，要经过你们大家讨论，还应该有一定的手续。一般应该在运动后期来作结论，不论是对于黑帮、对于牛鬼蛇神，对于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假革命、假左派等等，一般都要到后期来作结论。在作结论以前，暂时保护一下，让他活动一个时候，我看没有坏处。我只提这么个建议，这个建议是否对，你们是否同意，请你们考虑，请你们去决定。

58）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几次讲话（1966年8月2、3、4日）

8月2日在辩论会上的讲话

同志们，同学们，我对这里情况不了解，因此没有发言权。但是，我是来了解你们情况的。今天会议准备的不够，有同志讲是搞突然袭击，匆忙开这个会。错误的话是我的，这是我的错误。昨晚工8点多才通知×××同志决定明天晚上来，但还不能定，直到今天下午五点才定下来。开这个会主要听听你们的意见，今天看来，同志们有不同意见，意见至少有两种。至少有两种不同意见，可能有三种不同意见。有没有第四种意见？有不同意见也好。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因此看来，主要精神不派好些，派工作组不对。工作组在你们学校哪些做对了，哪些做错了？你们清楚，我们还不清楚。有党中央、新市委的错误，谁的就谁负责。

我建议这个会今天就开到这里，这个会太大，听不太清楚。明天晚上有时间我还再来，找你们不同意见的人谈话，有两种不同意见，找两方谈，有三种意见就三方谈。请你们准备一下，看哪些人参加？人不要太多，太多了讲不清楚。我也要提些问题，看那些同志把你们意见讲完，看什么时候再开这个会？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吗，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同学们希望我们听你们不同意见，不论明天、后天，三、四次我都愿意。感谢同学们对我的信任，请同学们给我自由。今天见了的没见够再见见，不能围住我们。你们还有行动不自由的吗？有就不对了。请你们不同意见的人白天准备，明天晚上我来。不过我还要留个后路，明天晚上不行，就后天晚上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依靠你们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搞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学生是主人。工作组已撤销，停止职务，工作组不住在学校里面，有的听说还去活动。有没有？如有，就不对。你们叫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们就什么时候回来。工作组留下好了走好？是不是你们要留多少就留多少。同学叫工作组干什么，听你们意见，让他们听你们的批评，决不许他们发表议论、意见，对什么人也没有这个权力。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没做多少好事，现在让他们为你们服务，给你们扫地，给你们开饭、洗碗，给你们贴大字报，字写的好的，给你们写大字报，写的不好的不让他们写。工作组要不要住在你们宿舍？为同学服务是光荣的，别看参加体力劳动耻笑，这是资产阶级观点。工作组过去给你们做好事不够，现在给你们服服务吧，做做好事。工作组同志在不在？你们要不要这样办？你们要参加体力劳动，看你们能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会做就慢慢学。

今天开会就开到这里。明天找同学们代表谈话，一方面十几个，二十几个分几次谈，听听意见，有两方面，找两方面谈，三方面，找三方面谈，有四方面找四方面谈，找工作组谈谈。今天这个会就到这里。

8月3日对“八一团”代表的讲话

辩论看事实怎样，有人材料知道很多，他也不揭，他也不斗，他们的话是站不住的。他们抓人多，要抓根儿，谁冒点儿头，很短，一打就缩回去了。你等他完全露出来后，就好了。有些暴露得很多就好了，邓拓、吴晗回不去了，这就可打倒了！他不完全出来是打不倒的。有些人刚刚出来一点，就回去了。

工作组有什么错误，是什么错误？是什么性质？几点意见：

1．学校成分不好的不少，对这些人要采取正确政策，争取他们，争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是一

个很重要的政策。

2．对犯了错误的人应采取什么态度？他们可以改正错误，要给出路，给重新做人的出路。

马克思讲过，“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只有全人类的解放，无产阶级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全人类指无产阶级劳动者，还包括剥削阶级子女，还包括没有枪毙的，给他们饭吃，还种地或劳改，使思想变化，改造他们，劳动改造使他变化。对不枪毙的人，还算人。你要枪毙他，他就反；你就改造他们，他要不改造，就永远不能解放。这包括帝国主义，地主、坏分子、右派分子。地主阶级枪毙了一部分，现在还有他们的家属，他儿子的父亲杀了，他儿子有杀父之仇，他要报仇，就不能解放。解放全人类，包括那些不被枪毙的犯人。无产阶级还要镇压犯人，无产阶级不专政就不能解放自己，把所有犯人都枪毙，杀父之仇就更多了。

有些家庭出身不好，他们有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些人也可以不反，反的是一小撮。你们要团结，不管人家怎样跟踪你们，你骂我，我不骂你，你造谣，我有认识。团结多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有人“八一团”也不加入，“革命团”也不加入，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昨天不开大会不行，不开大会就围起来了。今天谈不完，明天还可以谈，摆事实，讲道理。

讲几点意见：

1. 有党员，有团员，党团支部，总支书记，总支委员，组织改选、改组。原支委，原支书，你们不喜欢，可以改选，如暂时成立不起来，可以成立临时的。你们可以罢官，选不出来，成立临时支委。

2．院党委要改组，开全院党员大会，能改选出来，就选出来，选不出来，暂时慢点。把旧的院党委、院团委罢了，选出临时的院党委，院团委，选不出来也不急，等广时再由你们选。院党委能改选就改选解决。

3. 以后支部开会不要秘密，还要非党员。党员开会不开秘密会，吸收非党员参加。预备党员可以做支部书记。非党员参加党的会议，由院文革委员会决定，一半一半，比如，两个党员吸收两个非党员参加。

你们议论怎么办？要争取多数，不要把党、团员搞成黑帮，搞成反党，他们多数是好的。

秘密会(指党员秘密会)由市委决定。

8月3日对“革命团”代表的讲话

我提个问题，党总支党支部是不是要联系群众，联系非党员非团员？

你们党员开会，可以让他们参加，总支委员也不开秘密会。团总支团支部、团委员会也让非团员参加，这样他们就放心了，文化大革命是大家的事，要一起商量。

你们“革命团”、党员多，他们“八一团”团员多，不要搞得党员、团员对立起来。

党的支部委员会是否改选一下，改选后你们不同意再罢掉吆！要罢官可以。选举时有赞成的有不赞成的，如果相持不下可找个临时召集人。非党员认为不好的人，你们让他当委员，结果全体党员丧失威信。选不出来，临时指定召集人，今天你召集，明天他召集，这样群众就不会有意见了。他们不满意的，我们自己去掉，他们就不会有意见了，首先是党和非党团结起来，团和非团员团结起来。

群众不满意一两个委员，党员会丧失威信。处分党员在最后吆！谁可以入党，运动以后看，最后决定。是不是？好不好？准备他们罢你们的官。说你们保皇，你们会保什么皇呢？保个总支书记、总支委员，怎么叫保皇呢？

校党委你们不信任他，你们就罢吆，统统罢掉。罢了好人呢？罢了再选嘛，信的再挑出来，信一个出来一个。你们不罢群众有意见，党就处于被动，你们这么一作就好了。

以后除了市委通知让党员开秘密会的可以开，市委没有通知就不开。(插：群众都来了该怎么办？)他们都来了，来多了不好，可以加倍，二十个党员再加二十人，他们可以轮着来，反正我们没有秘密，这样就不被动了，不会有意见了。

我到你们学院，你们只知道来个负责同志，你们不知道是谁，他们也不知道我来，我来了你们才知道，你们认识我嘛。这个问题不要争了，不要发生误会，这里没有问题，没有阴谋。

你们要求两个团合并，你们首先提出来好嘛！我们赞同。你们说×××不是左派，又不肯定她是右派，你们就团结嘛，她也是你们团结的对象。

他们写大字报你们可以反驳，也可以象你们说的不反驳，让他说够了，说够了他就不说了。×××是你们团结的对象，你们不让她写，禁止不了，她贴，我不贴，你们可以让她嘛，你们党员比他们要高点。

你们不满意××的话，××的话不完全符合事实，你们提出要罢官，这个要求有点大，他的错误就那么大。

×××她是不是左派，以后还得看，市委同志讲×××是左派，可能不对，运动中运动后，左派是有变化的，开始的左派中间可能就不是了，中间的左派，后期可能就不是了，这个运动中是左派，另一个运动可能就不是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左派到大风大浪里去锻炼。不够左派怎么办呢？努力吆，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一点上不是左派，另一点上可能是左派，市委同志讲了这话，你们不同意，再争就没味道了。你们不喜欢他(××)他就不来了，干脆换一个是吧。

讲错一句话可以吆，改嘛，我来了，没有做准备，又没拿讲稿，也能讲错一两句，你们可以批评吆。

你们说×××不是左派，又不是右派，我们可以团结，即使×××真是右派，你们也可以团结吆。一九五七年有些大右派现在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吆！右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搞专政。一九五七年右派，他们想改了，就摘掉帽子吆！是不是怕摘了，他又来了，那我就再戴嘛，抓起来容易，扣起来容易。

你们听了我讲过要保护少数。主要是保护好人，可能保护了坏人，保护一下吆，短时间，一个月，二个月，三个月一年也可以，材料够了，就做结论，做结果，有的就抓起来，大部分还是不逮捕。一般右派不抓，反革命分手定了再抓，你们监督改造他，一般右派不抓，让他吃完饭做事，他还要讲话，让他讲嘛，他讲话也没有人听，有人听也不要紧，怕什么呢？

所以，抓起来容易，扣帽子容易，改造他难。党员，党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团结一切可能争取团结的人，除开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外。有些犯了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让他改造吆，你说不准吆？有的改得不好，有的改得很少，再看看吆。马克思讲过一句话：“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自己。”全人类不能解放，自己就不能解放，全人类是谁呢？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吆！地、富、反、坏、右算不算人呢？(插：算人，不算人民)，算人类呀！不是动物。地、富、反革命、资本家、坏分子，抓起来也得改造呀！你们把他们改造好了，自己才能获得解放。枪毙了，还有子

女啊！他们的儿女要报仇呀，有杀父之仇，儿子报不了孙子还得报，过去不是枪毙了一批吗？他们的子女还在呀，生活得还好嘛！就所谓的资产阶级权威，生活的还比我们好。改造就改造这些人，变坏人为好人，也还是个长期的任务，这是国内的任务，国外也是。这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改造一切坏人，改造一切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枪毙一个人容易，可是他们还有子女，子女还不高兴呀！你们学校有出身不好的，有地主的，资本家的，党的干部不好的，他们的子女，不能歧视他们，对他们的反动言论提高警惕，要提高警惕，不要歧视他们，他们有反感。今天只能提这么一个问题，以后的任务就由你们了，办好，办不好，要靠你们了，能团结好，团结不好，看你们了。不团结她，她就请示建材部、市委、中央。

资产阶级权威许你们批，加上比较多的教员，斗批改全靠你们。你们可能犯些错误，青年人不犯错误怎么能行呢？青年人犯些错误怕什么！你们有错误改就行了。有人间我们有什么经验，错了改就是经验。你们会想出办法的，需要党中央、市委帮助，就帮助一下，帮助不了你们自己搞，会想出办法的。

当然了，斗争资产阶级当权派也好，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也好，教改也好，都要有准备，但也不是什么都准备好了再干，一边斗争一边准备，准备好了再斗，斗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慢慢就行了。开始不行慢慢就好了，批也是一样，一开始不行，慢慢就好了。教改呢？他们看的书那么多，你们把书分下来，大家看大家批，教改也是边改边学习。不要打无准备之仗，但是什么事也不一定要准备好了再干，斗争中学会斗争。

这是你们：大家都知道的，我讲这么几点，我是不是讲错了，讲错可以批评，不要是我讲的，就不能批评，允许人讲错话，特别你们青年同学，不仅你们青年同学，我们也可能，有些话改来改去，改了几十年了还有问题，基本上对，大方向对就行了，好了吧1

8月4日对工作组的讲话

你们犯了错误，是什么性质，主要讲思想，你们理解到什么程度？我问了他们(指“八一团”代表)，××、×××他们说你们是方向问题，立场问题的错误。你们考虑光说方向、立场问题够不够？中央现在还有人在考虑有没有路线问题。过去你们对×××、××不好，抓了“游鱼”，你们走不了，我去也没有办法。

你们这样检查是过不了关的。现在的问题错误要讲够，×××准你们出来，你们得走掉。

要认错，不得再推了。抓了多少条“游鱼”？

革别人的命行，自己革命就不行呀！“六.一五”事件，抓“游鱼”，改组三个班，只能否定，不能肯定等等。你们是听了党员、党组织的话嘛！这些人的话听不得嘛！问题就在这个地方。你们还是依靠党组织系统搞，你们可以改组吗，如改组也选不出来，临时召集嘛。

将来要开大会，你们要检查，市委要替你们担责任，中央也要替市委担责任，你们不要往上推了。

活动不能怪你们，问题是有一批人拥护你，另有一批人不拥护你，还是走开好，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是运动的方向是对的，还是错的？是个别的错误，具体工作的错误，还是方向错了？是站在运动前边？是站在旁边？是站在对面反对群众？开始校党委站在运动的对立面，反对群众运动。北大大字报公布了，害怕了。怕的结果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反对。指手划脚，基本上是站在对立面反对运动。校党委垮了工作组掌权，你们是支援运动的能不能给群众一些帮助？不给帮助跟着干也行嘛！你们不是的。你们成了新的统治者，站在当权派的地位，怕把运动搞坏，就怕运动不按你们的想法搞。你做主人还是群众，是赞成是帮助。工作组当权不是采取支持的态度，还是有点架子。现在学生比你们聪明，办法多，又是

多数，像你们这样有点当官做老爷，你们有架子，就是我领导你们，照我的办，不照办就是“游鱼”啦！干扰啦！开始时市委、国务院也规定了内外有别等办法，现在看也不行，如不上街游行，大字报不上街等给你们一些不好的影响。现在看来不派工作组好一些，这些中央负责，没有快撤，最后才定。工作组有时阻碍群众，甚至是镇压群众运动，学生是搞当权派，批判教育改革，你们不会做，我们不会做。工作组没有必要，看来工作组站在群众方面，帮助的很少，个别有作得好的。一般是反对群众运动的。不让学生闹事，那么，学生不上课放假作什么？一般工作组都是想按我们的办，不是跟群众闹，鼓励群众闹。特别是怕反革命，怕反革命闹事，怕反革命上台，公安局也不要怕，看看反革命上台也好吗！反革命上台有什么不好？他们在前市委、中央军委上台了吆？反革命上了台有好处，给彭真上台这么多年也没有什么吗！用两年也就解决了。让反革命搞几天不好么？如果反革命闹事上台，而且群众拥护他，而且不用很久群众就会看出来，暂时群众分裂几天也不怕。如果反革命冒头，你就打回去，蛇一露头，你就打，结果一个也抓不住了。蛇出洞了就好打了。不要一出头就压下去。

最近主席讲。“造反有理”，原来统治者造反没理，有些人造别人的反有理，一上台，人家造他的反就没理了。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是马列主义的，造共产党的反就没理了。如果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那就要造反嘛！现在学校及文教机关阵地是在资产阶级手里，在那里党没有领导权，即使党委领导，他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根本的问题是反对别人可以，反对我则不行。人家造我的反，我们不让人家反，怕大民主。我(指工作组)有错可以揭，你开除我的党籍，撤我的职，赞成他引导好他，可以不造反，因此引火烧身，炮打司令部是正确的。如果是好人，反错了，还是好人。如果不让人家造反，非把你反掉不可，工作组不让人家造反嘛！不能反、不能赶，部长、校长，书记都有这个问题。不怕就好，越怕越怕，结果做的坏事就越多。你们不做事倒好一些，两个月倒可以学点东西，你工作越积极错误越大。还有一个怕反革命上台，两个人闹就是反革命来了，不是反革命也成了反革命，把×××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嘛，对反动学生批判嘛。要让他们活动，直到夺取领导权，让他们统治一个时期整了共产党员就暴露了。怕大民主，怕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秩序，革命群众运动的秩序不是以我们主观的框框为主的，群众起来要建立他们的秩序。×批评你们，我问过×××、××他们说你们是方向问题，立场问题。是不是呢？是的！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怕破坏资产阶级的秩序，修正主义的秩序，陆平，原市委不是么！工作组的秩序也是那一套，不比他们好，和他们差不多，凡破坏(秩序)的，你们就阻碍，以至于镇压，你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感情，对维护你们秩序的很感兴趣，有的学生党员说你们的方向对，你们的立场思想感情和“革命团”一样，他们的思想感情，立场和过去党委、总支的立场感情一样的。我们告诉党员学生主动团结这一派(“八一团”)，彻底改选，选不出来搞临时总支，不开秘密会。总支委员会通通滚开，就是这些人影响你们吗！虽然他们一千多人(指当时“革命团”)一冲就垮，群众和党员一齐开会，没有秘密会，否则群众斗他们、怀疑他们(党员、干部)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可以造反了，也可以造自己的反，造新市委的反了。修正主义还统治了中央办公厅，真反革命用反革命口号、用右派口号不可能，他们用的左的口号、左的面的，出现这样(情况)很难识别，不让他们统治一个时期很难识别。现在×以左的面目出现。×、×被整，党员感情流露怕整自己，我说你们自己罢官好不好？市委说×是左派，你们说是右派，我问过“革命团”×是左派？他们说不是，右派也不是，至少是个中间派嘛！应团结她嘛！发动党员、团员是对的，发动起来要革命，破坏原来的旧秩序。不这样恐怕党员将来有当保皇派的，党员多数是好的，搞好可能还是党团员当领袖，“革命团”不对，“革命团”以后在斗批改时还可能是主要力量。也有可能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这个人到底是好还是坏，很难说，如果是右派上台更凶。

×××是站在运动前边，她要闹事，你不让她闹，闹事不怕，可以讨论是文斗还是武斗，由群众决定，你(指工作组)十五日上午讲话是鼓励他们的，下午讲话就不好，这个问题应在群众中讨论，主张武斗的人在大会上让他讲话，他的面孔不就暴露了嘛！要把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风格打倒，不能靠打，要批透。农民是斗了地主的，青年感情这是好现象，他赞成戴高帽子，打一打他们威风也好吗！你们的感情不对头呀！你们有的领导同志是地主出身，你们也有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可能是自觉不自觉作

的，我们许多同志过不了这个关。这次文化大革命要触及灵魂。历代统治者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从北洋军阀到蒋介石。我们共产党人也不知不觉地镇压了学生运动，我们这样做，肯定要失败的。

群众讨论你们的检查过不去嘛！迫害事实客观就是镇压群众运动，你们对×××和×××的感情不对，你们思想就是有个立场问题，就是怕大民主。主席讲话没有大民王，党就会变成法西斯党，迟早要霸王别姬。在大民主面前你们害怕，实际是你们没有民主集中制，只有集中没有民主，你们勒令停止选举，采取指定的办法，实际是法西斯的统治，民主集中制，我看毛主席号召群众起来，就可以实行民主集中制，怕民主的必垮台，没有这样的群众运动，这样的民主制度就搞不好。你对×××同志的态度不好，就是他的年纪轻，资格没有你老，你敢和他顶，我的资格比你老你不敢和我顶，×××同志说你几句就不行吗？你有架子，不是采取小学生的态度，这是不行的，必垮台不可，你也是解放军，你的作风不好，我讲的是根本问题，你不通，也是检讨不好的，要当勤务员，鲁迅说：“横眉冶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她们就是孺子吗，你要当她们的牛。如果通了，你就准备一个检讨，×××帮助一下，起一个草稿，让×××看一下，我也准备讲几句话，你的检讨不好，我也不好讲话了，大会只能再来一次。

59） 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1966年10月23日）

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了许多工作组，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支援新市委一些工作人员作为工作组的成员。当时，中央各部委、共青团中央都很积极，抽出了大批干部，并由全国各地抽调来一些干部，作为工作组成员由新市委介绍到各学校。此外，中央某些部委还向一些机关派了工作组。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在这些文件中也有一些错误，也发生了一些不好影响。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解放北京市大多数党团员和一般干部，只要他们认真检查在前市委反党修正主义影响下所犯的那些错误，并加以改正，就可以既往不咎，就可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错的，但是同意了新市委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意见。工作组撤退时，把职权交给了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临时筹委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多数是工作组指定或者变相指定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受工作组的影响较多，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北京市许多中学的文化革命，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上述的错误，此外，还批准了共青团中央报送的“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规划”。在这个规划中规定，对多数中学的教职员实行集训，使初中一二年级的

学生放假，或到工厂、农村劳动，并对一部分中学生实行军训。

现在看来，对学校和机关的文化革命，是不应当派工作组的。当时群众纷纷要求党中央和新市委派工作组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去领导他们进行文化大革命，许多方面也要求派工作组，特别在报纸上发表了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以后，这种派工作组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当时，我们没有就是否应当派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就工作组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进行过讨论。各工作组是匆促地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应当说，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起来了，我们只有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并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向革命的群众学习，听取群众中的各种不同意见，然后才有可能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某些政策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对于这一个新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我自己和许多同志都不理解，都没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在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学习，不应当派工作组去代行党委职权，也就是不应当从外面派人到那里去包办代替，去建立“领导”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机构。如果群众一定要求我们派人去，我们也可以派少数联络员去了解那里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接收并保存原党委的所有资料和某些行政工作。对于群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则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虽然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但当时最多也只能这样处理。

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致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作。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一般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来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这一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旧政协会议开过会，我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将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对于当时时局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有和平幻想。虽然，在这个指示上同时提出练兵、减租，生产三项中心工作，是不错的。此外，一九四六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是有错误的，当时对林彪同志的支持是不够的。一九四七年夏，我主持的上地会议，没有系统地全面地解决当时分配地主土地问题，没有能够纠正当时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如杀人过多，侵犯一些中

农的利益等。一九四九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许多话，纠正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某些过份性急的情绪和作法，同时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但是，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没有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一年七月，我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件。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同志砍掉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过的，没有遭到反驳，事实上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在一九六二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一九六四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

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都肯定一九五八年实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以来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下，不论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更严重的错误，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一九六二年的国家预算，……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认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同志在二月二十六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讲话。××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根据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加以发挥的。中央在三月十八日批发了××同志的讲话给各省、市、区党委，要各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当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在许多地方把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大量削减基本建设投资，对于许多已经开工的工程项目大之二气，以至有些必须继续建设的工程项目，例如×××建设的某些重大项目，也错误地下马了，而某些应该削减的投资，又没有削减。

由于我当时过份信任××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同志作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此时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到毛主席那里汇报了北京讨论的一些情况，并把已经拟好的中央批发××同志的讲话的文件送请毛主席批发。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成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作法的。

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处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还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拟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见。这些都是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之后，而提出的直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但是我已经感到紧张，感到形势严重，因而急于请求毛主席回北京来。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人大会到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以前，我在这段时间内所犯的这些错误，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从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就着手起草“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以后又起草“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毛主席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形势、矛盾、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讨论，九月又召开了十中全会，通过了上述两个决定，并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中全会公报。这样，才把我这一次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当时的局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

我在一九六二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之后，在一九六四年又犯了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领导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个十条)之后，九月中央的某些同志又拟出了“第二个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于十一月十四日发出。这“第二个十条”是怎样拟出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第一个十条”出来后走了七个省，回来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第二个十条”是基本上根据彭真在这个报告中的思想拟出来的。一九六四年夏我觉得“第二个十条”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放手发动群众，所以作了一些修改，在九月十八日发出修正草案。

一九六四年夏，我到河北、华东几个省市，中南各省和云南都讲过话，在北京也讲过话，在这些讲话中，我强调了要各级领导同志到农村去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本来是对的。但是强调得过份，有些绝对化，这就是错误的。此外，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在这时以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的甚至是失败的。对当时各地方许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过份，对干部中犯四不清错误的严重性也估计过份，因而对于当时工农业生产形势好转的原因的某些解释也是错误的。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应当在蹲点、发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摸清情况，才能把情况调查清楚，认为照毛主席以前所说的开调查会的办法不够了，有的时候又说不完全适用了。这在事实上就否认了毛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十分错误的，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在这段时期中，我过份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让她在几个地方作了介绍，并且向北京的同志推荐听听她的介绍，后来又把她的讲话记录批发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其实，桃园蹲点工作队的做法，在当时就是有一些错误的。

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时，我的上述错误并没有改正。我在这次会议上说过，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又说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条上所说的，这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今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同毛主席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我正是在这种时候，忘记了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因而不能不走到邪路上去。这就暴露了我一九六四年所犯的错误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我的这次错误，也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二十三条”之后，才纠正的。“二十三条”上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打击对象缩小到极少数人身上。

由于我在过去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犯了右倾错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犯了更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又是从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由毛主席亲自纠正的。毛主席同中央其他同志讨论盾，在七月二十四日决定撤退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工作组。随后，召集了有各地方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八月一日召开党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公报，在全会后期，讨论了关于我的错误问题，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新的选举，全会一致决定：由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一些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对全党全国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世界革命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党内其他许多同志也远比我高明。我对十一中全

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严格遵守，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面前搞两面派。

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原因是；

一、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完全达到十六条决定上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就必须认真走群众路线，广泛和深入地发动群众，提倡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而当时我们的作法实际是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迷信工作组的作用，派工作组去包办代替群众的革命行动，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台。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把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和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看成是“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势必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路线。

三、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还存在着许多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而在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时候，就常常站不稳立场，有的时候就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在工作中又表现有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态度。

四、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能在工作和斗争中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没有到实践中去向群众学习，向毛主席请示和报告又不够，有的时候就在实际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对一些同志提出的正确的意见没有接受，相反，听取了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这是我现在对于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解当然还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去理解它。我决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林彪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样，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力求在今后为党为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这是我的检讨。请同志们批评，给我以帮助，并且清除我所犯的路线错误的影响。

60） 向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检查（1967年4月14日）

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

你们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给我的紧急通令中第二条限刘少奇于四月十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1．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庆施同志说，可以让狱中的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并接到由张闻天签字的狱中干部提出的三个请求条件。狱中同志看了，知道这是中央同意这样办的。我将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去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又名洛甫)处理，据张闻天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只知道狱中的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多少人。以后如何办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同志家里见过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看到造反报才知道他们登了反共启事。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2．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旧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一月十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二月一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内部指示。这个指示是有错误的。

3．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以后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的文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4．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着我国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的这些说法，毛主席当时就表示反对，但已来不及修改，就这样通过了。至今未改。此外，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错误的。是从七大的立场上退了一步。

5．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说安徽实行的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乱讲。“三和一少”是个别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中央会议上来，当时我尚不知有此种意见出笼。是后来从那个同志的保险柜中拿出来的。

6．一九六二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过，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7．一九六四年夏，我在几个省市作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我的检查中已作了详细说明，不必重复。桃园经验在当时是比较好，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8．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定我要读的其(他)(着)作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去加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

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刘少奇(签字)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

上一页 目录 下一页

61）向北京建筑工业学院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1967年7月9日）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全体革命师生员工们：

七月四日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同志通知我说，党中央的意见，要我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写一个检查。现将检查如下：

（一）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和各地来到北京的所有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便取得感性知识。我就是在毛主席的这个号召下，在去年八月一日到×××同志处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我到哪个学校去？经过研究后，一致确定，我到建筑工业学院去。×××同志也决定一同去。由于建筑材料工业部是归口国家建委领导的，所以××同志也到你们学院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通知中央文革派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派了×××同志来参加。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没有要创造什么经验，向全国推广的意思。

八月二日晚，我到你们学院参加你们的大会，上述各同志都未了。此外还有刘澜涛及其他外地来北京的同志也有几位来了，他们是临时决定来参加的，我事先不知道。

参加你们八月二日的大会，主要是听取你们中一些不同的意见。最后，我讲了几句话。

八月三日晚，我和×××、××、×××同志等再次到你们学院，先找“八一团”的代表谈话，后找“革命团”的代表谈话。主要也是听取意见。最后，我分别向“八一团”和“革命团”的代表谈了我的几点意见。

八月四日晚，我在中南海找工作组负责同志谈话，主要是问了一些情况，最后我也说了一些话。

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时候，我已感到我再不能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当天下午我用电话告诉×××同志说，我以后不再去建工学院，也不再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八月五日×××同志的讲话，以后吴兴峰在建工学院的活动，我都不知道。八月五日以后，建工学院有几位同学给我来过信，并接到过几份简报，但是，我都没有答复。有的交给了×××同志，有的处理了。

以上就是我参加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简单经过。

（二）

在去年（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经毛主席批准在全国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以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可是在去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却发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和一些机关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

制定出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内外有别，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给各地党委，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在建筑工业学院这种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就变成所谓“抓游鱼”的斗争，虽然我在事先完全不知道，在中央会议上也没有听到过有“抓游鱼”这回事。由于这种斗争，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它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抑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游鱼”等。这样，就在一段时间内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一般还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意见，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极少数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的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让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不知道这种局面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确实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有的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我的这种错误，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也违背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三）

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由于我在去年八月五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所以我到建工学院几次讲话中，都没有主动地承担责任，没有正式地站出来向建工学院全体师生爽快地宣布，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以便减轻当时在京的中央其它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建筑材料工业部

和工作组的责任。当时，我只是笼统地说，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的责任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来负担，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所犯的错误，你们清楚，你们可以讨论，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错误，你们也可以讨论，谁的错误谁负责。在这里，没有说明，我自己应负主要责任，它没有说明，当时的党中央是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这样，就模糊了当时所犯错误谁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当时我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我参加你们八月二日的全院辩论大会，听了两种不同意见的辩论，此外，同学们还给我递条子，提出来第三种不同意见。这些不同意见虽然包括一些原则问题、方向问题在内，但是我认为基本上还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问题，应该经过正常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就可以团结起来。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依靠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搞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以学生为主来搞。我认为这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基础上的团结，恰恰是当时所需要的，不能说这样的团结是“合二而一”的。当然在这里我应检讨，我当时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说的有些不够完全，不够确切的地方。

经过去年八月二日和八月三日听取各方面意见的结果，又在八月四日听了工作组领导同志的谈话，在我的脑子中已逐渐地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八一战斗团”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是坚决反对原来的院党委和工作组的错误领导的，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而“革命团”虽然也说院党委和工作组领导有缺点有错误，但他们由于受了蒙蔽，基本上是保院党委、保工作组的。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不是指向院党委和工作组，而是主要指向“八一团”。因此，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不正确的。我的这种看法，同北京新市委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我没有来得及向建工学院的师生员工们宣布我的这种看法，只是在八月四日找工作组同志谈话时，略微地透露这个意思，但也是很不全面的。

此外，我在同各方面接触中还发现建工学院的党团组织还是原班人马地在进行活动，既没有经过改选，也没有停止活动，因此，党团组织的活动常常是维持旧秩序，反对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造反行动的。因此，我曾建议改选党团组织，如果一时选不出来，就推选临时召集人。党团员一般不开秘密会，开会时要找一倍非党团员参加。我这个建议的目的，是想使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致受原来党团组织的操纵，阻碍运动的发展。至于我这个建议是否在以后付之实行，在以后的实行过程中，是否使建工学院的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在以后因为实行我这个建议，而使建工学院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的话，那就应该由我来负担主要责任。

我在几次谈话中，还谈到以下一些问题：

一、有人起来闹事，起来向我们党委和工作组造反，不要害怕，而要支持他们起来闹事，起来造反。即使有少数坏人参加，也不要怕。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好人，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如果害怕人家起来闹事，不让人家起来造我们的反，那就一定要犯方向性的错误。但是我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话讲得过多了，以至说过“不要怕坏人上台，坏人上台一个时候有好处。蛇完全出了洞，才能打着”。这些话是错误的，应加以批驳。

二、在几次讲话中，我都强调了要团结多数，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没有说明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没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条件，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都是实现不了的，即使实现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三、在几次谈话中，我都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他自己。”在解释全人类包括一些什么人时，首先我指出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学生、知识分

子，这是人类的绝大多数，但也包括那些还没有处死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及已经处死者的家属子女等，都要改造他的。而要改造这些人需要做很多工作。因此，在讲到改造这些剥削阶级的残余时，讲得过多了，过重了。这就引起人们有本末倒置之感，这也是错误的。

对于我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所犯错误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对于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错误指导思想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对于我的其他言论和行动，凡不符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也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并给予彻底的批判。

最后，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了的革命师生员工赔礼道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受错误路线蒙蔽而犯了不同程度错误的革命师生员工和广大工作组员，他们责任甚小，主要责任在我，他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我也要向他们赔礼道歉！

希望同志们在对我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刘少奇(签名)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

上一页 目录

突破网络封锁

目前国内有关部门机构对一些国外的政治性网站进行封锁，网友使用正常的方法无法浏览这些网站。突破网络封锁的方法很多，比如使用代理服务器，使用突破软件，或者使用在线代理。此处向大家介绍后两种方法：使用软件突破网络封锁，使用在线代理网址突破网络封锁。

一、使用软件突破网络封锁

目前有两种比较好的突破软件：无界浏览和自由之门。

1.1 无界浏览的使用方法：

第一步：下载一个无界浏览软件。点击下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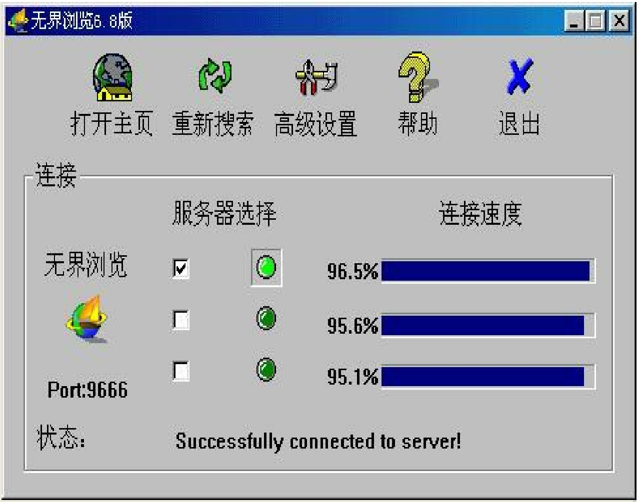
如果本电子书的压缩文件中包含这个文件，可以使用该文件。

第二步：双击u.exe，启动软件。界面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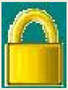


选择“确定”按钮，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软件开始自动搜索代理服务器。如果搜寻代理服务器成功，界面类似下图：



窗口上还显示一个锁头形式的图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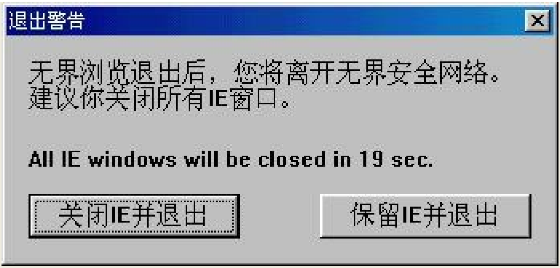


现在可以浏览被封锁的网站了。启动IE浏览器，输入网址，即可访问相应的网站。尝试访问下面两个被封锁的左派网站：

人民春秋：http://www.maostudy.org

中国与世界：http://www.zgysj.com

如果不想使用无界浏览，在锁头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上选“退出”。软件将显示下面的窗口：



点击“关闭IE并退出”或“保留IE并退出”，退出无界浏览。如果保留IE退出，您可以继续浏览其它网站。

如果计算机非正常关机或其它原因导致浏览器无法正常浏览网页（不使用无界浏览时），请按照以下方法恢复浏览器设置：

1。启动一个浏览器。选“工具/Internet选项”，显示一个弹出窗口——Internet选项窗口。在窗口上方点击“连接”。

2。点击“局域网设置(L)...”按钮。弹出一个局域网设置窗口。取消“为LAN使用代理服务器”复选框前的选择标志（√）。

3。点击确定，回到“Internet选项”窗口，再点击“确定”按钮，关闭“Internet选项”窗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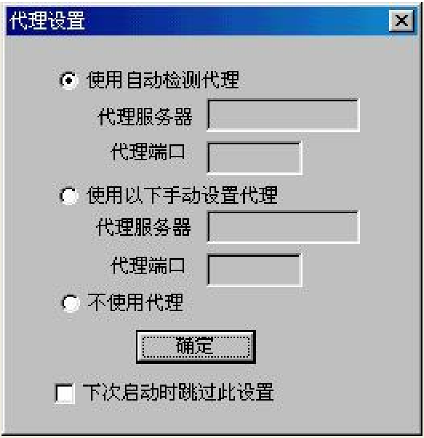
请注意：无界浏览只能自动识别微软公司的IE浏览器。如果您使用其它的浏览器（如Opera），请启动“无界浏览”软件之后。将浏览器的代理服务器设置为“127.0.0.1”，端口为“7865”。

1.2 自由之门的使用方法：

第一步：下载一个“自由之门”软件。点击下载。

如果本电子书的压缩文件中包含这个文件，可以使用该文件。

第二步：双击freegate.exe，启动软件。界面如下：



选择“确定”，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软件开始自动搜索代理服务器。如果搜寻代理服务器成功，界面类似下图：



点击窗口上方的“代理”，然后点击“设置自由门代理”按钮，窗口变成下面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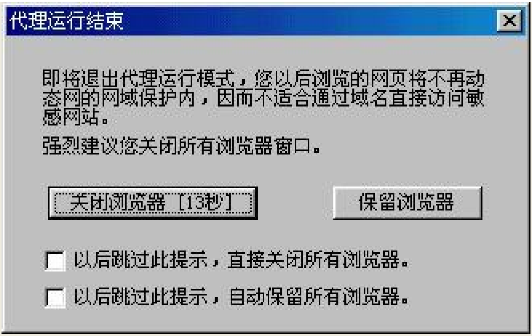
操作系统右下角的托盘处将显示一个图标。

现在可以浏览被封锁的网站了。启动IE浏览器，输入网址，即可访问相应的网站。尝试访问下面两个被封锁的左派网站：

人民春秋：http://www.maostudy.org

中国与世界：http://www.zgysj.com

如果不想使用“自由之门”，在托盘的图标上点击鼠标右键，在弹出菜单上选“退出”。软件将显示下面的窗口：



点击“关闭浏览器”或“保留浏览器”，退出自由之门。如果保留浏览器退出，您可以继续浏览其它网站。

如果计算机非正常关机或其它原因导致浏览器无法正常浏览网页（不使用“自由之门”时），请按照以下方法恢复浏览器设置：

1。启动一个浏览器。选“工具/Internet选项”，显示一个弹出窗口——Internet选项窗口。在窗口上方点击“连接”。

2。点击“局域网设置(L)...”按钮。弹出一个局域网设置窗口。取消“为LAN使用代理服务器”复选框前的选择标志（√）。

3。点击确定，回到“Internet选项”窗口，再点击“确定”按钮，关闭“Internet选项”窗口。

请注意：自由之门只能自动识别微软公司的IE浏览器。如果您使用其它的浏览器（如Opera），请启动“自由之门”软件之后。将浏览器的代理服务器设置为“127.0.0.1”，端口为“8567”。

无界浏览和自由之门软件都是Flg组织编写的软件。本人强烈谴责Flg的反动立场。

二、使用在线代理网址突破网络封锁

在Internet上有一类特殊的网站：在线代理网站。可以通过这些网站访问国内被屏蔽的网站。

2.1 使用在线代理

下面以http://www.daydream.com.ru为例介绍在线代理的使用方法。其它的代理网站用法类似。

第一步：启动IE浏览器。在浏览器中输入代理网站的地址http://www.daydream.com.ru，回车，进入该网站。界面如下：


PHProxy - 在线代理 -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文件(F) 编辑(E) 查看(V) 收藏(A) 工具(T) 帮助(H)
后退 搜索 收藏夹 媒体
地址(D) http://www.daydream.com.ru
转到 链接
ASP.NET Grid and Editors
Incredible freedom client-side data driven for ASP.NET
HTTP(s) and HTML Viewer
Award Winning Internet Explorer Plug-In to View HTTP and HTML
Browser Based HTML Editor
Advanced wysiwyg editor. Javascript based. Server independent. Demo.
Free Coding Guidelines
Get coding guidelines for C#, asp.net, javascript, VB etc.
Реклама от Goooooogle
Рекламируйте на этом сайте
PHProxy
URL表单 | 管理Cookies
URL
包含代理表单
在每个网页的上面包含代理表单以便修改
移除脚本
移除客户端脚本文件(i.e. Javascript)
允许Cookies
接受 HTTP cookies
显示图片
显示图片
显示提交
在网页上显示相关提交所作出的更改
Rotate13编码
在URL上使用rotate13编码
64位编码
在URL上使用64位的编码
隐藏Meta标签
隐藏网页Meta标签
隐藏标题
隐藏网站标题
会话Cookies
只存储这个对话的Cookies
新窗口
打开一个新的网页窗口
浏览
Internet

第二步：在“URL”后的输入框内输入要到达的目标网址（比如http://www.zgysj.com/），回车。

如果一切正常，将进入目标网址。

2.2 常用在线代理网址

http://www.daydream.com.ru
http://www.cnproxy.com/webproxy.asp
http://www.proxy1.be/

下面的网页中收集了一些在线代理地址：
http://emuch.net/html/200601/165098.html

2.3 在网上搜索在线代理

在线代理网址可能会失效（例如，被封锁），这时就需要寻找新的代理网址。可以使用Baidu、Google等搜索引擎查找新的代理网址。

- 如果想自己找在线代理，可以搜索“在线代理”或“online web proxy”
- 如果要英文的在线代理，可以用goole搜“online web proxy”

泛左翼网站

说明：标记为红色的网站建议使用代理软件或代理服务器上网（可能被封）

中国与世界：https://66.189.137.213/dmi

中国与世界：http://www.zgysj.com

中国与世界镜像地址：http://zgysj.zj88.

中国与世界镜像地址２：http://zgysj.1a.

人民春秋：http://www.maostudy.org/

中国文革研究网：http://www.wengewang.o

华岳论坛： http://washeng.net/

华岳论坛：http://69.41.162.74/HuaShan/

社会主义新农村：http://www.xncxnc.com
共产党人：http://www.gcdr.com.cn (被关

中国工人网：http://61.222.52.198/user/zggr/

乌有之乡：http://www.wyzxsx.com

历史文献下载：http://www.lswx.org/doc

河南省漯河第五高级中学图书馆（含马列全
http://www.yceg.net/tsyl.asp

主人公网：https://host378.ipowerweb.co

主人公论坛：https://host378.ipowerweb.com/~gon

主人公论坛资料区：https://host378.ipowerweb.com/~gon

主人公网资料下载区：https://host378.ipowerweb.com/~gon

天涯若比邻：**http://closerworld.org/phpBB**

海派经济学：http://hp.shufe.edu.cn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http://www.c

人本经济学：http://www.economics.com.c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http://www.cwebdiy.c

中国农民工：http://cnmg.cc333.com/

劳工开物：http://www.lgkw.net/

中国韶山网：http://www.china-shaoshan.

毛泽东学书

院：http://www.blogcn.com/user44/maosh
毛泽东思想：http://www.mzdthought.com/
东方红文化书屋：http://www.dfhsw.com/m
延安圣地网：http://www.shengdi.net/
南街村：http://www.nanjiecun.cn/
江苏爱国网：http://www.jsag.com.cn/

世界工人论坛：http://goin.to/workersbb

当代国际共运：http://communistwin.goin

荷兰星火网：http://www.red-sparks.com/

先驱社劳动民主网：http://www.xinmiao.h

毛泽东旗帜网：http://www.maoflag.net/d

毛泽东博览：http://maobo.7x.com.cn/

实践共产主义：http://www.sjgczy.com/in
革命马克思主义：http://marxism.home.su
共产主义网：http://www.communism.ik8.c
十月：http://red10.getbbs.com/
理想2005：http://www.lixiang2005.com/

今朝风流：http://www.zuopai.com/

巍巍昆仑：http://www.weiweikl.com

炎黄神圣网：http://www.yhss.cn/

大中华强国网：http://www.great-china.o

左岸文化：http://www.eduww.com/

向日葵文艺：http://www.xrkxrk.com

左岸：http://www.eduww.com/
李理主页：http://lmh.blogdriver.com/lm
民族产业网：http://www.mzcy.cn/

毛泽东论坛：http://www.mzdbbs.net/ www
照”）

左翼文库网：http://www.atgig.com/ezln/

中国国际关系研究：http://www.sinoir.com/In
国际关系研究：http://www.internationalrelati

英文独立媒体列表： http://www.atgig.co

李宪源博客 http://blog.chinesenewsnet.

中国历史文献网资料区|新左联：人民资料馆
学者之家|律师的广阔天地：老电影|孔夫子旧
旧 | 红军革命歌曲|中国革命历史文献资料|向
料区|抗美援朝影视资料网站|1949－1997年人
资料馆|从马克思到毛泽东：资料网(英文)|毛
耀中国：斯诺文集|华夏徽章网|毛泽东著作资

人民间|左翼论坛|国际边缘|环球视野|中国第一
联盟 |李·沃内斯特主页 | 评读鲁迅网|春秋乱
（台）|第九世界|杭州志愿者服务网|张承志博
的博客|批判与再造|华西村|打工随想文学网 |
益社区：马克思主义研究 | 中国社会主义新
国军事纵横|google毛泽东贴吧|时代朝鲜网|李
论坛 |百度贴吧：主人公吧|红色论坛 | 华沙
虎网|中国韶山blog|为人民服务|贵州兰花山互

|赫伯特·马尔库塞英文网 |马克思主义文库(中
网(英) |毛泽东著作(英文) |新左派评论(英国)
世界(英文)| 大同之梦网(加拿大) |真相网(英语

哥广州网 |政治活动分子信息交流网(英文) | 第
外交论衡月刊中文版| 伊拉克、阿富汗抵抗力
召唤——美国抗伊援伊死难人员滚动播报之
界体系理论中心|世界人民抵抗运动(英)|齐奥

军事天地 |苏联主义网|文化公社|世纪学堂|民
网|今朝风流| 中华复兴论坛 | 爱国者同 盟 网 |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网| 中华主擂台|左派时评
琪的文字乌托邦（马来西亚中文博客）马克
苦网(台湾) |第三世界网络(马来西亚中文)|中
国新文化学派 |谓我自然网 |周群 |新世代青年
朝晖网 |大同理想网|马克思主义者之家| 百度
理论图书网| 新青年|中央编译局| 陈独秀研究|
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东方明亮|东民网|霍华德
者的生活日志| 十字城镇:通向和谐社会快捷之
hkleftist |大别山论坛 | 共产主义者俱乐部|

中国文革研究论坛|中国文革（66-68）|文革时
术史之文革美术|文革宣传画(英) |毛泽东思想
|文革珍品典藏网（新加坡）| 红色艺术| 老电影
文学馆| 毛泽东像章收藏网|华夏徽章网||新湘

秘鲁红日杂志|革命共产党(加拿大) | 马列主义

主义(英) | 革命共产党(美) |图说巴黎公社(英)
（毛泽东主义者）|菲律宾共产党| 世界社会主
络（英文）|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

龙源电子期刊网|中国社科院 |强国论坛新帖检
询| 兴华论坛 |发展论坛| 天涯论坛 | 世纪中国
系统 |帖易：中文论坛门户|

逍遥公子|张广天|孔庆东东博书院|红星美女|老

英文独立媒体列表
独立媒体网络 http://www.indymedia.org/
第三世界旅行者 http://www.thirdworldtravele
世界社会主义者网络 http://wsws.org/
劳工出发 http://www.labourstart.org/
来自旷野镜像网站 http://www.copvcia.com/
澳大利亚绿色左翼网 http://www.greenleft.org
游戏结束 http://www.endgame.org
劳工伤害杂志 http://www.hazards.org/index.ht
皮尔杰文字 http://pilger.carlton.com/print/674
真正发生的事情 http://www.whatreallyhapper

幽默死了 http://www.humorisdead.com/index.
全球交换 http://www.globalexchange.org/
Z杂志：致力于社会变革 http://www.zmag.org
游行示威网 http://protest.net/
美国信息中心 http://www.davesweb.cnchost.c
不再有假新闻 http://www.nomorefakenews.co
为社会变革而工作 http://www.workingforcha
信息战争 http://www.informationwar.org/
宣传帝国 http://www.propagandamatrix.com/t
美国政治 http://www.americanpolitics.com/in
艾尔·马丁：知道太多的人 http://www.almart
格里格·帕拉斯特：新闻与电影 http://www.g
宣传评论 http://www.prwatch.org/improp/rese
布什观察 http://www.bushnews.com/
另类媒体网 http://www.alternet.org/
第三次世界大战报道 http://www.worldwar3r
反战网 http://www.antiwar.com/
新左派评论 http://www.newleftreview.net/NL

每月评论 http://www.monthlyreview.org/

更多参考网站：

【毛主席】维护人：朱社 信箱： zhushe@h
http://cn.netor.com/m/box200104/m5221.a

【高举毛泽东的旗帜】
http://cn.netor.com/m/box200203/m10295.

【山下旌旗在望】
http://my.coolala.net/bbs.php?a=revolutio

【人民英雄纪念碑】
http://cn.netor.com/m/box200203/m9871.a

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被关闭）

毛泽东网 www.mzd.com.cn (被关闭)

【毛泽东主义网】mzdzyz@mzdzyz.cc
http://www.mzdzyz.cc (被关闭)

郑州签名网

【昆仑之声】
http://www.klzhsh.com 被关闭

【兴华】freeangel121@163.com
http://www.1911.cn
http://www.1911.cn/bbs/index.asp

【中华英雄论坛】
http://www.china-hero.org

【铁血社】
http://www.tiexueshe.com

【铁血论坛】
http://www.tiexue.net/bbs/

【小草集】
http://www.bjzhenxin.cn/xcj/ （收费空间
http://zgxjxc.go.nease.net （免费空间，不太稳

【剑虹评论】

http://freethinker.51.net
http://www.comment-cn.net/

【世界工人论坛】workersbbs@yahoo.co
http://goin.to/workersbbs
http://free.deluxnetwork.com/~workersbbs

【东方之光】【东方之光家园】
http://eastlight.freewebpage.org/

【当代国际共运】

communistdwins@yahoo.com.cn,communistwin
http://communistwin.goin.to

【中国·国际科文网】
http://www.kewen.net

【中国817网】mzdbbs@126.com
http://www.china817.com

【岁月·人生】

http://www.51cd.net/

【岁月人生工作室】
http://www.51cdv.com

【新青年论坛】
http://www.xinqingnian.net/bbs

【龙源国际名刊网】
http://www.dragonsource.com
http://www.qikan.com

【刊林】
http://www.LHZD.com

【中国青年】chinayouth@spark.com.cn
http://www.spark.com.cn

【血铸中华】
http://www.china.1840-1949.net.cn
http://www.zjgphoto.com/china/bbs

【民族魂】

http://www.chinaspirit.net.cn

【新呐喊】
http://leftvoice.8u8.com 因被封，停止更新

【湖南在线华声论坛】
http://bbs.hnol.net/index.asp

【超级大本营军事论坛】
http://www.cjdby.com/

【一代伟人毛泽东】
http://www.chairmanmao.org/

【毛泽东思想研究】
http://www.mzdsxyj.com/

【左旋】info@zuoxuan.com
http://www.zuoxuan.com/

【毛泽东纪念馆】
http://mzd.chinaspirit.net.cn/

【毛泽东文学院】
http://www.zhaokao.com/school/homepage

【伟人足迹】
http://cnmzd.51.net/

【红色中国联盟】
http://http://www.redprc.com/

【红色中国】rednewchina@sohu.com
http://www.rednewchina.hpg.ig.com.br/in

【红色世界】
http://www.redworld.com.cn/

【中国革命文献】
http://geming.org/

【党史党建在线】(官方网站)
http://www.ccphistory.org.cn/default.asp

【毛啊毛网】maoamao@126.com,amaoc
013152552598 QQ：30243782

http://www.maoamao.com/

【韶山毛泽东书馆】
http://www.mzdlib.com/

【夏潮网】
http://www.china-tide.org.tw/index.asp

【反思与批判】
http://ca.internations.net/biz/fsypp/index.h

【共产联盟】
http://chagm.freewebpage.org/

【中国爱国新闻报】
http://1931-9-18.myrice.com

【中国思维】
http://www.chinathink.net/

【勿忘国耻】
http://www.wwgc.cc/dvbbs/index.asp

【反腐败网哨】
http://www.fanfubai.com/

【中国视点】
http://cnview.51.net/

【中华儿女】
http://www.cherni.net/lb5000/cgi-bin/leob

【历史天空】
http://www.weboys.com/history/bbs

【中華抗日同盟會】
http://www.mtfgi.com/nanjing/bbs/index.a

【文明的足迹】
http://wmdzj.xiloo.com/

【中华复兴论坛】
http://http://www.1840cn.com/bbs

【磐石在线论坛】

http://www.pszx.com/6.0/index.asp

【将军政要论坛】
http://jjlt.liful.com/000/cgi-bin/leoboard.c

【龙行天下】
http://www.fsgoodworld.com/123/

【抗日在线】
http://www.krzx.org/

【我们的文明】
http://mzd110.chinaspirit.net.cn/

【集美毛泽东像章馆】
http://lib.jmu.edu.cn/xuecun/maozedong/in

【自由论坛】
http://www.6328.net/bbs/

【环宇论坛】
http://www.huanyu-cable.com/bbs/index.a

【中华复兴　帝国论坛】
http://www.10000year.com/bbs/

【你好中国社区】
http://www.nihaochina.cn/

【红五星论坛】webmaster@zuoxuan.org
http://www.zuoxuan.com/bbs/notice_org.a

【朝峰论剑】
http://washeng.net/HuaShan/BBS/shishi/gb

【爱国者同盟】
http://www.1931-9-18.org/main/default.as

【士柏咨询网】
http://210.77.146.175/

【农友】
http://www.nongyou.org/

【中国乡村网】

http://www.china-village.org/

【China918爱国网】
http://www.china918.net/cn/index_cn.htm

【爱国论坛】
http://www.1931-9-18.org/bbs/index.asp

【环球军事论坛】
http://bbs.armystar.com/bbs/

【神洲评论】
http://www.6000year.com/luntan.asp?

【天下论坛】
http://www.creaders.org/cgi-bin/mainpage

【学说连线】
http://www.xslx.com/

【视点杂志】
http://www.chinanews.com.cn/chuban_1.h

【华夏论坛】
【读书笔记】
【国外理论与动态】
【军事与泥巴】
【民　风】
【天村】
【龙腾中华网】
【羊城网友周刊】
【新风旗帜网】
【在中国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http://www.csspw.com.cn/

【大同理想网】　维护人　淳远
http://www.dtlx.net/

满江红

世界工人论坛 http://workersbbs.goin.to/

国际歌歌友会 http://www.guojige.com/

爱龙网 http://ailong.com/

马克思主义论坛 http://quietlight.51.net/w

文革连环画 http://www.cartoonwin.com/

说明：标记为红色的网站建议使用代理软件或代理服务器上网（可能被封）

后记

本书是特大毒草，专供批判使用。为了彻底批倒批臭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在本书中编入了一部分机密材料，为了做好保密工作，希读者注意保管，不要遗失，并且不要转抄、翻印。

人民出版社资料室

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

作者: 页数:743页

人民出版社资料室

原书定价 RMB1.20

制作者：Yansan/2006年05月29日